

第九编 陶铸被揪与“一月风暴”

第五十三卷 1967年1月4日

(中央首长批陶铸)

1月4日

下午四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穆欣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公开指责陶铸是刘、邓路线的执行者，鼓励造反者整理陶铸的材料。参加会议的有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各院校的代表。人大、地质等院校闻讯后亦赶来参加(《传信录376》)。会后游行队伍到中南海西门。上万群众，情绪激昂，要求揪出陶铸。直到五日清晨六时半，周恩来出来接见，答应研究大家的要求。七时许，群众始离去。同时“揪出陶铸”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北京街头。在中央文革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同时，陶铸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安徽来京学生，对隔壁房间中正在筹划的对他将采取的行动，一无所知。

随着陶铸、王任重被打倒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瘫痪，中央文革起而代之。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穆欣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代表团时的讲话

首长进场，同学们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江青：今天的会，你们参加了没有？(指工人体体育场接见大会)(参加了)你们送给我们的材料收到了，我们中央文革正在研究整理，重要的整理出来，还要送给中央、送给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参考。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你们。(接着代表们汇报了有关陶铸同志、王任重和中南局、武汉、广州等地许多重要的情况，并交了材料。)

同学们，你们还有些材料、意见，我们还留下人来听，我个人感觉，你们打了个胜仗。
(热烈鼓掌)(指十二月三十日晚我们代表团在中南海舌战陶铸)

陈伯达：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闆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在中南海小礼堂回答我团问题会议)他是文革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反映的情况是很好的，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同学们！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条是要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争取多数，(不能)老受围攻，要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一块铁板，对于哪个集团的人也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多数同学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一块铁板，是可以争取的，一定要做细致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很重要，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热烈鼓掌)

王力：好好学习主席著作。

康生：同志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了，搞出来就胜利了。这是策略。好！再见！

同学们起立宣誓、呼口号，热烈欢送首长，代表们向首长提出要求：坚决要求陶铸同志就十二月三十日的会议上抗议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一事作公开检讨。

晚，有中国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红卫兵联队”参加的《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所属各单位及其他革命组织的三千多人，到中宣部集会，一致要求把陶铸揪出来批倒、批臭。并向全国发布了批陶呼吁书。

《陶铸跳出来以后……》(新北大中文系破私立公战斗队整理)

六月一日 毛主席亲自下令广播并发表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六月四日 个人野心家陶铸窃踞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等要职。随后陆续调其心腹张平化、雍文涛、王任重来京。

六月七日 陶铸与三反分子蒋南翔、何某等研究六六年高考的问题。

六月十日 毛主席在杭州发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陶当时在场。

六月十三日 陶铸回到北京，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却接受刘、邓的意旨，派张平化、李剑白为首的工作组进中宣部。

六月十四日 陶铸抽中宣部人员组成南下工作队，陶声言“现在是工作队专政”。

六月十五日 陶铸到教育部作报告，大保何伟，并任命他代理高教部部长，宣布教育部主要任务是清算董纯才(前教育部副部长)的凯洛夫教育思想影响，企图扼杀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会上大吹自己在中南局如何狠抓毛著学习。

六月十六日 陶铸派出以旧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组，刘某某为首的北京市小学文化革命工作组，雍文涛为首的中学文化革命工作组。

六月十七日 聂元梓等同志到中宣部送大字报，声讨许立群等黑帮。第二天，中宣部印刷工人贴大字报揭露工作组提出“清经济”、“整顿内部”、“扫清外围”、“人人洗手洗澡”等错误口号，陶铸和工作组万分惊慌，企图压制群众的革命行动。

六月二十一日 陶铸炮制中宣部文革小组，并指定他本人及张平化、张际春、李剑白等为小组成员。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宣部文革小组成立大会上要中宣部的各处对群众进行左，中，右排队，规定中宣部运动为三个月。不久，中宣部许多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扣上“抱粗腿”、“黑线”、“保皇”等帽子。

六月二十五日 陶铸到卫生部保钱信忠，说“哪有那么多黑帮？”陶还反复强调：“要依靠党团组织来进行领导。”企图以所谓组织纪律来压制群众运动。

六月二十六日 陶铸伙同刘、邓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文化部文化大革命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要求“从解放军抽调一千多名干部，加上本部的政治坚定的干部组成工作队派往各单位领导运动。”

七月一日 陶铸到北大作报告，把北大“六·一八”革命事件说成是“少数人捣乱”。还说“六·一八”以后，“北大运动更深入了”，肯定并支持张承先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并散布反对地方党组织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等谬论。

七月十三日 陶铸根据刘少奇指示，审查批准了《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放假毕业等问题的通知》，不让中小学参加文化大革命。

七月十四日 陶铸以中央名义宣布中宣部副部长及所属单位负责人名单：

张平化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张际春为中宣部副部长。

雍文涛为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后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萧望东为文化部代理部长。

何伟为教育部部长。

丁莱夫为广播事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钱信忠为卫生部部长。

荣高棠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陶铸还宣布派出南下工作队的决定，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要求 25 日前到达目的地，并发给工作队员几篇由刘少奇指定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王任重给湖北省委的一封信。(信中提出“枪打出头鸟”反动理论。)

七月十六日 在中宣部斗争阎王姚溱大会上，陶铸公然表扬彭真的死党许立群说：“他有悔过之心”，“还有点想革命的要求”，加以保护。

七月中旬 陶铸根据王任重的提议，刘少奇的批准，肯定“刘仰峤不是黑帮”，指示何伟“保护刘仰峤过关”。于是刘仰峤离京他去。

七月十八日 毛主席回到北京，对派工作组的作法作了批判。

七月十九日 陶铸手下大将张平化主持中宣部几十人参加的“声讨”周扬的“大会”，这个“大会”是贯彻执行刘少奇关于周扬问题三点指示的杰作。

七月二十日 陶铸布置南下工作队员学习刘少奇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及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黑提纲，并要成立一个教育组，要求在一个月内系统地提出大、中、小学教育改革方案。

七月下旬 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主席指示，决定撤销工作组。陶铸急忙将南下工作队改为“观察员”，后又将“观察员”改为“联络员”。在此期间，中宣部揭发李剑白(工作组副组长)错误之后，陶铸仍派李率领变相工作组到教育部执行任务。

七月三十日 陶铸在人大常委会万人大会上讲话，公开为张际春和坏工作组开脱，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甚至说工作组有的单位“不派不行”。

八月二日 陶铸陪邓小平到人民大学，邓说“要选定目标……”陶铸跟着说“辩论就是选目标嘛！”阻止人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

八月四日 陶铸授命中宣部副部长刘祖春到教育部讲话，把数百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陶铸一直认为“刘祖春的讲话基本上是正确的，精神是好的”，拒不为革命群众平反。

八月六日 陶铸以联络员形式派出变相工作组去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局、学部等单位。

八月十四日 陶铸与邓小平接见人大文革筹委会，二人串通一气，把保郭(郭影秋)派种种错误作法说成是有阶级感情，说郭是二、三类干部，是人民内部矛盾。

八月十五日 陶铸把被群众罢了官的张际春和中宣部工作组组长臧剑秋塞进中宣部文革。

八月二十日 陶铸到中央组织部讲话，要革命群众不要把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分子“都打成黑帮分子，那样安子文就不孤立了，不要揪得太多，不要人人自危”。同日，陶铸接见西安交大同学代表，说交大同学静坐示威是“伟大的创举”。这句话传到西安后，陶铸又托秘书打电话给西北局，加以否认。

八月二十一日 陶铸在人大辩论会上保护郭影秋，说“郭影秋就现有的材料来看，现在不是黑帮。”要求把郭的问题放下来。

八月二十五日 陶铸接见中南地区赴京同学时，为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和王任重开脱，说“我这中南局第一书记刚刚罢官，交给他，不能由王任重同志负责。”

九月三日 中央组织部革命群众一致要求斗争安子文，陶铸到部决定对安子文不准开大会斗争，并悄悄把安弄走。

九月十四日 中宣部阮铭同志给陶铸写信，对中宣部运动提出八点意见，其中心是要揭中宣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并批评了陶铸本人。

九月十七日 陶铸接见广东学习团 12 位同学，为广东省委及赵紫阳、区梦觉、王兰西、杨康华、李嘉人等(均为省委书记或常委)打保票。说：“我当省委书记近十五年，省委的问题我负有主要责任。”

九月二十日 陶铸委托熊复会见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两支红卫兵代表，传达陶的四点指示，对学部内部的斗争采取折中主义。

九月二十二日 陶铸否定阮铭 14 日给他信中的意见，说“中宣部不存在路线、方向问题”，“方向和路线是对的，方法也是对的。”“依靠了左派，斗争了右派。”压制群众揭发批判中宣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自己的罪行辩护，还污蔑红卫兵，说“红卫兵有什么了不起，到街上拿八分钱买一个红箍戴。”

九月二十三日 陶铸批准荣高棠 21 日提出的不许运动员外出串连的规定。派聂济峰以“顾问”为名去中央组织部执行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的任务。

十月六日 陶铸在教育部汇报会上，为何伟定框框，说“何伟是方向路线错误，不是黑帮”。“何伟与陆定一没有关系，只有工作关系。”对何伟说：“何伟，你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嘛！你就不是黑帮。”甚至污蔑革命群众说：“现在就是有人，不把别人打成黑帮不过瘾。”

十月十日 何伟接受陶铸的指示，在教育部传达陶铸六日的讲话，神气活现地把陶铸对他说的“你不是黑帮”重复了五次。

十月二十日 陶铸重申中宣部没有路线方向问题的老调，并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 50 天，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

十月三十日 陶铸接见湖南赴京革命师生和干部代表，包庇张平化，吹捧“湖南工作近两年有进步”“四清搞阶级斗争是坚决的。”“湖南的情况在中南说来是严重的，在全国说来不算严重。”甚至盗用中央名义说“中央还信任张平化，还是让他回去当第一书记”。

十一月五日 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说：“你们把主要目标对准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不对的。”妄想保护刘、邓过关。

何伟迫不得已抛出一个假检讨，八日又发表拒绝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声明，十五日陶铸批准他“休养”，让他躲藏起来。

十一月十一日 陶铸在中南海接见串连革命师生，为周荣鑫打保票，说“现在有些同志不信赖接待站，连秘书长都不信任。”

十一月十六日 陶铸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当着谭启龙的面要求同学向谭要指示，说谭是“老山东”，“觉悟高”，“执行毛泽东思想路线”，解决问题由谭启龙同志解决。实际上不让山东革命师生揭发谭启龙与山东省委的问题。

在这次讲话中还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不作内部问题处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黑龙江的李范五，一个是甘肃的汪锋。”

十一月十七日 陶铸在一次会上说“《红旗》杂志社贴的大字报说中宣部的运动是路线错误，我不同意！”还大骂刘祖春：“教育部是我叫你去的，自动么是路线错误？你这个人不象个共产党员，连旧社会的为人道德也不够！”当即要刘回华北局去，不当中宣部副部长(刘曾于 15 日在教育部作检查，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就在这一天晚上，刘接见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宣布 15 日检查无效，说“不符合陶铸同志的指示，当然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陶铸听了喜笑颜开，也不再提撤刘的职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 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胡说刘、邓反动路线主要是“认识问题”，他再次强调中宣部“运动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宣部有特殊性。”当即引起群众不满，贴出大字报。

从十月三十一日以来，中宣部革命同志批判工作组及炮轰文革常委的十几次会，陶铸一次也没参加，秘书处的同志写信给他，批评他的官僚主义，要他听取群众的意见，他非常冷淡。

十一月二十二日 教育部革命群众因何伟、刘皑风等人破坏中央关于平反指示，揪着刘皑风去见陶铸，等了一天一夜，陶拒不接见，只召见了刘皑风，指示刘“要把党委的旗帜打起来”，进一步镇压革命群众。

十一月二十三日 陶铸知道革命群众对他 21 日的讲话不满，急忙派熊复到中宣部传达他的三句话：中宣部在总的方面执行了正确路线；但受到错误路线的一些影响，影响多大可以讨论；工作队李剑白、许以倩在机关事务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步步为营，继续顽抗，掩盖他本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事实，压制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刘皑风到教育部传达陶铸指示，派文办张孟旭到教育部组织领导小组领导运动，并说“何伟有病暂不参加领导小组。”（事实何已出院）继续控制教育部运动，保护何伟。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宣部部分革命群众贴了一张大字报《和陶铸同志讨论一个问题》，批判了陶铸强调刘、邓反动路线是认识错误而不是立场问题的说法。陶铸大为恐慌，急忙抵赖，把自己的报告提纲给人看，叫人验证，查问有没有录音。并马上发表“声明”，指令中宣部文革把它登在《简报》上和《战斗快报》上。

十二月五日 陶铸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当着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的面为许开脱说：“省委有进步。”希望同学回去对省委“压力不要太大，压扁了就不行了。”安慰许说：“你们受了一些委屈。”

十二月八日 陶铸在中宣部被迫表态，说中宣部运动受到反动路线的严重影响，有些地方执行了反动路线。对中宣部三十几位工人被打成“反革命”一事，佯称“不了解情况”。

十二月十三日 陶铸对卫生系统作报告，洗刷自己和刘邓路线的联系，自封“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十二月十七日 陶铸继续给何伟定调，说：“是不是黑帮，要揭，要批嘛！当然啰，还不象有人说的是黑帮。”

十二月十九日 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五同志贴出《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打响了对陶铸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当天高教出版社某小组贴出大字报，攻击这张革命大字报是“反革命大字报”，一些战斗队写出大幅标语“谁攻击陶铸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砸烂它的狗头。”

十二月二十日 戚本禹同志写信给李冠英等五同志，表示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是可以的，“说这张大字报（指李冠英等五同志的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并针对着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是错误的。有人把写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要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此后哲学所、教育部、北师大、人大、中宣部等单位群众纷纷贴大字报指出陶铸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人物。

十二月二十一日 陶铸接见人大揪郭（影秋）兵团时说，邓小平 8 月 14 日在人大讲话是“中间的，我的讲话稍好一些，中间偏左。”

陶铸在广播事业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替丁莱夫开脱，说什么丁莱夫最大的问题是不出来革命。

十二月二十二日 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代表，为张平化求情。

陶铸接见文化单位代表时为肖望东开脱说：肖望东，你是个将军么！（陶还曾说过“肖望东是毛主席派来的。”）

十二月二十九日 陶铸接见安徽省八·二七革命职工赴京控告团，把李葆华（安徽第一书记）张凯帆（安徽书记处书记）请到会。会上陶铸态度非常不好，到会的职工非常不满。

十二月下旬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红卫兵联队等单位发起成立了“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

十二月三十日 陶铸在中南海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对同学揭他的问题大动肝火，甚至高举双手提出“强烈抗议”，陶颠倒黑白，语无伦次，千方百计打击同学，为

自己洗刷。

六七年元旦 陶铸召开宣教部门负责同志会议时说“给我贴大字报，欢迎！我就是这些事嘛，贴一个星期就过去了。”

一月三日 首都许多单位成立批判陶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委员会或联络站，中宣部贴有对联“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横额“彻底砸烂”，标语“陶铸是中国最大保皇派”等。

一月四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同志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陈伯达同志肯定同学对陶铸问题“揪得很好”，指出陶铸在中央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南地区的“后台”，江青同志说陶铸“独断专行”。

此后批判陶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高潮。

一月十日 在人大会堂陈伯达同志说：“陶铸同志是坚决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同志揭穿了这件事，毛主席是知道的，毛主席想挽救他，是知道他执行刘邓路线的，让他过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继续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推广了。”

《陶贼投敌经过》(摘要)

1933年5月18日(农历)陶在上海康脑脱路被国民党督察处逮捕。同年9月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34年2月转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6月27日判无期徒刑。1937年7月，陶在其兄陶自强等人的劝诱下叛变，于7月12日写信给蒋介石，信是陶自强交陈诚，再转交蒋介石。全文如下：

校长钧鉴：学生过去误入歧途，参加异党，触犯国法。现已觉悟，决定脱离共产党，抛弃以前之错误政治主张，愿为党国出力，参加抗日工作，以赎前愆，伏望宽恕。敬仰钧安，学生陶铸上，7月20日。(原载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东方红简讯》第四期，1967年9月23日)

[按] 权延赤：《捅陶铸致命一刀的人是谁？—女儿陶斯亮的回忆》《爱我中华》(第一期)一文载：陶铸被整，罪名除“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中国第三号走资派”之外，更致命的是“叛徒”。这份材料是由陶铸的亲兄陶自强在陶铸被揪出来以后，专案人员严刑威逼下所写的。陶自强早年与陶铸一同参加革命，同在一起作白区地下工作，又同一时期被捕，在国民党的严刑威胁下叛变。解放前夕，陶自强率县大队起义，后任祁阳中学校长。文革中，又因“被打得受不住”，而写了揭发陶铸也是叛徒的材料，成为江青、康生致陶于死命的有力武器。

另有一份在文革中，中央首长对陶铸批判的材料。这是由当时的小报汇集的。录以见横加陶铸的所谓“罪行”。

周恩来对陶铸的批判材料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把方向指正了，不要把方向指错了。要指向制定反动路线的

刘、邓，进一步指向继续执行反动路线的陶铸，进一步指向彭、陆、罗、杨反党集团。

.....

同志们，刚才说你们要批判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批判陶铸同志继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对的。

—1967年1月8日接见农林口部分师生和人大红卫兵的讲话

.....现在地方上许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把矛盾上交，陶铸给长沙打电话，要三千人来北京，有的买不上票，就打起来了。

—1967年1月10日在接见有关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京广线的问题是陶铸打电话给省委的。

—1967年1月10日在人大常委会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和第三司令部代表时的讲话

我们想向你们谈谈1965年毕业生的工作问题。去年12月7日，陶铸同志接见你们的代表，满口答应你们可以回母校搞革命，这样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十七、八万未转正的大中毕业生，连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毕业生，有将近三十万未转正的毕业生。转正的是极少数，只有两、三万人，其他都未转正。要按陶铸的意见办事，二、三十万的毕业生都要离开原工作岗位回母校去，就要转了方向。所以在去年12月有一次我接见你们的代表，就把这件事压下来了，说要重新讨论、重新安排。过了不久，就是在12月30日，有伯达、江青、王力等同志参加的接见武汉、广州专揪王任重代表队的会上，陶铸同志对党、对群众表现了极大的不满情绪。会后，康生同志、江青同志直接批评了陶铸，指出陶铸来京后一直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又继续执行了刘邓路线，出了许多乱子，刚才所说的这一次，陶铸总暴露了，伯达同志也就直接揭露了他，群众也就很清楚了。陶铸同志来京后任常务书记，后来又任中央常委，现在根据中央的要求、群众的要求，正让他作书面检查。

现在陶铸的问题清楚了，你们以前提的问题也就不用压着。

—1967年1月13日晚接见一九六五年大专学校在京毕业生实习生时的讲话

.....新的课题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把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后来陶铸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

—1967年1月17日晚在接见首都大中学校和中央各机关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以前是刘邓，后来是陶铸推行的路线。

—1967年1月18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

现在各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玩弄经济主义，有一种恶劣的手法，就是发钱、发粮票、发车票，把矛盾上交，逃避群众对他们的斗争。中央的陶铸，文化部的萧望东，总工会的马纯吉，劳动部的郗占元，也采取了发钱、发粮票，为了收买人心，对中央施加压力，鼓励小学教员、合同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京。

—1967年1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各地来京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在十一中全会选举后，在中南海国务院门口出了陶铸的大字报，那时我的责任是说明啊，出了第四号人物，我说不要这样提，错误是有的，但是要相信他。十一中全会刚选出，你能不相信“陶铸同志”！那个时候还叫“陶铸同志”了，我没有根据嘛。后来逐渐发现一些问题，感到不对头了，越发现问题越多嘛，一直到了.....特别是到了，我们年底内部批评他，主席还谆谆告诫他，还感到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我们看了。今年一月二日，对武汉赴广州同学还盛气凌人，那些话等于不满，我们是批评了他的，他那个牢骚，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不大对头，还没有看到他的.....(缺字——编者)那时我们在三个附中里等着，也想帮助，如果揪他的话，还要出来解释，即从中南海抓出来总不好嘛！他承认了一个错误才解了围。他开始时还提抗议，后来他说抗议错误了。对这样的人我们一步一步地

认识嘛！

—1967年1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与首都部分院校师生的讲话

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陶铸的错误之一就是他在接见中南地区学生的一次会上说，除了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外，都可以怀疑，表面上看，好象他说的也对，尊重毛主席，实际上是孤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句话是不许可的，不能绝对化，领导干部还要一分为二，还是有好的。

—1967年2月1日接见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十一中全会以后，也存在否定一切的思想，各单位尤其是工交系统也是“长字号”靠边站。这思想来源于陶铸。当时陶铸就说：“除了毛主席、林彪同志不能怀疑，其余都可以怀疑。”实际上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孤立起来了。

—1967年3月21日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财贸口各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这倒是陶铸思想啦！交印倒是象陶铸办的。陶铸在广东省也是这样做的。广东省赵紫阳就是这样签字交权的。

……中央各部是中央的政权，是国务院的，怎么把党组、党委的权让出去了呢？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许的，你这个思想是陶铸的。党委靠边站，我就没听说过。

……陶铸这是让了权，不是夺权。陶铸就是从怀疑一切走到了取消一切。陶铸的思想是有根的，陶铸召开的元旦会议，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今天才知道。陶铸召开这个会事先没有和我说过，你们要好好把陶铸的思想肃清一下。

……陶铸让党委靠边，这是今天的新发现，陶铸总是朝令夕改。

……卫生部去年6、7月份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陶铸的反动路线就更厉害啦！8、9、10、11、12，有5个月时间，这么长时间文教口不能不有很大影响。7个月的反动路线影响很大，在3个月内一下都肃清，是不容易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要分轻重，……部门也是这样。当然有的部也执行的很严重。文教口陶铸管了5个多月了，影响很深。

……十一中全会后，各口还没有肃清陶铸到处说的怀疑一切。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这不是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孤立起来了吗？

……应当很好地批判。不要否定一切、排斥一切，这是宗派思想，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1967年3月24日接见卫生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领导干部时的谈话

广东的盖子揭得很晚，是陶铸阻挡的。本来有人想在中央十月工作会议以后承认犯了反动路线的错误，陶铸说中南系统好象总是有点不同，顶多说一个方向性错误吧。总是拖住。在十一中全会后的八、九两个月，陶铸、王任重打招呼的事那就多了。那个时候，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中南局书记嘛，当然有些话是不会不受影响的。他们的电话也特别多，当然有些公的，有些私的，他的电话也很难分它是公还是私了。(笑声)因为当时我们有分工嘛，我管北京、中央，还有很多工作，才开始嘛！各省都让他打了，出的乱子也就多了。

…………
矛头要直接指向刘、邓、陶。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到中南、广东，当然就联系到陶铸，陶铸底下还有赵紫阳他们几个人。结合到本地，陶铸也算本地，半本地了。所以要指向刘、邓，因为刘是最大的，要系统地批判。……那末在广东来说，当然必须结合到陶、赵这些人，也要结合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的斗、批、改。

…………
看广东的阶级斗争盖子，象陶、赵这样的，在广东是头号的，问题确实还没有认真的揭发出来，还停留在口号上，认真地揭发还有更多的可以揭发的，还要警惕他们的阴谋。

至于暗流倒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我刚才指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两个暗流。一个是并没有被彻底批判的领导广东十五、六年的陶、赵这个暗流，另外一个就是地方主义复辟的暗流。这两股暗流倒值得注意。

—1967年4月18日在广州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问军艺《星火燎原》代表：)你们搞文艺的，陶铸那样的两篇文章，你们读了没有？(答：没有。)所以说你们一直叫喊打倒刘、邓、陶，不读东西，没有原料。要好好读东西，与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

—1967年5月18日接见部队院校斗罗筹备处核心组与军艺《星火燎原》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同志讲到“贺希明、霍泛的材料你们可以调查研究，中央今天正式告诉你们，贺是混入党内的高级特务，是李宗仁的红人”后，周总理说：“上次会议揭发贺时，他不敢抬头(康生：他是军级政治部主任)他还是陶铸支持的，把他带到广东，我很熟悉他，但不知他这么坏”。

—1967年6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第四次接见广西代表的讲话

湖南问题不统一慢慢会统一的，你们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全国有刘、邓，中南有陶、王，湖南也有嘛。

—1967年7月19日第二次接见湖南双方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对陶铸的批判材料

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指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在中南海小礼堂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问题会议)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江青插话：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反映的情况是很好的，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1967年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讲话

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到这里来，我说，马列主义研究院有人到这里来，我说你们是当学生的，只能学习，后来听说又当成中央工作组看待了，我就发了很大脾气。

……马列主义研究院来的人，我也不认得他，我只是说你马列主义研究院停课，根本没有教课。他们到处学习学习，那么到新华社也是一种学习，可以派些人来。

……给大家声明一下：过去如果你们这里有什么中央工作组，这是一个假的。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工作组。……

陈伯达同志的秘书插话：后来伯达同志要离开北京，他又请示，他说到新华社的那些同志和谁联系？向谁汇报工作？伯达同志说：“给谁也不要汇报工作，和谁也不要联系，就到那里学习就行了。你们在这研究院里没事，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能到那里去学习，当小学生。”经过就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成了工作组了，后来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开万人大会的时候，陶铸当时就跟伯达同志说，你也派了工作组——新华社工作组，我当时听了非常生气，因为这件事是我经手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他一定要说是工作组(伯达插话说：“而且是中央工作组。”)后来谢平仄犯了错误，新华社同志写了封信，后来伯达同志发现了，看了这封信以后非常生气，后来给康老看了，说哪里是工作组！谢平仄是什么人？(伯达说：“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他，没有见过面。”)当时叫我给赵某某打电话查这个人是什么人，根本不了解这个人，谁叫他当工作组组长的，后来说马上把他撤回去，撤回去检讨，后来把在新华社的马列学院所有同志都撤回去。他们在这闯了祸，事情经过就这样。刚才同志们还一再强调是工作组，实际上不是工作组，陶铸一直也强调这是工作组。(群众：“这是栽害伯达同志！”)这

是个阴谋！（群众：“这是阴谋！”）伯达接着说：我在这里就没派过工作组就是了，如果有，是假的就是了。……

……从新的中央宣传部陶铸同志接管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很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子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在他们所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算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的？（众：“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得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这两个传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能够识别它、识别这种……（江青插话：“恶劣的”。）极端恶劣的手法，揭发这种阴谋，揭发这种极端卑劣的手法，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这是我们党、毛主席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揭露这种阴谋、这种歪曲。我们党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我们的革命的传统，实事求是的传统，科学的传统，尊重事实的传统。有人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想把这个传统抛弃掉，想篡改这个传统，这是很清楚的嘛！这些图片，就是很清楚的嘛！还有电影（戚本禹插话：“还有些电影，我把情况说一说吧！主席接见几次，拍了一些电影，这些电影在审查时，发现他们在拍的电影当中，他们突出刘、邓，把刘少奇、邓小平的画面搞得很大，形象搞得那大，当时，江青同志、伯达同志指出了这个问题，后来才不得已作了修改”。）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华新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在一切文艺界斗争是很激烈的。现在还是很激烈的。你们挺身而出，来揭露这些事实，我们感谢你们！（掌声）至少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识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样搞阴谋。这些照片你们还有一些，还可以找出来，作为教育的材料，作为反面材料。

—1967年1月7日在新华社的讲话

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消灭阶级敌人。敌人不向无产阶级投降，就叫他灭亡。不要以为没有斗争了，我们还要斗争。有一小撮人搞阴谋诡计，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被揭露了，打倒陶铸，我给武汉某某造反团谈话说，陶铸在刘、邓路线推行时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中有的同志揭发陶铸执行刘、邓路线这件事，揭穿这件事，中央、毛主席是知道他执行刘、邓路线的，想挽救他，叫他过来。可是十一中全会后，没有过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还是继续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和王任重领导着中南局，出现了许多事件，是典型的反动事件。在武汉逮捕了大批群众，相当大规模地逮捕群众，逮捕革命群众在其它地方还没有发现过，我们想帮助他，帮助陶铸同志，但他没有转过来。他的世界观，他的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可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中央文革小组批评他，在常委批评他，但没有能够触及他的灵魂，是否帮助他不够呢？他自己认为是这样，我们认为是认真帮助过他，在十一中全会前就批评过他，希望他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当然，我们说的婉转些，十一中全会以后，他继续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公开摊牌好，不然，我就不安了。”他是这么说，做还是那么做，他仍然照他的轨道前进，街上这么多的大字报，打倒陶铸，这不是文革小组的过错，是不是我陈伯达的过错？后来他自己写过一封信，有一句话——咎由自取。对党中央、毛主席写这样的信，不是那么合适，但事实上倒真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上去，我们帮助也帮不上。是否除陶铸以外，就没有其他人了呢？恐怕还有个把吧！我们

根据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但有的病不能治了，的确不能治了。陶铸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表演，这几个月表演得够瞧的了。当然陶铸在大街上有那么多标语，有群众的压力，或许可能好一点吧，看看！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跑到我们党内来，也许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可以过关，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过不了，《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社论，我们社会主义要经过好多阶段，推翻了国民党，没收官僚资本的关过了，没收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关他过了，三反五反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反右派、公私合营、三大改造也马马虎虎过关了，五七年反右斗争因为没反到他头上，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五九年反彭德怀，不是直接反对他，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告诉我们，是长时间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因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不可能设想很快就没有斗争了，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死灰复燃，事实上，资本主义因素在我们国家是存在的，在思想这个问题上影响是很深的，不能低估，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社会主义这个大关，很多人、相当多的人就过不去了。当然，相当多也还是一小撮（江青插话：七亿人口中就是有三千万也还是一小撮！）

—1967年1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小礼堂接见有关代表的讲话

《人民日报》有些社论不是我主持搞的，有的我是不同意的。一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是我主持搞的。二论抓革命、促生产不是我主持搞的，是陶铸主持的。

……在后来我没有管《人民日报》的一段长时间内，唐平铸是跑到陶铸那里去了，实际上是陶铸在管。唐平铸表面上是要我管，说：“你还是管《人民日报》吧！你不能不管呀！”陶铸也是表面上要我管《人民日报》，实际上没有让我管，我也没管。

……（王力、关锋同志插话：《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同志执行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唐平铸执行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到报社来的学生也看出来了。）

—1967年1月17日在《人民日报》全体大会上的讲话

在这个运动中，从中跳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大头目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也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的斗争中跳出来的。

—1967年1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召开的
厂矿企业革命造反派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陶铸是革命群众揪出来的，我们支持。

—1967年4月7日在参观首都红卫兵成果展览会时的讲话

邓小平、陶铸都可以批判。毛主席许多文章是在斗争中写的。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出马克思主义，出毛泽东思想。要批判刘、邓、陶不断提高斗争水平。

—1967年7月15日晚在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

康生对陶铸的批判材料

同志们：

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

—1967年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

关于陶铸，我讲几句话。伯达同志讲了，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推广刘、邓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文革小组、中央常委面前、毛主席面前都几次帮助他，批评他，他都采取两面派。有时很“左”，实际是形“左”实右。

建国以后，我们党进行了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同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一次是同彭、黄、张、周的斗争，一次是同彭、陆、罗、杨的斗争。陶铸在高、饶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检讨，第一次是没有过关的。第二次勉强过关。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也好。他们怎么对待毛主席、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周扬的侄子周立波写

了《韶山的节日》，是大毒草，就登在《羊城晚报》上，并且还第二次发表。再比如，去年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中央立即通知全国各地不准登载，但隔两个礼拜，广州报纸全篇登了，他是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王任重那一套就是陶铸那一套。姚文元的文章全国各省都登，就是陶铸领导的湖南省委没有登。因此，我们宣布陶铸的问题不是仓促的。在常委，在文革小组，批评他，他与李富春、李先念的性质是不同的。……

—1967年1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小礼堂接见有关代表的讲话

陶铸问题并非偶然，主席屡教他不改。陶铸拥护高岗。广州文革是陶铸领导，《羊城晚报》登“毛主席回韶山”（疑为《韶山的节日》——原编者），这是周扬的儿子（疑为“侄子”——原编者）写的大毒草，后觉不好，但又重登。去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按语，发表后，全国不登，《羊城晚报》全文登。姚文元文章全国登，独湖南没登。陶铸要滑头，两面三刀，拥护彭真是明显的。

—1967年1月13日在接见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联络站的讲话

河南武斗不是停止了，而是一天天地发展，有军区的某些人在我们面前玩两面派手腕，还在煽动群众，同志们从这个地方，可以懂得什么叫陶铸，什么叫王任重，那些坚持执行，坚决拥护陶、王的人，象文敏生、赵文甫等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你们拥护的是什么首长，他是什么结果。

同志们要注意国家大事，脑子里有敌情，有阶级，有敌情。陶铸、王任重不是死老虎，陶铸、王任重还把手伸向河南，他们的黑爪牙是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敏生、赵文甫等。

河南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过去是受中南局陶铸、王任重领导的。

—1967年7月21日接见河南各方代表时的讲话

谢富治对陶铸的批判材料

我们要打倒刘、邓的，陶铸的反动路线，……

—1967年1月17日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搞革命，搞什么？主要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1967年4月10日在接见首都工代会全体委员时的讲话

大海航行靠舵手，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要针对刘、邓、陶、彭、罗、陆、杨一小撮，彻底革他们的命，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首先要革这一小撮。

—1967年8月1日凌晨接见北京钢铁学院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江青对陶铸的批判材料

同学们：

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骗了，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做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

—1967年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

我们对陶铸善意批评，他耍两面派，他伪造照片。那次会议是康生同志主持的，他对熊复下命令，一定要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就把陈毅的头弄掉，换上邓小平的头，这是非常恶劣的！这是特务活动！这些说明陈毅不是他们的人。他们还搞了一张把毛主席、刘少奇和宋庆龄拼凑在一起的照片，已经发到了全国。（康生同志：已经传到外国去了！）陶铸、熊复就是这样干的，还有一个人，可能还有。唯独陶铸和熊复这样干的。第三次接见的电影还是违

背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都是陶铸同志干出来的，肖望东也照办。

……他镇压我们小组，和王任重勾结在一起。

……肖华同志休息一、二年，刘志坚是第一线的。去年又捞一点资本，从此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不过，很隐蔽，但狐狸尾巴还是漏出来了，开始是王任重，后是他，接着是陶铸。

我们斗争的锋芒要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一些说了错话、犯了错误，但认识了，知道了，就不能象对刘、邓那样，也不能象对待陶铸那样对待他们。如果那样，我们国家还能有几个人工作？我们国家很大，你们想一想。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众：清楚了！）那就好了。

……

……李富春同志惹了祸，搞了统战部。统战部是李富春同志送了大字报去，才揭开了盖子。现在，有人要鼓动人来搞他，这合理吗？合乎毛泽东思想吗？（众：不！）这些同志在困难时候，是站在毛主席一边，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刘、邓、陶那样对待。过去教育你们，对自己的队伍，要分清敌我。现在教育你们，对领导也要分清敌我。

—1967年1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小礼堂接见有关代表的讲话

听说文化部来了二十万人，每天还补助七毛（台下有人插话：元旦另补助五毛），这是陶铸搞的。他们来干什么呀？外地来京的工人，有的是来京告状的，有的是受骗来的，总工会、劳动部向全国发了通知来北京开会。

—1967年1月17日接见首都大中学校和中央各机关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你们对那么大的刘、邓、陶不感兴趣了。贴自己人的大字报，这是亲者痛，仇者快。

—1967年1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三司代表时的讲话

现在我们队伍中有分化，有些人态度很不明确，“怀疑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是陶铸搞的。

—1967年1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

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影片是完全违背了十一中全会的精神，美化刘、邓、陶。（戚本禹同志插话：这完全是陶铸安排的。）

你们回去能否把一、二、三次主席接见红卫兵影片中刘、邓、陶的镜头剪掉，关于这方面我每次和赵辛初斗争得很厉害，我对赵辛初说，你们那个部（文化部）岂有此理，完全是刘、邓、陶的，要好好斗他，把斗的家伙统统斗倒。

肖望东为什么不斗？应该斗，群众要揪肖望东，陶铸把他保护起来，把他搞到旅馆里，搞到医院里，说他有病。但在天安门上却很神气，他身体比我还好，新旧文化部实际上是一个样，文化部那几个副部长都很坏，他们把几个黑帮保护起来，你们不去斗，不去夺权是很危险。

—1967年2月1日在接见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
和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伯达、江青等同志参观首都红卫兵战果展览会，有人问：“陶铸有何反映？”）江青同志指示：“主要反映他是反革命两面派，还要批他的两本书（即《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他在文教口做的坏事最多。”“（陶铸）改口号、改照片可以反映。”

—1967年4月7日参观首都红卫兵战果展览时的指示

张春桥对陶铸的批判材料

对于同志们知道的安亭事件那个事情，他们传达了谁的指示呢？传达陶铸的指示，因为曹荻秋就是跟陶铸打电话，陶就给说了，就是那种口气吧：“张春桥同志既然已经承认了嘛，那就只好这样，再继续工作吧！再把它改过来吧！”就是这样，那曹荻秋就是根据这个来办

事的，他就执行陶铸的。

—1967年2月24日在上海革命广场对革命群众的讲话

现在提出“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是无政府主义的口号，这是对外讲的，实际上这是反动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是陶铸提出的，在运动一开始我们没有反对它，这是由于在运动开始时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在当初姚文元同志曾写过文章，但毛主席说不要发表了，我们也反对当时湖北展开的全面批判这一口号，但是运动发展到现在矛盾基本暴露了，如果再提出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就离开毛主席的路线更远了。

—1967年2月25日与华东局革命造反派座谈时的讲话

现在造反派有个想法，觉得有些人是死老虎，其实是活老虎，从政治思想上来说，他还是代表，要批判代表人物，刘、邓、陶没有死，彭德怀也没有死。

—1967年7月15日在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

王力对陶铸的批判材料

我们北京的形势也是好得很。北京的形势，特别是在最近这一个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揭露了陶铸，(群众热烈鼓掌，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熊复！……)揭露了他继续忠实地执行刘、邓路线，揭开了这样一个盖子，这个变化特别表现在中央直属机关同宣传文教系统，各个单位把陶铸这个盖子一揭，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起来了(热烈鼓掌)。过去是一块大石头压着。毛主席指示我们，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有学生运动、有工人运动、有农民运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地投入到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是不行的。有好多重要的问题，还是要依靠机关干部来揭露。

同志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就是根据毛主席这个思想，提出了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的革命群众揭露了陶铸的问题，现在机关里，好多重要的机关，我们看一看，过去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现在变化了，盖子揭开了，斗争展开了(热烈鼓掌)。什么陶铸呀，什么熊复呀，什么大大小小的人物呀，那些继续最顽固地坚持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统统被揭露了。陶铸么，在刘、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就是忠实执行刘、邓路线的，他的屁股就是坐在那一边，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在什么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在要把人家，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上，在什么所谓恢复党团组织这样的问题上，就是执行的刘、邓路线。而在刘、邓被揭露了，刘、邓路线被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一边站了，陶铸成了继续执行刘、邓路线的人，千方百计地阻止对刘、邓路线的批判，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个批判，继续压制革命。特别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起来了，他就更沉不住气了，千方百计地压制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刚起来的时候，这种形势本来是好得很，可是他觉得不得了喽，一定要把它压下去。凡是他领导的单位，凡是他过问的单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够得到贯彻，就要继续执行他的那一套。他的一套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货色呢？它是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红旗》杂志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已经变成一个全国的、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的时候，这个陶铸，他还是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这个词，他也反对(群众呼口号：打倒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陶铸！打倒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打倒陶铸！打倒！打倒！)

在你们的新华社搞的一套是什么东西呀，什么照片一定要把邓小平的脑袋搬到陈毅同志的身子上，就光这一条，叫做什么货色呢？很恶劣！在机关彻底的批判陶铸这一套，这对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很多机关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形势，我们觉得机关的这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而且根据毛主席决定广播的这个《文汇报》、《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和登载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榜样。经过这样揭盖子，经过辩论，经过斗争，经过一个发展，我们这些机关一定能够掌握在毛主

席的好学生的手里(热烈鼓掌)。那么一些坏家伙,请他们滚!滚下台!(鼓掌)当然我们要区别对待,但是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自己一定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一定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办好!办得比他们好!(群众热烈鼓掌,呼口号:“打倒刘、邓路线忠实执行者陶铸!”“陶铸从中央滚出去!”“打倒陶铸!”)

—1967年1月9日在新华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陶铸这个人很坏,上次他到你们这里来讲话,是听到了我们(中央文革)的一点风声。他跟我们一块开会,开了一半就慌忙地跑了。说他有事,原来他是跑到你们这里来了。陶铸是以前直接掌握你们这里的,陶铸要打倒。

—1967年1月11日晚接见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宣传小组代表的讲话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大字报8月5日就提了嘛……10月3日《红旗》社论十三期一发表……有那么一些人反对,……其中有一位就是陶铸,他就不赞成,他就说是你不能叫,他就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是反对,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他说是因为太仓促。仓促?已经两个月了,怎么突然又仓促啦?毛主席提了两个月了,怎么又仓促了呢……他不光是这两个字儿的争论,他就不让批判刘、邓路线,不许批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也不许你批评,不给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认真地彻底平反。

……同志们调查一下,全国大体上都在那个时候,6月18、20那时,一些中央机关也在那时候,21、22、23、24、25相当普遍、相当多的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而那个时候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篇社论叫做“假左派,真反革命”。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学生起来是违反他们意志的,他就起来镇压,而工人起来,他更加不能容忍,工人起来、农民起来他就完蛋,最后被埋葬。因此千方百计进行镇压工人,这是他阶级本性决定了的。在这个问题上陶铸就是一个代表,他就要压,他自己就亲口讲:“工人起来,就把它压下去。”“压下去”是他的口号。……如果是按照陶铸的意志,那就要压工人,不许他组织,不许他们革命。

—1967年3月13日在接见归国留学生时的讲话

我们要办一张毛泽东思想的报,那就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李井泉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领导的报纸。他们在新闻战线上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毒素,他们关于新闻工作中的很多谬论,我们要同他们这些谬论相对立。

—1967年7月10日在接见《云南日报》无产阶级革命派时的讲话

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还有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再不能回到刘、邓、陶、李、阎的秩序上去。要提高这个高度来对待。把刘、邓、陶、李、阎彻底打倒,把他们散布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彻底肃清,不只是换几个人,一定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政策上、也从组织上把他们搞掉。

—1967年7月中旬在昆明二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关锋对陶铸的批判材料

关于王任重同志的问题可以找陶铸同志,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比较了解。

—1966年11月18日接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谈话

要打倒阎王,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在座的年青同志比较多,在旧阎王殿、新阎王殿你们哪个人当权?电话总机五个人谁当权?总机五个人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是有名的,很好嘛,可是把他们也分成两派,这应该归罪于陶铸,别的不讲,陶铸来到中宣部,不是领导大家打倒阎王,而是相反,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革命群众。我们为什么不把他套的枷

锁丢掉呢？

—1967年6月1日接见中宣部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今天开会讨论大批判的问题，讨论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大批判问题，从政治领域内把他们批倒、批臭，清除他们在各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影响，大立毛泽东思想。

—1967年7月15日在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是支持王唯真同志，应该支持他的工作。斗争，应该斗争刘、邓、陶，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新闻路线。陶铸直接插手新华社，派熊复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不批？两派应该抓这些问题。

—1967年7月31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戚本禹对陶铸的批判材料

关于李冠英、钱国屏、齐咏冬、朱岩、刘德珍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并针对着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要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1966年12月20日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徐昕等五位同志的信

现在机关里也住上人了，不能办公了。这是陶铸搞的鬼，一天还发七毛钱，有阴谋。……现在，连文化部厕所里都住满了人，楼梯都住满了人，这是陶铸搞的。陶铸发的指示，让他们到北京来造反。

—1967年1月26日会见小学革命教师时的讲话

人民大学的运动，文化革命运动里面的一些问题，今天提出很多的问题来，差不多文化大革命里所碰到的全党、全国、全军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重大的事情，你们这里都涉及到了，什么陶铸，什么邓小平，什么刘志坚，什么王任重，都跟你们这里有关系，而且是很多的所谓大人物，都到你们这里来过，什么陶铸，什么邓小平，所以你们这里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1967年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现在有人想否定《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沙家浜》……我们就要支持这些新生事物，为之大喊大叫。文化革命要搞出新东西，如果搞完文化大革命，什么都没有了，那还叫什么文化大革命？陶铸就主张文化大革命后，电影、戏剧什么都不演，我们反了他。

—1967年4月9日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讲话

最近有两个动态值得注意，就是阶级敌人企图从两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转移大方向：一是从极“左”方面，一是从右的方面。极“左”方面，不是把矛头针对刘、邓、陶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企图用各种流言蜚语打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转移斗争矛头，煽动一些人攻击总理，攻击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说中央文革分两派，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搞这一套都是从右的方面来制造混乱的。过去说文化革命小组分两派还可以，因为有陶铸、王任重。现在的成员都是一起战斗过来的，团结是坚强的、坚固的。

—1967年6月1日在接见中宣部同志时的讲话

批陶问题全国怎样部署？

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应再说。中央目前还没有考虑在全国范围批判。

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由广州军区决定。……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行不行？

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哪里？

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西行纪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本书都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它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上海时代中学有个革命小将陆某某，看过三家村的毒草，联系到陶铸的问题，首先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中宣部，受到迫害死去。报纸上可先发这个革命小将的大字报，广州加按语。

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可以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来批判，他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从广东先开始。

给陶铸戴什么帽子？

由广州军区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后定。

批陶的文章由哪里审查？

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批判计划由谁定？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1967年7月11日在接见广东省军管会代表所作关于批陶工作的指示

你看关锋很瘦，很辛苦，为什么反他呢？查关锋与谁谁关系，有什么好查？那是黑材料。要敢革敢保，我保他。彭真、陆定一、陶铸搞他。

—1967年7月15日晚在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

姚文元对陶铸的批判材料

这两个东西(指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编者)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潮，资产阶级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经用这么两种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交替使用。我举一个陶铸的例子，陶铸开始镇压群众是镇压得很厉害的，在那个文教口，拼命镇压群众，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后来看了不行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路线行不通了，革命群众起来了，他又搞无政府主义，他就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还提出过一个什么绝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就是陶铸的东西嘛，陶铸这种思想该不该打倒呀！(该！高呼：打倒陶铸！)

—1967年5月14日在南京的一次讲话

我们知道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主要来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象刘少奇、陶铸他们经常搞这一套的，所以要批判，肃清他们的影响。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混淆阶级阵线，使我们不能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我们不能夺好权，掌好权，不能团结大多数。我们晓得，在阶级阵线越来越分明的时候，打击的矛头应该是越来越集中，而不是越来越扩大。但是，陶铸这些人，他们刚刚相反，搞无政府主义，陶铸是个典型，他开始的时候，就镇压群众，在他那个文教口里面，把群众运动拼命镇压下去，等到后来看看压不下去了，群众起来了，他就搞无政府主义，搞形“左”实右，提出什么文化大革命当中怀疑一切是可以的，还提出什么绝食是伟大的创举。陶铸这一种思想该不该打倒？(众：该打倒！)他那个时候，无非是想把阶级阵线搞乱，所以我们主要的应该把这一些形“左”实右的东西，算在这一些人的账上，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肃清这种可能有的思想影响。

……无政府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象陶铸这些人，他们可以两手交替使用，有一阵，就镇压，压得非常厉害，有一阵搞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1967年6月3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第五十四卷

(回忆陶铸)

[附]

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

—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态有些异样，总好象在思索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果然，沉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我感到很意外，忙问：“让你做什么？”“中宣部长。”我断然否决：“你不合适，宣传部长要由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你胜任不了。”陶铸点点头，很认真地说：“是呀，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与我不太适合。”“那你就向中央辞掉。”“不行，还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那就去吧！”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你什么时候去？”“把工作安排一下，6月初就去，不过先要去湖南韶山渠通水剪彩。”此后，我们再也没说什么，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精神不好，也无心过问；再说，我们素来谈话简短，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需谈的话，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的事情，尤其是他。6月1日，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了。

我没跟去，这是我们的老习惯，无论他去哪里，我都不愿相随，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嘛！我们的女儿陶斯亮，此时正在上海军医大等待毕业分配。在广州，就冷冷清清的剩下我一个人。到7月初的一天，我由于身体过于虚弱，突然休克，脉搏每分钟300来次，发烧38度达20多天。刚退烧，陶铸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养病。我想反正病后需要恢复，不如去他那里，虽然指望不上他的照顾，但俩人相互间总有个依靠。于是我向省委请假，省委批准我去北京休养三个月。9月10日那天，我撇下了广州的空家，飞往北京。

下了飞机，出乎我的意料，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这是我们结合三十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这桩小小的插曲，仿佛揭开了我和陶铸从此患难与共的序幕。

以往北京的9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取代了。他们成群结队的拥在大街上，搞“四大”，破“四旧”，揪“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不仅触及人的皮肉，还要涤荡人的“灵魂”。我看着车窗外这种动乱景象，一股不安袭上心头：这场运动，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呢？这是1966年，萦绕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的问号。

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车窗外的情景，很少吭声，一直到驰抵目的地时，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即中央文革所在地)，住进中南海杨尚昆同志的房子。尚昆同志调广东工作，家已搬走。对他的这次搬动，我当时并未在意，事后才明白，它的含意绝非寻常。

陶铸情绪很好，他说：“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他这个人，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窄巷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我迈进了新家，同时也等于迈进了囚屋，因为在这所房子里我们只当了5个月的自由人，却做了近三年的囚徒，自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挺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州的家搬来，只随身带了几件行李，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

气息，倒象是宾馆。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旋成“X”字，因此得名为“X”字廊。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十分可爱；茂密的荷叶，伸展着圆圆的叶片，遮的满池绿油油，碧森森的；挺拔的荷杆顶着一个个肥硕的莲蓬，在风中轻轻摇摆；周围的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清香……，眼前的秋景美不胜收，我俩并肩观赏着，忘却了墙外那场席卷整个中国的大骚乱，获得了暂时的宁静和平和。陶铸说，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才在偌大个中南海内，独自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

陶铸的办公室，设在西楼。那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响此起彼伏，4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喧闹得好似股票交易所。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口，如：中宣部，组织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哲学社会科学部等部门。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大学生又插足进来“煽风点火”，因此，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和半瘫状态。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向他们解释党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有些还是老朋友，他们绕过中央文革，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火烧“走资派”，揪斗干部群众，抢砸档案材料，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此外，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教师；要参加中央和中央文革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每隔几天，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后来才知道，主席是分开听我们和江青、陈伯达的汇报的)。总之，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形势的特点就是“天下大乱”，弄得陶铸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完全打乱了，钟表也变得毫无意义。陶铸说，这几个月，是他近几十年来最忙碌的一段。他的精神状态，此时正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好似一张已拉到最大限度的满弓。

二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说实在的，我对他这点很有意见，哪怕把我当做一名普通的同志，彼此也应该交流思想。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于是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确实有些异样，例如：

中央文革把曹轶欧(康生老婆)派到陶铸这里协助工作，把陈伯达的老婆也安排到陶铸分管的某个部门中去。这分明是对陶铸职权的干涉，而绝非一般简单的人事安排，但当时，我也仅仅是感觉而已。

有一天，陶铸给汪东兴同志打电话，说周扬同志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找个地方。汪东兴用质问的口气问道：“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陶铸解释：“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还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王明住过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电话里，传来汪东兴冷冰冰的回答。我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汪东兴每次见到我们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生硬呢？

我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通知陶铸去开会时，他总是面有难色，纵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我还奇怪，为什么他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陶铸同意让剧团另一派来观看，江青故意冲着陈伯达发牢骚：“放他们进来，两派打起来谁负责？”江青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向陶铸提呢？看演出时，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江青走过来，热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对我

却理也不理，仿佛没看见似的。其实江青与我是熟谙的，以往她几乎每年去广州过冬，我都要尽地主之谊，因此江青对我一直还算客气。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11月份，主席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自己的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于应付，更何况总理也需要他协助，在这种时候，为什么突然命令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种种迹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为明显的信号，是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一段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连陈伯达、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却唯独没有提陶铸。文艺界是陶铸分管的，在文艺界的大会上，把陶铸排斥于毛主席亲密战友之外，这实际上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宣布：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路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果然心领神会者立即响应。

浙江某中学高中学生陆荣根，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他来京后，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张贴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整整用掉了60张大字报纸。有人抄下，我借来看过，完全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例如陶铸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象岩石一般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而陆的大字报却胡诌什么：“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真让人啼笑皆非。

耳闻目睹这种种异常的现象，又眼见一批又一批的老同志任意被打倒，被揪斗，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示众，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我的心真是沉重极了，我估计陶铸被打倒之日，即将来临。我做了思想准备，并且让女儿也退出她那一派的“勤务站”，我对她说：“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她太单纯，怎么也领会不了“粉身碎骨”这几个字的含意，还责怪我言过其实，以为我是故意吓唬她。

转眼到了12月底，1966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判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任重同志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养也高，人又潇洒，很得主席赏识，因此成立中央文革时，他被调来担任文革副组长、北京市文革顾问。另一副组长是江青，陈伯达任组长，康生、陶铸任顾问。哪知任重同志来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与文革小组其它几个人合不来。江青他们指责任重同志：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其他人商量，看样子很难再合作下去。任重同志原来就患有“肝炎、肝硬化”，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劳累，心情也不舒畅，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0月份，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从任重同志儿子那里，发现了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大意)。这下造反派可就闹起来了，大骂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一时间搞的武汉三镇乌烟瘴气。中央文革不失时机地介入和控制了群众运动，把群众握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造反派和中央文革上下勾结，形成了对任重同志的合围阵势，任重的处境岌岌可危！陶铸见状，很是着急，为了解脱任重的困境，给主席写了个报告，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主席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样一次党的最高级别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是可想而知

了。文革小组向任重同志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预谋好的。中央文革不管小的还是大的，个个板起面孔，恶声恶语的凶得不得了。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是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呢？”我问道，“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最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住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得下去呢？身体又那样的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这才是陶铸的本色，他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他了。我见他心情恶劣，便安慰道：“事已如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我估计自己也不会例外，随时都可能被揪斗，被拉走。我望着陶铸，很平静很诚恳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我去到蔡大姐那儿，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来后就闭门谢客，听候处置。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谈到下去视察的问题时，主席多少有些不满，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陶铸解释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主席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然后，主席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 20 多个。主席指示陶铸：“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主席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主席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主席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就这样，陶铸以为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事情仅仅是开始呢！对于他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在“四人帮”时代，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而陶铸简直连一天都过不去，就又落入江青他们搞的新陷阱中。

就在主席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 12 月 30 日)，已经是晚上 10 点，为某种特殊目的而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原本说好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他们下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不得已，陶铸只好去接见。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头，对方摆出一副咄咄怪逼人的挑战姿态。见状，陶铸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记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同志参加(是被他们从广州揪来北京的)；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但是造反派偏偏对着干，一是非录音不可，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他们的一位

头头蛮横无理地叫嚷：“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陶铸本来就是个燃油般的人，一点就着，此刻他强压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分明受到挑唆的学生，此时是有恃无恐，他们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陶铸那里肯依，冲突越来越尖锐，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被激恼了，盛怒之下他宣布：“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我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他哪里知道，激他发火动怒，乃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阴谋，他落入了圈套。造反派见激将成功，气焰更为嚣张，他们故意扩大事态，说陶铸压制群众，并强行把双方争论的录音带走，甚至企图把陶铸也揪走。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于是进入会场执行任务。他们身上带着枪，造反派又借此制造事端，说陶陶动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一片鼓噪，犹如鸦雀闹林。

此时，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坐着陈毅和富春等同志，当听说造反派要揪走陶铸时，陈毅气得一拍沙发：“我要保卫陶铸同志！”这是多么可贵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啊！直到陶铸勉强承认了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静，从而结束了这一长达 6 小时的“接见”后，陈毅和富春同志才放心离去，此时已是凌晨 4 点钟了。

据李一清同志说：“专揪”造反队一位学生告诉他，他们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与中央文革取得了密切的联系。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及险恶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1966 年的最后几天，就这样艰难地度过去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迎来了新的年度。然而对于陶铸来说，1967 年意味着终结，对于一个职业革命者来说，失去了工作的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

1967 年 1 月 4 日，永世难忘的 1 月 4 日啊！象一把利刃深深刻在我的骨骼上，纵使肉体化为齑粉，这个日期也会清晰地留在那里。

那天晚上 7 点来钟，李一清同志慌慌张张跑来找陶铸，陶铸不在，于是一清同志告诉我：今天下午 5 点钟，文革小组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学生们回来后扬言——陶铸要揪出来了！对一清同志反映的情况起初我还不相信，我这个 1926 年入党，有着 40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怎么也想象不到党内也会有如此卑鄙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我也是太天真了。到晚上 9 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与此同时，传单已四处散发，行动真够神速。我请警卫同志要了份传单，通栏大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具体内容如下：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终于东窗事发，但是陶铸仍然未归，我的心情沉重如铅块，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嚣的声浪，可以传出几里地之外。我茫然若失地又来到陈毅同志家，陈老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陈总亲自送我出门，并一再安慰我放宽心。哪里想到，这一面竟成为永诀。

直到深夜 12 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他说：“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起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总理、我、还有他们几个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总理同我商量工作后我去找安徽的张恺帆同志说事情；接着又去接

见安徽来京的学生。中央文革就在我隔壁房间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他立即给总理挂电话，总理说：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待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总理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最后，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也就在当天夜里，我在上海读书的女儿，被同学叫醒，从而证实了她父亲“粉身碎骨”的预言。我的外甥正在广西南宁串连，半夜也听到了他舅舅出事的消息。如果不是事先周密的预谋，绝不会在几小时之内传遍全国的。

三

陶铸 1926 年在黄埔军官学校加入了共产党，1927 年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福建从事秘密工作期间，他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1933 年被国民党逮捕，判无期徒刑，在南京中央监狱里，领导难友进行了绝食斗争。被党营救出狱后，赴湖北开辟了鄂中抗日游击区。以后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期间，一直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并受中央委托，化装进入北平与傅作义将军谈判，以后又担负了起义部队的改编和组织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各种党的领导职务。40 年火热而辉煌的革命生涯，突然在瞬间戛然而止，就象是一台高速运转的电机突然断电，是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1967 年 1 月 4 日以后，直到 1969 年 11 月 30 日去世，陶铸再没有呼吸过一口自由的空气，这对于他这么个生龙活虎的人来说，是何等痛苦和难耐的事啊！

囚徒的生活，最富有的就是时间，陶铸这下总算能坐下来了。最初没有派看守人员，我们还能在荷花池边散散步，自由地交谈。从陶铸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总算搞清楚了他与中央文革关系的始末，了解了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

陶铸调来北京，确实是小平同志提名，并得到主席首肯的。我们是从小字报上才得知这件事的。小字报上登了主席的一段讲话，大意是：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中央的，我说陶铸不老实，他说还可以。我不相信主席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一个“？”号。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

当时，几个秀才得势便猖狂，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虞。在这种形势下，小平同志推荐善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京，用意是很深的。

中央文革对陶铸起初也还是持欢迎态度，因为陶铸与少奇和小平同志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再说陶铸敢放炮，这一直率的特点，可以日后借用来炮打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然而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最早的分歧发生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陶铸刚赴北京上任没几天，6 月 9 日就飞杭州去参加主席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7 月 18 日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江青立即利用北大天字报事件向主席进谗言。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于 6 月 1 日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天字报后，北大的群众立即张贴出 500 多张天字报响应，其中有 400 多张是反对聂元梓的。后来又发展到有几千人围住他们辩论。江青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事件。她对主席说：“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天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月时

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到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我开始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坚持派工作组的人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主席听了江青和陈伯达等人的汇报后，从6月20日起连续召开了许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6日又召开了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8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再明显不过的是针对少奇和小平同志的，公然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错误观点。

陶铸刚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刘邓一边。但是真正令“四人帮”失望和不快的，还是在1966年8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上。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次。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尾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看样子，中央文革本来意图是想拉拢陶铸，给他们当炮弹，去打少奇和小平同志。陶铸不仅没有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简报是发给大会看的)。

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主席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全面围攻。尽管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明眼人都看的清楚，刘邓实际上是被“拉下马”了。但陶铸依然真诚的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做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俩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的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一般地说，他对中央负责同志都是很尊敬的，对少奇同志就更是如此。陶铸说：“1942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直到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找我谈了一次话，我承认了自己在高岗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的意见。刘少奇听后，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了他看人可能有些偏。经过这次谈话，我对刘少奇的观感有所改变。以后刘少奇去广州，以及我来北京开会，接触就比较多起来，对刘少奇的好感也就更加增加了。我觉得刘少奇这个人，有意见可以提，尽管我在财经会议上放了炮，但是他不计前怨，还是找我谈心，待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尤其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至于陶铸与小平同志的关系，那就更好了。陶铸说：“1949年，二野

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8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见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与少奇和小平同志，虽然没有更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陶铸调中央后，始终不能遵照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意图，站到反刘邓立场上去的原因之一。相反地，做为中央文革顾问，他却总是与文革格格不入，以至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妇孺老幼，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谢富治由于打头炮有功，顿时变成江青的宠信，成了“左”派头面人物，真是黄钟废弃，瓦釜齐鸣。谢富治与陶铸都死于癌症，但谢去世的时候，一切都是超规格的隆重，甚至天安门降半旗致哀；而陶铸死后9年，人们才在一间凋敝的骨灰堂的角落里，找到了他的遗骨。同是跟着主席征战几十年的人，结局却是如此的不同！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已经陷入很深的危机中的话，那么他们直接冲突的导火线则是在卢正义和吴传启的问题上。卢正义是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传启是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他们是些心怀叵测和别有用心之人，并且有重大的历史问题。但是江青极为赏识他们，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学部，封他们二人为“革命左派”。陶铸不同意这样做，再三向江青说明真实情况，但是江青哪里肯听？最后，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做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大意是对卢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是对卢的历史问题，仍然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未按江青意图封卢为“革命左派”。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双方则完全搞翻了。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的太多了！管的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象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有一次，我与总理商量：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道江青听了气得要命，竟然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可能她认为自己是主席夫人，又是文革副组长，很了不起了，应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国庆节，天安门检阅台的排列名次，是按历来传统安排的。我们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接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她心里很不满意，为此又迁怪于我。”他指了指茶几上的报纸，轻蔑地说：“你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与总理平列了，象什么样子！”陶铸从来没有象这样推心置腹地向我谈论过他工作范畴内的事情，他实在压抑不住了，在这间孤寂的、与世隔绝的小屋内，他的一切痛苦，委屈，愤怒，迷惘只能向我倾诉。他说：“曾志，你不知道，自从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等那帮人，总是对我冷嘲热讽，故意找碴子，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地打击我。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

话，江青他们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我说：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道：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又如纪念鲁迅诞辰 85 周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百把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千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个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如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张狂。”

陶铸说：“自从吵了那次以后，我跟江青就彻底闹翻了。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 1930 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

从陶铸断断续续，有时甚至是不太情愿的倾吐中，我渐渐地明确到：他与中央文革的绝裂，并非是单纯的人事不和，或历史宿怨，而主要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产生的观点与思想上的深刻分歧。我搜索我的记忆，将这些分歧大致归纳如下：

一、关于派工作组和暂停各级党组织领导，改由各级文革行施权力。在这个问题上，陶铸几乎一进京就本能地站到少奇和小平同志一边。他对共产党的天下却让共产党员当家的怪现象百思不解，异常痛苦。记得有一次我和女儿向他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取消党的领导表示不满。起先他一声不吭，皱着眉，急速地在室内踱来踱去，突然，他停了下来，爆发出一股怒气，几乎是吼道：“你们为什么问我？这样子搞法又不是我决定的，我也想不通，你去报告主席吧，就说我陶铸想不通！”接着又冲出一句：“你们若是怕我犯错误，现在就划清界线好了！”当时，我只是觉得他脾气发得莫名其妙，话也说得莫名其妙，现在我才理解，他的愤怒来自于他的无法排解的困扰和痛苦。

二、在农村和城市企业的文化革命的搞法上，陶铸与文革小组也是大相径庭的。“十六条”在总理主持下，搞的一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性的文件。这份东西，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起了一定限制作用。“十六条”明文规定农村和城市中的企业不搞四大，不进行串连。但是中央文革唯恐中国不乱，他们在平谷县搞“大民主试点”，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江青在报告上批示：此材料很好。但陶铸看后认为，这一套绝不能推广，因此扣压下来未予转发。后来，在中央文革的高压和操纵下，中央于 1966 年 12 月 15 日又发了一个《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草案第七条写道：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队与队，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对这份草案，陶铸已失去过问的权力，除了痛心之外，他无能为力。此后，中国朴实憨厚的农民们，也赶时髦似的搞起“造反”来，古老平静的中华大地，处处留下了武斗的弹痕血迹。保定地区两派农民之间的自相残杀，不是至今使人记忆犹新吗！

三、陶铸长期从事实际和具体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经历过 1957—1959 年期间，一系列诸如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三面红旗”、反“右倾”和“彭黄反党集团”等频繁的运动后，谁人不深遭其难，不深感其害，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搞怕了，全省的粮库竟到了粒米不存的地步。他怕重蹈覆辙，因此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论和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却遭到中央文革的非难，说这种提法实际上是以生产压革命，是搞经济主义。陶铸说：“中央文革背地动员中学教员和各地文艺戏剧人员来京上访控告，中央三声五令通知他们不要来，可是他们还是大批大批的来，他们一来就向我要吃要住要生活费。文革又反过来指责我搞经济主义，真是难得很呐！”

四、在对待两派群众和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是陶铸与中央文革分歧的一个很直接的

触发点。陶铸的观点，认为两派组织都是革命群众，只是在思想认识上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他一直热心地做两派群众的团结工作，极力促成两派组织的联合。但是中央文革却绝对的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至酿成大规模武斗，造成群众无谓的伤亡。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的宠儿，江青称红卫兵为“小太阳”，林彪武断地说革命造反天然是合理的。王力则说的更加肉麻：“外交部的一个收发员都可以当外交部长，只要是造反派。”而陶铸与在多数老同志一样，对造反派是不赞成和看不惯的。有一天，他晚上回来，阴郁的对我说：“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他眼圈红了。从他对待“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和大造反派吴传启和卢正义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窥见他那种极为反感的情绪。

五、陶铸被称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认为这真是一种荣誉。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冲击，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他们跟陶铸都较熟，更主要的是息息相关，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陶铸的做法是：第一步向造反派交涉，把他们先弄出来，安排到招待所住。也就是先保下来，然后再进一步“解放”、任用。可惜，这仅仅是他的一个愿望，当他自己倒下以后，凡受过他不同程度保护的同志，均变本加厉的受到迫害。他难过地说：“虽我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啊！”陆定一同志被打倒以后，陶铸曾有指示：生活待遇不变，搬家后一定要安排沙发。当陶铸也被打倒后，一天，陆定一专案组来了十几个人，一进屋就将陶铸身上戴的毛主席像章扯掉，要他低头弯腰向毛主席请罪，原因是因为他主持的陆的专案几个月都搞不出名堂来，而谢富治一接手，马上就有了重大突破？为什么要从政治和生活上包庇陆定一？

10月19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讲话：“这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两头劲很足(即中央领导和群众)，中间劲头不足，甚至还有点顶牛。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陶铸说：“我同全国各省市部委负责同志一样，对于这场运动，的的确确很不理解。”“直到此时(即他被打倒以后)，我才搞清楚，原来这场运动是对着刘邓来的。”他是多么天真啊！然而陶铸顽强的按照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去办理。他执拗地表白：江青陈伯达的那些观点，那些作法，我认为不对，我不能跟着他们转，我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原则去干。”当中央文革以各种莫须有罪名围攻他时，他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1967年1月4日以后，开初几天除了丧失自由之外，其他一切如常。元月20日左右，停止了送文件，并派驻了4个警卫。又过一个来月，将红电话机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陶铸每天在警卫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除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可随时批斗外，其它单位的造反派是派代表进来批斗，有时在家里，有时拉到小礼堂去。最初的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第二天，中南海墙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又高喊打倒陶铸，说陶铸是“七二〇事件”的总后台，这正是那个时代造反派的特征——指鹿为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真让人啼笑皆非。晚饭后，我与陶铸正在猜疑何谓“七二〇事件”？突然涌来了一批人，把陶铸双手往背后一扭就带走了，连外套都没有让他穿。同来的几位女同志，稍后一些也将我拉走。深夜，我和陶铸陆续回来，见到家已被抄过，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片等物统统被抄走，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开，房子里乱的一塌糊涂。陶铸似乎已筋疲力尽，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房子的隔壁是春藕斋，主席经常在那儿活动，陶铸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一天晚上，三点来钟的样子，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声，是警卫在报告，说发现有什么人往墙上爬。第二天又有几个警卫队的负责人来察看，我问陶铸的警卫秘书曾云，究竟是怎么回事？曾云说：“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我太天真了，我说是猫，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我还让曾云将此情况反映上去，曾云根本不屑于理我。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完全是在制造事端，借口这件事，将警卫由4人增加到十几个。把陶铸厕所

的窗子钉死，窗子封死，玻璃上涂满墨汁。又在陶铸的卧室里，对准他的枕头，安装了一个耀眼的灯泡，白炽的光线直射到他的脸上，使他彻夜不得安眠。将一直比较关心和照顾我们的曾云也调走了。连去西门看大字报的一点点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也取消了，X字廊完全变成了一座牢房。

警卫人员对陶铸的态度也越来越坏，动辄瞋目裂眦，恶声呵斥。每天三餐饭，他们列队从我们房门走过，故意放声唱辱骂陶铸的歌，什么“反革命，狗陶铸，砸烂他，打倒他……”有时，站在床头的警卫，整夜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成心搅得陶铸无法入睡。陶铸苦恼极了，实在忍无可忍时，也会同他们吵起来，他们骂陶铸是混蛋，毒蛇，是国民党叛徒和特务，陶铸轻蔑地说：“你们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下呢，如果我是国民党，你们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儿子和孙子了吗！”当然，这种争吵是不会有好结局的。“播罢‘红灯’‘海港’时，窗灯射目壁如灰。梦魂欲觅终难觅，怕听钟声鹊噪枝。”从这首小诗中，我们可以想象出他当时的情景。

到了1968年3月底，对陶铸的看管又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子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象影子似的紧紧盯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我俩说话时也是贴身而站。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一种精神酷刑，它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使人感到紧束、沉重和痛苦，你会觉得周围的一切：空间、时间、阳光、空气、饭菜、睡眠……全都变得毫无意义，神经稍微脆弱的人，非精神失常或自杀不可。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心境。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他竟然能够旁若无人般地，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他在精神上，已升华到一种超然度外的境界。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的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拼命读书，除了马列主义著作外，对历史书籍和唐诗宋词也很有兴趣，但是最心爱的还是那部“名臣录”，他每每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而自比。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X字廊前花木森，
风送芬芳入杳冥。
静坐偶欣唯蝶舞，
夜眠深苦是蚊鸣。
汉家狱辱因何怨，
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烦冤终不免，
求仁奚用为身名！

陶铸还酷爱写字。书看累了，就提起毛笔练字，以陶冶和安抚性情。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来代替，两年多的时间，他将家里的新旧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有两米高。1969年他被遣送到合肥后，我打扫房间，望着这堆报纸，一阵心酸袭上心头，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陶铸了！我随便从中抽出几张来，留作永久的纪念，其余的付之一炬。1970年，陶铸去世后，有一天女儿整理他的遗物，顺便翻了翻我留下的这几张报纸，意外的发现，在许多旧诗词当中，竟夹着他自己的诗和词，我没能把绝大多数报纸带出来，真是痛悔莫及。正是凭着这样的机智，他才得以在看守的紧盯之下，用诗词抒发了自己满腔悲愤，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襟怀。除了以上引用过的几首外，还有一些寓意很深的诗，如：

料峭风寒花独开，
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
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
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
头颅惨白不成妍。

1968年8月份，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相呼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正在家中养病的女儿，两眼红肿，颊上还挂着泪痕，端着盆热水走过来，想让我们泡泡那双站得浮肿酸痛的脚。单纯的女儿啊，她哪里想到我们此刻最疼痛的莫过于心，假如此时有一把利刃，一刀一刀的割破我们的皮肉，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女儿发现了父亲额上的血肿包，扑上去想给揉揉，陶铸一把推开她，脸色惨白，双眼喷火，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我那时病痛交加，瘦的只剩下60多斤，经过这场野蛮批斗以后，更显得虚弱不堪。陶铸悲愤交集，指着我对看守说：“你们为什么斗她？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人呀！”说到这里，两行老泪，顺着他的憔悴的面颊缓缓流下。相识40多年，我不记得他哭过，他是个硬汉子，然而……但是从此以后，无论是病痛、分别还是死亡，再也没见他流过一滴泪。哀莫过于心死，难道是心凉的缘故？不，他不是这般脆弱的人，我了解他，我相信一直到死，他的一颗心都是火热火热的。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突然说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拖到1969年元月，又出现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请来医生看看，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到了3月份，陶铸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我央告医生，仍然不予理睬。直到3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检查腹部，发现右上腹有个馒头大的包块。他草草诊断为“肝炎”，便将陶铸送进302传染病院。入院后检查，才搞清不是“肝炎”，而是胆囊部位的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病情上报给总理后，总理批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董芳宗主任担任术者，301医院的陆准善主任做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杰也参加医疗小组。这个阵容，确实是国内外一流的，体现了总理对陶铸的关怀。

陶铸又被从302转到301医院的外科。他们将陶铸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4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哪里还象什么病房，十足的牢笼！动手术需经家属和本人签字，他们怕陶铸不同意，动员我去做说服工作。哪知医生刚说明意图，他二话没说就签字了。我们当时没敢告诉他这是癌症，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胆囊切除术。但是陶铸心里很清楚，只是没有道破罢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去追究自己的病，只有一次，他实在疼痛的太厉害了，才脱口说一句：“没想到癌这么痛！”这个时候的他，对死已置之度外，所以才能够有如此的气概。

我给汪东兴同志写了封信，要求允许我每天去医院看护，但是直到手术后第三天的下午，才让我去探视。陆主任向我介绍了手术的情况，他说给陶铸做的是胰腺癌根治术，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术，手术进行了8个多小时，除了切掉胰头的癌瘤外，还切除了胆囊和十二指肠；胃切掉三分之二，大网膜去掉了四分之一。

在白罩单的映照下，陶铸显得格外瘦削萎黄，两个鼻孔，伤口及手臂上，全都插着管子。

但是他很平静，脑子也很清楚，见我来，用眼神和手势向我示意：一切都顺利，请放心。但是术后第四天，病情却急转直下。由于严重的肠胀气，将手术切口撑裂，大量的腹水向外流淌。医生用吸引器不停的抽吸胃肠液及胆汁，每天要抽出4000毫升又黑又腥的液体。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陶铸又并发了可怕的“肺炎”和“胸膜炎”，持续高烧，神志模糊，生命垂危。我看他时，见他正处于昏睡状态，我连声唤他，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见到是我，便喃喃地说：“曾志，看来我过不去了。亮亮，你要好好照顾亮亮……”还想再说什么，一阵膈肌痉挛，打呃不停，随即寒战高烧，又昏迷过去。谢天谢地，危险期总算度了过去。在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他恢复得很快，回到家来，能在走廊散步一个小时，看书习字一坐就是两小时。他顽强的进行着体力、脑力和意志上的锻炼，尽管他很清楚自己患的是绝症，尽管我们彼此互不揭穿，但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们——不能就这样的死去，一定要力争活下去！

1969年9月下旬，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脉搏微弱，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已无好的治疗，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我至今想起他那副痛苦的样子，仍觉心中酸楚，那是言语难以形容，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加肉体的双重疼痛。他常常痛的在床上东倒西歪，前扒后仰，大汗淋漓，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虚弱的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需要我用手去抠。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的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我劝他：“忍不住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他说：“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活着。他并不怕死，但是一生清白，岂能蒙垢赴黄泉？“不，我不能死，不应该死！”在冥冥中，他无声地呐喊。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1969年10月15日早上7点钟，汪东兴派人来叫我去。东兴同志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需与陶铸断绝联系。”我如同五雷轰顶，勉强自持，问道：“什么时候走？”“明天。”“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那就是18号！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我回去后，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绝然地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第二天，中直政治部王良恩主任来谈话，陶铸躺在床上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王又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他考虑的很周到，请我帮他装了一箱子的书；要我买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还要再准备一柄雨伞和一床薄被里，以便自己洗涤。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的凄凉。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他要了亮亮，外孙小亮和我的小照片，包好后放在内衣口袋里。他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似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离死别的三天，我们就这样互相勉励和安慰着，没有说一句凄切的话，更没有掉一滴泪。

18日无情的到了，我燉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上路的时间到了，护

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他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的、一步一步地走出来，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的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车远去了，消失了，永别了，陶铸——我40年来的战友和伴侣！

一周后，我也搬出了这所留给我无限思念，无限苦痛和无限空虚的家。

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故，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了之。死前不许我们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从我们分别到他逝世，只有43天的时间。他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未能与亲人决别的遗憾，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一个为党奋斗了40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一个忠贞热忱的革命家，最后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陶铸从1966年6月走马上任，到1969年10月抱病离京，三年多的时间，我俩相依为命的在“X”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做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上的。我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直到九年后，“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颂。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如今，陶铸去世已经18个春秋，我也变成一个耄耋老者，然而这些如烟的往事，却一直不曾散去，它们在我眼前飘着，在我心房里飘着，透过蒙蒙的烟云，我永远能见到一张面容，他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生动，那样的亲切。我突然觉得，陶铸根本没有死，他活着，活在一切爱他、敬他、理解他和同情他的人的心中！

[附]《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

这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的夜晚，合肥机场来了一架专机。

在一片黑暗中，几个人从飞机上走下来，很快进了等候在停机坪上的一辆轿车，悄悄地驶出了机场大门，朝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急速驶去……

不一会，从停机坪开来的那辆黑色轿车开到了“秘密病房”门口。车门打开，一个面戴口罩、身穿呢大衣、手拄拐杖的人，忍着痛苦，坚强地走下车来，这是一位从北京用专机送到合肥的“特殊病人”。

他是谁呢？

监护人员猛然认出来了。他不是那位被诬陷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同志吗！

从这天晚上起，身在囹圄的陶铸同志连真名真姓也不能使用。病历上写着“王河”的化名，那是押送他的人给他起的名字。住院期间，别人都是用这个名字叫他。

这是一间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病房，一间经过精心安排的“秘密病房”。

几天前，医院里有个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被领导召去“密谈”，要他立即选个地方做病房

备用。要求是：既要安全又要绝对保密。最后他一再得到训诫：此事只允许他一人去做，不准告诉任何人。

这个政工人员领受了“密令”，很快对全院所有的房子作了一番选择。

为了做到“安全”和“保密”，防止病人“逃跑”、“自杀”、“行凶破坏”，防止病人“被抢走”、“被打死”、被选的“病房”特作如下改装：一张病床的床腿被截去一段，显得特别矮；电灯吊得几乎贴到天花板上；重新单独改装了变压器，电压很低；北边墙的窗子外面钉上了几道木杠，窗口堵死了，窗子上蒙挂着厚实的窗帘，不能让别人从外面看见里面的人；病房门口走廊的一头被堵死，一直堵到顶上楼板不留一条缝，走廊外只有一道门进出，平常是封闭的，不轻易开，非监护人员一律不准进入。

病房门口，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两个战士看守着，严密注视病人的活动，进行“特级护理”。按照规定，看守人员不能随便与病人交谈，但要认真地记病人“动态日记”。……

早在陶铸同志入“院”之前，在专案人员的组织下，就成立了监护小组，由一名组长，两名副组长负责。当时陶铸同志在合肥住院的事，省里除那个主要负责人和有关部门极个别负责人外，知情人就限制在这个小范围里了。专案人员要监护小组“终身保密”，并威胁说：

“你们的名字都装在中央档案里，谁泄密谁负一切责任！”在监护小组负责人会议上，专案人员宣布说：“陶铸是叛徒，性质已定。我们采取监护措施为的是保存罪证，……对他管理一定要严格！”

到合肥的那天夜里，专案人员又一次召集起监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就是说，治病是假的，控制住他才是真的。对他“要坚持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如何才能不出问题呢？他们的具体规定有十条之多。

不是囚犯，却不如囚犯。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候，陶铸是不能出来放风的。病房里不见一丝太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

“铁屋如灰”。陶铸同志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里度过的。

二

一来到合肥，陶铸同志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掐断了。规定他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通讯，不准会客，等等。他活动的天地就是病房。开始，陶铸同志还能在病房里走动，有时一走就是二十分钟；实在累了，他就躺下来歇歇，擦擦汗水。有次，陶铸同志吃了一点面条，自觉精神还好，就下床来了。踱着踱着，他索性把拐杖甩到一边，不用任何支撑走起来。小小的病房，成了他作体育运动的场所。

陶铸同志以极大的毅力坚持着踱步，锻炼身体，为党为革命要活下去！那情景如牢笼里的一只猛虎，多么想大吼一声，冲出牢笼，奔向山林！现在他被关着，不仅受了“伤”，连“吼叫”的权利也没有。看守人员接受了押送者的“密令”：“如果他不老实，‘装疯卖傻’大喊大叫，就堵他的嘴！”要进一步“顽抗”吗？对不起，他们手中有的是整治囚徒的工具！

在这里，他连张一张嘴，说一句话，都要受到注意和反击，都会被认为是“放毒”。专案人员曾多次向监护人员交待：“警惕他挑衅、攻击和放毒”，要防备他“套话”，遇到这些情况，“要作坚决斗争”。

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诬陷、迫害陶铸同志，这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的铁案。但人们迄今并不了解，作为一个病人的陶铸同志，在这间病房里住了那么多天，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治疗？

关于治疗情况，专案人员也有“指示”：“根据病情和这里的条件治疗用药。”这句话记在监护小组一位负责人的本子上。猛听这话似乎还不错，其实是个骗局。“治疗”吗？那只是个幌子，如果真要“根据病情”给陶铸同志治疗，为什么要把他从北京搞到合肥？难道他的病情还不够危险？难道北京治疗的条件还不如合肥吗？否。他们这句话的要害，是在“这

里的条件”上玩弄花招——治好治坏，谁能包得了？“这里的条件”就是“这里的条件”嘛！当然这几个字，也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这里医疗条件虽不好，但政治条件却是很好的。那个主持省委工作的某负责人是林彪、江青信得过的。在这里他们想怎么处置陶铸同志，都可以得心应手嘛。事实上，自从陶铸同志迈进这间“秘密病房”那时候起，“这里的条件”的特殊威力，就开始起作用了。根据陶铸同志的病情，他的饮食标准在名义上是“特饮”，其实是任何特殊的照顾也没有；他想吃点甲鱼，黄鳝，这类东西在合肥不难买到，但回答是搞不到。结果每天端上来的都是吊不起胃口的老一套。

到十月下旬，由于病情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陶铸同志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他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再不作病情检查，进行抢救治疗、不病死也要很快会饿死！

临护小组把病情反映给上面，结果勉强得到同意可以给陶铸同志作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十月二十三日深夜，万籁俱寂，医院里的人都睡了。监护人员进了“秘密病房”，给陶铸同志带上口罩，用担架把他抬到放射科进行胸透。检查结果证明，陶铸同志的病情已非常严重：肠子粘连，已经发展成为完全性肠梗阻。后来又经过请示，一直拖到十一月十五日，时间过了二十三天，才得到据称为“中央”的批准，决定给陶铸同志施行手术。

这就是所谓“根据病情”得到的“治疗”！

手术仍在深夜进行。当陶铸被送上手术台时，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不放心地再三问手术医生：

“我到底是什么病？”

“溃疡病眼发黄吗？”

“……”

陶铸同志不相信自己是溃疡病。溃疡病眼睛是不会发黄的，但监护人员却说他是“胃溃疡”。

腹腔打开了。无影灯下，医生惊呆了：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已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腹腔打开后又缝合起来，连完全性肠梗阻治疗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但是极度衰弱的陶铸同志挨了这一刀后，由于失血过多，又没有得到相应的积极治疗，这对他的生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是无法回答的。

手术后，陶铸同志就一直处于肝昏迷状态。

手术中，有一件事不能不单独一提。不知是由于真个的“这里的条件”限制，“血库里没有血浆”呢（监护人员这么说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个原因，有关人员还没有敢说出的），这次手术后，没有能给陶铸输血，只是按一般情况输输液而已！！这是我们今天能想象的事吗？

癌症发作时给病人造成的疼痛，据说是任何其他病症所比不了的。护士们亲眼看过陶铸同志每当疼痛发作时，坐起趴下，趴下坐起，一刻也不安宁。坐着时，他用拳头顶住腹部，腰勾着，强迫拳头对痛点产生巨大的压力，用来减轻痛苦。趴在床上，他的病痛似乎也未能有些微的减轻，常常能看到他用拳头顶着腹部，两条腿，一会儿伸，一会儿曲，辗转反侧，苦不堪言。虽是冬天，病房里不生暖气，他却满身冷汗。这是剧痛和毅力激烈交锋后的产物。不吃东西，不给营养补充，却要流汗，单这汗水也会耗尽他的心血和生命。

那是个晚上，只有一个护士值班。陶铸同志已经吃过止痛片，仍没有效果。这个护士心里也有些不忍，在陶铸同志一再要求下，没有报告，自作主张地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针。

可是第二天，这事被上级知道了。护士受到警告：“以后不要给他打针了。打止痛针要请示‘中央’”！

可见，陶铸同志每一个治疗细节都是在“中央”即林彪、江青一伙控制下进行的，想要

获得真正的治疗，这是可能的吗？

三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二十二时十五分，不朽的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陶铸同志不幸逝世了！

陶铸逝世的当天夜里，监护小组立即打电话报告了“中央”。第二天，专案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到合肥，在他们的“监督”下对陶铸同志的遗体进行了“热处理”。

有人提出让他的亲属来合肥料理丧事，遭到了专案人员的继续拒绝！

监护人员为陶铸同志穿上一件件“老衣”——最外面的是黑灰色大衣。在为陶铸找“老衣”时，他们打开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那个大木箱子，才发现里面几乎全部装的是书，衣物只有少量的几件：米黄色的衬衣、丝棉衣、呢制服……

陶铸同志的遗体用一床白布床单裹盖着。在他逝世后第二天灯火已残的深夜，遗体被抬上救护车，迎着哀号的寒风，偷偷地送到合肥火葬场去！

火葬场上，一切早有了周密的安排。人们被告知说：死者叫“王河”，是“烈性传染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是这么一种病，安全要紧，所以，火葬场上除两名烧火炉的工人参加工作外，其余一概不参加这次火葬，但两个烧炉工不准接近遗体。跟来的几个监护人员戴着大口罩，穿着白衣服，忙着搬运遗体，谁也不说话。他们以“医护”名义出现，造成一片“烈性传染病”的恐怖气氛。

火葬要有人签字。谁来签字呢？那个政工人员“奉命”在火化单上签了“斯亮”二字。“斯亮”是谁呢？当时人们并不了解。可是后来大家终于知道，原来那是陶铸同志心爱的女儿名字。

根据专案人员的“意见”，陶铸同志的骨灰被收进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连一点点花纹也没有，这也是专案人员规定死了的。

(摘自徐子芳《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第五十五卷 1967年1月4日至8日

1月4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劝说停止明日召开的批判陈毅、叶剑英1月13日、29日讲话的大会。江青指出：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任军委文革组长的以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康生打断刘志坚的检讨，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你刘志坚。并诬指刘志坚是叛徒^①。刘志坚从此被打倒，关押达七年又九个月。

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于4日、5日连续两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会，三万六千余人参加。彭、罗、陆、杨被押至会场。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萧向荣、梁必业、安子文、曾三及严慰冰(陆定一妻)、郝治平(罗瑞卿妻)陪斗。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全国来京串连的文艺、出版、体育、教师等群众十余万人。江青讲话，建议坚持徒步串连。周恩来宣布，中央文革委托江青起草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关于小学和体育界的革命化，中央文革也起草了相应规定。还告诉大家，毛泽东著作的印数要从去年的3000万册增加到今年的8000万册。他号召大家节约纸张，以便印出更多的毛著。

陈伯达、康生在人大会堂小礼堂将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嘱咐好好组织批判。

中学红卫兵组织与“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一些“联动”成员从后台冲入会场，散发传单，燃放鞭炮，强占麦克风，撕扯“三司”袖章。

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飞赴上海，处理上海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问题。临行前受到毛的召见。

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散发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根据陈丕显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由舒泽池(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来沪串连)执笔起草，经陈丕显修改后在次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的。《人民日报》在九日转载时加上了由毛泽东口授、王力笔录的编者按：“随着上海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曾说：“很好，又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

^① 刘志坚抗日战争中在冀南负伤被俘。第二天在一次伏击战中获救。

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自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

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被接管后的上海《文汇报》发表声明，“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

1月5日

凌晨，周恩来接见《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的代表，随后，又接见了到会的全体同志，表示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陈伯达、聂荣臻在业余航校体育馆接见国防科委、军医大学、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群众，表彰北航“红旗”“名誉不错”，要好好保持。（《传信录379》）

由全国各地串连来京的工人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指示：革命职工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

首都造反派举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

大庆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召开“彻底批判大庆展览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解放军军事测绘学院造反派封闭了全军文革小组，揪斗了刘志坚。

张、姚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在上海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张春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把整个社会中坏的东西该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过来。”

上海《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接管了《解放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

报》诞生。”

1月初

叶群将江腾蛟在郑君里等家中所抄到的材料，在家中当着江青、谢富治的面，全部焚毁。

1月6日

6、7、8数天之内，造反派陆续包围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

由江青提名、毛泽东批准，任命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深夜二时，周恩来在中南海第二次接见“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代表以及“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十九个组织的代表，听取了代表们揭发陶铸问题的汇报和意见。他对大家说：陶铸同志要检查，首先要到党中央常委去做检查；希望大家把材料送上来。代表当即递上很多材料，周恩来表示将负责把材料转交中央文革小组。他还询问了“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的组成及联络工作情况。（《传信录382》）

周恩来两次接见江苏省负责人及南京赴京造反群众，解决南京问题。

王力、戚本禹在清华附中接见该校的一批所谓“老红卫兵”，鼓励他们有错就改，“早日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传信录380》）

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16个单位召开“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刘、邓已被置于“走资派”这一敌对地位。在江青的怂恿下，清华大学学生假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遭车祸入院，诳骗王光美前往看视，乘机把王劫持至清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王光美被迫写了四点保证后放回。

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工总司”组织了二万群众冒雪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韩哲一、梁国斌。全市数百名局以上的干部陪斗。大会发布了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

(一)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彻底坦白交待。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做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

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第三号通令

(一) 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示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 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后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待，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待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 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待，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 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 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张、姚两人没有参加大会，而是躲在兴国路招待所里，观看电视转播的大会实况。

根据张春桥的布置，徐景贤在会后将大会的发言稿和通令报送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姚文元写成了《情况简报》：

“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 10 时到下午 3 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市长、市委书记。曹监督劳动，陈一周内交待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了。革命形势大好。”

从此，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已完全瘫痪。党、政大权已完全落入张、姚所操纵的造反派手中。

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红旗》1967 年第二期立即转载，并特加按语。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红旗》杂志编者按：《文汇报》从今年一月四日以来，面貌焕然一新，成了一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报纸。它连续发表了许多好文章和好社论，本刊转载的《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好得很！它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准造反的奇谈怪论痛加驳斥，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有些负责人，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或没有改造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既不学习，又不接近群众。因此，他们直到今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于是就跟着瞎说“过头了”，“太乱了”，“革命精神是好的，具体做法不对”等等。应该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这样下去就要从不理解走到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同志，极有必要读一读《革命造反有理万岁》这篇文章，照照自己的思想，换一换脑筋。希望这些同志，赶快猛醒！赶快猛醒！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杀出了一批革命造反派。他们根据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高高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那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发起了急风暴雨式的总攻击。其势锐不可当，迅猛异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批红色革命造反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

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感情最深厚。他们最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不怕。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许多所谓“越轨”行动。“越轨”就是革命！“越轨”就是造反，这些“越轨”行动，是革命的创举，每一个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呼“好得很”、而不应该跟着瞎说“糟得很”。

革命造反派，他们的目光最锐利，嗅觉最灵敏，斗志最旺盛。在他们的冲击下，一小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论伪装得怎样巧妙，还是一个一个地被他们揪出来了，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论采取什么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都一一被革命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识破了。在革命造反派的穷追猛打之下，那批顽固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境越来越狼狈。他们如果不低头认罪，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继续顽抗下去，则非垮台不可。

革命造反派，他们敢打敢拼敢造反，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革命造反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有成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关在书斋里学，而是在大风大浪中学，带着阶级斗争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因而学一句，顶一句用，精神力量化作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大敌当前、困难重重时，他们学了毛主席著作，就浑身是胆，敢于豁出去，任何困难、阻力都压不倒他们，而只能被革命造反派所压倒。

革命造反派冲在前头，遇到了种种阻力。这些阻力，花样不少，说法不一，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一句话：不准造反。我们必须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准造反的奇谈怪论痛加驳斥。

“过头了，过头了”。这是一种怕字派的意见。他们一概不赞成革命造反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击。他们喜欢舒舒服服地闹革命。其实，舒舒服服是闹不成革命的。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舒舒服服地闹革命是假闹革命，真想舒服。谁想舒舒服服地闹革命，谁就会舒舒服服地“演变”成为修正主义。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亦是这样。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对资产阶级的剧烈的冲击，没有一场尖锐的决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会轻易地从执行者的头脑里退走的。我们就是要大喊大叫，就是不怕“过头”。

“这样搞法太乱了。”你怕什么！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今天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扬大民主，只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打掉那些束缚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旧框框，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我们再不要重犯叶公好龙的错误了。天天在叫发动群众，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又惊惶失措，怕得要命，这不是重犯叶公好龙的错误吗？革命的大乱好得很。革命的大乱的结果，失去的只会是一切腐朽的东西，而在斗争中我们却能学到更多的毛泽东思想。

“革命精神是好的，具体做法不能同意。”这又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提法。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总是通过一个一个具体行动体现出来的。你既然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精神，但对每一个具体革命行动却又百般指责，这样，你的“支持”、“赞成”，岂不一一落空了吗？！一面肯定革命精神，一面又反对革命行动，两者怎么能够统一起来呢？造反派在斗争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也是难免的。谁想抓住他们的某些个别缺点来攻击革命造反派，谁想从中捞取半根稻草，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对待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要末积极支持，要末坚决反对，折中主义这条路决然走不通。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这个口号，以什么态度对待革命造反派，这是检验他们的试金石。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要高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以当一个革命造反派而自豪。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展望新的一年，形势大好，任务艰巨。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任何情况下紧密团结，继续战斗，革命到底，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新胜利！

“联动”第四次冲击公安部，有人高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继去年十二月底三冲公安部之后，一月六日晚，联动纠集百余人四冲公安部。他们捣毁礼堂设备，放鞭炮，割电线，砸喇叭，写反动标语“活着干，死了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又涌进食堂，将几十斤香肠和猪头肉抢食一空，真是一群无赖！次日，联动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凶器等企图再次冲入公安部。由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保卫，其险谋才未得逞。但联动‘贼心’不死，一月十日，他们竟向公安部下了‘最后通牒’。第二天，五、六百人第六次冲公安部。革命群众被激怒了，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他们结成了一道冲不垮、打不散的人墙，和联动据理斗争。在英雄的人民面前，联动狼狈不堪，落荒而去。恼怒之下，竟砸广播车出气，并大喊反动口号“刘少奇万岁！”

1月7日

周恩来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说：“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

晚，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说：不要揪人，不仅谭震林、李富春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不能揪。陶铸同志也不能揪。刘邓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还要保。

周恩来接见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他们是到中南海西门来，要求揪刘少奇的，周答复，送大字报可以，要揪不行。

江青、陈伯达等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指责陶铸授意熊复，以换头术，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照。

王力、戚本禹至北京红卫医院(安定医院)接见以精神病被送至该院治疗的陈里宁。陈里宁长期来多次写材料揭发批判刘少奇，受到折磨。(《传信录 383》)

陈里宁，湖南湘潭人。湘潭市政府干部、党员。1963年4月写材料对刘少奇的言论提出怀疑，被认为患精神病，送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在11月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少奇的问题，寄省委书记张平化转交，复被送入精神病院。1964年7月又因怀疑刘少奇，受到批判。他先后写了三十余封信给毛、周等中央领导。12月，复被送入精神病院。1965年1月，被逮捕，反复审讯，倍受摧残。10月，复至京入院医治。1967年1月，由于王力、戚本禹的干预，陈成为反刘少奇的英雄，天津话剧院以陈为原型写成剧本，王力命名为《新时代的狂人》。在京津多次上映，顿时名噪一时。

北京市召开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大会。

1月8日

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宣布中央各部要改组，宣传组由王力负责。并充分肯定上海两报的夺权行动：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下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很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的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的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那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用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让群众监督。)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

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了就解决了。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要排的。(有人插话：陶铸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都讲，来京想见毛主席很好，我想毛主席一定会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一定会见。用这个来将主席的军，搞两面手法，自己落好。)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门。教育部管不来，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插话：陶铸非常坏，新华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把陈毅的头割掉，换上邓小平的头。)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按] 席宣《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探讨》(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记 58 年成都会议，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柯庆施发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两个月以后，柯遂在八届五中全会

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考同时附合的还有陶铸，申言“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有谓陶之超擢纯出邓小平之荐，恐非其实。且其时邓早已见嫌于毛，陶若非毛所见重，邓虽有荐，亦难入毛的耳。据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记，陶以曾顶撞刘少奇而著名，毛之任陶，盖取其与刘有夙嫌耳。据杨尚昆回忆：文革前，毛曾有意另设书记处，任陶担任。故杨“称陶铸是刘少奇调中央来的，是‘天大的冤枉’。”

毛泽东讲话，对上海“一月风暴”高度评价和支持：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①

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初稿，供讨论用）

一、党政机关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各级党政机关必须认真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大力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促进干部的思想革命化，把我们的党政机关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化的领导机构。

二、对党政机关的当权派要作阶级分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一小撮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彻底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规章制度和思想作风。例如：官僚主义、老爷作风、机构臃肿、级别制度等等。

三、党政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革命干部在运动中应该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和保密制度，但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保密”“组织纪律”等等作为借口来限制和压制群众运动。

革命干部对于任何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能无条件接受，而应当进行抵制。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各级党政领导采取任何形式整革命群众，不许因为干部提意见而调动他们的工作，公布他们的历史，停止他们的党团组织生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揭发领导问题而被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革命干部，必须认真予以平反。

五、机关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可以建立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

党政机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小组，必须由群众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产生，并且随时可以撤换改造。

各种革命组织和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是否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由他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六、应该允许革命干部在本机关、本地区以及同一业务系统范围内进行革命串连，以交流经验，互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应该欢迎学生、工人、农民到机关进行革命串连，

^① 转引自徐向前《在文化大革命中》，具体日期不详。

任何不允许革命串连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保密机关可以在机关外部设立接待站，接待来串连的革命群众。

七、建立少而精的主管日常工作和业务的领导班子，保证完成工作任务。在夺权的单位或者领导瘫痪的单位，要打破级别限制，用群众推选和上级批准相结合的办法，把那些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的干部选拔到临时的领导班子里来。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把各级党政机关办成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同时任命王力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汪东兴在人大会堂接见农林口部分师生及人民大学红卫兵。周恩来讲话，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批判陶铸同志继续执行的反动路线，这是对的。但不要揪他们，要党内批判。江青代表毛主席问大家好。说：斗争的锋芒，应该比较准确地针对着一小撮制定这条路线的人及死不回头、执行这条路线的人。（《传信录 386》）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接见赴中南海揪陶铸、谭震林的红卫兵。周讲话：要批判是对的，我劝大家不要揪。我们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不用揪的办法。我处理四次冲中南海的问题了，无论如何，要守纪律。

周恩来接见北京石油学院造反师生及石油系统的群众，表示支持他们批判石油部党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出余秋里前几年基本上执行的是毛的革命路线。（《传信录 387》）

陈伯达打电话给躲避在昆明市郊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指责他胆小，害怕群众，“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阎红彦被逼自杀身亡。

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单位 62 名代表。说“要把目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起来。实际上从 1945 年以来，从七大以来，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萧望东的文化部还是旧文化部。（《传信录 388》）

戚本禹在国防部接见测绘学校、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时重申刘、邓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传信录 389》）

受江青的委托，关锋找山西刘格平谈话，面授机宜。刘格平即日返回太原，贴出揭发省委的大字报。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编辑部文章《为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在一起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国家和政党。

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家被抄。廖是贺龙的外甥。

上海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了全市铁路、海港、长江航运及邮电部门的权。张春桥说：火线指挥部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了市人委。接着，又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造反组织联络站”，以取代公安与市委的权力。

上海“工总司”二兵团头头耿金章在锦江饭店九楼主持开会，会议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到会的共有 35 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也出席了会议。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均拒绝参加。会议决定由朱永嘉起

草《紧急通告》，签字者共 32 个造反派组织，陈丕显也签了字，表示支持。张、姚、王均表反对。

《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述评，评述上海革命形势。

《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述评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上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烈火熊熊，凯歌高奏，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空前团结壮大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着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发起了总攻击。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面临全线崩溃的命运，他们正在采取更隐蔽、更毒辣的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上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百万产业工人，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障碍，推动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造反有理”的教导办事，不怕打击，不怕压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杀出来了。他们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先是识破了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借口“抓生产”来压制革命的阴谋，并且给予狠狠的打击；继而又戳穿了他们唆使、纵容御用组织中被蒙蔽的工人群众擅自离开生产岗位，破坏生产，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手法。许多工厂的革命造反派一面进行揭发斗争，一面坚守生产岗位，彻底粉碎了一小撮人的新的进攻。他们的革命行动，逐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不少受蒙蔽的人纷纷觉醒过来，革命造反派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发展壮大，他们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

郊区的农民现在也积极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革命的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决心彻底斗垮农村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铲除一切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最近，不少县召开了几万人的大会，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发起猛烈的攻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热潮。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是：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革命行动，给上海地区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很大的影响。上海新闻单位的革命造反派，接管了《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革命造反派掌握的宣传工具，以最大的革命热情，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威风，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三个重要标志是：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他们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大风大浪中，在艰苦、复杂、曲折的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他们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敢字当头，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死不怕，发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勇往直前。无论是工人革命造反派，大中学校的革命造反派，还是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每一支红色造反队伍都有着一页可歌可颂的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革命造反派最懂得，我们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战无不胜的伟

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因此，他们始终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特别是林彪同志发出了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伟大号召以后，他们更加自觉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更勇敢地艰苦奋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

在斗争中，广大革命造反派不仅越来越团结一致，而且也注意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尤其可喜的是，许多大中学校的革命小将，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到工厂和农村去劳动与生活，向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学习，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开始和工农相结合。不少工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也派出代表，到学校取经。这样，相互推动，内外交流，进一步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近一个多月来，通过几次全市性的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实行了大联合、大团结，在同一个战斗目标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同时，通过每一次斗争，每一次揭发批判大会，加上革命造反派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许多受蒙蔽的群众认清了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真面目，使犹疑观望的群众进一步明辨了是非，倒向革命造反派一边。

上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的第四个重要标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进攻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看清，上海地区一小撮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小撮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采用种种恶劣手法，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他们明里一套，暗中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阴险毒辣地围攻、打击革命的红卫兵小将，软化收买红卫兵小将。他们用卑劣的手段阻挠工人起来革命造反，阻挠不成，就指使一批人组织御用工具为其“保驾”。他们采用各种形式，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制造事件，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工人斗学生，自己则退居幕后，“坐山观虎斗”。大量的事实表明，他们如此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的人自己就犯下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死死地抱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根稻草，就是为了“保”自己，“保”自己的“乌纱帽”。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任何妖魔鬼怪，不管他隐蔽得多么巧妙，不管他采用多么狡猾的手法，都逃不脱被揪出来的命运。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深深懂得，尽管当前的形势很好，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很深，流毒很广，斗争还会有曲折和反复，摆在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因此，必须丢掉幻想，坚持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五十六卷 1967年1月9日至11日

1月9日

毛泽东讲话，论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是不成功的。有好多重要的问题，就是依靠机关来揭露。

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在他主持的军委碰头会上，攻击贺龙是“土匪”。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贺龙家在年初被抄，夫妇二人为躲避造反派的揪斗，藏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

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贺龙及其他（节录）

（一九六七年一月）

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人物，他发了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陈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处理海军问题，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

海军过去以军事为重点，转为以政治为重点；以非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官僚主义作风，转为非官僚主义作风。海军这几年的成绩是不能抹煞的。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扣上夺权的帽子，扣上“地下活动”的帽子，是不公道的。

刘志坚主张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帅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

这几位老帅是好同志。他们是做工作的，不是不做工作的。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不是不光明磊落的。把他们炮轰了，打倒了，对军队是不利的。相反真正要打倒的并未打倒。

在军内并没有炮轰贺龙。他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他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我们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的。是资产阶级进行反扑。刘、邓、陶、刘志坚他们向无产阶级挑战。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但在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在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大土匪，是土匪出身。用送礼、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他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打倒贺龙！

中央文革决定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市二中、二十五中和华侨补习学校为军训试点学校。2月10日，解放军军训人员进入诸校。

周恩来、谢富治在人大会堂接见全国公安、检察、法院来京人员，谢富治讲话说：我们正在酝酿关于加强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六条，并念了《六条》的草稿。他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传信录392》）

在工矿企业座谈会上，江青讲话，说：现在同志们要夺权。现在是革命工人大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陈伯达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斗争。半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群众

的夺权斗争做了思想准备。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治的地方就要把权夺过来。凡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垄断的，都要把权夺过来。（《传信录 393》）

陈伯达接见新华社群众，宣布改组新华社，王唯真任副社长。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目前形势很好，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揪出了陶铸。把陶铸的盖子一揭，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过去是一块大石头压着。他攻击陶铸一贯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倒台后，仍千方百计执行并阻止批判反动路线，还反对提“反动路线”一词。（《传信录 394》）

王力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革命造反团成员，说：《告上海人民书》和《人民日报》按语，“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传信录 395》）

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大师生，说：从七大以来，就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传信录 396》）

工交系统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薄一波大会。

“联动”第五次冲公安部，呼口号“打倒江青”，“保卫刘少奇”，“谁反对刘少奇就砸烂他的狗头”。

《人民日报》转载《急告全市人民书》，把标题改作《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上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语。

《人民日报》转载《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语(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接见“红革会”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工人起来了，革命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工总司”等 32 个造反组织的《紧急通告》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其中突出反对经济主义，作出十条规定，“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 12 日重新发表《紧急通告》时，都加了编者按，表示“全力支持”，“最坚决的支持”。

紧急通告

《文汇报》编者按：我们全力支持《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我们希望全市革命造反派认真执行这十条意见。

目前，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政治上已开始瓦解了，便必然要从经济上来发动新的进攻。这场新的进攻，其矛头直接针对无产阶级的司令部，直接针对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必须最最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新反扑。

任何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行为。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行动起来，不折不扣地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面揭穿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阴谋，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把生产搞好，努力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解放日报》编者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继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之后，又发出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个通告十分重要。我们表示最坚决的支持。这个通告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正在玩弄新的花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并妄图用物质刺激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及时识破了这个大阴谋，粉碎了这个大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经济主义，物质刺激，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不要这些破烂货；他们完全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急通告》所提出的十条意见，正是反映了革命群众的共同意愿，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再一次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目前，正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条路线决战的时候，正当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玩弄新的阴谋。他们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工人停止生产，影响港口工作，破坏我国国际威望。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段，无非是为了：一、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二、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同时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推行和平演变，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

为此，我们严正警告上海市委，任何妄图用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和增加工资福利来转移斗争视线的阴谋，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揭露这个阴谋，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攻。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我们相信革命的广大工人群众，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定能“公”字当头，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正确地处理上述问题，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医药工业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上海造纸工人革命造反总部，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北地区指挥部，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工人安亭兵团，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民族造反司令部黄浦区指挥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济大学东方红总部，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1月 10 日

毛泽东对《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作批示，认为“此两件很好”，要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按] 据叶永烈《王洪文兴衰录》，这份传单是上海工人返沪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主持，朱永嘉^①起草，且得到陈丕显的支持与同意草成的。张春桥当时以为已有《急告全市人民书》，不需再有此《紧急通告》，颇以朱永嘉为多事。王洪文亦因耿之第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而不满。然毛泽东因看中其中反经济主义这一点，大加称许，故一时身价倍增。张、王亦转而攫此以为自己的功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月上旬，眼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完蛋了，一小撮走资派输红了眼，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刘、邓的黑干将，和彭真、林枫结成反党的“桃园三结义”的反革命江湖侠客吕正操此时也跳了出来。他扣压了铁路系统几十个革命组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却印发了五十万份《告全国旅客书》，要全体乘务员为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全面组织起来。他煽动乘务员说：“你们能出乘就出乘，不能出乘也是革命行动。”恶毒挑拨乘务员和旅客的关系。他拿出杀手锏，挑动各地工人罢工，赴京告状，制造铁路中断事故，破坏国民经济。

王秉璋操纵下的七机部一时妖风四起，提级加薪，串联补助，停产停工，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进行了为期十八天的罢工。

在农林口谭震林通过水产部党组所属渔业公司各组党委发出了停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造成了严重的轮船停港事件。

一小撮走资派又把这股黑风刮到农村，妄想把农村作为他们最后一个堡垒，负隅顽抗。他们煽动农民和工人、学生的对立情绪，公然说：“他们工人要造你们的反，你们就把反造回来嘛！”使大批受蒙蔽的群众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在年终分配问题上，他们恶毒地提出“分光、吃光、用光”的“三光”政策，分掉公积金和储备粮，一下子签发了八十万元的“串联费”……想以此挖集体经济的墙脚，搞垮人民公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 158 页）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高校造反派组织。陈伯达讲话，说陶铸揪出来后，是不是除了陶铸就没有旁的了呢？至少还有个别一、二个吧！江青讲话中说，当前走资派大搞经济主义，破坏文化革命。造反派内把斗争锋芒指向一批有错误、但作了检查、坚持工作的老同志和军队，必须防止。江青在讲话中说：“桃园三结义是彭真、林枫、吕正操反对林彪副统帅的反革命小集团”。（《传信录 397》）吕正操家随即被抄。

周恩来在中南海对铁路系统院校师生职工讲话，说：“丢开业务，光搞革命，那不是落空了吗？抛弃业务，怎么搞好革命？”（《传信录 398》）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大会堂西小礼堂接见有关单位的造反派代表，介绍上海的经验（反经济主义）。江青说：王震不好。谢富治原是邓小平的部下，但他是第一个揭发邓小平的。（《传信录 399》）

康生在高级党校大吹他十年来与杨献珍进行的十次原则性斗争。他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

^① 朱永嘉，原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助教，姚文元秘密起草评吴晗文章时曾帮助提供明史资料，有功。其后就成为上海写作班子中的负责人之一。

献。”“刘少奇有一种理论，总起来就是唯生产力论。”（《传信录 400》）

根据江青的指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写成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报告，送林彪审批。林彪亲批：“完全同意”。

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部分团员谈话：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公司联合行动，在天安门广场火烧所存的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通告，各地纷纷响应。

黑龙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等组织组成省委和机关接管委员会，进行了夺权。

《人民日报》发表北师大红卫兵批判孔子的文章。

1月上旬

中国科技大学“雄狮”在西单附近贴出《中央文革往何处去？》的大字报。北大附中“红旗”在北大贴出“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倒！”的大标语。在北太平庄出现“敢替谭力夫翻案”的标语。

1月 11 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如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峰、谷岩、张涛。小组成员名单是由江青拟就的。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林彪指示，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再报林彪。

徐向前《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月十日，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中央文革对这个名单也很关心，也想看看，已送他们征求意见。我阅后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尤其是海军、空军，负担保卫海防空防的任务，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不好。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也把王辉球、成钧、常乾坤抓走。这个问题应该研究解决，否则大家没有底。……十一日，又送来正式通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

毛泽东委托林彪，在政治局与中央文革出席的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人民日报》在 12 日公开发表）。这个文件将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等并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了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的权力机构，正式取代了书记处。毛泽东甚至说：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以后的文件都以类似的形式发布执行。《人民日报》与《红旗》并分别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对上海的夺权表示支持。

在此前后，林彪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对领导干部“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张春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

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所谓经济主义的通知。

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中发(67)16号

各级党委：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工矿企业和农村全面地深入地展开。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一切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形势非常好。但是，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他们用各种经济收买的手段，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他们煽动一些群众要晋级加薪，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资。他们煽动前几年下放到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回到城市，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按国家规定，强行到银行提款。地富反坏右分子也乘机妄图扰乱国家经济生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第一，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惕，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说服少数被蒙蔽的群众，揭露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阴谋诡计，保护国家财产、保护

集体财产，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循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前进。

第二，在经济问题上，过去有些不合理的东西，中央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调查研究，吸收群众的合理意见，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

第三，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第四，中央责成各级银行，不论是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是集体经济单位，所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支出，都要一律拒绝支付。

第五，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等，现在都不要改变为国家所有制。

这个文件，应该在工人、农民、学生中普遍宣读，也可以在工厂、农村、学校中张贴。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禁止“一小撮走资派”煽动工人农民入城，包围银行，强行提款。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14号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现在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煽动一时被他们蒙蔽的、支持他们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大批地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到北京来，或者流进大城市、甚至煽动罢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银行，强行提款。一切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今后，如果发现有人继续进行这种煽动，应立即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发至公社党委、人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并批示：这个文件，应该在工人、农民、学生中普遍宣读，也可以在工厂、农村、学校中张贴。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 中发(67)17号

根据各地革命群众反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少数的党政负责人，为了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最近任意给群众大批金钱物质，他们以“关心”工人、青年“福利”为名，对反对他们的革命群众组织用金钱去笼络，同时又给某些被他们蒙蔽来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以特别优厚的物质享受。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

一切群众的革命组织，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防挥霍浪费，对于某些领导人用经济手段来转移革命人民政治斗争方向的企图，都必须提高警惕，应该使革命群众懂得，干革命最重要的威力无穷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福利问题上，势必削弱自己的革命斗志，容易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

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 中发(67)18号

我们的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广播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中央决定，凡是发生这样情况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广播电台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交给群众离开电台去斗争。群众有意见的领导人，应当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各地广播电台，应当一律使用原来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称，不要改变。

(注：必要时，可在广播电台内部张贴)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晚，“联动”第六次冲击公安部，“联动”及亲联动分子数千人集聚天安门，向公安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人员，受到镇压。

中国科技大学“雄狮”贴出《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分歧在哪里？》的大字报，师大附中贴出《严重违反16条的现象——评12月份以来的抓人现象》，攻击中央文革。晚，“雄狮”组织被抄。15日其头目被捕。清华大学连续贴出《康生与总理》、《康生同志，我们怀疑你》等大字报。

“捍卫团”头目时传祥、张百发再次被游街示众。

揪斗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大会在北京体育馆召开。

上海“红三司”接管上海公安局及各分局。

第五十七卷 1967年1月12日至17日
(山西省夺权)

1月12日

《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文。

《人民日报》、《红旗》联合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对一些地区、单位领导人，屈于压力，增加工资福利、滥发经费、物资、票证等现象，指为走资派拉拢腐蚀群众、破坏运动的行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联动”为非法组织，责令其成员到公安局自首登记。

周恩来在中央、国务院、北京市接待人员会议上讲话：“有些地方、部门，过去推行刘邓反动路线时强调生产，反对革命。因此，群众一起来就斗群众，围攻群众，错打群众。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广大革命群众要冲破……，各地的领导总想维持他们的旧秩序，于是抗拒抵制……第一个时期是怕群众，第二个时期是躲避群众。到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躲不起来了，于是就瘫痪起来，什么都承认，一反过去，借口革命而破坏生产、放弃生产……大搞经济主义。”(《传信录401》)

江青到新华社，指责熊复在照片上“弄虚作假”，在全国起了极恶劣影响。他的入党也极有问题。(《传信录402》)

戚本禹煽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造反派闯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朱德在中南海的住所，进行揪斗，朱德不在家，造反派揪斗了康克清。

《戚本禹反革命案起诉书》被告人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钓鱼台十六楼，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所，对他们进行围斗。

(在同一会上)诬陷朱德是“大野心家”、“大军阀”等，指使一些人逼迫曾任朱德秘书的曹全夫揭发朱德、康克清的所谓问题。戚本禹还煽动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可以去妇联点火。”当天晚上，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闯进朱德住所，围斗了康克清，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历史的审判》第2辑第9页)

王力、关锋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及北京四清工作团部分团员。呼吁北航“红旗”及地院“东方红”学习上海经验。批评四清工作团团员因刘建勋、解学恭支持造反派来中南海抓他们两人。(《传信录403》)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财经学院“8·8”战斗队及其他十余所院校的造反派联合组成“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下乡联络组”，师生纷纷下厂下乡。

上海召开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这是他们1月4日回沪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张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引述了毛的话：“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

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同时向毛泽东发出了致敬电，输忠颂圣。（《传信录 404》）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永远忠于您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全体战士，向您，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们正在最最热烈地欢呼您老人家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我们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时候，从北京又传来了您老人家的声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这是您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的声音，这是您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鼓舞、最大鞭策的声音。我们欢呼，我们歌唱，千万句话说不尽我们的幸福心情，千万支歌唱不完我们的感谢心情，我们只有千万遍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总是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刻，给我们指明斗争的大方向；您总是在斗争最尖锐的时刻，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精神力量。您永远热情地关怀和支持革命造反派。您永远培育和扶植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现在，您又在我们革命造反派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激战中间，批准了我们的大方向，肯定了我们的战斗任务，支持我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您的这一伟大英明的决定，定将迅速点燃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什么反革命的经济主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者组织的新反扑，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都将统统在这场冲天烈火中烧焦、烧臭、烧成灰！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一再教导我们，敌人决不会自行消灭，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事实正是这样。上海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虽然他们玩弄的反革命的经济主义阴谋已经被揭穿，虽然他们已经在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但他们仍然在进行疯狂挣扎，千方百计地企图瓦解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妄想在我们各革命造反团体中制造分裂，挑起纠纷，以便他们滑脚溜走，取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我们一定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一定要遵循您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致行动起来，穷追猛打落水狗，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打得永世不能翻身。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您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彻底肃清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的恶劣影响。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把革命造反派进一步联合起来，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紧紧掌握住上海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使上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上海和外地在沪各革命造反团体欢庆中央贺电，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以第十三冶金公司焊工杨承效为首的“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联合造反派成立“山西省革命造反总部”，宣布夺省委权。

青海“8·18 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等造反派组织冲击青海日报社。

1月13日

深夜，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找毛泽东谈话，郑重地向毛提出自己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沉吟不语，只是建议刘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论》与狄德罗的《机械人》。临送行时，嘱咐：“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中发(67)19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

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按] 关于六条出笼的经过，请参看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92页。据

王力《反思录》，它是在 1966 年 12 月就开始搞，是毛亲自提出的。六条规定反对毛、林者为反革命，后来实际上扩大为凡不满江青、陈伯达、康生乃至王力、戚本禹等的言行，均以反革命论处。多少人因此而无辜陷罪，甚至冤死无告。

周恩来在铁道部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上讲话，号召反对经济主义。（《传信录 405》）

徐向前、江青、关锋接见空军机关院校革命群众代表。关锋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重要的就是从他们手里夺权。只有夺权，才能斗倒、斗垮、斗臭他们。”会上，关锋等一致指名攻击刘震、成钧、何廷一为空军司令部的走资派，企图夺吴法宪的权。（《传信录 406》）

周恩来电话指示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不能抄贺龙的家。

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林彪要请江青讲话保你，要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并催促他快点写材料。吴法宪立即写出材料交给叶群，诬告刘震、成钧搞“地下活动”，又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诬告何廷一搞“政变”。

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化名萧力）在解放军报社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指出几个月来，军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一直脱离文化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而胡痴、谷岩、宋璋却宣布夺了报社的权，准备发布《告全军战士书》。在中央文革支持下，15 日胡痴以反党阴谋被揪斗。

上海游斗了陈丕显。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

1月 14 日

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并讲话。一月中，由周恩来拟出名单，经毛泽东批准，将一批大区中央局书记、省市委书记二十余人接到北京，以资保护。其中有宋任穷、张平化、江华、江渭清等。

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早就想开区、省委书记的会，是林彪同志叫我做的，总抽不出功夫，现在力争争取主动。究竟什么时候能争取到，不好预计。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够，思想不通，思想对立着，有的立场对立着。中央是各部委、各口、各部，地方大区、省、市思想跟不上，认识一下跟不上来，现在是情绪抵触，有的还站在对立的立场，不执行无产阶级路线，后两种情况多过前一种（前一种是执行正确路线，后两种是情绪抵触，立场不对），这种情况就很被动。江苏情况好一点，常熟最惨了。江华到上海养病，李井泉也到上海。刚才是内部情况，我只是概括地说了。

这个形势大好，特别是上海《文汇报》比《解放日报》好。《文汇报》评论中四个特点，确实如此。因为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五月通知起，杭州四月会议，北京五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发表，那是内部的通知。那时就说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这话现在还有效，到现在还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主席有预见，我们太落后了。参加革命三十年的、四十年的，在社会主义更高阶段，不能过社会主义关了，值得深思，不怨天，不尤人。许多人在大半年前，在主席面前就讲过，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怎么现在还是跟不上呢？的确是个新问题。列宁、斯

大林没有过这一关，马克思不负这个责任，巴黎公社是第一次演习。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我们离毛主席这么近，但是又离得这么远，这是很值得想一想。彭、罗、陆、杨揪出来以后，文化大革命几个主要方面都和他们有关，头一个阶段拿他们做反面教员，他们是反党集团。各省、市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林彪同志说，我们有些同志头掉了，还不知道是怎样掉的。主席问大家，如果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大家敢不敢造反？靠军队，他们也可以掌握军队。我们听了，有许多同志当耳边风过去了，有些人也许以为主席百年以后的事，不是眼前的事。主席说了，就是在想，吴晗罢官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影子。主席要点名，彭真当耳边风。主席到上海组织力量，姚文元的文章是这样出来的。当时主席指出，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跟着走，这样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当时刘、邓在场，吴晗为代表，彭真当耳边风，雪峰是认真了的，当时就感到彭真认识上有距离。我把雪峰的话告诉了彭真（当时是内部问题），雪峰看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这个问题。雪峰批判彭真是积极的，但同样执行刘、邓路线，错误比较严重的。北京市委现在还瘫痪，为什么？就是因为看得不深，跟得不紧。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的领导下，自己就跟着做了怎么办？也问我。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哪些是执行主席的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荐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谢富治同志能看出问题，也敢于说话，过去向邓小平提过意见，也提得很早。各级干部要注意观察领导，群众也是观察领导，各级领导如不互相观察，互相帮助。有的领导同志情绪还在抵触，甚至还在对立。主席思想中的最根本的东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反复循环，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能够在亿万人民的考验中经得住风浪，受得住考验。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这是前阶段总的情况。

这一起来就遇到了抵抗，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这一条路线的根源，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不仅是一九六二年，还有更远更远的根源，主席在前十条、“二十三条”中都讲哲学，大家不去学习，还说什么执行了没有？实际上都执行了，有自觉的，有不自觉的，那一个省没有执行呢？如李葆华现在很被动，中央工作会议上没听他说象样的话。李葆华大家知道还是比较老实的。凡是不承认的大区和省就很被动。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说了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家抓这个草。这样就更被动。对大区来说，任穷同志在，刘澜涛同志在，其他也有人在。大区负责人是三、四、六日都去见主席的，都是三十年、四十年以上的干部了。加上内战四十多年了。为什么毛主席这样说，我们都违反了？刘、邓一说，我们就执行了？是毛泽东思想太少了。尽管你主观上不是反党，彭、罗、陆、杨是反党的。消灭“私”字，层层关口，看你过去过不去。不进则退，退了就落后，就掉队。群众对刘、邓很气愤，可以理解。我们不光是愤慨，还有我们自己。除有宗派关系的以外，一般都是思想上的共同性。六七月份你不能不承认，群众揭发是个侧面，但是他这个侧面是能站得住脚的。十一中全会一开，冷冷清清的局面一转变，马上轰轰烈烈起来，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大家陷于被动。受压抑后，很快起来了。这就是社会革命的真正考验。所有制问题解决了，这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许多旧的东西，这都是生长修正主义的基础，所以说，搞不好中国必出修正主义。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这个因素，这不是耸人听闻的，主席在天安门上讲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了，大有希望。我说的是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各部，各省、市没有一个过了关的，原来说中联部好点，实际上王稼祥、邓小平都有问题，对马来亚的党比对父子党还严重，非常严重，比斯大林严重得多。……妇联又揪出康克清，总工会搞得最晚，搞得最凶。现在中央各部无一例外，直接冲到国务院了。各们副总理要做精神准备。中央不比各省好过。你们来中央是休息，我们可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休息，旧东西在脑子总是有，应当彻底清除掉。

许多地方领导同志想不通，八、九两个月是这样，在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不通，后来似乎通了，但许多问题没有揭发。山西未揭发，天津已揭开，内蒙已揭开了，还未解决。北京已瘫痪了，各单位的底子，我们不很清楚。现在人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可以开会，京西饭店有危险，北京饭店又有人要接管，广大人民和解放军是可以信的，但是有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十一中全会后，华北解决得不好，彭真搞的乱子，新市委承担，说话不灵，就是没有一个依靠的力量，当然不会有大问题。十月工作会议表现出来的，华北如此，别的区域也是一样。陈伯达同志谈得比较尖锐，林彪同志语重心长，是领导同志的谈话，大家应结合起来理解。和刘、邓有共同的思想，用反动路线去抵抗运动，但又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更严重，所以非提出批判反动路线不可。群众运动绝不因为我们阻挡就不前进。滚滚洪流是一直向前的。

十二月发表的两个十条，就是支持迎接革命的洪流冲向工矿企业单位，冲向农村。中层干部是否通了？现在还在观察，(地、县现在根本没通)烧到他本身怎么办？宋任穷本机关就闹得他混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典型。两个十条迎接这个高潮，现在高潮已经起来了，如军队、公安的已通过反经济主义，广播电台，机关的也要出来。如左派工作做得好，秩序就会好一些，军队要做好准备，现在不要出动，一旦某一方面领导权被坏人拿去搞反动的东西，那时就要用军队来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只要方向对，有点小乱不要紧。“十六条”有些东西现在跟不上去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已超过了原来的设想，摆在面前的是迎上前去，因势利导，不要抵触，更不要对立，要象迎接钱塘江大潮一样，鲁迅是彷徨了一段，一九三〇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上海的紧急通告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主席先读了，主席抓住了，这又是一个新的信号。挑起这个反扑是冲向社会以后，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不甘心不失败，就抵抗，有的是直接破坏，有的是指使各级的领导。必须进行全面地总反击，全面地总进攻。

我们的领导跟不上的，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很对立的，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怎么办？我们解剖两个麻雀给大家作例子，一个是部门的，一个是地区的。部门的如石油部，根据主席指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石油部，在这个情况下骄傲了，故步自封了。石油部的成绩首先归功于中央、主席领导，第二应归功于大庆全体职工的努力，当然不能否定石油部本身的领导作用，这也合乎实际，前五年比任何企业搞得都好，后来骄傲情绪增长，这里也夹杂着薄一波、李运昌故意为难。余秋里调小计委后，计划工作成绩大，很放心。大庆油田外边去的红卫兵冲不进去，本身的职工要革命，也压得很厉害，整个工委陷进去了，执行错误路线，一冲倒后，全部瘫痪，由右变“左”，七万多职工，有一万多人出来搞串连了，过去很少超支，现在超支很大，势必走到自己的反面。大庆油田栽这个跟头也有好处，压得厉害也就反得坚决，冲击力大，革命可能彻底一些，王铁人变成了造反派的头子，希望他们在抓革命、促生产上能走在前边，还有可能后来居上。32111 钻井队就是后来居上。石油部转变得好，可能转变得快一些。对石油部不能采取对吕正操、武竞天的办法。对彭、罗、陆、杨斗得太多，并不利，罢官的休息了，停职反省也是睡大觉。吕正操一直是自由出入于铁道部，对吕正操撤职留用，三月为期，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铁道部革命造反派组织了监督管理委员会。

再解剖一个云南，后来估计云南比四川好点，整个西南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西藏怎么样？西藏以军队为主可能好点。云南最近出了一件事，是想避开也不行了。就是因为云南省委对李井泉的领导不满，但是不是站在正确方向来斗争呢？阎洪彦从本位出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三省落后性相同，但是四川硬抗，搞白色恐怖，打击群众，因此还有人起来反抗，四川的盖子没有完全揭开，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自杀叛党，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绩，过去的几关都过了，但是(要)过的关过不去了，薄一波不揪出来，但也有人议论要打倒他。阎不走这条路，可能还有人认为他是好同志，现在就不能这样说了，他的家

庭……他的父亲抽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他上不请教主席，不读主席的书，最近事件发生后，郭超同志来反映，谷牧有个报告是错误的，对林彪同志的报告不看，读语录是说说的，做报告也是说说的。下不请教于群众，怕群众怕得要命，然而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呢？也是根本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军区党委也要想一想，主席为什么要搞大民主呢？我们应想一想，哪一点应请教主席，哪一条不符合群众要求，哪一点对同事不以平等态度待人。第一次乒乓球比赛时，阎只批评李井泉而根本不批评自己。他和高岗不一定相同，他是以和高岗不同自我标榜，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张恩尧我们是为了利用他向蒋帮做工作，可以给点鸦片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要给鸦片吃！反高岗使阎背上了包袱，平时也只是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要走上绝路，对红卫兵不欢迎，是防，是挡，十月工作会议后，还是依靠保守派压左派，对造反派不相信不支持，十月以后支持造反派是对的。元月四日左派冲向军区大院，阎洪彦、周兴一起逃跑，逃到西山，后又在西山开省委会，要周兴去见群众，群众叫周兴滚回去，阎洪彦滚出来，更不敢出来了，把军区暴露在群众面前，冲向了大楼，把赵建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洪彦的去向知道也不能告诉群众，群众烦了，把他压在车上游街了三、四个钟头，住到医院去当防空洞，扬言干部听到泣不成声，不吃晚饭。

我也犯了个错误，听说李葆华同志在稻香楼被围四昼夜，签了许多条子，陶铸讲了后，中央通知叫李回来，造反派同意了，结果叫保守派抢出来逃难到肥西县，发生了三天打架，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赵建民完全歪曲事实，咎由自取。叫阎洪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打的电话，阎听后，问周兴说怎么办？周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他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眠尔通几十片自杀了。这么大的事，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是反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

(周总理通过张子明给周兴并转省委的电话指示：(1)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来，决不允许再有任何动摇。(2)坚决彻底批判省委反动路线的错误。(3)只有如此才能改变严重恶果。(4)抓革命、促生产，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5)必须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教育保守派和不明真相的人。(6)希望接受上述五条建议，并坚决实行。)

只有如此，相信局面能变，向健康方面发展。见了同学后要很快把上述精神传出去。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王府井的传单说阎被谋害，赵毅重伤，这显然有人指使，阎洪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斗争锋芒不能向着军区，军区也不能当防空洞。进入军区责任在省委，中央呼吁撤出来。希望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矛盾不上交。

中央各部和各省谁都没有过了关，高高兴兴地回去，准备过好这一关，是否能过关，决定于本人。今天就说这些，相信绝大多数人能过好这一关。林总叫我做思想工作，我就讲这些。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地方党委把重要档案材料，电台机要人员和交通人员，暂时转移到军事机关，这对保证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保证党内文电的正常传递，是有好处的，

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党委，却借此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塞进军事机关。更恶劣的是，有的地方党委，自己干了这种事，却嫁祸于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中央责成你们：

(一) 凡属真正的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以及保证党内文电正常传递的人员已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应当由你们向群众正面讲清道理。如果革命群众怀疑党和国家机密文件中有整群众的材料要求清查，说服不了的时候，可以采取由你们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共同封存的办法处理。

(二) 凡是把整革命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必须立即全部取出，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当众处理。

(三) 决不准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在幕前或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负全部责任。

另外，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社论认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风行。

文化部揪斗部长萧望东。

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大会”。

在陈伯达煽动下，北京街头贴出“打倒萧华”的大标语。

王洪文勒令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

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奉江青旨意勾结地方各造反派组织联合行动夺权。随即以向造反派表态支持的戏法，跳到前台，成为山西省的革命领导干部。本日发表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 1 月 12 日夜起，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卫恒于 1 月 29 日夜间自杀身亡。

[按] 刘格平 1936 年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篮子监狱)。

同时被囚的还有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多人。安子文等均奉中央通知，履行悔过手续而遭释放，此即所谓刘少奇包庇的大叛徒集团一案。当时，惟刘格平拒绝履行悔过手续，后来才被释放。1966 年 12 月，江青了解这一案件，对刘格平特加赏识，于是把他调来北京。上海夺权后，即授意他立即返山西进行夺权。刘在 1 月 8 日回到山西，9 日联合刘贯一等五人贴出揭发省委的大字报，并迅速与

造反派勾结，于 12 日晚一举夺权。中央文革立即予以承认。刘与山东的王效禹，同是继上海夺权之后，在中央文革直接指使下最早起来夺权的地方领导。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夺了山西省的权后发布《第一号通告》。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一反到底，彻底打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几年来，他们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更是积极地推行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把大批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企图扼杀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亲自纠集了大小特务，建立了秘密情报网，安放窃听器、派出特务，专门刺探各革命组织的动向，把其划成一、二、三类，并把其领导成员登记造册，以便不久的将来好下毒手。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把大批黑材料放在省委各部内，至今拒不交出，猖狂对抗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省人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天天云集其中，密谋行动。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组织了一些保皇团体，公开与革命造反派拼命捣乱。等等，等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山西广大革命群众向这一小撮混蛋及其卖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强大攻势，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一小撮黑帮分子，为了挽救其灭顶之灾，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经济战。他们拼命给一些组织大量房屋、汽车、经费，某些单位的钱像流水一样成千上万地淌出，近几天更是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山西的财政经济和腐蚀了革命组织。

在他们的怂恿或操纵下，最近不断发生大规模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革命造反派，甚至发生武斗的现象。大量工人不断出外“串连”。

狗急跳墙，前些天他们甚至不惜挑动上万工人围攻革命造反派，以致许多企业停工，严重影响生产，甚至造成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等。

革命的同志们！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新的转折点！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保证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我们二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立即投入战斗。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反党分子的巢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很！

我们大声疾呼：

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牢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照常上班生产。我们革命造反派们更要在积极造反的同时，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不得动用武器、弹药和泄露国家机密，违者依法查处。

三、鉴于前一段贪污浪费之风大盛，勒令山西省文革接待站自即日起冻结流动资金，停止发放一切车辆，并进行调查和调整。除必要的正当的经费外，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联合监督财务机关执行。

四、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广为宣传，协助执行。凡有违反上述各条者，由有关部门协助我们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打倒折衷主义！打倒经济主义！决战刚刚开始，胜利就在前头：我们的决心下定了，为了真正捍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深信，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必将发展壮大。

“雄关漫道真知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革命的造反派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下团结起来！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附：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

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

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

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

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

北航播火兵团

北农机“全无敌”纵队

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

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

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

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

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

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

晋京革命造反大军

山西反修兵团

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

山西农民造反兵团

山西“延安”文艺兵团
太机第四野战军

赵瑜：《但悲不见九洲同》：(1967年)元月11日，以十三冶金公司二级半电工杨承效为首的“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及“红工联”等各路群众组织头头和来自北京的赴晋“造反”组织代表一道，联合成立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经过实力角逐，杨承效登上盟主地位，任总指挥。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已被总指挥部押在。

元月12日凌晨一时，夺权正式开始。省委大院如煮汤一般沸腾起来。至凌晨三时渐次平静，以收集各式公章大印半麻袋为标志，宣告了夺权的胜利。

1·12夺权之初，省级干部最先“站”出了五个人，他们是刘格平、刘贯一、刘芝兰、陈守中、袁振，向社会发表过《五人宣言》，表示向过去的“黑省委”决裂。由于与晋东南类似的原因，夺权之后两派分歧日益明显。到了1967年4月分歧日甚，突发了省城4·14事件。拥护刘格平的分一派，要坚持打倒刘贯一、刘芝兰、陈守中号称打倒“刘陈刘”。另一派反对刘格平、支持刘陈刘。由于观点的相近，晋东南“红字号”(即其组织名字带有“红”字)与刘格平及“红总站”挂起钩来；而“联字号”(带有“联”字)拥戴着武天明、李顺达，就必然地与张日清及“红联站”搭起线来。山西省形成了这样的两大派系(无论他们是否情愿)，其主要实力分布如下：

刘格平、陈永贵	张日清、刘贯一
杨承效、程首创	李顺达、武天明
红总站	红联站
驻晋零星部队	省军区及各军分区
晋东南红字号	晋东南联字号

(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6册)

65年被贬黜在河南洛阳机械厂挂名副厂长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揪至西安批斗(习曾任西北局书记)。习写信给毛泽东，毛复函：“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指李建彤的《刘志丹》一书)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周恩来于是把习接来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习得以安然度过运动。

1月15日

北京和各地在京的150个单位的造反派，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提出：各单位夺权可采取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采取开联席会议的方式进行管理，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传信录410》)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揪斗。

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武竞天在天安门被揪斗。

北京街头第一次出现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然根据毛的指示，次日即被揭去^①。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造反派“联队”抄查了民委和政协的档案。

“二司”及“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主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王

^① 韩素音《再生凤凰》第59页。

力等出席。陈伯达讲了话。

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与耿金章的第二兵团，联合其他九个造反组织进占康平路市委大楼，宣布对上海市委、市人委夺权，任命张春桥为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第二书记兼副市长。在张春桥的威胁下，耿金章旋即宣布退出，夺权流产。

西安造反派揪斗了西北局书记刘澜涛。

1月16日

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讨论夺权问题，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决定：“夺权斗争需要进行三结合，就是在地方上，要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要有解放军的代表，还要有革命领导干部。”

周恩来在深夜给刘少奇最后一个电话，嘱咐“要经得起考验”。

《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全面总结上海夺权斗争的经验，转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它是经过毛亲予审定的，是对造反派在全国全面夺权的公开号召。《人民日报》同日进行转载。张春桥在1968年2月5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曾说起：“(1967年)1月16日，主席批准夺旧市委、旧人委的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红旗》杂志评论员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他们正在乘胜追击，扫荡抗拒历史车轮前进的垃圾。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提出的革命方针和采取的革命行动，给全国树立了榜样，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经验。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支持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一个大学的范围内，从陆平反党集团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现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他们盘踞的地方和单位，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着党权、政权、财权。他们总是利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这些权力，来打击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一小撮人怎样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那些权力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党权，来欺骗、蒙蔽、压制一批干部和党团员。他们企图瓦解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极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企图涣散无产阶级为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他们把我们党的纪律，歪曲为资产阶级的纪律，歪曲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纪律”，歪曲成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纪律”，变成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紧箍咒。谁要反对他们，就把谁打成“反党”分子。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那些部门、那些地方的部分政权，在他们力所能到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群众。谁要起来革他的命，就要把谁打成“反革命分子”，以至开除、监禁。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歪曲地利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欺骗一些群众，组织什么“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等御用团体，来保他们自己。

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着的财权，笼络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为他们保驾。他们还用金钱收买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他们用各种经济手段，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单纯追求个人暂时利益的经济主义的邪路。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他们乱开支票，乱发物资，慷国家之慨，收买人心，妄图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交通运输。他们恶意地拟“矛盾上交”。这是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垂死挣扎的表现。这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反扑的新形式。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这也保，那也保，归根结底，就是保住他们自己的权力。在革命群众的压力面前，他们可以做这样一些假“让步”，也可以做那样一些假“让步”，但是，他们所做这样一些或那样一些的“让步”，都是企图打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保持他们压制群众的权力。他们在权力问题上，是寸权必争，绝不让步的。他们企图采用各种手段，阴谋扰乱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生活，以达到他们保持自己权力的目的。

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的堡垒，要一个一个地夺取。无产阶级夺回来的阵地，也还要一个一个地去巩固。

我们对于狡猾的敌人，必须提高警惕。他们也虚伪地打着“革命”旗号，向无产阶级夺权。他们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擦亮眼睛，分清敌我，辨别大是大非。要坚决把那些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家伙，一个个地揭露出来，把他们打倒。

上海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伟大贡献，就是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无所畏惧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举行大反击，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

这正是值得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值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

分子、革命干部学习的最主要的东西。

上海的大革命，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首创精神，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的经验证明，只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的权夺过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障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上海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绝不是极端民主化，绝不是小团体主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集中力量打漂亮仗，才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上海的经验证明，必须紧紧把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必须向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化等等，进行坚定的，不调和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维护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革命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目的是很鲜明的。这就是发动广大群众打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崇高评价，也是向全国革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并不说明那一小撮反动家伙的强大，只不过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发作。这种发作，恰好是表明他们就要垮台了。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我们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这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最伟大的力量。

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在我们的面前，是一片大好形势，是一片光明。我们要看到“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我们要象上海的革命群众那样，勇敢地打退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挑战。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

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石油系统“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代表时说：现在要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攻击，夺权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传信录 411》）

陈伯达、江青在接见聂元梓等时指出：王任重背着中央文革在北大搞，他和刘志坚一起搞了许多鬼名堂。江青还说：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王力、穆欣在新华社接见山西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指出目前运动的重要问

题是要工人起来，上海经验标志在一个市范围内向资产阶级夺权。夺权一定要联合。要把领导权夺过来，还要以革命机关干部为主。（《传信录 412》）

北京日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北师大“井冈山”、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等组织支持下夺权。而同时北航“红旗”、北大“红旗兵团”等组织亦进驻北京日报社，与报社内的另一对立组织结合，宣布夺权，并控制了印刷厂，自行编发报纸。双方相互指责、争夺。经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北京日报》停刊。北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到 2 月 5 日始撤离该社。

煤炭、石油、卫生等部被夺权。

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内燃机总厂、光华木材厂、邮票厂等单位连日来纷纷举行座谈会，揭露经济主义，批判走资派耍花招，撂担子，撒手不管、破坏生产的阴谋。

上海“工总司”、上海“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委会”等 27 单位发表第二次告上海人民书《坚决支持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

在原黑龙江省委书记潘复生、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下，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 23 个单位成立“联合总部”，发表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大权的公告》，欧阳钦、李范五被打倒。

广东全省革命派大联合（“省革联”）向省委发出最后通牒，把权力交予造反派。

1月 17 日

林彪复信解放军报社萧力（即李讷）等人，支持他们批判社内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封信并由毛泽东亲予批示。

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毛主席批示：

同意，这样答复好，退林彪。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萧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芳、武将、杨秉文、刘福山等几位同志组织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批判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解放军报》要采取“内外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肖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它机关干部，来访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说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来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 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林 虹
一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中央同意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望即转发公安部门并督促执行。

通 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支持上海市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是在新的形势下所采取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如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的四条、特别是其中的第一条，民警和劳改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作正面教育等，已经同目前形势不相适应，应该立即作废。各级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而应当根据《人民日报》《红旗》元旦及一月十二日社论、红旗评论员一月十六日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公安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大中院校、军队系统、中央机关造反派代表，听取大家的意见。周恩来讲话，说“夺权主要是夺领导权(包括人权、财权)，业务上是监督。”江青当面驳辩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传信录 413》)

陈伯达、江青、王、关、戚到广播事业局接见全体成员。江青讲话，报告毛泽东很健康。她说：你们应出题目，天天叫丁莱夫(局长)交待。把敌人丢在一边，让他睡大觉，休养，就不太狠。(《传信录 414》)

人民日报社召开批判唐平铸的大会，陈伯达、王力、关锋在下午赶来参加。陈伯达讲话，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很对。唐平铸到陶铸那里去了。关锋插话：《人民日报》有陈伯达的无产阶级路线和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指定《人民日报》今后由王力、关锋负责与中央文革联系。(《传信录 415》)

戚本禹在接见工人造反派代表时说：你们夺权，还定什么框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应该夺。他在与北航、地院的造反组织谈话中，说：北京的运动已经不如上海，我们感到惭愧。上海左派组织联合起来夺权，可北京左派还闹分歧。(《传信录 416》)

王力、关锋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山西革命群众，相继讲话：要求趁上海夺权的东风，进行夺权。你们可以依自己的意见改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名单。一句话：要夺权。(《传信录 418》)

谢富治对公安干部讲话指出：斗争已发展到接管和夺权新阶段。今天北京市公安局为政法公社所接管，“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传

信录 419》)

连日以来，清华、北航、政法、地院、科大等院校纷纷查抄“联动”据点，拘捕其头目。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学生赵战平，邹平等三人正式被捕。

农业部保守组织“延安兵团”宣布夺权。代部长江一真签字承认，被认为假夺权。“井冈山”、“红旗”等造反派则串连所属机关及农大、农机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监督委员会”，予以抵制。

由北京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首都打倒经济主义联合指挥部”发出紧急通令。

紧急通令

目前，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甘心于他们失败的命运，玩弄经济主义，进行新的反扑，一些受蒙蔽的群众正中敌人鬼计，一小撮趁机捣乱的坏蛋，大量抢购贵重物品，挥霍国家财富，严重地破坏了市场供应，造成恶劣影响。经济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催化剂，是敌人对抗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指示的政治阴谋，我们要坚决反对，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为此，我们特通令：

1. 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要立即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意增加的工资、福利，滥发的各种经费、物资退还给国家，不得挥霍浪费。
2. 暂时封闭全市各布票兑换站。
3. 暂时冻结呢绒、绸缎、手表、照相机、皮货、毛线、半导体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等贵重物品的出售，一般日用品不得大量购买。具体办法另行通知。
4. 对趁机进行投机倒把者，一律专政，严加惩处。
5. 本通令自发出之日起，立即生效，如有违抗、故意破坏或捣乱者我们将采取严厉措施，后果由其本人负责。

本通令请各政治机关、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监督执行。

这样作，可能会给同志们带来一些不便，但是我们相信，一切革命同志都会顾全大局，积极克服困难，支持这个革命行动。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极力进行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擦亮眼睛，不要中了敌人的物质刺激的糖衣炮弹；要厉行节约，浪费就是极大的犯罪！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首都打倒经济主义联合指挥部

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公社

首都中学革命造反联络站

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

首都职工革命造反者大楼工厂战斗队

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

中央歌舞团红旗造反团

中国人民大学《东方红》公社

北京市财贸职工革命造反尖兵总部

东方歌舞团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

北京百货大楼红色暴动委员会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水利部夺权。

北京邮电学院造反群众揪斗胡乔木。

山东青岛市长王效禹让康生之子张子石等来北京向陈伯达、康生、王力汇报，进行勾结。

张春桥又一次传达毛泽东的四点指示：

- 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 二、要抓住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 三、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干部、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革命的形势。
- 四、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张春桥还说：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好社会主义关。

第五十八卷 1967年1月18日至23日

1月18日

周恩来约请李富春、江青与贺龙谈话，江青拒绝参加。造反派组织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喊“打倒贺龙”的口号。周恩来向贺龙表示住中南海已无法保证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

中南海内造反派切断刘少奇住处电话线，断绝其与政治局的联系。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召集部分工矿企业代表及学生代表座谈。周表示：上海走到前面去了，我们要急起猛追。铁道部已夺了吕正操的权。今晚已有30多个单位到北京市委夺权去了。北京的几所综合大学在夺权中要下大力量，要起主要作用。陈伯达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夺权是解放后夺权的继续。（《传信录420》）

全军文革小组长徐向前谈海军问题：海军政委苏振华是邓小平插在海军的钉子。海军文革改组，以萧劲光为组长，王洪坤为副组长，李作鹏为常务秘书长。北京部队政委廖汉生是贺龙的亲信（外甥）。（《传信录421》）

中共中央通报各地党委，表扬天津建筑材料公司“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上缴附加工资。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26号

各地党委：

天津建筑材料公司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来电报说，他们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把公司批准给他们的三千九百多元钱和附加工资，全部上交银行，进行封存，等运动后期处理。中央认为：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交银行的做法好，赞成他们。

中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周恩来、刘宁一对工资问题作紧急指示。

（1967年1月18日）

1. 临时工、合同工现在制度不变，因为生产需要，行业需要。如果改成固定工，工资势必提高，工资提高后对农民有很大影响。并按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办。
2. 学徒工制度从长远看，可改为半工半读，但是现在不变。
3. 关于精简人员能不能复工、复职，今后按生产需要可由劳动部门介绍。
4. 工资和工资标准问题，未经中央批准以前，一律不动。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准的，应向他们斗争。
5. 各种补发工资问题。以前没按有关规定执行的，可以经企业和群众讨论并报上级，按照规定执行，以前错了的一律不补。如果过去执行错了的，有关领导挑担子，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
6. 各种奖金问题……（不清）。

全国各系统中第一个联合起来的财贸系统的革命造反派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周恩来、李先念出席。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林彪向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表示亲切慰问。大会宣读了给毛的致敬电和《紧急通电》。

光明日报社造反派及中央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冈山”

揪斗穆欣夫妇。

教育部、外交部联合向中国驻外使馆发出《关于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北京一些群众组织发布打击经济主义的第二号紧急通告。

紧急通告 第二号

目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派大好形势下，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象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经济主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包着蜜糖的砒霜，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表现。

我们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刻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为此，我指挥部于元月十七日发出一个紧急通令。

但是，革命每前进一步，敌人总是要出新花招的，我们必须警惕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歪曲我十七日的通令，阴谋策划罢市活动，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我们必须戳穿阶级敌人的阴谋，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为此，现紧急通告如下：

1. 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惕，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说服少数被蒙蔽的群众要顾全大局，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彻底揭露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的阴谋诡计，保护国家财产，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2. 除本指挥部元月十七日通令所指出的暂时冻结的部分商品(呢绒、绸缎、手表、皮货、半导体、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照相机、不凭券的毛线及毛织品)以外，不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借口私自扩大暂时冻结的商品的范围。
3. 不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借口私自封闭商店。

我们呼吁：一切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坚决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号召，打倒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首都打倒经济主义联合指挥部

北京市财贸职工革命造反尖兵总部

北京百货大楼红色暴动委员会

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公社

首都中学革命造反联络站

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

首都职工革命造反者大楼工厂战斗队

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

中央歌舞团红旗造反团

中国人民大学东方红公社

东方歌舞团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天津市“工农学联合战斗团”、天津市“荣复转退战斗兵团”劫走解学恭、胡昭衡、赵武成、阎达开等市书记处书记五人，秘密囚禁。中央对这类全国性的联合组织拒绝承认。

1月19日

中央发布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的规定。

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规定 中发(67)24号

各级党委、人委，各军区、军分区：

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国家仓库中的一切物资，没有国家调拨的指示，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私自动用，违背者以国家纪律严厉惩处。

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

毛泽东密令林彪：要整一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说：“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至二月中旬，毛指示，不要再提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

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在北京体育馆接见安徽革命造反派和其他组织代表。周表示支持对李葆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周提出：以告状串连为名，出外闲逛，妨碍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反对经济主义。不赞成组成全国性组织。最近发现“全国工农兵红色夺权总部”、“全国工农红旗军”两个反动组织，原来的“西纠”的一些人组成了“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陕西省又有“红色恐怖队”，必须镇压。（《传信录422》）

下午，在京西宾馆举行军委碰头会，就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在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元老派与文革派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之间发生激烈争论，僵持不下。文革派认为军队应与地方一样，开展“四大”，不能特殊。叶群用准备好的稿子，突然发起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攻击。江、陈声言：已决定于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萧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会后将会议情况向军区单位进行了传达。军区所属的战友文工团与总政歌舞团的造反派立即前往揪萧华，萧华从后门走脱，其家被抄。经叶剑英告毛泽东求免，于是当晚大会改为批斗彭真、罗瑞卿，刘志坚陪斗。周恩来曾命准备直升飞机，必要时营救被斗者。当时北京各大院校造反派分为以北京航空学院为首的天派及以北京地质学院为首的地派。当天的大会为天派所组织，遭到地派的冲击，在混乱中散会。

晚，红卫兵强烈要求揪斗陈毅，包围人大会堂，其代表与周恩来辩论达15小时。周坚持拒绝。

康生、王力、关锋在接见青岛造反派（其中有康生之子张子石）时，康生作了

长篇讲话，谈到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从建国时即已存在。表现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砍合作社，右派进攻直至 62 年《海瑞罢官》的出现等。文化革命就一定意义上讲，又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触及灵魂。他极力鼓励青岛接管，因为它有个好条件，就是有个王效禹。

李富春在团中央革命造反团夺权大会上讲话，肯定团中央夺权是革命行动。
(《传信录 424》)

文化部夺权。

凌晨三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贺龙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妇到北京近郊山区。为了安全，周恩来特意安排中途换车，并不让带工作人员，以便严格保守秘密。

“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派人到广州设立办事处，在中南地区就陶铸问题进行调查和宣传工作。

“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第一次筹备会议召开。共 38 个组织参加(“二兵团”、“红革会”未参加)，由姚文元起草的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了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进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了一步。”“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北京以新北大为首的一些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与中央各部委机关内的造反者勾结，纷纷开进高教部、中宣部、文化部、华北局、团中央等单位，进行夺权。因中央文革进行了批评，始各行撤回。

造反派包围“联动”所在的石油学院附中，公安局逮捕其成员任志明、马晓军等。

1月 20 日

上午，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召开，因萧华被抄家一事，元老派严厉指责文革派，叶剑英拍案大骂。陈、康、江等集体退出会场。此即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委会议的参加者。杨得志等纷纷汇报各地军区受造反派冲击情况。会议结束时，毛心事重重的说：“你们不要汇报了，要说的，我全晓得了。”

陈伯达在下午两次紧急电话指示：《解放军报》只能由本单位革命派自己解决，外单位不能冲击。(《传信录 428》)

王力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接见上海工人时讲话：毛主席把上海工人阶级经验总结、提高，归结到一点就是夺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广大的革命群众，向走资派夺权，向坚持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夺权。(《传信录 425》)

财政部夺权。

北航“红旗”等组织扣押北京副市长吴德，声称夺权。陈伯达、江青电示：考虑组织北京市工农兵革命师生代表会，组织市人民政府。(《传信录 426》)迁因各派矛盾流产。

下午，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组织冲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求改名为红卫兵广播台。中央文革派王力劝阻。（《传信录 427》）

1月 21 日

毛泽东致林彪信：“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又及：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林彪批：“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志速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照办。”

林 彪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按] 此信是批在安徽省军区关于可否派出部队警卫群众组织召开的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的请示报告上的。根据毛的这一指示，发布了军队支左的决定。执行三支(支工、支农、支左)两军(军训、军管)任务。实行军训始自 1966 年 12 月 31 日的通知，军管始于 1 月 11 日关于广播台的通知。各地军区因收存省党委转移的材料及隐藏被追捕的省领导人，屡受造反派的冲击，故毛说军队早已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林彪关于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口头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支持革命左派，在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不能调和折衷，搞折衷实际上是反动路线。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细緻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或者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判定，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按] 根据毛泽东对军委扩大会议的指示，所有全国各级政权，必须全面进行夺权，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革命派？要等到运动后期再定性。根据这一逻辑，下面的群众组织，凡是主张打倒各级领导，进行夺权的，都是革

命左派，否则为保守组织。但是实际的情况却远为复杂难分。通常各级领导中也多分裂为对立的两帮，各受一部分群众组织的支持，都称自己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指责对方是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对这些干部的性质尚不清楚，因而对支持他们的对立两派群众组织究竟谁是革？谁是保？就更是糊涂难辨。譬如，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邱会作，人品极为卑劣，受到群众的反对和斗争。然而，因为他是林彪线上的人物，叶群亲自出马保护。一夜之间，他便成了小节无碍的革命领导干部，而坚持打倒他的群众组织便成了反动帮派。又如湖南的群众组织“湘江风雷”，中央文革原定为反动组织，后来又改封为革命左派。在此纷纭的情况下，毛命令军队介入地方，进行支左。军队从它传统的认识出发，支的恰恰不是文革派的左即造反派，而是保。正如王年一所述除极个别大军区外，多数大军区经过短时间的考察、犹豫，都支持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多的、复员转业军人多的、劳动模范多的、比较遵守纪律的、拥护军队的一派。这一派一般来说是人数多的大派，是造反精神比较不强，甚至保护某些走资派的造反派，正是被与之对立的、造反精神很强的、激进的造反派所称之为保守派。多数大军区支持这样的一派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一派具有遵守军委《八条》，党团员多，拥护军队等等条件。（《大动乱的年代》第200页）军队支左恰恰成了军队支“保”，把已经十分混乱的运动进而推向更大的灾难和破坏。“保”的一派有了枪杆子的撑腰，更加肆无忌惮；而造反派因恃有中央文革的支持，也有恃无恐。于是全国各地两派武斗纷起，并且有军队直接支持，发展为大规模长期的内战。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接见各军兵种机关、院校、科研等三十七个单位的四清工作队员代表时讲话。肯定了四清运动的积极成果，北京的四清虽有彭真的干扰，也不宜完全否定。（《传信录430》）

中央高级党校“红战团”贴出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该团与清华“井冈山”、天津大学“八·一三”、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共同成立了“调查康

生问题联络委员会”，起草公告。

煤炭部发生第二次夺权。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军区造反派揪斗。

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招待所投井自杀，随之其家连续三次被抄。

北京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一〇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人民大学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据点先后被捣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势力也先后被镇压，头目被捕。

1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文章号召，革命造反派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亿万革命群众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为核心，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出现了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但是，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在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队伍里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一直在激烈地继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各种权力，非夺不可！这是广大革命群众，通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掌握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

为什么当革命的左派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瞄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第一炮的时候，就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为什么当“工作组”来了以后，革命左派不仅没有翻身，反而更变本加厉地遭到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

为什么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甚至武斗流血，多少革命的闯将受打击，遭迫害，被开除，被镇压，直到最近，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大反扑，出现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大泛滥？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敢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说得好：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这不是什么“个人野心”，而是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共产主义夺权，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它必然带来阶级矛盾的集中爆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这场大决战的现实，已经为我们展现了极其激动人心的场面。

你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已经冲破重重障碍，紧急行动起来，集合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之下，团结起亿万革命群众，发扬了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敢于斗争，敢于夺权，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

你看！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因为夺权就夺去了他们的命根子，夺去了他们赖以“秋后算账”的最后法宝。他们惊惶失措，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然而，一切反革命的垂死挣扎都无济于事，他们正在迅速被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的洪流所淹没。

这对于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真是从未有过的痛快啊！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为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夺权擂响了战鼓，使旧世界的资产者吓得发抖。四十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吹响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军号。今天，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亿万革命群众正在毛主席的新伟大号召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口号下动员起来，投入战斗。这就预示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是新世界当然的主人！”这就是广大革命群众响亮的声音！

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使社会上的斗争同本单位的斗争结合起来，内外联合，两面夹攻，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起当家作主，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

大联合，要在夺权的斗争中形成。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它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那些折中主义、改良主义的东西，那些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分裂主义的东西，必须统统打倒。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高潮中，极少数资产阶级顽固分子总会乔装打扮一番，削尖了脑袋，力图钻进革命派大联合的队伍中来。他们虚伪地打着“革命造反”旗号，向无产阶级夺权。他们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

阶级的革命司令部。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敌我，辩明大是大非，戳穿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回击！

阶级敌人空前强烈的抵抗是必然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勾结起来，拼凑起反革命的联合，来对抗革命的大联合。但是，无论遇到多少曲折和反复，我们上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我们必将战胜一切困难，把那些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家伙，一个个地揭露出来，把他们打倒。革命的大联合终将战胜反革命的小联合。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的战友们，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动员起来，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陪同阿尔巴尼亚来宾参加外地来京群众大会。周恩来讲话：当前主要战斗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各地走资派大搞经济主义：发钱、发粮票、发车票，鼓动人们来北京，把矛盾上交。周总结了上海夺权经验：(1)必须实现革命派大联合；(2)接管必须以本单位为主体；(3)在革命群众监督下，能够工作的人都应照常工作。他动员大家回去闹革命。对军队不能夺权。对“中国红旗军”、“湖南纠察队”、“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工农兵红色政权保卫军”等反动组织，必须镇压。(《传信录 432》)

周恩来在全国各地来京造反派代表会上指出：有些单位不能采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受造反派毒打，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惨死。遗体上有三十二处伤痕，颈部有多处血洞。

“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公告。陈伯达在本日凌晨两次打电话给蒯大富，命清华“井冈山”退出该组织。并命对校内贴出攻击康的大字报进行反击。(《传信录 433、434》)

“上三司”进占康平路，宣布夺上海市委的权。张春桥指使王洪文率工总司威逼撤去，上海第二次夺权迅速破产。

山东省青岛市在王效禹领导下，进行夺权，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名义发布第一号通令。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宣告成立，夺取了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全部权力。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特作如下通令：

一、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完全归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所有。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予以封闭，停止其一切活动。

二、前青岛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各部委负责人，前青岛市市长、副市长、各局局长、

处长，自本通令公布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其他一般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听从指挥，照常工作。

三、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发出的一切指示、文件(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除外)，自即日起一律作废。

四、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青岛市各级党政机关、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单位和各群众团体的权力，凡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一律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夺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级领导人员和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而尚未改正错误的人，无权夺权。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号召全市革命造反组织和革命群众，积极协助监督执行，对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革命秩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依法予以惩办。

六、号召全市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彻底摧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七、由于山东省、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委员会郑重宣告：对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所发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拒绝执行。并呼吁全省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来！

江苏发生夺权事件。

以中山大学“红旗”为主的“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广东夺权，省委在他们的监督下继续处理日常工作。

“1·22 夺权成为一个秘密夺权。两个学校组织，一个机关组织，一个工人组织，一个珠影，四个外地组织，共九个组织。夺权成了谈判，把赵(紫阳)等叫到中大，要印给印，这是不可仿效的。夺了权，掌不了权，瘫痪了，所以中央决定实行军管。”(周恩来：4·18 在广州的讲话)

1月 22 日、23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与首都院校师生连续两次举行座谈会。江青表示，对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与党校“红战团”调查康生材料感到震惊。我们是共过患难的，现在联合不起来，她要求学生与工农结合。陈伯达指责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你夺权，我也夺，夺来夺去，形成内部斗争。(《传信录 435、436、437》)

1月 23 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开始正式介入地方。

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中发(67)27 号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央发布关于广播电台的补充指示。

关于广播电台的补充指示 中发(67)29号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开展群众性的夺权斗争。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需要做如下的补充规定：

(一)坚决支持各省、市的广播电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成为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

(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尚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护时，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队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三)实行军事管制是暂时的、过渡的措施。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应当结束军事管制。

(四)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地方台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必须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而不得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不得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林彪就夺权问题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对于领导干部，“有的关起来，有的戴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就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就需要。”

康生在人大会堂的座谈会上传达林彪的指示：“最根本的问题是立场问题，是无产阶级立场问题。”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同体育界座谈。康生讲话：我同党校的反毛泽东思想做了十年的斗争。“红战团”造了我许多谣。周恩来也指责体校造反派与“红战团”联合炮打康生是上当了。你们应当去发表声明。（《传信录 438》）

北京军区造反派公开提出打倒司令员杨勇。

七机部夺权。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宣布夺了刘贤权的权，组成联合指挥部，独揽青海党政大权。

《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市农村来信《打退年终分配中的经济主义妖风》。编者按中说：北京市郊区一小撮坏家伙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打着‘关心群众生活’的招牌，蒙蔽一部分群众，分光公共积累，分光储备粮，甚至种籽也分了”。按语提出“希望那些一时受了蒙蔽的人，……不要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忘了集体利益，忘了政治，忘了阶级斗争，忘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哈尔滨荣复军头子以招待看文艺节目为名，将其成员及群众集中到青年宫。节目完后，随即纠集三百余人，手持铁棒、木棍、钢丝鞭、匕首等凶器，袭击了“红色造反团”。荣复军随即遭到哈尔滨驻军镇压。

第五十九卷 1967年1月24日至27日

1月24日

徐向前亲往林彪家，反映军内情况。林彪同意以军委名义发布一个有关部队文化革命的文件。由林彪口述，整理为七条。后经军委与中央文革成员共同研究通过，呈报毛泽东。毛批示以此件向正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征求意见，补充了对高干子弟加强约束一条，共为八条，即所谓《军委八条》，于1月28日正式发布。

周恩来接见工交各部革命造反派代表时讲话：并非青一色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夺权。外交部就夺了权。主席说：发表了夺权的文章，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但也不能说夺权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然就没有一小撮的问题了。夺权首先是夺运动的领导权。各部夺权分两步走：首先是夺运动的权，另一方面培养业务新生力量取而代之。如果造反派业务能力很强，就一气呵成。夺权原则：并非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夺权。否则影响夺权。能夺的就夺。夺权是一次大演习。夺权可能有反复。如果革命派夺了权，但不符合四个原则，其他造反派不满意，可以再夺。但右派再夺，就是反革命。（《传信录442》）

外事口在人大会堂举行了批判陈毅的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参加。陈毅作检查说：造成自己错误的原因是过于自信，凭老经验办事，民主作风不够，工作作风粗线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传信录443》）周恩来发言：陈毅同志的检查是好的。谦虚的。国际上发生的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十七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辉煌的业绩。

下午，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与上海警备区解放军代表讨论夺权问题。商定积极进行准备，在25日行动。“革会”闻讯，抢先在午夜举行夺权，发布号外。

[特大号外]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这次夺印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25日

这次夺权是由“革会”盗用“工总司”的名义组织的，张春桥不予支持，故亦很快流产。“革会”因之转而反对张春桥。

王洪文指挥“工总司”造反队员数千人，去上海柴油机厂，以冲击张春桥家的罪名向在一月风暴中反对他们的“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

部”(简称“上柴联司”或“联司”)进攻，图谋一举砸掉它。因对方早有防备，未能得手，仅抓走“联司”成员二百余人，在公安局关押。“联司”组织群众列队至公安局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并呼吁全市人民支持。两派从此长期对峙，武斗时有发生。上柴在运动中，分裂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加入“工总司”，其反对派“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最初亦系“工总司杨树浦区联络站”成员，因受排斥而转成“工总司”的反对派。

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在外滩、南京路等闹市区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和“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大标语。从一月中开始，复旦大学的“孙悟空战斗队”、“东方红公社”、“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三司”)、“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革会”)等开始酝酿“炮打”张春桥。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受到广大干部严厉批判，他写信哀求叶群：“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

1月 25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 中发(67)30号

各级党委，各级军区党委：

现在，有些农村和企业、事业单位要把“四清”工作队员揪回去斗。中央认为，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条》、《二十三条》，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是必须肯定的。根据《十条》和《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当时派出工作队，是正确的，不能说是错误的。至于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受形“左”实右路线的影响，犯了一些错误，主要应由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负责。因此，中央决定：

(一)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的不要揪回去斗。

(二)对于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有意见，可以用写信、送大字报或者其他方式提出。

(三)必须保卫四清运动成果。不许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这个通知可以在农村、城市和部队各单位内部普遍张贴。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首都科学界在人大会堂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谢富治等出席，周作了长篇讲话：文化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是触及灵魂的阶级斗争；也是十七年来夺权斗争的继续。夺权亦需革命性、科学性与组织纪律性。(《传信录 444》)

周恩来接见回国驻外使馆人员。根据毛的决定，驻外使馆人员三分之二回国参加文化革命。(《传信录 445》)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重申夺权只能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主要是监督权。

谢富治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造反组织 10 位代表时，对他们夺权接管最高法院一切权力表示祝贺。

全国各地驻军纷纷公开集会，举行武装示威游行，表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京造反派三万余人，围搜“联动”的最后据点八一学校，抓走 32 名学生。

《人民日报》刊载“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1月14日发布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以示祝贺。

贵州省夺权。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曾连续向中央发电，反映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王力认为李是部队中不多见的拥护“文革”的积极分子，乃向毛作了推荐。李于1月下旬被召到京，在江青处领受了回去夺权的任务，江对他说：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1月25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夺权成功。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祝贺贵州省的夺权。2月14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

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风暴，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把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大权，统统夺回来！

贵州省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下，十七年来忠实地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祖师爷的旨意，在贵州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这一小撮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一批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变质分子，给他们挂上“马列主义”的招牌，塞进我党政机关各部门。这一伙人串通一气，连成一条线，上瞒中央、下欺群众，把贵州省搞成一个“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的修正主义独立王国。

这一小撮人，十七年来一直骑在人民头上，欺压迫害敢于坚持无产阶级原则的革命干部，欺压迫害敢于同他们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一小撮人是压迫贵州人民的太上皇。

这一小撮人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大搞反革命的反攻倒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大力鼓吹单干风，把贵州省搞得乌烟瘴气。这一小撮人不顾人民的死活，大肆兴建其修正主义的宫殿，腐化堕落，荒淫无耻。这一小撮人是剥削贵州人民的吸血鬼。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贵州人民起来造反了！一张张大字报像一把把匕首插进敌人的心脏，捅了这个马蜂窝。这一小撮混蛋跳起来了，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对革命群众实行疯狂的镇压。他们一手制造“六·八”、“八·三一”、“九·五”事件，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甚至私设监狱，动用专政机器，非法逮捕、刑讯我革命造反派战士，对人民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其时间之久，范围之广，手段之毒辣，在全国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这一小撮混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死心塌地地追随其修正主义头子，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混蛋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口口声声说“认罪、认罪”，但时时刻刻却在密谋策划，至今还在转移黑材料、排列黑名单，准备反攻倒算，对革命造反派下毒手。

他们一手炮制的工人纠察队、工人敢闯团这样的保皇组织，对付革命派，挑起武斗，制造事件，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

当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被革命造反派粉碎以后，又使出更加毒辣的手段——经济主义。这些混蛋粪土国家钱财，挥霍人民血汗，用金钱来腐蚀我革命造反派队伍，收买工贼叛徒，破坏国家财政经济，破坏生产，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这一小撮人已经完全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美帝国主义站在一条线上了。

这批混蛋们最近又在策划新的阴谋，他们退居幕后指挥，使全省的工作瘫痪。保皇军化整为零，把黑手伸向农村，妄想挑动农民与工人的矛盾，破坏农业生产，其用心何其毒也！

贵州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十七年来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是清算这一小撮混蛋罪行的时候了！
是砸烂这个修正主义独立王国的时候了！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为保证贵州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我们向全省人民号召：

一、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每个人必须在当前大风大浪面前经受考验，决定弃取。一切革命者应该毫无保留地支持这次革命行动，拥护和服从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领导。如果谁胆敢破坏我们革命造反派夺权，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二、抓革命，促生产

所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企业工作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守岗位，坚持生产，不得有误！革命造反派不但要成为革命的闯将，还要成为生产的模范。我们号召全省革命群众努力工作，积极生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光！

三、坚决反对经济主义

所有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上海革命造反派以及贵阳地区革命造反派发出的反对经济主义的通令。立即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冻结一切流动资金，取缔投机倒把。如果有意违犯，我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完全有权处置。

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立即逮捕。凡破坏生产、挑动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者，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凡把矛头指向我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器、弹药，盗窃或泄露国家机密者，依法查处。

五、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宣传、执行。如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由革命群众及有关部门协助监督查处夺权斗争的号角吹响了！不管前面有多大的狂风暴雨，我们都要迎上去。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大踏步前进。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一切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浩浩荡荡地冲决一切障碍，奔向胜利的前方。

一切革命的同志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抓革命，促生产！

打倒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

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教工战斗兵团

毛泽东思想贵阳战斗团

贵州省省市毛泽东思想文化科研战斗团	贵阳市毛泽东思想小学教师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贵阳红色保卫战斗团	东方红文工团东方红公社
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贵州省气象系统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冶金工业部贵阳铝镁设计院毛泽东思想“驱虎豹”战斗队
新华社贵州分社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科委系统战斗团
《新贵州报》毛泽东思想并肩战斗联络站	贵阳医学院工农红卫兵
贵州省广播事业管理局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贵阳师范学院“六六”战斗团
中共贵州省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红卫兵
贵州省工交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捍卫毛主席红卫兵总部
贵州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财贸分部	贵州省体校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贵州省宣教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毛泽东思想革命军工农战斗队总部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公安厅 113 革命战斗队	退休工人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贵州省人委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总队	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州野战兵团
贵阳市市级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阳联络总站
毛泽东思想财贸战斗兵团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号兵”战斗队
贵州省誓死保卫毛主席“中南海”兵团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黔联络站
新北大驻贵阳战斗团	首都一司驻西南联络总站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驻黔联络站	中国科技大学南下串连红卫兵
首都三司驻黔联络站	

凌晨，林彪派叶群拿着他和陈伯达的手令，亲自到总后勤部把因作风糜烂、正被揪斗的邱会作接到西山躲藏。

邱会作《日记》：

1967年1月25日零点四十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妻子儿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

我听到“林副主席办公室派人叫我去”，我就知道得救了。抑不住的感动从内心里像炸弹一样爆发出来。当时我心脏阵阵发痛。我服了一片药之后，也就不管他了。我用最大的忍耐忍住了眼泪，因为我发过誓了。

叶群同志对我说，林总命令在六小时以内办妥这件事，否则林总要亲自到你们机关找你去了。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到时我不回去，他真地出来了，可了不起。

为我事，林总亲自挺身而出，并派夫人来接，以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写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动，不能不流下温暖的热泪。

1月26日

毛泽东指示，接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取了的政府，这很容易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当谢富治说：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时，毛说：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谢又说：昨天向主席谈到，“联合行动委员会”有许多高干子弟。毛说这是阶级斗争。

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接见工交系统代表，提出薄一波很狡猾，61、62年他瘋狂得很。余秋里是部长主任级的标兵，与薄的性质不一样。夺权先夺文革领导权，

第二监督业务，如果有能力，可把文革领导权与业务领导权都夺过来。（《传信录446》）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67)国秘字第8号

各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人委，各总部、各大军区、省军区，民航总局，各大区、省(区)管理局：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战略的需要，为了保障国际国内航班的正常与安全，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现决定：

一、对民航总局、各大区管理局、省(区)局、航空站、指挥勤务保障体系、机场和飞行学校，一律由军队接管。接管工作由空军组织实施。

二、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照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军队系统的安排和做法进行。

三、在军队接管后，民航系统各单位的革命组织，对民航系统以外的革命组织，一律不进行串连。

此令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南海造反派斗争刘少奇夫妇。

北京来电(传单)

元月二十六日晚，中南海全体革命群众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大会一开始，听说叫刘少奇背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王光美就抢先对他们说：“他能背下来”。刘少奇就结结巴巴背到“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时候把“核心”两个字丢了，王光美赶快给他提醒，王光美说“还有核心”。在群众斗他们时，王光美处处为刘打掩护。群众责问刘时，刘张口结舌答不上来，王光美就急急忙忙为刘强辩理由。刘的态度极不老实，群众给刘摘下了帽子，王光美忙说：“不要让他感冒了，以后就斗不成了。”当群众责问刘为什么反对毛主席时，刘就狡辩说“没有反”。群众对刘又问为什么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答“那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对王光美一直为刘打掩护很不满意，叫刘回去，留下王光美继续斗，刘怕王光美吃苦头，刘不走，后来群众把刘催走，叫王光美站在桌子上……。

部分外地小学教师和北京小学“红旗造反团”部分成员，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戚本禹到会，宣读了陈伯达、江青的亲笔信，表示支持。戚本禹讲了话。（《传信录448》）

江苏、安徽省委被夺权。围绕1·26夺权。安徽、江苏群众分裂为两大派。

上海市“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串连各红卫兵组织，联合行动“炮打张春桥”。因徐景贤是张的亲信，乃决定由复旦大学“红革会”先轰徐景贤，以进行“火力侦察”。

福建造反派冲击福州军区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军区与保守组织“8·29派”联合反击，指责这是反革命行为。

新疆石河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因汽车二团夺权，两派发生武装冲突，死24人，伤74人。

1月25日69名中国留法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在莫斯科瞻仰列宁墓时与苏方发生冲突。26日首都“三司”在苏联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游行。

据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十三、十四期合刊《简讯》记载，造反派在苏联大使馆外示威游行，向苏联政府提抗议。周恩来、陈毅代表毛泽东、林彪慰问留学生。在苏修王八蛋、混蛋的乌龟壳外贴着中俄【文】大幅标语：绞死勃列日涅夫！、油炸柯西金！、砸烂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的狗头！、打倒混蛋苏修！、苏修大使从大使馆滚出来低头认罪！、苏修必败！，苏修乌龟壳的铁栏杆上挂了二顶高帽，一顶给勃列日涅夫，一顶给柯西金。苏修狗东西吓得屁滚尿流。我们严正警告苏修们，中国的红卫兵不是好惹的。

1月27日

叶剑英传达毛泽东对解放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 一、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
- 二、地方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错开。
- 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部队要有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凌晨二时，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公社”、北航“红旗”、炮兵学校联合行动，查抄了潜藏在育英中学的“联动”成员，逮捕20名，抄出了五辆摩托及自行车、匕首、铁棒等物件。“联动”分子数百人流窜广州，与广州的“工人赤卫队”和八一中学的“主义兵”勾结活动。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工交系统接管单位代表，说：夺权是本单位的造反派和本单位外的造反派大联合。（《传信录449》）

周恩来接见新疆12·9绝食斗争造反派代表，表示对石河子事件一定要调查清楚。（《传信录450》）

中央党校出现以“全无敌”署名的小字报，勒令“野心家、阴谋家、刽子手、酷吏康生”交待罪行。党校“红战团”因此被打成反革命组织。

由北大、清华、北师大、地院及工矿企业二百多个单位发起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发出紧急倡议：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以便夺北京市的权。

深夜，上海“红革会”40多人劫持徐景贤，要徐交待写作班子与张春桥之间的问题。张春桥亲自向上海警备区调动部队，由师政委何海涛率全付武装的四个摩托排和一个步兵连包围了复旦大学和原市委党校，图谋迫使“红革会”交出徐景贤。然被拒绝，于是发生冲突，何海涛旋率众撤回。

连日来，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抗议苏联“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的法西斯暴行”。北京各界群众聚集在苏驻华使馆前，焚烧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的模拟像。使馆的中国工作人员举行罢工。

第六十卷 1967年1月28日

(炮打张春桥)

1月28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拟定八条命令，经毛泽东审改，批示照发。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和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按] 军委八条是在各军区皆受冲击，怨声四起中，由林彪与徐向前、聂荣臻、杨成武制成，原为九条，目标是稳定军队，中央文革讨论时，去掉两条，最后一条是毛亲自加的。

徐向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八条命令》作武器，各大单位领导同志的腰杆硬了许多。有些军区，让省委负责同志住进军区大院，保护起来。对于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抓了一批。三支两军的同志，在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和稳定地方局势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时，唯恐天下不乱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气急败坏，诬蔑军队‘镇压群众’，‘支持保皇派’是‘带枪的刘邓陶路线’，要‘揪出军内一小撮’，妄图煽动群众，与军队对立，搞垮全军文革，搞掉八条，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

中央军委发布《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

中央军委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军区的文化大革命，遵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应分期分批进行。

二、目前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积极支援革命左派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三、帝、修、反正在加强反华，蠢蠢欲动，蒋匪也想乘机袭扰。因此处在反帝、反修第一线的军区(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新疆)和有随时策应各军区任务的武汉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应照前次指示暂缓进行，把自己稳定起来，以便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何时开始，听候军委命令。

北京市发生夺权事件。

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造反派时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当权派要分清性质，区别对待，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资产阶级当权派。”

晚，周恩来接见浙江省造反派，要求冲入省军区的群众立即撤回，并对夺权提出五点建议。

晚，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工业展览馆咖啡厅会见“红革会”各高校负责人。红卫兵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军队镇压红卫兵？30年代做了些什么？高呼“张春桥是两面派！”“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等口号。被红卫兵批斗达6个小时。从28日至30日三天内，全市炮打张春桥的运动高涨。

《“一·二八”绑架事件真相》

现将一月二十七日深夜至二十八日凌晨，复旦大学“红革会”、红卫兵复旦大队造反派等组织绑架我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及解放军赶来保护一事经过公布如下：

绑架的背景是什么？

从一月二十四日开始，上海公开出现了一股反对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的逆流。复旦大学“孙悟空”在全市张贴了指名攻击张春桥同志的大字标语。复旦大学“红革会”和“红三司”的负责人先是保持沉默，然后争相登台表演。一月二十六日，复旦“红革会”贴出了一张《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大字报，提出十个问题，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八时许，复旦“红革会”勤务组召开了各系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问题，同时提出现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作的徐景贤、郭仁杰等人，和张春桥同志等有联系，只要把他们搞到手，就能迫使张春桥、姚文元出来说话。还提出“红革会”如果不搞，“红三司”和“孙悟空”等可能要搞。因此，就在这个黑会上，中文系的代表提出已经准备好了五十个人，决定马上采取行动。复旦“红革会”的头头，至今不敢把这次会议的真相告诉“红革会”的战士。他们搞徐景贤、郭仁杰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他们的大方向是完全错误的。在这次会议上，根本没有谈论市委写作班有些什么严重问题，但是事后复旦“红革会”负责人却倒做文章，大肆宣传市

委写作班的所谓“罪状”，力图证明自己采取的是什么“革命行动”，挑起群众对军队的不满，这是对群众的进一步的欺骗。

绑架的经过

二十七日晚十二时许，复旦学生四十余人，前来我站找负责人徐景贤，声称反映有关反张春桥情况，一再拒绝他人接待，并挨屋搜寻。我站同志在十分混乱的情况下，主动多方设法将正在处理另一要事的徐景贤找到，进行接待。开始屋内只有七人，刚谈几句，忽然自外涌进三四十人，将徐景贤和我站另一负责人郭仁杰团团围住，宣布要请徐、郭两人立刻到复旦解答问题，否则马上采取革命行动。他们不睬徐景贤及我站另一同志请其说明理由的要求，强行将徐、郭拖到门口。我站部分工作人员及正在我站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兵团一负责人闻声赶来，拦住询问为何抓人。复旦有人回答说：“第一，市委写作班是陈、曹手下的黑写作班，徐景贤是这个黑写作班的头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郭仁杰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站同志要求摆事实，他们便大骂我们是“保皇派”、“假造反”，并说徐景贤是“当权派”，“完全有权对你采取革命行动”。有人还骂我站是“地下黑市委”。接着，二十余人便把徐硬拖下楼，拥上汽车带走，同时带走坚决拦阻的我站一工作人员。由于郭仁杰已被“工司”同志拦下，他们大部分留下继续到处搜查。这时，我站及“工司”同志同他们展开了激烈辩论，指出他们无理绑架一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的行动完全错误。但他们不仅不讲道理，反而蛮横地声称要将我站另一负责人王承龙同志抓走(我站共三名负责人)。王承龙同志同他们辩论，又遭到围攻，被摔到水泥地上昏迷过去。

正在这时，解放军驻沪部队同志赶到现场。这是我站请来的。他们到后除封锁现场外，没有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便立即召集各方代表进行调查。参加调查会的有警备区、市“文保会”、市“红革会”总部、“工司”二兵团、复旦及我站代表。会上，复旦代表除重申上述两点“抓”徐、郭的“理由”外，又增加一条即写作班和徐、郭是“两面派”，制造各造反派组织分裂，例如郭仁杰“挑动”复旦“红革会”和“红三司”联合起来“干”首先在上海刮起反张春桥风的复旦“孙悟空”小组。我们要他们摆出事实，他们又诡称“暂时没有必要抛”。我站代表除介绍事实真相外，当即驳斥了他们的几条“理由”，指出这种无理绑架行动的大方向完全错误，这里面一定有人暗中搞鬼，目的在搞垮我站，制造革命造反派组织之间分裂，矛头直指张春桥同志。市“红革会”代表一方面表示复旦“红革会”这一行动“不适宜”，马上把人放回；另方面，又责问我站“派出”部队，为何事先不同他们联系，以致事态扩大，“背后有人在挑拨”。这时，“工司”等代表都发言指出他们的行动完全错误，解放军来得就是对。有的未参与这事件的“红革会”同志也发言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这种做法。最后，警备区代表发言，认为部队来完全正确，军队执行毛主席指示，有责任保护革命造反组织，如“红革会”认为徐、郭有问题，应充分相信群众，进行揭发，不应随便把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抓走，“红革会”应马上把徐景贤放回来。在大家严厉批评下，市“红革会”及复旦代表理屈词穷，被迫答应立即放人。警备区同志也表示部队马上撤，双方之间的问题，以后大家运用“四大”武器解决。至此，问题本已初步解决，不料刚赶到没几分钟的市“红革会”另一负责人，却突然气势汹汹地责问调动军队镇压“红革会”战士，提出要警备区首先完全彻底承认错误。于是又引起激烈争论。当部队主动撤离时，复旦同学又挡住去路，逼问究竟谁调动的。相持半个小时多，才让他们离开。但又强行把带队的师政委和参谋留下，围攻追逼近一天。到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半，数十名复旦同学又将他们拥到警备区大吵大闹，到二十九日上午才离开。

以上是在我站发生的绑架事件我们所目睹的情况。“红革会”将徐景贤同志抓走后，我们要求部队到复旦追查徐景贤的下落，但复旦“红革会”开始坚决否认组织过这一行动。他们同时偷偷地将徐景贤转移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复旦一千一百号文科阅览室，不准徐景贤向外打电话。部队的同志找了好久才找到徐景贤，听取取了有关人员的申述，随即主动撤离。

了。而徐景贤同志和派去协商释放徐的郭仁杰同志以及我站驻“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代表朱永嘉同志三人均被拘押在复旦。而且朱是在吐血卧床情况下被他们从床上拖走的，当时仍吐血不止。同时，他们还公然继续追捕我站有关工作人员。

掀起疯狂反对张春桥、姚文元的逆流

不仅如此，从二十八日起，他们又运用各种方式歪曲事实真相，一面宣传“同时抓到”徐景贤等三人是一大“胜利”，一面召开大会，煽动群众起来“控诉”所谓“调动军队镇压革命学生”，大搞反张春桥同志、反姚文元同志的活动，甚至当《解放军报》记者前往了解情况时竟也遭到无理围攻。同时他们又在全校全市张贴巨幅标语，如“谁派军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揪出调动军队镇压复旦‘红革会’的后台老板”，等等，甚至出现了“打倒罪魁祸首张春桥”的反动标语。市“红革会”负责人并扬言要把“这一全国性大事件上告到中央军委”。当晚他们又围攻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达六小时之久。二十九日晚，“红革会”、“红三司”、“孙悟空”等在复旦大礼堂联合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有些人的发言对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横加污蔑，乱造谣言，最后决定三十日在全市举行大会炮打张春桥，游行示威，大造声势，这些组织的负责人简直疯狂到了极点。

对上述事件，我们认为：

一、复旦“红革会”突然在深夜绑架我站负责人的行动，完全错误。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公开赔礼道歉。

二、“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利用这一事件歪曲事实真相，煽动群众，反张春桥同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大方向更是完全错误。必须将其中为首分子揪出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三、人民解放军派部队保护我站，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做得完全正确。市“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在一月二十六日晚上就要求军队派兵保护过自己，为什么当“红革会”抓了别的革命组织的人，就不准人家要求军队保护，这是什么逻辑！他们竟然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并无理扣押围攻警备区同志一天多，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把这一事件的幕前幕后指使人统统揪出来依法惩办。

四、徐景贤同志在以前尽管有种种错误缺点，但他起来造反，在去年“一二·一八”大会上发言对促使全市广大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有相当影响。郭仁杰等同志在造反后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现在如有错误缺点，应该通过批评解决，非法绑架是极端错误的。

五、市“红革会”在某些负责人的控制下，最近一时期来，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等恶劣倾向发展得愈来愈严重，现在竟发展到炮打中央文革、围攻执行任务的解放军、非法绑架扣押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等，正在走向它的反面。这种组织能让它按照这种状态存在下去吗？不能，决不能！“红革会”领导必须彻底改组！“红革会”的革命派战士们，快起来造你们领导的反吧！

谁炮打中央文革，就砸烂他的狗头！

谁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就砸烂他的狗头！

谁反对毛主席就把他砸个稀巴烂！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对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六小时围攻——请看红革会头头堕落到何等地步！

最近，上海市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极端猖狂地攻击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真是狗胆包天！

要知红革会头头堕落到何等程度，请看一月二十八日晚上他们围攻张春桥、姚文元同

志的一次集会。

一月二十七日深夜至二十八日凌晨，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经过事先策划，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徐景贤同志，为此，他们叫嚷这是“一大胜利”！二十八日那一天，他们集中在前中苏友好大厦红革会的一个办公地点，商量进一步的行动计划。这时，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来到了他们的会场。

小丑跳梁

会议一开始，他们就对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进行了一场大围攻，完全用斗争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办法来对待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斗争持续达六小时之久。这些跳梁小丑，有的跳到凳上，有的挥舞拳头，不断高叫“张春桥是口头革命派，我们不相信你！”“张春桥是两面派！”“张春桥算老几！”“你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等等恶毒的口号，甚至还有人提出：“北京在揪康生，上海就要揪张春桥！”等反革命叫嚣。他们还用了两架录音机进行现场录音，拍了不少照片(应当勒令他们把录音和照片全部交出来，听候革命群众审查)。总之，除了没有给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挂牌子游街以外，斗争敌人的一套办法全都用上了。

在会上，张春桥同志说明了事实的经过，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批评了红革会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的做法是不对的。他的话说完以后，有些人就跳起来，蛮横地要求替红革会“平反”，胡说出动军队是早有计划的镇压学生运动，还蛮不讲理地说深更半夜绑架徐景贤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一定逼着张春桥同志承认这是“革命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恶毒地攻击徐景贤同志是“假造反”，是“牛鬼蛇神”，高喊：“砸烂写作班！”“打倒徐景贤！”还说张春桥同志是写作班的后台，嚣张地谩骂张春桥同志“昨天是革命派，今天就不是革命派了”。红革会的一个头头当场狂妄地宣读了十问张春桥的传单，高叫要“揪出地下黑市委！”红革会的某些头头还说什么：“‘深更半夜’这句话我们早已听到过了，去年‘八·二六’事件曹荻秋就这样讲过，你说的和曹荻秋一模一样。”他们用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根本界线的恶毒手法，攻击坚定的革命左派张春桥同志，这只能说明红革会的一小撮头头已堕落到毫无政治原则的地步！

疯狂的反动叫嚣

这一小撮头头，还发出了一连串极端反动的言论：

“你们都是当权派，当权派都可以揪”。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不去区分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而是提出“当权派都可以揪”，这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

“你们在北京只会发号施令，现在到上海尝尝我们的味道。”这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们要责问你们这一小撮家伙，北京谁在发号施令，就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发号施令，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着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和指挥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领导和指挥着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迈进；领导和指挥着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大搏斗，大夺权。你们这样猖狂地反对发号施令，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其用心何其毒也！

“你(指姚文元同志)不要奴隶主义”。大家都知道，姚文元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听毛主席的话，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的。可是，红革会的一小撮头头竟责令姚文元同志“不要奴隶主义”，他们的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们就是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听毛主席的话，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他们就认为是“奴隶主义”。老实告诉你们这一小撮，我们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是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谁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砸烂他的狗头！

原形毕露

红革会的这些头头还无理纠缠，硬要张春桥同志帮助接通给中央的电话，并且指名要周总理、陈伯达、江青三位同志中的一位听电话，其他同志听电话一概不要。张春桥同志再三向他们说明情况，要给中央打电话是可以的，但指名要谁听电话是有困难的，是否打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王力同志，由王力同志转告。话还没有讲完，一小撮头头竟然追问：“你同王力是什么关系！”还破口大骂：“你比曹荻秋还坏，以前也就在这里，曹荻秋还给我们方便！”一句话漏了底，说明了他们和曹荻秋之流过去关系十分密切。至此，这一小撮红革会头头的反动嘴脸暴露无遗。

在这次会上，他们不仅猖狂地围攻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而且对秘书、警卫人员和驾驶员也进行盯梢，限制人身自由。他们为了打电话给中央，把秘书强行留了几个钟头，经姚文元同志提出抗议才放走。有一个警卫人员上厕所，就有几外人跟在后面。深夜十一时左右，驾驶员要出去看看汽车，就有两个人拦住他说：“要委屈你一下，跟我们去，我们吃过亏了。”他们实行的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

这次集会，是一场丑剧大表演。红革会的一小撮头头，不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而且直接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我们要严正警告你们：只有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向全体红革会的战士坦白交代你们的罪行，才是唯一出路，如果还要顽抗下去，决没有好下场！

真正愿意革命造反的红革会战士们，看了上述材料，你们对红革会某些负责人的所作所为一定也会义愤填膺！我们要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向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清算他们的罪行。我们要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战士团结在一起，高举夺权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旗帜，高举彻底打垮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黑市委的旗帜，彻底击退资产阶级的新反扑！（本刊记者）

反革命合唱中的一出丑剧——访被红革会一小撮人无理绑架的徐景贤同志

伟大的“一月革命”——在上海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这个革命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坚决支持。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正在乘胜前进。

然而，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革命群众的强大攻势面前，犹作困兽之斗，伺机反扑。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暂时被煞住之后，他们又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利用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代理人和一些机会主义分子，故布疑阵，造谣中伤，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针对毛主席派到上海来的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以便进行反夺权。其用心何其毒也！

就在这一股反革命逆流中，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无理绑架、强行扣留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徐景贤等革命同志，一手制造了难以容忍的“一·二八”事件。

红革会一小撮人，非法绑架徐景贤等同志，决不是孤立的、偶然发生的事件。

一月二十四日凌晨，复旦大学的“孙悟空”四人，跑来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要求张春桥同志接见，说是要“请示”问题。其实，就在几分钟前，他们在外滩、南京路等主要马路刷满了“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等巨幅标语，第一次公开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派来上海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由此，上海的一股反对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的反动逆流表面化了。当时，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和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一起，戳穿了他们的两面派手法，他们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逃之夭夭。

当天，在辩论会上，红革会的负责人始终没有明确表态。红三司的负责人之一安某某则假意说：“张春桥可以怀疑，但不同意‘孙悟空’的口号，要与他们辩论。”

接着，复旦大学校园内便掀起了反对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浪潮，相继贴出了矛头直接指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大字报，如《向革命造反派提几个为什么》、《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二十问张春桥》等，捏造污蔑，无所不用其极。其中的一些大字报就是红革会的所属组织贴出来的。

反对张春桥、姚文元的逆流猖獗一时。红革会的一些头头，便在二十七日晚上密谋策划，决定做一次政治赌博，在“打张”的“革命行动”中抢占第一功。他们认为，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徐景贤等跟张春桥接触较多，抓住徐景贤，就不怕张春桥、姚文元不出来。于是立即行动，派出一支小分队，深夜十二点闯进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声言要跟徐景贤谈谈当前形势，相见之后，便强行绑架，塞进小吉普，一溜烟飞往复旦去了。

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在此紧急情况下，请求人民解放军保护。部队的同志去复旦寻找徐景贤，红革会的一些人还当面撒谎。解放军同志直找到早晨六点多，才算找到了徐景贤的下落。

二十八日晨，红革会的一些头头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假惺惺地表示，愿意立即把徐景贤同志送回。于是，联络站的郭仁杰等同志陪同解放军去复旦要人，谁知出尔反尔，他们不仅不释放徐景贤，而且把郭仁杰也扣了下来。更其恶劣的是，把正在吐血的联络站工作人员朱永嘉同志硬拖到复旦，关进了保健室。

对徐景贤、郭仁杰等同志，他们是软硬兼施，双管齐下。表面是要他们谈形势，实际上是要摸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材料。这些头头后来自己在大会上狂叫：“徐景贤是张春桥的材料袋，现在这个材料袋已经到我们手里了！”他们的这种卑劣做法遭到了徐景贤等同志的严词拒绝。接着，他们又利用部队来到复旦这一点挑动群众，尽量把原市委写作班和徐、郭等人搞臭，企图把罪责嫁到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身上。他们谩骂徐等“黑支部书记”、“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谩骂原市委写作班是“黑市委的打手”、“一窝黑秀才”、“就是要把老虎屁股摸到底”。一句话，他们掉过头来打写作班，就是为了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结果，他们捞不到半根稻草，便对徐景贤、郭仁杰同志实行严密监视，连打个电话回家也马上有人向头头汇报。本来把他们两人扣在一起，派人偷听他们的谈话，后来又把他们隔离开来，分别送到哲学系的学生宿舍里，勒令他们“交代问题”。然而，尽管这一小撮人煞费苦心，红革会的一些战士是不同意某些头头的做法的，通过他们的帮助，徐、郭还是见了面，后来还共同写了《七问》的大字报，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并由红革会战士抄出张贴。

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欺骗广大战士，歪曲绑架的真相，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却在“派”出军队上大做文章，大字标语刷满复旦校园，广播喇叭叫了一遍又一遍，把矛头直接指向人民解放军和张春桥同志。看来，他们是准备大打出手了。

二十八日晚上，红革会开了大会“控诉”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孙悟空”等大放厥词。二十九日晚上，红革会又出面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复旦红革会勤务组带头发言，“孙悟空”的胡某某、“红三司”的安某某，都成了登台表演的丑角。这是红革会某些头头的机会主义的大暴露。

会议为了制造气氛，除了礼堂搞得情绪疯狂之外，还向全校广播，煽动复旦师生的情绪。他们专靠造谣吃饭，只消举一个例子，他们在大会上公开叫嚣：“《解放日报》一月二十六日的社论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篇社论从一稿到三稿都是张春桥看的！”其实，张春桥同志没有看过一个字。你看，这些炮打中央文革的能手的手段多么卑劣！他们自称过去是做“两面派”，现在要作“一面派”了！说得对，你们终于暴露出了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你们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面派”！他们又狂叫各派要在这个基础上

“联合起来”，这种反革命的逆流的“联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迟早总会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的凌厉攻势砸得稀巴烂！

在红革会等某些头头的操纵下，在场内居然喊出了“打倒张春桥”的口号。他们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便做了两条决议：一是三十日上午举行“炮打张春桥”游行示威，准备把徐景贤、郭仁杰等同志拉出去游街；一是三十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开“誓师大会”，“控诉”人民解放军“镇压学生运动”，“炮打张春桥”，他们的负责人并且打听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住址，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请看红革会的这一小撮人猖狂到了何等地步！

正当此时，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下达了，各革命造反派识破了他们的真面目，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他们头头的反了，他们的美梦破灭了！

可是，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执行中央文革的五点指示，在背后却继续大搞舆论，大印传单，煽动红革会战士的情绪，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甚至还伪造所谓周总理的四点指示，攻击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我们警告这一小撮人：如果你们坚持错误，继续沿着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邪道滑下去，你们必将自食恶果。

斗争还没有结束。徐景贤同志和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表示：我们完全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和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联合起来，和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代表者斗争到底！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旗帜，高举彻底打倒以陈丕显为首的黑市委的旗帜，高举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的旗帜，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本刊记者）

[附]安文江：《我不忏悔》（摘录）

1967年1月28日，复旦大学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我作为组织领导者之一，不久被押上批斗台，我的生活与思想也发生了急转弯。命运替我划了条黑色的弧线。

1979年，有人称这一事件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先声”。我觉得，不承认这一事件对“四人帮”的冲击，以及客观上有助于群众对“四人帮”的认识固然有失公允，但是过高的溢美之辞也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从没想过要去充当反“四人帮”的英雄，就象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红卫兵暴徒一样。

“四人帮”垮台后，有人攻击我们打张是“争权夺利”，这是无聊！而参加过炮打的一些人又挂出先知先觉的面孔，这同样是无聊！起码，我自以为既非跳蚤亦非龙种。对前者我冷冷一笑，对后者我淡淡一笑。反正我就是我，不是英雄也不是臭虫！

1月中旬，我们复旦率先贴出了一批言词含混但所指明确的大字报、大标语：《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警惕反革命两面派》。接着又贴出针对徐景贤等机关联络站的大字报，企图从这里撕开口子再攻背后的张春桥。复旦伤风，上海感冒，来看大字报的人比南京路上的还多。从全市涌来看大字报的人把大字报区填得水泄不通。三路有轨电车出现通车史上第一个高峰。下午，张春桥应约到友谊电影院会见六百多“红革会”战士，遭到长达六小时的围攻、训斥。同日，复旦“红革会”派兵奇袭丁香花园，绑架了徐景贤、郭仁杰，并关押在复旦外文楼。28日夜，张春桥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命令解放军某师郭政委，动用全副武装的吉普车两辆，三人摩托十八辆冲进复旦园，要用武力解救徐、郭二人。并对骚动的复旦红卫兵实施武力警告。这显然是火上加油的败着。内战未息的三派在高压下迅即结成了“反张神圣同盟”。原本在观望犹疑的学生也在枪口下呼出了“保卫复旦园”的口号。深夜召开的全校大会群情激昂，吼声震天。那一天阴雨霏霏，可我浑身燥热。“妈的！把枪对准我们红卫兵等于对准伟大统帅毛主席！”我的几个朋友劝我不要急于表态，再看看发展动态。我说：“不行！张春桥动枪，我们起码得动口、动笔！”我急匆匆赶到了大礼堂，和两天前还在打内战的“红革会”头头紧紧握手。在会上作了《再问张春桥八个为什么》的鼓动性发言。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调门越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大

会一致决定：1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性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反张示威游行。口号是：“万炮齐轰张春桥！”

当时我很乐观，得意地认为，就凭我们的大示威就足以使张春桥下台。但是，我完全估计错了。29日凌晨，“工总司”、同济“东方红公社”等宣传车开进复旦，大量散发油印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电文措词十分严厉，其中第五条云：“希望复旦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这是整个“文革”过程中，中央文革发给红卫兵的唯一的特急电报。当天，徐景贤、郭仁杰坐车驶出复旦，上海其他保张组织变相占领复旦园。

我们对特急电报的真实性心存疑问，总觉得中央文革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这种语气对待革命小将。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红卫兵已是过山后的拐杖。已经失宠了，我们纯粹是自作多情。30日，我们赴京核实电报真伪并伺机告状。先到北大找聂元梓，聂借口离不开会场拒绝见面。再到清华找蒯大富，蒯司令说电报是经江青、康生批阅后拍发的。他说了句聪明话：“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上海能乱吗？张春桥能倒吗？”我茅塞顿开！上海已成夺权样板，张春桥是“一月风暴”大功臣。现实需要他，他就倒不了！这就叫“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我够蠢够愚够天真的了！

其实，反思我所见过的政治斗争，从反右到“四清”直至“文革”，有多少实事求是？有哪一次没有舆论一律、味道浓烈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时，我没有这份认识，但是，心冷了。心一冷，脑壳也降温，这是“自我回归”的开始。

然而，“文革”不需要自我。八亿人一颗脑袋就够了。谁要自己的脑袋就得准备受批判！

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创办《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于本日出版，全文刊载遇罗克的《出身论》。此报一共出了四至五期，先后登载了遇罗克写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文章。

来自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近二百名外国人，在北京游行。他们中不少人戴着“白求恩——延安造反队”的袖章。他们手举毛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思想造反团：白求恩——延安”给毛泽东同志的致敬信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高兴地听到您温暖和精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指示，这个指示支持在中国的外国革命工作人员期望和中国同志一样生活、工作和斗争的要求，这是我们政治上的解放。

在对待外国人员的资产阶级反动经济主义下面，给予我们的每一个照顾都是物质福利，却没有一项是我们政治上所需要的。甚至不允许我们同中国同志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更不要说和他们一起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运用毛泽东思想了。这样，不仅使我们处在对于政治衰退的条件中，而且我们的孩子也不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前一时期还不要我们知道有毛主席语录本，并提醒少数得到语录本的人不要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使毛泽东思想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呢？

您把马克思、列宁的旗帜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您的英明的革命领导，使人民欢欣鼓舞，使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胆颤心惊。您的群众路线观点发挥了空前的无穷威力。您总是听取群众意见的，因此，听到了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员的声音。我们一定真正地为中国和我们本国的革命人民服务，以尽我们一切力量来报答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我们一定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以便在斗争中使我们的

思想革命化，并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我们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伟大的号召。您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解放。您的决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您亲自点燃的。让无产阶级的烈火从世界革命的延安——中国烧遍全球。

我们的造反团是在您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它包括世界各大洲的人民。我们一定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而战斗，我们决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在中国工作，才能为世界革命做出较大的贡献。

沿着白求恩精神和延安精神前进！

在中国的外籍工作人员和中国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胜利！并把它的影响传遍到全世界！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万岁！

毛泽东思想造反团

白求恩——延安

1967年1月28日

第六十一卷 1967年1月29日至31日

1月29日—30日

晚，上海“红革会”联合八个组织在复旦大学大礼堂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徐景贤获此消息，立即电话报告张春桥。张春桥向中央文革汇报，要求采取紧急措施，阻止大会召开。王力接到电话，提议采由“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向中央文革写报告的形式，反映事态，然后由中央文革表态制止。“机联站”的报告拟成后，市委办公厅有关人员指责其中歪曲事实，拒绝拍发。张春桥于是在30日亲自起草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特急电报》，倒签发报日期为一月二十九日。

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人负责。
-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电报”印成二十万份，广泛发至全市。这份由张春桥矫造的电报，据张自己说，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红革会”所策划的“炮打张春桥”全市性大会遂致流产。

[按] 此为上海反对张春桥的第一次浪潮。从此，“红革会”已濒于溃散。二月中，在张、姚策划下，把这一事件定性为“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在全市开展反逆流活动，“红革会”覆灭。嗣后，张春桥、王洪文等又借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打三反”等名义，连续多年对参加“炮打”的人进行残酷迫害。据《历史的审判》所载：上海市文化大革命中以炮打中央文革而制造的冤假错案达249000余起，受株连者百万人以上。

1月 29 日

周恩来接见“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说：王任重又吹又写报告，说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健康，吹抓了四五百人。武汉的运动十月份才起来，张体学是被王任重拉坏的。王是十二月回武汉的。现在是夺权，资产阶级路线代表人物不甘心死亡，以各种形式搞经济主义、矛盾上交、分散主义。（《传信录 453》）康生在讲话中指邓小平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青海省“8·18 红卫兵总部”、“8·18 红卫战斗队联络站”等 41 个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发表了《告全省人民书》，部分造反派冲击军区。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请示中央军委。叶剑英指示：对围攻群众尽量作说服工作，防止事态扩大。但对那些开枪杀人的歹徒，可予严厉惩处。

1月 30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就浙江问题发表决定。

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月二十三日的决定，遵照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最近关于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要求当局将违法乱纪的某些高干子女交出归案法办等等，所进行的群众斗争是革命行动，中央予以支持。

三、由于上述斗争不仅为浙江党政军当局所压制，而且引起多次群众斗群众的恶例，特别是一月二十六日事件又在中央、军委上述的决定发表之后，更加不能容许。这样，就激动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连续进住军区大院、礼堂，其责任应完全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个别领导人来负。中央对此，表示极大注意。

四、中央对在上述斗争中一切负伤和受辱的同志，不论事出何处，一律表示同情和慰问，伤的应予治疗，受损失的应予赔偿。如果查出幕后有策动群众斗群众的主使人，应予严办。

五、为迅速平复这一事态，以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中央特派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偕同浙江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同志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丁钧同志前往杭州，会同浙江省委和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负责查办此事及其有关问题，并将结果报告中央批准。

六、凡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材料，包括在这次斗争中的材料，统应由杜平同志、丁钧同志会同省委、军区、造反总部派人负责清查集中，然后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补充规定办理，不许有任何隐瞒。

七、犯法同学应责成其家属劝他们迅速归案。此案由中央公安部会同杭州市公安局按中央规定原则办理。

八、省委和军区有关同志应对此事向群众作深刻检讨。

九、中央希望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所属群众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主动离开军区大院、礼堂。在未离开前，双方不许再有任何挑动对方的言论和广播、传单宣传。

十、中央号召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所属群众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夺权的斗争，粉碎反动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为代表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央号召浙江军区和全体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以利浙江阶级斗争的深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

王力向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广播学院部分造反派传达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指示：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有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王力在人民日报社谈话中谈到《红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第四个问题时说：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三方面协商成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新的巴黎公社，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用人民公社，毛主席在 58 年就想的城市人民公社。（《传信录 454》）

上海王洪文所掌握的“工总司”与耿金章操纵的“二兵团”在斜桥发生火拼。耿指责王扣押了二兵团常委范建华，故大兴问罪之师，并企图派人砸张春桥家，包围在斜桥的“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工总司”复实行反包围。张春桥严令耿撤走部众。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宣布解散冲击军区的造反派组织。济南逮捕七大造反派领袖。西宁省军区通令取缔“红囚兵”。“红囚兵”冲击军区，赵永夫下令开枪镇压。

建委主任谷牧得造反派“最后通牒”，由西南三线乘机返京，被绑架斗争，旋由周恩来安排避居中南海。

1月 3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对石河子流血事件的指示。

对新疆石河子流血事件的三项指示

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党委，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

(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要向天开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值勤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释放。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接见“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时说：夺华北局机关的权可

以，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的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了中央的权。（《传信录 456》）

周恩来、江青、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萧华等接见外地来京部队同志。周恩来讲话说：因为随意逮捕，随意抓人，不仅把部长捉了，副部长统统捉了，司局长也给捉了，常常几天找不到。“同志们给我想想，这个对于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吗？”（《传信录 457》）

叶剑英接见济南军区机关革命组织联合造反团，答复他们济南军区推迟文化革命是毛的决定。“要拿主席亲笔的没有，亲口是有的。命令上也写上了。”（《传信录 458》）

周恩来报经毛泽东同意，在城西什坊院建立临时特监，以关押被揪斗打倒的高级干部，包括陆定一、黄克诚、彭德怀、彭真、班禅额尔德尼、贺龙、罗瑞卿等，计二十四监。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召开，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表《第一号通告》，范正美(哈师院造反派头目)任革委会“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顾问。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权政权，巩固政权”。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展，进入了以夺权斗争为中心的新阶段。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卷入了大联合、大夺权的红色风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我省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支援红色造反者的夺权斗争，为社会主义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形势好得很，而且越来越好。

原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年来称王称霸，大搞独立王国，大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黑龙江省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黑根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到来，于是便利用他们控制的权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疯狂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方百计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派出工作组，大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大批的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反革命流血事件。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胜利的形势下，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便垂死挣扎，变换花招，大搞经济主义，挑动一部分工人罢工，停产停车，外出“串连”，真是坏事干绝。他们对毛主席，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为了让毛泽东思想占领黑龙江省的一切阵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把黑龙江省的党、政、财、文等大权，统统地夺过来。为了实现这一夺权的战略任务，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全省红色造反者召开声势浩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由红色造反团各联合总部负责人，省军区负责人，省委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负责人，酝酿协商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我们郑重宣告：

一、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

二、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领导并坚决支持全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当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干部，应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革命造反派干部，执行毛主席

革命路线的各级负责同志，要同那里的红色造反者联合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坚决支持并参加红色造反者的夺权斗争。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要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好好工作，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不能消极怠工，不准擅离职守。

三、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的顽固堡垒，坚决反对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念，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

四、一切权力归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只许革命左派夺权，不许那些名为“革命派”、实为保守派掌权、篡权。每个红色造反者必须提高革命警惕，严防政治扒手。要分清真革命派、假革命派，真夺权、假夺权，凡是已被反革命组织、保皇团体抢去的权力，对政治扒手篡夺的权力，统统都要坚决彻底地夺回来。有敢于反夺权者，坚决严加惩处。

五、一切真正的红色造反者，都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保证生产革命双胜利。要坚决反对经济主义，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生产、交通、财政金融，不准私分公共积累和储备粮。违反规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者，坚决依法严办。

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发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有不法行为，立即法办。对“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等反革命组织和八八团、“赤卫队”等保皇组织中的极少数首恶分子、犯罪分子，应坚决镇压。同时必须把这一小撮反动分子与那些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那些改头换面，以各种花样，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坚决实行专政，从严处理。

七、废除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发布的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指示、文件(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文件除外)。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了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黑龙江省军区和我省驻军部队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已经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红色造反者的夺权斗争。我们红色造反者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同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密切结合，采取强力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

全省红色造反者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下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让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黑龙江省的广大土地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刊载“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四点指示：

(一)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二)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政策。戴高帽子，抹黑脸，脱帽洗完脸，立即上班工作。

(三)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严重错误还得挽救他，使之改造自新，不然，还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吗？

(四)说服干部，使干部懂得，不要人人过关，搞得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出，不要“怕”字当头。“敢”字当头，最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

毛泽东：关心夺权问题(传单)

主席问总理：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夺权机关。

总理：才夺一天多。

主席：要抓典型。

总理：市局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1)是黑帮，影响很深程度的黑帮；(2)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4)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5)有个别一般错误(这样人较多数)。

主席：前两种面要划小，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五种形式：(1)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2)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3)停职留用；(4)撤职留用；(5)撤职查办。

总理：哪种办法好？一面斗争，一面留用，有了对立面，可以壮大队伍。把许多面压在身上也很被动(指革命造反派)，留用一面斗争，一面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队伍陷入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要拿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

主席：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办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怎么办)。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看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小，夺过去很快要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对张春桥同志从上海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传单)

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林彪关于朱德问题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传单)

彭德怀历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这个错误，犯那个错误。都是为了野心。

对右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批判到底，斗争到底。把你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是有好处，这样，看来你还能改好，否则不可能。

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了党的一个很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内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个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了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健全党，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悔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悔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查的，不是的！是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不自觉是不行的，已检讨了不老实。他也不服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件，他也主张轮流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一天也没有做过总司令员，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遵义会议前朱德指挥，以后毛主席指挥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前方是某指挥的(不是李德)，解放战争是

毛主席指挥的，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主席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两个，打败仗，没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在中央会议上谈邓小平、陶铸及“二月兵变”(一九六七年一月)(传单)

彭、陆、罗、杨这些家伙就是企图变天，就是妄想搞反革命政变的。我们不搞这个文化大革命，我们不搞他们，他们就要搞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毛主席是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采取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同志们还记得“二月兵变”那件事吗？运动初期，北大、师大、人大等校揭露彭真一伙企图策划反革命政变的大阴谋。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康生同志在北大、师大讲过这么一段话：“我只举一个事实，今年二月底到三月初，北京市委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想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为资产阶级专政。策划派往北大、人大，至少调一个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且在北大都看了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当时北师大工作组长孙有渔千方百计替彭真辩护。康生同志在那次讲话中还指出：彭真要夺政权。他(孙有渔)替彭真辩护，彭真本来要政变，他说造谣，并用简报写出。彭真大黑帮要在北大、人大住军队，本来是真的，孙有渔说是假的。你们看孙有渔站在什么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立场。可见“二月兵变”是真有其事了。正当广大同学根据这个线索继续深究时，邓小平、陶铸急急忙忙跳出来。邓小平八月二日亲自上台表演，矢口否认了这回事。邓小平说：“那是因为军队要驻扎到北京来。用一些民房，军队领导考虑到住在学校不方便，军队和学生混在一起不好。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澄清了这回事以后，要辩论的话，这件事就不算一件事了，就是这样了。”陶铸也替邓小平帮腔。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人大说什么“‘二月兵变’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

刘、邓被揪出来了。他们是彭、陆、罗、杨黑帮的后台老板。他们的面目也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不禁要问：“二月兵变”真的没有这回事吗？邓、陶为什么匆匆忙忙矢口否认这件事情，替彭真开脱罪责，他们和彭真一伙的阴谋到底有什么联系？

周恩来同志传达林彪同志关于军训问题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传单)

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革命性就是五敢。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现在有人打不到点子上，你们不调查研究，怎么能打到点子上呢？纪律性就是革命的自觉性。

姚文元同志传达林彪同志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传单)

1. 造反派要继续发扬五敢精神，革命到底。
2. 在斗争中要研究科学性。
3. 加强组织纪律性，发扬三八作风，会唱四支歌：(国际歌、三八作风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第四首毛主席很谦虚，没有提。前三首也是主席的意思。
4. 一部分干部过不了关，什么时候采取组织行动，革命群众自己考虑。部分人不会过关，要帮助过关，但不等于包庇过关。

林彪对解放军报社的重要指示：(传单)

- 一、热烈地拥护毛主席。
- 二、热烈地支持左派。
- 三、坚决地打击右派和一切牛鬼蛇神。
- 四、永远保持鲜红的旗帜。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被揪斗。

康生布置对 1946 年在新疆被盛世才囚禁而后被释放的共产党员九十余人，以叛徒罪名，进行审查，致其中 26 人被折磨致死。

戚本禹接见人民大学师生，说：“孙泱(副校长)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通过孙泱可以搞朱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

第六十二卷 1967年2月1日至3日

2月1日

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说：“最近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写信问我，给党内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画花脸、游街示众，算不算武斗？我认为这些也是武斗的形式。这里我想强调一下，进行斗争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强调以理服人……打人的应该依法处理。”

毛泽东对“三司”《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作者孟繁华）一文颇为欣赏，推荐给《红旗》和《解放军报》转载。转载时均特别加上了编者按语。

《红旗》杂志转载《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编者按语

（一九六七年二月）

《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是一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我们在这里向全国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推荐。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就是在当前的夺权斗争中，必须“打倒‘私’字。”

这篇文章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它看到了我们正在进行着两种“夺权”的斗争。文章指出：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且必须夺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权。

不夺我们头脑里“私”字的权，不打倒头脑里的“私”字，就不能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只有夺了我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权，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阵地的权，才能形成浩浩荡荡的步伐一致的坚强革命队伍。否则，即使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也不能巩固。精神的东西要转化为物质的东西，脑子里带着“私”字去夺权，即使夺了，这个权也还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权。

在当前夺权的斗争中，一些革命造反派队伍中暴露出来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有一个总根子，这就是“私”字。“打倒‘私’字”这个口号，提得深刻，提得及时，说到了问题的根本。

打倒“私”字，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当前，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老三篇”等光辉著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应该切实学好。借口斗争紧张而放松学习，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立即纠正。

打倒“私”字，必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打倒“私”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的思想。

林彪同志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夺他们的权，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但同时，又要革我们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命。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

革命队伍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决定的意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说：“不怕八路军大练兵，就怕八路军大整风。”同样，在今天，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说，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的思想革命化，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打倒“私”字，实现和巩固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的大联

合。

胜利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

(原载《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3 期)

《解放军报》编者按：

今天，本报转载的《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一文，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要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必须彻底造“私”字的反，让“公”字在头脑里牢牢地扎根。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势不可挡。这个大革命的风暴，正在迅速摧毁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盘踞的顽固堡垒，同时，也更广泛更深刻地触及每个人的灵魂。

在革命造反派的队伍中，也存在着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一些非无产阶级的错误的思想。这些错误思想，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私”字。这个“私”字，是革命派团结的大敌。我们必须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私”字打倒，才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派肩负的极其伟大的历史使命。正如文章中指出的：“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夺权斗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只有在思想上彻底夺了‘私’字的权，才能保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彻底胜利。”

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彻底清除一切私心杂念。我们每个同志，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

(原载 1967 年 2 月 1 日《解放军报》)

《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为题，发表社论，欢庆贵州省夺权。嗣后各省夺权，皆发表类似文章，实同八股，录此一篇，以概其余。

西南的春雷（二月一日《人民日报》评论）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这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我们欢呼！欢呼毛泽东思想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对整个大西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这个胜利，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建立一个为群众所拥护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它有威信，有能力，统一地集中地领导夺权斗争。这是夺权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核心领导的权力机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就是这样一个纲领。它向全省人民发出的五项号召，好得很！好得很！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的关键时刻，一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应当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魄力和勇气，应当在群众中亮相，应当振臂高呼，应当亲临前线，和革命群众结合，并肩战斗。只有这样，才能号召广大群众，才能组成一支有集中领导的、有组织纪律的、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胜利地完成夺权斗争的任务。

贵州将彻底变革。贵州在前进。夺权，这仅仅是彻底变革的开始。我们预祝贵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沿着毛泽东思想的光明大道胜利前进！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无产阶级！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上海、山西、青岛给我们作了榜样，贵州又树立了一个榜样。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

周恩来、李富春、康生接见工交系统造反派代表。周恩来讲话：工交 23 个部门都夺了权。纺织部内部造反派未形成，外部要帮一下。国防口、农林口、文教口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但也夺了。各省市都在夺。“我们要利用夺权把干部都考验一下。”（《传信录 462、463》）

周恩来在接见中央接待工作人员时讲话：现在夺权斗争已起连锁反应，任何单位都在夺权。应该是大多数是夺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真正烂掉是少数。次之是不能作原来工作，撤职留用。第三是停职反省不如停职留用，改过自新，以观后效。第四可以留用，监督业务生产。后三种是多数。（《传信录 464》）

戚本禹、谢富治在公安部礼堂接见公安局全体成员及矿院“东方红”与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成员。两个学院的造反派因接管石景山公安一分局问题，发生冲突。戚本禹宣布，对石景山一分局由卫戍区接管。矿院“东方红”撤还。戚本禹还提到“现在要成立北京人民公社，这是毛主席提到的。”（《传信录 467》）

徐向前接见解放军总后勤部造反派代表，说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邱会作不是三反分子，不是刘邓的人。他在生活上的问题引起了很大公愤。对廖汉生、杨勇要打倒，对郑维山要保。（《传信录 468》）

江青、戚本禹接见八一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制片厂革命群众代表。江青说：新文化部与旧文化部是一回事。（《传信录 471》）

王力、关锋在《红旗》杂志大院就“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在中宣部夺权问题，传达陈伯达的批示，并讲了话。陈伯达的批语：“中宣部的接管，要由中央直接干预，不能由外面的人随便接管。外边来接管的人必须立即退出。中宣部的印章一律收回，印刷厂、司机班、收发室、电话总机等单位已由《红旗》杂志接管，是正确的。《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机关杂志，不许来历不明的人来扰乱。陈伯达 2 月 1 日晚十时。”（《传信录 469》）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向学生代表讲话，指责“红革会”适应了陈丕显、曹荻秋的要求，破坏对陈、曹的斗争，破坏大联合。（《传信录 470》）

2月2日

周恩来写信提议：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性质临时通知参加。明日(3 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提议今后每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毛批示：“此件不用，退周”。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以祝贺黑龙江省夺权胜利。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连续刊登七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提出“反托”口号，把矛头指向批判总部错误的群众，引起社会上许多群众组织

“清除托派”之风。

“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谭震林一手制造”的农口“反革命复辟逆流。”

师大“井冈山”、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造反派冲击高教部、教育部，抢走档案。

以耿金章为首，成立了拥有32个造反派组织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酝酿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在张春桥诱胁下失败。

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在连遭批斗后死亡。

2月3日

毛泽东接见以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文革初期，与中共沆瀣一气者，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惟此“欧洲之明灯——阿尔巴尼亚”。若北朝鲜、北越，皆因与苏联关系，而与中国若即若离，时好时坏。迨至文革后期，中国与美国关系建立，中共与阿尔巴尼亚亦反目成仇。

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问：“谢胡同志什么时候来中国的？”

答：“去年五月”。

“当时我就说，究竟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那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有利，可以不轻视敌人。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一九六一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六一年到六五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作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了个别问题，个别人物。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饶，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已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前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陆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各地都转载了，而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北京不打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北京市委时，我们增加了某个卫戍师，现在还是某个卫戍师。以前某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打人，杀人，杀死了三口人，杀伤三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女，如贺龙、陆定一的女儿。所以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解决了，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播了，八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去年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当时我在杭州，一天中午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我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这样大字报就满天飞了。清华、北大附中写了两件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八·八我接见了八十万红卫兵，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就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负责人反对学生运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发了刘、邓问题。现在双方决战还未解决。今年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解决问题可能到明年三、四月份，也可能更长一些时间。

好几年前，我就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分几部分人：

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可以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产阶级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是赞成的，合作化他就不赞成了。这一批其中有的是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是解放后才进党的人，有百分之八十解放后才进党的，其中一部分当了干部，有的当了支部书记，县委书记。

第三部分是收留下的国民党，这些人有的过去是共产党，以后叛变了，登报反共。那时不知道，现在查出来了，他们不拥护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如地、富、反、坏顶多百分之五约三千五百万人。他们是分散的，分散到各乡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敌了。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中顶多不过几十万，也是分散的。所以大字报，群众运动，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就吓得要死。

大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修正主义分子了，搞修正主义了。文科不能写文章，哲学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经济学的，可多呢？现在看来有希望，斗得很厉害。（卡博、巴卢库说：斗得厉害好，清醒一下好。）群众都发动起来，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卡博同志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到明年这个时候，可以这样说了。但是也许我们被敌人打败，打败就打败嘛，总是有人革命的。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博同志讲：不搞斗争是不成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巴卢库同志说：就是要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就是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象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不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大相信的。中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那有这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同他们讲过话呢！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成了反革命。井冈山，聂元梓受过压迫，很革命，去年十二月份，今年一月份分化了。但不管怎么样，总是好人多。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了，不行了的。不过斗来斗去，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街上有打倒某某某的大字报，打倒某某某的就更多了。杨成武是代总长，管好几个部，某某部要打倒他。打倒肖华是某某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但有条永远是真理：那是绝大多数党员、团员和人民是好的。

《十年浩劫》：二月三日凌晨三时一刻，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巴卢库的会晤仍在进行。话题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一直沉默寡言的巴卢库将军提了一个问题：“主席，从总体上说，人民解放军是支持这场运动的吗？”“这个么，怎样讲才好呢？一句话是扯不清白的。”“老实讲，我不喜欢讲解解放军的坏话。但是，最近一个时期，军队整

了一下造反派，抓了一些人，有的地方还开了枪。这样搞就不得了。天下一乱，我们的老帅就看不惯，他们不喜欢造反派，横看竖看都不顺眼，有情绪。这个情绪，很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我是主张让他们多想一个时候。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么。……送走了巴卢库，毛泽东打开了当天的《解放军报》，一天前，毛泽东曾听女儿萧力（李讷）说，林副主席写信支持以萧力等八人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称赞他们在《解放军报》社内部点燃了革命的火焰。军报也定于二月三日在头版发表他们的造反宣言《告全军书》。毛泽东在报纸版面上寻找着，他从一版看到四版，又从四版翻回一版，全然不见《告全军书》。他叫来秘书，请秘书查询此事。秘书当即接通了《解放军报》社的电话，夜间总编的答复是：在校样上机后，报社接到总政的命令，撤掉《告全军书》，同时解散《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秘书向毛泽东如实转达。他感到很恼火。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造反派的信他是看过的，并作了肯定的批示。这一切，总政萧华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知道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干？”毛泽东愤然想道，一个月来的烦恼一齐涌上心头。（摘自第193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步行串连的通知。

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 中发(67)40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

几个月来，广大革命师生热烈响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号召，进行步行串连，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广阔的发展。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了夺权斗争。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参加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战。

目前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由于前去的革命师生过多，拥挤一起，天气寒冷，食宿、交通安排极为困难，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的地方还发生了传染病，影响了革命师生的健康。这些问题，急需加以解决。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一、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步行串连队，凡停留时间超过三天到五天的，请迅速返回原地。在县以内步行串连，也要防止过分拥挤。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一律停止前往串连和参观。

二、步行串连队在返回的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目前，为了使远离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迅速回到本地本校闹革命，参加斗、批、改，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在十五天内也可以免费领取直达票乘坐火车和轮船。不靠铁路线的，应当步行到邻近的铁路线上乘坐火车。

三、为了响应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反对经济主义，防止铺张浪费，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在串连和回程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粮食定量可适当增加。宣传费、医药费只在必要时可给予少量补贴。

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凡是吃饭尚未交费的，自二月八日起一律交费不再免费。

本通知可在全国城乡各有关单位和地方张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高度赞扬

了上海的“一月革命”，说：“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它是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决战。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对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堡垒，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一个一个地巩固。“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阵线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是，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决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也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

毛主席指出：“掏乱，失败，再掏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来，也是这样。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上海市、山西省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必须高度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总是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在他们权力被革命群众夺掉的时候，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夺权，妄图反攻倒算，把他们失去的权力再夺回去。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正在重新组织他们的反动队伍，聚集地富反坏右分子，搜罗社会渣滓，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扑，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妄图篡夺革命造反团体的领导权，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唆使尚掌握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单位、一个生产大队领导权的同伙，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妄图扰乱国家的经济生活，以达到他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夺权的政治目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是决不能得逞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要蔑视他们。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对付，切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充分认识，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和反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敌我矛盾。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向。否则，就会走错误，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凡是经过半年多来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和单位，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在夺权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集中目标，狠狠地打击敌人。必须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把人

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乱轰一气。否则，就会妨碍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就会犯方向的错误，就会被阶级敌人利用。

(二)

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夺权斗争的阶段，革命群众团体必须实行大联合。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就不可能胜利地完成夺权斗争，就是收回了一些权，也还会丧失。

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整顿思想，整顿队伍，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对于上述的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和行动，绝不能任其滋长，否则，就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如果有人坚持这些错误思想和行动，发展下去，就可能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革命群众组织收回了某些部门的权力，本身的地位就随着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候，一些同志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发作。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我们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一切要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要以大局为重，不要闹个人的名誉、地位。要坚决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号召，不要讲排场，讲阔气，浪费国家财物，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

夺了权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负责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应当采取团结的方针，争取大多数，而不能排斥大多数。这样做，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新秩序。

每个人在夺权斗争中和当权以后，都要经受新的考验。我们期望，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要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忠于毛主席，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期望他们逐步地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不要做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老老实实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认真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三)

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

这些领导同志，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党内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他们现在已经在群众面前亮相，在群众面前公开表明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共同战斗。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要相信他们。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是拥护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拥护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当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同群众一道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时候，革命的群众团体应当支持他们。应该看到，他们的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他们在政治上比较成熟，他们的组织能力较强，他们参加核心领导，对于夺权和掌权，都是十分有利的。

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

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一般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他们当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本单位夺权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一点，决不能忽视。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四)

这一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不是自上而下的撤职和改组，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号召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文化团体和学校焕然一新，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旧东西。

经验证明，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要“抓革命，促生产”，使生产系统照常工作，指挥原来的业务班子(必要时加以调整)执行任务，并组织革命群众对业务班子实行监督。这个临时的权力机构，还要担负起统一指挥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任务。建立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是应该的，必须的，非常重要的。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盘踞的烂掉了一些单位，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创造并将继续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在这里，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地采取在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来代替剥削阶级的旧东西，来代替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旧东西。而绝不能只是把权接过来，一仍旧章，按老规矩办事。

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自下而上地发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它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巴黎公社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苏维埃的经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

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

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守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对于这些反革命家伙，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一切革命的同志，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对于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它们只能实行专政！

现在，一批牛鬼蛇神跑出来，搞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之。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

有的地方，反革命组织暴露得很充分了。当地驻军和广大革命群众、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的公安机关，对反革命组织实行了镇压，这是做得完全对的。哈尔滨驻军和广大革命群众、市公安接管委员会，对当地所谓“荣复军”这个反动组织的处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他们在包围了所谓“荣复军”以后，首先发动政治攻势，使广大受蒙蔽的人觉悟过来，反革命肇事的现场，变成了控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受蒙蔽的人们交出了头头。所谓“荣复军”很快就瓦解了。这样做，既打击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又争取了受蒙蔽的人们。

在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专政机关必须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这样就能形成天罗地网，使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

一切革命群众组织，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混进来捣乱。要在统一指挥下，配合专政机关，担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在解放战争进入对蒋介石反动派举行总反攻的时候，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在今天，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军正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正在向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发起总反击，我们也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也必须加强纪律性。这样，我们在当前这场斗争中也将是无往而不胜。

“一唱雄鸡天下白”。让我们热烈地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吧！

《红旗》第3期还刊登本刊评论员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一文。

文章说：“一小撮钻进党内的当权的反动家伙，在他们盘踞的一些地方和部门，实行‘和’

平演变”，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把他们篡夺的一切权力夺回来，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发现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伟大发展。这个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普遍的意义。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这些反动家伙，维持他们反动统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盗用党的名义，把党的纪律歪曲成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纪律。对于这种反革命的纪律，必须彻底砸碎。

一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起，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地进行斗争，而不管他们的什么“纪律”。他们已经不是革命的上级，而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战争中，一个革命战士，当某个指挥员叛变投敌的时候，是决不能服从他的指挥，相反的，要把枪口对准他。战争中是这样，政治斗争中也应该是这样。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说来，必须粉碎反革命的纪律，同时，必须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

经验证明，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经过酝酿协商，建立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必须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这个权力机构，必须是有权威的。

超阶级的权威，是没有的。我们要彻底打倒资产阶级的权威，坚决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

有些人反对一切权威，这是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这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最高权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权威。凡是执行这条路线的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当然是应该有权威的，也一定是有权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当仁不让地做这样的权威。这个权威，是无产阶级的权威。

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有权力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待党内一小撮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待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就是要剥夺他们的民主权利，同他们没有什么平等可说。

谢富治在“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红旗军’的誓师大会”上讲话，表示支持，同时建议今后类似活动，无须小题大作。（《传信录 478》）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十项通令。

《大众日报》发表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

第六十三卷 1967年2月4日至7日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2月4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小学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

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草案) 中发(67)39号
(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小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必须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

(二)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积极参加本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斗批改，并组织学生学习。

(三)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五、六年级和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文化革命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

一、二、三、四年级学生，由革命教师或高年级学生作辅导员，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生也必须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

(四)小学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由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民主选举产生。这些组织的成员，应以革命教师和高年级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学校的行政班子，管好师生的生活。

(五)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任何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问题，而采用各种形式进行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小牛鬼蛇神”等的革命师生，必须平反。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点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把教职员中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由教育机关安排，就地劳动改造。

这一通知可在全国城乡基层单位和小学校中张贴。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

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 (67)国密字 18 号

第二、三、四、五、六、七机部，并国防工办，各省、市、自治区人委：

二、三、四、五、六、七机部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是国家重点保密单位。经中央文革同意，非本系统内职工和学生，其它外单位职工和学生一律不要去串连，已进去串连的，应立即退出。

这一通知，可在有关各单位内部张贴。

戚本禹在京棉一厂辩论会上讲话：一、二、三厂女同志多，武斗最厉害。京棉一厂最近的武斗，总理和中央文革十分关心。他要求：(1)不要武斗；(2)不许抓人；(3)坚持生产。(《传信录 482》)

2月5日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张春桥任主任。上海人民公社发表了题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的宣言。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的成立大会。但是《人民日报》迟迟不报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造成上海人心浮动。耿金章、红革会等反张势力复行活跃。

《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人民公社今日宣告成立

上海人民将于今天下午隆重地在人民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诞生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她的诞生，庄严地宣判了旧上海市委的死刑。从此，旧上海市委的一切权力全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又一巨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极其重大的胜利！上海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学生、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热烈庆祝她的诞生，从心底里欢呼：“上海人民公社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权政权，巩固政权。”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打倒旧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粉碎了旧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实现了大联合，从旧上海市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魔掌中夺回了党权、政权、财权和文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上海人民公社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是上海地区一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大夺权的胜利成果。

今天，上海人民将以万分振奋的心情，热烈隆重地庆祝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欢庆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节日。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反抗，就造反，就斗争，就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上海革命造反派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的号角，打响了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胜利的第一炮。

在这个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时刻，北京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来了贺电。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这个伟大号召，好象一声春雷，振奋了全上海，震撼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从此，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如大海怒涛，滚滚向前。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基础上，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基础上，在痛击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光辉胜利！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两个阶

级、两条道路之间的大搏斗，大厮杀，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争夺政权。因此，千重要，万重要，夺取政权最重要。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掌握了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他们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意攻击。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千方百计地扶植资本主义势力，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竟狗胆包天，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要阴谋，放暗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当他们感到自己快要垮台时，他们又开黑会，定黑计，大刮阴风，大布妖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凭着他们手里掌握的权力，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干尽了坏事，在一个短时期内使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上海，陷入了瘫痪状态。他们妄图用这种毒辣的手段，卡住我们的咽喉，切断我们的血管。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正象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都是一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人。他们自己给自己敲响了死亡的丧钟，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垮台的条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和历经革命风浪考验的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目睹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倒行逆施，眼看毛主席缔造的红上海开始改变颜色，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万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红色造反者们发扬了天不怕，地不怕，敢同恶鬼争高下的大无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乘革命的大好时机，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勇敢地挑起革命与生产两副重担，煞住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击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迅速扭转了局面。就在这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奋起砸烂了修正主义的阎王殿，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

一月革命，是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铁拳；一月革命，是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的战鼓；一月革命，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下而上地夺回自己专政权力的新形式；一月革命，开辟了上海劳动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阶段。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上海无资产阶级革命派实现大联合，夺取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抵抗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防止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坚强保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横扫自己头脑中和自己队伍中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行会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垃圾，加强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强大武器。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组织就团结，我们的队伍就一往直前，我们的斗争就所向无敌。我们上海人民公社的全体红色造反者向毛主席庄严宣誓：“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就是我们的终身天职。伟大的“老三篇”，就是我们的座右铭。光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著作，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狠斗“私”字，大立“公”字，不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把上海人民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定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普照全上海！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

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对阶级敌人则实行最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不论是现在的临时委员会，或是条件成熟时选举产生的正式委员会，都必须高兴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群众路线，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全面的大夺权，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打倒旧市委、旧市人委，挖出一切目前还隐藏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旗帜，坚决打垮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地、富、反、坏、右和其他一切牛鬼蛇神，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坚决制裁，坚决镇压，同时，严防类似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之流的反革命组织，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众，进行捣乱，袭击革命左派和革命组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旦发现，组织立予取缔，首恶分子及幕后操纵者马上依法严办，决不宽贷。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号召：

全市的革命工人们，要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更好地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进一步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工业生产，搞好交通运输，搞好市场供应，搞好内外交流，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国家生产计划而奋斗！

全市的革命农民和革命的农村干部们，要更高地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揭发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强对地、富、反、坏、右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大力抓好田间管理，保证城市供应，夺取今年夏熟丰收，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们，要坚持响应毛主席最近发出的伟大号召，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同时，严守岗位，加强备战，提高革命警惕，时刻准备迎头痛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帮凶的挑衅和进攻，时刻准备无情镇压国内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立新的伟大的功勋！

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们，要更认真地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为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作好准备！

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革命干部和工作人员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同时要严守岗位，尽职尽责，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全市和外地在沪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要继续发扬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我们就是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寸权必夺”！在已经夺权的单位，我们要学会巩固权力，使用权力，决不容胜利果实再落入敌人之手；在被右派假夺权或我们夺权后得而复失的单位，就必须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罪恶阴谋，组织阶级力量重新夺权；至于那些仍然被资产阶级代理人所盘踞控制的单位，我们就要充分发动群众，立即开展夺权斗争，决不容许那些反动家伙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总之，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同时，在夺权斗争中，我们还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夺权，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那种“见干部就揪，是当权派就打”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论调，必须彻底批判。我们对于旧市委、旧市人委以及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即十六条的精神，区别对待。对于他们当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我们就是要积极支持。对于犯有一般错误或犯有严重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愿意悔改的，我们就应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允许他们改过迁善，将功赎罪，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至于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家伙，则必须坚决打倒！

全市的革命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坚决地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为实现上述号召而斗争！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上海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里程碑。革命左派夺权、掌权，为开展全面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夺取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斗争更尖锐、更复杂。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其他一些反革命分子，决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向我们发起新的反扑，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决不可以松懈斗志，麻痹大意。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再有几个反复，多次曲折，再打几个大战役，打几次歼灭战。但是我们的决心是下定的了，不管风浪再大，都要挺起胸膛，勇猛前进，迎接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闯过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决不后退半分。上海人民公社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它必将在更猛烈的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让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吓得发抖吧！让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让一切牛鬼蛇神，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胆颤心惊吧！让那些只知道按照常规走路的政治庸人在上海人民公社面前目瞪口呆吧！上海人民公社涤荡的是一切污泥浊水，创造的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

上海工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大事记 (初稿)1966.11.8—1967.2.5

载《文化革命通讯》1967.6—7

十一月八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处要求和曹荻秋商谈在11月9日开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大会一事。曹荻秋躲在衡山饭店，拒不接见。只派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刘冠应付一下。曹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是何等仇视！

十一月九日上午 各厂职工打电话给市委，要求参加下午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总司令部成立大会。杨慧洁在市委的指使下，向各厂职工急忙传达了所谓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黑指示，以不能停工影响生产为名，阻止工人群众去参加下午的成立大会。

中午12时 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向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前和大会进行中，工人同志曾多次要曹荻秋参加，对于这样一个有四万人参加的革命的大会，市委竟不闻不问，不派一个负责人参加。会后，工人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谴责上海市委企图把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的罪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就紧紧地把枪口对准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旧市委。

“毛主席，只有您，才是我们工人最知心的人哪！”“跟上海市委没有什么理讲，我们上北京见毛主席去！”凌晨一时，工人造反派决定乘火车上北京，向毛主席报告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的喜讯，控告上海市委的罪行。

上海市委一面策划在安亭停车，一面又唆使数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干部、工作队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围攻北上的造反派同志。沪宁全线停车。这就是上海市委一手策划的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同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同志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10时 韩哲一与上海副市长李干成到安亭。韩、李全然不提陈伯达、张春桥同志10时指示精神，反而挑动工人大去北京，以便达到他们给中央施加压力的罪恶目的。

中午12时，陈伯达同志给工人造反派同志来电。晚12时，张春桥同志乘飞机直达安亭。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8时 张春桥同志与全体工人见面，张进一步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意义，劝大家回上海。工人同志经过讨论，除派部分人步行继续去京外，其余人都回上海。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 张春桥同志在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五项要求，并指出：“上海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现在工人们起来了，这是中央所希望的。希望工人们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中央文革小组对工人造反派的支持，使他们清楚地看到：谁是造反派的亲人，谁是造反派的仇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响彻全场。

十一月十四日 中央常委开会，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十一月十五日 在苏州，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提出五项革命要求。曹荻秋拒不签字，公然叫嚣：“我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张春桥同志对曹荻秋展开了两个小时的激烈斗争，最后，张春桥同志严肃的指出：“你不签字，我签。”曹荻秋这才被迫签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胜利的结果。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曾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表示支持张春桥的签字。王一平接到王

力同志的电话记录稿以后，竟破口大骂：“王力支持春桥五条，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

十一月十六日 毛主席十分关心上海工人运动，中央常委汇报以后，毛主席同意了张春桥同志的处理，并英明地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永远支持工人革命造反派！

熊熊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了！工人造反派奋起之日，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旧市委完蛋之时！

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上海市委不甘心安亭事件中的失败。他们造谣言，放暗箭，把“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的罪名强加到工人革命造反派头上。为了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曹荻秋、宋季文、张琪之流积极策划成立上海市委的保皇工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

十一月十九日 曹荻秋在少年宫接见国棉十六厂、国棉三十一厂的五百多名工人，污蔑工人造反队组织不纯，叫嚣什么“我们只能支持造资产阶级的反，决不能支持造无产阶级的反。”

在陈丕显、曹荻秋的策划下，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企图围攻张春桥同志。会上，市委的老爷们一致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和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张春桥同志痛斥了顽固坚持刘、邓反动路线的市委老爷们。他们质问市委为什么不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当场宣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曹荻秋之流词穷理屈，心怀不满地说：“组织上可以服从，思想上不通，我有保留。”

十一月二十四日 张春桥同志离开上海回北京。曹荻秋在沪西工人俱乐部接见良工阀门厂、国棉十七厂等38个工厂的一百多个代表。曹在会上迫不及待地批准了成立赤卫队这个保皇工具。曹授意赤卫队头头要“先搞筹委会，这样比较主动”，“开成立大会市委可以派负责同志参加”，并当面关照杨士法，应把工人赤卫队交给总工会。

十一月二十五日 曹荻秋在沪西工人俱乐部接见38个厂的代表，赤裸裸地说：“我们不支持工人造反派成立司令部，大会也不去参加。”“市委承认司令部是暂时照顾，主要是为了更大利益。”曹荻秋还统一了市委接待人员的口径：“张春桥同志签订的五条我们知道。”再次挑动群众斗群众。同日曹又和杨士法在青年宫接见工人代表。曹说两个“五条”是“大毒草”，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是绝对错误的，“破坏了党的原则”，“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企图煽动工人反对中央文革。曹被红革会小将揪出后，杨握了握拳头对工人赤卫队说：“你们应该这样，才会有力量，要组织起来。”并规定了工人赤卫队的口号是“坚决反对双五条”“要张春桥回上海来向人民低头认罪”，还说炮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是什么都要轰，上海市委以前是正确的，我们要轰的是“双五条”。这样，又一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

十一月二十六日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成立，黑市委派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参加。

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 “红革会”战士与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协商，要求第九期《红卫兵战报》与《解放日报》一道发行。报刊发行处负责人推脱说：要请示《解放日报》社和市委。

十一月二十八日 《红卫战报》第九期〈特刊〉出版，刊登了《毛主席先后检阅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彻底埋葬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等文章。红卫兵小将提出《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的革命口号。

上海黑市委无理拒绝对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要求。黑市委指示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要他通过联络站工作人员与邮电局和《解放日报》取得联系，统一口径：《解放日报》是市机关报，是党报，《红卫战报》是群众组织的报纸，不能一起发行。

十一月二十九日晚 “红革会”十余人来到邮局报刊发行处，与负责人进行谈判，报刊发行处与市委口径一致，始终不同意，谈判决裂。

十一月三十日凌晨 1 时 “红革会”小将冒着寒风，列队来到《解放日报》社门口，他们随即派代表和报社、邮局负责人交涉。两小时后，谈判又告决裂。就在这种情况下，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临时决定封闭《解放日报》社。其他革命造反派纷纷支持“红革会”小将。

当日，“《解放日报》社革会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发表四点声明，表示支持“红革会”战士的革命行动。

全市零售员开会抗议邮局党委无理拒绝“红革会”战士的革命要求。

十二月一日 《解放日报》“卫东”战斗队，《文汇报》“红心铁骨”战斗兵团合写了一张大字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革命职工站出来说话了！”表示坚决站在“红革会”战士一边。

市委有计划、有组织地调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了在《解放日报》社内的“红革会”小将。

十二月二日 上海市新闻界里部分革命造反队和“红革会”小将在文化广场召开“向《解放日报》、《文汇报》贯彻的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新闻界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红革会”战士的革命行动。

从 2 日晚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工人同志们陆续前往报社支持“红革会”小将，与“红革会”战士并肩战斗。

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哈尔滨、西安、兰州等地革命师生也纷纷投入战斗。

市委幕后策划调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解放日报》社，以“要辩论”和“要看《解放日报》”为名，对在报社里进行战斗的工人造反派、“红革会”战士及外地革命师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强攻。

十二月三日 张文豹给红卫兵联络站工作人员传达市委意见：“一个地方报纸停止 10 天、8 天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暴露了市委企图利用“解放日报”事件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罪恶目的。

通过斗争的实践，进驻报社的各造反派和报社的造反派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于是成立了“火线指挥部”，统一指挥这次斗争。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学生造反派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同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联合。

进驻报社的各造反派多次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人韩哲一、王一平、李干成、宋季文、蒋文焕等谈判，但造反派的革命要求屡遭无理拒绝。

十二月四日 强攻达到高潮。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使用十二磅重的大榔头，百余斤重的三角铁，以及大石块、玻璃片等物，向守卫在最前线的工人造反队和“红革会”战士发起冲击。他们还开来了工程急修车，用云梯、铁叉攻楼，甚至把汽油倒在大门上，准备火攻，未达目的。至此，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正当《解放日报》事件中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市委突然决定撤走各厂的四清工作队。这一决定，显然是为了退居幕后，而操纵各厂的保皇工具——赤卫队，对造反派毫无顾忌地进行残酷的镇压。市委撤走工作队的新阴谋在各厂引起了严重的恶果。色织二十四厂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正当色织二十四厂的工人革命造反队对工作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的时候，市委突然下令撤走该厂工作队。工作队临走，私自烧毁了 32 本黑材料。革命造反派果断地采取了革命行动，不让工作队溜走。这时，由工作队扶植的保皇工具——赤卫队，就出来大显身手了。他们从 12 月 7 号开始，对造反队进行了三天的围攻，他们殴打、绑架造反派，把 200 名造反派队员禁闭在一间小屋里达 22 小时之久。厂内的当权派和工作队队长是这次事件的指挥者，而市委派去调解的工交政治部主任和社教办公室主任以及总工会的代表，是赤卫队行凶的支持者。撤工作组这一事件牵制了革命造反派的

力量，干扰了工人造反派对进驻《解放日报》的造反派的支援。

十二月五日 在《解放日报》社战斗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组织一百四十余人受伤，斗争日转艰苦，而意志更加坚强。革命造反派不怕死、不怕难，准备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大无畏精神，吓坏了黑市委。市委请示华东局，华东局不能决定，就请示中央，中央严厉地批评了市委，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工人。市委这才不得不让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宋季文签字同意“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项要求”。

十二月六日 曹荻秋亲自批准市委工交部负责人杨士法一手扶植的“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上海市委还派候补书记王少庸参加。这些一向以保市委出名的人，这次也大喊起“向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口号了。但是，在这句激昂慷慨的口号背后，赤卫队却把炮口对准了革命造反派。

上海街头贴满了工人赤卫队总部主办的第一张大毒草《革命战斗快报》，矛头对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组织。

十二月七日 赤卫队和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市委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签字。

十二月八日 上海市委又故作姿态，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所有工作人员，“坚决地”执行市委签署的“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继续玩弄假投降真反扑的把戏。四日凌晨，《解放日报》社党委下令停止报社的编辑工作，停止印刷，撤走全部工人和工作人员，并从外面引进扒手，妄图破坏机器，将报纸停刊等罪名加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红卫兵小将身上。

十二月九日 《红革会》的一些负责人，撇下正在《解放日报》社里进行艰苦战斗的其他造反派战士，错误地决定撤退。《红革会》很多战士坚决反对他们负责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认为“解放日报”事件的斗争应坚持到曹荻秋的垮台为止。他们组织了第二“火线指挥部”。

十二月十一日 在人民广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其它革命造反组织一起召开六十万人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肯定《解放日报》事件是革命事件。

十二月十三日 《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发表。这是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进军号！

上海广大工人造反派纷纷响应《红旗》第十五期社论号召，向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猛烈进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完蛋之日不远了。

十二月十八日 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出来造反了。曹家后院起火，黑市委心脏爆炸。从此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行列里加进了一支有力的生力军。

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陈丕显这个阴谋家的一手策划下，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这是一个假批判，真包庇的大会。事前，陈丕显伙同市委书记处的人对曹荻秋下了密令，要他在赤卫队总部召开的大会上装出一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高姿态”，公开指责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同时马天水在会前通知市委机关造反派，张文豹通知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说，曹荻秋准备在大会上改变立场，站到革命左派一边来，曹荻秋准备受赤卫队的围攻，请造反派解围去。可是，在会上当赤卫队总部提出了炮口对准造反派胸膛的所谓“八项要求”时，曹荻秋竟签下了字。这八项要求承认赤卫队是群众的革命组织，承认以前与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单方面签字无效。

十二月二十五日 眼看曹荻秋保不住了，陈丕显为了保自己，又出一计，一方面说什么“赤卫队的事情唯张祺、杨士法是问”，唆使王少庸说工人赤卫队后面有人操纵；另一方面又宣称曹荻秋的签字是政治立场的错误，由他个人负责，书记处不同意。此后，曹荻秋发

表声明，宣布他的签字作废。陈丕显、曹荻秋为保自己，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一次挑动工赤卫队和工人造反队的冲突，制造了康平路，衡山宾馆，昆山，苏州等一系列的流血事件。

华东六省一市工人到华东局要求解决问题，魏文伯拒不接见，晚上，工人开始在南京路西藏路静坐。

十二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吹响了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在工人运动蓬蓬勃勃进展时，农民运动也开展起来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黑市委的纵容下，工人赤卫队一小撮领导人开会，策划停铁路、停邮电、停公交、停水、停电、停工矿企业，停市内清洁卫生等阴谋，妄图迫使中央文革承认他们是革命的组织，使他们镇压工人造反派的反革命行动合法化。

北方区海港停工开始。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和各单位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资产阶级习惯势力掀起一股经济主义黑风，紧密配合着“三停”。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开始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 《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办的《工人造反报》创刊号出版。

在中百公司门口，赤卫队围攻六省一市静坐工人，造成流血事件。

赤卫队以反对曹荻秋“把80万赤卫队员打成反革命”为理由到康平路包围“阎王殿”，大闹“皇宫”，威逼曹荻秋声明项目签订的错误的“八项要求”继续有效。这样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单国棉十七厂有2400人停工，持续一星期之久，损失百万元以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 工人造反派开始到“康平路”劝说赤卫队员回厂。在赤卫队的头头策划下，下午，在“康平路”发生了严重的武斗，造成“康平路事件”。

十二月三十一日 凌晨，在康平路的斗争还在继续。赤卫队的头头又策划新阴谋，他们以少数赤卫队员包围专供中央首长住的衡山宾馆，妄图用“调虎离山计”把工人造反派吸引在衡山宾馆，而带领被他们蒙蔽的数十万赤卫队员去北京，以达到他们给中央施加压力的罪恶目的。造反派工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只派少数力量到衡山宾馆进行劝说，他们收缴一小批赤卫队顽固分子的袖章，发生了冲突，这就是“衡山宾馆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发出了在全国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吹响了把学校，工矿、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号。

晚间十一点，曹荻秋主持一个黑会。会上，根据陈丕显“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的黑指示，订出了一个黑“五条”。从此，一股加工资、增福利的经济风在工业、财贸等系统愈来愈猛地刮起来了。

一月三日 晚上，《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造反派同志们经过艰苦的斗争，在上海和外地等革命造反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共同战斗，冲破重重的障碍，终于杀出来了。接管了《文汇报》，把报社的大权全部夺过来了。《文汇报》的造反，揭开了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序幕。

一月四日 一张崭新的革命的《文汇报》问世了，它宣判了旧《文汇报》的死刑。新生的《文汇报》重新刊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了告读者书，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报纸。”

全市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文汇报》夺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名写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当晚，《文汇报》“星火燎原”战斗队的革命造反派一接到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就立刻登载。但当时《解放日报》还在马达、

王树人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控制下，他们非常惧怕革命的大字报，借口“点了市委的名”，“涉及到赤卫队”，“要引起群众斗群众”等等，竟不予以刊登这一重要文件。

一月五日 《解放日报》革命造反派起来造反了，接管了大权。《解放日报》新生了！

一月六日 上海百万革命造反派冒雪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揭露了市委大量反革命罪行。

一月八日 《文汇报》先后重新刊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和《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文汇报》编者按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红旗，向反革命经济主义发动了总攻击。

上海街头，贴满了工人革命造反派为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所刷写的大批革命标语。工人纷纷退回领到的补发增加的工资和福利费等，主动让出占的房屋来。

一月九日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一月五日《文汇报》发表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由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发表的《紧急通告》。《人民日报》并给《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加了编者按。

从十八时起，上海铁路革命造反派接管了上海铁路分局调度室，两天后，扭转了沪宁、沪杭两线瘫痪的局面，客货运输正常。

一月十日 上海黑市委大刮经济主义阴风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到应有的惩罚。上海革命造反派把推行经济主义的上海副市长张承宗、宋季文等人押在宣传车上，游街、示众，大快人心。

同日，江南造船厂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隆重集会，热烈欢庆一万三千吨“朝阳”号巨轮在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凯歌声中下水了。这是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晚上十时，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与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在人大会堂接见了《文汇报》的代表，大大鼓舞了《文汇报》的造反派。

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电贺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组织，高度赞扬上海造反派：“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特地发表了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向全国革命造反派发出了伟大的号召：联合起来，夺取！

人民广场红旗漫卷，上海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革命造反派，举行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决心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再接再励，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同志宣读了中央贺电，并讲了话，姚文元同志也讲了话。电视转播了大会实况。

为了实行大联合，会上倡议上海和外地驻沪的各革命造反派团体各派出联络员，建立联络站。

上海工交系统战线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会聚在东方红体育场，召开了控诉上海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新罪行的大会，讨伐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推行了经济主义的混蛋们。

这天，由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主持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立了。

这天，到北京去控告工人造反队的上海第二制药厂赤卫队等九个人，写了一张《向毛主席请罪》的大字报，贴在《人民日报》社门前，这标志着工人赤卫队受蒙蔽的工人开始看清赤卫队的大方向之错，他们坚决要站在毛主席这边了，和上海市委划清了界线。工人赤卫队土崩瓦解了。

一月十四日下午 陈丕显、曹荻秋等一伙混蛋在上海革命派押送下游街示众，大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

一月十五日上午8时 在文化广场召开《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砸烂石西民大会》，陈丕显、曹荻秋、王少庸、杨西光、杨永直、孟波及一大批文艺界的坏蛋被揪上台，示众，陪斗。

团市委书记张浩波被游街示众。

一月十六日 《红旗》杂志评论员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号召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切权都夺过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月十八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就当前革命造反派在大联合大夺权的情况，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号召各个革命造反派要认真活学活用主席的这篇文章。又转载了《红旗》杂志社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向一切领导干部，一切共产党员，发出伟大的号召，指明了方向，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毛主席对革命的新生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高度赞扬；认为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创举。使报纸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造反派无限鼓舞，决心紧紧跟着毛主席，风里浪里去造反，革命到底不回头！

一月二十日 由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等二十七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了《坚决支持革命行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上海市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节节溃退，在市区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被阵阵扑灭时，又把经济主义妖风吹到农村，广大革命农民奋起制止。革命农民起来造反了！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盘踞的最后一个反动堡垒也被摧毁了！

当第二张《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传到农村时，贫下中农无不欢欣鼓舞，高呼：“说出了我们广大贫下中农的心里话。”

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上海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

最近，在一些革命队伍中出现“内战”现象，这是革命造反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反映。

一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重要社论，吹响了全国全面夺权斗争的冲锋号。

一月二十三日 在一些人的阴谋策划下，复旦《孙悟空》贴出了反对张春桥的《二十问》大字报，紧紧地配合社会上一股炮打张春桥的逆流。

一月二十五日 《解放军报》发表《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驻沪军队的广大指战员在市内游行示威，坚决支持革命派夺权！

一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的社论。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节约闹革命”。工人革命造反派坚决执行这一最高指示。

这一天，复旦红革会紧跟《孙悟空》贴出了矛头直指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的大字报：《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一月二十七日 上海二十九个革命造反群众组织联合发表了《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革命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的文章，这标志着上海的农民革命运动正在急风暴雨般地迅猛向前发展。

一月二十八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护革命造反派，为了制止反张春桥同志的妖风，应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的要求进驻复旦大学，事情处理完后立即撤出，而红革会的头头却无理扣留解放军师政委和参谋。

此后，红革会某些头头到处造谣惑众，极力污蔑人民解放军“镇压学生运动”，污蔑张春桥同志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红革会的头头还在中苏友好大厦围攻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达六小时之久。

工人革命造反派坚决谴责红革会头头的无理行径，奋起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人民解放军。

一月二十九日 上海和外地的三十三个革命组织发出《紧急通告》，呼吁支农工人坚守生产岗位，就地同贫下中农一起大闹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一小撮混蛋挑动支农工人大量离开生产岗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阴谋诡计。

一月三十日 清晨，从首都传来了中央文革小组一月二十九日来的特急电报(五点指示)。来电旗帜鲜明，给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以巨大的支持，给这股反革命逆流以迎头痛击。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先后表态，坚决拥护中央来电，击退反革命逆流。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十八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就当前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有关问题的联合声明》，号召各革命造反派破“私”立“公”，来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胜利开展夺权斗争。

一月三十一日 《红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发表。社论高度赞扬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说：“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这篇社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改的，毛主席给了我们造反派展开夺权斗争的新的思想武器。

二月一日 上海革命工人热烈欢呼《红旗》第三期社论的发表，纷纷举行集会或座谈，活学活用《红旗》社论。他们表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夺权，联合起来掌权，联合起来把这场生死决战坚持到最后胜利。

二月四日 在《红旗》社论的指引下，上海和外地的革命造反派在反击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从一月底以来，对红革会某些头头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群众性的批判，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坚决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广大红革会战士纷纷起来造他们的头头的反，参加了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条件逐渐成熟了。

二月五日 平地一声春雷——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她象一轮朝日，在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万丈光芒。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她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天，上海百万革命群众在人民广场举行了“热烈欢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宣布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大会上通过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喜。

伟大的一月革命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六七年二月十三日

[附] 金春明：《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后后》(摘录)

一、 安亭事件及其后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安亭，发生了卧轨拦车事件。这次事件是由上海市一部分人要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引起的。

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浪潮的影响下，在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主要是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帮助下，十一月六日，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

等三十多人开了一次会。会上决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并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还决定于九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宣布工总司正式成立。会上推举了大会五人主席团，王洪文因为是党员(当时参加会的只有两名党员)，很受重视，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十一月九日，大会如期举行，参加者据说有万余人。大会上散发了工总司成立宣言。

大会前，工总司曾派人到上海市委提出要求，市委作了认真研究。根据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通知的精神，市委认为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这样做违反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规定的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上海市委曾就这一意见打电话向北京汇报请示，得到了赞同。张春桥对上海市委的方针当时也表示完全同意。

工总司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大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一直闹到半夜。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他们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声称要北上赴京请愿。这列火车离开上海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安亭站。于是，王洪文等人就率众闹事，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三十小时又三十四分钟，严重影响了客货运输。

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来电报，要华东局和上海市顶住，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上海市委一方面不承认工总司的条件，一方面又派人到安亭，送去衣服、食品，做思想工作，动员工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从当时的情况看，可能不要很久，问题就可以妥善解决。

可是，十一月十二日张春桥到上海后，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就自行驱车去安亭。他先找王洪文等几个头头开小会，然后又开大会，当众答应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第二天下午，张春桥就在文化广场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即：1.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2.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行动；3.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十五日，张春桥又去苏州，同在那里继续坚持北上的工人签定了内容大体相同的五条。这两个五条统称“双五条”。

上海市委对陈伯达、张春桥出尔反尔的行动十分不满。陈丕显同志曾打电话给陈伯达，提出严厉质问：“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数不算数？”在曹荻秋同志主持的上海市委常委会上，不少同志还当面批评了张春桥的两面派行为。但张春桥说，他向毛主席汇报过，并得到了批准。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委只好接受了既成事实。

张春桥搞的这一手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是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给市委强加上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罪名；二是扶植了反对上海市委的力量——工总司，使它迅速扩大，成为搞乱上海的一支主要力量；三是开始为自己培植了一支以王洪文为首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帮派势力。

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先例，从此上海就出现了大量的红卫兵之外的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揪斗、炮轰、游行、集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和迫害，使上海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起来。把上海搞乱之后，张春桥借口江青要他改文章而飞回北京。等待时机，准备下手摘“桃子”。

二、赤卫队的成立和康平路事件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出现了另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群众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赤卫队成立后发展很快，据说最多时达八十万人。他们公开反对张春桥签字的五条，并给陈伯达、江青发了一份“特急电报”，说“双五条”是大毒草；要求张春桥立即回上海检查交代。

赤卫队成立伊始，就同工总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上海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上海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革会)办的《红卫兵战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革会要求把这份《红卫兵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以便“消毒”。解放日报领导经请示上海市委后，拒绝了革会的要求。于是革会决定占领报社，封闭解放日报。这一行动遭到赤卫队的反对，很多赤卫队员到报社附近游行示威，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并同革会展开了辩论。工总司闻讯立即派人支持革会。这次事件是工总司同赤卫队的第一次大较量。经过八天八夜的争斗，十二月八日，上海市委终于被迫承认了革会的“三项决定”。

十二月十八日，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徐景贤、朱永嘉等人“奉命造反”，根据张春桥的电话指示在文化广场召开了炮打上海市委大会。革会动员了八千红卫兵压阵助威，并帮助他们揪斗了陈丕显同志。工总司也派了一千五百名工人声援。当晚，“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这个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十二月二十三日，工人赤卫队召开了批判大会，强令曹荻秋同志到会，并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项要求，曹荻秋同志被迫签了字。第二天市委开会，陈丕显同志主持，批评了曹荻秋同志。会议认为不该签字，要曹荻秋同志给赤卫队做工作，妥善解决。但工作尚未来得及进行，二十五日，工总司又召开批判大会，把曹荻秋同志揪到会场，迫使他当众宣布同赤卫队签字的八条作废，赤卫队是“保皇组织”。这样，就使矛盾激化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赤卫队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一方面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解决上海问题；另一方面，调人包围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陈丕显、曹荻秋同志“算账”。到二十八日晚，包围康平路的工人赤卫队员已达到一万多人，而且还在陆续增多。这就是康平路事件的开始。

张春桥在北京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二十九日下午，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秘密派人找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头头徐景贤，传达张春桥的“紧急电话指示”：“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桃子就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派，赶紧动员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徐景贤得到这个“指示”后，立刻向王洪文等传达，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在衡山宾馆设立总指挥部，又在荣昌路六十号设立“前线指挥部”，紧急调人。到二十九日晚饭后，被调集到康平路一带的工总司一派成员已达十万人，被包围的赤卫队不到三万人。

但是，要兴师问罪总要有个罪名，于是，张春桥又同他老婆一起，给赤卫队无中生有地捏造了一个抄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事实是怎样的呢？当时身临其境并作过调查研究的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等人曾在一份材料中作了如下描写：“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爆发了康平路事件……就在二十九日夜里，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凌晨四时，劳一元、戴定宪(均为革会常委)等人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就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张的老婆李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可是到了五点多钟，张春桥打电话回家问怎么回事，他的大女儿张维维在电话中回答：‘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张春桥叫张维维让李文静听电话。一阵计议之后，李文静立即满脸杀气。天亮后，她马上改口，大叫大嚷说赤卫队抄了她的家。这样，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的政治谣言，就满城风雨地传开了。”

正如鲁迅所深刻指出过的：“只有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这正是流氓行为的模

范标本。”“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正是这样一种政治流氓。

调集了人马，又给赤卫队诬加了“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王洪文、徐景贤一伙就按照预谋大打出手，指挥了上海市的第一场大武斗。

关于这一场大武斗的简略经过，在“四人帮”上海余党炮制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中，有如下一段自供：“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事件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赤卫队是一个有数十万工人的群众组织，包括一些著名的劳动模范和大量老工人，他们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当然难于忍受。不少赤卫队员北上赴京控告，被阻于昆山。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八十多人中，七十多人是赤卫队员，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这样就造成运输无人指挥，上海铁路交通中断。从三十日凌晨到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中，停开客车二十六列，五万多旅客不能乘车，五万多旅客被阻于中途；停开货车三十八列，中途停车二十二列，货物积压数万吨，在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干部普遍受冲击，党政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一严重事件，使上海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于极度混乱。

事实充分说明，上海的混乱和危机的制造者，正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而不是别人。

三、《告全市人民书》与《紧急通告》的发表和党中央的态度

对于上海市出现的这一大动乱的局面，当时的中央领导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力求减少混乱、稳定局势的主张。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同志，指示他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告工人的思想工作，同群众组织协商，一起解决上海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并特别强调：“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另一种主张以张春桥为代表，他们极力制造混乱，以便乘乱夺权。张春桥在分析一九六六年年底上海形势时曾得意地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垮了”，“上海的桃子熟了”。

接到周总理电话指示后，陈丕显同志立即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到东湖招待所开会。在这次深夜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陈丕显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根据周总理指示，对上海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商定了一些办法，同意陈丕显同志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传单。

会后，由几位工人和红卫兵(主要执笔者是中央音乐学院到上海串连的红卫兵舒泽池)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的传单，副标题是《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转载时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初稿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完成。四日，又向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征求意见，作了修改，有十二个群众组织同意签名。后来就把它送给陈丕显同志。陈丕显同志立即签字同意，责成《文汇报》印二十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这份被“四人帮”隐藏多年的陈丕显同志签字的传单原件已经找到)。一月五日，这份传单又在《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

今天看来，这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一开头就引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话，并且宣称“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的一年”，“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个基调是根本违反事实的，站不住脚的。但是，其中也提出：“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这对于解决当时上海市面临混乱和危机又是有好处的。因此，它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上海市委努力克服生产面临

的困难，稳定局势的措施。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布后，交通运输情况经各方面的努力稍有好转，但所谓“经济主义妖风”仍刮得很厉害。一月八日，在锦江饭店又召开了一次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会大多数群众组织代表统一了意见，决定起草一个《紧急通告》，并推选红革会和联络站的代表起草，草成后又经三十二个群众组织表示同意，于一月九日在《文汇报》上发布。

陈丕显等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同意发表《紧急通知》。事后，陈丕显同志还专门给张春桥打电话，谈了这个问题。根据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当时记下的电话记录，陈丕显同志是这样说的：“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要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们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歪曲宣传，使很多人误认为这两个文件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搞的，而陈丕显同志和曹荻秋同志则是反对的。可是，事实恰恰相反。

工总司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签字的第一个群众组织，但作为工总司负责人的王洪文并不同意。王洪文虽然参加了陈丕显同志召集的会议，但却攻击这次会议“是个阴谋”，中途退场，表示抗议。起草时他没参加，签字时也找不到他，就由别的负责人代表工总司签了字。事后，这个代为签字的负责人受到王洪文的斥责。

文件起草时，张春桥和姚文元还远在北京。一月四日他们虽然到了上海，但并不知道这件事。四日晚，《文汇报》负责人打电话给市委机关联络站，说明天头版准备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请他们帮忙问问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一个当时担任联络站宣传组长的人去向姚文元请示，“姚很冷淡地说，刚回来，许多事不了解，看了也没法表示意见，登不登由他们自己决定吧”。

他们对待《紧急通告》的态度又是怎样呢？在讨论起草《紧急通告》时，通知王洪文参加，但他拒绝出席会议，还指使一些爪牙冲进会场大吵大闹，胡说什么：反对经济主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大方向错了”等等。当派人找到王洪文要他代表工总司在《紧急通告》上签字时，王公然拒绝，说：“我不同意参加签字。”张春桥、姚文元当时是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吹嘘说张姚“指导”了《紧急通告》的起草。实际上，在《紧急通告》发表后，张春桥对徐景贤等人大发脾气说：“五号刚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来一个通告？”吓得徐景贤等人“很紧张”。于是，便把代表联络站签字的朱永嘉在内部批了一顿。

一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给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个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

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谈话和中央发来贺电的消息，马上命令徐景贤等人召集各群众组织的头头，连夜到上海市委党校开会，抢在中央广播贺电之前，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贺电。接着，张春桥就无耻地美化自己，说什么，他和姚文元回上海才一个星期，上海已经发生了如何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肯定过两次。中央“给一个城市的群众组织发贺电，这是史无前例的事”，“这是对上海的最大支持”等等。还说他已给中央回电，“请中央放心”。似乎一切都不言而喻地应当记到他们的功劳簿上。王洪文更是再也绝口不谈自己如何反对两个文件，反而借口贺电是打给工总司等群众组织的，口口声声说这是中央对“我们工总司”的关怀和支持，并从此把工总司吹嘘为“毛主席亲手树立的一面红旗”。

一月十二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上海召开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又在会上大肆炫耀了一番。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象这两个文件真是他们主持搞的，一时蒙蔽了许多人。

事隔十年，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朱永嘉被迫说了几句老实话。他说：“八日的那次会议以及《紧急通告》的起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没有予闻过。如果说有关的话，陈丕显却是有一点姻缘关系，他在那里支持了群众的要求。按历史事实，陈丕显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中，是有一点功劳的。”

四、“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和夺权中的反复争斗

张春桥、姚文元急急忙忙赶回上海，目的就是要夺权。他们一月四日一下飞机，就分别找徐景贤、王承龙和工总司的几个头头密谈。张春桥说：“我和姚文元两人参加你们一起。”并煽动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一月六日，徐景贤、王洪文一伙假冒全市各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并把全市高级干部几百人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压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是经过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的，但他们却欺骗中央。明明是他们自己把大会的口号定为“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但在五日向中央汇报的简报上却说：“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张、姚一伙颠倒黑白，把当时由于他们造成的生产瘫痪、交通阻塞，以及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的混乱局面的责任，硬栽在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身上，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公开打出了夺权的旗号。大会之后，他们在全市进一步掀起了戴高帽子、游街、揪斗的恶浪，大规模地迫害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

这次大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的手里。

在搞垮各级党政机构的同时，张姚策划建立他们自己一手独霸的全市性政权组织。一月八日建立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权了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张春桥叫嚷说：“火线指挥部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他们还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市公安局，用“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全市最高机构，来代替上海市委。这些行动充分说明了他们妄图以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把上海经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基地的狂妄野心。

但是，上海市的广大群众对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工总司王洪文一伙的倒行逆施是不满的。上海的各个群众组织也并不都是甘心听凭张姚等人一手摆布的，有些群众组织想把权夺到自己手里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几番反复的争斗。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前，上海曾发生过四次夺市委、市人委权的行动，这就是一月十五日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主的夺权；一月二十三日“上三司”的再次夺权；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的夺权；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夺权。

这几次夺权行动，由于妨碍了张春桥、姚文元篡夺领导权、独霸上海的阴谋部署，因此，在他们的分化瓦解、威逼利诱和残酷镇压下都失败了。

五、“一二八”炮打张春桥和红革会被镇压

张春桥一伙在上海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不满，于是，以上海红革会为主的青年们首先行动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炮打张春桥的斗争。后来被称为“一二八炮打”。

红革会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本来就有些看法，以后又听到了关于张春桥历史问题的一些传闻，产生了怀疑；再加上“上三司”被镇压，自己夺权被反对等原因，因此，对张春桥的不满就爆发了。

一月二十六日，红革会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先搞徐景贤，抓住“材料袋”，打开突破口，再搞张春桥。一月二十七日深夜，复旦大学一批红卫兵到市委党校揪走了徐景贤。张春桥闻讯后大为恐慌，立即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悍然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当时出动了全副武装的四个摩托车排和一个步兵连，包围了复旦大学。事实证明，一贯自称“支持新生事物”、“支持学生运动”的张春桥、姚文元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用刺刀镇压学生的人。

这件事引起了红卫兵的极大愤怒。一月二十八日红革会常委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炮打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破例主动到会场会见各校红卫兵负责人。红卫兵当场质问，同张姚面对面斗争长达六个小时。当红卫兵问张春桥：“你三十年代干了什么”。“狄克是谁”的时候，张春桥面色死灰、臭汗直流。

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在复旦大学礼堂，以红革会为主，联合其他组织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并示威游行。

面对这种情况，老奸巨猾的张春桥再次要弄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他开始是调解放军镇压学生，但解放军在了解事实真象后很快撤走了。接着，一月二十九日晚，张春桥、姚文元把王洪文等一帮亲信找到衡山路一幢小楼里密议对策。之后，王洪文等人一面派人到街上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一面紧急调动人马封锁人民广场，准备冲击会场抓人，制造流血事件。继而，他伙同陈伯达、江青炮制“中央文革特急电”。一月二十八日，事件一发生，张春桥马上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歪曲事实真象，向陈伯达、江青求援。二十九日，张春桥又打电话，张打完了，姚文元又打，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陈伯达、江青等人接到张春桥的电话，立即起草了内容为：不应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张春桥；不能组织十万人的游行；要放回徐景贤的所谓“中央文革特急电”，发往上海，为张春桥解围。

有了中央文革的这份特急电报，张春桥的胆子马上壮起来了。他立即批示：“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散发。”并且公然宣称：“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

三十日晨五时，红革会得到“中央文革特急电”，又得知工总司已在调动人马，于是取消了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并释放了徐景贤。这样，这一场炮打张春桥的斗争就失败了。上海市红革会也因掀起“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而垮了台。张姚一伙对参加“一二八炮打”的青年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据初步统计，全市因参加“一二八炮打”而受到打击迫害的（不包括一般请罪、检查）达二千五百人，其中隔离审查二百多人，被办学习班的四百四十人。审查中，非刑拷打，肆意摧残，逼死五人，逼疯六人，不少人被打成残废和造成终生疾病。

六、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首先搞乱上海，然后妄加罪名，搞垮上海市委，接着又采取种种手段消灭不听话的、异己的群众组织，经过这样几个步骤之后，张春桥一伙就逐步把权抓到了自己手中。在这个基础上，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起，他们开始筹备自己的政权。

一月十九日，张春桥一伙在拼凑班子的会议上，狂妄地把他们的夺权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相比，说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叫做“一月革命”，全市政权机构可以叫做“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可以名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等等。二月初，张春桥把筹建上海领导机构的情况报告了陈伯达。这时，《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这篇社论不仅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说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

风暴正在席卷全国”。而且说：“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陈伯达将社论的内容告诉了张春桥，又告诉张春桥：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善于观风投机的张春桥马上找了十多个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提议当即获得赞同。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张春桥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旧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着上海无产阶级、广大的人民夺了权，当了政”。事实正好相反。“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上海市委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带领全市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半殖民地的旧上海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把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改造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前的上海市委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所谓的“上海人民公社”实行的却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这个所谓“上海人民公社”为首的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还有林彪死党王维国，文痞徐景贤，卖身投靠这些坏人的老干部马天水等。就是这样一批坏人掌握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他们上台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在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炮制的公社成立宣言中写道：“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他们还在“第一号通令”中公然宣布：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他们怎样对待广大干部呢？张春桥说：“对解放出来的干部，要当国民党留用人员对待。”毛主席、党中央多年培养教育出来的广大干部，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在张春桥口中，竟然成了“国民党留用人员”，这充分暴露了张春桥一伙妄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搞“改朝换代”的野心。

他们采用名目繁多的严刑酷法，残酷地折磨和摧残革命老干部，甚至把一所监狱的劳改犯全部放出去，而把大批老干部关进来，充分表现了他们封建法西斯的惨无人道。

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唯一符合事实的结论只能是：所谓上海“一月革命”不是革命风暴，而是反革命逆流；不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小撮坏人操纵利用的“群众运动”；不是革命的大联合，而是一派包办；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的新形式，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这次反革命逆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必须彻底肃清。

(原载《党史通讯》1983年第10期)

中央决定：中央各部、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毛泽东对争斗激烈的工人日报社指示：“《人民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工人日报社、北京日报社和市公安局都发生相互排斥的两个造反派组织进行夺权、抢权互斗，是北京市近来打得最厉害的几个单位。

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给清华井冈山总部，指出“反托”是错误的。2月7日，蒯大富承认错误，并作了几次检查。

2月6日

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指责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人他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豁达一些，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嘛。

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就一月末造反派群众连续冲击军事机关的公告。

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

兹将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转发你们，望参照执行。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最高指示

军队向前进 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最近，正当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实行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正当福建部队加强战备的时候，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他们违背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规定，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公布之后，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公开违抗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这是严重违犯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工具，是人民利益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保卫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的保卫者，谁违抗毛主席的命令，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内蒙流血事件发出急电。

特急电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

(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三至五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二月六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

[按] 早从 1966 年初前门饭店会议开始，乌兰夫以地方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而靠边站。文化大革命开始，群众中分裂为呼和浩特市各院校(以属于“呼三司”的内蒙师院“东方红纵队”为主)的造反派与主要是以工人与机关干部为主的对立面组织“无产者”。“三司”支持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积极批判乌兰夫的自治区书记高锦明、权星垣。“无产者”则支持与乌兰夫关系密切的王铎、王逸伦。军队介入运动后，支持“无产者”。二月五日内蒙师院红卫兵围聚内蒙军区门前静坐示威，质问军区领导黄厚、王良泰、刘昌等。师院学生韩桐当场被军官柳青用手枪击毙。“毛泽东领导的解放军打死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卫兵”(苏联新闻报导语)，激起公愤，当地形势紧张。

陈伯达与北师大附中师生座谈，提出复课问题。小学要复课，初中下学期复课，高中也打算复课，大学也在研究。现在你们太涣散了。学生中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严重。今后长征不一定搞了。“联动”是一批老红卫兵，早期有功；后来搞了一些恐怖活动。“红五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传信录 486》)

北京一、二、三红卫兵司令部负责人多次会商实现大联合，筹组“首都红代会”。本日下午，谢富治接见有关代表，表示支持，指示暂时不包括中学，因中学生中左派代表比较混乱。

2月7日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机构，必须有三结合的领导，即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革命领导干部、驻军负责人。省市夺权，不是这样三结合的，一律不承认。克服革命造反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传信录 490》)

在审改驻外使馆、代办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周恩来要求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五大”，不组织战斗队，不能夺权。

2月初

在戚本禹的积极煽动下，中国人民大学几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批朱德联络站。

湖南省军区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被逮捕者达数万人。

第十编 所谓“二月逆流”

第六十四卷 1967年2月8日至11日

2月8日

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出席者为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碰头会规定每二三天召开一次，时间是下午。会上元老派与文革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中央军委发出特急指示，要求外出串连的所属人员限时返还。

特急：

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

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

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发布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外出串连的同志，热烈响应军委号召，大部分已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但是，仍有一些同志，目前还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为切实贯彻执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军委决定：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机关、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待站，从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旅差费。凡违犯上述规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

(请各单位迅寄转发)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奉毛泽东的指令，周恩来用飞机把华东地区的省委书记江渭清等接到北京京西宾馆，以资保护。

中央军委根据八条命令，经林彪批准，作出如下决定：

1. 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的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
2. 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

周恩来、谭震林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周在讲话中说：主席批示我，各省夺权后，要一个一个地接见。并建议江苏不采用江苏人民公社的名称。
(《传信录 492》)

陈伯达在三座门接见坚持在这里要揪邱会作的二医大和总后机关造反派。他们对2月1日徐向前的讲话也表示不满。陈伯达重申，他保邱会作。(《传信录 493》)

戚本禹与清华附中及部分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要求“首先把学生集中到学校里面来”，初一、二年级可以学习点语录和毛著；高中不一定是上课，集中到学校搞文化大革命。现在，“联动”把下乡下厂当成防空洞。“他们在打你们，你们可以自卫嘛”！他还与部分教师进行座谈，表示初中要开学。一半时间学文化，一半搞革命。(《传信录 494、495》)

下午，中央统战部继续召开大会，批斗徐冰、刘述周、张经武、平杰三等。

上海市级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发布《砸烂“等级”、“职称”旧制度》的通令。此通令后被指为毒草，予以批判。

砸烂“等级”、“职称”旧制度

通令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崭新的政权机构已经产生。旧上海市委的机构已经砸烂，但刘、邓路线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依然存在，什么等级、职称都是统治和压制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工具，长期来，总是局长管处长，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群众，一级吃一级，一级压一级，“长”字头总是驾凌于党和群众之上，群众不得“离经叛道”；“长”字号讲话就是“指示”，强迫群众不折不扣执行，群众提不得半点意见，严重的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首创精神。这种旧的等级制度，是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上层建筑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培植奴隶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温床，必须立即把它砸个稀巴烂！为此，发布通令如下：

- 一、即日起：凡是“长”字称号统统取消，一律以革命同志称呼。
- 二、即日起，级别制度统统取消，工资仍按原标准发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除外）以后按中央、上海人民公社新规定执行。
- 三、上述通令望造反派战士、革命同志督促执行。

上海市市级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济南军区海陆空三军为庆祝山东省革命造反派夺权胜利，举行了大规模武装示威游行。游行中，解放军包围了保守派“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

青岛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一部分保守派分子企图反夺权，包围广播电台和报社。解放军举行大规模武装示威，以示对造反派的支持。

南昌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斗争省长方志纯大会，省委书记杨尚奎、刘俊秀陪斗。

二月初，武汉市和北京南下的部分军队内外造反派强行占据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设在那里的长江日报社，本日，在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导致武汉及湖北各地更加严重的乱揪斗之风。^①

重庆市保守派重大“8·15”宣布夺权，成立革联会，把“工人造反军”、重大“8·26”、西南师范学院“8·13”等组织打成反革命。两派冲突日炽。

2月9日

毛主席批示：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下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继续召开，徐向前为刘志坚叛徒问题对陈伯达进行质问。陈伯达坚持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批朱(德)联络站贴出海报，定于十日召开批判朱德大会。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答复：如批朱，我将来陪斗。会议因而夭折。

北京新华书店出售横排本《毛泽东选集》二十万套。

戚本禹接见沈阳音乐学院造反派，说：夺权要三结合：军队、群众、机关造反派。对劫夫（音乐家李劫夫），“我想保一下。”（《传信录 499》）

^① 武汉造反派主要有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三钢（武汉工人造反司令部即钢工总、武汉市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即钢二司、钢 9·13），保守派为武汉市革命职工联合会。

谢富治在人大会堂讲话，要求工人、农民、学生各自组织起来，然后实现大联合，组成夺权的筹备小组，由学生、干部、驻军代表参加。（《传信录 500》）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在当前大联合、大夺权中，最妨碍大联合的突出的是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山东夺权是真夺权，在干部问题上过“左”了。在三结合中第一位重要的是干部政策。当前正考虑让串连的人统统回来。（《传信录 502》）

批判薄一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

2月上旬

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作了书面批示：大意是：绝不容许右派组织肆意冲击军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作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要硬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作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可以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强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

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内部进行整风。清华园内，就“反托”和整周恩来、康生材料问题炮轰总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整风则主要是围绕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问题展开。

2月

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叶剑英讲：“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什么其他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会上群情激愤，提出要同他们辩论。叶说：“各位且熄心头之火，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艰巨的，复杂的。”必须按毛主席的部署行事，不可妄动。

2月 10 日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陈伯达、江青、康生 1 月 4 日讲话^①，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他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有事，你从来不找我。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一个批评陈、江的会。要陈、江作出检讨。陈伯达大为紧张，甚至想到自杀。“二月逆流”以后不了了之。这次会议上，毛还讲了上海夺权后还是改称革命委员会。还说了“要党，不能不要党”。又要王力写《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

《人民日报》根据毛的指示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并为此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高度赞扬“三位一体联合夺权”的经验。在第三版上又登载了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一文，并加上了按语。

^① 即 1967 年 1 月 4 日江青、陈伯达等接见湖北揪王任重代表团的讲话。

《人民日报》发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编者按语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决战时刻，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而且要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这样，才能保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把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派，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对那些受蒙蔽的群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从而把大多数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很好，可供各地参考。

周恩来、萧华接见内蒙古党委、军区、“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卫军”（“无产者”）四方代表，会商解决内蒙枪杀韩桐问题。（《传信录 503》）

陈毅接见西安造反派组织十代表说：中央要我解决西安问题。当时陈毅分工处理西北问题。（《传信录 504》）

谢富治在人大会堂讲话：外出串连的人都要回来整风、整顿思想。北京夺权又进入关键时刻，要先组成一个工农兵学的筹备小组。（《传信录 505、506》）

水电部第二次完成“全面夺权”。

张春桥在接见同济大学造反派时说：怀疑一切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过去不批评是因为当权派用这个口号来压群众。（《传信录 507》）

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口头声明，最强烈抗议大批暴徒连续四天侵扰中国驻苏大使馆。

2月 11 日

毛泽东最近指示：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

军委发布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

军以上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军级本身不含，以下同），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形势大好。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更好地支援和参加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胜利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光荣任务，把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特作如下规定：

一、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是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的这个命令，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学习讨论，认真抓好活思想，务使大家深刻认识颁发这个命令的伟大意义，提高执行命令的自觉性。凡是我军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决地捍卫，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二、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开展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

令。

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四、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修、反加紧反华，我军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因此，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五、根据古田会议和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所确定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六、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

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到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同群众紧密结合，一道闹革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凡是没有上级命令停职、罢官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守岗位，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七、在运动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要大力宣传、认真贯彻林副主席的指示，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以上规定，应立即向各级党委、全体人员传达。军委要求全体同志，认清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充分认识我军在这场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光荣任务，坚决执行上述规定，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军事管制的规定。

[按] 1月26日，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武装部队与冲击该部的造反派发生武装冲突，共死二十多人，伤近百人。中央文革称这是军队镇压造反派，军区则说是在忍无可忍情况下还击歹徒。相持不下，于是有进行军管之令。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规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不是一般的农垦部队，而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它处在边

疆和反修、反帝斗争前线，负有保卫祖国边疆的繁重战备任务。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新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同时积极搞好本身的文化大革命，使自己永远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永远保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革命部队。

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和战备的需要，决定在文化革命期间，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许干预和串连。

二、毛主席一月二十八日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八条规定，在生产建设兵团完全适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三、由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共同组成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兵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新疆军区文革小组直接领导。

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各师、团(场)、矿、企业事业单位均应成立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并受上级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四、生产建设兵团革命群众可以在本连队(车间)和团以上机关的本部(处)建制内建立文化革命群众组织，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

五、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群众组织，对本单位领导有批评、建议权，没有监督权；对某些领导干部的错误，可提出检举，经过党委调查核实，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可以越级上告，听从上级处理。

六、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大、中学校、文艺团体、科研部门和医疗单位，一律按照原建制搞好本学校、本团体、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不干预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文化大革命。

七、生产建设兵团所有革命师生、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及全体支边青年一律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在所在单位进行串连，不出外串连；有生产、工作任务的单位，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八、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凡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领导权的，应进行夺权；但事先要报上级党委、文化革命委员会批准。

生产建设兵团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有的单位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如有严重问题，可根据群众的意见，由上级党委采取改组、撤换的办法处理。已经夺了权的单位，要经过上级调查核实批准后生效。

凡群众认为是“三反”分子而要求定性、开除党籍、判刑，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

九、生产建设兵团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

十、凡夺取、盗窃枪枝、弹药的分子，按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予以逮捕。

零散和个人私存的武器，必须重新登记，统一集中保管，违者严格查究。

十一、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部队，受新疆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

十二、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所有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分。

中央发表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

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草案，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 中学(包括中等技术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斗、批、改。

(二) 从三月一日起中学生(包括毕业生)停止串连，一律回本校，一边开学一边闹革命。中学上课要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以必要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

(三) 红卫兵是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主力。红卫兵组织应该在运动中巩固和发展。红卫兵应以劳动人民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四) 中学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选举代表组成，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筹备开课。负责搞好师生生活。

(五) 不许对提出批评和揭发问题的革命学生和教职员进行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必须认真平反。

(六) 认真整顿清理教师队伍，把教职员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七) 为了加强革命纪律性，中学里在适当时机要对中学师生集中进行一次短期的军训训练。在农忙期间，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

(八) 一九六六年的高初中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也一律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复习功课。

这一文件可在全国城乡和中学中张贴。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1967年2月11日

下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继续召开。叶剑英发言，强调军队不能乱，成立各种战斗队不好。他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徐向前也说：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搞，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周恩来接见农林口五单位造反派，指出夺权以后，要在春耕前站稳阵地，抓革命，促生产。(《传信录509》)

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造反派八单位代表时说：王任重病得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下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是无政府主义。巴黎公社原则滥用就成了自由化了。(《传信录510》)

北京召开愤怒声讨苏修法西斯暴行大会，周恩来讲了话。

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对专案组工作人员指示：“审讯工作是个艺术，什么性格、手法，首先要摸清。你要攻这个地方，首先要看地形，看看对方有什么战略战术。第二要准备子弹，就是材料。第三，第一次审讯，一定要有个审讯计划，就是我们要问什么，对方会采取什么手法抵赖，我们再用什么手法攻，这一次审讯达到什么目的，子弹火力配备到什么程度。不要把所有子弹都打出去，不要企图一次把所有问题解决。要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由次要到重要的核心。”康生在谈到审讯方法时说：“有时审讯，笼统出个题目，好似不晓得，就是靠你讲。他拿不出材料来，骗你，只要你有点材料，不要发急，让他骗你，越骗得厉害越好。等

他骗完时，你说，照你这样说，你根本不晓得？你给张纸让他写，你根本不晓得，签个字。蠢家伙一签字，我拿出东西来一打，他全部解除武装，这就可以大进攻了。这是诱敌深入。有些聪明家伙，他不写，你就说我们的审讯记录是否可以签字，他逼着没办法，让他签字，然后拿出材料来……”

江青指示办一个揭露“联动”的展览。

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布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一、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维护革命秩序，坚决支持、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市的全体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应当在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二、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公安局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闹革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相结合，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彻底改造旧公安局，建立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公安局。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有义务支持和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护革命秩序。革命群众对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有意见，可以向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事代表提出；问题严重的，可以由公安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同意，邀请有关的革命群众代表参加批判；有犯罪行为、证据确凿的，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私自处理人民警察和公安人员。

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欢迎回国的留苏学生(反修战士)，抗议苏修暴行。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近日来，已有二百万人在苏联使馆前示威游行。(《传信录 511》)

首都“政法兵团”贴出长篇大字报，攻击谢富治。

第六十五卷 1967年2月12日至16日

(大闹怀仁堂)

2月12日

毛泽东召张春桥、姚文元至京，一星期中连续接见三次，就上海夺权后的名称等问题作了指示。

毛泽东指出：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

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已经这么叫了。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

这样下去，就发生了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社长？这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总得有个党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公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总不能代替党吧！还有，什么叫社员？农社里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那么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

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据我看，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

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却跟英国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还是西哈努克好一点。

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也就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能说明什么呢？

我看，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我们看来好象校长低得多，总统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

所以，名称不宜改得太多。在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名字的人要算是王莽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就像现在有人不喜欢“长”字一样。王莽还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就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王莽改了那么多地名，连自己都记不得了，闹糊涂了。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不得不把老地名写在诏书里。这么一来，使公文来往变得非常麻烦。

再如，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其实，不光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连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我看，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国务院还叫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改名字。

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不要叫公社了吧！是不是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好。

大学里的，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我看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么一来，全国只有你们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吗？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国都要叫公社，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

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发生了刚才提到的问题，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个办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

据张春桥后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的传达：张、姚还没有到机场，毛主席就问他们来了没有？机场的同志说马上就到。主席在门口等着他们。我们一到，主席就问：(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怎样？他们来这里告你们的状。

一、三结合问题，主席讲：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毛主席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部长都撤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长，叫勤务员，叫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有长的。主席说：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改变”，就是反动口号。

二、关于上海人民公社，毛主席说：(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主席说：(上海)人民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抓人前门进，后门出。主席说：学校的权力机构可为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三、关于中央文革紧急指示(指一月三十日就炮轰张春桥问题给上海红革会的电报)主席说：我看了，写得很好，有造反派的气派。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措施”。这一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抓人。

四、有几笔账以后还要算：

1. 市人委机关向总理的勒令；
2. 红革会问题；
3. 广革会反对电台军管；
4. 龙华机场反对军管。

五、其他：

1. 现在用得很多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是主席 1920 年讲的，自己也记不住了，以后不要用了。

2. 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 主席问：同济大学的学生是否还在车站码头？张春桥同志回答：还在。主席又问：你们来的时候是否还在？张答：还在。主席说：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真正结合，现在才是真正结合了。

4.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了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现在我们的斗争方式要高明一些，不要、不能老是“砸狗头”，“打倒某某某。”我看大学生应该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

5. 文艺界也要回原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

6. 《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对斗争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张春桥说：《文汇报》压力很大。主席说：要支持他们。（原件注：二月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的传达，不是主席的原话，仅供参考。）

二、三、四月份是夺权的决战时刻。当前有四大任务：(1)夺权；(2)抓革命、促生产；(3)镇反；(4)内部整风(整思想、整作风、整组织)

改成什么员，如政治委员，也是在发号施令么！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他连这句口号都不怀疑，对自己就不怀疑？

要搞三结合，对于革命的领导干部不结合要犯大错误，要走到反面去……。你们当院长总要了解一些业务。市一级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军队组织。区一级是机关干部、武装部、群众组织。工厂是厂一级，有行政干部、技术干部、工人的革命造反群众组织，有年轻工人，年老工人，民兵……。

《论共产党修养》是欺人之谈，对资产阶级有利，要好好批判。（据传单）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取缔全国性的组织。

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 中发(67)47号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和各地出现了许多所谓全国性组织，它们都不是自下而上地在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合在一起组成的。其中，还有极少数组织是由地、富、反、坏右分子搞起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一、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它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单位参加运动。

二、这些组织以各种名义冒领的公款，应一律由批款单位如数追回。在本通告下达前，已经花掉的款项必须开列清单，由批款单位进行审查，购买的实物，除已经消耗的以外，也应一律追回。本通告下达后，领到的款项，不准动用。如有携款逃匿者，追查法办。

三、这些组织，如发现有反革命活动，其成员必须向公安部门揭发报告，由公安部门负责审查处理。

特此通告。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党员党籍处理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党籍处理问题的通知

各级党委、各级军区党委：

最近，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或群众组织按照某些群众的要求，开除了一些党员的党籍，有的还当场烧毁了入党志愿书等档案材料。对此，中央认为：

一、除了逮捕法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该立即开除党籍外，一般党员的党籍处理，应该放在运动后期进行。

二、按照党章规定，党员的处分，必须由党组织执行，群众及其组织，无权对党员进行党纪处分。

三、有关党员的入党申请书等档案材料，不得烧毁。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国务院、军委发布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回原校、原机关进行检讨的规定。

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回原校、机关检讨的规定

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命令指出：“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鉴于军队参加地方学校、机关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成员，长期离开岗位，使某些单位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在工作组中的缺点或错误，大都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因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为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部队的文化大革命，特规定：

(一) 军队回到地方学校、机关作检查的工作组的所有成员，各单位要在三、五日内让他们回到原工作岗位。

(二) 组长以上的成员，如犯有严重错误，革命群众要求必须再行检查，要同全军文革办公室接洽，经过协商一致，可以回去检查，但检查之后应使其随时返回。不允许各单位到军队随意抓人。

(三) 回去检查要在军事勤务以外的时间进行。如有重要事务，经过协商，时间可予推迟。

(四) 对于回去作检查的成员，不允许扒领章、帽徽，不允许变相体罚。

(五) 普通队员一律不回去检查。分组长如无严重错误，也一律不再回去检查。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周恩来办公室电告内蒙四方，分别作好家里的工作，停止武斗，不要使事态扩大。

傅崇碧、李震在北京卫戍区、公安部及首都各造反派代表座谈会上讲话：各地正在夺权，有些单位一个晚上夺了七个部的权。光夺了印，这不算夺权。左派在夺权中打架，乱抓人。今后抓来我们也不收。(《传信录 513》)

“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在工人体育馆举行“揪斗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誓师大会”，并发出了《呼吁书》，呼吁掀起一个批陶的新高潮，同时决定组成“揪陶兵团”，在会后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揪斗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旬”，声称要把陶铸及其死党一个个揪出来示众，把他们统统斗倒、斗垮、斗臭！从2月13日至21日，被视为陶铸黑爪牙的熊复、张际春、萧望东、钱信忠、何伟、刘皑凤、刘祖春、孙正、张孟旭、丁莱夫、张子意等一一被批斗。

在天安门、中南海、八大学院等处开辟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滔天罪

行专栏”。

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讲话：“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重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的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

上海造反工人组织正式分裂，“一兵团”发起反“工总司”大游行。

2月13日

周恩来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时说：运动“还有半年，延长不延长不一定。据形势可能延长。因为斗争会有反复，别害怕。问题是党政干部亮相太少。”（《传信录515》）

周恩来电话指示，对贺龙不能抄家，其所有文件交军委办公厅。

戚本禹在接见红代会筹备人员时说：蒯大富打托派是错误的。不能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传信录517》）

《北京日报》复刊。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2月14日

毛泽东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必须注意西安交大极“左”派。

送林彪、恩来同志：

排斥交大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

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是不破坏工厂的，请酌。

此件恩来看完送林彪同志。

毛泽东

1967 2·14

根据毛泽东 10 日指示，中央文革开会对陈伯达、江青进行批评。江青以病假缺席。张、姚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想干什么？”

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新华通讯社问题的六点通知：

1. 新华社是党中央领导的宣传机构，不得由社内外的革命群众组织接管。领导机构和人员的调整，要由党中央决定或批准。
2. 新华社已经建立的监督小组要切实加以改进，这个问题应由社内的革命群众协商解决，在没有妥善解决之前，都不要进驻社长办公室。
3. 主持新华社常务工作的社长王唯真同志有职有权。
4. 立即成立临时工作小组，由六人组成，协助王唯真同志工作。
5. 一切工作同志都要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抓革命促生产，保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
6. 关于规章制度问题可以批评、批判、提出改革建议，但要上级领导机关批准才能执行。

中央文革小组

1967 2·14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规定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要经中央批准。

陈毅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说：北京市发生了一个问题，现在监督者想把权扩大。外交部和外办只能搞监督权，不能包办代替业务。有的过一个时期，经验不成熟，还可能取消监督权。（《传信录 518》）

李富春在团中央讲话：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十七年来，他实际上是反毛主席的。共青团的前途，中央没有定。一个方案是红卫兵代替共青团，一个方案是红卫兵加入共青团。（《传信录 519》）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阎长贵向南开大学“8·18 红色造反团”传达首长指示：“柯庆施同志是个好同志，华北一批人叛变自首问题，柯庆施同志没有责任，不要对柯庆施同志采取任何不好的措施。”

晚，王力对北大、北师大、人大五十名学生（受聘为《红旗》杂志通讯员）谈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大批优秀人物，将来国家的命运是要交给他们，都要靠他们，但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还要有个过程。叫带“长”字的都靠边站不行。对于一些犯错误的干部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去做。毛主席的这条路线是和王明路线相对立的，王明对犯错误的干部都是打倒、推倒，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又说：你们是经过挑选的，但还要在斗争中考验。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大联合、大夺权。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夺权中只要有一个领导干部参加就说是保守派，是错误的。《红旗》第三期社论中原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主席指示，后半句不要了。（《传信录 520》）

[按] 不再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表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不属清算范围，意在争取广大中下级领导干部。但是这一批人早已受够冲击而靠边站，造反派又抓住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肯放松，同时造反派又分裂成不同的派别。这些干部凡是亲近甲派、受它所支持的，必然受乙派的忌恨而千方百计进行打击。大联合不成，三结合无望，故自夺权以后，全国各级组织皆长期处在派性的混战之中。

北京二万余名小学师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小学革命师生打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革委会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在新省委建立以前，行使贵州省的党、政、财、文各种大权。

青海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对《青海日报》实行军事管制。“8·18 红卫战斗队”拒不退出，发生冲突。叶剑英指示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对胆敢无视《军委八条》者严加惩处。林彪办公室亦指示可以反击。

2月15日

据周恩来2月17日在接见财贸各部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中说：“前天(即15日)，我们党的会议确定不用这句话(指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了。你们看以后的文件就没有这句话了，不赞成这个扩大化。”

周恩来接见贵州造反派赴京代表，说：你们的文件二十七日送给我，二十八就送给了主席。主席对你们所提对待干部，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是调、留、提的意见很欣赏。现在说中国就是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夺权已呈连锁反应，左派不夺，右派、保守派也要夺。右派、保守派夺了，我们解放军要帮助夺回来。(《传信录521》)

谢富治与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代表座谈北京市夺权问题。北京现在是第二次夺权。他提出：全国性的组织在北京一概取消，下一步撤消各地在京所设联络站。北京也不要到外地设联络站。北京夺权将不用“公社”的称呼，倾向定名革命委员会。(《传信录522》)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拥护“文革”的外国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聚会，他们给毛发了致敬电，要求取消对他们及其子女的特殊待遇，并和中国人民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后游行，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

2月16日

周恩来主持的碰头会继续召开。**原定议程是经济问题，由于几位副总理从李富春那里得知毛有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谭震林当即责问张春桥：**陈丕显是否已接到北京来？张以群众不答应为由推卸。谭怒斥张：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是你干的。会上，谭震林指责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忿然欲离会。会上元老派和文革派发生激烈争执。此即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被指为“二月逆流”。李富春则一言未发。

当夜，康生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了碰头会议记录。江青写了条子：“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毛泽东立即召见张、姚，听取了汇报。江青与王力亲往林彪处汇报。林彪的答复只是“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陈伯达是个书生”两句话。

《大动乱的年代》：2月16日下午，在怀仁堂会议上进行了一次更为尖锐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下面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和核对”的这次会议的记录《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详细摘引：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抓革命，促生产”。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不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

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陈毅同志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第209—211页)

徐向前《在文化大革命中》：谭震林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来，让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谭回来^①。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谭震林才没有退出会场。接着，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总理当时都挨过整。还说：“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江青汇报，炮制了份黑材料，向毛主席告我们的状。我后来听说：毛主席开始听了，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当听到十六日陈毅同志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后来还说什么？那就叫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去。(《元戎蒙难记》第14—15页)

中央发布关于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告。

关于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告

一、国务院工交各部直属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的试点，是经过党中央、军委、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是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各试点单位，应积极做好整编试点工作。

二、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和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两次命令进行。由于基本建设工程兵不是作战部队，因此，除了进行正面教育以外，也应当在本单位党委领导下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三、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担负着国防和重点工程的施工任务，这是关系到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抢时间、争速度的大事情，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和随军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夺取

^① 周当时说，“太放肆了，给我回来！”

革命和建设的双胜利，并注意保守国家机密。

四、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斗争锋芒应针对原来企业的领导干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刚从解放军调来的干部，应当安心工作，切实领会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精神，认真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对本身的缺点、错误，主动检查，接受群众批评，做出好样子。

五、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已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部队连以上的主要骨干又大部分来自解放军。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采取撤换调离的办法，一般不搞群众性的夺权。

六、由于基本建设工程兵的兵种机构和纵队领导机关尚未建立，国务院工交部门的有关各部必须加强对各支队、大队的领导，认真负责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七、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坏人乘机攻击和诋毁解放军，挑拨官兵关系，破坏基本建设工程兵整编工作。

这一通告可在有关部门、地方和基本建设工程兵部队单位宣读、张贴。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

军委发布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对军队内部的夺权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

如果领导权确是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持收回。夺权后，对于犯有错误的原有领导干部，应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一棍子打死的风，万万不能长，一犯错误就一脚踢开，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不能把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人当作夺权的对象。

(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夺权，必须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必须是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和革命的群众三结合。必须是通过充分酝酿协商、条件成熟，经过上级批准后，才能夺权。不能搞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在夺权斗争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绝不能武斗。对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和个人，不能采取排斥、打击、压制和歧视。夺权单位，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保证既搞好文化大革命，又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三)各学院学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这些分队的指挥权，应按军委二月八日的规定移交各驻地军区或部队。

(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它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群众对这些单位的党委和领导干部有意见，可以充分鸣放。党委成员个别不行的，

个别撤换，大部分不行的，进行改组，但均须报请上级批准。在本规定之前，凡规定不应夺权的单位而夺了权的，可由上级机关、革命群众组织和本单位领导三方面协商解决，把权交回。

以上规定，望全军指战员、学院学校师生员工、文艺团体、医院和军事工厂的全体同志，切实遵照执行。

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萧华、曾山参加。周说：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杭州也是这样。长沙冲了，占了军区大楼，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要抓陈锡联同志，还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萧主任(华)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周恩来指示，从十八日零时起，两派停止对骂、对打、抓人，不开群众大会，不搞游行示威，以防止事态扩大。(《传信录 523》)

周恩来关于内蒙问题的四点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

总理二月十六日晚第二次接见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红卫军四方面代表时指示，对内蒙当前事态处理的总的精神是：要从大局出发；事态急需立即坚决平息下来，听候中央处理。具体提出四点指示：

一、停止对骂。大、小报纸停印几天，要出可以转载人民日报文章；对骂的传单、标语，一律不准再出；广播车、广播站一律不准对骂。

二、停止对打。

三、停止抓人。

四、不开群众大会，不搞示威游行(包括武装游行)。

以上四点从十八日零时起生效，如再有违反者要追查肇事者。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说，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又胜利了。(《传信录 524》)

陈毅接见留学生代表时说：现在动不动炮轰、打倒，这不是瞎胡闹吗？有些人，作风不正派，踩着别人上去，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2月 16 日、3月 16 日

《新北大》上连续刊出批判刘白羽所撰《朱德将军传》一书的文章：《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二文。

第六十六卷 1967年2月17日

2月17日

康生单独晋见毛泽东，就怀仁堂会议情况进行汇报，张、姚整成记录，上报毛泽东。

谭震林致信林彪，就碰头会上所发生的争论继续抗辩，表示要继续斗下去，拼下去，下定决心，准备牺牲。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人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了某某，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某某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复说过要保的，无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算，因为这样太露骨了，又来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巨大损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对于丑化党的行为，对于老干部倒下去这样子，他们一言不发。少了几吨鱼，就如此大发雷霆，就可以看出他们喜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作检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布礼

谭震林

二月十七日

[附] 《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

——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摘录)
《人民日报》记者 纪希晨

《人民日报》编者按：一九六七年春天，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炮制的迫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其目的是打倒当时抵制他们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进而打倒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架空毛泽东同志，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斗争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英勇捍卫马克思主义

原则和党的传统。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坚持原则，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党中央最近再次郑重宣布不存在什么“二月逆流”，而是“二月正流”。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本报特组织了这篇报道。

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叶剑英等同志就同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路线分歧。双方多次的斗争，都集中在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应不应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等革谁的命、靠谁革命的问题上。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会议达到了高潮。

林彪、“四人帮”一伙，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的这场保卫党的原则的斗争，污蔑为所谓“二月逆流”，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党全军全国的大冤案。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掀起了一股反击“二月逆流”的妖风，造成了极大的恶果。

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彻底失败以后，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剑英同志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同志就对大家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讲过：“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就已为“二月逆流”翻了案、平了反。但是，林彪、“四人帮”一直掩盖着历史的真相。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顾这段历史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的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有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展开了尖锐争论。

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了公然破坏党中央制定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许多事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广大群众迅猛起来了。为了达到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目的，八月十三日，林彪以“副统帅”姿态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公然破坏《十六条》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估计，篡改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另立所谓三条标准，凡他认为不符条件者，一条“罢官”，二条“罢官”，三条还是“罢官”。八月十八日，他又在百万大会上，叫嚣要“四个打倒”，要“大破一切”，“改革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他鼓吹什么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号召打倒“走资派”和“反动权威”，进一步煽动大乱，把“罢官”、“横扫”、“火烧”之风刮遍全国！

北京市委和各省、市委连遭冲击之后，大批干部被扣上“走资派”、“反革命”帽子打倒了。

邓小平同志等党中央、国务院，军队的许多领导干部，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了，“公检法”被砸烂了，国家机构开始瘫痪了。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续遭到冲击。林彪、“四人帮”一伙一股劲地煽风点火，造谣诬蔑，狂叫有“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妄图毁我长城。

功在祖国的贺龙同志，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就被林彪一伙造谣诬蔑，接着全家被抄，妻子儿女离散、流落了。与此同时，在陈伯达、戚本禹操纵煽动下，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掀起

了炮轰聂荣臻同志的浪潮。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也遭到恶毒攻击。在外事口，他们集中攻击陈毅同志，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煽动群众冲垮军队，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唆使军事院校学生要求开十万人大会，批判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一月十九日，陈伯达诬蔑“军队资产阶级化”了。各个大军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无不遭到冲击。

就在这时，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被林彪、陈伯达、江青突然袭击，一月四日被点名诬陷打倒了。这是怎么回事？谭震林、李先念、陈毅等同志去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富春同志也不清楚，回答说：“不知道，没有讨论”。

这时，全国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国家经济生活引起严重混乱。周恩来同志不能不出来过问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他就指示谷牧同志立即起草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要求工厂不要停产闹革命，红卫兵不要到工厂串连。但是，这个指示还没有发出，立即遭到林彪一伙的围攻，谷牧同志被批了三天。在一次会上，林彪叫嚷，工交战线比文教战线更坏，必须“彻头彻尾地打破旧的东西”，坚持要在工交战线大串连，造成许多地方“停产闹革命”的严重形势。首先，国务院有关的部长和主管生产的国家计委几位副主任，都被揪斗了。王震同志等也被斗了。“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一只胳膊了。”这是指在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在漫天风雪中踏遍大庆油田的余秋里同志。

周恩来同志象中流砥柱，巍然矗立在险风恶浪中间。周总理挺身保护被揪斗的老同志。他把贺龙同志一家接到自己家中，他煞费苦心地把一些老同志安排到中南海居住，使他们在冲击中得到短暂的休息。他看到煤炭部长张霖之同志被鞭打致死的照片时，悲愤地说：“这些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呵！”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操纵下，上海爆发了“夺权”黑风。接着，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省市，以及中央、国务院的各部也相继发生夺权。这时毛泽东同志发出警告，指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可是，这些整天喊“高举”“句句是真理”的人，根本不理会这些，仍然大肆宣扬“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竟然向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严禁夺权的外交部、财政部发动了夺权。

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同志来到李富春同志的住处。他们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十分义愤地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师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把毛主席架空了，国家就要大乱了。半个世纪千百万人民大众，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大乱了。这不能不引起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打天下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警觉和忧虑！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师，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一场面对面的生死搏斗

二月中旬怀仁堂会议，双方斗争发展到白热化。后来所传的所谓“大闹怀仁堂”，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伙反党阴谋家、野心家进行的搏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的碰头会，象往日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一边坐着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同志；另一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两军对阵，十分鲜明。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无限焦虑的老帅，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在这以前，徐向前同志曾因他们凭空捏造刘志坚同志是“叛徒”，顶过陈伯达。徐向前同志说：

“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不了解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质问他们：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同志幽默地嘲弄陈伯达：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为了稳定军队，在这以前，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致意见是，无论如何都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叶剑英、聂荣臻同志一同去找林彪，指出：军队要搞个法，要搞个命令，要有限制，不能把军队搞乱。于是，中央军委向部队发了指示，军队不能搞大民主，不能成立战斗队，不能搞串连。

但是林彪利用他窃取的权力，主持召开了一次军委常委会。他横蛮地提出要在军队全面搞大民主。参加会议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异口同声地同他辩论：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了，你国防部长靠什么？

经过争论，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大民主，军事院校可以搞，但不准串连。这样，军委搞了八条命令，送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自找了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详细进行研究，认为八条命令很好，一月二十八日，批准照发，以稳定军队。

斗争更加尖锐化。就在传达经毛泽东同志审查批准的军委八条命令的会议上，关锋仍在诬蔑解放军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当即遭到叶剑英等同志的痛斥。他们指出，由党领导和培养的解放军，战胜了民主革命的敌人，也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人。谁要想搞垮解放军，必定粉身碎骨！

但是在林彪一伙煽动下，八条命令以后，冲击军队的事，仍然连续发生。听到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被抄家，机密文件被盗劫时，叶剑英同志在京西宾馆激怒地用拳头敲着桌子，警告想要搞乱军队的野心家说，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徐向前同志也愤然站起。他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他气怒之下，一把掀倒跟前的桌子，真是义愤冲天。

就这样，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怀着无产阶级的怒火，来到碰头会上，点燃了怀仁堂的斗争。

斗争在继续着。三天之后……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同志问他：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同志所以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张春桥听了，狡猾地说：

“群众不答应呵！”

“群众？”谭震林同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张春桥说：“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的多轻巧！千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一股怒火在谭震林同志胸中燃烧

着，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

“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谭震林同志一进屋，就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林彪、“四人帮”惯于打着“群众”的招牌，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假借“群众”之手，实行他们的罪恶阴谋。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故意刁难推脱，马上打断他的话：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同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穿衣服，拿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陈毅同志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

“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那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工作？”

看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余秋里同志拍案大声疾呼：“许多干部被揪来斗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那样干法，我就不去！”

一个事后证明早已倒向林彪、“四人帮”的公检法负责人插话辩解。

“你不要和稀泥！”

李先念同志也愤怒地谴责林彪一伙破坏党的传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西斯罪行：

“我们党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残酷斗争和凌辱，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当那个公检法负责人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驳斥他：

“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理论权威”：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那个顾问回答：“我没有看！”

周恩来同志气愤地说：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聂荣臻同志对林彪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成是什么“联动”，是保守反动分子，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有的还关押起来的情况，十分气愤。他说：

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在中央碰头会上，我们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就这样同一伙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进行英勇战斗。老将们铿锵、锋利的语言，剔肤见骨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罪恶，伸张了革命的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和控诉！

顶着惊涛骇浪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林彪、陈伯达一伙一连对李富春、陈毅等同志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其中数那个“理论权威”和那个公检法负责人叫嚣得最凶。他们恶毒诬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叫嚷什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各种帽子、棍子一齐飞来。什么“俱乐部”呀，什么“黑干将”呀，什么“联络员”呀。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几个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那位中央文革顾问，因此就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同志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

“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三月十八日，陈毅同志回到家里，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真是巧合！四十一年前，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四千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四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了。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合法的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而且被批斗了。在组织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用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逐步实现了他们的夺权阴谋。

他们并不满足。在社会上规模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谭震林同志曾写信给中央揭发江青，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她提高警惕。江青听了暴跳如雷，对谭震林同志等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后快。她立即叫戚本禹和谭厚兰密谋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三月八日前后，相继制造了冲击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大学大庆展览的事件。

三月十四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在极其复杂的局面中，王震同志等坚决保护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广大群众同林彪、“四人帮”一伙掀起的黑风恶浪展开斗争。

一九六七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叶剑英、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同志登上天安门，检阅游行。五月四日，陈伯达、戚本禹亲自窜到北师大，向谭厚兰等煽动说：“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他们嘛！”“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办嘛！”果然，他们就把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的决定，当作所谓“五月妖风”来反，使已经混乱的形势，变得更加混乱！

七、八月，在江青、陈伯达策划下，王力、戚本禹直接指挥国务院各口“造反派”，建立“摧资联委”和“揪刘火线指挥部”，动员二十万人，对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展开围困战。他们妄图下毒手，劫持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夺“旧国务院的大权”，街头上公开出现了

反对周恩来同志的大字报和标语、传单。直到毛泽东同志察觉了这一罪恶阴谋，他们的企图才未能实现。

七月十五日，“批陈联络站”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周恩来同志多次指示要他们撤出。那个公检法负责人却几次窜到那儿煽动：“小将们，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陈毅同志到飞机场接待外宾，痛斥那些阴谋篡夺外交大权的野心分子：“你们是两面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不能把权交给你们！”他们更加猖狂揪斗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在大小会议上被批斗六次。周恩来同志旗帜鲜明地保护陈毅同志。八月初，一次会上，有人公然对抗周总理指示，在会场挂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总理站在灼人的阳光下，坚持不进会场，直到他们灰溜溜地把标语摘下，才同意开会。八月十一日大会上，他们搞突然袭击，甚至窜上主席台揪斗陈毅同志。周总理指示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并愤然退场。八月十五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大会。那个公检法负责人操纵大会，一心要搞臭陈毅同志。周恩来同志批评他：“搞臭了陈毅同志谁来当外交部长？你来当外交部长？”八月二十七日凌晨，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的周恩来同志，又遭到一伙人的长时间围攻，以致心脏病复发。可是，他们却不听劝阻，扬言要拦截汽车，坚持要冲击陈毅同志。周恩来同志万分气愤地警告他们：

“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

八月十九日，人民大会堂进行批斗谭震林同志的大会。会上周恩来同志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谭震林同志。会中，周恩来同志临时离开会场，“四人帮”在卫生部的女黑干将，乘机扑上台，劈面打了谭震林同志两个耳光。接着，就有三个大汉，一跃上台，将谭震林同志架起喷气式，一阵拳打脚踢，把谭震林同志打倒在地，然后在他腰背上踏上两只脚！

对这种错误作法，李先念同志当场抗议：“周总理事先跟你们是有协议的，可以批判，但不能武斗。你们这样搞，我就退出会场！”

一九六八年三、四月，是陈伯达所说的反击“二月逆流”的“决战的第五回合”。江青在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上，妄加罪名，宣布谭震林同志是“大叛徒”。同时还宣布杨成武、傅崇碧等为“二月逆流”翻案，撤销他们的职务，逮捕了余立金同志，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夺取的权力。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唐太宗诗)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林彪、“四人帮”杀人之心不死。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把除谭震林同志外的六个老同志，分割开来，每人专门成立一个小组，不断地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聂荣臻同志曾到一些政治局委员那里交换工作意见，林彪、“四人帮”一伙就诬陷他们是“反党集团”，监视行动。有人甚至拿出聂荣臻的活动登记，逼他承认。聂荣臻同志当场痛斥这种法西斯罪行：

“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吗？就不能相互商量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搞的是什么？是特务！”

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同志，每日带着病弱的身体，出席会议，有时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准许。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副总理和老帅们，只能在会议间隙时间稍事休息。会上，他们抓不住老帅们什么问题，就凭空诬陷叶剑英、聂荣臻同志是什么所谓“杨余傅事件”的黑后台。

聂荣臻同志去问林彪：是怎么回事？林彪狡辩说：没有点名嘛。

聂荣臻同志很气愤地说：

“你没有点名比点名还坏。我宁可受明枪，不愿遭暗箭！”

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林彪、“四人帮”为继续迫害老帅，又编造谎言，埋下伏笔，突然把闭幕了几天的一期“会议简报”发了下来。“简报”不仅莫须有地诬陷徐向前同志的爱人、聂荣臻同志的爱人是“叛徒、特务”，而且故意披露，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同志由延安来到华北，暂住阜平县陈南庄军区司令部时，驻地遭到国民党飞机的扫射轰炸。这件事，后来在解放大同、保定时，从敌伪档案里查清，是司令部的一个内奸作案引起的。在罪证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的情况下，经过正式审判，把这个内奸枪毙了。这期由江青发言的“简报”，竟血口喷人，说聂荣臻同志是杀人灭口，意思是说，聂荣臻同志当时要蓄意谋害毛泽东同志，真是恶毒至极！

他们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故意制造借口，诬陷当时在山西、河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妄图给他们戴上勾结敌人的帽子，置之于死地。

徐向前同志先后被抄家三次。家中的文件、书信，甚至连作战日记也都抢劫一空。可是他们一根稻草也没有捞到。他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活中的忘我战斗。徐向前同志和战友们同无数先烈一起，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鲜红的战旗。他说：“我们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错误也犯了不少，但是我们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问心无愧！”

林彪一伙通过所谓疏散，对老帅们进行精神折磨，“围而待歼”。被批斗的几位老帅，一家老少全都分散各地，不能互通音信。聂荣臻同志的爱人，被别有用心地安排到靠近边境的吉林草原上的一个五七学校里去劳动。

战争年代，曾长期在大别山区和中原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李先念同志，一九四六年奉中央命令，率部向北突围。林彪、“四人帮”竟制造谣言说他是“大叛徒头子”。当即遭到参加领导突围的王震、王树声等同志的有力反驳。他们用大量确凿的证据，驳斥了诬陷，保护了李先念同志。王震同志等拿出当时突围作战的会议记录说，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怎么能允许颠倒呵！

林彪一伙把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叶剑英同志视作他们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千方百计要打倒。一次中央会议上，叛徒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同志“要搞政变”！

那个“理论权威”马上接着说：“我对徐向前、陈毅也有意见！”诬陷老帅们要“搞政变”。叶剑英同志当场反击他们：

“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站在毛主席一边，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会后不久，他们公然违抗党规国法，派人抄了叶剑英同志的家，还挖开了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戚本禹讲话当天下午，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斩断叶剑英伸向文艺界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同志的五个子女及其亲戚、保姆拘捕，分别关押一年到四年。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先后被冲击、批斗和疏散的日子里，他们尽管陷囹圄，但始终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充满高昂的斗争精神。

那时，国内外大事，几乎全靠敬爱的周总理操劳处理。从夜晚到黎明，从日出到黄昏，他关心着祖国各条战线的问题。从生活必需的油米柴盐，到遨游宇宙的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的山寨，到深更半夜接见外宾，日理万机！他的身体一天天瘦弱了。有一天，一个烈士子弟前来探望总理，他恳求总理为全国人民保重身体。总理听了，在黄昏的庭院里，停下脚步，两道浓眉下，闪光炯炯目光，深情地望着这个同志，激动地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同林彪、“四人帮”搏斗的暴风

骤雨里所表现的崇高品质。他们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附] 所谓“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摘录）

宋琼 孙浩刚 邵一海

一

林彪一伙炮制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主要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同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关戚”一伙，所进行的几次面对面的激烈斗争。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发生在一九六七年的早春，决不是偶然的。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后，长期隐蔽在我们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纷纷趁机跳了出来。经过一番谋划、勾结、招降纳叛之后，很快形成了以林彪为头子和以江青为头面人物的篡党窃国的反党集团，他们用革命油彩在自己脸上涂抹打扮以后，互相提携着登上了政治舞台。于是，在我国阳光普照的晴朗天空，出现了乌云，刮起阵阵反革命政治台风。

林彪、“四人帮”这两个阴谋集团，一开始就是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他们悉心研究古今中外一切反动阶级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巧妙地袭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新老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党手段，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卑鄙地炫耀、渲染并利用某种特殊地位，自封为“高举更高举”的“革命家”，“最忠最忠”的“左派”，各树山头，互相吹捧，紧密勾结，互为利用，进行篡党窃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打着“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之类蛊惑人心的口号，公然叫嚣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他们网罗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新老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打砸抢者，作他们的基本力量，拼命煽动一些人的极“左”狂热，鼓吹“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向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进行全面冲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清华大学西操场，江青、姚文元气势汹汹地狂叫：“在一九六七年我们将在各个战线发动全面的总进攻！”果然，随着一九六七年的到来，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煽起并操纵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反动逆流，更加猖獗。在这股逆流冲击下，党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以及全国各地省市委许多党政机关瘫痪了，许多工厂企业停工停产了，广大农村地区一片片动乱起来，并且开始冲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人民解放军，严重地威胁着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中央政治局。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回顾一下一九六七年初那些惊天动地的日子，看看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出现了一幅多么触目惊心的情景：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林彪死党邱会作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和陈毅同志发起进攻，策划要在一月五日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出现了攻击聂荣臻和徐向前同志的标语、传单。

一月四日下午，陈伯达、江青等人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对陶铸同志搞突然袭击，诬陷陶铸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新的代表人物”。刹时间，“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同一天，江青又大闹政治局，恶毒攻击贺龙同志是“坏人”，“要把贺龙端出来”。

一月七日至九日，林彪、“四人帮”操纵几个坏人煽动受蒙蔽的群众，多次包围中南海，要揪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和谭震林同志。在北京的大街上，连续出现要打倒周恩来同志的大标语，还有包含林彪辱骂朱德同志等内容的传单。

在这同时，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又在上海刮起了反革命的一月黑风。一九六六年底，他们就煽动群众“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通过处理“安亭事件”，制造“康平路事件”，使上海市委和各级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这时，张春桥认为“上海的桃子熟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窜回上海，在他们的策划和操纵下，党在《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领导权相继被篡夺。一月六日，他们假借全市各造反组织的

名义，召开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并把全市几百名局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使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同时，他们在背地里策划建立全市性的政权组织，张春桥还授意他们的御用组织贴出“拥护张春桥当市委第一书记”的大标语，不久便篡夺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张春桥得意忘形地嚎叫：“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我们上海革命任务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

从上海刮起的夺权黑风，是一股真正的“一月逆流”。这股逆流很快冲到山西，冲到青岛，冲到贵州，冲到黑龙江，冲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祖国的天空，乌云滚滚；祖国的大地，浊浪滔滔。那些被林彪、“四人帮”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和单位，无产阶级专政正在逐渐演变为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正面临着被一小撮阴谋家颠覆的严重危险。

二

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给人民带来深深重灾难，不可避免地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和各种方式的抵制、斗争。“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战斗了几十年，曾为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一九六七年早春，表现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和军委常委会上的斗争，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坚持马列主义的老一辈革命家为一方，以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为另一方，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场斗争首先是从军队的问题展开的。

搞乱军队，还是稳定军队，在这个问题上，几位老帅同林彪一伙存在着根本分歧。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为了达到乱中篡权的目的，千方百计要把军队搞乱。几位老帅认为，军队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神圣使命，一定要保持稳定。针对林彪一伙煽动群众搞乱军队的阴谋，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中央发了文件，规定不准冲击军事机关。

林彪一伙并不死心。一月十日，江青、王力、关锋伙同林彪，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林彪还提出了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在他们的策划、操纵和煽动下，我军威震中外的总司令朱德同志受到了恶毒攻击。当时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同志受到卑鄙的诬陷，许多同贺龙同志一道工作过的军队负责人被揪斗。从总部到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

为了顶住林彪、“四人帮”搞乱军队的阴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召开了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稳定军队的问题。向部队发出了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的通知。不久，林彪利用自己窃据的地位，再次召开军委常委会议，蛮横地提出要部队全面搞“四大”。会上，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坚决反对，严词责问林彪：“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了，你国防部长靠什么！”两种意见坚持不下。最后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四大”，军事院校可以搞“四大”，但不得串连。根据这个精神，拟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送请毛主席审定。毛主席亲自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请去，详细进行了研究，认为很好，同意照发，并强调了不要搞喷气式，不戴高帽子。这对林彪、“四人帮”要搞乱军队的反革命阴谋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们反党乱军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的碰头会上，老帅们再次同林彪一伙进行了斗争。叶剑英同志指着陈伯达，毫不留情地质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问得陈伯达瞠目结舌，支吾半天，说不出名堂。这时，徐向前同志也拍着桌子，责问陈伯达：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这时，坐在陈伯达旁边的那位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的“理论家”，竟气急败坏地对老帅进行人身攻击，叫嚷道：“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接着，叶剑英同志责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

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同志并且辛辣地讽刺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过了三天，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在怀仁堂举行的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上，又进行了一次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这就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诬指为“二月逆流”的主要事件——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当天晚上，惯于“恶人先告状”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为了诬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一个关于这次会议的纪录(以下简称《纪录》)。出于显而易见的目的，这份《纪录》有许多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斗争中光明磊落、威武不屈的高尚品德。为了使大家了解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不妨把这份《纪录》的内容详细摘引如下，并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纪录》说：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二月十六日的斗争，确实是从谭震林同志提出陈丕显同志的问题开始的。但是，《纪录》笼统地说了一句“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不仅把这一事件的真实背景和双方辩论的过程掩盖了，而且歪曲了谭震林同志提出问题的实质。当时，由于不少省市委书记被游街、批斗，毛主席连续三次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一再提出要把一些省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排除林彪一伙设置的种种阻挠，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但是，仍有一部分被当地的一些人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毛主席指名要接到北京而仍未到京的一个。因此，那天谭震林同志前来参加碰头会，在门口遇到刚从上海搞了反革命夺权回来的张春桥，便将了他一军，问道：“陈丕显回来了吗？”张春桥推托说：“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同志紧追不放，又将一军：“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老羞成怒，露出了凶相：“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同志听到这话，一股怒火不由从胸中升起，指着张春桥说：“原来打击一大片就是你领导的啊！”进了会议室，谭震林同志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以及一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回京的问题。狡猾的张春桥又故意推托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这时，谭震林同志打断张春桥的话，说出了大意如《纪录》的那些话。

《纪录》继续引述谭震林同志的发言说：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当时紧跟林彪、“四人帮”的那个政法部门的负责人——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这里说的捕鱼问题，是指渔船出海时搞不搞“四大”的问题。谭震林同志考虑到：一、

一条渔船只有十多个人；二、船上有电台，民兵有武器；三、渔船经常同日本、南朝鲜、台湾的渔民打交道。因此确定出海捕鱼时不搞“四大”。陈伯达蛮横地起来反抗，几次在电话上同谭震林同志吵架。

《纪录》接着说：

“(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边斗争。陈说：这些傢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不是证明了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同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谈到“哭”的事，不妨在这里介绍一点背景。由于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国家经济生活引起严重混乱。有一次，敬爱的周总理召开会议研究生产问题，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到了，可是，主管工业生产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同志却被揪走了，大家焦急地等待着。周总理和三位副总理看到国家的经济命脉破坏到如此程度，看到在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干部被整得这种样子，怎能不担忧，怎能不痛心！周总理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纪录》最后引述李先念同志的话说：

“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这里，《纪录》却没有引用周恩来同志接着讲的话。周恩来同志当时质问那个和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的“理论家”：“这篇社论，你看了吗？”那个“理论家”回答说：“我没有看！”周恩来同志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也慷慨陈词，愤怒斥责了林彪一伙的罪恶行径。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聂荣臻同志严正指出陈伯达一伙对老干部“落井下石”，不怀好心，把干部子女都说成所谓“联动”，进行打击迫害，是“不教而诛”，用心险恶。

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和核对”的这份《纪录》，他们是用来作为陷害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罪状”的。可是，在我们看来，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看来，这不是什么“罪状”，而是一篇对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义正辞严的控诉书，是一篇正气浩然的战斗檄文。字里行间，迸发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林彪、“四人帮”的切齿痛恨，洋溢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

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关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正义，为国为民，同林彪、“四人帮”进行的这样一场短兵相接的英勇搏斗。这是一场捍卫马列主义、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这是一股奔腾澎湃的革命激流。

中央发布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

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

一、加强内地和边疆建设，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实现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担负着极其光荣而重大的任务，应当以模范的行动，以文化革命为动力，坚决实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二、所有迁入内地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调人或借调支援内地建设的职工，支援边疆建设的职工，都应当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坚守岗位，积极工作，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三、现在，有些地区和单位，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唆使和蒙蔽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一部分职工和家属成批地离开现有工作岗位，回到原调出地区，影响了内地和边疆建设。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又一种形式，革命职工和家属千万不要上当，必须擦亮眼睛，彻底揭露，坚决反对。

四、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如果对原调出地区和单位的当权派有意见，可以写信或寄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派少数几个代表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但不要成批离开工作岗位。

五、凡是目前已经回到原调出地区的职工，应该迅速返回内地和边疆。调出和调入地区的有关单位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积极动员帮助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当他们返回到原工作岗位之后，应当欢迎，不得歧视。

六、原调出地区和单位，对于从内地和边疆自动回来的职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如已经安排工作的，仍应积极动员和帮助他们返回内地和边疆。任何单位不许留用。

七、对于一小撮挑唆和煽动职工群众离开内地和边疆工作岗位的负责人和肇事者，应该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情节恶劣的，应该依法惩处。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央发布关于处理上山下乡知青外出上访、串连、请愿的通知。

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广大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已积极返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和农业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小部分人，以种种借口长期在城市逗留。为了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

二、有些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影响，做了一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只要他们回到本单位认真检查，改正错误，可不再追究。

三、在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的坏分子，要彻底查清，依法惩办。

四、对于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三条：“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执行。

五、前几年精减下放、现居城镇的人员安置问题，也应按上述第四条的精神执行，不得回原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强求复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确保机要文件与档案安全的几项规定。

关于确保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安全的几项规定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单位因为抢占机要室，争夺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而造成严重失密。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继续发生，防止坏人乘机破坏，现就确保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的安全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一定要加强保护，一律不准冲击、占领机要室和档案库，不准抢占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如果发现机要档案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应该挺身而出加以保护，如劝说无效，应立即报告当地军事机关或公安机关，请他们加以保护。已经抢走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一律追回。

二、夺权部门所属的机要室、保密室、机密档案室，应由原有机要和保密人员中的革命同志接管，不准其他任何单位和人员干预。原有人员中个别不适宜继续做机要工作的，可按中央规定的机要人员条件选派，报上级审查批准后，进行调整。

三、有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包括密码、密电、绝密文件和机要保密单位的一切图表、图纸等技术资料，都要严加保管，未经上级批准，任何单位和人员一律无权翻阅查看。

四、在文化大革命中，未经上级同意，擅自批准借出的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要责成当事人火速追回，并限期交回原部门。

五、以上规定，革命群众要遵照执行。如发现有坏分子乘机破坏、盗窃、抢劫档案材料时，要依法惩办。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文艺团体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文艺团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和清算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肃清以周扬、夏衍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在斗争中，要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但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三)根据目前斗争的新形势，文艺团体工作人员，一律停止外出串连。到外地串连人员尽快回到本单位，集中力量彻底闹革命。一面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一面创作和排演现代的革命化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和戏曲等。

文艺工作人员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下乡、下厂，同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四)认真整顿和清理文艺工作队伍，把混入文艺团体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革命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五)要节约闹革命，爱护国家资财。破坏国家资财者，按照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处分。

(六)自负盈亏的文艺团体，如果他们今后演出有困难，现在基本生活费又没有来源的，可以由当地政府另外安排生活出路，主要是到农村落户或者分配到工厂或新建的企业中去劳动。

以上规定的前五条，适用于部队的文艺团体。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对待工作组问题的通知。

关于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问题的通知

各级党委：

关于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派出的工作队(包括搞了一段文化革命的四清工作队)问题，中央考虑到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主要锋芒应当针对着这条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而不应当长期揪住工作队不放。因此，中央决定：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工作团和工作组，包括团长、组长和组员，都回原机关参加革命和工作。

(二)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各单位，今后不要再揪工作队去斗争。

(三)工作队中的坏人和确实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应把材料送原单位或上级领导机关，必要时，可以同原单位的革命造反派联合斗争。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央发布通告，取缔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生产岗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革命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以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特此通告全国，并可张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周恩来、李先念约集国务院财贸各部委及财经学院等造反派代表谈话，严申：对财政、外交、公安的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将受批斗而伤病或无法工作的部长吴波（财政部副部长）、姚依林（商业部长）、方毅（国家计委负责人）等接至中南海保护。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参加造反派，图谋夺财政部的权，周命令当场逮捕。并传达了毛泽东不再提“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提法，以利于团结更多的原领导干部。中央部门夺权中的三结合采取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的形式。每个部党组要恢复。夺了权的必须经中央审查才能承认。部内问题一定要以部内造反派为主，外单位不能参加。（《传信录 524》）

李富春接见工交系统红色造反联络站代表时说：夺权已形成连锁反应，各部都在夺权，但不应千篇一律，而应区别对待。一、是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二、夺对业务实行监督权。对工交战线，要一分为二，有刘、邓影响，也要看到毛主席的红线。（《传信录 525》）

下午，谢富治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的同志。在谈到革命造反派内部问题时说，不要互相打架了，不要发互相攻击的传单，不要随便抓人、骂人。都要看到自己的缺点，不要只看到别的人缺点。（《传信录 526》）

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 8·26 战斗团的公开信》，劝阻造反派冲击成都军区（军区支持保守的产业军），并警告造反派头头，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负责。造反派置之不理，继续冲击。军区因此大肆拘捕，人数高达万数。**同时，广州、福建、内蒙、新疆、云南等地均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陈伯达电话通知《光明日报》，停止揪斗穆欣。

第六十七卷 1967年2月18日至24日

2月18日

晚，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代表林彪)等到他的办公室开会。严厉指责了谭震林等元老派。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徐向前、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议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退场。

康生在会上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按] 40年代，正当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却在延安的窑洞里策划夺取党内的最高权力。他重用情报头子、整人专家康生，他用娴熟的权术、残酷的斗争手段，斗垮了“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形式色色的敌人，通过整风，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他把同志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使任何人都对他俯首帖耳，山呼万岁。“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一生帝业的始基，故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之有半点非议。

会上确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名政治生活批评会)^①，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进行批评，三人“请假检查”。并确定由周恩来找陈毅、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传达会议精神。

中央军委发出通知，重申二月八日通知，外出串连人员限期返还原单位。

中央军委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

军委二月八日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下达后，外地来京人员已大部返回，但近日仍有一些人来京。为切实执行军委通知，特重申如下：

^① 政治局生活会的参加者除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外，增加萧华、叶群、余秋里、谷牧、汪东兴。

1. 请各单位大力宣传军委通知精神，要求全体人员严格执行军委规定，不再外出，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什么问题，应报请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解决，也可以写信向上级机关反映。

2. 今后各单位来京和到外地去的人员，必须经军以上党委同意，报告军区、军、兵种领导机关批准，来京人员，要报经全军文革小组批准。未经批准外出的，各地接待站一律不予接待，各单位也不予报销旅差费。

凌晨，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周讲话：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权，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因为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是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夺党、政、财、文大权，那是讲的地方。干部大多数还要继续留用。你们大家有委屈，我向你们道歉。（《传信录 529》）

聂荣臻接见国防院校代表说：学校以教学为主，也学工、学农、学军，也搞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这跟刘少奇的半工半读不同。在夺权告一段落后，一边主要抓革命，也可以斗批改，这个工程很大。

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接见国防工业各部院、国防工办、国防工政造反派负责人。周讲话：各部委造反派夺权一般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对老干部不能残酷斗争。（《传信录 530》）

叶群、陈伯达、江青及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萧华与总政所属单位座谈。叶群讲萧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传信录 532》）

谢富治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夺权委员会与革命造反公社代表。指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停止发展。蒯大富、聂元梓应去夺权委员会工作。（《传信录 533》）

新北大、高教部、民族学院等单位在政法干校礼堂召开“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陶”大会，何伟、徐冰被揪出示众受审。

上午九时，文教口和总勤务站办公室召开了首都一百四十多个大小文艺宣传单位代表会议，讨论文艺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问题。

武汉军区在征得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于二月二十八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队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2月 19 日

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 2 月 18 日所写的《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关于两个中学军政训练试点的工作总结报告》作了亲笔批示。

林彪同志：

- 一、此两件应立即转发全国。
- 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四小时。
- 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次二十天。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江青说毛的这个批示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林彪将谭震林写给他的信转交毛泽东，并写信说：“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此致

敬礼

十九日

毛泽东接信后，批“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林彪收到后当即撕碎，掷入痰盂里。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夺权的省市，必须先经中央批准，然后见报，且不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

各级党委：

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夺权斗争的宣传报导问题，中央作如下规定：

(一) 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

(二)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学文化革命的意见。^①

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中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斗、批、改。

二、从三月一起，中学师生(包括一九六六年应毕业而尚未毕业的学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回本校，下乡下厂的也一律回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为了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对中学师生要分批分期地进行一次短期的军训训练。

三、革命的红卫兵是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红卫兵组织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应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在学校中不许成立反动组织，象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对于受蒙蔽而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学生，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允许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具体安排上课，搞好师生生活。一时不能选举者，可由各方代表协商，成立一个临时领导班子。

五、中学上课要和文化大革命紧密结合。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以必要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在农忙期间，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向贫

^① 就2月11日的草案，进行了若干修改，正式颁行。

下中农学习。负有国家生产任务的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不必下乡劳动。

六、不许对提出批评和揭发问题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教职员进行打击报复。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等的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必须认真平反。中学的教员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不要排斥一切，打倒一切。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反对群众斗群众。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正确解决。

坚持文斗，不许武斗。对犯错误者，要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地督促和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

七、认真整顿和清理教师队伍，把教职员中坚持反动立场而又不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指本人，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八、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指示，爱护国定财产。对学校的设备自己动手进行全面维修，对破坏国家财产者，分别轻重，给予教育或纪律处分，并酌情赔偿。

这一文件可在全国城乡和中学中张贴。

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北京广播学院对北京台夺权问题发生争论，乃至武斗。中央文革于18、19日两次写信，要求双方协商解决。

谢富治、戚本禹、刘建勋与首都红代会代表座谈。戚本禹讲话，介绍了刘建勋的情况，强调夺权必须与干部结合。

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钢一连”、“井冈山之声”、“挺进大队”等战斗队联合举行了“彻底批判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会”。决定成立“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联络委员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指责该校的所谓“新思潮”派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并与之进行了“原则”的斗争。二月下旬，“井冈山公社”发出通知，决定总结批判“新思潮”的收获并进行军训，用毛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指导，以人民解放军为榜样，来整训自己的队伍，声称要使之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所谓“新思潮”，其内容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怀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破坏大联合，打倒一切权威组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二月中旬，一月风暴敲响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刘、邓、陶及谭震林一伙眼看末日就要到来，狗急跳墙，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在二月掀起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复辟的第一步是一·一七假夺权。

二月四日，他们收买了保守组织农大“红旗”为御用军，砸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广播台。二月十一日，谭(震林)谎报下情，一手安排总理对“农红总”所属五个假夺权单位的接见。接见以后，又乘机大肆造谣，歪曲总理讲话精神，声称中央已经批准了他们的夺权。并借此向农口革命造反派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保守派重整旗鼓，开张营业，一跃成为“左派”，“农口红色造反联络站”(保守组织)也生意兴隆，大吵大叫，好不热闹。而原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反而成了“反动组织”，被扣上了种种罪名，到处抓“扒手”、“黑手”、“右派”。一刹时，“人妖颠倒是非淆”，黑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农口。谭说什么：“他们搞白色恐怖，我们搞他的红色恐怖”。“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这个革命组织被强行解散，农大“东方红”小将被打成反革命。那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却起来控诉革命群众对他们“政治迫害”，陈正人抛出了《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向革命群众进行反扑。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经部党组研究，在大会上“控诉”被“一小撮”“右派分子”操纵的农科院“红旗”(革命组织)对他实行的“法西斯暴行”；大叛

徒朱则民及其老婆三反分子杨钧也跳出来大骂“红旗”是“一小撮右派”。江一真也以当权派的身份粉墨登场，加强“领导”。谭还把那些根本没有亮相的干部甚至是党内走资派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农口出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

2月中旬

支持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的全市各组织成立“支联站”，与“工总司”对抗。“支联站”头头是交通大学助教汤福生，化名“全向东”。2月19日，“全向东”至上柴，表示对“联司”(司令杨仲池)的支持。

2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布致农村贫下中农及各级干部的信，要求抓好春耕工作。

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

贫下中农同志们！农村工作干部同志们：

贫下中农是农村中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当这春耕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

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善于同贫下中农一起商量，同一切劳动群众一起商量，掀起一个春耕生产的高潮。

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挑动宗派纠纷。他们必须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认真地继续进行劳动改造。

在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

建议你们考虑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春耕生产工作。会议要有准备。会议时间要短，以一天到两天为好。

还建议，召开好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

同时，还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团结起来！

祝你们为夺取春耕生产的胜利而奋斗！

(这封信要在农村中宣读和张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批朱(德)联络站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揪斗朱德，被周恩来制止。

2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就执行军委八条作了一些补充说明。

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中央还做以下几点说明：

(一)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

(二)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大中学校的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四)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级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五)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得包办代替。

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谢富治、戚本禹、刘建勋、吴德、高扬文与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接见北京三大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催促完成联合。谢说：北京市要成立一个权力机构，工、农、兵、学、商多方面参加。

李先念接见建工部革命造反派代表，号召大家返还内地建设工地的岗位。毛主席说过：内地建设搞不好，就睡不好觉。内地建设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谭震林接见农林口造反派代表，祝贺农林口各部门各学校实现大联合。(《传信录 537》)

李先念接见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时说：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王学明是党内走资派。

关锋、戚本禹在《光明日报》全体职工大会上，说《光明日报》几年来，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报纸。穆欣基本上是左派，应停止揪斗。(《传信录 539》)

武汉造反派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

2月 22 日

江青迫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搬出来”，被拒绝。

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会召开，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王力到会祝贺。周恩来代表毛、林及中央祝贺首都红代会成立。他说：这次庄严的集会，表明我们即将象上海一样进行一次大夺权。陈伯达讲话：“广大革命群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传信录 540》)大会发布的《红代会宣言》指出：“目前，夺权与反夺权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三结合的方针”，“必须在自己灵魂深处来一场大夺权、大造反”。大会通过对毛的致敬信：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还通过了《告全国红卫兵书》。首都红代会是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造反联络站”、

“第三司令部”和其他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的联合组织。首都红代会由 15 名常委组成，由农大“东方红”、农机“东方红”、邮电“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医大红卫兵“红旗”、“新北大”、“政法公社”、财经“八·八”、地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电影学院“东方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联委会”、北外“红旗”、清华“井冈山”担任。

李先念接见外贸部革命造反派。说：杜向光(原财政部副部长)公开违抗中央

命令，想利用造反派打倒吴波，不能允许。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没有错误。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出现了连锁反应，先夺了再说，夺错了没有错误。夺过分的，让出来就是了。要说错，我们错了。（《传信录 541》）

2月 23 日

军委颁发由毛泽东签发的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的通知。

林彪、周恩来、伯达、荣臻、向前、剑英、萧华、江青已阅 签发：毛泽东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各军区、军种、兵种、学院、各总部：

党中央于二月二十日下达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文件。我军全体干部战士，要紧急动员起来，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春耕生产。这是一项时间性很强的紧迫任务，各级领导一定要十分重视，坚决抓好。

(一)各地驻军要根据上述中央文件的精神，大力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意义，不违农时，迅速掀起春耕生产的高潮。

(二)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武装部，要把抓好春耕生产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省、专、市、县)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好春耕生产会议，具体安排春耕工作的落实。

在某些原来干部已经不能工作的单位，军分区、市、县武装部以及驻军团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同当地的贫下中农组织协商，成立领导生产的班子，恢复生产组织，安排春耕生产。

(三)各级人民武装部门，要号召全体民兵，成为春耕生产中的骨干，充分发挥民兵组织生产突击队的作用。

(四)各地驻军要不失时机，以劳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援农村人民公社的春耕生产。

(五)所有部队在助耕生产中，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四清运动中已被罢免的干部破坏农村文化大革命和破坏生产的活动，要协助地方专政机构和贫下中农组织，坚决给予打击。

各单位接此通知后，应立即研究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上报。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信浙江省军区并转造反派组织，号召并赞扬军区与造反派联合，搞好运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的信

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

自从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决定以后，中央十分高兴地看到，浙江省军区和所属机关、部队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完全符合于中央上述决定的要求。你们无愧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和参加者的光荣称号。

总结四十天来的情况，省军区和部队同志在处理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确实贯彻执行了林副主席的指示，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品质。你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中央也高兴地看到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二月二十日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

上发表的“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社论。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也检查了在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表示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道歉，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检讨。我们相信，有了这一表示，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将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同人民解放军合作，更好地团结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

中央号召浙江省军区和所属全体人民解放军当此关键时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历次命令，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积极支持参加夺权斗争；同时，注意大局，警惕敌人，严守纪律，巩固队伍，加强战备，坚决贯彻执行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新制红卫兵袖章、旗帜时必须尽量节省布匹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红卫兵今后新制标志应采用臂章或胸章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并革命造反组织：

最近公共用布特别是红布用量增加很多，其中有不少浪费现象。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节约闹革命”的号召，国务院建议各地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原有袖章能够不更换的，就不要更换，确实需要新制的，应当学习革命战争时期的办法，采用尺寸较小的臂章或胸章。制造旗帜和其他用布，也要尽量节约，杜绝浪费。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公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由张春桥充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为副主任。

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一月革命熊熊烈火，从上海开始，席卷全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场气势磅礴的革命风暴中，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了大联合，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取得这一系列胜利的基础上，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我们庄严地宣布了上海“三结合”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诞生。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的名称，现在已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我们全上海革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一月革命精神，领导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市革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原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所颁布的宣言、通令、通告、决定、决议及其他一切文件，一律继续有效，全市人民必须切实遵照执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陈伯达对《光明日报》代表谈穆欣问题，说：多年来《光明日报》工作是比较不错的，他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传信录 543》）

青海省军区通令：取缔反革命组织“8·18 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逮捕首恶分子；同时出动军队，包围并夺取了青海日报社。对反抗者开枪射击，顿时枪弹如雨，血肉横飞。在冲突中，共伤亡 377 人，其中解放军死 4 人，伤 26 人。林彪电示，打得好，打得对。**开会时，林彪又把责任推到叶剑英头上，并把这件事定为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典型。**

2月 24 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参加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

总政治部关于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

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干部，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对这些错误，主要应由提出这条错误路线的人负责。同时，他们对自己的错误都已在工作单位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这些干部回去后，各单位不要再让他们作检查；他们在工作组期间的检查材料，也不列入档案。

中共中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与卫戍区逮捕了北京的“全红总”等组织的头目。

中央文革打电报给西藏拉萨革命派，答复有关问题。

西藏台转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首都赴藏革命造反总部、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赴藏小分队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我们收到你们二月二十二日从拉萨发来的电报。对你们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1. 中央军委二月二十二日给西藏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意见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同志作些工作。

2. 中央文革小组欢迎你们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捍卫和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伟大方针。你们要同张国华同志和西藏军区革命领导同志合作，使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走弯路。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周恩来致信林彪，就决定召开军以上干部会，事先只请示毛，而未向林报告一事，承认是一大错误，并保证永不再犯。

江青、谢富治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中学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讲话：对联动这样反动组织要做分化瓦解工作。他们组织很严密，是有后台的。谢富治要求对这个组织做坚决的斗争。它有后台，代表一个反动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代表。（《传信录 544》）

上海举行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群众大会，张春桥作长篇发言，传达毛泽东关于有关夺权的最新指示。

张春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讨论问题了。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鼓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现在有一张大字报说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了呢？那我现在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的。(掌声)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它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呼口号：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实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每一次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话，他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关心的，这使得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知道，主席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感到是光荣，但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掌声，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主席对上海的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一些，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过去已经给我们很高的评价，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组织所发出来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都是毛主席在当时接到文件，就很快看了，而且很快决定了向全国广播。在这次谈话里面，毛主席又说：“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他还讲了一下这段历史，比如说，上海工人，在安亭事件那个时候，他讲：“你上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二千人吗？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了，这就说明上海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毛主席对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我们，学生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机关干部的情况，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甚至于也问了市委一些干部的情况，我们都汇报了。有些细节问题他都晓得，他问：“你们那个时候，学生不是都到了码头吗？那现在那些学生是不是还在码头上呀？”我们告诉他说：“当我们陪卡博同志到码头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许多学生还在那儿。”主席说：“很好！”他对学生的关心，对工人、对农民、机关干部、解放军战士、上海部队的情况都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对上海的革命群众的每一个好的创造，每一个革命的行动，主席都无微不至的关怀、了解。我们感觉到主席对上海的关心，这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来说，对上海的革命群众来说，是最大的关怀，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有了党中央的支持，(呼口号)我们面前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阶级敌人还会玩弄多少花样来反对我们，他们都没有办法来阻挡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我想下面来分别地说几个问题。

(一)讲一讲夺权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在主席那里谈得比较多，这一个问题我也想讲的多一点。

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个新的阶段是从上海革命群众夺权开始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讲的“一月革命”的风暴开始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解决政权问题。但是，我们这次的夺权，和一九四九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是不同的。毛主席这一次和我们谈话的时候说：“这一场革命，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同志们，注意主席这一句话，他说：“这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个“我们”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自己亲自领导的。这一天，他是要中央文革

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一句话，我想就我们的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十七年来，从根本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十七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说是刘、邓路线是占统治地位，不能作这样的估计。所以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应该肯定的。那末后半段呢？后面就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怎么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毛主席说(那天这个问题他解释了)，“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就是被篡夺了的，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还需要革命。(呼口号)

有一个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一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因为所谓“彻底改善”，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地改了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地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

为什么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场革命？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这十七年来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嘛！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现在呢？经过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统一了，稳定了。但是事件总是这样，统一了、稳定了，是它的好方面，但是它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个比较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党权、政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

毛主席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不会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一个思想，是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很复杂的事物最后就变成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的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场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了主席这句话的意思，那我们就能够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这是关于夺权里面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第二，在夺权斗争里边，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成为问题的中心的是“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够夺权、夺了权能不能巩固的关键。

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我们上海，对于上海旧市委、旧市人委的权，已经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夺了一次，发了通令。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还有其他的四个单位又夺了一次。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又夺了一次。但是他们夺到了什么东西呢？他们夺到了几间房子，有的就把市委还有华东局大印抢到手了。就因为这个印拿到手了，就认为权夺到了。但实权呢？根本没有夺到。你们在座的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夺权了，那末应该发号施令了，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权说是夺了，但是他说了话也没有人听。市委的权是这样，华东局也是这样。我在这里讲华东局机关，也夺了好几次了，到现在你说夺下来了没有啊？我看也就是那样，占了几个房子。大概还有些人强迫魏文伯、韩哲一签个字，要点东西，搞个汽车什么的。这些大概夺了一些，别的东西夺不到。我现在劝夺华东局权的人，那个权

还是不要夺了吧！要夺就要搞“三结合”，你也没有办法“三结合”。这事情将来专门跟他们谈，因为我在中央讨论过一下，华东局的权不能这样夺法。华东局书记处的权是不能夺的，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那末你夺权，就是向党中央夺权了！要夺只能夺华东局机关，华东局机关就是一点房子，有什么好夺呢？

在这里我就讲一个市委，华东局机关，其他单位，同志们知道的比我多。有些局，有些县，有些区，有些企业工厂，夺来夺去，结果谁也没有夺下来。这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夺不了权的。没有一个大联合，几个单位，一个单位或者两个单位去夺权是夺不下来的。那种小联合的夺权，或者一个单位，两个单位的夺权，它只能产生小团体主义。有些单位去夺权，夺了个印刷厂，夺了印刷厂以后，这个印刷厂就归我这个单位了，别的单位来印东西就不准。这种小团体主义的夺权，实际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小团体所有制，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我们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和个人，怎么能属于一个小团体呢？如果那样的话，就变成小团体所有制，从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这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我们这个话说得尖锐一点，是为了告诉这些同志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是南斯拉夫的办法。什么工人自治呀，小团体呀，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都懂得了大联合夺权，要大联合夺权，还不是说得很清楚，要大联合需要找一个恰当的形式，这个恰当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三结合”。“三结合”，同志们是知道的，这就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说是大联合。所谓大联合，不在于有多少群众团体都参加了，当然凡是革命的组织应该联合，这个思想我们已经宣传很久了。现在的问题不仅是说群众团体越多越好，而是说，如果缺少另外二方，只有革命群众组织，没有人民解放军，没有革命领导干部，那么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夺下来也不能巩固，所以主席这次和我们谈话，谈得最多的是“三结合”问题。我们很好地思索了主席的这个指示，和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在北京恰巧碰到了山西的同志、山东的同志都到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山西的同志汇报的一天，我们参加了，山东的那天汇报，我们就回来了，没参加。从各个方面来看，山西大约特别明显就是军队的作用。山西的夺权，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根本夺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山西省委，反动透顶了，而且已经准备了武装，搞了那么一批便衣特务，发了枪。象刘格平同志(夺权的领导干部，原来的副省长)，就在他住的房子的对面，就有两个特务，有枪，窗口就对着他们门口，随时准备把刘格平捉起来。如果他们不夺权呢，再过两天，现在出来的这一批革命领导干部就都被捉起来了。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革命派的一边，支持革命派夺权。这样，这些手里没有枪的革命群众才把权夺下来的。

刚才我们读《毛主席语录》有这样一段话：“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军队的政权，在世界上，在阶级社会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你要想夺权，又没有军队那怎样可能呢？我们夺国民党的权要有军队，那是要靠军队打天下。今天我们把一部分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夺回来，还要靠人民解放军来支持，没有这个力量是不行的。

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行不行？这也是不行。因为群众只要一采取革命行动，必须要有干部。比如说，我们革命造反派，建立一个战斗队，总有一个负责人，不管名字叫什么，有的叫“服务组”，有的叫“勤务员”，有些人不喜欢这个“长”字，不愿叫战斗队的队长。但是不管叫什么，总是有领导人，总有干部。现在我们要夺权，总要有干部。除非是有新的干部，老的干部。新的过去没有担任领导工作的，还要有些过去担任过领导工作的。为什么要有一批担任过领导工作的革命领导干部呢？因为事情很明显的摆在这儿，一个工人同志他不管多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也很有工作能力，在这文化大革命里边有很多的贡献，但是马上把一个城市(比如说上海市)，或者一个省(比如江苏省)，交给这样的一些工人同志来管，是

有很大困难的。因为他没有经验嘛！如果他管一个车间，可能比较熟练，管一个大的工厂就已经困难了，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他，这个困难当然大。你们工人造反队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同志，很有才能，现在马上交给你们，你们有困难。就拿我来讲吧！我总算做工作还做了一些年了，现在要我负责上海市的全市工作，我也是感到非常吃力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事情我过去没怎么管过，我的经验并不是那么宽，现在一大堆问题摆在面前。过去有的时候，我也顶多参加一些讨论，但是决定不是我做的。很多事情我根本没碰过，没有摸过。经济工作，工厂工作，我也知道得很少；商业知道一点儿，也不多；象财政税收这些事，我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在这里可以向同志们坦率地讲，我从来没有兴趣，有些文件送到我跟前我看都不想看；好多事，农村我知道一些，也不多。本来这种感觉，比如说，在柯庆施同志在世时，那时候我们总觉得，虽然我们也担负着很重的责任，和我们的能力不相称，但是那时候也觉得好办。但最后觉得问题不好办，就跑去找柯老商量一下，他下个决心就办了。柯庆施同志六四年一病倒，六五年去世，那个时候我们突然就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就挑不动了。这个担子突然往我们身上一加，我们感到没有一个地方商量了，担子越加挑不动。现在客观上面临的任务比那个时候要多了。那么，一个普通的工人同志、学生，我想他们遇到的困难会比我们要多。

我在主席那里谈到，我们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有的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那天就说，我看当一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在一个学校里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全校的情况也还不了解。主席这样讲，照我看，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做个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你这个学问还没有学完，或者大学刚刚毕业，你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系主任嘛，总是我们已经培养的一批助教讲师，即要那些人出来。

那天还讲到，主席说，有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啰，周谷城再教书恐怕不行了吧！？看哪些人还行呀？他也是关心这个事。我说了这些话，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你们不要泄气呀！……主席是说，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他们作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个班，就是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有些困难，要有一个过程，还得学习。“三结合”，我们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老的考虑这个问题要从培养接班人来想，这个班怎么接呢？看起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的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儿工作嘛，学个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如果二十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做省委书记那不是还很年轻吗！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是热爱的，对青年同志评价也很高，但现在不能够单单强调那一点。因为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三结合”的问题。这就不能不说“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够不说我们的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的。

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个问题我已传达了，主席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那个牌子早就给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人民公社、第三个人民公社又在筹备了嘛，他就不要砸掉这个牌子？……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如果不是在这里过高的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参加了工作，这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就夺不下来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三结合”就把权夺下来了呢？那么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今后也是这样，就是“三结合”的。下面我们就讲“三结合”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它的基本力量有三方面代表，这样的基本形式已经形成，我们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

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不单是所有革命组织起来反对他的，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绝对有威信的、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更加有权威，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总想来试一试，想来反对我们，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着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他试一试吧！我们已准备好了，谁要想着来碰一碰，我们就会有方法对付他们。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实现“三结合”，这是主席给我们反复谈的一个问题。

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得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是“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来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有没有可能实现“三结合”呢？上海市 600 多个部、局长以上的干部，处长以上的干部是 6000 多个，难道说，从这 6000 多人、600 人中都找不到“三结合”的对象？这个不可能。可以找到。而且应该说，这 6 千多人，我是讲处长，还没讲科长，科长就更多了，这么多人里面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一点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当然啰，上海的革命的干部或者是整个的干部造反的比较少，而且造反比较晚。上海机关干部造反是一直到 12 月 18 日开大会，那才算是开了炮。这已经是相当晚了，但在全国还算是好的，还是比较先进的。当时，毛主席看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说：“上海的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但从整个数量来说不是很多。在 12 月 18 日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副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个事情当然不能怪革命造反派，也不能怪革命群众，应该他们自己负责，谁叫他们不造反？这个事情我们没办法替他们负责，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首先应该是陈丕显、曹荻秋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他们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大批干部带坏了，总是为首的嘛！同时，据我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地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群众、一般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干部，甚至市委里的人也没有传达，这样使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不能传达到群众、干部中间去。十一中全会回来以后，传达了什么？没有很好传达，据说市委的会，开常委会还是委员会，曹荻秋只传达了一个小时。那怎么行？那样子传达的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也没有很好传达。据我们听说，象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根本没有很好地告诉群众、干部。所以当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一冲市委，一提炮打司令部，上海的干部莫名其妙：什么“炮打司令部”？所以很多事情是应该由领导负责，应该由为首的人负责。有些事情他们根本没有传达。正如同志们知道的“安亭事件”，那个事情他们传达谁的指示呢？传达陶铸的指示。曹荻秋就是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就跟他说了一通，就那么口气：“春桥既然已经同意嘛，就只好这样了嘛！再继续做工作嘛！就改过来嘛！”曹荻秋就是根据这个来办事的，他就只信陶铸的。伯达同志的的意见，到后来主席的意见，我都告诉了市委，市委不但没有向一般干部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马天水所以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开完会时，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所以他敢于跑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攻击我。他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而是陈丕显、曹荻秋那些人就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好好地讲，什么话都讲，鼓动他。你说这个人，陈、曹这样的人，他们欠债实在欠得多，不但对上海的人民欠了债，对干部欠了债，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同时他们又用什么“内外有别”呀，“组织纪律”呀，“什么东西不能讲”呀，把干部压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我前面讲了，首先由他们负责。但是领导首先应该负责，这个不能怪我们，不能怪革命的群众，我们相信他们中间，六千多人处长以上还有六百多个部局长以上的干部，我们相信他们多数是愿意革命的，是愿意跟着毛主席走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解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柯庆施在世的时候还是这些干部，又为什么在柯老领导下就能够执行主席的路线，就能

够紧跟着毛主席，把上海的工作做得不是比较好吗？柯庆施同志主持工作时期，特别是五八、五九年以后，上海的工作在全国是比较好的，还不是这些干部？还不是六千多个领导干部？还不是六百多个部局长。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一小撮坏人，但是我是讲多数，这些同志那个时候在柯老领导下，他们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要按主席指示，看干部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全部历史。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很多干部那个时候，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是相同的，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

毛主席这一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对我们讲，我们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这里讲的“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走。主席还特别讲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毛主席说，只要我们善于引导，他们也会跟着我们走的。主席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再强调，我们要相信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不相信大多数，就是不相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结果使自己完全孤立起来。

实行“三结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对待干部问题，《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里面有一段专门讲正确的对待干部问题，第四期又专门写了一篇《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这两篇社论党中央都讨论过的，毛主席看过。头一篇主席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这一篇，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我们只知道我们走的那一天当面送给主席了，他看了，作了重要的修改，比如象这样的话，《红旗》第三期里：“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主席就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后面加上“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这样就体现了主席一个伟大的思想。……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错误、坚持不改或累教不改，是不可救药的，都要治病救人。主席加上几个字，政治界限就很清楚了，那就宽得多了。

现在同志们，已在别的会上已经说过，好多同志现在比较忙，特别是夺权以后。据说夺权以前学习主席著作还好，说是有时间，夺权以后忙得一塌糊涂，不看书，不看报。这个危险啊！象这样两篇社论和中央最近发的文件，那是要逐字逐句考虑的呀！因为里边一、二字的改变，政策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革命在发展，在变化，形势在变化，如果我们头脑不适应形势变化，我们就可能犯错误。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反复讲了“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部有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份同志。这就是一点，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碰到一些人，那个顽固劲发生一股错觉，以为大多数是坏人，因此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其实，同志们，这个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根本不能成立，既然“打倒一切”嘛，提这个口号的人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哩！他只打倒一部份。他“怀疑一切”，他真正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也不怀疑他口号对不对，那么你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份。实际上没有那样的事儿，不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只能是这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哪有打倒一切呢？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这种口号，今天阻碍了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着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从思想上根本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如果看见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也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怎么实现“三结合”呢？这种“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

要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要走向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因为他直接研究了一个单位，就是中央机关有一个单位。我们一到那儿就跟他讲，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那个造反派谈话，问你们怎么样，他们说：“我们这个造反派很好，我们一个科长都没有”。这表示他们组织最纯洁了。我们说这个话，主席就说了。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那一个单位有三十几个副科长，这一个单位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单位了，一个也不要，明明里面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做阶级分析，而是从职务，从那一级以上，这那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站在毛主席一边、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现在有很多不讲阶级，……我们在北京看到国务院转给我们的一个材料，下了一个通令，用电报发给国务院，说要取消一切“长”。那当然啰，你要向中央提出一个建议，取消一切“长”，也未尝不可。但是他用电报给中央发了一个通令，而且里面有许多话是完全错误的，说什么：“历来就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到将来还是处长管科长；你没有办法叫科长管处长，除非他们的关系改过来，把现在的科员改成科长，把处长改名为科长，那有什么意思？本来，“书记”在国民党里是最微小的官职，而到我们这里就变成最大的当权派了。这些都是名字问题。而且里面说什么“一切带‘长’字的，都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的”，我说，这句话是反动的。难道我们国防部长林彪同志也骑在党和人民头上？根本不讲阶级，同样叫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叫国防部长，林彪同志也叫国防部长，这是两个阶级，怎么能这样呢？搞这么一套，不讲阶级，我们就没有办法搞“三结合”。一讲阶级，党的队伍就可以重新来看了，对每一个人就重新考察。主席说，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他说得毫不含糊，这种一脚踢开，最后一定要把自己也踢开，一棍子打倒的风气万万不可长。

同志们，主席过去一直劝我们最好读一读鲁迅写的《阿Q正传》里面有一章，叫做“不准革命”。我们不要不准别人革命，不要学里面的赵太爷，要允许别人革命。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一，就是不但要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合作，而且要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合作，还要和那种意见不但和自己不一致，而且实践证明他是完全错误的，他反对过你而且证明是错误的这种人合作。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的毛主席是这样的模范。大家现在看一看嘛！现在把事情已经揭开了，大字报都已经上了街，其实许多事只是党中央没有公开就是了。譬如，象朱德总司令是从井冈山反对毛主席嘛，我们现在学习的《古田会议决议》里面好多条，就是反对朱德的。那里面纠正的错误倾向的代表，就是他。但毛主席对这种人是拉着走，总希望能多团结一些人嘛。这一点希望我们革命派的同志向毛主席学习。

我们现在就应该根据主席这样的思想，对本单位的情况作一下具体的分析，究竟那些人是什么情况，作阶级分析。同时我们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使那些领导干部有机会来检讨错误，因为上海有这么一点，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人始终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应该给他们机会。一般干部不搞人人检查、人人过关。就有一些人，不作一点检讨，他没有办法出来“亮相”，我们应该给他机会，让他“亮相”，让他们表示态度，欢迎他们出来发表“造反声明”，也欢迎他们互相之间去串连，他可以找一些知心人交换意见。要造反，要革命，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给他机会；当然给他机会，有的人也不干，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条件。同时我们不要等待一切条件成熟才搞“三结合”，也不要搞得那么十全十美，非要搞那样好的干部，那可能是不多。我们只能够根据不同的人来区别对待，有的人要打倒，有的人是可以参加领导，有的是要做工作的，有的参加一般的领导，有的可以参加核心，或者还有其它的方式。在“三结合”这个问题上，同志们完全有创造性，要有首创精神，但是目的要搞“三结合”。

一些同志害怕，怕一些人投机，怕是假造反，怕认错了人又怎么办？同志们，不要紧，

不要前怕狼后怕虎，革命造反派应该什么都不怕，怎么现在忽然怕起来了呢？他总有一天会暴露的嘛！如果他一直不暴露，你怎么能说人家投机呢？如果弄错了，将来让他改么！我们就不能犯错误？这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成的错误，同志们，这样将来我们不准犯错误了？犯错误就打倒？我们还是会犯错误的，还是经常会犯错误的，造反派的同志也会犯错误的，犯错误咱们就改，早改，坚决改，没有什么办法，只要我们有这一条，我们就不会变成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又坚持不改，累教不改，只要不做这个就行了。第一，不要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余的你就不怕嘛！你就不要坚持不改，不要累教不改。认错了几个人不要紧，如果这样怕，我们将来犯了错误那怎么办？现在我们也不能用了，那没有人做事情了，所以，请各个单位考虑一下，排排队，最好选择几个标兵，选择某些人代表哪些类型，有了几个标兵就行了，好办了。当然是对革命造反派同志说的了，我们希望大家要向那些干部去做工作。我们也希望他们坚决站过来。光靠我们做工作，不站过来不行呀！他们现在有许多顾虑，说晚了，说早了没有站过来。你既然承认早不站过来是不对的，现在还不站过来，不是越来越晚了吗？还等到什么时候呢？党和人民是欢迎他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鲜明的，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只要坚决地改，党还是欢迎的。而且犯了错误，也有好处，犯了路线错误，可能因为犯了一些路线错误就增加了免疫力，在以后就少犯路线错误和不犯路线错误，也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嘛！

有人说双方感情合不来，斗了一场又怎么与他一起做工作。我说谁斗的，还是谁来做好工作好，因为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嘛！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斗他，是根据毛主席的路线；现在搞“三结合”还是根据毛主席的路线。在这一点上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己应该首先把感情转过来。他们决不能对革命造反派记仇，准备“秋后算账”，打击报复，这是不允许的。如果真正认识教训，就应更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斗了一下，可能有的是过份了，应该谅解。我们对你们执行毛主席这条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难道你们对革命造反派就不执行这条路线吗？还要无情打击？那当然不行！小将们有些做得过分地方，那也只能够谅解。任何革命都要付出代价。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一个伟大革命，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我们看，现在的代价并不大，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我们的代价并不大。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他们的反复，夺权，反夺权，那个代价大得很。我们的代价不大，自己挨了斗，也算一种代价。我看，有的斗得完全对，有的有一点过分，也就不过是那么一点吧？也算一点代价，也就算你对革命的一点贡献吧。

老实说，没有革命小将那样英勇、那样敢想、敢说，那样英勇地冲锋陷阵，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揭不开的，这个功劳谁也不能抹煞。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象有些人我们能够揪得出来吗？能够把上海的面貌象今天这样改过来吗？不可能的！谁要是看不到主流，看不到主要方面，那么就证明这些人现在还没有了解这次革命是干什么的。我们劝说一些人，你们想一想大局吧！想一想这场伟大革命对于我们国家面貌、国家命运不是几天而是决定我们几十年、几代的问题，即使自己有点什么不愉快，也应该改过来，应该看一看大的方面。

我们要继续搞“三结合”，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所有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包括市委书记处内部的人，如他们愿意革命，愿意跟毛主席走下去，那我们都准备根据主席的指示来考虑他们的问题。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希望这些犯了错误，以至犯严重错误的人，在这紧要时刻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还愿意不愿意跟毛主席走，还愿不愿意改正错误，还是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呢，还是马上改？现在是紧要关头，不能再拖延，请他们自己考虑。这样，我们的“三结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能很好地进行。

下面谈一下“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组织形式问题。还讲一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要改名字的问题。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谈话中也作了详细的指示。毛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嘛？！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这个“长”字)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主席说，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单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还说：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如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问题主要是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

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也叫了。最近主席反复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初没有那么想，如这样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个党呢？所以毛主席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他说：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他还跟我们研究，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我们上海有个叫生产委员会，可以叫革命生产委员会，现在也有叫文化革命委员会。简单地就可以叫革命委员会。这种委员会也应该是“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干部)，应该有工人(老工人、青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

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叫国务院，不必改名字了，市仍叫市人民委员会，也不要改了。

毛主席又说，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他要我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吧！主席的基本思想是怕挫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同志们，从这儿可以看到毛主席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考虑一个问题，反复考虑，比我们细致得多，他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想到的问题，这包括我在内。同志们也没想过，还有什么国号问题，承认不承认问题。根本没想过这些问题。那时很多同志主张搞公社，我们也觉得不错，叫公社也可以，所以一弄干就起来了。当然我们也报告了中央。可是没再往下想，有些时候脑子里也想过；什么人叫社员？农村里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那么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因为脑子里有点热，就没往下想。但主席考虑问题反复的考虑，非常注意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最后，中央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意见，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名称不叫人民公社，但文件上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给上海革命人民留了一个余地，你们上海自己考虑考虑。所以主席考虑问题非常周到、细致。特别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他就是怕挫伤。我们临走时，主席还问：“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我们说：“我们上海人民总是听主席的话，主席讲的大家都会听的”。我们回来后，公社委员会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大家一致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给我们留下了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考虑结果，还是一致根据毛主席指示，还是把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从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来看，更加证明了我们向主席讲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群众组织，全上海的革命群众，一定会同意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的。”还有人说：“因为‘革会’没有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什么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有那么一个人，他在一个会上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口号是错误的，理由就是这个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更确切些，我说穿了，就是因为没有包括他在内。那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口号“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与一切权力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样，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因为这口号的实际意义，是一切权力归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上海人民。也就是说，把一切权力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回到我们自己手里来，这样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权是不同，不会和任何一个个人野心家，一个小集团来分享政权的，它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别人没有资格来讲话。那一种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至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一月革命”。

“一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上海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地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革命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工人阶级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英雄，他们冒着极大困难，英勇地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月革命”，我们还在想，实际上上海的夺权是从去

年12月下半月开始的，那么我们夺权也不是等到成立人民公社委员会开始，而是我们当时看到铁路不通了，港口阻塞了，“赤卫队”要搞“三停”这样的危险，而市委在那里继续在搞经济主义妖风，使上海已经处于瘫痪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如再不夺权，不要说还有一个月不夺权，如一月初我们不发《告上海人民书》、《紧急通告》，那我看不要一个月，再有十天，上海就不可收拾，或者说我们收拾起来就更困难了。我们的夺权，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自下而上的夺权。人民公社成立时，我们实际就拿了市一级的权，市委已停止活动了嘛！实际上十一月六日的大会上，宣布不承认曹荻秋是市长了，我们早已经夺了权了。人民公社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把一月革命的成果从组织上用一个组织形式表达罢了。正是因为是这样，它是有一个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所以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一看到这现象就发现了一个个事物，就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毛主席发现的，才亲自批准了《告上海人民书》、《紧急通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个单位的贺电，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怎么能说是少数人搞起来呢？还有人说什么是我搞起来的，我谢谢你们，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如果没有上海的千百万群众自己起来夺权，谁也搞不成这个局面。

我们的同志有这样的口号：“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上海人民公社”，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庄严的口号。它表示了我们有决心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把名字改一下，但这并不是改变了我们的决心，我们还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有那么一小撮人，人很少，只有那么一小撮，他们被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或者还没有说成那么更坏，至少是被一种思想，被一个“私”字迷了心窍。这种人，他们永远也不懂什么叫“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人民公社”。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方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上面主要讲了夺权问题，下面讲一讲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报纸上已发了“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这几天陆续发了“关于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小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文件，关于机要、保密档案的文件，还发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讨论写出来的。例如小学开学不升学的问题，我们没有回上海以前(12月份)，在北京就开过好多次座谈会，反复征求意见，征求小学教员意见，学生意见和家长的意见，调查几个月才下决心的。中学也是这样。这些文件，例如《红色工人》文件也是调查很久。我想不再一一解释了。因这些文件已发出来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问题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贯彻。这问题首先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下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党中央的指示得到贯彻。

今天到会的，除去各县来的同志(但毕竟到会的农民同志少，大家现在是听广播)，到这个会场的是城市的人多。我们希望全上海同志，首先是贫下中农同志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能保证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同时我们也希望，城市的同志能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因为农业最大的特点是有季节性的，有的晚了一天就会影响收成。我们不管搞什么革命都离不开一条，今天我们到会的同志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吃饭，如果吃饭成了问题，那我们别的事就难办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但搞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其他很多问题也好，都是要抓革命。不干革命，生产是上不去的。但在这里我想应解决一个思想问题。好像一讲抓革命、促生产，那就要把时间都化在革命上，就侵占了生产的时间，而且用得很多，用的劳动力多。好多基层组织大量人员脱产。好多农村公社的群众组织，一个生产队人不多，但脱产的人员很多，这是不利的，不好的。

林彪同志曾经讲过，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应放在第一位，革命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时间的安排不应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各工厂一天要八小时安排

生产，否则生产要打乱了，促生产就没办法促了，你商店还不止八小时，农业不是算八小时工作制的，特别是春耕大忙要来了，时间，劳动力更加紧张，我们抓革命就要按这样情况来看。

在此，特别要对目前还留在城市里的农村的同志讲几句话。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支援内地的工人同志，还有一些回乡支农的工人同志，还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还有他们的家长，我希望你们能很好地学习一下中央的这个文件。你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内地去这个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光荣的。过去这样做，将来还要这样做。如不把农村搞好，不把内地建设搞好，不把边疆建设搞好，我们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有用。而上海的今后任务仍是支援全国的农业，支援全国的农村，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我们的生产是为全国服务的，我们的工业也是为全国的。我们同志们应记得，柯庆施同志就是为了关心内地建设，才抱病到四川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在那里去世的。他最后还是那样关心内地建设，那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呢？有些人现在抛弃了自己光荣的革命工作岗位，跑到上海来。有的人跑到上海要求报户口，重新安排工作。达不到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斗工厂干部。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有一些人吃了国家的饭，不为人民服务，在城市里干了些坏事，那更是错误的。新疆建设兵团那里因为内地去的人大量回到上海来了，他们那里农业生产已经受到影响。我们崇明岛、长兴岛一些国营农场因为一些青年同志跑回市内来了，那里的生产就完全停顿了。有的农场，去年的稻子都没有收，棉花还在地里。听到这消息我们非常痛心。上海的一些学生听到这消息非常痛心，现已有几千人跑去抢收了。那为什么原来应该在这个岗位的人不回去呢？我们特别听到，在几个大饭店里，如和平饭店里就住着国营农场的工人，那么我们就请问这些工人同志，你们住在和平饭店做什么？你们的岗位是在你们的农场嘛！你们住在和平饭店要学坏的。你们应快点回去。而且你们中间在下乡上山青年中，从外地回到上海的人中间，有那么一小撮人是坏人，他们在那不干好事。我们的青年同志、革命工人不要上他们的当，应按中央指示办事，回到自己的光荣的岗位上去。现在春耕已经开始了，应该回去了，你们是有实际困难，我们知道。但是这些困难应该按照正常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这种事作借口就不回去。有些从贵州、四川回来的同志，我们也知道，我在北京看到一些电报，贵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厉害，压迫过你们。那现在改变了嘛！贵州已是先进的地方了嘛！你们都应回去与那里的工人同志团结一致闹革命，支持贵州革命委员会，去进行夺权斗争。不应该在上海了，留着了。有些人现在劳动纪律很不好，名义上是出来造反，实际上是什么反可造，就是逛大街玩，当然这不是所有的人，有那么一部分人。我觉得如果同志们真的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话，就应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因为这样懒懒散散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色。我们革命造反派同志是在最困难的时候都顶上去的。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回到生产岗位，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违背这个方针，也不能违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些规定。我们赞成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对有些人他们这样不顾劳动纪律就应该加以考虑：如果教育了，劝了，还不回去就应停发工资，因为国家不能这样拿钱养人；实在不行应该开除；如再干坏事，就应受法律制裁。我们上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上海今后还是会往外动员人口的，所以想在上海市内安排工作，不要抱这个希望，没有什么希望，死了这条心吧！对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我不想再多讲了，就讲这么一点，我把话说死一点是为了大家都死了心，才好办事，才能回去。

镇压反革命这方面用不着多讲，上海这地方同志们总记得，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人数不多，只有那一小撮，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要重视他们。镇压反革命问题不能粗心大意，现在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观察，特别是我们广大的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情况很复杂，就是有许多反革命。如果他们说：“我是反革命”，这就好办了，现在有些是打着造反的旗子，有的是削尖了脑袋，钻到造反组织内部来了，这一点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同

志都应提高警惕性。我们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从来是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靠专政机关、靠人民军队、靠公安局、同时靠专政机关和革命人民的结合。这样充分的群众路线，如果我们广大革命群众起来了，那么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用什么方式活动，他们搞秘密活动也好，搞公开活动也好，我们就容易识破他们。这是一点，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性。第二希望我们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要加强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要全力支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或我们的上海文化大革命，有最强大的支柱是人民解放军，不但有陆军还有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他们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支持各革命造反派，已做了很多工作，在这里，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上海的陆、海、空军指战员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向人民解放军同志们保证，如有人攻击你们，如有人对你们采取冲击军事机关那样的行动，我们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坚决和人民解放军站在一起。

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地方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指示，实行军事管制，但那个地方有的组织，他们说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有的预先谈过话，应该服从中央命令，要实行军事管制就实行，但那里的组织里边的人（当然是很少的），竟然不执行军事管制，甚至把军事管制的命令划了叉叉，而且对军事代表围攻，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单位的犯过错误的人如果他们真正是革命造反派的话，应先作检查，向军事代表赔礼道歉，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要采取别的措施！

另外，还应说一点，现在市面上造谣很多，谣言造得越来越离奇，有些人（也不多），他们就是专靠造谣吃饭。有那么一位接管市委的人，突然发了一个什么“总理的四点指示”，我想到这个指示奇怪呀！中央既然有这个指示不会不告诉我们吧！？后来我们就打了电话到北京问，根本没有这回事。他就可以假冒中央名义，到处散发是“总理的几点指示”。当你问他时，他告诉你“不是总理，是伯达同志指示”。再问又说“不是陈伯达同志的，是从那里听来的”。居然可以这样冒充总理的名义，到处去造谣，“红革会”的人也干这个事，说是中央文革一月二十九日电报是假的，然后又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说总理经过总参，告诉上海的“红革会”，又是总理，又恰恰是四点指示，总理好象专门发“四点指示”。说什么“红革会是不对的，张春桥派兵也是不对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样子，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总理从来没有过什么这样“四点指示”。上海的红卫军发过二次特大喜报，一次特大喜报是总理讲：“毛主席、林彪同志讲转复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但总理讲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报，说总理讲，全国的红卫军都不好，就是上海的最好。总理从来没有过什么这样“四点指示”。这些东西我本来一到上海就知道都是谣言。这次我们在北京开会，当作笑话给总理讲了一下，大家笑了一场。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毫无一点影子。

还有一些谣言，造到我身上来。最近我看了一下关于我的谣言，多得很，我简直一点也没有办法。比如说，有一张传单，说我给三军的同志谈话，谈话时说到什么工三司如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声明，我和三军的同志的谈话是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谈到什么工三司。那个谣言多啰，又是什么我们在北京，突然国务院接待站打来电话，说上海一、二、三兵团，工三司代表来告状，告上海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告王洪文、潘国平和我。而且里面说上海那一天五十万工人游行。你们在上海的，你们知道那一天有过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嘛！这两天又有什么好几个离奇的电话，是说什么王力同志分析上海的形势，有五点指示，我算一算这个时间，我们正在北京，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事。我现在也不去问王力，也用不着去问。还有个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复的，说上海人民公社如何，说中央不承认。我在这里说一句就行了，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本没有个接待站，他是个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在北京不是有个工人劳动文化宫嘛，那个地方是什么？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文化革命接待站。文化革命小组没有接待站。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什么中央文革小组第一联络站有个什么几点指示，更是胡说八道，那里有这些东西。连一个接待站

也没有，那怎么又听了五点指示。我看你真是碰了鬼了。(笑声、鼓掌)现在有些人就是靠这个，就好象说北京有个什么消息啊，到上海街上一贴，就谁也不能辟谣。我们是实在是不愿意辟谣，也不值得辟谣。如果要辟谣也很简单，你以为你可以造谣，我们就不可以给总理打个电话去问一问吗？那样子造谣法，这样的人如果再造谣啊，小心一点。假冒中央，国家政府首脑的名义造谣，你要负法律责任的！(呼口号)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理你就摆出来，不要造谣言，靠谣言吃饭是吃不饱的，有道理你就来讲吧。比如“红革会”那些头头们，你有道理你完全可以讲嘛！不要靠造谣，我们相信“红革会”的战士们是要革命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曾经向我们打电话要求说他们要开请罪大会，要我们参加，我说你们战士们有什么罪啊！你们请什么罪呀？红革会战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一小撮头头，就是那些头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认真地改正错误，我们不准备一棍子打死。但是那要采取老老实态度，不能采取蒙混的办法，或故意挑动红革会战士，使得战士继续上你们的当，我们采取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小组电报的态度，我们支持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我们欢迎红革会战士们造反！

现在还有那么一股风，故意挑动我们革命干部子女，军队干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一个什么革干军干子弟联合战斗团的传单，这是一张反动的传单。他们故意地来挑动革干军干子女，说现在社会上到处斗你们，斗你们的父母。这是胡说八道！我们革命干部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的这一边的，我们的军队干部更是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的这一边的，革干、军干子女绝大多数也是站在毛主席的这一边的，这些孩子是党的，是人民的，是毛主席的。他们即使有缺点错误是可以改的，你们想挑动他们的感情，把他们拉到一条错误道路上去，去搞什么“联动”，你们是得不了逞的！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很好地对待这些青年同志，因为他们是党的，他们会跟着党走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做他们的工作，这样才能使得“联动”这样反动组织不能在上海扩大活动。

最后我想说一下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准备多说了，因为我已经讲的时间很长了，现在我们为了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到底，我们需要把上海的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加以整顿，特别是要从思想上加以提高，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为上海人民为全国人民建立了功劳，这是谁都看得到的抹煞不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我这里讲的是革命造反派的组织，不是讲的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我们的队伍里也有不纯洁的。有的需要清理一下，同时我们建议，能够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有些群众性革命组织跨行业的很多。他又是工人组织，里边又有农民，又有机关干部，又有学生，又有文艺工作者，很杂。有的以学生组织为主又吸取了别的，有的以工人为主吸取了别的。这样搞不好。还是按照产业来组织好。同时，不是按单位来组织也有问题，大家搞的都在上面，混进来坏人也不知道。如果在本单位组织，比较好，坏人不容易钻进来。同时从整个斗争，从批判，特别是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一个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者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只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好多革命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用协商的方法解决。现在有些办法，有很多行会性的组织，有的是专门搞经济斗争的组织，那实际上是分裂了工人阶级。比如说，有的是按年份，那个东西怎么能够一起去造反呢？比如说，1965年大学毕业生一个造反司令部，我就劝这样的同志，你们考虑一下，1965年也好，1957年也好，别的年也好，不管那一年吧，反正你那一年，总是里边有左、中、右吧，有两个阶级吧。你们的那一年都是左派，都是革命派，我不相信。我们要搞嘛，总得按阶级，按左、中、右来组织吧。我们是革命造反派，那末就要按革命造反派来组织，怎么按年份呢？说58年，或者不管按那个年份最好，49年那个年份也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也不能

划分阶级啊！有些更是一看名字就知道是什么，……那天我听人家说，有些公墓有些坟被挖了。当然这些事情要解决啰，被挖的这些人就组织了一个造反司令部，我也不晓得造什么反，但也要有经费，也要刻图章，也要搞什么，这个不成为一个什么革命造反组织嘛！又有些组织是不能承认的，不应该组织的，我们希望他们自己自动解散。有些机构脱产人员太多，刚才我讲了，要加以解决。将来要逐步做到按巴黎公社原则来选举，有些组织的设立名义很大，其实没几个人，但是也要房子，也要汽车，这些人我还是希望回到原来的岗位去，好好的生产，好好的革命。你如果能够把你这个单位真正搞好了，就不错了，咱们现在还有好多单位的权没有夺下来哩！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说一下，就是增强组织问题。今后要好好地学习，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够借口忙不看书。这个旧市委的有些领导人，就是不学习。要想着学习毛主席著作那真是难了。什么规定星期六要学习啦，但是一个人也找不到。这个东西要靠自觉的，我们同志们知道，《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有一句话，希望有些人不要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志很好地想一想这句话，我们最近发现一批人，但是总数不是很多，包括在北京也有，外地也有，我们都是很欣赏那几个人，这几个人真是不错，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很有才干。但是最近都犯了比较大的错误，这句话就是对这些人讲的。在座的同志们，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当刚刚取得一点胜利，就冲昏了头脑的人，原来个人主义就有，但在这个时候个人主义突然大发展，有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要很好地读毛主席的书，不是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念几段语录，真正要学会主席的思想，语录要读，主席的有些重要的著作要读。特别是已经当了权，现在夺了权，自己是当权派了，究竟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这个问题，我们面临着考验，如果我们当了权，我们跟着毛主席走，真的读毛主席的书，向我们头脑中不好的东西，经常不断地作斗争，那我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当权派。如果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发展了，那我们也可能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要被打倒。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批人或者就是在座的一部分同志起来打倒我们。这个话，我想在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时候，讲一讲这个话有好处，为了使大家不被打倒，于是先要想到被打倒。

在学习这一点上，我们要很好地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现在一天他花在读书、看报上的时间，那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全国的红卫兵的报纸他都要，而且他都在看，好多种传单他都在看，每天，秘书组都要送来一摞报纸和传单。他为什么会了解这么多情况呢？很多情况得从这里面了解。他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讲，他跟我们讲，你们不管怎么忙，你们最好一天拿四小时读书看报。同志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就不能拿两小时啊？

同志们，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是听了毛主席的话的，我们有信心，不管阶级敌人多么猖狂，他们是打不倒我们的。但是，堡垒是容易从内部突破的，如果我自己搞不好，如果我们不是坚决地完全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做，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地、不断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认真地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那可能坏事坏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我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有最大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在毛主席的关怀之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取得更伟大有胜利！

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祝同志们在工作里面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第六十八卷 1967年2月25日至2月28日

(政治生活会的召开 军以上干部会议的召开)

2月25日—3月18日

中央七次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围攻批判了谭震林等元老派。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以后，由周恩来主持的党、政、军、文革“碰头会”停止召开，毛泽东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行使党、军大权。中央文革的权力陡然大增。社会上则掀起反所谓“二月逆流”的高潮。

徐向前《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在三月份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还说：二月逆流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原来设想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二、三、四月要看出个眉目，但他们把运动打下去了。此后，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议被干脆取消。

2月25日

陈伯达、康生、江青、叶剑英、关锋、戚本禹、叶群接见即将参加高校下一期军政训练的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干部。江青指示：军政训练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叶剑英说：中央文革八个月来的工作，是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工作的，成绩是伟大的。（《传信录547》）

陈伯达、康生、王力接见云南省造反派时讲话：大联合是大方向一致下的大联合。工厂是干部和民兵三结合。在夺权中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是错误的。目前提出造反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精神。（《传信录548》）

吴法宪对空军司令部与直属组织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讲话：继揪出成钧、刘震、张廷发、何廷一、王静敏之后，各部门又提出一些有重大错误的人，如司令部的邢永宁、尉剑畴、王少江；政治部的黄玉昆、王平水、夏屏西；高指的周彪、杨易风；雷达兵部的向黑樱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传信录549》）

北京“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络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大规模的批斗大会。被王力、戚本禹赐名为“新时代的狂人”的陈里宁在会上发言，控诉刘、邓路线对他们的迫害。“3·6专案联合战斗团”发言指刘少奇为大叛徒，利用职权，指使薄一波、安子文叛党出狱。

张春桥在接见北京驻沪联络站师生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一本典型的修正主义代表作。这本书在国内、国际都有很坏的影响。现在批判它，给红卫兵出个难题。”他在与华东局造反派代表座谈时说：刘少奇看来九大中央还要选为中央委员。毛主席说：看来以后我还要与他一起工作的。彭、罗、陆、杨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了，毛主席建议不要开了，说：我怎么能和他们四人（反党分子）一起开会呢？（《传信录550》）

从 24 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在全市各革命组织的协助下，分别逮捕“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红色造反兵团”、“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第一战斗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的领导人四十余人。前三个组织被定为反革命组织。

《首都红代会首战告捷》

二月二十五日，从凌晨六时起，首都红代会所属单位配合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合行动。坚决镇压和取缔了“全红总”等九个反动的和罪行严重的所谓全国性组织。广大的红卫兵战士、革命的教职员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走上街头，革命的干部也以高昂的斗志投入这一行动。“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我们坚决和中央文革小组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刘邓陶必须从党中央滚出去！”“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坚决拥护解放军！”的震天口号声划破首都的长空。首都红代会首战告捷，显示了大联合的巨大威力！

(清华《井冈山》第 18 期 1967.2.27 日出版)

上海“工总司”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被拘捕，第二兵团开始瓦解。二兵团长期与“工总司”抗衡，秘密策划结合陈丕显，进行夺权，反对张春桥、王洪文，故被吞没。与之相近的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均相继瓦解。1967 年 5 月 2 日，耿金章始得释放。

广州揪斗陶铸、赵紫阳、区梦觉、林李明。

2 月 26 日—3 月 25 日

由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召开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三支两军问题。

据《神坛下的林彪》：由于周恩来的建议未先通过林彪，康生首先提出：“此例不可开”。江青也认为“这很危险”。叶群于是伙同康生向毛泽东告状。周恩来特意给林彪写信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并保证今后“决不重犯”。(第 113—114 页)

2 月 26 日

周恩来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成员时，说：党中央、中央各部不能夺权。中央各部夺权主要指的是监督业务。但中央只有几个部管住了，如外交部。当有人认为解散文革领导小组是破坏十六条时，周说：十六条早就突破了。可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对革命实行领导，对业务实行监督。要由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和有气魄的闯将，以闯将为基础，组成革命委员会。(《传信录 551》)

周恩来与广东省、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后，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建议对广东实行军管。对与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亦行军管。毛批示：“同意这样作。”

李富春接见大庆地区革命造反派代表，指出：大庆还是一面红旗。为什么百分之八十的标兵都被打倒了？(《传信录 552》)

李先念接见外贸学院造反派，欢送他们撤出外贸部。(《传信录 553》)

《人民日报》发表上海体育界造反派文章《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首都和中南地区斗争陶铸筹备处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斗争陶铸大会，熊复、雍

文涛、萧望东等陪斗。

2月27日

毛泽东对周恩来讲：“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能同意，难道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毛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还说：今后应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晚，康生、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原“首都三司驻外地联络站”代表，指出军区不能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志。红卫兵在运动初期搞串联，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儿可能起不好的作用，所以驻外地联络站一律要撤回来。（《传信录 554》）

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王力、关锋在广播事业局座谈。江青讲话，问：为什么让丁莱夫之流丢在一边睡大觉？这是敌人！对敌人，我看要狠。（《传信录 555》）

陈伯达、王力、关锋给《人民日报》临时监督小组指示：唐平铸与一月中《解放日报》事件没有责任，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传信录 556》）

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若干补充。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颁发后，得到全军广大革命同志的热烈拥护。军委决定暂停四大的单位，有的已经转入正面教育，并撤销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广大革命群众按照保持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也自动撤销或改组了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

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2月28日

毛泽东在陈伯达送呈的一个材料^①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载：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决战时刻，刘邓王朝面临着总崩溃。他们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谭震林赤膊上阵，一手制造了农口的反革命复辟事件。党内走资派一个个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凶相毕露，向革命造反派展开了全面的反攻倒算。

清华大学蒋南翔之流狂叫：“你们造前党委的反造错了。清华是有成绩的，是先进单位”。胡说他“与彭真只有工作关系”，“对陆定一一些地方有抵制”。

团中央黑帮分子胡耀邦丧心病狂地提出“申诉”。

地质部的落水狗何长工也爬上岸来，狂吠：“大民主也有我一份”。

彭真的黑爪牙吴子牧喊冤叫屈：“我怎么能是黑帮呢？”

刘少奇的臭婆娘王光美也疯狂叫嚣：“打倒了再爬起来……”。

^① 天津小站的材料。

许多单位的党内走资派利用“亮相”、“三结合”等革命口号，大搞合二而一，大搞反革命复辟。“联动”也猖狂活动，叫嚣“二十年后平反，三十年后掌权”。各单位的保守势力纷纷抬头，配合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组成反革命十字军，猖狂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对革命造反派实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在中央会议上，刘邓之流贼心不死，抓住群众运动的某些缺点，并把它强加于中央文革头上，妄图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自己翻案。

[青海] 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操纵保守势力，调动专政工具，包围和冲击已被造反派夺权的《青海日报》，围攻革命小将达十天十夜。2月23日，赵永夫之流对青海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和逮捕，三百余革命群众，其中包括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惨遭残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二三惨案。

[重庆] 李井泉之流采用了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控制了重大八·一五等一些组织的头头，他们把中央的口号接过去，加以篡改歪曲，大搞反革命的“三结合”。二月八日成立了伪革联会。于是，保守派大翻天，疯狂向革命派反扑。他们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重大“八·二六”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乱抓乱捕，非法审讯，残酷拷打，实行白色恐怖。妖雾弥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

[武汉] 陈再道之流将“三钢”等革命组织发表的《二·八声明》打成大毒草，继而又在造反派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制造分裂。称《二·八声明》是香花的为“香花派”，反对它的为“毒草派”，挑拨两派之间的关系。三月二十一日，陈再道又抛出了《三·二一公告》，把武汉地区最坚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并拥有四十八万战士的“钢工总”取缔了。近二千名革命闯将被捕，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被斗、被整。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

[湖南] 湖南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欺骗中央文革，谎报下情，将“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长高司”反倒成了革命左派。大批的革命小将被捕入狱，遭毒打、受迫害，白色恐怖又一次笼罩了湖南。

[河南] 党内走资派利用专政工具，并操纵“公安公社”等保守组织，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等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派实行了大搜捕、大镇压。他们用飞机散发传单，把郑大“联委”打成非法组织，并狂吠要打倒“三八一联”（三八即开封“八·二四”，洛阳“八·一六”、新乡“八·一八”，一联即郑州大学“联委”）。他们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北京揪刘建勋同志，向真正的革命派反攻倒算。

[内蒙] 党内走资派乌兰夫代理人王逸伦、王铎之流，把军区党委书记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并擅自逮捕支持呼和浩特革命造反派三司等革命组织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二月五日，他们开枪打死革命小将，制造了“韩桐事件”。接着，大肆逮捕革命群众，企图把革命造反派、革命领导干部压在阴山之下。

[成都] 李井泉及其狗老婆组织“产业军”。他们出动飞机散发军委《二·一七来信》，利用这一来信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战斗团”打成反动组织，成千成千地逮捕革命群众，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万县，在宜宾，在泸定，都发生了严重的开枪流血事件。

在福建、在新疆、在安徽、在西藏、在东北都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无数的革命闯将被毒打、被关押、被残害……

谢富治、傅崇碧接见首都职工革命组织代表。傅说：最近北京工人组织武斗相当严重。现在各工人组织应该停止发展。工人组织中打人、抓人、私设公堂。

农村也有，昌平搞得很厉害。谢富治强调夺权没有经验可创造。前一段夺权经验有四点：一要实行三结合；二要搞大联合；三、夺权的必须是真正的左派；四、必须依靠本单位。离了这四条就不行。（《传信录 557》）

《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市革委会在 23 日通过的《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的错误。

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实行联合，《人民日报》在 3 月 1 日刊登了这一消息，并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为题，发表社论。

周恩来宣布对广东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

周恩来、李富春、余秋里、谷牧等接见煤炭、铁道、石油等部造反派代表，对抓革命、促生产再次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三月份再不搞“三结合”，就要犯方向路线性错误。周表扬了石油部生产情况。

2月

毛泽东指示：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高风格。北京街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对运动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登报贴在大街上，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八月初也没有这样凶。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将来他们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就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了，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的斗臭。（周恩来在接见黑龙江红色造反者时传达）

毛泽东指示：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毛泽东讲话：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向总理和国务院送递的一份指令中，要废除所有的首长。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很反动的……其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首长才行。

谢富治指示：有些小报刊登谣言，影响不好。今后首长讲话不许张贴大字报与发传单。

江青指责上海市公安局整了她的“黑材料”，为此将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打成“现行反革命”，副部长凌云被捕入狱。

传单流传的陈毅讲话：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校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

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磨菇，明天来跟你磨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

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一九五二年犯过一次，一九四九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过去)犯错误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在井冈山的两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完全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还不错嘛！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引者注：这句话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如果外交人员都象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引者注：这又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泄密，完全为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引者注：指江青)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引者注：指红卫兵)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引者注：这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十一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光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嘛！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引者注：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引者注：此处“运动”指政治运动)，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①

2、3月

自上海“鲁迅兵团”文章发表后，从二月底到三月初，首都各高校造反派组织纷纷开始整风。

^① 陈毅这篇讲话，似是好事者摘引他在文革中许多次讲话的一些段落并加上一些说法编次而成，流传甚广。通过它，一以见陈毅之为人；二则反映了当时一些老干部的情绪，故全文保存。在文革中，真是表现硬骨铮铮的中共高层领导第一当推陈少敏；其次当是陈毅、谭震林。其余则尽是软骨头一摊，卑卑无足道。

第六十九卷 1967年3月1日至8日

3月1日

《红旗》第四期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声言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能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它是由毛亲自审阅修改的。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节录)

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利。”

事实证明，这个基本估计是正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必须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

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我们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敌人。不把他们打倒，我们国家就会变颜色，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从他们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敌我不分，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

半年多以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猛烈的反击中，有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信赖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对于当权派，当然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群众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十七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十七年来的伟大成就。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右分子，故意混淆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界限，故意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团员，妄图达到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一切革命同志，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上当。

周恩来在接见西安造反派代表时，对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全国各校又提出抓、揪、抄，表示愤慨。他质问：你们眼里有没有中央？他提出：今后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对流行的“大联合、大夺权”口号，他传达说，2月27日毛主席已表示不同意，难道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改为“大联合夺权”。他提出：“大联合”要一个系统联合，不要跨行业，已经跨了的要改正。他指责批刘澜涛的小报实在不好，丑化。北京更不像话，搞了个《百丑图》。再这样，过几天我们就要封报了。（《传信录559》）

周恩来、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继2月28日再次接见工交所属铁道、煤炭、石油、水电、一机、化工、冶金等七部造反派及负责人，逐一研究煤炭、矿冶、石油三部恢复业务问题，指示介入的矿业学院学生退回原校整风。会议继续在二日举行。（《传信录560》）

3月2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不准部队所属的一些单位进行串连。

关于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等单位不准串连的通知

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并各省、市、自治区人委（均请所在军区转）：

为了保守军事机密，部队所属国防施工、基本建设、科研、设计单位和军队修理工厂、军需生产工厂，经中央文革同意，非军队人员一律不要去串连，已进去串连的应立即退出。军队内部人员串连问题，按军委有关规定办理。这一通知，可在有关各单位内部张贴。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

周恩来、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继续同工交各部造反派及负责人，研究恢复业务问题。（《传信录561》）

江青召集十二省、区负责人开会。会上，江攻击邓小平是汉奸、法西斯、反革命两面派。

戚本禹在人民大学讲话：人大的第一个敌人是孙泱。第二是郭影秋，第三是胡锡奎。建议“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开门整风。“三红”搞康老的材料有很大的错误，应该吸取教训，清理队伍，达到联合，不能马上联合，也要协力。注意斗争方式，还要注意保密。

《人民日报》正式宣布山东省革委会诞生，并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同时还登载了山东省革委会在2月3日发布的第一号通告。

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和批发的《首都红代会宣言》。清华、北大、师大等院校造反派连日欢呼庆祝。

下午，首都几十个单位在钢铁学院开会，斗争了反革命组织“全红总”的头目王振海等。

体委“革命造反联络总部”斗争荣高棠。

3月初

戚本禹谈北京市老干部吴德、刘建勋、丁国钰、高扬文、李清泉是比较好的，

有的比较坏，如雍文涛。（《传信录 564》）

3月3日

毛泽东发布《关于军队要协同地方管工业的指示》：

林彪、周恩来同志：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小组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工厂作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某某军在无锡、某某军在重庆、某某军在伊春、韦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毛泽东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劝阻自发前往援越抗美的通知。

中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劝阻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自发赴越援越抗美的通知

从去年十一月以来，发生多起我红卫兵越境到越南，要求去越南南方参加抗美斗争的事件。最近又有安徽、江西、湖南等二十个省市的二百多名红卫兵和革命职工，汇集于中越边境的凭祥市，要求市委发给他们去越南的护照。还有些人直接向越南驻华使馆写信、发电报、打电话，要求赴越。此事已引起越方注意，并要我们帮做解释工作。由于这些行动涉及中越两国关系，处理不好容易使我陷于被动，请你们即通过革命组织予以劝阻。谈话时可着重说明以下几点：

一、我红卫兵和革命职工要求到越南参加抗美斗争，表达我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坚强意志，这种革命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是好的。

二、我国抗美援越的行动，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应当在党中央和我国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任何个人、任何团体，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自由行动，一切不听命令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在当前情况下，我红卫兵和革命职工应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回到本地原单位去闹革命，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也不是对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积极支持。

三、我国人员去越南必须取得越方同意。私自越境外出是非法的犯罪行为，也是对兄弟国家的不尊重。因此，这种行为必须坚决制止。我各地革命群众也不要直接向越南驻华使馆、领事馆提出赴越要求，以免使对方为难。

此通知在必需时可向革命群众宣读，不得向外张贴。

中央军委办公室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总政部门干部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聂荣臻、萧华、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参加。萧华就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作了检讨。陈伯达讲话：萧华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由于长期养病，8月10日才回来，在一段时期犯了些错误。周恩来讲话：萧华问题搞得这么大，是有别有用心的想搞垮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传信录 566、567》）

李富春写信给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提出中央认为刘宁一不是三反分子。（《传信录 569》）

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穆欣接见江苏代表团。王力说：对于江渭清，单凭江苏饭店“一三”事件就应该打倒。康生指出：昆明提出“左派内部必须大乱”，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你们江苏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等口号是真的形“左”实右，要坚决反对。（《传信录 568》）

在所谓“二月逆流”时，北京大学校文革的一些人把北大“井冈山”、“红联军”打成反动组织，关押了一百多人。本日，北大哲学系教师郭某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揭发聂在1966年11月涂改录音磁带，

在政治上陷害“井冈山”、“红联军”等问题。聂指郭为“资产阶级整风方针的代表”。北大开始波动。

3月4日

谢富治、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及部分工作人员。戚本禹讲话：中央近来研究一个关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精神是大家都回学校。外地联络站，三个司令部的都撤回。建议三个司令部合并。成立了红代会，三个司令部都撤销。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他们在对红代会所属各小报及印刷厂负责人讲话中，批评出版的东西错误很多，泄露机密、歪曲讲话，还出了“百丑图”。今后对未发表的毛主席著作与诗词，不能随便翻印。（《传信录 575、576》）

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人民大学造反派，就批判朱德问题，指示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你们说是我们叫你们搞，就搞不成。”

“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连日(4 日、5 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彭、罗、陆、杨之外，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安子文、曾三、萧向荣、梁必业及郝治平、严慰冰等数十人陪斗。

《郝治平回忆》：“开会时，我们都在台上站成一排，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会场上又喊、又骂、又拳打、又脚踢。还有人上去打瑞卿的耳光，瑞卿问他们为什么打人？就打得越凶。让我们低着头，跪着，弯腰，还揪着后脖领子。我穿着一件中式棉袄，领子扣得很紧，再一揪，简直喘不上气。看我要不行了，他们才松了手。红卫们穿着大皮鞋，尽管我穿着棉裤，腿上还是踢了好多青紫块。一些人跑上来照相、照电影时，我低着头，就是不让照。他们就拼命扯我的头发。这时，我忽然听见瑞卿在我的身边说：抬起头来，让他们照。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很受鼓舞，心想，我也没有罪，怕什么！我就抬起头来了。这时，又听到一个红卫兵对瑞卿说：你还有什么了不起的！瑞卿说：你们要照就照吧！我抬起头来看他，他被用一个大筐抬着，旁边是一片血迹，这是从脚的伤口里流出来的。天啊！这是什么世道？我心里充满了愤怒。”（《浩劫初起》第 241—242 页）

《罗瑞卿回忆》：以后(1966 年 12 月 24 日)，即是对我不断的斗争，主要是军内系统。有时是三天两天一斗，有时是四五天一斗，也有一连斗几天的，一直到 1967 年的三月底。(4 月入院作手术)约在四月底，又通知我写政治自传，我写了。自传写好后，就不断将我从医院拿出去斗，也不断有审讯。直到九月，将我从医院拿出去一连斗了几天……(同上书，第 243 页)

3月5日

周恩来、康生、王力、关锋等在人大会堂接见江苏两派赴京代表。周恩来说：江苏“红总”(以工农为主体)1.26 夺权，但排斥“8·27”。一月三十日三十万人大会又拒绝“8·27”参加，造成造反派内部分裂，发生打、砸、抢。故采取临时办法，实行军管，但不在报纸上宣布。南京“8·27”是以南京大学 1966 年 8 月造反而著名并发展起来的。它们提出口号：“砸烂文氏黑店”(文凤来为“红总”所支持的革命干部)，“红总”则报以“文凤来好得很！”的口号，“8·27”复以“好个屁！”讥之。故当时以“好派”、“屁派”相称。康生说：自己称自己“屁派”，真糟糕！（《传信录 577》）

李先念在对人民银行造反总部讲话时，对财政金融学院“8·8 战斗队”高度赞扬。并说：外贸学院到外贸部，商学院到商业部，财金学院差不多各单位都去

了，他们去了 30 多个工厂，起了先锋作用。（《传信录 578》）

戚本禹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说：江青同志说过，地院“东方红”的红旗不能倒。还有北航“红旗”、“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师大“井冈山”的红旗不能倒。朱成昭应闭门思过。“东方红”核心领导组应站出来领导。王大宾是个好同志。（《传信录 579》）

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数万群众举行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全红总’大会”。“全红总”头头王振海、李卫兵、周牧等被批斗。

首都各高校普遍开展开门整风。戚本禹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对整风作了指示。要求通过整风，达到联合。

3月6日

江青策划打倒谭震林，指使戚本禹授意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的头头谭厚兰，密谋“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

《文汇报》发表《搞臭风头主义》的社论，认为风头主义是当前革命大联合的危险敌人。

3月7日

毛泽东就《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批示：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三月七日

天津延安中学的报告

报郑副司令员并军区其他首长和全军文革：

现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如下：

这个初级中学一千三百多人。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仅五六十人，组织多而乱，不少组织斗争方向不明确，有武斗现象，学校冷冷清清，经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学校面貌，到校人数达一千一百人，广大革命师生更加热爱毛主席，提高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三性”大大增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委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公物还家，节约闹革命的新风尚。三月一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实践证明，毛主席“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的论断，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我们的体会是：

(一) 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针对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

针对师生中存在的问题，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深刻揭发、批判、控诉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使广大师生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分清了敌我友。接着以整风的

方法，反复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整顿了组织，克服了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为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扶植新生事物。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下，中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实现全校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呢？起初想以战斗组联合。但争论了二十天没有结果，组训五连学生二月十六日写出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便立即显示了他的极大的感召力。两天内即有十五个班联合了起来。可是这时也出现了一些阻力，有的学生说这是“折衷”“调合”“和稀泥”“大杂烩”“破坏文化大革命”，并扬言赴京“告状”。这时组训部队的团党委及时组织广大师生和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组织任务必须服从政治任务”的论述，和《红旗》三期社论。大家认为方向对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

(三)狠抓大联合中的活思想。

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组织在运动中作出了贡献，建立了感情。现在回班闹革命，就产生了不少活思想，搞不清大联合和战斗队的关系。怕失掉“地盘”怕“丢官”怕回班受冷遇等。总之“私”字作怪。我们反复宣传了大联合的意义和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好处后，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种形式有利于大联合，大团结，有利于“三结合”，有利于整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抓革命促教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整顿巩固发展和统一红卫兵队伍。一句话，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彻底完成学校的斗批改任务。同时，并发动所有干部和师生中的骨干做好每个人、每个队的思想工作。使大家愉快地回到教学班内归口闹革命。

(四)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

以教学班为基础联合起来后，组织大家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八条)，各教学班选举了文革小组，遵照八条精神，由下而上整顿和统一了红卫兵组织，称为“延安中学红卫兵”。在整顿和发展工作中，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已发展的 520 名红卫兵中(占受训学生总数的 52%)劳动人民子弟占 85%以上。红卫兵整顿后，战斗力大大加强，已成为全校复课闹革命的一支先锋队。

当否，请指示。

郑三生、衣瑞伦、杨竹亭

67.3.7

毛泽东批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

此件拟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84 号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铁道兵党委的报告，渡口驻军联络站指挥部关于《首先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发给你们。

中央认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重要的经验。

渡口驻军支持左派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转发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先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工指、铁指、各师、各独立团并报军委转：

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以铁五师为主组成)在支持革命左派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具体做法很好，特转发供参考。

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是从政治上支持，也就是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左派自己的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希各部队认真检查过去一个阶段的支左工作，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铁道兵党委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

附：渡口驻军联合指挥部原电：

我们来渡口后，左派欢欣鼓舞，斗志大涨，也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心理，把斗争的胜利寄托在部队的点头和表态上，把部队认为各种事件的当然裁判。凡事必请示报告，有的甚至公开表示：“解放军这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心理最集中的体现在动辄就请求部队派兵支持。一个月来，上百个单位在双方争辩到对持的时候，“都急来电”要求部队前往制止武斗或镇压反革命，特别是左派处于少数，右派制造白色恐怖的地方，请求部队派兵支持的更加频繁。对此，我们从未轻易出动，必要时只派一个同志前往呼吁双方坚持文斗。

我们认为，部队只能在确实判成是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才能出动坚决镇压，如在两派激烈争辩时，轻易出动，那怕是少量部队也危险很大。

- 一、容易掩盖矛盾，使观点不能充分暴露，推迟左派大联合的进程。
- 二、弄不好，要被坏人利用，使部分群众误认为部队镇压工人革命运动，挑起一些争端。
- 三、有可能长了保皇派的威风，挫伤革命造反派的锐气。保皇派往往自恃成分好，历史清楚，认不清大方向，把革命造反派某些过激行动统统说成是“牛鬼蛇神出笼了”。保守派还最容易误认为部队是他们的当然后盾，在斗争激烈时，便强烈要求出兵支持。

有鉴于此，我们把支持革命左派的斗争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中去识别真正的革命左派。在对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

1. 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主席的教导去寻求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使这场伟大的斗争真正成为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我们认识在这场阶级的搏斗中，激烈的争辩和少数人也出来捣乱，是必然的现象，是好事情。这种大风大浪正是产生真正革命派的必然条件，只要我们适时的为群众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任何错综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也才能使他们尝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甜头，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组织，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才是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决定力量。这一点即是支左斗争的关键，也是支左掌权的关键。

2. 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作好团结教育内部工作，使之成为思想统一基础上有战斗力的坚强集体。

多数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原来是普通工人，对抓人的活思想认识不足，多是注意研究一些斗争方法的问题，往往在大风浪中便出现组织的畸形发展的现象。我们便组织他们学习“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的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总结自己在激烈斗争中组织涣散的教训。现在有的左派重视这一环节，能根据斗争的形势，大抓内部的政治思想，他们在处于少数，甚至在右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下，轰不垮，压不倒，拆不散。在激烈尖锐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3. 帮助他们紧跟上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斗争的大方向，及时把全国的新形势、新经验和上级的政策精神，向他们传达，与他们同学同议，澄清糊涂认识，把自己的行动变成更自觉，使千头万绪的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这条纲上来，不被个别事件所激怒，及时修正错误。使一切行动都能将革命造反精神和强烈的政策精神统一起来。

以上报告当否，请示。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草案)

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行斗、批、改。

二、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

三、各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接着统一安排，分期分批地进行短期军政训练。

四、各院校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深入地进行批判和斗争。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

五、各大专院校，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以外，对各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助教、职工、都应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吸收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安排他们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六、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实行全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

七、大专院校的革命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应该以劳动人民家庭(包括工农兵和革命干部以及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八、大专院校所属工厂、企业和科学事业单位，必须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这一文件，可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张贴。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中小学复课闹革命》(节录)

中小学的革命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有了很多的贡献。目前，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摆在中小学革命师生面前的光荣任务，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是革

命的师生回到学校去，为无产阶级占领中小学阵地的时候了。

中小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等学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年轻一代的一个重要战场。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小学革命师生，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把中小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并且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复课闹革命，要紧紧抓住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要看到，复课闹革命，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定要很好批判，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批判得不认真，就不能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

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用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科学常识。

过去，在有些学校里，由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斗群众，造成了一些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员之间，教员和教员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存在着个人主义、风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些，都阻碍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阻碍着斗、批、改的进行。中小学的革命师生一定要认清形势，一定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具体安排上课。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小学的革命师生一定要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注意绝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学生。就是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学生，除了个别的首恶分子和犯罪分子必须法办以外，对它们也应当采取争取教育的方针，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应当允许他们革命，不应当歧视他们。教职员中坚持反动立场而又不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指本人，不是指家庭出身)必须清除出去。但是应该看到，中小学的教员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要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人，要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正确解决。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小牛鬼蛇神”的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必须认真平反。我们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采》。

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在春耕期间不要在农村生产队搞夺权。

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 中发(67)82号

各级党委：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发布以来，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农村文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当前正是春耕大忙时节，各地农村应该在这样大好形势下，认真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立即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春耕

生产高潮，这是关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关系到全年收成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头等大事。

为此，中央决定：

- 一、在春耕大忙期间，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要进行夺权斗争。
- 二、已经夺权并经革命群众和上级同意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班子，应该切实地挑起革命和生产的两副重担，用毛泽东思想指挥好春耕战斗。领导瘫痪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应由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革命干部组成临时的领导班子来抓好春耕生产。
- 三、农村干部(包括正职)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 四、在已经四清过的地方，决不允许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要坚决卫护四清运动的成果。

(这一通知可在农村中宣读和张贴)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北京出现“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指责谭震林炮制大寨展览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为刘、邓翻案。”

北京市委干部刘建勋、吴德、高扬文等在首都剧场向全体革命干部检查了错误，进行“表态”。

贺龙在其西山的幽居地写完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

戚本禹密函江青、康生、陈伯达，“正式向组织建议，要刘、邓、陶、朱搬出中南海。”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作出《关于全体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开展军政训练的决议》。决定全体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开始，进行军政训练。

3月7日—16日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来华访问，10日参观了北航。

3月8日

中央转发毛泽东就天津延安中学实现大联合体会一文的批示。

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
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批示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

现将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毛主席所加的批语，对于学校的军训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请你们向所有参加军训工作的干部和全体师生传达，组织大家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此后，人民解放军陆续派出军训团进驻学校，开始对大、中、小学师生分期分批进行军训。军训团到校后，搞大联合，建立革委会，将学校教导、总务等机

构改为政工、教育革命、后勤等组。并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度，撤销教研室(组)，将师生统一按班、排、连、营建制编队，设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

林彪找李作鹏谈话，指示：“我想搜集一点具体事实，来说明军队中间也存在着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方面的路线斗争，请李作鹏同志把海军苏振华等人如何执行刘邓路线，在上面勾结坏头头，在下面煽动群众，向李、王、张进攻的材料，给我整理出来，把事实摆出来。要采取列举事实的办法，拉条条的方法，不要写成文章，很快搞出来，三天交卷。”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陈永贵等先后参观了在八一学校，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八一学校是北京军区高干子女寄宿学校，学生在校养尊处优。全校千余人，其中六百余是服务人员。文革期间，学生中出现大批“联动”分子，对学校大行破坏。来参观的中央首长一致认为，应当砸烂高干子女寄宿制度。康生看到被砸的标本室时，说：“土匪，完全是土匪！”（《传信录 584》）

这个展览会受到“联动”成员的多次冲击。

康生对全国总工会四组织所主办的小报《红旗》上刊载《揪出反革命两面派刘宁一》一文提出严厉指责，说刘宁一不是三反分子，不是三和一少路线的制定者，而是揭发者。（《传信录 585》）

王力接见广播事业局整风小组及造反派组织代表，指示开门整风。中央文革重视2·18武斗，“这与反中央文革的逆流时间差不多，配合在一起。”希望电台能与中央文革共患难，真正站在一起。（《传信录 586》）

北京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召开“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街头四处出现“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

下午，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千余人，由谭厚兰等率领，高喊“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冲击并占领了“大寨展览会”所在的北京农展馆。

晚上，由谭厚兰组织的又一批人冲进农业部，占驻该部。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抄了北京部队政委廖汉生家。廖是贺龙的外甥。廖与其妻均被送到北京卫戍区看押。

第七十卷 1967 年 3 月 9 日至 11 日

3月9日

谢富治、戚本禹接见北京日报社造反派，宣布从 12 日开始，报社由军队接管。接管后，进驻报社的工人、学生要退出报社。

农业部召开批判谭震林大会。

3月9日—10日

在解放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与谢胡、卡博、巴卢库的谈话。陈伯达讲话，揭露从 1962 年以来刘少奇“反毛主席的罪行”。“当前的斗争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大意）

刚才康老介绍了毛主席 1966 年 5 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 8^①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的斗争，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危险的，资本主义就要复辟。

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1962 年刮单干风，就是刘少奇为首，邓小平赞成的。他们的那一套，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64 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的那一套，表面上“左”，实际上右，现在揭发了很多材料，象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搞的四清，原来是假的，让坏人专了政。1964 年毛主席有意指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说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当时，毛主席就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意见，说：“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封建社会就有清官赃官的矛盾，这种提法，不是阶级分析，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刘少奇 1962 年提倡单干，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新的重大发展。

1964 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了，他就不让发了，他说：“这个报告修改后，有些地方还要斟酌。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是王光美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蹲点。蹲点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刘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点是阶级分析的蹲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是调查研究的蹲点，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 1964 年开始的，也不是 1962 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

^① 此处时间有误，可能是 1967 年 2 月份。

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就是要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条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育，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1949年他在天津王光美的家里，对资本家说，资本家要大胆剥削，工人欢迎你有剥削。他说现在必须提倡剥削，欢迎剥削，还说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不能生活。1952年山西有一个合作化问题的文件，刘少奇批了，认为合作化是不合适的。最近发现了一个材料，1950年1月他在东北提出了一个意见，说搞变工队不行，不能发展到集体经济。大家知道，毛主席在抗日时期，大大提倡变工队，变工队是发展合作化集体经济的前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刘少奇在东北否定变工队，提倡“三马一犁”。他认为“三马一犁”发展到80%，才能搞变工队，没有“三马一犁”，变工队就没有基础，要让单干放任自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

七大以后，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胜利，敢不敢胜利，胜利后走到那里去。一条是要胜利，敢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不要胜利，不敢胜利，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

1965年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彭真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的一个讲话，我们做了注解，发给大家看看。彭真在东北实行的是国民党路线，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林彪同志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东北取得了胜利，这是很重大的关键问题。后来，彭真在东北站不住脚了，回到华北。那时正在土改，刘少奇要他在华北搞土改。他搞“搬石头”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历史上可以查明，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行动上，刘少奇、彭真都是这样搞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实际上不是一切，而是打倒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肯定地主，资产阶级。

从历史上看，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问题就容易看得懂了。

彭真在去年二月搞了一个汇报提纲，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提纲，要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革无产阶级的命。在同一时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搞了另外一个文件，无产阶级的文件。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央发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执笔的，否定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到党中央来。过去是若隐若现，现在变的非常明显，非常尖锐了。

社会主义越发展，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一定要反抗。一九六五年，彭真一边讲二十三条，一边反二十三条，经过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就抛出了这个汇报提纲，赤裸裸地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这个提纲，否定了彭真在中央在北京的地位，站不住了。中央的通知是五月份发出的，六月北京市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一天等于二十年，时间过得很快，事情很多。这是一个大革命，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大革命，广泛地动员了群众，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大规模斗争。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八个多月大家都经历过了，有好多问题事先没有想到，好多问题我也没有想到。但是如果想一想革命历史，想一想中国革命的历史，世界革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革命，很多事情都是出现很迅速，是事先不能预料的。在座的同志有些问题一下子不能马上理解，是不奇怪的。

回想一下，运动开始的时候，以刘、邓为代表，由他们主持，派了大量的工作组，到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各学校，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中讲的，他们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下去，

打下去。六月以后，大量的大字报在各学校、工厂、机关出现了。以刘、邓为代表的一伙人显得非常恐慌。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这些大字报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毛主席说过，大字报这个武器，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但是大量的、主流，是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揭发了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刘、邓他们看来，这是“反革命”，他们把很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对于真正反革命的大字报，如李世权反毛主席的大字报，刘少奇却说要保护，要保护少数。（康生：当时有两种少数，一种是毛主席保护的革命派的少数，一种是刘少奇保护的反革命的少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回到北京，开始扭转局面，把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看一看，很多是革命的，是好人。这并不是说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而是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两个月了，有些同志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看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后，还觉得不能理解。我看是由于没有好好考虑，没有好好想一想。

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基本节目就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很大负担。不陪不行，他是个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的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话，学习毛主席路线，接见群众。他找肖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肖华：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工作组，那里也要派，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清华大学、师大附中，就是王光美、刘涛搞的。他还批评工作组长，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女儿，根本不接近群众。当然小孩子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这只是一方面。他只听这一方面，不听广大群众的。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读谭力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语录还起劲。他在美术学院说，谭力夫的发言，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一分为二，大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去操纵。邓小平的女儿说的话，是谭力夫那里来的。流传最广的话，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根本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不顾党纪国法。同志们看了“八一”学校，最早是主席建议中央文革的同志去看看，康生同志看了，建议到会的同志也去看看。一看很清楚，那是“联动”的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他们可能是少数人，威胁一批人跟他们走。好好的学校，破坏成这样子，是刘邓路线造成的恶果。

刘少奇同邓小平是有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共同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四年冬一九六五年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不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的个人矛盾就抛到后边去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同性就突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两人立场一致，路线一致。在座的同志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没听

说过，在紧急关头，邓小平是一个打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还是让那些人站在群众头上，采取高压政策呢？邓小平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坚持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立场一致。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毛主席回北京后改变了局面，但刘、邓路线还有市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说，这个决议(十六条)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毛主席有伟大预见。十一中全会以后，路线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了这种情况，提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大家进一步把问题弄清楚。毛主席有个讲话，林彪同志有个很长的讲话。会议快结束时，毛主席又单独找各大区的同志们谈了一下，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负责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区别对待，要让我们丢掉刘、邓路线的包袱，不要把制定反动路线的人，同那些执行的，不自觉执行的，执行了又改了的混在一起。下面的同志是执行了的，但好多同志是不自觉执行的。一说明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就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事实说明，中央工作会议是有成效的，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线。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来往。我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思想慢慢地通了，逐步转变过来了。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有很多同志是有感性知识的，接近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很容易接受。如果完全没有感性知识，不接近群众，就不容易通。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同志，他们一与群众见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坐办公室，接触的就是那么几个人。我们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与群众接触，却变成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困难好象很困难，其实只要一个钟头就能解决，只要见群众，就可以弄清楚，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待反革命，那要镇压。如果对反革命宽容放纵，就失掉无产阶级的原则，失掉无产阶级立场，那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但是应当相信，只要我们同群众接触，反革命就更容易暴露出来，就更孤立，抓他就容易。不然，反革命混在群众中，他抓住我们不接见群众这一点，播弄是非，颠倒黑白，制造事件。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是有很大成绩的。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许多同志进一步接触群众，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接着来了个工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主要是在学校，社会上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工人起来，各地方都起来了，最集中表现在上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愿意接近工人群众，把他们哄到北京来，给他们路费，大搞经济主义，想收买工人，想这样把工人运动压下去。上海的革命工人不理这一套，他们发现这是用经济主义来腐蚀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就发起了新的斗争，发展成为向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夺权的斗争。这个时候，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介入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

定。这样不但把一般的群众运动提高了一步，而且使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同群众相结合，使斗争走上了新阶段。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解放军打出来的，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七大讲过，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进行。人民解放军公开站出来，公开支持革命左派，对文化大革命，对夺权斗争，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夺权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康生同志传达的，毛主席同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两次谈话所说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就可能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政权中来，形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主席、党中央一直讲就是一小撮。人民解放军要巩固、要壮大，一定要清除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相互联系的。

在全国解放前，在夺取政权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刚才讲的阎红彦就是一个例子。十七年的经验证明，有些人就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他们失掉了政权，失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千方百计让他们的后代钻到我们队伍中来。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宣传剥削阶级的思想，大量保存剥削阶级腐蚀人民的文化。这样，产生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不足怪。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旁的选择，就是要坚决拔掉这一小撮人。这件事情，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这也是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任务，人民解放军要保持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是无产阶级的传统，是人民的传统。毛主席英明地作出的这个决定，已经开始在全国收到了成效。当然，不要那么急，要充分酝酿。人民解放军要跟人民群众、要跟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老干部相结合，这就是《人民日报》上登的革命的“三结合”，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糊里糊涂的“三结合”，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三结合”。

这个斗争是很尖锐的，我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要充分估计到斗争的复杂性。最近，我写了个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夺权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目前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在夺权斗争中，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这里顺便说一下，混到群众里面的也有坏人、反革命分子，浑水摸鱼，搞反革命活动。中央采取了措施，取缔了一些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有的是内部的，有的是里通外国的，有的是蒋介石策动的。所以毛主席说的很值得大家注意。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中也混进一些反革命分子，所以我们要头脑清醒冷静地作阶级分析。到群众中去，就可以把这些人分辨清楚。反革命活动本来是搞地下活动，他们利用大民主搞地上活动。地下活动不容易看得清，地上活动更有利于我们破获，这是好事。

大字报中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大字报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人民日报》去年六月的一篇社论，《大字报是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说，这是一大毒草，不准学。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当然对大字报，我们要有一定的领导。对反革命分子利用大字报，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采取措施。大字报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形式，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问题是要看到对无产阶级更有利，还是对资产阶级更有利。应当看到，大字报还是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大字报可以进行彻头彻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有反革命插上来，我们可以识别，对这种大字报，也不可怕。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队还是按照军委的规定执行。

有的同志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怎么样？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地讲一些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书里也讲阶级斗争，但只是概念上的，没有把阶级斗争当作现实问题。这本书是在抗日时期写的，他不分析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应如何做。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修养。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个人是没有阶级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地主到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我顺便说一下，马克思讲过，列宁也讲过，阶级斗争的学说，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发现阶级斗争，是一个进步。事实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阶级斗争还不够格，完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本书是空空洞洞的，也有马列主义概念，也有孔孟之道，是一个大杂烩，是不三不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从这本书里得不到无产阶级的东西，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糊糊涂涂的概念。

原来刘少奇还有一封信，说中国没有斯大林，只有靠我们来工作。那个时候毛主席已经很明显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破了斯大林讲的框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不是没有斯大林，而是有更高的斯大林，林彪同志已经充分阐明了这个问题。

先说到这里，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3月10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发表毛泽东关于夺权后建立的机构叫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

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大意）

请到会的同志们原谅。原来准备和同志们座谈，不是来作报告，到场后同志们来个不发言，这就逼着我讲话，这样一讲难免犯错误，这就相当为难。现谈几个问题。

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毛主席语录》204页，把第24页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同一节的208页，倒第五行起“刘少奇……你的还是我的。”这一段删去。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说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修养”这个词。思想和意识有联系，但又是两个概念。讲思想是一回事，讲意识那就含义很广。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讲，在生理学上讲，意识和知觉有相同的意义，失掉知觉，就失掉意识。意识，是包括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个方面在内的。思想有独立的含义，它是指人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现象的反映。与这相同的语言，有时又叫思维，主要是讲通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

毛主席讲过刘少奇的这本书是欺人之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只谈个人修养，个人道德，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斗争，自然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同志们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

刘少奇说共产党员修养要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他的共产主义道德是能“爱”人，能“恶”人。又说，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完全是孔孟之道。

刘少奇说，要有最大的勇敢，没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是他说的共产党员的最大勇敢。

刘少奇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说什么没有偶像的

崇拜。可以看出，这是暗示攻击毛主席的。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说，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是可以告诉蒋介石的。

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持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就是他的所谓“修养”。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和丑恶灵魂。同志们提出，要对这本书进行批判，是很好的。这本书在国内外流毒甚广。毛主席说要写文章批判。

二、昨天，我把毛主席对谢胡、卡博、巴卢库等同志的谈话向同志们传达了。我想，同志们的问题原则上可以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夺权。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会产生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还会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这里可以理解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天天写文章骂我们。《真理报》一月份就发表二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和帝国主义腔调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革命的；说不是发展文化，是破坏文化。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人民的看法。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黑暗面的大革命。因此，这场革命运动，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它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亿万人民头脑中，使亿万劳动人民直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发展的新阶段。这不仅对中国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对世界革命也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相反，他们欢欣鼓舞，热烈拥护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骂我们，说“糟得很”。一切革命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异口同声地说好得很。好得很和“糟得很”，这是世界上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

对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总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研究历史教训，对于认识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另一方面，革命的人民则认为完全是对的，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这是四十年前毛主席对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看法。我们今天重读这一段，仍感到很现实。

同志们还可以想一想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历史。毛主席说，这次整风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粉碎了王明路线，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基础。对待这个伟大的运动同其他的革命运动一样，也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毛主席和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则认为糟得很。

解放后，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主席提出的这三面红旗，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全国人民、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认为好得很，而彭德怀、

黄克诚、张闻天反党集团则认为“糟得很”。

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有些人是站在敌对的阶级立场上来反对革命的，有些人是反党分子，他们利用群众运动中个别缺点，他们利用延安整风审干中的个别缺点，他们利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个别缺点，抓住不放，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有一种人，一时看不清楚，分不清主流非主流，主要非主要，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固定一点，看不见运动的发展，看不见缺点错误已经或正在纠正。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其结果容易把是非颠倒了。

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认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并得到全党的信任，是经过许多曲折，许多斗争的，从党创立时算起，到七大是经过了二十四年。有个代表人物叫王明，住在莫斯科，化名外国人骂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中央委员会里还有人否定延安整风，比如张闻天。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就更多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谭政等等，彭德怀最近又写信给毛主席为庐山会议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会有两种立场、两种看法，有的是党外的敌人，有的是混进党内的敌人，也有一些同志一时看不清楚，有怀疑。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相当胜利的时候，解放军同志必须吸取历史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这个运动象延安整风运动一样，年限越久意义越大，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楚。同志们要坚信毛主席。今天到会的同志，包括我在内，摆在面前的是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那种情况。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要从主流、本质和运动的发展看问题，吸取历史上的教训，看清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三、什么叫两条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指出了这个问题。什么叫两条路线斗争，什么是刘、邓路线的本质，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毛主席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本质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消灭一切私有制，而且逐渐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刘、邓路线就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坚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这一年的五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向天津的工人代表会议公开声明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违背人民的利益，违背工人的利益。这是刘少奇的政治纲领。同一个时候，他在干部会议上讲了两句概括的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一九五〇年，刘少奇曾提出中国不是发展社会主义，而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句话，后来邓子恢也讲过。这些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论点。考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虽然说法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也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的时候，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大大发展，他们说，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有一定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力，才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达，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一九三〇年，考茨基写了一本书，叫《陷入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在这本书里讲，十月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按照俄国的条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他狂妄地说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如果列宁是对的，那么他几十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全部垮台了。在苏联有个苏汉诺夫说，城市工业水平低，农村很落后，在俄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写了一篇文章——《论俄国革命》，严厉驳斥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列宁说，俄国生产的发展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工业还有一定的基础，农民虽然落后，但同无产阶级一起革命、农民是赞成革命、赞成社会主义的。你们是修正主义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到一九二八年才实行农业集体化，这里除有各种原因外主要是资本主义逆流的影响。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列宁在《论合作制》的文章中说，如果只有城市的社会主义，广大农村是资本主义，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就不巩固。只有农村实行集体化，合作化，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有可靠的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个社会基础，就是苏联农村存在的个体经济，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这样。这样的国家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

再看看刘少奇，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刘少奇一九五一年六月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办互助组合作社，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不能合作化。一九五二年，他批山西省的一个报告说，把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企图战胜自发势力，这是错误的、危险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批语曾印发给马列学院的学生和中央各组委。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在农村反对搞合作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后来的大砍合作社，事实上也是他的主张。他一九五七年反对党校学习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反彭、黄时不积极，一九六二年又大刮单干风，一九六四年搞形“左”实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切是有联系的，决不是偶然的。毛主席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

四、“三结合”问题。基本论点，已经在《红旗》第五期社论上说了。这个社论，主席亲自修改，增加了下面一段话：“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作。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上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以暂缺，将来再派。”林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这个“三结合”是对解放军的最大信任。如何执行这个任务，请同志们好好讨论。对于否定一切、排斥一切的问题，当然要注意，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有的省委虽然有戴高帽子的，实际上问题还没有真正揭开，不要去“和稀泥”。

夺权问题，同志们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很好的经验。现在夺权、军管与解放初期不一样，这是在大民主条件下的军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军管，军管一定要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军管中可能发生一些矛盾，要放手发动群众去解决，决不能压制群众。军管决不能走到过去工作组的道路上去。

今天就谈这些，下次有机会再谈一次。

军委发出关于军内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支工的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革命群众组织外出串连人员，遵照军委规定返回本单位后，不少单位正开展整风学习，总结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准备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有些单位的群众组织返回以后，没有切实执行军委命令，没有进行整风学习，不抓本单位的斗批改，而仍然热衷于搞大串连。有的外出人员迟迟不回，有的同地方群众组织搞串连，不通过当地驻军领导机关，擅自同地方群众组织一起去参加地方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

夺权斗争。在与当地驻军发生分歧时，不尊重驻军领导机关的意见，一意孤行，甚至同地方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去冲击当地驻军。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违反中央二月二十一日的通知和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妨碍了我军支左工作和支农支工业生产的进行。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两三天时间进行整风学习，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尔后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连，也不要同本地区外单位或地方组织搞串连。所有外出人员一律收回，地区性的和几个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能到军队串连。

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毛主席交给军队的光荣任务，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信任和鼓励，一定要切实做好，努力完成。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不得各行其是。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凡是未经上级批准撤职或停职的干部，除应在群众帮助下，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努力改正外，应该站出来做工作，把本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和行政管理工作管起来，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帮助和支持他们领导好这几项工作。

毛泽东复信章士钊，拒绝章士钊所提不要打倒刘少奇的劝告。

章士钊上书毛泽东

“文革”初，章士钊对不断加剧的动乱深感忧虑。那时，“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遍布全国，他却给刘少奇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见到党内恢复团结，毛泽东同刘少奇重新握手，领导全国。章士钊在给刘少奇写信之前，曾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他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制止打倒刘少奇。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其实，这一不幸的趋势已无可挽回，刘少奇同志实际上已被打倒多时了。但他义愤填膺地说：“我非写不可！我不能看国家这样毁掉！”章士钊在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说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章士钊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当时实际上已经沦为阶下囚了。章士钊给毛主席的信送出后大约只有三四天，毛主席在3月10日亲笔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 三月十日”

章士钊长长叹了一口气，他知道他所能尽的力已到尽头，局势的发展已无可挽回。

(《文汇》第4期 章含之文)

章士钊大约在致信毛泽东的同时，也曾给刘少奇一信，敦劝刘少奇对毛泽东检讨认罪，以释矛盾而臻和好。

章士钊给刘少奇的一封信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上海，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 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 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 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

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尔变色。尤可怪者 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 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 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闻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齿奇哉 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 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 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 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言，润公乐于 公之有此一举。立以 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 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固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曩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由间道楔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
政绥

章士钊谨启
载《文摘报》1988.5.15

李先念接见卫生部群众组织代表，说：这几天，借揭保健工作之名，从中央负责同志生活上搜集资料，这是在丑化党。（《传信录 594》）

[按]当时大字报上揭发了许多干部生活奢侈腐化，特权享受，小病大养，无病亦养，挥霍国家医疗资源，甚至霸占他人妻女，生养私生子等等丑闻。实则此类事决非个别现象。从迷信阴阳采补、淫荡糜烂，因而被誉为“铁鸡巴”的毛泽东、到乱伦的将军、到前后有九个性伴侣的“花帅”，这类丑事在“伟、光、正”的先锋队中，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只要政治上不倒，统统是“小节无碍”。早在 1949 年 4 月，当解放军初入江南名城南京，立刻陷入一场抢房子、抢位子的混乱争夺中，赤裸裸，急吼吼，其丑态一点也不逊于太平天国的将士们。一位

姓宋的高干见到江南水灵灵的女孩子，垂涎欲滴，忍不住对当时南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说：“一个人要能娶两个老婆就好了。”在山沟里蹲了十来年，一入城，干部们忙着找老婆、换老婆。从 49 年到 79 年，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一部形同废纸的《宪法》外，只有一部《婚姻法》，就是为干部们换老婆方便用的。胜利了，饱暖思淫欲，官做大了，又缺乏监督，更无所顾忌。历史上农民起义军都逃不了腐化堕落的结局，中共也不例外。一位姓萧的将军在文革初期被批判时，竟坦言：“老子出生入死打天下，搞几个女护士、女文工团员，算得了什么？”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都成了商品，官员们以权谋财，以权谋色，90% 以上的贪官都有二奶、三奶……公共情妇、不雅视频、堂堂高官无耻充当皮条客，性秽闻花样翻新，中共官场比青楼、妓院还要淫荡、龌龊。中共官吏中许多都沦为人间少有的最淫荡、最腐朽、最无耻、最无道德的一群衣冠禽兽。

下午，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来到大寨展览会所在的北京农展馆，表示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和群众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谭震林！”

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北师大分别召开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云大会。”

《人民日报》提前转载了《红旗》第 5 期(3 月 30 日出版)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

北京市六中召开大会，斗争王冒明，“西纠”成员王冒明因杀人致死罪被判死刑。

中央批准对江苏实行军管。

3月 11 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问题

北京怀柔县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很好。材料在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上登载，并发表社论，请注意！

中央认为：各省、市、自治区、地、县，都应该参照怀柔的经验，在农业、工业、财贸各方面，成立这样三结合的指挥部，以利“抓革命，促生产”。

康生偕其妻曹轶欧参观大寨展览会，指责这个展览有很多东西是反毛泽东思

想的，突出的是刘少奇的政治。该展览原是康生代表中央专门审查批准的。

吴德、刘建勋、丁国钰(或作高扬文)三位干部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革命群众中亮相”，进行检查。“群众”对他们的检查表示“欢迎”，为下一步进行三结合做了准备。

以首都红代会及农林口机关造反派为主体的近百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首都彻底击溃谭震林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联络站”(简称“首都批谭联络站”)，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声浪越来越大。下午，师大“井冈山”等三十二个单位齐集农业部前，召开了“揪出镇压农林口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谭震林誓师大会”。

清华“井冈山”贴出“廖汉生与贺龙”的大字报，指责贺龙是刘邓的忠实门徒，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青海日报》事件发生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求重新调查。毛在本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一群“联动”分子骑车在王府井八面槽高喊“砸烂中央文革的狗头！”

第七十一卷 1967年3月12日至16日

(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3月12日

毛泽东接见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成员。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李作鹏伙同王宏坤、张秀川编织成《海军党委内部两个司令部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以特急函送交叶群。其中诬指苏振华、刘道生、杜义德为海军内“苏记黑司令部”，陶勇、方正平、卢仁灿、康志强为这个黑司令部的“四大金刚”；傅继泽、郭炳坤、张汉丞、赵晓舟、罗斌为“五大虎将”。4月，海军直属机关高级干部36人受到批斗。

关锋在一次讲话中辟谣说：毛主席没有讲过不管什么当权派，先夺了再说的话。

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筹委会成立，它包括35所中学的革命群众组织，拟于近日召开红代会。晚，谢富治在接见筹委会代表时指出：对老红卫兵要作阶级分析，对高干子弟要区别对待，其中坏的应该叫有反动思想的高干子弟。“联动”是红卫兵的叛徒。

红代会发出通告：要求所属单位立即行动起来，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不把谭震林批倒批臭，不把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击溃，誓不罢休。

3月13日

周恩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就军事管制问题进行了逐条说明。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已经动用了团的兵力”。军管形式有两种，一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是派出军代表。

周恩来同志讲话

先讲一讲军事管制的问题，生产问题等一会再讲。

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批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全国省、市、自治区，三分之一实行了军事管制，六分之一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三结合”夺权的，有七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这一类也有七个：内蒙、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七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毛主席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

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内部争论很大，甚至发现有的军区和地方党委完全处于对立的情况，所以要摸一下。

按地区来说，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一半有了领导，七个准备夺权，还有七个没有解决。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领导机构的问题。因为“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怎么能搞好？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就是象报纸上介绍的怀柔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

现在讲一讲关于军事管制的条文，供大家讨论。

一、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夺权斗争是由上海推动起来的。夺权斗争的发展虽然不算很快，但也不算慢。但是在这个阶段中，不少地区（有一半），不少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旗帜鲜明地联合起来，有的革命组织转化了，有的两方都是革命派，但不联合，甚至争论不休，发展到武斗，当权派干部没有挺身而出，没有检讨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这样就使当地的军事领导机关无从支持和参加革命的“三结合”夺权。这些单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或者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边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或专政机构，或机密要害部门，或国防企业事业单位，国防工厂、仓库等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

目前省市公安局六十二个，大部接管了。公安机构过去长期受彭、罗影响，里面有一小撮坏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冲击了一下，揭发出一批坏人。公安部曾经试行夺权，但最后还是实行军事管制。内部即使是真正的革命派夺了权，但力量小，压不住坏人。南京、杭州公安局也有这样的情况。北京公安局，由政法公社一个单位包下来，结果不行。他们年青，革命热情有余，但经验不足，坏人不但没有被揭发，反而保起来了，反而使他们被动。也有由内部坏人夺权的，他们拿着权整好人，如天津公安局有一个时期，连交通警都不上岗了。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实行军管，坏人才有所畏惧，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

二、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派出军代表，必要时可以派出军队保护。

如北京饭店，派了三个军队干部去，订出几条规定，群众大多数是拥护的，其他大饭店照办就行了，人数可以更少。有的地方不行，需要派军队保护。

三、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一般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全面领导所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特别要作好支持革命左派的工作，把左派联合起来，帮助干部亮相，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另外一个班子，全面抓生产指挥工作，把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全部抓起来。这个班子叫生产指挥部。

现在春天到了，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紧迫，北京的卫生部还在吵，我看要派军事代表，一个人就行了。中、小学都开学了，地方事情很多，中央教育部还可以搞革命，省、市、地、县就不行了。三位一体的生产指挥部，要把这几方面抓起来，相互结合。组织形式上大体是这样的，但也要因地制宜。

各级军管会，受上级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同时领导下属级党委、人委和军管会。并代表本地区与其他地区党委、人委和军管会联系。军管会本身受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党委的领导。

地委、军分区，如有军部驻在这个地区，应受军党委的领导。师住在县，应由师来领导。组织问题再具体化一下。

各地区军管会，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要注意促进当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当权派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出来亮相，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给他们创造机会，教育革命群众允许他们出来检讨，这样才能推动革命“三结合”的早日实现。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毛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军事管制抓革命、促生产，到底那是重心？还是把革命干劲鼓起来，军队要政治挂帅。刚才富春同志说，三月份是个关键，生产有的是上升，还有的不是上升。三、四、月份很紧，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干劲起来后，革命干部亮相，大联合，这些工作做好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地区军事管制，最后要落实到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省、地、县三级的临时权力机构。五月份恐怕不行，一般省一级可以实现。这是设想，大家可以讨论。

各级领导干部，在取得革命群众同意后，可以吸收到抓生产的领导班子里来，在工作中考验。

有的同志提出，军管会中能不能吸收这些同志，我认为不是马上吸收。因为参加军管会，将来就得参加“三结合”。在军管会中，是解放军，生产班子可以经过革命群众同意，吸收他们参加。一边检讨，一边考验。有些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一时群众不能谅解的，可以降级留用，这样群众容易接受。调离只能是少数。象广东的赵紫阳同志，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已经作了检讨，我们叫他回去降级留用。现在第一书记都跑到北京，不是个好办法。他们对情况很熟，要就地监督留用，甚至撤职留用。铁道部的吕正操、武竟天，已经撤职，但还留在那里工作。看他们是不是真正回心转意，以观后效。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这符合毛主席所说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军管会抓生产的班子，叫生产委员会或生产指挥部，应充分利用其管辖的业务机关和下属的业务机关，来进行生产领导，不要另行组织机构。这是很要注意的事情。现在各级机构庞大，组织层次多，厅、局、处、科。可以在军管中，缩小一些机构和减少层次，但也不能大裁大减，为下一阶段的制度改革和机关革命化创造条件。批、改就是改制度。军管要为下一步整改带来更有利的条件，决不要因为军管，机关变的更大，人更多了。这里讲的军管，是指省一级的。

四、企业事业单位的军事管制，应该根据各单位情况，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者派军代表。

如卫生部，机构是可用的，就是派个代表，把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帮助他们实行“三结合”。

在一般的企业事业单位，军管会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要注意促进这些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促进这些单位的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和民兵代表三结合早日实现，以便成立本单位的“三结合”监督业务权力机构，从而改组该单位的领导机构。

“三结合”搞好了，厂的领导才能巩固。另一方面，就是有了新的领导，改组了，也要提拔新生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特点就是自下而上“三结合”。过去都是由上而下的。一九四九年，靠几百万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实行了军事管制。国民党少数人跑了，其他的都接过来，包下来了，将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包下来。学校更是原封不动，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大，去年就发作了，大家都领教过了。那个军种、兵种没有军事院校？军里好一点。上次大军区来开会的同志意见可大啦！各级干部都是由上而下派的。派去的干部有的是新吸收的党员。就是解放区里的党员干部，派去也受到“糖衣炮弹”的影响。当然，这也只是一小撮。一九五二年进行了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由上而下的，更不用说对经济基础的改造了。地主还在农村，资本家在城市还拿定息，革命总是没有搞彻底。所以毛主席说，十七年我们是搞社会主义革命，但不是彻底的革命。其原因是没有找到自下而上的方

法。这一次找到了由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一声炮响，大字报出来了，把学生发动起来了，来北京的就有一千多万，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个别老干部说，这个斗争真是激烈，从来没有遇到过。正象林副主席说的，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如果这样分析，就会很快，把旧的东西挖出来不是很好吗！你还是站在老立场，维持老秩序，站在群众之上，当然就看不惯，当然引起群众反对。这是革命的事物，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如此，在外国也是如此。这样一个大震动，才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搞下去，把这个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才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党不变质。有了修正主义可以反掉，保证资本主义永不复辟，保证世界革命早日实现。这个时候，就要叫解放军参加这一工作，一月份主席号召，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左派，并且成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是无产阶级工作组还是资产阶级工作组？如果是压制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就是资产阶级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无产阶级工作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就找到一个方法，找到监督检查领导的方法，过去不要说检查，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管也是鞭长莫及，还是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还是要看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你正确，群众就跟你走。可是怎么样才能正确，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不完全正确，就可以得到补充和修改。本地区、本机关、本部门的人监督是有效的办法。过去我们还没有找到这种方法。有人说，开个代表大会，那也无效，不起作用。二十三条一发表，彭真还是搞彭真的，刘少奇还是搞刘少奇的。将来“三结合”要转为代表会议，那时要实行巴黎公社的选举。现在这种“三结合”起监督作用。

企业、事业单位的革命组织，应按行政单位归口编组。这些单位的群众组织可以允许串联，但不允许互设联络站。尤其不要学生到工厂搞联络站。

“三结合”夺权斗争，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参加，其他单位不参加，因为不了解情况。有的同志问，今年的大串连搞不搞？不搞好。毛主席已经肯定今年不再搞大串连了。我们打算补发个通知，但在本地区，还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总之，工人、学生要回去搞斗、批、改。国防工厂、机要、要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仓库，实行军事管制，不进行夺权，不改组领导机构，革命群众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也可以向上一级党委建议。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进行有限的“三结合”，成立监督组织。革命组织必须归口，对本单位以外的不进行相互串连。一切革命组织，都在业余时间按归口的系统活动，开全单位大会，必须经过军管会批准。各单位的民兵组织，必须不受群众组织的影响。民兵不能属于那一派组织，不然不能在“三结合”中起民兵代表的作用。

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的党员是三百万，现在一千八百万，六分之五是解放后发展的。有的受到资产阶级影响，已经蜕化变质，有的是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徒，是会淘汰相当数目。但绝大多数是好的。团员淘汰就更要多一些。

五、县(含)以上党政机关的军事管制，一般只派军代表，一、两个也可以。主要任务是促进该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该机关的革命群众组织按行政单位归口编组，实现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成立该机关的业务监督机构。领导没有瘫痪的加以帮助。机关民兵组织，在军代表的组织下搞军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进行整顿。现在军训重点在学校，尔后在厂矿，最后才到机关。

六、各地区、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要提一批积极有贡献的干部到领导层去。多数干部应该留用，少数犯了严重错误但愿意改正的，也可以降级留用。极少数应该撤职的在本机关、本系统下放劳动，下放工作，不能上交。本单位不能处理的，在一个地区范围内调剂。大批人力要下放，机关庞大不利于革命。

军队已经肯定，院校、文艺团体多了，要下放。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也要向下放。把上头搞得短小精悍，不要头重脚轻。将来，党政机关是不是转向供给制，把资产阶级法权早点去掉一些，树立新的生活方式。

七、军事管制批准程序

各省、市、自治区和边防沿海的专区、自治州、各省辖市、中央各部和直属大的企业、事业单位，由中央批准。

各县、各省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由省批准。

八、不论已经实行军管和尚未实行军管的，对反动组织，对严重违法乱纪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军事机关与公安部门配合予以逮捕法办。

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子是反动的，处置要慎重，可以将头子隔离起来，只要抓住他的罪状，就可以逮捕。可以不宣布解散，群众可归各原单位，因为宣布解散，对群众震动太大。这种方法比较有利。对抢国家文件的，要严肃处理，严重的，要逮捕法办。遇到这种事情，要追究，追回被抢的文件。

毛主席说：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各地军事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个最高指示，对全军干部进行广泛的动员。解放军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根据林彪同志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吃透两头。学好“老三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农村调查序言》、《学习和时局》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林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只有吃透毛主席著作，才能正确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军队现在的确很忙，又要军管，又要支左、支农、支工。正是因为忙，更需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包括参加军管的的领导同志也要认真学，以便提高政治水平。然后到工作对象中去，走群众路线，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坚持四个第一，提倡三八作风，支持“三结合”，捍卫“三结合”，不是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合在一起，不是把保守派合在一起，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表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也表现在其他问题上。我们不能放松自己的阶级警惕。解放军的阶级警惕是强的。解放军是工农子弟兵，现在要与群众进一步结合。毛主席依靠群众，依靠解放军。最高统帅这样信任解放军，我们要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最高指示，不要忘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李富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就生产问题讲话。

关锋、戚本禹接见青海造反派“8·18”，了解青海事件情况。(《传信录 598》)

王力对回国留学生讲话：10月3日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陶铸就不赞成。他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是反对。这不光是几个字的争论，他就是不让批判邓路线，不许批工作组。(《传信录 599》)

下午，北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石油学院“北京公社”等组织在北师大召开揭发余秋里，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

学部民族研究所部分群众贴出《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遭到许多大专院校的反对。当时学部造反派提出三打倒(余秋里、陈毅、谭震林)二炮轰(李富春、李先念)。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春耕时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夺权》。

3月14日

周恩来在接见西安造反派时，说：毛主席看到“打倒朱德”的大标语，不同意这种提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朱德问题要暂停。

陈毅接见对外经委造反派代表，说：革命的监督权是文化大革命的创举。监督不搞监督官，做监督工作，不能脱离原单位。（《传信录600》）

北京五十多个院校十万人游行示威，反击“二月逆流”，群众高呼“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掀起了反“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论提倡一个公字》。

3月15日

中央宣布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军管会主任。广东省1·22“革联”夺权之后，与各单位造反组织冲突，无力控制局面，造成混乱，此种现象，全国各地皆然。广东在全国地位特殊，故较早实行军事管制。“省革联”与军区及其支持者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成为广东两派长期武斗的祸根。

[按] 在被群众造反派组织夺权的省、市乃至一些机关，派别对立，无法联合，往往夺来夺去，为劫持大印而武斗不止。所谓“革命领导干部”，除毛及中央文革钦定者外，各派有各派的结合对象。“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根本无法建立。毛所标榜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终于成为破裂的肥皂泡。图穷匕首见，而有所谓“军管”。“大民主”成为独裁统治者枪杆子下的装饰和讽刺。

3月16日

毛泽东关于《毛选》注释问题的指示：

一、注释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

三、《整顿党的作风》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去。

四、新印《毛选》仍用原来日期。

五、《毛选》五、六两卷一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

六、《语录》第208页引用刘少奇的一段也删去，另204页标题为“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

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布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

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

最近，一些地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挑唆一部分人破坏国家财产，私分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砸毁工矿、

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设备和物资，妄图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中央认为，这些现象必须立即予以制止。

一、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教育群众不要上当，团结起来，同一切破坏国家资财的行为作斗争。切实地保护国家财产。

二、农村集体经济的财产不容侵犯。不准私分生产队的公积金、集体储备粮和种子，不准随便动用农业生产的专用款项，不准破坏农具和机器。必须认真保护耕牛和其它牲畜。

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杜绝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节约使用交通工具，不许随意强占公房公物，不许把生产运输用的车辆改装为宣传喇叭车。各生产单位在一般情况下，应尽量少搞游行示威等大型活动。在反革命经济主义泛滥时期领取的各种交通工具、物质装备和公款等，应主动退回。

四、对文物、图书要加强管理和保护工作，不许随意处理或破坏。

五、如有盗窃或破坏国家资财者，必须按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教育和处分，并要酌情赔偿；对于其中情节严重的首恶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这一通知可在城市、农村和部队各单位普遍张贴

中共中央转发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

中共中央转发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

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这种布告不登报，不在全市广播，只在有关厂矿张贴。

布 告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对某某某厂(矿)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特任命某某某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某某某，某某某为副主任。

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从政治思想上支持。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群众自己的力量，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

二、厂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和业务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应当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批转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通知》和中央有关的政策规定。

三、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努力工作，遵守劳动纪律，服从上级指挥。建立革命秩序，严格出入制度。

四、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减少脱产人员，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同经济主义进行斗争，坚决同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进行斗争。

六、为了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提倡厂矿内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做到按生产系统和行政单位编组。

七、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在本单位或本市内进行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任何革命组织联合厂矿外革命组织召开大会，必须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

八、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成立筹备组织，推动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九、厂矿一切外出长期不归的人员，限一个月内回到本单位，如在规定时间内仍不回厂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十、厂矿全体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破坏国家财产、破坏生产的人，要依法惩处。

十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生产，从事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并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十二、厂矿全体革命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厂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 月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地方报纸宣传的几项规定。

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

现在，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各省市的报纸宣传工作出现一些问题，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 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

(二) 各省、市、自治区的临时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以后，地方报纸应即接受其领导。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地方报纸应接受当地军管会的领导。

(三) 各省、市、自治区报纸的宣传方针，应严格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参照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而不得宣传那些同党中央精神相对立的口号。例如：党中央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有的报纸强调革命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强调革命派必须大乱，强调革命群众组织之间要打内战，打到底。又如，党中央强调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有的报纸却提出一些宗派主义的口号，甚至提出“打、砸、抢万岁”等反动口号。这些都是错误的，应该改正过来。

(四) 在报社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控制局面，特别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实行军事管制。如报纸不能正常出版，可以出版新闻电讯，刊载新华社电讯和中央报刊上的文章。

(五) 报纸上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

(六) 报纸上一律不要使用那些漫骂的词语，例如：“砸烂狗头”，“混蛋”，“油炸”等等。

(七) 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对于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一切地方报纸都无权擅自发表评论。

(八) 报纸要注意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不许泄密。违犯者要追究责任，严重的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

(九)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报纸上都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导。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当立即处理。

(一) 十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和单位，包括报纸和广播电台，都一律不要在报纸和广播中公开宣布军事管制。

陈伯达指示：不能让陆定一在卫戍区那里反省。那是法国人盖的房子，是解放前北京最好的房子。不能让他们在那里休养，这些人一活就是七十、八十，比我们活的时间还长。“要带上铐子”，要连续审讯。

康生接见安徽夺权派代表，说：任何人不得任意捕人、武斗。

王力在人民日报社讲话，说：从下到上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股逆流值得注意。夺权看来四月份解决不了，再延长一个月。大串连不适合时宜，看来不要搞了。

戚本禹在市委机关召开的“彻底揭发批判旧市委誓师大会”上说：虽然彭真反党集团被揪了出来，但旧市委并没有被砸烂，黑帮分子仍然很嚣张。新市委犯了严重错误，没有用革命的方法砸烂旧市委。北京市要继续夺权，把黑帮斗垮斗臭，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戚本禹在接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代表时说：“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他坚定支持左派，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当时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比较坚决。”他又说：“看干部不要看他干什么的，要看他是代表哪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此后，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黑龙江省革委会作了调整。(《传信录 602》)

178个单位的一万三千余人在北京农业大学召开声讨谭震林大会。

第七十二卷 1967年3月12日至16日

(六十一人叛徒事件)

3月16日(续)

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在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刘少奇、张闻天作出了“叛卖的决定”。“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示中还引用了毛泽东1月31日在谭震林关于农口几个单位阶级斗争情况报告上的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个批示，是毛泽东批准的。61人中，除已死去22人外，一人为科长，其余39人均为省市委以上负责干部。(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文(南方日报1966年3月29日)载：61人中19人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2人叛变被处决，文革时健在者40人，其中22人担任省、部长以上干部，13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余者为一般干部)。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①

[机密]中发(67)96号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张闻天的材料中说到在狱中的人提出过“三个条件”，同案的许多人都否认这件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张良云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一道叛变。

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

^①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

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现将张闻天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及附件，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负责同志。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叛徒集团的揭露，应当引起我们全党极大的警惕。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五洋捉鳌简讯》

南天大学八·一八、八·三一红色造反团抓叛徒战斗队各小分队转战大江南北，协助西藏歌舞团革命造反派，揪出了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大叛徒王其梅。协助江苏化学公司革命造反派，揪出了该公司政治部主任、大叛徒方立凡。他们还协助北京的革命造反派，先后抄了国家经委副主任周仲英、交通部副部长马辉之、北京内燃机厂长刘尚之以及卫生出版社田益等叛徒的黑狗窝，查获了大批罪证。二月间，他们又对张闻天(1936年时的党中央总书记)、李楚离(组织部副部长)、杨献珍等大叛徒进行了提审。(《追穷寇》1967年3月27日)

由61人案引起的揪叛徒恶风，到67年6月，全国有五千多人受到审查。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含恨逝世。

[按]下面收的是当时南开大学红卫兵“三六专案调查组”调查的薄一波叛徒案材料，对后来研究文化大革命者，亦为不可少的参考材料。文革以后，这一椿“叛徒案”全部平反，有关材料，亦作为附录，见于本卷。

刘少奇是大叛徒集团的总头目——揭开刘少奇、安子文、薄一波叛徒集团内幕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三六专案调查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旧世界，把一切垃圾污垢从那些黑暗的角落里统统扫了出来。

去年十月份，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一九三六年的《华北日报》上，发现了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发表的《反共启事》。启事内容极其反动，这是一个地道道向敌人屈膝投降的反共自首书，这是一个公开背叛党、背叛人民的反共宣言书。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搞清这个案件的内幕，我们有关单位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我们获得了多方面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我们断定：这是一个隐藏了多年的叛徒集团，而这个叛徒集团的总头目就是刘少奇。现在就我们了解到的可以公布于众的材料，整理如下。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妄想占领全中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眼看就要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突出、更加尖锐，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可是，蒋介石卖国集团，依然采取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大片美好江山白白的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在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组织起全国人民，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一方面揭露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发动民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拿起武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毛主席领导下，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赴汤蹈火，进行前赴后继的战斗。革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抗日热潮的高涨，给当时白区的监狱斗争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何梅协定之后，宋哲元接管北京，宋哲元与蒋介石之间有勾心斗角的内部的矛盾。如果抓住这个大好形势，把狱中斗争同狱外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争取更广大的民众支持，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是有可能的。

但是，作为当时北方局总负责人的刘少奇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地却采取了可耻的变节投降的办法。

一九三六年三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到达天津，任北方局书记不久，就出卖了共产党员的灵魂。他假借中央的名义，给关押在敌人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下达黑指示说：“你们可以履行自首手续。登报，写反共启事出狱。”

刘少奇和北方局的一伙叛徒借口：白区斗争是很残酷的，北京很可能要沦陷到日寇手里。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如果再不出来，北京一旦沦陷，这批人就出不来了。刘少奇之流还借口：形势有了变化，目前抗日第一，我党已经争取建立统一战线，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需要大量干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只要能出来就行。登自首启事那种东西，老百姓看惯了，已经起不到多大坏作用。而且现在狱中的那些共产党员都是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出现，登了那种启事也不要紧。（见附件一）

刘少奇这个怕死鬼悲观地认为：事物的存在，就是向死亡发展，而最后结果还是死亡。生命就是死亡，人生的斗争就是与死作斗争，就是死的不断的克服，否则人都死了，原则还有什么用呢？（见附件二）

刘少奇通过魏梦伶跟当时北京伪统治者宋哲元及反省院长阎文海商量好出狱问题。

刘少奇又通过徐冰、孔祥祯、魏梦伶等人写信通过看守班长牛宝正送到狱中。向狱中人解释，党需要你们出来做工作，你们可以“假”自首出狱，可以登报，可以有反共内容。并说：“登启事出狱虽然有些不好影响，但这样使国民党监牢中保存了残余的同志，保存革命的力量，这是正确的，这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联合的正确方针。只要搞好革命，那点影响是可以弥补的……”

传达了第一黑指示以后，刘少奇给当时在延安的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说现在监狱中有一批干部，想早些处理这批人，所以想让他们履行一个手续出来。在信中刘少奇还帮助狱中干部提出三个条件，让张闻天签字，张闻天签字复信后，刘少奇就瞒着毛主席、党中央和其他领导同志，又一次指示狱中人叛变，同时又进一步造谣说：这是中央的意思，登启事的政治责任由党来负。刘少奇还威胁那些坚决反对叛变的真正革命的同志：如果你们再不出来，那就叫自由行动，就要成为罪人，组织上就不管你了！（见附件四）

刘少奇的黑指示下达以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徐子荣等人对刘少奇的叛党指示坚决拥护，积极执行，表现得最为嚣张。他们利用他们把持的北平伪军人反省院南监党支部，对坚持原则的同志采取了各种威胁打击的卑劣手段。对动摇的则是引诱、拉拢：现在不出去，以后就出不去了，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云云。

刘格平同志当时是北监的党支部书记。他与张良云等许多真正的革命同志，坚决反对写反共启事出狱，对这种叛变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坚持要争取无条件释放，否则，宁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写任何叛党启事。这下可触怒了薄一波等人，薄一波派了四个人到北监游说，拆刘格平同志的台。他们恶狠狠地威胁：这是组织命令，军事命令，只能执行，不能讨论。如果不出来，就是不服从组织决定，就要开除党籍。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刘格平、张良云等真正革命同志在沉重的压力面前没屈服，薄一波等人更是暴跳如雷。一次放风，薄一波和一个人在院中争吵了起来，薄气势汹汹地叫嚷：“谁怕上当，谁别干，

大家都不干，我一个人也干！”

过了不久，薄一波和杨献珍首先跑到敌人那里去索取自首书。他们对敌人说：“你们要我们登报启事，我们同意。”于是就在自首书上签了名，按了手印。紧接着，刘澜涛、安子文、徐子荣、周仲英、马辉之、董天知、鲜维勋也先后跑到敌人那里去，在自首书上盖了手印。

在刘少奇指示下，在薄一波带动下，六十一个叛徒先后都在敌人的自首书上签名按了手印。接着，这六十一个叛徒就在国民党《华北日报》上登出了令人气炸心肺的反共启事，什么“……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为一个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向敌人屈膝投降的反共自白书，这是一个公开背叛党，背叛人民的反共宣言书。这就是刘少奇以及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之流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毛主席的铁证。(见附件五、六)

更令人气愤的是，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这帮混蛋还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在罪大恶极的蒋该死的狗头象下，举行了反省典礼。接受敌人反省院长的训话：过去你们受共党利用，经反省院教诲，你们已悔过自新，出去后要拥护政府、守法反共，……。接着叛徒们向敌人院长、管理员、看守班长、看守等鞠躬宣誓：感谢院方教导，我们已经改过自新，今后决不为共党利用，坚决反共，为国效劳。然后，敌人管理员大声问大家：悔过自新是不是真心诚意了？叛徒们就大声回答：是真心诚意。另外敌人还大声问保人：你们敢不敢保？在薄一波的保人郭挺一和胡仁奎带领下，保人齐声答：敢保。训话完了，在院子里犯人按照敌人的要求排好队，各个保人站在背后，照下相来。

最后领取出狱证件，在礼堂里叛徒和保人一排站立，逐个点名应声后走到前面，向敌人鞠躬，按手印领取出狱证件。上面写着：“改过归正，反省自新”等字样。拿了此证件就可以受到敌人的保护。就这样，在刘少奇的指示下，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分作十批出狱。出狱后，这些叛徒又分赴全国各地，把刘少奇的指示带到全国各地。薄一波一出狱就受刘少奇的指示，以叛徒的身份到阎锡山手下当了一个大官。薄一波等人去太原，带了刘少奇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同样是一个叛党的黑指示。这封信指示山西太原监狱里的乔明甫、龚子荣、刘裕民、阎秀峰、李逸山等几十人写悔过书或在阎锡山印的条条上签字出狱。(见附件七、八)

在刘少奇的指示、默认和庇护下，北京、太原、武汉、南京、济南、苏州、合肥等地数百名叛徒，集体变节自首投敌。然后又钻进党内，形成一个庞大的叛徒集团。这个叛徒集团的总头目就是刘少奇。这群以刘少奇为首的叛徒，拿共产党员的革命原则去和敌人做苟且偷生的交易，这种可耻的行径和革命先烈的英雄行为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啊！刘少奇所谓的“假自首”、“保存革命力量”、“出来可以为党工作”、“用工作来弥补不好的影响”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归根结底，就是：“保命要紧”。这纯粹是苟且偷生的活命哲学，和赫鲁晓夫之流的“脑袋掉了，原则还有什么用”有什么两样！刘少奇与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刘少奇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史。三十多年来，刘少奇不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成为可耻的叛徒。而且还极力庇护、提拔这样的叛徒，宣扬叛徒的活命哲学，打击揭发他们罪行的革命同志，气焰是何等嚣张，保等猖獗！

在刘少奇的指使下，薄一波这一伙叛徒一出反省院，立刻一个个都改名换姓，改头换面，又混进党内。这伙叛徒狐假虎威，他们以为刘少奇这个后台硬得很，从来就没有向组织真实汇报过出狱的经过。他们定下攻守同盟，互相串通一气，统一口径，在自传上写着“组织营救出狱”或者写成“按中央指示，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写了个简单的启事。”只字不

提写了“反共启事”出狱。一九四四年，薄一波指使李楚离在自传上填了个“组织营救出狱”就行了。一九五七年李楚离又对安子文说：“填组织营救出狱”。一九六四年，华东局组织部长罗毅也指示叛徒刘慎之填“组织营救出狱”。不仅如此，刘少奇、薄一波之流还采用了各种卑劣手段，上骗毛主席，下欺全国人民，在刘少奇的直接命令下，一九四四年薄一波把叛徒集团的名单交给彭真（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一九五六年刘澜涛又把名单列出来交给刘少奇；一九六二年安子文再一次把名单抄出来交给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备案了事。还美其名曰：凡登记者，已作“组织结论”。刘少奇假借中央名义指示“写反动启事出狱”，但对毛主席封锁消息，说只是履行了一个简单的手续。而对下面却说“这是组织营救出狱，中央已经知道，已经做了结论。”还说：这是组织秘密，你们不要问了。刘少奇、薄一波这帮野心家还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到处造谣说毛主席讲这样出狱没有错。刘少奇、薄一波这帮野心家把谣言竟造到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头上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谁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在刘少奇的指使下，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窃据的职位的方便，干尽了毁脏灭证的勾当。一九五〇年安子文伙同彭真，把他们的档案“借”去三年不还，把他们背叛变节的很多档案销毁了。安子文之流害怕别人揭发他们叛变一事，还使尽了各种卑鄙手段。他们到北京图书馆里去，把他们在《华北日报》登的反共宣言的字都挖掉。有个当年北平伪军人反省分院的看守班长叫牛宝正，对他们叛变的情况最了解，薄一波、安子文、冯基平之流非常害怕他泄露“天机”，于是把他从山东请到北京，以“贵宾”相待，用金钱、地位把他稳住。牛宝正一到北京就成了党员，十九级干部，牢牢地跟着叛徒集团跑，为叛徒集团服务。

在这一系列安排之后，刘少奇又进一步利用职权，千方百计为叛徒活命哲学开通行证，企图使自己变节行为合法化。刘少奇之流开动他们掌握的一些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讲坛，大肆吹嘘他们的狱中生活。甚至不择手段，让一个根本不了解当时狱中情况的北京红旗剧院经理付世钧，根据他们拟定的讲稿到处讲演，而且还在广播电台录音广播。在刘少奇的旨意下，胡锡奎等人更是赤膊上阵，在北京日报上大书特书北方局和监狱斗争的“光荣历史”；甚至到现在，刘有光、刘尚之之流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段光荣的历史”，“我这是抛弃个人名节，服从了党的利益”。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阎王的刘澜涛更是嚣张，他叫嚣：“我们出狱是按中央指示的，这事与我无关，我不是叛徒，你们去问中央好了！”这些叛徒也有不少现在装出一副可怜相，尽量把自己粉饰成为一个刘少奇的受害者，大肆吹嘘自己如何反对刘少奇这一指示。自己只是想组织上不犯错误，结果政治上犯了错误。企图把背叛党、背叛革命、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的罪行推得干干净净。这一些都是枉费心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语。”刘少奇、薄一波之流也正是这样的一种蠢人。

经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之后，刘少奇开始着手使他们的变节行为合法化。

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企图规定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也可以做中央委员。并且也的的确确把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廖鲁言等安插进中央委员会，还把彭真、薄一波、刘澜涛等提拔到中央政治局、书记处。

在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前，刘少奇、邓小平还专门召集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看待登报自首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刘少奇特别强调登报自首的人有些是假自首，骗敌人的，不能称是政治上的错误。还有些是生死关头怕死，并不是叛党。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一手操纵下，会议最后决定起草一个文件，订出《六条规定》，把大批血债累累的自首变节分子包庇下来。《六条规定》把叛徒分成“错误”、“严重错误”、“一度动摇”、“自首”、“叛变”和“严重叛变”六种，区别对待使用。《六条规定》规定：被捕后在敌人印的自首书上签了名的不算自首，称为“在敌人面前的一种错误行为”，不影响使用。《六条规定》规定：被捕后在敌人报刊上发表了反共启事，公开攻击党咒骂党的，不作“叛变”的结论，而只作“自

首”的结论，按自首性质限制使用。《六条规定》还规定：被捕后，供出同志或党的机密，但以后翻了供的，定为是“一度动摇”，使用上只稍微受到些限制。在刘少奇的纵容和幕后操纵下，安子文之流利用他们把持下的中央组织部，以《六条规定》为幌子，篡改了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采取缩小审查范围，从轻论定错误性质，从宽处理，灵活掌握，放宽使用以及欺骗党中央对毛主席封锁消息等恶毒手段，进行反革命活动，大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使许多人没有得到审查，使许多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得到提拔重用。

一九五三年，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曾规定：“审查的范围，应包括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财经文教部门中的全部干部。”一九五五年，全国刚刚开始对只占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的干部进行审查的时候，刘少奇、安子文之流就惊慌失措地提出要压缩审查面，迫使全国各地把审查面压缩到最少的比例。在刘少奇、安子文之流的破坏下，一九五三年中央发出审干工作决定之后，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二月，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只完成审查任务百分之五十的有十八个省、市。另外数百万区助理员以下的干部就没有审查。刘少奇、安子文之流还规定了许多个“不审查”。例如：对公私合营中的私方人员不审查，因为刚公私合营就审查他们，会被误解为消灭资产阶级；历史问题早已交待清楚，现在未发现问题的不审查；有非政治性问题的干部不审查；社会关系复杂，家庭出身不好，但本人早已划清界限，工作一贯表现好的不审查，因为怕影响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有组织上了解他们问题”的人不审查。这个规定是个大阴谋：安子文之流借口他们的问题刘少奇了解，彭真知道，就可以不被审查。而另外一些人因安子文、李楚离等了解，又可以不审查。如此进行招降纳叛，就方便得多，合法得多了。就这样，数百名叛徒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被审查出来。可见刘少奇、安子文之流手段之毒。

“鱼恋鱼，虾恋虾，王八恋的是鳖亲家。”叛徒刘少奇、安子文对自首变节分子也就自然偏爱。他们对许多人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都用从轻论定的办法，变成了一般问题，把叛变说成不叛变，自首说成不自首，使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继续占据着重要岗位。如叛徒刘岱峰，曾经向敌人出卖了我们几十个同志，并向敌人供出了我地下党以及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情况等，而得到敌人重用，当上了阎锡山的政治部副主任，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叛徒却被邓小平、薄一波重新拉入党内，由邓小平、薄一波充当刘岱峰重新入党的介绍人，并且叫他窃据了国家计委副主任、云南省副省长、国家物委副主任等要职。又如前建工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秀峰，被捕后曾在敌人面前指证出卖革命同志，以后翻供。他们却不以叛变论处，而作为“错误”，不影响使用。又如李砥平，被捕后办了坦白手续，在反省院欢送出院人员大会上大肆宣传鼓吹三民主义，后来又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写了自首书，表示出狱后要实行三民主义。对这样的自首分子，安子文之流却定为“自首”，而定为“严重错误”，继续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子文之流还搬出刘少奇一九三六年指示集体自首的叛徒活命哲学思想，到处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谬论，说什么：“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各方面需要人，干部不足”，“这些人的问题都是历史问题，发生历史问题的时间已经很久了”，“这些干部能担负一些工作，让他们作，有什么不好呢？”刘少奇、安子文之流还选择出叛徒金明作为标兵提拔为中南局书记。又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提拔大叛徒邓拓、匡亚明等。山西省人委秘书长卫逢棋，抗战时期曾被阎锡山俘虏，承认自己是省长，把我们的一部分人员交给敌人，把我们政府的钤记、帐册也移交给敌人，担任了敌人战地服务团长，给敌人绘制了设置情报站的路线图。对于这种严重变节的人，安子文之流竟也积极主张提拔为副省长。还如叛徒刘尚之在福建、中央司法部，两次参加反党集团，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福建省委曾经作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但是刘尚之到安子文处一哭诉，安子文、徐子荣马上给刘尚之翻案。然而反党事实铁证如山，罪责难逃，安子文、徐子荣之流无可奈何，只得写上：“事情属实，但需撤消上述决定。”就这样，刘尚之到现在还身踞要职，继续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而对真正革命的同志，刘少奇之流却利用职

权残酷打击。现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刘格平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是当年北平伪军人反省分院中拒不执行刘少奇黑指示的好同志。刘格平同志不怕威胁，不受利诱，就是不遵守他们修正主义的“纪律”，不服从他们叛党的“命令”，坚决不写叛党自首启事，坚持斗争到底，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狱。这样的好同志，却一直受到刘少奇等人的冷酷无情的排斥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格平同志被调到北京任很高的职务，在当时，只有四十几个中央委员，其中就有他。后来，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坏蛋怕刘格平揭发他们叛变一事，就利用刘格平在民族事务问题上的一些缺点，穷凶极恶地打击刘格平，想把他置于死地。处理刘格平时，根本不讲道理，不准其申辩，处理后连让刘格平看都不行。以后，把刘格平同志送到山西，但不给工作，几十个省委委员，刘格平的名字都没有。刘格平当上一个副省长，还是中央作的决定。尽管这样，刘格平同志仍然没有被压服，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继续向中央揭发。这些同志因为揭发刘少奇、薄一波等人的叛党罪行，曾经受到党纪处分，曾经被捆绑起来关押了几十天，曾经被送到小学去念书，还美其名曰：“老干部学文化”，曾经被说成是疯子，计划要送到神经病院，企图灭口。

刘少奇利用职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大批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插到中央和全国各地，上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副总理、各部，下至各中央局、省委书记处、工厂党委等等，形成了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网。这些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上下勾结，串通一气，抱成一团，互相包庇，互相掩盖，到处打击革命同志，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在后台老板刘少奇的支持下，薄一波、安子文这个叛徒集团贼心不死，先后于一九五〇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〇年，三次于北京集合，碰头开会，并在反省院照相留念，阴谋篡党、篡军、篡政，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他们的黄粱美梦。刘少奇之流的末日到了。

“宣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坚决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刘少奇叛徒集团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铲除掉，把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誓保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附件一

今天的形势，是中国本部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入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极少数愿意甘心情愿作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

摘自刘少奇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发表于北方局的《火线》报上

附件二

人自初生一直到衰老死亡，一直和死斗争着，是死的不断的克服，但最后还是死的战胜。生命是死亡。

.....

事物的存在，就是向死亡发展，而最后结果还是死亡。死的胜利，是新事物的产生。事物之肯定，是克服死亡的过程，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摘自刘少奇《人为什么犯错误》

附 件 三

因为中共在武装中保存了干部和部分武装，所以现在才能发展偌大的党，可是这只是在苏区中保存的，白区除了保存革命的旗帜外，工作上基本是失败的，这是工作的大错误，也是白区中的机会主义，这是犯着不去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联系的错误。

但是部分的组织是保存的，河北省委保存了几十个干部，其次国民党监牢中保存了残余的同志。

摘自刘少奇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四日《关于华北华中抗战的总结》

附 件 四

参考下页张闻天交代，此处略。(本书编者注)

附 件 五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需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 周斌 张家璞 杨仲仁 董旭生 刘华甫 夏维勋 冯俊斋 徐之荣

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九月二日《华北日报》第二版

同上反共启事内容有：

李郎吾 王伯庆 张鹏德 刘俊才 胡锡昆 廖广麐 高仰云等人。

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五日《华北日报》第二版

附 件 六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

《华北日报》自首叛党集团一览表

现在还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因篇幅有限，只选登其中一部分)

现名	化名	现在工作职务
薄一波	张家璞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
安子文	徐子文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李楚离	李郎吾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徐子荣	徐之荣	公安部副部长
廖鲁言	廖广麐	农业部部长
周仲英	周斌	国家经委副主任
杨献珍	杨仲仁	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
高仰云	高仰云	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刘澜涛	刘华甫	西北局第一书记
胡锡奎	胡锡昆	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附 件 七

刘慎之交代，履行自首手续和出狱过程

第一步向敌人索取自首书，是一种固定格式，内容大意是经反省院教悔认识过去的过错，悔过自新，今后不反对政府，在政府领导下坚决反共，在自首书上签名按手印(或画押)。

其次是登报启事，我们登报是集体二十多人。其内容有年幼无知，误入歧途，悔过自新，今后不反对政府，在政府领导下坚决反共等。启事底稿是集体一张各别画押的。

反省院长训话照相。在院子内犯人按照相的要求排好，各个保人在背后，反省院长在对面摆一方桌训话，训话内容已记不确切，大意是经反省院教诲，你们悔过自新，（表功让犯人感恩）今后要拥护政府守法反共，（训诫）最后大声问保人，你们敢保不敢保？保人齐声答：“敢保”。训话完了照相。

发出狱证件。在饭堂内犯人和保人一排站立，逐个点名，应声后走到前面，向敌人鞠躬，领取出狱证件。证件是油印的，大意是某某已悔过自新，准予释放。

还有敌人询问悔过自新是否真心诚意，答复是真心诚意。此项是在院长训话时询问集体回答的，还是在领取出狱证件仪式上个别询问个别回答的，这记不确切。

最后由保人领我出狱。

附 件 八

刘锡五交代：出狱之前在饭厅开个出狱典礼会，先由反省院长训话：过去你们受共产党利用，现在已反省完，出去后不要再为共产党工作，坚决反共……不为共党利用，为国效劳。

接着我们答曰：“感谢院方教导，我们已经反省，出去后再不为共党利用，再不为共党工作。”

出院时每人领一张证明书，上边写有：“改过归正，反省自新。”领这张证明时按了手印，并向院长鞠躬。

张闻天向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交代关于一九三六年“自首”真相。

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

我现在交待以下三个问题。

(1) 立场问题。

(2) 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里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去；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就复信表示很同意他的意见，并且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给毛主席，或到中央特别讨论。

(1) 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的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仅违反了党纪、党章的规定，损害了党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辉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张闻天

1967. 2. 18

[附] 熊怀济：《天地有正气》（节录）

党中央和“七大”对一九三六年出狱问题作的结论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前夜，中国

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余党员。

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从前方来的“七大”代表都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审查。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狱的五十二名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这十四名代表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周仲英、赵明新、吴云甫、王德、彭德、马辉之、李楚离、刘慎之、傅雨田、刘子久等。

一九四四年三月^①薄一波同志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到达延安。他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在北平草炭子监狱五年半的监狱斗争，当他谈到关于上海事变和福建人民政府的那个长期争论时，毛泽东同志说：你们那个争论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嘛。薄一波谈到狱中党支部规定了反对“反省政策”的方针，强调把身体搞好，学习马列主义，坚定信念，斗争到底。毛泽东同志说：这样做是对的，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保存、锻炼和教育了一批同志，这就是胜利。毛泽东同志还问了出狱的还有哪些同志和他们的情况。薄一波同志作了汇报后，他关切地说：你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出来以后又分派到各地去，又回到五湖四海，做了不少工作，是起了作用的。他还要薄一波同志开了个名单。^②

这次谈话后，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又找薄一波同志谈话，也谈到一九三六年出狱问题。任弼时同志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中央作了讨论，让你们出来的。此外，刘澜涛同志于一九四四年冬，周仲英同志于一九四五年一月，都曾分别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过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经过。

“七大”期间，中央和各代表团对每个代表都进行了认真的代表资格审查。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是刘伯承，副团长是薄一波、王从吾。安子文是晋冀鲁豫代表团的代表。薄一波同志提出应把他们一九三六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说清楚，作出结论。

对于薄一波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经代表团审查，认为一九三六年他们从北平草炭子监狱出来是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由党组织营救他们出来的。因此，代表团同意了他们的代表资格，并报请中央批准。后来，刘少奇、李富春同志告诉薄一波同志：你的建议中央同意了，中央把你们出狱的问题通知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他们还说，其他代表团如提出此问题，也照此解释。

事实上，从一九三六年这些同志出狱，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召开前，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都遇到这批同志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狱的问题。在他们填写自传和向党组织的汇报中，都谈到这是党组织的决定。对此，中央组织部作了认真的调查，证明事实确实是如此。因此，“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同志说明了这件事。他说：这批同志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党组织营救他们出狱，是北方局建议，经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因此，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薄一波等同志一九三六年出狱的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中央提名的候选人有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在各代表团酝酿候选人名单时，中央正式通知，这些同志的出狱，是北方局建议经中央批准的。

党中央对薄一波等同志出“反省院”的问题是经过多次严格审查的，对他们这段历史是清楚地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炮制的大冤案

这样一个经过北方局建议、党中央批准的正确决定，中央和党内许多负责同志，特别是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是清清楚楚的。三十年来，党组织一直没有认为有什么问题。全

^① 过去薄一波同志在他写的文章中说是1943年，后经查对，应是1944年。

^② 薄一波：《崇敬与怀念》，1981年7月3日《人民日报》。

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安子文同志又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过一九三六年出狱的经过。一九五三年薄一波同志再次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份关于出狱经过的报告，也批示存档了。为什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问题就成了重大的政治案件呢？就成了一个被突然“发现”的、向党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这就必须揭露一个那个“中央文革”的“顾问”、阴险狠毒的野心家康生的丑恶表演。

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有些虽然现象不同，本质却完全一样。一九三一年，当这批共产党员因宣传抗日、组织抗日力量而被捕的时候，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口号叫“中日提携，共同防共”。同侵略者的口号相呼应，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是“先安内而后攘外”。两个口号都把防共、反共放到首位。八年抗战，蒋介石龟缩后方，宁愿把半壁河山抛给敌人，也日夜不忘“限制异党活动”，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重提“剿共”的口号，公开向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发动进攻。外国侵略者反共，国内反动派反共，人们都看到了。可是有谁曾经想到，还有些混入革命营垒、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人也在反共？而且，他们行径之卑劣，手段之狠毒，实在令人发指。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康生和林彪的高级幕僚陈伯达就在策划一场反共阴谋。康生是一个残害过大批共产党员的刽子手，而陈伯达恰恰是当年进草炭子监狱之前就在天津叛变出狱的叛徒，进了草炭子监狱后不久，又向敌人写悔过书出狱了。刽子手加叛徒，从共产党内部搞反共活动比起日本人和国民党就高明多了。他们把党的大批好干部打成“走资派”以后，又上演了一出罪恶滔天的“抓叛徒”的丑剧。

康生对于薄一波等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经过，本来是完全清楚的。一九四四年，康生当着薄一波同志的面，赞扬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炭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七大”召开时，康生身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对这些同志的问题、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通知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此事的结论，都是知道的；一九四五年九月，康生找安子文同志谈话，安又向他谈了一九三六年出狱的经过，康生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一九四八年，当时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当时渤海区党委所在地过春节时，康生曾对别人说起一九三六年北平一批党员出狱的问题。康生说：一九三六年，中央分析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抗日高潮又已经到来，需要大量干部出来工作，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都被关在北平狱中，如不及时把他们营救出来，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解往南京。另外，如果敌人很快占领平津，或者华北政权汉奸化后，这批同志就只有全部牺牲。考虑结果，当时中央决定营救他们出狱。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康生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和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为了制造这一大假案，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让某专案审查办公室搞调查，还指使红卫兵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根据康生的指示，南开大学有个所谓“抓叛徒战斗队”，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六十一人组成的“叛徒集团”。九月，康生就迫不及待地诬陷薄一波等同志当年在草炭子监狱有“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康生的调子一定，其他“文革”干将都争先恐后大造舆论。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同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二月十二日，关锋对参加军训的解放军代表的讲话中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重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劳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四月十二日，江青粉墨登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煞有介事地说：“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康生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五月六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说：“南开‘八·一八’、北航

‘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所谓“三六”专案，指的就是一九三六年被敌人关押在草炭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位同志，执行党中央、北方局的决定，由党组织营救出狱，投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问题。

由于江青、康生一伙的煽动，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作了结论的问题，统统翻腾出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案、假案、错案，很快把一场祸及成千上万人的灾难扩展开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在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操纵下，以中央的名义印发了某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

八月九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刊登《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的文章，说这个“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狱中的人自首叛变的；而这些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作出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这批“叛徒”出狱后，又是刘少奇“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两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康生一伙的指使下，南开大学红卫兵向当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同志，追问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问题。他们到张闻天同志家，向他追问经过情况，还逼他写具体材料交代。张闻天同志说，事隔数十年，具体情况需要仔细回忆再作回答。

鉴于这是一起重大政治案件，为了回答红卫兵的质问，张闻天同志作了认真的仔细的回忆。但是，对当时的一些具体的细节，确实是记不很清楚了。只有一个关键的情节，就是关于营救薄一波等同志出狱，刘少奇同志曾给党中央写过报告这件事，他是记得很清楚的，对报告中向中央的建议，他当时也是认为可以同意的。但当时正式批准北方局的报告的经过，他就记不清了。为了慎重起见，张闻天同志曾将他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写了封信，请他查中央原来的档案，以证实当时的情况。

奇怪的是，康生接信后不予置理；张闻天同志又第二次给康生写信，康生也一直不作答复。最后，张闻天同志只好决定由他个人负责，承认是他批准的。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有一天，有两个自称是康生派来的干部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找到张闻天同志。他们对张闻天同志说：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出狱的案件，被你(张闻天)从中把水搅浑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等等。

这次谈话后，张闻天同志感到压力很大。事隔不久，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在康生一伙的指使下，竟有一个排的武装，把张闻天同志和他爱人看守起来，实行隔离监护，进行审讯，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才解除监护。

事情很清楚，康生之所以要威胁张闻天同志，就是怕张闻天同志如实说出北方局的报告是经过中央批准的这一历史事实。因为这样一来，康生一伙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和薄一波等同志的阴谋，就可能落空。

在那一段天昏地暗的日子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完全疯狂起来了。康生使出了浑身解数：时而亲自出场，时而调兵遣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历史，混淆是非，伙同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越过党的组织部门，把持了“专案组”，并且砸烂了“公检法”。真正是为所欲为。只要康生写张纸条指名把谁“拷起来”，谁马上就会遭逮捕。甚至周总理发现此事，亲自发出了保护这些老干部的指示，他们也拒不执行。党纪国法被他们糟蹋到了何等地步！

尤为恶劣的是，康生一伙采取卑鄙的手法，先是制造一种这个案件是“群众揭发”的假象，然后又把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农口运动情况的报告》写的一段

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塞进他们炮制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中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印发，使人认为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就是针对“六十一人案”而写的。据此，康生一伙就将薄一波等同志定为“叛徒集团”，并且还借党中央的名义，去欺骗和蒙蔽广大群众。

总之，炮制“六十一人案”这一千古奇冤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作恶多端、老奸巨滑、一贯靠玩弄阴谋诡计以欺世盗名的康生。

康生之所以要伙同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炮制骇人听闻的“六十一人案”，就是妄图通过分裂我们伟大的党、破坏我们伟大的党，来实现他们篡党窃国的反革命阴谋。

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始终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处在农村的苏区、边区，后来叫解放区；一条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敌占区、国统区，总起来叫白区。正是在这两条战线，两个地区进行了长期斗争，特别是农村的武装斗争，我们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时候，却把成千上万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共产党员称为“民主派”，胡说什么“民主派变成走资派”，要统统打倒；他们还把成千上万来自白区、被敌人迫害过的共产党员称为“叛徒”，要统统“揪出来”，用以全盘否定我们党的白区工作。事实上，他们不仅要揪一个草炭子监狱的“北方叛徒集团”，还把魔党伸向全国，还要揪一个“南方叛徒集团”，揪一个“开封监狱叛徒集团”、“太原监狱叛徒集团”、“新疆监狱叛徒集团”，等等。

历史无情。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终被“揪出来”的，恰恰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货真价实的反革命集团。这帮败类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林彪死无葬身之地，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俗话说：“雪地里埋不住死尸”。他们那个埋藏得很深的“顾问”康生，如今也在阳光下现出了魔鬼的凶恶面目。

[附] 刘英：《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节录）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一个难答的问题突然提到了闻天的面前：一九三六年春“六十一人出狱”是怎么一回事？提问者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

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闻天是记得清楚的。

那是一九三六年春天，少奇同志报告，说有一批干部（六十一人）关在北平草炭子监狱，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的普通手续就可以释放。当时华北抗日形势迅速展开，急需干部，而狱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领导同志签字的文件，才愿出狱。少奇同志请中央立即决定。事情来得很急（因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又是如此重大，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六十一人出狱以后，许多同志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七大召开前夕，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对他们又审查了一遍。闻天对我说，事实就是如此。“六十一人出狱的确是中央批准的。”可是在这个当口重提这桩历史陈案，该怎样回答呢？闻天很为踌躇。

当时以批《清宫秘史》为由头，引发了全国上下抓叛徒的运动，斗争矛头向着少奇同志。报纸上，“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的代称；如果对此事推卸责任，那么少奇同志“大叛徒”的罪名就更重了。事实并非如此，闻天怎么肯为了一己的安危而使少奇蒙冤受害呢？六十一人出狱本来是那种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策略，无可厚非；六十一位同志本身更是在狱中坚持长期斗争的好同志，当然不应为此而蒙冤受屈。但此刻如果明说此事是经中央研究批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也担待不起。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案经过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去信，闻天用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说此事回忆结果是“经中央批准”，

这样回答是否可以，请他查查文件。

闻天接连去了两信，却不见回音。红卫兵“小将”催得急，闻天乃独自承担责任，他答复：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并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小将们”欣喜若狂，又揪出了一个“大叛徒”——张闻天！

闻天反倒有一种轻松之感，这个坎总算是迈过去了，虽然又多了一顶帽子。

可是，阴谋家的卑劣远远超出老实人的意想之外。这事并没有就此了结。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的一天，闻天突然被叫到经济所受审讯。回来后，他对我叙述了这次审讯的经过——

今天来了两个身穿军服的人，自称是康生派来的。问了一通六十一人案始末之后，严厉地训斥我，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把水搅浑了”。他们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明明是暗示我重写材料，把责任推给刘少奇。我当场拒绝了他们，告诉他们：“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闻天讲完了这段经过，轻声对我说：“我可能会被逮捕。”

果然不出闻天所料，隔不几天，五月十六日，景山后街甲1号我们的寓处开来了一个班的武装，宣布对我们实行‘监护’，就地将我们隔离开来，把我们两人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五百二十三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原载《回忆张闻天》第334—337页)

[附] 萧荻：《历史不容忘记》(节录)

一记南开大学清查“抓叛徒活动”的前前后后

祸及全国的一场大迫害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南天大学造反组织两个骨干在北京图书馆从敌伪报纸上查到高仰云同志一九三六年经党组织营救、办理出狱手续的材料，一时之间如获珍宝，便向“中央文革”写报告，诬陷高仰云和几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是“叛徒”，同时以南大“八一八”造反组织的名义张贴大字报，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抢先把诬陷材料公布于众，自以为是抢到了“爆炸性新闻”！

“四人帮”和康生等人对此备加赞赏，并加以充分利用。他们百般赞扬南开大学造反组织“八一八”和“卫东”抓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有功，关批准同意，“抓叛徒”成员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同时亲自向南开大学两派造反组织的头头部署调查一些老干部的所谓“历史问题”，从而使“抓叛徒”活动祸及全国。

在笔者面前摆着一份历史见证。那是当年南大造反组织留下的原件。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记载着：

“……我们派出了几十个抓叛徒小分队、几百个专案调查组，调查人员出动了几万人次，行程约一百五十万公里(其长度可绕地球三十七周半)。从海南岛到黑龙江，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云贵高原到福建前线，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除台湾、西藏外全国二十多个省、几百个城市都留下了我‘八一八’战士的足迹，共计调查了北京、太原、济南、武汉、开封、南京、苏州、杭州、保定等十二个敌伪反省院材料……”

自然，对立的一派“卫东”也不示弱。后来的“北航红旗”、“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北京化工学院”等所谓“联调”更是紧紧跟上，加上各个当地单位内部的造反组织，一时

“抓叛徒”热如火如荼。仅据当时南大两派组织宣称，这一活动迫害十二级以上领导干部即达一千二百余人。

一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其矛头恰恰是指向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给广大青年包括这些造反者本人开辟光明前途而呕心沥血奋斗几十年的老同志。

阴谋家的导演

象“抓叛徒”活动中所迫害的“六十一个”和越来越多的老同志，他们的襟怀不但是坦白的，脚步是光明的，而且历史是一清二楚的。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对这一特殊情况加以歪曲岂不更加蛊惑人心？作为老谋深算的野心家康生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加害老干部的良机，尽管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问题是审查过的，对他们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康生之流还是瞒天过海纵容和导演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迫害。在十年浩劫那一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总理值班室针对“八一八红色造反团”要用大传单形式向全国广泛宣传“叛徒”材料的作法，打来电话，“总理要你们把材料交上来。在中央没有审核以前，不能用报纸形式发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一极其重要的指示，竟公然被造反派肆意篡改和歪曲。老革命家张闻天同志首当其冲，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就遭受到了“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的非法审讯。但他铁骨铮铮，在“六十一人案件”问题上不推诿，不含糊，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独自承担责任。直至一九七六年，他冤死江南。在年老力衰、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张闻天同志在肇庆被监护时期写了《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等重要文章，就“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曲折历史提供的教训痛切陈辞。周总理舍生忘死对受冤老干部的尽力保护，张闻天同志无所畏惧地为坚持真理以命相争，他们这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将彪炳千秋流芳万古！而康生、“四人帮”之流机巧权变诬害忠良，终将在历史审判台上蜷缩在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落。

当法制荡然无存时

不要证据，不许申辩，事实可以随意捏造，剩下的就只有无尽无休的逼、供、信，加上拳打脚踢，棍棒齐飞，视人命如草芥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

安徽教育学院副院长曹建培同志，是一位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并于转年入党的老干部，他在接受重任赴新疆开辟工作中，一九四三年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捏造罪名关进监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同马明方等一百三十一人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回延安。经党组织审查，曹建培同志的结论是“在狱中政治立场坚定”。但，就是这样一位历经敌人风刀霜剑坚强不屈又已早作结论的老同志，也没有逃脱悲惨的厄运。

一九六七年南开大学造反组织为扩大“六十一个”“战果”，派人到合肥和当地造反派一起，对曹建培刑讯逼供达二十九次，那是日夜不休的“车轮战”。有一次从晚上逼打他惨叫到第二天凌晨四点。连续的刑讯毒打，使曹建培同志头、腰、背、腿多处受伤、口吐黄水、血水，直到胃病复发，溃疡穿孔。动手术后第四天，那些狂热的刑讯者为了“在咽气前抢下口供”，又对他进行了连续四天七次突击审讯，终于在三月二十六日凌晨，使曹建培同志含冤死去。

这位坚强的老同志至死也没有承认自己是什么“叛徒”，因为那是诬陷！

“凡是住过反省院的，不分青红皂白，全定为叛徒”，这就是造反组织荒唐的逻辑。在南京化学化肥公司审讯政治部主任方立凡这位老干部时，外来的造反组织手里什么材料也没掌握，硬是把别人在三十年代写的什么启事念了一遍，逼方立凡承认写过这东西。方立凡拒不承认。审讯者大声喝斥：“承认不承认，叛徒的案也翻不了！”谁知这一套讹诈式的审问中所念的材料，竟被当地造反组织抄成大字报公布，使他备受折磨。南开大学去的造反者“放一枪就跑了”，但方立凡同志却被置于绝境。跳楼自杀身亡。

为了人的尊严

中共天津市委对清理南大“抓叛徒”一案给以很大的重视，不仅组织了市属十七个单位进行联合办案，并请中央指委核查小组牵头，组织了有关省、市进行协作。市有关部门和南大负责同志组成领导小组，在清理工作中，把主要力量放在调查核实上。

这和当年法制遭践踏的情况，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南大党委首先深入开展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们对当年曾参加过两派组织的群众，不加歧视；同时不分哪派，吸收其中了解情况并积极向组织反映情况的同志参加校系两级核查班子，充分发挥知情人的作用。这样，很快解脱了大多数，把力量集中到搞清“抓叛徒”一案的来龙去脉，和核查重点审查对象上来。核查，一切都要有足够的事实根据。天津有关各部门的同志们，下大力清理了天津档案馆和其他部门保存的有关“文革”的材料，并到中央档案馆等部门查阅了当年南大两派造反组织上报“中央文革”的有关材料。这些“笨工作”一直做到这样细致；举凡“文革”期间的两派小报、讲用材料、来往信件、大字报底稿、外调介绍信存根、入党志愿书……直至车票的报销存根，都被一一分析整理，按人头建立了一千一百多张卡片。

与此同时，各有关单位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塘沽盐场为弄清一个有关人的问题，先后到六个省、市五十四个单位进行了细致艰苦的调查核实。

核查工作自始至终在严格的政策指导下进行。只有头衔而错误事实不多的人被实事求是地一一剔除。清查结果，在区别对待的方针下，对一些组织、指挥、策划“抓叛徒”造成严重后果的少数首要分子以及具体指挥刑讯逼供，提供诬陷材料，造成严重后果，而又态度不好的几个责任者定为“三种人”，开除出党；对犯有上述罪错，干了一段但中途退出，态度又较好的人，定为犯严重犯错误；对于清查属于一般性错误，态度较好的人，则及时解脱和使用；对在过去已作过处理，这次整党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仍维持原结论，但由于罪错实属严重，有的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如“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陈相文，在十年浩劫中，他派人抄党委书记高仰云同志的家，派人去北京从伪报中查找老干部的所谓“罪状”，到外地大肆宣讲所谓“抓叛徒”的“功绩”，扬言“我们怀着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决心，杀出南开园，踏遍全中国”！并因此被认为有“功”，一九七一年后，先后升任市委委员、团市委书记、团中央“十大”筹备组副组长，直至“四人帮”倒台后被审查期间仍不老实。在清查中，经过反复调查核实，证据确凿，被清除出党。《天津日报》对此公之于众，并以《大快人心事》为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还有一个学生除了积极参与“抓叛徒”罪恶活动，又有触犯刑律的行为，尝了铁窗风味。这算是两个比较特殊的处理。至于其它人，包括在“抓叛徒”中错误十分严重并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都留有余地，也没有公开点名，期待他们自重、自新。

（原载《蓝盾》1985年第7期）

第七十三卷 1967年3月17日至20日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

3月17日

中共中央通知，未经中央同意不能在省、市一级擅行夺权。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道和广播电台广播夺权。

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接见国防科委各部，各部部长都参加。周指示：(1)要下一道通令，四月份不串连了；(2)好多部长都要放回去工作。关于夺权，周说：开始有些模糊。收回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肯定的；夺回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不仅群众说过，中央有过这个口号。目标大了些，主席也估计到各地会有连锁反应。经过实践，主席认为仍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要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将功赎罪。(《传信录 603》)

萧华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广泛宣传文革的意义，深入批判刘邓和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推向新高潮。

康生接见安徽1·26夺权派代表，严申不准再乱捕反对派。(《传信录 604》)

周恩来、谢富治在军管干部会议上讲话。周说：毛主席根据目前情况，考虑到军队不仅要管农业，而且要管工业。目前，全国除了15个省市外，其他省市都实行了军管。军事管制要扩大，在夺权的单位，要派军代表。县以下派民兵代表。谢说：北京有一千多个工厂，这次实行军管的一百多个。(《传信录 605》)

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在西苑大旅社召开部分厂矿企业的解放军代表会议。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北京进行了军事接管的工厂有一百零几个(北京共有1700多个工厂，70万工人)。需接管的都是关键工矿。搞军事接管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叶群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吹捧邱会作是“解放以来四个后勤部长中最好的一个。”

武汉军区和武汉公安机关逮捕了在武汉地区煽动极“左”思潮的造反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和一些骨干分子。

红代会批谭(震林)联络站等134个单位一万二千余人在农展馆广场召开“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誓师大会”，人民解放军也参加了大会。

3月18日

中共中央致信全国职工、干部，正确贯彻中央要求，搞好运动。

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

工人、职员同志们！革命的厂矿干部同志们：

工人阶级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

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召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希望你们在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新的条件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

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主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风头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

你们应该巩固劳动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

你们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制的以外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

你们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在文化革命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产品的高质量。要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材的不良现象作斗争。

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研究精兵简政的经验。既要大大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又要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要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高国家主人翁的伟大责任感，好好保护国家财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

党中央号召，一切在厂矿中工作的革命干部，应该带头做好各项工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尽最大的努力。

党中央相信，一切厂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严格进行自我批评，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当好群众的小学生，在工作中改造自己，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混进厂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绝对不许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职工之间的团结，制造和挑动派别纠纷。对他们的处理，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立场、劳动态度和厂矿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合作。

建议厂矿的全体职工，在业余时间，认真讨论中央发给你们的这个信件。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团结起来！

祝你们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业生产的双丰收而英勇奋斗！

(这封信要在一切厂矿和基本建设单位中宣读和张贴)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 3 月 18 日布告。对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人员回京问题作了规定。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三月十八日的布告

现将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三月十八日的布告转发你们参考。各大、中城市如有类似情况，可以参照办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首都广大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社会渣滓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

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

[附]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

一、凡被遣送的下列人员，原则上一律不准返回北京，已经回来的应立即返回原遣送地，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

- (一) 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 (二) 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分子；
- (三) 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
- (四) 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 (五) 表现不好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 (六) 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 (七) 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分子；
- (八) 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 (九) 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 (十) 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分子。

原来依靠上述十种人生活的家属子女，已回北京的，一般也应动员他们返回原遣送地。少数确有正当理由，在京又有亲属抚养的，也可以不回原遣送地。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回北京。

二、被遣送后返回京的人员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在本市给予安置：

(一) 不属于第一条中所列十种人的人员，已经返京的应予落户。原来在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内部的，由原单位妥善安置；

(二) 十种人中，被遣送去沿海、沿边地区和国防要地，已经返京的，可予落户。

上述两类人，已在迁入地安家落户的，就不要再返回北京；

(三) 十种人中，年老病残，不能单独生活，原籍无依靠，北京又有人赡养的，以及个别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予落户。

三、那些人可以在本市安置，应由原单位的或街道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意见，经有关行政领导和公安机关审查批准。

四、应该返回遣送地的人员，必须立即离京，违者由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五、凡遣送到本市各县的，当地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应当顾全大局，做好遣送回乡人员的安置工作，不要让他们返回市区。

周恩来函商毛泽东、林彪等，要求对政府各部之陷于瘫痪者皆进行军管，毛批示：“退总理照办”。

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台上站着彭德怀、贺龙、陈毅、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谭震林等四十七人，周恩来参加了大会。

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传达毛泽东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

周恩来、康生、萧华、李天佑、王力、关锋、戚本禹、徐立清等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严厉批评了内蒙军区镇压造反派的错误。

下午，在民族宫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教育部、高教部、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等单位的革命组织。据云蒋在会上“态度极不老实”，遭到了与会广大革命群众的“痛斥”。

部分“联动”分子贴出大字报《社会向何处去》。三十一中贴出大标语“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见”。

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于3月12日至18日在太原举行，正式建立山西省革委会，刘格平任主任委员，张日清、刘贯一、陈永贵任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

北京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是戚本禹搞四清的地方，本日召开“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死捍卫四清运动成果大会”，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几十个单位，共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

红代会今天上午电话通知所属组织：

1. 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任何人不能对周总理有半点怀疑，绝对不能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对他实行专政。
2. 不要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3. 李先念、余秋里的问题还不太清楚，正在调查。

3月19日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先后派出二百八十多万人执行任务。

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

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一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些单位究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党委讨论决定。

一、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一段落，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样做，既可以增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力量，又可以使这些单位的人员，更好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促进思想革命化。这些单位的整风何时结束，能抽调多少人员，何时开始，由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党委讨论决定。

二、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中发(67)106号

各级党委，各军区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目前，各地区、各学校、各机关、各企业事业单位，正在集中力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同时，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希望各级领导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

这个通知可在城市、农村和部队中张贴。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戚本禹等人参加了大会。周恩来讲话提出：在春耕大忙季节，生产队、生产大队不要夺权，即使是需要夺权的也不要夺权，把春耕工作做好。

杨成武在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对罗瑞卿、邓小平作了长篇批判发言。（《传信录 611》）

3月20日

毛泽东对齐齐哈尔铁路机务段3月12日报告的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铁路局也应该派出军事代表，吸取好的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好的。此事请你们研究。”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强调运动所造成的“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其损失“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下午，毛就林的这个讲话，写信给林说：“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以斟酌，然后可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做了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从此，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斗争进入新的高潮。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前几年，毛主席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却变得容易被忽略，好象没有阶级斗争了。我们毛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主席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发展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自从有了文字以后的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从原始公社崩溃瓦解以后，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更进一步了，他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

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古今中外，阶级存在的社会领域里面，最基本的问题，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每一个人在思想上都有阶级的烙印，没有一个人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总都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阶级。这种社会阶级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现象，区别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区别于将来的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阶级存在的事实，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贯穿于各个方面。这种阶级斗争的存在，来自一定的经济基础，反映到上层建筑，就形成了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政党、政党里面路线的分歧、政策上的分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的差别。这些分歧和差别，处处都有阶级的烙印，处处都是由于阶级、阶级斗争这个根源引起的。

因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所有现象的总的根源。离开了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这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不影响我们的思想，而是或者不知不觉地，或者有意识地，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共产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路线，指导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和政策，如果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我们观察人，观察事，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如果我们不自觉，不重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不注意阶级分析，就会变成客观主义。而客观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客观主义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否认阶级的。但是，实际上用这种形式来掩盖它的阶级的面貌，阶级的愿望，阶级的政策，阶级的行为，便于欺骗群众。

整个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处在阶级、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通常采取三种斗争形式来进行，一种是思想战线；一种是政治战线；一种是经济战线。可是这三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有的时候以这一个为主，有的时候由那一个为主，可是它总不是孤立的。所以，它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东西。

阶级斗争在各个时期，由不同的阶级来出现，采取不同的阶级对抗形式。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当然，每个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在不同的阶段，每个国家都有两个主要的对抗的阶级。当然，同时也总会有其他阶级的残余，或者新的阶级的这种苗头。

我们的国家，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对立、对抗、斗争，成为我们全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一个总根源。不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现象，那就会把事情混淆起来，是非颠倒起来，就是回到一种所谓全民观念，就会把个人看成是孤立的个人。人哪，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总是社会的人。正如医生给我们验血的时候，他抽出一滴血来，就看出全身的红血球和白血球，酸性和碱性的这些变化。这一滴血就代表你的全身。你一个人的活动，就是一个阶级整体的一种表现。

所以，没有这种无产阶级观念，看一个人就会看错了。对于每件事情的评价，每个问题的作法就会不同。例如：对老干部的看法，就可能认为一切老干部都好得很。其实，对老干

部，是必须做阶级分析的。有很多老干部是保持了原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他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不会是统统变成资本主义分子，也不会是统统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的看法也是这样：或者说这些青年在冲你那个单位的时候，就说他们统统都是坏的；或者是另一种观点，说他们统统都是好的。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很多人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的，但一定还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以及其他的社会成份，地、富、反、坏、右分子。干部子弟也是这样子，有的是无产阶级分子，有的蜕化变质成资产阶级分子。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所谓“乱”的问题也就看不清楚。实际上，这次的乱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方面，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把它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是两方面对立的斗争，无产阶级这方面也是有个别误伤的，干部中间也有个别误伤的。但这是个别，而且可以保护下来。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文化的看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甄别出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坏的，而没有这种观点就甄别不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首先是资产阶级发起的，然后，无产阶级反击。首先是通过思想斗争，然后逐步进到政权的斗争，以及经济上的斗争。整个斗争中出现许许多多复杂的现象，但是，辨别那些可取，那些可舍，那些是是，那些是非，只有从阶级的观点上，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就是说，从阶级、阶级斗争这一个总根源，才能够弄得清楚。

在我党内，毛主席是最正确的，是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是错误的，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一个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就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这个阶级斗争，不会是一个短时期的斗争，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斗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早就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许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和无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只有毛主席这种最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的人，才能排斥、克服、肃清资产阶级的这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稍微低一点，在自己脑子里面，就多多少少还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可是，推翻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思想里面的阵地、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个战线上如果不打胜仗的话，那么，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可以前功尽弃，我们一些老革命过去所奋斗来的这些成绩，革命的果实，广大人民所奋斗来的这些革命果实，可以悄悄地被资产阶级偷去了，窃取了，或者明火执仗地把它夺去了。

因此，我们应该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展开持久的斗争，我们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才能够保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向前发展。不然的话，政权要悄悄地改变颜色，或者要发生剧烈的反革命政变，资本主义所有制要重新代替社会主义所有制，地主

富农的所有制要重新代替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所以，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就现时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任何国家，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影响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这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一个阶级，或被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特别加强阶级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才有劲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有决心来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才能够跟得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这种伟大的气魄和勇气。不然，我们老是跟不上，而且老是犯错误。本来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是在新的情况下，重新提醒，那还是有作用的。我们写的座右铭，不是天天贴在那个地方的嘛，背也背的来，但是经常看看总会有点好处，而且今天尤其必要。今天的思想动态，今天的活思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实际上存在着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讲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

毛主席有这样的话：“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不看清楚主流，就会发生迷失方向的问题。任何时候的事情，总是有主流和支流的，总有顺的地方，有逆的地方，有正的方面，有反的方面，不会只是一个方面。可是这两个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是绝对平衡的，都不会是半斤八两的，它总是有重有轻，它总是处在变动的中间，一下这个轻那个重，一下这个重那个轻。它不会象机械那样保持平衡的，机械经过过细观察的时候，它也是在变动的，至于其他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肯定是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不会一样，肯定有一个方面是主，一个方面是次。

现在我们看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到底主流是主要的，还是支流是主要的。当然，主流是主要的。可以说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认为，不要怕乱。这次果然经过这个乱出现了很多的好事情。我找了一些同志谈了一下，他们高兴极了，情绪非常之高，他们觉得好得很。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乱，使他们遭受惨重的失败。他们会感到是一种惨痛的失败。不经过这样的大的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我们通过一个表现上很乱的形式，把他们打倒了，这是伟大的胜利。当然，假若他们夺权以后，得势以后，革命群众还会造他们的反就是了。可是那时的牺牲，就会比现在大得多。这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乱，也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们的事业是在向上发展。例如生产，有些地方还上升。抓一下就上升了。今后抓下去，还会大高涨，会出现新的高潮，新的兴旺的高潮，发展的高潮。所付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其实，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毛主席是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可是，有的同志看到自己的几个熟人挨了一下斗，就觉得天下整个都黑了，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误

观念。其实，那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属于很末尾的现象，很次要的现象。我们看到打倒那一批坏家伙，这就是伟大的胜利啊！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还要大流血，他们得了势，就会要实行大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醒我们的：“那就不要很多的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假定那种情况出现，我们革命人民还要用革命战争反抗他们，推翻他们，但那样就还要死好多人。

这一个主流、支流的问题，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不经过这一个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好人也看不出来，接班人也看不出来，新的苗子也发现不了。在这一次斗争中间，坏人固然揭露了，斗倒了，斗臭了，斗垮了，好人也涌现出来了。这就保证了今后的百年大计。许多好人，很多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涌现出来了。不然，他们处在九地之下的，压得很低，冒不出头来。打倒了坏人，发现了好人。没有这一场革命，坏人打不倒，好人发现不了。我们的领导将来就可能落在坏人手上。这次革命是最好的，是采取打倒他们的最好的办法：搞红卫兵，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红卫兵就是捉拿牛鬼蛇神，捉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的天兵天将，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起最主要的作用的，还是我们毛主席。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党内走无产阶级道路的同志，广大的群众，广大的革命左派。

同时，除了打倒坏人，发现好人以外，还挽救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挽救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悬崖勒马，及早回了头，没有更深地陷下去。经过这场大震动，使这些同志不陷下去。和平生活过了十七年，有些人是变了，有些人也到了边缘上，这个运动，是把为数不少的人挽救了。

坏人打倒，好人发现，中间这部分人挽救过来，这是重大的成绩。我们打倒的那些，不是凭一个宗派的原则去打倒的，而是根据一个政治的原则，根据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打倒，或者是发现，或者是挽救。这是有原则的。不管那个山头，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的这一面，站在毛主席这一面，我们这一次统统是保的。不管那个山头的，站在反无产阶级的那一面，站在反毛主席那一面，反社会主义那一面，那就是有的要打倒，有的要半打倒。这样，就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样子，今后所出现的局面就会根本不同，会保持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革命的政权，是清除了那些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思想革命化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生产更加发展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思想革命化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生产更加发展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更便于对抗外来侵略战争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镇压颠覆活动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也就能够保证我们更顺利地应付各种困难、天灾或者人事方面变化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胜利是很大的。

同时，在思想方面，就是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一个大的革命，把新的思想——毛主席思想空前地普及，把人们的精神面貌、政治水平，都提高了。毛主席的思想可以说变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小孩儿都能够讲得出几句毛主席的话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气象。思想上的这种变化，是很大的。今后还要继续地坚持下去，把毛主席的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行动的纲领，行动的指导，必修的功课，这是保证我们不走错误道路、保持革命到底的重大战略措施。

这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苏联没有进行，因此苏联人民受了大害。伟大的十月革命，到今年恰恰是整整的半年世纪，可是，现在苏联的领导集团不但没有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相反地，他们倒退了。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前后沦落为修正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为变相的法西斯国家，用最欺骗的

面貌来欺骗群众。

我们有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智慧、魄力、经验、威望，举行了这个史无前例的震撼全国、全世界的大运动，这是有伟大的意义的。不然，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十七年、十八年来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付之流水，付之东流，可以前功尽弃，可以毁于一旦。毛主席所进行的、所发现的、所领导的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影响全世界，如同列宁、斯大林建立了在一个国家之内取得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胜利。

我们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的胜利是个什么胜利？是夺取政权的胜利。这一次是保卫政权，巩固政权的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些国家实现了，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那里被资产阶级用狡猾办法，资产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的影响，外国的帝国主义的影响，自己本身产生的一批资产阶级分子，把政权变了性质，国家变了颜色。阶级斗争是不能以调和的办法解决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条定律，如同数学上、物理上、化学上的定律一样，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定律，是不能掩盖的。对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只有把它揭露，只有把它暴露，只有把它打倒，只有把它战胜。你不打它，它要打你。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树不动，风总是要吹得你动。这是流传的语言。这句话有道理。其实，我们不是个树，我们应该成风，我们要刮他们的风。当然，他们要刮我们的风，但我也要刮他们的风。我们刮它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来摧垮他们。单纯的消极防御不行，要采取主动的进攻。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防御是必要的。但是后来这一时期采取主动的进攻是尤其必要的。今后有的时候还可能转到防御，但有的时候还要采取大规模的进攻，或者小规模的进攻。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要看到事情的两方面，要看到那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不看到主流这一方面，只看到自己一些老同事挨点整，就把整个天下都看黑了，那就全错了，那就糟了。那就上了敌人的大当。

看不到主流，就会迷失方向。而且，毛主席已经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政策，来去掉支流中那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我们要看到，不管怎么样，要看到这个伟大的胜利，要欢呼这个胜利，庆祝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讲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教导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主席还经常说，我们军队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不但要学会打仗，而且要学会做群众工作。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教导。从红军时代直到最近。所以我们军队同世界上的一切的军队不同。其他的军队就是个打，就是打仗，其它的不管。我们军队还担负着这样多的任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军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战斗任务，应该义不容辞地、责无旁贷地支持地方。军队和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军队离开地方就不能存在，不能存在，不能存在。地方越搞的好，你军队就越好打仗嘛，地方越搞的不好，你军队就越不好打仗嘛。兵员靠地方，吃的靠地方，穿的靠地方。打仗的时候，封锁消息，切断敌人的电话，都靠地方嘛。侦探敌人的消息，伤兵抬到后方去，都靠地方嘛。所以，不把地方搞好，军队就好不了。在座的同志们有不少是经过长征走过草地的吧，那个时候沿途就是没有地方工作。我们的人，老实讲，给国民党正规军打死的不多，主要是给地主武装打死的。我们那个部队，过草地这一段，国民党没打倒几个人，主要是没有根据地饿死的。在江西的时候，一个连一百多人，后来一个连就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十来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搞好地方工作。毛主席有个老办法，要打仗先要创造战场。什么叫做创造战场呢？就是把我们军队分散，以连为单位，以排为单位，到处去打土豪，分田地，帮群众建立

党，建立政权，做群众工作，让那个地方变成根据地。变成根据地了，敌人进来的时候，就进入了迷魂阵，我们在什么地方躲着，他们都搞不清楚，结果他们就是草木皆兵，一草一木都变成了红军，即使没有红军的地方，他们也觉得有红军，要拿队伍去对付。有红军的地方，反而没有去对付，结果就遭到我们的袭击，他们在整个的战争中都是被我们袭击打败的。我们所进行的人民战争差不多都不是那种堂堂之阵，那样子摆开来打的，而是在群众的掩护之下，把他们打掉的。但有的时候没有群众，我们就困难了。例如，刚才我讲的长征啦，过草地啦。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到了那些没有群众工作的地方，又重新吃了苦头。兵没有补充嘛，粮食没有嘛，消息被封锁嘛，被反动派欺骗的少数人还放冷枪，这些，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那么点队伍，能够抗击几十倍、十倍，八倍的敌人，可是一脱离了根据地，困难就多啦，人家就敢向前冲，我们就怕有伤兵，一个伤兵就几个人抬，士气就不旺。所以，搞好地方工作是个大事情，从军队的观点来说是个大事，从全国来说那更加是大事。

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有些当然搞过了，不同的程度搞过了，但是没有这样子的抽出军队去这样子搞。至少十七年来没有这样子搞过。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勇敢的、负责的、积极的来承担这些责任，来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或者是犯右的错误，或是犯“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军队，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用了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是要看到有一种危险，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勇敢执行任务，但是要非常谦虚，非常谦虚，要非常细心。

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在革命的期间，当然应该以革命来带头，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搞生产。所以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也不能等量齐观。革命期间要抓住革命。就是将来这个大运动过去以后，也始终要由革命、由政治来领导经济建设。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一到地方就只搞革命，放松了生产。生产是不能放松的，生产放松了，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会转过来破坏革命。因此，我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重要性来说，要把革命摆在第一位，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生产的时间应该占得多。

一般的说，生产的时间要更多。文化革命和生产，二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差别的，要分别对待。

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我们派出干部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自己本身就应该是很好的左派。你派一些右派分子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去搞，他一定搞不出好事来，一定不会或者不懂支持左派！所以要站稳立场，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阶级问题，要站稳阶级立场，站稳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子的支援，就是好事。不然，可能帮倒忙，那就危险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头脑，不能有点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时搞不清。有搞错了的，本来想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所以一定要照毛主席的老办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老办法，就是要唯物论呐！要调查研究，搞清呐！

我们支持左派，支援地方，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现在各个地方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办法，是大家创造的好办法。就是这么办，就要思想上的支持。毛主席思想、党中央的政策，同群众结合起来，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思想，群众自己懂得了，他们动起手来办，比我们包办代替，那就好多了。只要他们知道这一套思想，这一套政策，没有我们去，或者我们走了，他们也完全能够办好！否则，你人在，这一套就在，人走了，这一套也就走

了。能够扎下根来的还是思想。所以，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保证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在军队内部固然要如此，到地方上，也要把思想工作这件事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办。

刚才讲到了要注意调查情况、弄清情况以外，还要报告请示，碰到重大问题要报告请示，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对的。这种想当然，自以为是，常常同党的口径、党的政策差的满远！满远！满远！才不是那么回事情！才不能那么办的！所以重大的问题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请示，要养成报告请示的制度。现在军一级的同志要办很多事，你们就是要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

不能随便抓人，的确查清了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的少抓。我们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要掌握这个政权，实行这个政权的专政职能。但是，多抓不如少抓好。几个很反动必须要抓的，一定要断然抓起来。

一般地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开枪。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我们搞军管的，是革命的“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地方。军管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作法。因此，一切事情，还是要支持地方的新生力量，左派的力量，把他们支持起来办事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整个的工作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只能协商，只能帮助，只能临时代管。有些同志可能调到地方去做工作，这是另一回事。在军队干部没有撤回来之前，一定要搞好一个新的班子，搞一个好的班子，不能马马虎虎地走了。原来有的班子我想是有五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好的，只有个别坏人；一种全部烂掉了的，那只好搬掉了；一种呢，烂掉一半，那就只搬掉一半就是了；一种呢，烂掉了一小半，那就搬掉一小半就是了；一种是烂掉了大半，那就搬掉大半就是了。总而言之，不能一概搬掉，也不能一概保留。要分清楚五种情况，分别处理。要看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团结大多数，要很具体地体现毛主席所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样的道理。

这次搞好一个好的班子，是百年大计。政权就是这个班子的问题，班子搞好了，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有保证。一个坏班子，就不能够保证毛主席路线的执行，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所以搞一个新班子，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迫切事情。怎么才能搞好一个新班子，是大问题。我们搞军管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很慎重很慎重地来注意，而不要把这样一个政权问题，轻率地处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嘛！你通过政权，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嘛！你通过政权，文化上问题不能解决嘛！那些反动东西就没法打它嘛！所以，一切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政治，归根到底是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毛主席讲的，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关于支援地方，现在还没有成套的经验。初步想到这些。

我们要看到，这些任务很大，很重，又新，我们要勇敢负责，但是要很谦虚谨慎，这许多必须注意。当然，应该注意的事，还绝不止我上面说的这些，你们还可以讲许多，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军训怎么搞，等等。我们必须边做边总结经验。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作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这些。

我总共讲的问题，就讲完了吧！三个问题：就是阶级观念，主流和支流，支援地方。这些问题已经提过，现在只是一提再提吧！三令五申吧！注意又注意吧！无非是起这个作用。

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

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在讲话稿中原有“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句，4月24日正式印发时删去。)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

现将中共广西梧州市委文革小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抄家物资处理意见的请示，转发给你们，供参考。为避免这类物资受到损失，望各地从速处理。中央特作出如下几项规定：

一、查抄地、富、反、坏、右或其它不法分子的财物，除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给本人(如原物已遗失或损坏则不退赔)以外，一律上交。

二、确属革命群众和劳动人民被错抄的财物，应全部退还本人。原物遗失或损坏者，做价偿还。

三、贪污、盗窃和私用查抄财物者，应自觉退出上交，否则严加处理。但被小集体用于文化大革命的少量消费物或现款，经说明情况，可不予追究。

四、地、富、反、坏、右或其它不法分子，不准借处理查抄财物的机会，喊冤叫屈，反攻倒算。违者必须严加惩办。

(此件发各级党委内部掌握)

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抄家物资处理意见的请示
区党委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

我市在去年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于八、九月间红卫兵对一些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抄了家。这些物资至今尚未处理。春季已到，南方雨水多，保管不好或不及时处理，就会霉烂和丢失(已发现有被偷盗现象)，我们意见：

一、属于黄金、白银、外币和大量人民币(以一户有数千元以上的)，予以没收或代管。

二、属于高级生活用品，如高级皮衣、手表等类物资，予以没收。

三、属于普通生活用品，如布料衣物和一般生活用具等归还原主。

四、这些物资在抄家时已损坏的或保管不善损坏和丢失了的讲清楚，不予赔偿。

以上意见当否，请速复电。

中共广西梧州市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说：毛主席接见张春桥时说，二、三、四月份是决战时刻。现在可能拖长。所谓决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决战。主席讲，明年二、三月看出结果。准备夺权的有七个省市，七个还不明朗，十个军事接管，五个夺权。现在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但不提反扑。(《传信录613》)

谢富治接见“政法公社”代表时讲话，说：目前是决战时刻。搞谭震林你们应该参加。夺权斗争中，有少数左派没有经验，没有团结多数。这次解放军接管106个工厂，很多都是在夺权中没有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所致。谁反对统帅、副统帅，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就要坚决和他斗争到底，这是大方向。(《传信录614》)

谢富治对红代会核心组讲话：说：中学近来比较紧张，海淀区的中学、北航

附中的保守势力比较嚣张。现在有阶级敌人搞反夺权，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扑。(《传信录 615》)

下午，在工人体育馆由农口革命组织主持召开了“批判谭震林大会”。揭发控诉了谭在农口搞反革命复辟的罪行。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新北大公社”的代表在会上作了联合发言。

第十一编 批判的再次升级——刘少奇专案组设立

第七十四卷 1967年3月21日至24日

(毛泽东批准设立刘少奇专案组)

3月21日

毛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对刘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

北航“红旗”等六组织秉承康生的暗示，对刘少奇历史进行调查，声称已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曾被捕变节。康生写报告建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540专案组）。本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其他政治局常委也圈阅同意。

[按] 刘少奇历史上曾两次被捕。一次1925年在湖南，一次是1929年在沈阳。

(见卷89、138) 1953年初，毛曾密令高岗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高岗命东北局第二书记张秀山落实。同时的红卫兵材料，又诬栽刘27年在武汉时放弃阶级斗争、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指为内奸、工贼。毛于此中情况，早就应该有所了解。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下面录天津大学红卫兵调查，以见其大概。盖所谓“调查”，实为罗织，此陷人以罪之通行手法也。

扼杀武汉工人运动的刽子手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赴武汉调查组

多少年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大的阴谋家、野心家刘少奇一直沽名钓誉，文过饰非，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装扮成我国工人运动杰出的“领导者”、“组织者”、“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妄图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阴谋。刘少奇多次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如何领导武汉工人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收回英租界。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事。历史不容篡改，颠倒了的历史一定要再颠倒过来，把刘少奇假革命、老反革命的面目彻底搞揭穿。

工人运动的蠹虫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震撼全世界。“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工人组织起来，农民组织起来，学生组织起来，而且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创造了新式的军队，因此革命就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陈伯达同志著《人民公敌蒋介石》第三十八页）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失败，但是，它教育了人民，锻炼了我们的党，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正确，无比英明，无比伟大。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工人运动的重心由广州向北推移，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得到了异常迅猛的发展。

武汉的工会一成立，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工会组织立即猛增至三百个，工会的会员

达三十万人。这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它的出现，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表现了高度的无产阶级权威。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工人阶级最深知武装的重要，武汉市的广大工人从组织起来之日起，就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据当时的统计，工人纠察队员约五千人，枪三千支，劳动童子团约一万人，都用六尺长的棍棒武装起来。纠察队员身穿毛蓝色制服，戴着白布写有“纠察”红字的袖章，以四、五人为一组活动，雄纠纠气昂昂，好不威风。据老工人回忆，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武汉全市工人大罢工，纠察队与宣传队走上街头、工厂，到了预定的时间，纠察队全部举起了“全体罢工”的大旗，刹时间汽笛全鸣，全市大小工厂全部停工，吓得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家屁滚尿流。纠察队保护工人利益，维持社会治安，收回外国租界，惩办工贼和反动资本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使反动派闻风丧胆。当时一个大资本家颤颤兢兢地说：“罢工以来纠察队之横暴，实为语言难以形容。”可见工人纠察队之威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有了自己的武装，这是无产阶级的命根子。反动派胆敢侵犯工会，胆敢为非作歹，工人武装立即给予镇压。工人阶级牢牢掌握了枪杆子，就能夺取政权，就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丧失了武装，就没有工人阶级的地位，革命就要失败。

对待正在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的态度，是检验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毛主席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那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就大叫“工农运动过火”，大叫“糟得很”。

一九二六年十月，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身份随全国总工会从广州迁至武汉，随后又当上了湖北省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比陈独秀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刘少奇在国民党省、汉两党部招待会上讲道：“大家知道，武汉工人约三十万，工会三百余，而总工会之成立仅三月有余。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短促，欲其尽善尽美，实为不逮，我们自己也知道……刻下即有差处，应要社会原谅，切不要因此压抑工人运动。”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刘少奇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在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报告时说：“当时工人太左了，太幼稚了。”“要求提得过高了。”而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大骂工人“横暴”的时候，正是他们想千方百计地扼杀工人运动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刘少奇是在为谁说话，他公开地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一边，维护他们的利益，学着他们的腔调，指责、诬蔑工人运动，完全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

帝国主义的叭儿狗

一九二七年元月一日武汉全市工人大罢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月三日，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队到英租界江汉关附近讲演，受到了英国侵略者的野蛮殴打，英国海军陆战队全部登陆，用水龙和刺刀对准了我们手无寸铁的工人弟兄，并杀死我国工人李大生，肠子拖出了很长，激起了全市工人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汉口英租界，包围了帝国主义在汉口的海军陆战队，占领了沿江大道、江汉关、汇丰银行等重要地区，英国侵略者吓行魂不附体，仓惶向武汉国民党政府求救，要求派兵保护。武汉国民党政府当时迫于人民的压力，不敢出兵，再加上当时武汉卫戍部队为我党叶挺同志率领，大助了革命工人的声威。英国佬见大势已去，就假惺惺的声称英租界托为代管，夹着尾巴跑上军舰、高船，逃之夭夭。什么“托为代管”，完全是英国佬的殖民主义逻辑，明明是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收回，又有哪一个替英国佬代管呢？

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工人纠察队一马当先，锐不可挡，那些过去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的英国洋人，被他们弃如粪土。军队不能维持的秩序，他们能维持，他们在反帝斗争

中立下了伟功伟绩，享有极高的威信。

毛主席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的革命工人，革命群众为收回英租界无不拍手称快，喜气洋洋，江岸站满了前往观看的人群。而当时正在九江开军事会议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蒋介石却吓破了狗胆，他说收回英租界“将引起严重的后果”。孙科等人也大叫大嚷：“绝对不再演汉口英租界之事态，暴力行为则绝对回避。”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看！当时身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湖北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的刘少奇又是怎样的态度呢？他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充当了蒋介石、孙科之流的帮凶，他在斗争最激烈之时不参加，而热衷于与英帝国主义谈判。他盗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下令给进驻英租界的三百名工人纠察队于元月七日撤出，并学着叭儿狗的腔调说：“我工友自应严守纪律，服从政府军警维持，以表示拥护国民党政府之真诚态度……毋论中外各工厂工友，均须安心上工，不得三五成群，聚集英租界，发生纠纷，一切游行须先报告本会许可，如英界有巡捕上街，不得与以殴打，……码头工友，尤不得在租界上叫闹……毋得违抗。”还说：“现在英租界既已让出，就是我国民政府统治之地域了。我们同胞特别是工人们，应当恪守秩序，由此可以表现我民众运动是有秩序，有意义的了。”你看这里，帝国主义的奴才刘少奇让纠察队撤出，让工人严守纪律……不得叫闹。怕的是英帝国主义不得安宁；怕的是英国佬被吓得心惊肉跳；怕的是帝国主义吃了中国工人的有力铁拳头；怕的是有损于国民党右派之外交。刘少奇对英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忠和对工人阶级的刻骨仇恨不都一语道破了吗？把工人运动污蔑为“三五成群”，“发生纠纷”，谩骂成“叫闹”的是什么人呢？只有英国鬼子、蒋介石、孙科之流。把工人阶级用鲜血和生命夺回英租界的英勇斗争诬蔑为英国人自动“让出”的是什么人？也只有英国鬼子、蒋介石、孙科之类。刘少奇是他们的叭儿狗，也自然与之异口同声了。刘少奇所拍卖的“有秩序，有意义”不过是不准工人闹革命而已；不过是为他的主子效劳而已。

在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收回英租界后，日、法租界统治者也都吓破了胆，纷纷向我们试探，是否收回日、法租界，并表示愿意“交还”。德商也有的主张“交还”德租界。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日本水兵又在汉口行凶杀死我国车夫五十多人，造成了比一月一日更加严重的“四·三惨案”。中国人民不可辱，血债要用血来还。日本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广大工人和市民的无比愤怒，他们争相冲入日租界，并提出了收回日租界的强烈要求。就在这紧要关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以“领导”之名来到现场，他一到现场就和日本鬼子握手言欢，以示歉意，并使尽欺骗，恐吓之能事，要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退出日租界。当晚，他又一次盗用总工会名义发出布告，言之曰：“现在政府已派兵前往维持秩序，请大家同胞万勿骚动：（1）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2）不要打日本人，听候国民政府的交涉及总工会办法。”并派出宣传车多辆，高树标语旗帜，上书：“工友们，各安所工，惨杀事件静候政府解决。……亦必能为民众雪耻也。”；四月二十四日，湖北省总工会又在刘少奇一手操纵下，发出通告，要求：“凡各工会在日本商店、工厂、洋行、财务的工友，应一律上工。”

再看看，“静候解决”结果又是什么？这次惨案不了了之，不但没有为民众雪耻，而且

租界仍在日本手中，大批在日本企业作工的工人惨遭迫害，无故解职。

和“一·三”事件一样，刘少奇又完全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叭儿狗，完完全全出卖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卖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刘少奇想到的不是中国工人同胞被杀害，工人阶级被压迫、被剥削，中国的国土被帝国主义蹂躏，而时时刻刻地惦记着日本人挨打，惦记着日本人的窗户，惦记着日本人的工厂没有开工。刘少奇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镇压工人运动，为帝国主义效劳。刘少奇是地地道道的民族投降主义，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刘少奇是怎样同他的狐群狗党，对抗毛主席指示，把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的影片。刘少奇所爱的国是帝国主义的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伟大祖国，他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要打倒的帝国主义。

刘少奇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日本鬼子的奴才，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是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大叛徒，是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的败类。

彻底的阶级投降主义

从一九二七年四月起，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反革命真面目彻头彻尾地暴露了。

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钻进革命队伍的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蒋介石，经过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和布置之后，终于公开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开始了血腥大屠杀。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至五日，蒋介石、汪精卫等狐群狗党，在上海密谋反共。四月十二日，这是我们要永远记住的日子，蒋介石在上海开始了对革命工人的血腥镇压。

就在“四·一二”前后，在蒋家党徒所在的地方，都充满了公开与秘密地屠杀革命人民的白色恐怖。

三月十一日，即唆使他的走狗惨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

三月十二日，蒋介石的走狗段锡朋遵蒋介石之命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中央党部。

五月十七日，武汉政府所属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由宜昌进攻武汉。

五月二十一日，武汉政府所属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师二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

六月五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反革命面目大暴露，公然武装押解共产党人出境。

在这样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向右转，他们故意闭门、歇业，制造混乱，向工人阶级发起了猖狂进攻。据记载，五月二十日，武汉市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

形势是很清楚的，国民党反动派要叛变革命，要对人民狠下毒手了。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少奇，面对着蒋介石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心安理得，屈膝投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充当了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的急先锋。

武汉市的工人阶级，最懂得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他们珍惜自己的纠察队，珍惜自己的武装。他们对阶级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不抱任何幻想。他们时刻保持着革命警惕性。人民有了武装，就能抵抗反革命的袭击，就能保存自己，发展自己，消灭敌人，就能镇压反革命，就能夺取政权，就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武汉工人纠察队，是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坚强的战斗队伍，又有一万多人手持棍棒的劳动童子团做外围。他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保护工人利益，镇压反革命，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收复英租界、击退夏斗寅的进攻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武装，就有了工人阶级的权利，失去了自己的武装，就要人头落地。“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是这样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武装的。

在武汉，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反动派，对于工人武装力量，对于工人阶级直接掌握枪杆子，看了就打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总想拔掉眼中钉。

五月二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压迫工人、保护资本家的训令，其中第四条即为：“工会、纠察队对厂主、店主有恐吓、罚款、擅自逮捕或其他压迫方式者，一律开禁。”

五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对湖北省总工会发出三项训令，第三条为：“除工人以外，工会不得有逮捕、罚款、及其他压迫之事情。”

这是汪精卫及其所代表的反动派企图绞杀工人武装的反革命讯号弹。

就是在这样严重的政治局势之下，刘少奇仍为汪精卫脸上贴金。在六月十日召集的手工业工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还说：“革命势力日益巩固，反动派虽日谋捣乱，而实无所施其技，至湖南、湖南、江西等地事变，政府均有相当对付。”以此来欺骗迷惑群众，从思想上解除工会武装。

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在郑州开完反共会议，唐生智带着军队回到武汉，准备向人民开刀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还在大会上说：“对凯旋将士表示欢迎。”并叫嚷“要求政府削平湖南事变。”可见刘少奇对国民党反动派孝忠到何种地步。让快要公开叛变革命的汪精卫去“削平”、“对付”反革命政变，真乃天下奇闻！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少奇终于对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了最后的、彻底的大拍卖。

一九二七年六月，那正是反动派猖狂的时候，正是蒋介石党徒在全国各地对工人进行大屠杀的时候，正是汪精卫“七·一五”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的前夕。刘少奇这个工人运动的蠹虫，为了迎合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的需要，开始了绞杀工人武装的罪恶阴谋。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刘少奇盗用全国总工会的名义，首先给童子团总部下了五条黑命令，其中前三条为：“（1）童子团所持木棒，目前需一律交存工会，不得取用，并将木棒数目详细报告总部登记。（2）童子团暂停止一切服务活动。（3）绝对不准无故穿着童子团服装。”这五条黑命令受到了一些童子团团员的坚决反对，刘少奇后又盗用总工会名义，发出通告，要各工会负责协同童子团总部执行五条黑命令。

刘少奇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收缴了童子团的武装，仍不死心，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湖北省总工会又发出布告，宣布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所有枪支弹药一律交存政府。布告上说：“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什么“为避免反动派造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叛变行为作辩护而已。什么“交存政府”？纯粹是把工人的武装拱手交给汪精卫反动派！什么“派兵保护”？明明是让汪精卫派兵封闭工会，镇压工人运动！

与此同时，由刘少奇主管的湖北省总工会还致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信中说：“除枪弹清册随枪送交外，相应先行函达贵处，烦为查照，于本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派员来敝会点收。”在这里，刘少奇把工人利益完完全全地出卖了。也完完全全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关于“武装夺取政权”、“暴力革命”的英明论述。他们把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弹药收在一起，十支一捆，集中在友谊街十六号，经汪精卫派人点收，后用卡车送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交给了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刘少奇对工人运动如此彻底的大拍卖，连卖国贼汪精卫也感到吃惊。在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会议第三十三次会议上，汪精卫说：“军事委员会得着了总工会自己缴械的消息，也很觉得奇怪。”出席会议的詹大悲说：“湖北省总工会因为这几天外面谣传很多，恐怕引起误会，乃于昨天自动将纠察队解散，总工会这种举动很好。”就在同一次会上詹还假惺惺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声言要对总工会“切实保护”。就是在这同一天，一连反革命武装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刘少奇被吓昏了，急急忙忙给汪精卫

打电话，还是乞求汪精卫“保护”。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心，七月二日，刘少奇还亲自跑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工人运动委员会上做了“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之意义和经过”的报告，刘少奇如此公开出卖工人阶级利益，为国内外一切大小机会主义者所望尘莫及。

在工人纠察队解散之后，汪精卫反革命武装到处捣毁工会会牌，到处行凶绑架工人，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刘少奇的交枪投降，受到了汪精卫反革命集团的欢迎和赞赏，这只哈叭狗受宠若惊，完全置工人利益于不顾，又伙同工会中的一小撮坏蛋，接连发出黑通电、黑宣言，名曰：“全省总工会告军士同志”，“全省总工会宣言”，“全省总工会通电”。通电和宣言，是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是刘少奇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叛变工人阶级的铁证。刘少奇等一小撮坏蛋在“全省总工会宣言”中大肆诬蔑，把工人阶级反对投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说成是“大惊小怪”，叫“大家要注意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此事的布告”，并要工人“服从全省总工会命令，拥护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通电中也向反动派献媚说：“特于勘日自动停止纠察队，请政府保护，以示拥戴之诚意。”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刘少奇解散工人纠察队，解除工人武装，不要武装夺取政权，不要阶级斗争而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是完完全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彻头彻尾地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

他这样做有着他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他尽力瓦解工人的武装队伍，让工人只满足于“日食两顿粗饭，身穿一件破衣”的地步；让工人放下枪杆子，做一个“严守纪律”的工会会员。这正是《修养》中所唱腔调的前奏。刘少奇完全为旧的统治阶级服务，维护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大资本家的利益。

刘少奇经过一番紧张的廉价的政治大拍卖，坏事做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溜出了武汉，潜往庐山歇暑，过着悠闲豪华的生活。

就是刘少奇溜出武汉一周之后，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开始了对共产党和革命工人的大屠杀。国民党反动派拿着刘少奇亲自交出的枪，对着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者开枪了。“宁肯错杀一千，不肯错放一人。”汪精卫和蒋介石在武汉、上海，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杀人大竞赛，在武昌阅马场，一次就用机枪杀害革命志士七、八十人，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江两岸。

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是谁？是蒋介石、汪精卫，是刘少奇！刘少奇对革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欠下了累累血债，这笔债，今天是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这是毛主席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马克思主义的精辟的总结，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少奇的无情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以上事实充分揭露了刘少奇反革命的真面目。但是多年来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当然的老“左派”，到处招摇撞骗。为了给他篡党篡政作舆论准备，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二日，正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阶级斗争异常尖锐之时，刘少奇带着臭妖婆王光美来到武汉。在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簇拥之下，窜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旧址——汉口友益街十六号和尚德里四号，刘少奇大言不惭地指着尚德里四号的一间房子说：“过去我在这里住过。”“对面那间房子是向忠发同志住的。”并在尚德里四号大门前，叫臭妖婆王光美为他照象，在友益街十六号，刘少奇又同样指着一间房子说：“一九二六年，我在湖北省总工会工作时，就在这间房子里办公。”住口！这房子不是什么办公室，而是你出卖工人阶级利益、出卖革命的政治交易所。

主命仆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遵照刘少奇的意旨，极尽吹牛拍马、颠倒是非之能事，拍电影、写小说、办展览。并匆忙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决定把尚德里四号、友益街十六号辟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省全省总工会纪念馆”，并广收资料，积极筹建，为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树碑立传而奔忙。

“江城四处怒火起，大江南北呼声急。”今天，全国人民正展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揭露、大批判。尽管刘少奇象赫鲁晓夫一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别人，把自己装扮成领导工人运动的“元老”。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无情的，历史不容篡改，历史不容歪曲，被刘少奇颠倒的历史，我们要再把它颠倒过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剥开刘少奇的画皮，翻开无情的历史史册，就不难发现，刘少奇绝不是他自我吹嘘的和某些人所吹捧的那样，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者”、“组织者”。他和陈独秀是一丘之貉，是老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最大的卖国贼，是工人阶级的大叛徒！

附 件

附件一：

全省总工会告军士同志——为工人纠察队停止武装事

同志们：对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自动停止了。停止的意义是为了顾全革命利益，消灭反动派的借口，而使官兵联合更加巩固起来！

我们官兵的联合是在革命战线上的需要；而且表现出来了。过去的关系，如你们打仗，我们担任运输；你们在前进冲锋，我们使后方巩固，在战地受伤的武装同志回来，我们努力拥护和慰劳，总之官兵同是受压迫，同是尽力革命的人；所以每次军事的胜利，我们表示了欢迎与热望！每个兵士同志的伤亡，我们尽了慰劳与悼思！我们常是这样想：“革命之目的在解放最大多数的民众。工农是最大多数的民众，工农群众中有许多分子投身军队中去，所以我们认定工农兵是亲爱的兄弟！”同志们，除了过去的因官兵联合而获得之革命胜利以外，我们更继续巩固这种联合，因为我们最大的敌人——帝国主义还没有打倒。

现在反动派还是暗中活动，到处造谣！如说“全省总工会已被军队打毁了”之类不一而足！他们的用意是污蔑革命军，是想挑拨兵士同工人的恶感，使国民政府的群众基础动摇起来，即好设法破坏革命运动。这种阴谋该多么险恶呵！同志们！为了镇压反动派巩固武汉的革命起见，我们加倍努力吧！

- (一) 拥护中央党部！
- (二) 拥护国民政府！
- (三) 兵官联合肃清一切反动派！

(四) 兵工联合保障革命的胜利万岁！

摘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汉口民国日报》

附件二：

为纠察队停止武装告工友——全省总工会宣言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自动的将纠察队的武装停止了，这是为了顾全革命利益，消灭反动派的造谣的目标，巩固兵工联合的表现，丝毫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大家要注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此事的布告，以及本会发出的通告、布告、工人日报等确实消息，勿道听途说，而致以讹传讹的上当不浅，工人们，你们会想到工会自卫问题，你们必定感觉到纠察队的武装停止后，反动派将任意破坏我们的工会了，其实我们从前有纠察队的时候，人数亦是很少的，真正反动势力一来，决不能专靠纠察队，必须全省五十余万工友一致起来奋斗，所以现在时候，每个有组织的工友，要关心工会的事，服从工会的命令和拥护工会，任何反动派对我们工会捣乱时，即群众起而攻之，那才是群众的精神，工人的团结力量，我们定知道，反动派造谣言，连狗屁也不值，工友们只要不以耳朵当眼睛就好办了，亲爱的工友们，服从全省总工会命令，拥护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总工友严查反动派造谣，将反动派拿交政府严办。

摘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汉口民国日报》

附件三：

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

为杜绝反动派造谣 所有枪弹交存政府 仍请派兵保护工会

湖北省全省总工会，因迩来反动派造出种种谣言，离间工农感情，为避免谣言起见，特于昨日自动将纠察队解散，所有枪弹，一律交存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兹将该会布告及公函，探布于后。

布告 为布告事：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混淆外界闻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购回枪弹，并经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深恐外间不明真相，致滋疑窦

为此布告仰各界人等，一体知照。

此布

致军事委员会函

敬启者：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离间工兵之感情，于是制造种种谣言，对敝会纠察队肆口中伤，飞短流长，实足淆乱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敝会为避免造谣者借口起见，决定本月二十八日起，自动实行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此领回枪弹，已交存管理汉口卫戍事宜办公处，免滋外人疑窦，但是反动派破坏工会，几贫唯力是亲，务必准予派兵保护，并面通令武汉各军事长官知照。无任盼睐，并俟见复，而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致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敬启者：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离间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敝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闻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敝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领枪弹，几知刻交存贵处，除枪弹清册随枪送交外，相应先行函达贵处，烦为查照，于本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派员来敝会点收。无任企祷，立盼示复。此致管理武汉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

附件四：

全省总工会通电——为纠察队解除武装事此后望政府切实指导工农运动

湖北省全省总工会为该会纠察队自动解除武装事，发出通电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集团军总司令，各军长，各军政治部各军党部，省市党部，省市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转全国各省总工会，中华全国农民协会转各省农民协会，各报馆各界同胞均鉴：近日反动派鉴于兵工联合，二次北伐胜利，革命势力扩张，极力挑拨离间，欲使革命之中心力量革命军与工人阶级，发生恶感，彼辈则坐收渔利，苟延残喘，如反动派倡言敝会纠察队武装，将不利于革命军，此种阴谋异常毒辣，敝会为巩固革命战线，绝灭反动派之所借口起见，特于勘日自动停止纠察武装，请政府保护，以示拥戴之诚意，此后望我中央政府切实指导工农运动，俾群众有政策遵行，革命有基础巩固，尤望严查一切反动派加以惩办，毫不放松，当兹

主革命力与封建势力争斗时，方能获得最后胜利也，谨此电闻，诸希朗鉴

摘自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

一段被隐瞒的丑史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调查

刘少奇这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为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投机革命，在敌人面前屡屡屈膝投降，汪精卫在武汉留了他一条狗命；一九二五年在军阀赵恒惕逮住了刘少奇，不久他又从狗洞里爬了出来。

一九二五年底刘少奇从上海回湖南“休养”，被大军阀赵恒惕逮住，下了狱。这个贪生怕死之徒，为了保住自己的一条狗命，找到他的同乡洪赓扬等来保驾。洪赓扬当时是湖南洪江陆军稽查处处长，是刘少奇的盟兄弟。一九二一年刘少奇就曾赠寄照片与洪留念，并在照片背面题了那首“身长七尺好奇男”的臭诗，以表情意。

既有如此之“交情”，洪便找到伪国民党师长贺××、叶××，将刘“保释”出来。刘这次被关押五十余天，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放出。刘少奇释放时，大军阀赵恒惕破例对“犯人”以礼相待，并赠予刘少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一套，难怪刘少奇在黑《修养》中孔云子曰地贩卖孔孟之道了。

刘少奇与反动军阀、政客之间有这样微妙的关系，是人是鬼不是很值得深思吗？刘少奇四十多年来隐瞒了这段历史，从未向党中央、毛主席交待。不管刘少奇如何伪装，终究逃不出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老牌叛徒揪出来示众。

根据毛泽东二十日指示，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实行了军事管制。

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指出：对待干部，“不需要人人过关。人人过关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是刘邓路线。这个思想来源于陶铸。”“怀疑一切是错误的，《红旗》四、五期社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四期社论是批形‘左’实右。只隔了十天，五期社论又出来了，批判了右的思想。”“带引号的‘左’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右就是什么人都结合，实际是复辟刘邓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展开。”“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传信录 617》）

萧华在总政对直属单位讲话：要求加强路线斗争教育。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去东北夺权，揪出了后台，是北京军区。”（《传信录 619》）

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解放一批地方干部，组成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进行工作。陈再道下令逮捕造反派三千余人。

3月 22 日

毛泽东接见了出席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的全体代表。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见邮电、交通、铁道等部代表，宣布对三部实行军管，并迅速把业务系统恢复起来。（《传信录 620》）

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萧华等第二次接见青海造反派，了解情况。（《传信录 621》）

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到会讲话，号召工人阶级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总政在人大会堂召开关于三支两军工作的会议。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积极支持厂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

下午，在教育部召开了“彻底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筹备委员会会议”。

3月 23 日

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萧华等第三次接见青海造反派。（《传信录 627》）

周恩来、李富春、余秋里等在凌晨接见石油部、大庆油田、大庆驻军及哈军工代表，周讲话：对余秋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打倒，一种是保。这两种意见我都不同意。要批就打倒，不批就保，不要这样绝对化。我是同意批判余秋里、康世恩的，批判到一定程度再定性。要进行调查研究，要进行阶级分析，要按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正确对待干部。又说：一概结合、一概肯定、一律扶植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思想。（《传信录 622》）

下午，计委、工交系统及首都其他单位的三十四个组织一万五千余人，在北京师范大学“七·二七”广场举行“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国家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石油部“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师大“井冈山公社”、学部“红卫兵联队”、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井冈山纵队”等代表先后发言，声讨和批判余秋里的“罪行”。并宣布成立“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联络委员会”。

《进军报》（第 12 期，1967 年 3 月 26 日出版）报导：

运动一开始，余秋里就屡次指示整理群众的黑材料，但是直到去年年底，他还矢口否认，私下却不顾党纪国法，大肆转移、销毁。被转移的黑材料，有计委、经委、水电部、劳动部等单位的。被销毁的黑材料，有余秋里等人的笔记本；有党组成员、局长和文革小组长等的笔记本；有计委、工交口文革的运动动态、各种简报、左中右排队材料；有从大字报或个人日记中摘录整理群众的黑材料及没有贴出的整群众的大字报底稿等等。甚至应当永久保存的党组记录，也被他们烧掉了。

余秋里曾反复研究销毁黑材料问题。他说“科委韩光之所以吃亏，是因为××丢了笔记本，被张本拿到了；李雪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所以暴露，是因为他的两个秘书揭了他。”他“通知党组成员，凡是记录党组会议的东西，都要烧掉。”

余秋里等人在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以后，特别是在中央“补充规定”下达以后，还变本加厉地毁灭罪证，这是党纪国法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代表中央宣布：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搞军事政变，镇压群众，进行隔离审查。

外国人大卫·库普写大字报，批评造反派在掌权后的一些错误。戚本禹给人

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送去外国人的一张大字报，供三红和新人大的战士们参考。祝你们整风成功，在斗争中学会掌握毛泽东思想。”

旧北京市委政治部主任冀民在市内散发传单，攻击“工代会是大杂烩组织。”谢富治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冀民被卫戍区扣留。

3月 24 日

萧华代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工作。

周恩来、李先念、汪东兴接见卫生部造反派代表和领导干部。周重申不能借揭发保健工作丑化党。卫生部被毛指责为城市老爷卫生部，1966年8月，由于原部长钱信忠等被揪靠边，经陶铸提名，中央批准，派47军政委孙正至卫生部领导，兼任卫生部党委书记。陶铸倒台后，卫生部旋亦被夺权。群众组织中对批钱、批孙各有分歧，形成对立两派。周要求各派开门整风，对干部排队，抓革命促业务。（《传信录 625》）

谢富治在公安部讲话：夺权与反扑（即反夺权）非常激烈。中央正一个省一个省安排。第一是上海，然后是黑龙江、贵州、山西等。有的省三结合不成熟便军事管制，象广东、河北。军管有三种，保守派夺权的要寻找左派，左派夺权的要帮助他们完成三结合，两派斗争厉害的要军管。（《传信录 626》）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今晚在人大会堂安徽厅第四次接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及原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和外地赴青红卫兵。（《传信录 629》）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指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

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 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 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 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此件除青海外，只在军事系统内传达。青海可在有关部门内部张贴，不许登报和广播。)

[按] 青海的《青海日报》在 1966 年 6 月 3 日发表了“富有革命造反精神”的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王昭认为它是错误的，是大毒草，自 6.14 起，连续 8 天，在《青海日报》上进行批判、消毒。一批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甚至被迫自杀。虽经中央文革多次指令，省委仍拒不彻底平反。当地群众就此事件分成两大派：“8·18”与“青海红卫兵总部”、“捍卫团”等，前者为造反派；后二者为保守组织，两大派长期对立，连续发生 6.10 事件、胡天申事件、10.1 李家庄孤儿事件、12.9 民和事件、12.15 事件。武斗严重，而且愈演愈烈。据当时造反派的一篇报导，说：1 月 3 日：王昭又唆使青海红卫兵总部恣意寻衅，挑起争端，无理扣压、残酷殴打前去“总部”商量有关处理黑材料问题的青海省“8·18”红卫兵十余人。他们严刑毒打吉林工学院赴青海串连的董兰平同志，使之造成严重的脑震荡，现在病危。他们把革命的工人从二楼窗口向外扔。为了镇压坚持斗争的革命造反派，王昭亲自调动青海东卫队、捍卫队等保皇组织，同时调集了一万多不明真相的、被迫停产的工人、农民(有些人手持木棒)大力围攻革命派，殴打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捣毁“8·18 红卫兵司令部”等革命组织。许多人受伤，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为了扑灭群众的斗争烈火，王昭批给保皇总部及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大量的汽车、汽油、面粉和摩托等。目前，白色恐怖正笼罩着西宁。但是青海的革命造反者们，无所畏惧，不屈不挠，正在坚持斗争。(1967.1.10《首都红卫兵报》)3 月，造反派群众占据

青海日报社，青海驻军支左小组在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命令下，调动军队，包围报社，在武斗中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余众被驱出报社，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赵永夫事件”。(参见2月23日记事)事件发生后，赵永夫向中央军委汇报，叶剑英指示：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后中央文革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青海问题重新审查，遂有此结论。

国务院系统所属财贸口的红卫兵组织作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逆流”的决定。

教育部造反派揪斗蒋南翔。

北京师范大学苏海东等贴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钢院张建旗提出炮打周恩来。均立即受到反击。

第七十五卷 1967年3月25日至29日

(首都中学红代会成立)

3月25日

在周恩来主持，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参加的解决青海问题会议上，林彪讲话，指责赵永夫在青海是搞法西斯大屠杀。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青海问题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们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青海问题是个大案件，是法西斯的大镇压，元月二十三日青海军区接到中央的指示（五条），刘贤权同志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向群众表明态度，支持八·一八，本来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个同时，赵永夫煽动机关造刘贤权的反，同时又勾结反党分子王昭，操纵支持保守组织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来斗刘贤权同志，赵永夫这个坏蛋并停止刘贤权、张江霖同志的工作，然后就篡了军权。后来又勾结总后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非法组织了联合指挥部，反抗兰州军区，操纵了驻军镇压八·一八。对内代替了青海军区党委，对外代替了青海省委，独揽了青海省党政军大权，并不经军区讨论和上级批准，张晓川非法调动了二百多辆汽车游行。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有三条指示，叫把部队撤出来，赵永夫又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到兰州搞“绝食斗争”。赵为了镇压八·一八，对八·一八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想尽一切办法找根据，谎报军情说：“群众有枪”，“群众先开枪的”。实际上部队先开枪的。二十三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并开枪，抓了一万多人，打死打伤几百人，（有的群众面向东方，手挽手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残忍的反革命行动。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总理插话：根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打电话“打得好”都是捏造。（呼口号：打倒赵永夫反革命分子。）

三月十一日青海问题，主席批了。经过调查已经查清楚了，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青海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刘贤权同志的领导，赵永夫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南京交警教导纵队受了几年反革命训练，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刘贤权同志是个好同志，老红军，是支持八·一八的。去年反对王昭也是正确的。（叫刘贤权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叫张江霖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张江霖同志是支持刘贤权同志的，也是好同志。刘贤权同志也有个缺点呀！警惕性不高，你和老虎睡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发现。驻军其他同志也是警惕性不高，跟着跑，政治上麻痹（犯了错误）也应吸取教训，驻军调动十三个连，包围青海日报社，对八·一八进行残酷的镇压，法西斯暴行，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是个典型，就是对于那些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的组织也不能开枪呀！除非是武装暴乱，只要是徒手群众就不要开枪。这一点你们回到部队要好好贯彻，开枪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抓住这条死守线。（××开枪就变成大血案，大刽子手）西藏不也是为报社问题，九千人包围了六天，经过耐心的政策宣传教育，没有开枪，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也解决了问题，这样的例子其它地方也有。为什么要采取镇压的行为呢？开枪只能说明：只有那些仇恨人民的人，才能干得出来，不然是不可理解的，是想不到的事。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百分之一百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很重视，觉得问题很大，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使反动的，

也不能这样做，即使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么！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这件事是和王昭有关系的，王昭和罗瑞卿的关系很密切，和彭真、刘澜涛是有关系的，是个坏蛋。青海公安总队改编独立师时，王昭就把独立师交给了赵永夫掌握，不交给刘贤权同志，所以独立师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记不清）王昭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急先锋，是操纵保守组织与八·一八死做对，赵永夫在镇压八·一八以后就急于把王昭做为反革命的“三结合”对象。这个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作出七条规定（中央决定已公布张贴）中央这个决定很好，把青海问题作了正确的解决。从这件事中，我们要吸取教训。军队也是不纯的，有坏分子的，象赵永夫这样的人还存在，我们的部队大多数是好的，但确有坏人，不但青海有，总政总参总后，各军也有，他们要造反，要夺我们的权。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些坏蛋都跳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好得很，坏家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向革命分子进攻；如果不搞一下，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一轰而起，我们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可以信赖的，大部分是好的，有些是认识问题，但是确有一小撮坏家伙。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如三个总部，空军、海军确有坏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空军是会被坏人夺了权。他们不是把地位、人选都安排好了吗？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向我们猛烈进攻。总后也是这样，黄克诚、洪学智和他们的爪牙，就抓了邱会作同志的小辫子，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好同志。总政也有，总参也有，都是坏分子。从量上来看不多，但分量很重。比如，总政就有日本特务、国民党分子，总参有夺权吗？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差不多我们这些组织中间，也是要一分为二。但是青海的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是国民党分子、法西斯分子、蒋介石分子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动派，他们乘机要夺我们的权。我们军队对刘邓反动路线的认识比地方差，比红卫兵差，与刘志坚的不介入是有关系的，现在要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对群众组织要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对那些冲击军区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是坏组织，比如左派冲击军区，也搞认罪、请罪那就不好了。主席在八条规定中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好好学，领会主席思想，我们要把文化革命搞好，就要依靠群众组织的大多数。靠解放军，靠大多数的革命干部。昨天主席又再次提出强调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的解放军，一定要依靠群众，解放军和群众象鱼和水的关系，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永远是这样，离开了群众我们无法生活，有群众和没有群众，情况就大大不同，不是小小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好好地进行群众工作，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支持左派。只有和群众站在一起，即使万一支持错了，马上就改正，昨天晚上主席还讲：军队要支援农业，支援工业，要支援革命左派，训练革命师生，任务很重，很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也不要把矛盾上交，要好好干，只要我们好好按主席思想和主席指示办事，紧密和群众站在一起，肯定主流是主要的，就是有了问题，及时请示军委，这样可能三分之二对，错也是三分之一。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红卫兵比我们清楚。今天主席打了电话，请示了一下，想把红卫兵出的报和传单，比如刘少奇一百例罪状，收集一下，印发下去，有了铁证如山，也能使人恨起来，不然光靠一般讲是不行的，没有群众观点，和人民没有感情，就会把群众当成坏人，就会随便开枪，就是和人民没有感情，总政要收集，快印发，要采取措施。（肖华同志说：我们印了第一册），一册还不行，还要继续印，思想上的转变，还是事实在前，没有事实，人家印象不深。还有总理、康生、伯达、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讲话，也要印发下去，这场文化革命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不是宗派斗争。空军的成均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海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血淋淋的典型。你不打倒赵永夫，他就要打倒你刘贤权，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讲话，号召中学生回到本校去，复课闹革命。大会发表了宣言。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

东风浩荡，红旗飘扬，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万道霞光，满怀革命的壮志豪情，从伟大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光荣诞生了！

这是首都中等学校数十万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中学红代会的召开，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亲切关怀的结果。她标志着首都中等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了新的战斗里程。

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发源于毛泽东思想的故乡，她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

伟大的红卫兵运动走过了光辉的战斗历程。当她刚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蕴藏着强大生命力的幼苗，坚决地斩断了企图把红卫兵扼杀在摇篮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手，是毛主席高度赞扬和坚决支持了红卫兵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是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一次又一次亲切地接见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号召红卫兵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关怀，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强大声音，象春雷动地，在短短的时间内，红卫兵的星星之火如烈焰滚滚，燃遍全中国，辉映全世界。

红卫兵从她诞生那天起，就誓作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小兵，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红卫兵从她诞生那天起，就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登上政治斗争舞台，在自己的鲜红大旗上，金光闪闪地写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红卫兵一登上政治斗争舞台，就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兵的全力支持下，以无比的英雄气概，“杀”出校门，冲向社会，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把旧世界打了个落花流水。红卫兵驱散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粉碎了反革命的围剿，击败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

红卫兵在光焰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阶级斗争中，迎险风，战恶浪，成为毛泽东时代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闯将。红卫兵不愧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一支最可贵的政治突击力量；红卫兵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红卫兵沿着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历尽无数惊涛骇浪，冲破重重急流险滩，驶入了新的战斗航程，今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联合起来了！

我们成立了自己新型的革命组织机构——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这是我们中等学校红卫兵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代表大会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处理日常事务工作。

我们的最高司令是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强大的后备军。

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命干部和其它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对毛主席有深厚阶级感情，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一貫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钢铁般的战斗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摆在我面前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十六条，充分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经过几个月来的艰苦奋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并且还在节节胜利，广大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陷于四面楚歌、全面惨败的境地。我们面临的，是一片光明，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我们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毒还没有彻底肃清，它的社会基础远没有被摧毁，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没有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在负隅顽抗，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遥相呼应，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联合起来，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痛击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现在，毛主席已经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期待着我们把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多少年来，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在学校中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中学是他们用以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重要阵地。“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领袖的教导，就是对我们的最高指示。我们要立即回到学校去，夺回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盘踞的阵地，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打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枷锁，冲破旧教育制度的罗网，开创无产阶级教育的新天地，把我们的学校办成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坚强堡垒，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牢插在中等学校的阵地上！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权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一个“权”字，集中地表现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我们红卫兵战士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所畏惧地去造资产阶级的反，翻剥削阶级的天，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为无产阶级夺权，为无产阶级掌权，把党、政、财、文大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

要夺权，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否则夺权就是一句空话。“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当前，“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它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有利于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利于彻底完成学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我们红卫兵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实现这种联合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左派的力量，发展革命派的队伍，为革命派大联合作出贡献。

要夺权，就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这是取得夺权

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学的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是由革命教师和学生、革命的领导干部以及解放军代表组成，它必须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妄图混水摸鱼，实行反革命复辟，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一切红卫兵，一切革命派，必须及时揭露，坚决反对。

“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毛主席所亲自制定的党的阶级路线，就是要分清敌我友，坚决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是否愿意并且真正逐步实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这是检验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试金石。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必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的传统方针，满腔热情地启发他们的觉悟，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也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给他们改过的机会，让他们将功赎罪。对于反动的“血统论”以及排斥一切、反对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关门主义的倾向，都必须彻底清算，坚决打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破“私”立“公”的思想大革命。目前，这个革命正在更广泛、更深入地触及人们的灵魂。夺“私”字的权，革“私”字的命，成了运动深入发展的关键。林彪副统帅指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每一个红卫兵战士都必须在灵魂深处开辟灭资兴无的战场，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实现思想革命化。当前特别要大学“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整顿党的作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狠抓世界观的改造，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宽广大道，在大风大浪中树立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红卫兵战士必须在整风中克服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用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可靠的接班人，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军队。我们要象人民解放军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把我们的红卫兵组织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是红卫兵的命根子，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我们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把革命进行到底！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决战，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最好课堂。让我们积极响应林彪副统帅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高潮。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听一辈子毛主席的话，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红卫兵战士们，同志们！我们的伟大领袖在召唤，我们的革命父兄在期望，让我们信心百倍地迎接更大的战斗吧！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将亲手埋葬帝国主义，我们将宣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在我们这一代实行“和平演变”的幻想彻底破产。我们决心同全国人民一道，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同全世界革命人民

一道，创立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红卫兵战士们，同志们，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是世界的希望。红旗我们高高举，越举越鲜明，战歌我们唱下去，越唱越响亮。让我们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乘胜前进，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全球！

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军以上干部会议闭幕。

军委扩大会议精神

(传达记录整理 注意保密 不得外传)

军以上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开了近一个月。会议期间，毛主席、林彪同志几次接见全体代表，会议由周、叶主持。周总理给会议作了两次重要指示，陈伯达也给会议作过指示。三月十二日，毛主席接见了全体同志。

(一) ^①提高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 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及迫切性

开始同志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后来解放军按主席指示，介入地方文化革命，好了一些，就有了五、十条，可是文化大革命完了，可能有些人还不理解。这次运动是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的大革命，是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记得不全)资产阶级向我党进攻十七年了，文化革命是我党向资产阶级大反击、大决战的斗争，是挖修正主义总根，保证我党不被修正主义腐蚀，保证我党千年万年不变色，胜利前进。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矛盾及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性，十七年来，有些地方，如北京市委、中宣部等被篡夺，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二十多年，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行啊，所以毛主席对阿友(对尔巴尼亚)说：文化革命有两个可能，即(1)是资产阶级打倒我们，(2)是我们把资产阶级打倒。毛主席说把资产阶级打倒我们放到了第一位，如果不是放在第一位，就是没有敌情观念，如果不是这样认识，就是没有敌情。因为，1. 地富反坏右在全国就有三千五百万人。2. 八个民主党派有十多万人。3. 旧中国留下的五百万旧知识分子，这些人一直统治着我们的文化部门，解放后接受了大批的旧职员、旧军人。所以复辟的危险性从目前来看，主要来自党内、国内以及上层和各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我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信，十七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们企图用武力来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用和平演变来搞我们，打进来拉出去，搞复辟，这个危险主要来自党内上层党的领导机关……。当然我们应看到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好的。但是不能光看到我们光明的一面，还看到有阴暗面，阴暗面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老革命干部(指长征)是搞民主革命的，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推翻三座大山他们是赞成的，但取消剥削他们就不干了，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多少下去了，还有些在和平环境中演变过去了，所以他们搞社会主义就不行了。

^① 编号不全，传单原件如此。

(2) 解放后入党的占百分之八十，这些党员有的掌了权，如书记，区、县长以上的等。这些人没有经过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锻炼，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

(3) 解放后有些旧职员，表面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国民党员，如刘澜涛、胡锡奎。

(4) 解放后，地、富、反、坏的子女，过去陆定一统治时，有些人上了大学，由国家统一分配，有些人是好的（指经过改造），但也有是化妆了的。他们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的仇恨。如刘澜涛这个叛徒案六十二个人除一个人是科长，死了二十二人，其余都是省委、市委以上干部。

我们党内也有里通外国的，自解放后不断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都是这些原因，资产阶级从五一年以后就向我党开始猖狂全面地进攻，我们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只是解决个别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毛主席总结了十七年来的政治斗争的经验，找到了文化革命的方法，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党的阴暗面，这是大教育，大批判，大审查，全国全党性的全面发动群众，叫群众搞，这次只要是三反分子统统打倒，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不搞不行，（有一句看不清），搞晚了也不行，如再迟几年，那就不是我们揭他们了。再迟了连挂牌子的地方也没有了，不搞不行呀，在苏联就不行呀，你搞他镇压你，现在是一次不流血的内战，迟了就成了流血的大内战。

2. 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一条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十几年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系列的事实证明，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言人，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大地主出身，一九二五年是被国民党抓去的，怎样出来的不清楚。可能是叛徒，这个问题刘少奇至今未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交待。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刘少奇宣扬我军向蒋介石投降（当时刘澜涛是赞成的）。在解放后，他说巩固民主革命，搞四大自由，五七年反对统购统销，“托拉斯”是刘少奇提出的。

50年到东北，当时东北正搞变工队，他不让搞，他说每户有了马、驴才能搞，他形左实右，主张把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与毛主席提出的政策相对抗。刚解放，他就带着老婆到天津，反对搞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太早了，现阶段搞社会主义是错误的。52年太原提出办合作化，刘少奇批了一句话：“这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这是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相对抗，反对搞社会主义。59年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不积极。60年对形势悲观失望。62年带头刮单干风，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与苏修遥相呼应。叛徒分布很广，各个角落。晋察冀是陆定一的一摊，文化部门是修正主义刘少奇的吹鼓手。刘少奇的外衣是“论修养”。刘少奇反对毛主席二十多年来是一贯的，毛主席说：“经过长期考察教育，我对这个人完全绝望。”“八大”是56年召开的，“九大”至今未开的原因也在于此。

邓小平，内战时期任七军政委，在福建有一次很紧张，假借汇报，跑了，临阵逃脱。解放后有人揭他（莫文骅中将）被打成反革命，现平反了。抗战时，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毛主席不同意，实际上已经暴露了，以后伪军百分之九十五，日军的百分之六十，指向了我们，秋天，引来了冬季大扫荡。五九年斗彭黄时，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小组负责处理罗瑞卿时，邓小平不参加会议，还要罗喊冤，罗顽固跳楼未死，还叫坚强，后来跑到陕西来了，到最后给罗下结论时，不都叫回来了。邓反对毛主席，自担任总书记以来，从来不给毛主席汇报，开会时，离主席远远的，主席讲话时也不记笔记。说林彪在部队搞学毛著是搞政治资本，形式化，他主张以实带虚，邓下面是贺龙、罗瑞卿。工作也不主动，吊儿郎当，整天打扑克，打麻将，专门派飞机接吴晗和他一起打桥牌，邓曾给毛选编辑部负责人说，毛选上多注解二野（突出刘、邓），少注解四野（贬低毛主席），并对林彪说，“你有平型关战役，我

有淮海战役”，实际上他在淮海战役中并没有出啥力，在和林彪争功劳。

搞文化革命就是避免拿枪的内战。

毛主席提出三结合，但资产阶级搞的是两结合，其中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

3. 主流与支流

最近（文化革命以来）中央发出了三十五个公开文件，都是解决支流问题。有些同志把支流看得多了，有些同志思想方法不对头，不看本质看支流。不要怕乱，主席讲，乱而治之，乱只能乱敌人，乱就能挖出来，没有这样的运动，他们就会把我们搞垮，把主席推翻。当然，就是敌人夺了权也不要紧，我们重新革命么！有的同志说影响生产。李富春同志讲，六六年是工业生产全面上升的一年，农业上升百分之七，工业上升百分之二十二，钢、煤、石油三月份又上升了。六七年工农业生产一定会全面地高速度的发展。死了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赶不上过去一个战役、战斗，淮海伤五万人；也赶不上一次流行病。革命不付代价是不行的，群众起来了嘛，挂了就挂了（指挂牌子）。我们有些人演变，变了轰一轰，冲一冲，受受教育。这次大革命要把坏人打倒，把不坏不好的都教育过来。

阶级斗争不能调和的，要看主流，大方向，抓不住本质就要犯错误。

4. 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早有全面安排的，不理解也要执行，决不能不合自己的口味就不干了。

文化革命两个阶段，即：两个力量。

（1）从去年五月十六日至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是第一阶段，毛主席用了一张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联就把全国亿万群众发动起来了，以红卫兵为急先锋，工农兵为主力，群众性的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冲他个不亦乐乎，来势非常之猛……

（2）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时出现了新情况：一、资产阶级反夺权，假夺权；二、左派分歧，互相争夺，牛鬼蛇神也起来夺权，形成了反复夺权，这在一、二月份是全国性的，是必然的，其原因是，革命造反派（小将）有天生的弱点，即政治上不成熟，虽然冲劲大，但是缺乏组织性。这时毛主席使用了解放军这支大军，介入地方文化革命，在这个阶段中以解放军为主力，推动各方面工作，凡没有人管的，解放军都管。

三个过渡：

- （1）把权过渡到解放军手里；
- （2）从解放军手里把权过渡到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手里；
- （3）从三结合那里过渡到象巴黎公社那样通过全面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

这样算一个大战役。

5. 解放军的任务：三支两军。

三支即：支工业，支农业，支持左派，主要是支左。

两军即：军管、军训。

衡量左派的标准：

（1）看大方向是否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和毛主席的态度。对上述三点看，是认识问题还是一贯的。

（2）组织纯否，首先是领导成员，如果地、富、反、坏就不行。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后台。

（3）群众对这个组织的看法。

（4）衡量一个组织要用政治原则去衡量，不能带宗派情绪。

关于西安情况：

三月十八日以后，出现了十八个群众组织，是四按（按部门结合）的必然反映。但也

有些是山头主义的反映，对没有群众基础的，没有经过整风成立的，不承认，被推翻的保皇组织及改头换面的反动组织一律取缔……对民族性的组织也要一律取缔。

叶剑英、聂荣臻、萧华、杨成武、彭绍辉等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国防科委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传达林彪指示：对二至七机部实行军事管制，各个院校及科学院新技术局由国防科委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对几个研究院及科学院部分单位，由科委接管，进行调整改组。（《传信录 633》）

戚本禹第五次接见青海造反派代表。（《传信录 630》）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造反派，指出胡耀邦阴谋翻案。他写的大字报《我的申述之一》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表现。（《传信录 634》）

北京师范大学各战斗队纷纷反击苏东海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贴出“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攻击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等大标语。

张春桥在上海与华东局造反派座谈，张说：总理要我管江苏、浙江。对刘少奇，毛主席说：我看以后我还要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些省委书记，如叶飞、江华、谭启龙都到北京去了，都是毛主席邀请他们去的。最近你们看到没有？本来提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现在只提二反了。本来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后一条不提了。陈伯达同志说：反动路线问题按内部矛盾处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给予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3月 26 日

周恩来接见新疆代表团。造反派反映，军管以后，把造反派的权拿下，交给了保守派。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我们反对保守派就是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新疆军区已勒令北京去的学生在 3 月 10 日离开，有隐瞒、窝藏的要受纪律处分。周一再肯定学生和造反派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解放军调查不够，支持的不对，应提醒其注意，造反派要主动与之搞好关系，否则不利于三结合。王恩茂问题，先不定性，回去作检查。（《传信录 635》）

陈伯达、戚本禹到计委看大字报，询及 3 月 24 日召开的“彻底粉碎刘邓陶薄资本主义复辟大会”，有人反映会上有人喊“誓死保卫余秋里”。陈伯达说：“我是计委副主任，我没有来，是官僚主义，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可以打倒我嘛。”戚本禹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怎么还敢打倒你。”（《传信录 636》）

陈伯达、戚本禹到清华大学，就教改问题与部分师生座谈。

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对炮打周恩来一事拒不认错，声言“三个月后再见”。并于 31 日发表公开声明，坚持反周立场。

在上海整风动员会上，姚文元作了长篇的整风报告，张春桥作动员报告。（《传信录 637、638》）

3月 27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指示立即成立以钱钧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安徽省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

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执行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批转的《重要通告》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于左派组织，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要争取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来。对于真正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依法处理。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

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个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做法。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一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一·二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报纸如不能正常出版，可暂出新华社电讯稿。省广播电台也按同样的原则办理。

六、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双方都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要正常的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一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一组织。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八、压制“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应支持省市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较早站出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干部。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可在派往公安厅的军代表领导下，由各革命组织（包括公安厅真正的革命干部）组成调查小组，进行专门调查，参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教学改革问题。陈说：“下半年就

要上学了，教育制度要搞个大革命。”“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清朝末年演变来的，后来又接受苏修一套东西。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大破大立”。“要从根本上推翻现行的教学制度。”他还说：“中国人还要学什么中国语言”！（《传信录 639》）

谢富治在北京市委、市人委工作人员会上讲话：打倒一切、反对一切，这是刘少奇搞的。文化革命初期，干部都靠边站，就是他干的嘛！（《传信录 640》）

王力、关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王力说，最近要批判《清宫秘史》。新闻界要批判吴冷西、胡乔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将在四月二日开会（后延期）。北京市的特点：由主席指示先开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这样大联合就有了基础，思想容易一致。（《传信录 641》）

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在中山公园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吴德在会上指出因新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决定将市委、市人委全部工作人员集中到市委党校，彻底肃清刘邓及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作协斗争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刘被指责为以亮相为名，行反攻倒算之实。中央决定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

3月 28 日

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对大字报攻击他吹捧电影《清宫秘史》等言论，进行辩解，毛不置答。

周恩来、李富春在接见国务院工业系统 21 个单位的代表时，周讲话说：“这次夺权是四九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估计，原说在二、三、四月看出个眉目，现在还得加上个五月才能看出个眉目。明年二、三、四月或更长一些时间要看出个结果。”（《传信录 643》）

周恩来、康生等接见安徽代表。康生宣布了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办法。（《传信录 644》）

王力、穆欣与唐平铸在人民日报社谈话：新闻工作要转入批判。批判分三类。有不点名批判，如刘、邓、陶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点姓与职务不点名，有明点姓名的。（《传信录 645》）

王力、关锋把题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材料送呈毛泽东。它是关于 1966 年 6、7 月间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情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 3 月 29 日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及其他同志看一看。”该报告在 3 月 30 日出版的《红旗》上发表。

[按] 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指为刘邓路线的组成部分是很不诚实的政治栽赃，反映了毛在担心打击面太宽后争取干部多数的诡谋。

3月

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内部政治，由此引起西哈努克的不满。

第七十六卷 1967年3月30日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发表)

3月30日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〇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路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另一次重大的斗争，即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并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毛主席就两个青年写的

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之后，以陆定一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判。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欠账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这样一部极其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誉之为“爱国主义”的影片，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

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

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歌颂为“爱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完全是一副极端可耻的恐帝、崇帝、亲帝的奴才面孔。

影片对所谓英、美、德、俄、日、法、意、奥“八国联军”的帝国主义侵略害怕得要死，在影片中大肆宣扬恐帝思想。叫嚷什么“中国从甲午之战以后，财力亏损，兵力单薄，……众寡不敌，强弱悬殊”，“外畔必不可开”。大臣许景澄被帝国主义吓得放声大哭。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但是在电影的作者及其歌颂者们看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除了举手投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赤裸裸的民族投降主义，十足的亡国奴论调！

与此同时，影片又大肆宣扬崇帝、亲帝思想，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公开贩卖卖国主义理论。作者公然通过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之口，欢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什么“各国一定会原谅皇上”，“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如果对照一下当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扬的论调同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简直是同出一辙。例如沙皇俄国就欺骗国内人民说：它“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秩序。”列宁早在一九〇〇年写的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的战争》中，就无情地驳斥了侵略者的这种反革命论调。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种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①同样，对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的所谓“爱国主义”（即彻底的卖国主义），也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

影片宣扬的欢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卖国主义理论，同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操着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同一个腔调，在《白皮书》里大谈美国如何“关心”中国，把侵略说成“友谊”。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对这种反革命的强盗逻辑，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毛主席指出：将侵略说成“友谊”，是“美国老爷的逻辑”。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谅解”和“帮助”，他们对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路的当权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害怕得要命。他们幻想同帝国主义的伟大号召，极端不满，他们大肆吹捧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十分明显，在全国解放前夕，反动的电影公司和反动文人所以要制作这种宣扬帝国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8页。

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影片，就是要通过电影制造反动舆论，公开鼓吹依靠美帝国主义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口头挂着“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样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吗？他们爱的是什么国？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祖国。他们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国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卖国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这决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他却大肆散布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国主义以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毛主席说：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他却要人民交出自己手里的武装。他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理论，认贼作父，心甘情愿地要去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买办就是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什么“红色买办”！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早就想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卑鄙无耻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成了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影片。因为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所宣扬的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理论，恰恰反映了他们热衷于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卖国心理！

“心有灵犀一点通”。影片里光绪皇帝望湖兴叹的一句诗，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光绪、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写照。在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了共鸣，这就是他们要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①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无论是城市或者乡村，到处都有义和团在进行革命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各种标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决心：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

^① 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〇〇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枪、洋炮武装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著名的“廊坊狙击战”中，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联军，被义和团“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死伤将近一半，最后狼狈地逃回天津。后来西摩尔胆战心惊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同侵略军进行肉搏战，在火车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国侵略军，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在杨村的战斗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被义和团战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侵略军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血凝而不流。”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身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①，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②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③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团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击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园所贮藏的历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①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乱”。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杀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但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禧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

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35—336页。

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①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上，早已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全国解放以后，这样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怎样对待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这个分歧的一个爆发点，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在这次交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个电影的评价问题上，各自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赞美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影片，其目的是为了请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企图借用它们的名字、口号和服装，在中国宣扬资本主义。

影片歌颂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和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开始分化出来的一些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在革命风暴和亡国大祸的威胁下，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戊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网罗，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来是承认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决不是无原则地对戊戌变法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歌功颂德。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改良主义的目的，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事物的质。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以渐变的形式，使地主经济逶迤曲折地改变为半地主、半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并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所以，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自横刀向天笑”。戊戌变法运动最悲壮的一幕是一个勇敢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夭折，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却还在鼓吹早已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极力宣扬“如果要中国富强，必须要维新变法！”还通过光绪皇帝之口，大肆赞扬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吹得天花乱坠，什么“明治维新”，什么“变法上谕”，什么“中国这样改革起来，不到三十年，就可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啦！”等等。这是疯狂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呼喊，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呼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影片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绪皇帝，捧到了九天之上。说他“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用尽了心机，受尽了闲气”，“只要国事有办法”“身体倒不在乎”。

特别恶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将相和美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丑化劳动人民，把群众污蔑为“群氓”。在电影末场，作者通过被歪曲、被丑化了的村民、村妇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绪皇帝，称颂光绪皇帝是个“好皇帝”，“他是帮我们老百姓的”，“我们都惦着皇上呢！”村民、村妇把鸡蛋、饽饽“献给”光绪皇帝吃。临别时，“民众夹道跪送”。影片还污蔑说什么“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难道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恭顺服从、卑贱丑陋的群氓吗？绝对不许污蔑劳动人民！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歌颂这部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恰恰暴露了他们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获得革命胜利之后，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亲自为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作了总结，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之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然还把这部大肆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作为“爱国主义”影片，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页。

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①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视历史事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美化资产阶级共和国，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所以全力歌颂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因为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影片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工具。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通过古人来赞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并利用这部影片来迷惑群众，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

“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4—147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839页。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更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样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个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文中“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是毛泽东所加写的。据王力交待，毛泽东亲自改了三遍，发表前，周恩来也不知道。

江青：《在京剧团的讲话》（摘录）

胡乔木是个托派。难怪我怎么也不理解。就是这《清宫秘史》，他坚决抵制主席。他说是爱国主义，因为这是刘少奇的话。我完全记得清清楚楚，是在一个桌子上，他也在那个桌子上，刘少奇也在那个桌子上。说是爱国主义，我说是卖国主义。我说主席也看了这个戏，主席说过：这是个卖国主义的戏。我那个水平只那么一点，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把义和团诬蔑成那个样子。光绪、珍妃都是想对外国人投降的。就是说中国人对外国人投降是合法的。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是正确的。刘少奇的投降主义是正确的。所以他死咬了一口，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坏蛋亲自坐镇。陆定一最后说：这是爱国主义，是艾青。我说什么爱国主义，是卖国主义！我气坏了。因为他特意站起来，回过头来，针对着我讲话：啊！江青，等等，你敢说是卖国主义！我说，就是。陆定一作为一个部长，中央委员，一个屁也不答。

[按] 影片《清宫秘史》：1944 年姚克作，1948 年由永华影业公司摄制。同年 11 月在香港首映，49 年 1 月初始在上海放映。

毛泽东对《清宫秘史》，据传在 1950 年三月该片放映时便指出：“《清宫秘史》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1954 年，他在关于《红楼梦》讨论，给政治局的信中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受批判。”1965 年 12 月杭州讲话中，又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

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但刘少奇对于这一指责，一直否认。早在3月30日，刘少奇就“给毛主席一封信，说明了自己对《清宫秘史》的看法与经过”。在戚文发表后的4月7日，刘少奇在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中又予以否认。据刘平平等的回忆，刘少奇在4月1日见到戚文“气愤已极，他把报纸狠狠一摔，对我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册第16页）然在1967年4月14日邮电学院批判胡乔木的会上，胡曾承认：刘少奇对他说过：光绪是爱国的，这部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当时造反派还就此对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研究人员荣孟源进行了调查。兹将有关材料附录于次，以存这樁公案。

胡乔木关于《清宫秘史》问题的检查（1967.1.21）

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这本来应当成为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第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我在事先接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刘少奇说它（《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

人民大学红卫兵及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部分成员调审胡乔木的摘录（1967.4.4）

问：关于《清宫秘史》问题，你一月二十一日的检查与戚本禹同志讲的事实不符，为什么？当时对《清宫秘史》搞的那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是谁让反动文人荣孟源写的？

答：具体过程忘记了，后来我才知道我说的不对。荣孟源给范文澜写信时也没有说清楚。范文澜说是荣孟源写的。据说荣参加了那次旧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但是究竟是谁让他写的，他也记不清。戚本禹的文章是经过中央审查的，当然可靠，我说的是不正确的。

问：你一月二十一日的检查与戚本禹同志讲的出入在哪里？

答：我的检查除不深刻外，事实也有出入。主要是关于组织文章批判的问题与事实不符。戚本禹同志说是当时旧中宣部几个人为了达到假批判、真包庇的目的而组织的，我却说是江青同志组织的。对批判文章的看法，我也说的不对，我以为是真批判。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后，才知道是假批判。

问：你们把旧中宣部干的事推给江青同志，居心何在？你这不是嫁祸于人吗？

答：不，不，是我当时记不大清楚了。（随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

问：刘少奇对你讲过什么话？你为什么要宣传刘少奇的谬论？为什么要抗拒毛主席的批示？

答：那是我先听了刘少奇的话，毛主席的话后来从江青同志那里知道的。过程是这样的：刘少奇对我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影片。有一次在旧中宣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定一和江青同志都到了。陆定一、周扬吹捧刘少奇的观点，而江青同志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我说：少奇说的，这是个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会后江青同志对我说，你说的是错误的，主席认为是卖国主义的。

问：江青同志跟你讲了，你怎么对待主席的指示？

答：我听了江青同志的话之后，我自己没有去组织别人批判，自己也没有去批判。相反别人有批判的文章我都压下来没有发表。我抗拒了毛主席的指示。

问：《清宫秘史》十几年一直不能批判，你有没有责任？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答：我有责任，我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但是我主观上没有反对毛主席。

人民大学红卫兵与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战士与范文澜谈话记录（1967.4.9）

问：50年，你让荣孟源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那么是谁让你找荣孟源的？你谈谈事情的经过。

答：是胡乔木让我从我们所（近代史所）里找一个人写批判文章，我找了荣孟源。他看过一次电影，连《清宫秘史》的电影剧本也没有看，就简单地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小文章。写好之后，给了我，我又寄给乔木。胡乔木批了进一步修改发表，然后退给荣。荣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又把胡乔木的批语“发表”两个字剪下来，贴在文章上边，就寄给《人民日报》了。后来不知为什么《人民日报》没有刊登。

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签字）67.4.9 中午

荣孟源交待

大约是1950年或51年，一天晚上，所长范文澜同志叫我看电影，说是审查片子。我就去了，地点好象是电影局。看了两个片子，一个是关于彝族的；一个是《清宫秘史》。看过以后，当场就座谈，主持会的人好象是沈雁冰（记不准）。对于彝族的片子，一致否定，我未发言。对于《清宫秘史》，大家还同意。……现在只记得一句话：“这个片子演出来，北京的旗人不会反对。”“座谈时间不太长，大家发言也都很简单。过了几天，范文澜同志叫我把意见写出来，我就写了。现在找不到底稿。……经范文澜同志看过以后，就发出去了。是我发的还是范文澜同志发的？发给谁？想不起来了。此稿发出去之后，很长的时期没有消息。大约是几个月以后，把稿退给我修改。上有胡乔木的批语，大意是说，此稿太激烈了，修改后可以刊出……。我就把原稿修改，删去了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部分，只留下义和团部分。补充了一点材料，修改了一些文字，全文不过两千来字。我把胡乔木的批语贴在修改稿上寄出去。记得是寄给《人民日报》。从此以后，就没有消息。

从去年夏天范文澜同志问起此事以后，只能记起这些情况。

荣孟源（签字）1967.4.9

这些材料说明，刘少奇对《清宫秘史》，评论有“爱国主义”之说，或许有之。然刘日理万机，专心党务，于一个普通电影，漫尔评之，鲜芥小事，忘之久矣，亦情理之常。即就此评论而言，也大不了是一个看法有错，当时毛泽东对自己的忠实同志和战友，自可坦诚交换意见，帮助改正，何至于耿耿于怀，待十七年之后，犹大张挞伐？共产党人之间的同志关系之虚伪险恶，何一至于此？

用这样一个电影的评论，而推演为八大问题相质责，罗织之深，实所罕见，谁不
寒心！

第七十七卷 1967年3月30日至31日

(《论革命的三结合》的发表)

3月30日

《红旗》发表《论革命三结合》的社论，它是由毛亲自审阅修改的。

《论革命的“三结合”》^①

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正确地领会这个方针，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

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经过半年多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涌现出一大批新起的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广大革命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的基础，是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基础。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新起的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新生力量，他们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

这一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在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必须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作用，必须重视他们的意见，而绝不能把他们当做陪衬，因为他们是广大革命群众的代表。如果不承认或贬低他们的作用，那就是否定革命群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排斥他们，把他们当做陪衬，那就不可能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那就不可能是革命的“三结合”。

在一切大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必须看清本质和主流，看清革命的大方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缺点和错误，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看到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看到他们有许多长处，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对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则应该满腔热情地、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还应该看到，许多革命群众组织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出了自己组织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和纠正的方法。这是一种可贵的革命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同时，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正是革命群众自己提出来的。

归根结底，对待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也是能不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任何组织和个人脱离了广大革命群众，那就一定不能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半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严峻地考验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揭露出来了。同时，证明了我们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

^① 此文先期在3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和比较好的。那种对干部一概排斥、一概打倒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需要指出，这不能责怪群众，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这种余毒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没有肃清，因而也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犯过这种错误。

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事业单位，都有大批的革命干部。就是在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盘据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也是这样，不过那里的革命干部长期受到压抑罢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

革命干部参加“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的作用，必须充分估计。他们应该而且可能在这个机构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当然，只有和群众相结合，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才能起到这种作用。

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检讨错误，改正错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应该按照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团结他们，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其中许多人还可以参加临时权力机构。

但是，不能把坚持错误、不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的人，强加在群众头上，硬拉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来。否则，那就不是革命的“三结合”，那就根本谈不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那就会出现新的反复，甚至使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新上台。

我们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进来。这就是要混水摸鱼，要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要实行反革命复辟。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干部，都必须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积极支持广大的革命左派群众，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经验证明，在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有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参加，对于胜利完成夺权斗争的任务，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有了人民解放军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了人民解放军的支援，地方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就更大了。阶级敌人最害怕人民解放军，最害怕有军队干部参加的革命的“三结合”。他们费尽心机制造流言蜚语，捏造事实，妄图挑拨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对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必须给以充分揭露和坚决的打击。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举世无双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的军队。毛主席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正因为这样，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都信赖人民解放军，都热烈拥护当地驻军的代表参加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态度，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也是区别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某些地方，由于阶级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当地部队的某些同志，也可能在支援工作中，犯暂时的错误。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真正的革命左派应该善意地采取适当的方式，向部队负责同志说明情况，提出意见，而绝不应该采取公开对抗的态度，更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阶级敌人所

利用。

人民解放军在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全体指战员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虚心向革命群众学习，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善于同群众商量问题，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这样做，就能非常有力地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就能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部队本身也就能在斗争中得到新的锻炼和提高。

“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这个权力机构，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能是合二而一的、折衷主义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有代表性、才能代表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只有这样，它才能是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才能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实行强有力的集中领导，才能对阶级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的各种形式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不可糊涂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当前，我们要特别记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

《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清华大学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亲自掌握的一个典型。本刊调查员，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对待干部问题的情况调查，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煞费苦心地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特别有必要着重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干部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实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就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批判他们的。二十三条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贯穿着这个精神。

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广大群众，打击广大干部，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群众，最害怕革命干部，

特别最害怕革命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一方面挑动群众斗干部，一方面挑动干部整群众，企图一箭双雕，既整了革命群众，又整了革命干部。他们企图使干部不能站出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因此，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企图把对干部“打倒一切”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他们装出关心干部的样子，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挑拨干部同革命小将的关系，挑拨干部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他们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排斥真正的革命干部，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他们自己也梳装打扮起来，千方百计地妄图钻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是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都必须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同志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才能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在夺权斗争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又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文末一段，批“修养”这本书，是王力据毛口授的“最高指示”而加以发挥的。毛的原话是：“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由周恩来任组长。

清华大学《井冈山》小报发表文章，批判“打倒一切”。

《让铁的事实说话》

《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尖锐地指出：“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企图把对干部‘一概打倒’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这是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

通过十个月来的切身体会，我们有千条万条理由可以雄辩地证明：正是革命小将，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正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坚决地抵制、反对和批判了把干部“一概排斥，一概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不会忘记，去年六月九日工作组一进校，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他们广泛散布“清华党是黑党”，“干部都是黑帮、黑线”，“党员都是修苗”的反动谬论，严重混淆两类矛盾，搅乱了干部的阶级阵线，残酷打击革命干部。大批的中下层干部横遭斗争，甚至连学生党员也难幸免。工作组逼他们写检查，监视、斗争、限制人身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正是革命造反派的同学，冒着打成“保皇派”的危险，反对武斗干部，反对斗争一切干部，打倒一切干部；反对叫所有干部作检查，拒绝执行对一般党员的盯梢、监视。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丑化我们的党，丑化我们的大批革命干部。

工作组进校一个多月，除了大搞“反蒯”斗争，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外，

几乎把每个干部都搞得“臭名远扬”，“臭不可闻”。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之下，不少同学（多是保守派），为了表明自己“立场坚定，界限分明”，为“避免和黑线有牵连”之嫌疑，根本不敢和任何一个干部接近，话也不敢讲一句，清华园内一片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革命造反派同学，在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的英明决定的巨大鼓舞下，第一个敢于和干部接近，和干部结合，共同造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当时，我们和原来的班主任王韧共同组成了《红色风暴》战斗组。在毛主席“造反有理”的英明教导的鼓舞下，不怕围攻，不怕挫折，不怕议论讥笑，不怕“秋后算账”，积极地投入了战斗，展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批判。

八月份，工作组撤走之后，工作组一手扶植起来的清华“伪三临”，在王光美、王任重等人的幕后操纵下，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一手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八·一九”、“八·二四”反革命事件，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镇压下去，保护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特别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过关。而后，又大规模地毒打干部，进行政治迫害。他们还在教职工、干部食堂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一群混蛋 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 吃喝玩聊睡不问国事

在食堂里贴上大字报，大骂教职工、干部们绝大多数是“混蛋”“狗崽子”“冷血动物”，把正在吃饭的教职工、干部赶出来集体训话。当时，革命造反派的战士们看着这些粗暴践踏十六条的行为，十分愤怒，他们敲锣打鼓给员工食堂送去了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正在吃饭的教职工和干部都站起来热烈鼓掌欢迎，我们也针锋相对地贴了一副对联：

多数革命 钡镁钙锶钡活性稍差 追学赶帮超起来造反

这副对联受到了革命的教职工和革命干部的欢迎，他们对我们的行动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帮我们拿凳子，帮我们张贴，热情地、感动地称赞说：“还是八八派（革命造反派）的同学们讲政策。”

十月初，井冈山红卫兵成立还不到十天，保字号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骂她是“牛鬼蛇神窝”，那时，我们刚刚串联回校，看到井冈山红卫兵高高举起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敢打、敢冲、敢革命、敢造反，我们马上决定加入井冈山红卫兵，但是王韧同志原来是工作组眼中的“黑线人物”“三类半”干部，批判斗争四、五次也没有“下楼”，他能不能加入呢？我们将这个问题提给蒯大富同志，他表示：“他敢站出来革命，起来造反，是非常可贵的。”稍问了一下情况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蒯大富同志亲手签名批准了王韧同志的申请。这件事情又一次雄辩地证明，革命小将是最坚决地抵制和反对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谁要想把“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那简直是痴心妄想。

今年年初，我校几个团委副书记奋起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戚本禹同志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亲自写信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起来革命，起来造反，这是对所有革命干部的一个巨大的鼓舞。这和刘少奇、王光美为保护蒋南翔、刘冰等一小撮混蛋，为保护他们自己，而残酷地打击迫害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毛主席他老人家从来都是最充分地相信广大群众、相信广大干部的。他老人家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和十六条都无比正确地指出：“一般情况下，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今年《红旗》三、四、五期社论又一再地阐明我党一贯的干部政策。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说明，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小将们从来就是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革命小将们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抵制和反对把干部一概排斥、一概打倒的功绩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铁一般的事实表明：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光美、王任重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谁要想把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我们就坚决反击。
谁要想把罪名强加在中央文革头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和他拼命！坚决把它打倒！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井冈山兵团《红色风暴》

清华大学《井冈山》小报《简讯》：目前，我校正面临着一个彻底批判反动的“八·九”思潮，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好形势。战场已经从大字报区深入到食堂、宿舍、楼道里。楼道的两侧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有的甚至贴到了床头上。它们，尖锐泼辣、笔锋犀利，一针见血，一语道破，触动灵魂，展开了一场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刺刀见红的“白刃战”。这是整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又一新生事物。（1967年3月24日第24期）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出席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周在讲话中说，今天是你们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健康恢复，开始工作的时候，邱在后勤部工作出色，与其前任黄克诚、洪学智明显对立。江青、陈伯达也为邱会作吹嘘，对他的重新上台表示支持。（《传信录647》）

李先念接见银行系统造反派，说：二月份是个立场问题，错话说了不少，要很好深思。（《传信录648》）

3月31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讲话：运动从开始时至去年十·一，是第一阶段，革命派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不但作了思想准备，而且作了组织准备。进而进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更突出，发展为夺权斗争。并不是说所有地区、单位、团体都必须夺权，那样就不是一分为二。毛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结果，是指看出眉目。现在看来，时间还要拖长。为什么这次提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呢？因为夺权斗争是自上而下的进行的。夺权夺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了，这都是一股逆流。夺了权以后，私心杂念起来了。有的搞假夺权，有的打击另一派群众，这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今年三、四月份看出眉目，明年三、四、五月看出结果。而且，不能永久是革命派的选举，还要搞革命委员会，临时权力机构要变成正式的权力机构，将来还要回到人民代表大会。（《传信录649》）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张春桥、萧华、杨成武等接见福建省赴京代表团和北京赴闽返京学生。责令军区取消因1.26冲击军区事件以后所采取的镇压措施，要求：（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放；（4）写了检查的退还本人。（《传信录650》）

周恩来、康生、江青召开四川汇报会。康生、叶群申明，流传在成都的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的信是假造的。（《传信录651》）

谢富治在北京市委讲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挖总根子。他还引述毛泽东对《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批判，说：“骗人的欺人之谈。总而言之，是不要政权。只要修养。”（《传信录652》）

毛泽东对报纸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的不够，揭露的不够，批判的不够。

林彪指示杨成武，不要把材料送给叶剑英。杨请示周恩来后，仍继续照送。

由于王洪文攻击“联司”大方向错误，引起了“工总司”本身内部分裂。一部分人另组“支联总部”。王于是在三月中旬设立秘密据点，专门调查“联司”与“支联”的活动。

3月中下旬

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第七十八卷 1967年4月1日至8日

4月1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安徽问题的文件，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强调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和各地驻军，无论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机关和单位，或者在没有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保障更好地实际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要注意：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中央军委发布对东北局五点指示。

中共中央军委给东北局的五点指示

- 1、不准把群众组织任意打成反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必须由中央批准。
- 2、冲击过、反对过军区，提过意见的，被捕的一律释放，通令一律作废。
- 3、对违法乱纪犯罪个人依法惩办，要和群众严格区分开来。
- 4、群众组织犯严重错误的，要通过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不能强迫请罪、挂牌子。
- 5、不准在左派队伍中支持一派打击一派。

中共中央军委
四月一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李天佑等接见四川宜宾代表，解决宜宾问题。刘结挺在会上进行了控诉。四川党、政、军领导在场。（《传信录 653》）

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外交学院等单位编印了《陈毅黑话集》、《陈毅黑话选》、《批陈专辑》等材料，攻击陈毅，并成立了批陈毅联络站。

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发出“向刘邓发出总攻击号召”，动员全校，一定要打倒刘少奇，批臭黑《修养》。

4月2日

李先念接见供销合作总社代表，承认自己在运动中有严重错误，欢迎大家揭发批判。在取得造反派同意后，成立由王念基领导的党组，在造反派监督下进行业务工作。（《传信录 654》）

中共中央下达 117 号文件：“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

戚本禹在中央音乐学院座谈，说：不能反对毛主席、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如果反对他们，我们就要打倒他。刘诗昆以前是“红专标兵”。戚说：这种标兵应该打倒。（《传信录 655》）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它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武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王力修改。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在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区领导人所持的抵制与镇压红卫兵造反行动的强硬态度。

北京红代会、工代会数十万人游行示威，声讨刘、邓，欢呼中央夺权的“伟大胜利”。

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叶剑英的大标语。

4月3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等接见四川革命群众代表。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宣布，原宜宾地委刘结挺与其妻张西挺的冤案已查清，这是揭露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周恩来指示，成都军区、宜宾军分区大量捕人是不允许的。成都军区司令员由梁兴初接替（原黄新廷）。并公布谢富治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长。（《传信录 656》）

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接见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革命派代表。会上康生指责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 3 月 27 日对部分老红卫兵的讲话完全是“联动”观点。学校的左派不能解散，军训人员必须支持左派。提班级大联合是错误的，必需是革命的大联合。（《传信录 657》）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及《中国青年报》群众组织代表，协调各组织关系。李说：二胡（胡耀邦、胡克实）是团中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传信录 658》）

谢富治在北京卫戍区召开的军管代表会议上讲话：由傅崇碧领导的北京支左、军管工作有成绩，也有的地方支右了，甚至有镇压左派，把左派头头抓起来，其中包括北大、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抓他们就是犯罪行为。军队支左错误原因：一是认识不清；二是立场问题，思想上右倾。有的是受老婆、孩子的影响。老婆就是当权派，自己也是地方的常委，孩子是保守

派，因此站在刘邓一边。（《传信录 659》）

北京红代会开会，首次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北师大等 73 个单位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誓师大会。

北京市中等学校开始实行军训，原拟要求按班级实行大联合，然两派斗争依然激烈。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中学师生代表，指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一部分中学生拥护江青等人的讲话，立即组织起来，是为“四·三派”。

4月上旬

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负责人及中央文革成员参加，周恩来布置总结三支两军经验，以利改进工作。

4月初

根据叶群说的“总后彭德怀、黄克诚的人”“没有挖掉”的指示。经邱会作策划，组织调查组，搜集总后勤部五名领导和各部一些领导的材料，本日向叶群汇报。

戚本禹以诗赠北航韩爱晶，其中以“黑魔”隐喻谭震林，“白虎”喻陈毅，挑唆他们发起对谭、陈的攻击。

4月4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关锋、谢富治在人大常委会接见北京 30 余所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代表。指出：军训后，左派组织不能解散、军训不能干涉、妨碍文化大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并批评了李钟奇讲话缺乏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传信录 660》）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关锋接见农大东方红造反组织代表。江青说：过去曾保过谭震林，是因为对他的东西掌握不多，不知道他有这么多恶劣的东西。你们一定要很好支持农口的左派。如果你们力量不够，其他单位要轮流支援。周总理说：农口问题复杂，农业部可能军事接管。（《传信录 661》）

李先念接见商业部造反派代表。（《传信录 664》）

陈毅接见对外文委代表。（《传信录 665》）

叶群、戚本禹在人大常委会授意韩爱晶，搜集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材料。以北航“红旗”名义连续发表《严正声明》，提出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

另一部分中学学生组成“四·四”派，中学“四·三”派认为必须批判“联动”思潮；而“四·四”派则认为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

北京大学举行万人誓师大会，声言决心挖掉中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会上揪斗了陆定一、周扬、蒋南翔、陆平等。

4月5日

唐平铸在“《人民日报》有关宣传报导的会议”上转述了毛泽东看了即将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起草的宣言，表示不满意。说：文章什么都说，但没有棱角。牛为什么要长两支角？也为了斗争。这个宣言你们要上台，他们要下台，这个宣言要写得有气概，因为这是震动世界的事情。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文件要有气概，比巴黎公社还要郑重。要参考《共产党宣言》写，理论上要有新的东西。这个宣言有历史意义，将来莫斯科革命也要学习它。新的革命委员会为什

么要成立？宣言中没有讲出道理，好比钝刀子割肉。要点彭真的名，要把批刘邓引向一个新高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这样一次，要做点好文章。唐平铸还传达陈伯达在昨天会议上的指示：要写一批有份量的文章，对刘少奇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初步定为 24 篇，分人专撰。如陈伯达负责组织的《中国向何处去？》、《红旗》负责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人民日报》负责的《在农业集体化道路上两条路线斗争》、《新闻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等。（《传信录 666》）

国家计委、工交、基建口各部委，首都大专院校八十多个组织，联合成立“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委会”。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见了造反派代表。周指出：你们所提的要斗倒薄一波，先要斗倒余秋里、谷牧，这个逻辑不通。

商业部召开彻底揭发姚依林罪行大会，李先念到会。在讲话中检讨了文革以来“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反动路线”。（《传信录 667》）

4月6日

林彪与黄永胜谈话，决定向全军发一份新的命令。林口授十条，经王力、关锋等加工炮制，成为与《军委八条》在性质上相对立的文件，呈报毛泽东。本日，毛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然后交中央文革碰头会进行讨论，并一致通过。

中央军委命令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

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 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接见计委、经委、建委革命组织时，周说：薄一波是工交战线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薄一波有他的死党，那就是他的叛徒集团和牺盟会。当然牺盟会不都是坏的。周历数薄一波从 52 年以来一贯到处伸手，两面三刀。要系统批判，揪出他的死党。谷牧、余秋里有错误，但要支持他们工作。(《传信录 668》)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第四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传信录 669》)

中南海内造反派冲入刘少奇家，勒令刘对戚本禹文中所提八个问题作出交待。并责令他今后自己做饭、打扫卫生，及改变夜间工作的习惯。

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正式成立。

康生妻妹、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指为谋杀，下令调查。在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赵登程等的严刑逼供下，制造了石磊(校医)、宋公田(校医)、闻伯俊(校医)反革命集团谋杀苏枚案。六十多名干部与家属子女受株连。

4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播放林彪 3 月 20 日讲话录音的通知。

关于播放林彪讲话录音的通知 中发(67)123 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讲话的录音，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报告，对于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地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认真组织大家学习林彪同志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叶群接见天津驻军及革命领导干部与群众代表。江青讲话：66 军(军长郑三生，政委萧思明)在天津支左，完成大联合，瓦解了“野战兵团”，抓人少，是有成绩的。(《传信录 670》)

陈伯达、康生接见内蒙古农民“东方红”代表周文孝，听取情况。（《传信录671》）

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参观红卫兵战果展览。（《传信录672》）

刘少奇就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文末所横蛮质责的八大问题，向中南海造反派作出书面答辩。并抄成大字报张贴，然立即遭撕毁。

师大“井冈山”召开三万人大会，提出坚决打倒余秋里。

4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指责他建国十七年来，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着重指出，必须批判《修养》一书。《光明日报》也以《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题，发表批判文章。批判进入一个新高潮。

《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

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奋起千钧棒，以笔作刀枪，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总攻击，对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著的大毒草《修养》，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吹响了这次伟大战役的进军号。

早在去年五月，毛主席就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就必将给予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致命的打击，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推动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争，必将带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处在决战阶段。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着重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彻底肃清它的流毒，把大批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革命干部解放出来。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从来是针锋相对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和十六条都明确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大批革命干部打成“黑帮”、“反党分子”，竭力阻挡干部起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这种情况，今天还在极大地妨碍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在这场伟大的批判斗争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要勇敢地站出来

革命。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干部，要立即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一切要革命的干部，都要坚决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和他们一起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火力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的“三结合”，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形成的。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是在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洪流中考验出来的。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在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总要在他们的后台老板鼓动下，纷纷出笼，跳出来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骨干力量。一定要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集中火力斗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而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必将把各单位的斗、批、改提到更高的水平。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彻底清算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它象一条红线，贯穿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由来已久，从未间断。十七年来，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定地引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需要，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妄图实现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就是这个人，为资本家剥削喝采，为富农经济叫好。就是这个人，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拼命鼓吹“四大自由”。就是这个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主张阶级调和。就是这个人，反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竭力鼓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就是这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就是这个人，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鸣锣开道。这个人的野心，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要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因此，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来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战斗任务。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只有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在各个领域内的流毒，才能使广大革命群众懂得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必要性和艰巨性，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自觉地坚

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这本书，是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对《修养》这本书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修养》这本书，完全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本书，是要资产阶级“修养”，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本书，宣扬唯心主义，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按照这本书，舒舒服服地关在小屋子里去“修身养性”，就只能是舒舒服服地演变成修正主义。这本书一版再版，不仅流毒全党全国，甚至流毒世界，害人不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干部由于受了《修养》的骗，中了《修养》的毒，妨碍他们积极投身于革命的群众运动，盲目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受蒙蔽、受毒害的同志，不要再上《修养》这本书的当了。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群众运动的火热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对这本书的彻底批判，一定要联系自己的思想，触及灵魂的深处，大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粉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这是一场破私立公的革命，是用毛泽东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革命。只有打碎这个精神枷锁，才能轻装前进，真正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这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就是一场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群众在批判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过程中，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毒素的过程中，一定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斗的武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光明日报》社论：《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发起总攻击的战斗号角！一场埋葬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空前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兴起。

毛主席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打着“红旗”反红旗，提出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妄图扭转中国革命的航向，千方百计地要把中国革命引向歧途。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他利用他所窃踞的党政要职，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系列

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篡党、篡政、夺无产阶级的权，专无产阶级的政。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那末，人民的江山就要改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会付之东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在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针锋相对地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掌稳了航船，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破浪前进！现在，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流毒的决战时刻，已经来到了。这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批判、大斗争。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大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的大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大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大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中国的赫鲁晓夫，也是不打不倒的。我们必须穷追猛打，打他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要彻底批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必须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才能使他们原形毕露，才能把他们长期以来所散布的大量毒素统统挖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肃清他们的流毒，铲除他们的影响，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要搞好这场大批判，首先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纲，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在各个领域内的恶劣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大剥削阶级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大革命，是从思想上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大革命。当前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性的战役。

长期以来，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在文化领域的文、史、哲、经等部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和扶植了一伙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只有彻底摧垮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后台，才能把这一批反动的家伙挖出来，才能完成一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使命。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这条反动路线，一方面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只有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才能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思想革命化，肃清反动路线在革命派内部流毒，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只有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才能把受打击的大批干部解放出来，才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唯一正确的干部路线，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在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斗争中，特别要批判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修养》。在一九六二年再版的这本书，是他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他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这本书，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们必须把它彻底批深，批透！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大批判的最强大的最锐利的武器。在当前这场大批判、大斗争的群众运动中，我们必须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更新的高潮，把我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毛泽东思想

的万丈光芒，永远照耀全世界。

革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少年，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让我们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

中央文革就中联部批判伍修权作出指示。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指示有关伍修权的问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对××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指示和康生同志的批示：

我赞成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的意见。

康生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

××部革命造反总部：

（一）申健同志受委托到外语训练班调查顾柏生翻印“联动”反动传单一事是正确的，一定要调查结果来，并要作报告。

（二）外训班同学在个别人的挑动下到××部抓申键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违背康生同志指示的。请你们立即回去，积极参加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积极参加本单位斗批改。

希望你们同××部伍修权划清界限，他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指《我和刘宁一同志的分歧是原则的分歧、路线的分歧》——编者）是错误的，继续把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完全歪曲了中央四月一日对安徽问题的指示，颠倒是非。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

在批判民族文化宫展览的刘邓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上，红代会所属某些单位发生冲突，导致武斗，发生了轰动全市的“民族宫事件”。“民族宫事件”是北京两大派（以北航“红旗”、“新北大”为首的“天派”为一方，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为首的“地派”为另一方）斗争的导火线和公开化。

第七十九卷 1967年4月9日至10日

4月9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

上海市第六女中革命红卫兵，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了全校革命的大联合。这又一次证明：革命的大批判运动，可以大大推动革命的大联合。我们欢呼市六女中的革命红卫兵在共同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我们希望更多学校的革命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以及革命领导干部，在当前这场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中尽快地联合起来。

市六女中的经验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当前实现大联合的主要障碍。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过关，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他们还利用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欺骗少数学生，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因此，在一些学校中，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至今还没有在学校中彻底肃清，它还在各个方面影响和阻碍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有些革命群众组织之间至今还在打无原则的“内战”。事实很清楚，只有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了它的流毒，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在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矛头一致向上，直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就是他伙同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利用反动的血统论，毒害了不少青年学生。他是我国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是我国七亿人民的公敌。彻底批判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反动谬论，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当前革命师生斗争的大方向。市六女中的革命学生，开始由于没有紧紧把握住这个斗争大方向，始终联合不起来。有时，人在班级，心各一方，坐不拢、谈不来，甚至互不理睬。通过共同揭发、批判、控诉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派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敌人并不是原来保守的学生，而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来保守的学生也认识到，革命派的学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而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无论革命派学生或原来保守的学生，大家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共同的敌人找到了，大方向一致了，在这场大批判中，明辨了是非，弄清了思想，提高了觉悟，相互清除了隔阂，于是就联合起来了。

革命的大联合，只有在共同的斗争中才能实现。大联合，首先需要政治思想上的大统一。这场大批判运动，是一场思想大革命运动。毛主席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这场大批判中，就是要大破大立。大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市六女中革命学生积极参加这场群众的大批判运动，用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有力地批判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为广大联合建立牢固的思想基础。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在这场群众性的大批判、大斗争中，要狠触灵魂，横扫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努力实现思想革命化。通过共同的斗争，在大破大立中实现的大联合，才是真正的巩固的革命的大联合。

有人说，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落实到原来保守的群众组织，落实到班组里的学生。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想法。批判当然要落实，

这个落实，就是指这次大批判一定要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同斗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以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同时又把各单位的斗、批、改提到更高的水平。如果把批判落实到过去保守的群众组织，落实到班组里的学生，这岂不是又把矛头向下，又去整群众了吗？这恰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者所希望的，我们万万不要上当。对于革命师生的缺点、错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斗争指向革命的群众。

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又将大大地推动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有了统一的革命组织，团结了大多数，步伐一致，火力集中，就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彻底打倒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是一场硬仗，必须依靠七亿人民团结一致，顽强战斗，才能取得胜利。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我们一定要赶快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斗争。

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介绍黑龙江夺权经验。

戚本禹在中央戏剧学院讲话：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问题严重，但现在她是学生，不要作为斗争重点，重点当是李伯钊、萧望东。(《传信录 673》)

戚本禹在《北京日报》讲话，表扬《北京日报》已从过去最坏的报纸成了最好的报纸。3月7日的社论《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毛主席就说：“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论。”(《传信录 674》)

地院“东方红”等造反组织劫走民委档案。

4月10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李雪峰、郑维山接见天津各方代表，解决天津问题。周恩来、陈伯达、张春桥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传信录 675》)

谢富治、吴德、傅崇碧接见工代会代表，决定派军代表常驻工代会，迅速从组织上完成按系统、按部门联合。有些组织反映军代表不支持他们，谢让傅记下来，回去找军代表开会，让公开支持造反派。并说：谁说公安局的权不能夺？谁说工厂保卫科的权不能夺？武装部的权也可以夺。(《传信录 676》)

清华大学造反派召开 30 万人大会，首次对王光美进行公开斗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 300 人陪斗。斗争会前和会后，对王光美进行了非法审问，肆行人身侮辱。

批斗王光美

“株连”是封建主义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株连的现象就已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极为普遍。因刘少奇错案造成 22000 余起错案，首先是株连到王光美。这里略说对王光美的一次批斗。

在打倒刘少奇以前，“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同意开会批斗王光美；在打倒刘少奇以后，批准了。1967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举行了 30 万人的批斗会，批斗王光美，还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 300 人“陪斗”。“盛况”空前，写下了“文化大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批斗会上，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王光美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连成的项链。^①王光美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她承认是“三

^① 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到印度尼西亚访问时穿过旗袍，戴过项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

反分子”，她义正词严地驳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永远不反。”

刘平平等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中说：“妈妈在大会前，作了长时间的答辩。”事实上，王光美在会前、会后都作了答辩。“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杂志社，1967年8月10日出了《井冈山》专刊，登了《三审王光美》。这是1967年4月10日在批斗会前和批斗会后“审”王光美的记录。全文太长，以下是摘录^①：

第一次审问

地点：清华中央主楼

时间：晨6点半左右

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王：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同学要她穿上去印尼的衣服出去斗，王光美不干。)

问：这衣服一定要你穿上！

王：就不穿！

问：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王：反正我不穿。

问：告诉你，今天是斗你。不老实，小心点！

王：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问：谁跟你谈？告诉你，今天是斗争你。

王：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人身自由。

问：(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

王：这是绸子的，太冷了。

问：“冻死苍蝇未足奇。”

王：如果我真反毛主席，那冰死就活该。

问：你就是反对毛主席。

王：我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

问：不行！都穿上。

王：你们没有这权利。

问：我们就有这个权利！今天是斗争你，我们要怎么斗就怎么斗，没有你的自由。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论还是收起来吧。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阶级阵线！

(时间到。捉鬼队员给王穿妖衣)

王：你们武斗，你们违反毛主席指示。

(众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王：谁反对毛主席指示就……(被打断)

(众念：“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

王：你们用强制手段。

问：胡扯！是你侮辱我们。你穿上这套衣服去印尼与苏加诺吊膀子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你侮辱了全中国人民。

你还想倒打一耙。对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里的头号大扒手，对你就是要

^① 原编者按：摘录一仍其旧，问话中的攻击、污蔑之词均不加改动。

强制。

王：希望你们好好调查一下。

问：我问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谁干的？

王：真正的革命者是勇敢的，是勇于正视事实的。……反正“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肯定不是我，也不会是杨天放。谁是真革命的，谁干的谁自己承认。是谁说清华园是黑窝的，是谁说宁可怀疑 99 个也不放过一个黑帮……真正的革命者就要敢于站出来，谁干的谁自己承认。

问：你说，为什么打击基层干部，而何东昌倒在香山休养，刘冰、胡健在北京饭店，蒋南翔，同学提了多少回，你们就是不斗。

王：我不知道，北京饭店是在开会。蒋南翔情况我是反映了。中央有同志批示(我不能说)不让拉回来斗。

问：派工作组的目的是什么？

王：同意派工作组当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当然毛主席不在，刘少奇要负责主要责任。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

问：就你这一个人就打多少革命群众成反革命？害了多少人？

王：我们没定一个反革命。

问：你赖不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事实！

王：事实总是事实，应根据事实得出结论，这才是毛泽东思想。

问：不对。立场是主要的。你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就是看革命群众的阴暗面，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们看的事实，收集的事实就是和你不同。

王：现在有人推卸责任……，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应敢于承认事实。……怀疑一切都是错误的，是谁提出的？

问：你们怀疑革命的一切，打击一切革命群众、干部。

王：反正“怀疑一切”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刘少奇的思想，我们是反对“怀疑一切”的。

问：(气急、骂)大扒手、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给中国人民丢脸，揭事实。(给苏加诺点烟)

王：我认为我没丢脸。那天是告别宴会，他坐在我旁边，我是女主人……应尊重印尼习惯。

问：你说，你把多少同学打成反革命，我们这里就有不少。

王：反正我们只批过，没有打成反革命。

问：谁让你反“假左派”的？

王：不是刘少奇。是工作组问我，是叶林、杨天放，他们说蒯写了一个夺权的批语，还有反映了与现在根本不同的片面情况，我就根据这些同意了。

问：刘少奇做了什么指示？

王：刘少奇对清华指示很少。

问：那你卖菜是谁让的？捞政治资本。

王：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王光美为什么过去四清时三同现在不三同啦？……”主席说：“可以参加劳动，……这样可以接受批评。”我听了很感动，就去劳动了。

问：那你老老实实劳动啊？为什么三个饭厅去卖菜。

王：走三个饭厅，不是因为接触不广吗？

问：你回答：“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到底是谁推广的？

王：的确不是刘少奇。

问：蒯大富是谁定的反革命？

王：与刘少奇无关，也肯定没定反革命。

问：你交待。保蒋南翔是谁指示的？
王：蒋南翔性质未定的话是我讲的。但你们前后的话都不讲，只讲这句话是断章取义。
问：同学们对蒋恨死了，你却说性质未定，不让斗，这不是保他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王：我不知道。你们试试看，将来你们工作中不要犯错误。
问：你对批判《修养》怎么看？
王：这本书是唯心的，不谈阶级斗争，我同意报上发表的《红旗》评论员文章的几句话。
至于反毛泽东思想，主观上我是不同意，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问：对戚本禹同志批《清宫秘史》的文章怎么看？
王：这部片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对，这部片子刘少奇没有说是爱国主义的。我和他一起看的，当时只看了一半，以后天亮了看不清了，他什么也没说。这是肯定的，他没说过。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没说过。
问：照你这么说戚本禹同志在造谣了？
王：是不是有另外人假借刘少奇的名义说过这些话。
问：你觉得这文章写的对不对？这是毛主席看过的！
王：是吗？是主席看过的吗？我觉得还是从革命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问：戚本禹同志文章针对的是谁你清楚吗？
王：那他提的的确是刘少奇。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问题怎么看？
王：有的是刘少奇的责任，有的不是刘少奇讲的。
问：那么《红旗》上在造谣？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王：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过去就是相信不够才犯了错误。我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我觉得有出入，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直接没感到这一点。
问：那叫叛徒集团自首是怎么说的？
王：这不是他指示的，是一个负责同志提建议，他同意过的。
问：是谁？
王：我不说！
问：你包庇！快说。
王：(沉思一会)是柯庆施建议的，刘少奇同意了。
问：(气愤)不许你污蔑柯老！
王：反正我说话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好了。
问：王光美你说，你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看？
王：我主观上还认识不到这个水平。反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主席许多事委托刘少奇、书记处处理，发生的事他要负责，但现在他靠边站了，不负责了，不当权了么。在反动路线时他是走过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
问：就是反动路线这一点？
王：当然不止。凡是犯路线错误都走资本主义一段道路。
问：就按你的这种说法，你说说看刘少奇走过哪些资本主义道路？
王：山西老区互助组的批示，是错的，是他批的。合作社发展太快，他求稳，说要慢一些。1962年他对困难的估计过分。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谬论出来他是不赞成的，单干也是不赞成的。他那时许多关键时刻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
问：刘少奇宣传“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王：刘少奇是讲了很多的错话，你们是指1950年他在天津的讲话，当时我也在，我知

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的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问：这么说，讲“工人就得剥削”是对的？

王：有些是错的。有的这样讲是对的，有的这样讲不好。这不能脱离环境。比如一个资本家与他座谈说剥削是罪恶，那开一个厂就大罪，再开一个厂罪就更大了。刘少奇说只要对国富民强有好处，开厂剥削，这样的剥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剥削。这是特定条件下讲的，现在有人砍头去尾地讲这句话。

问：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散布对蒋介石的迷信是谁呢？

王：那不只他一个人。根据报纸上的报道，绝不是一个人责任，停战协定(决议)上写“和平、民主”很明显嘛。他现在把责任担起来，勇于承担责任。(众笑：这么他还是英雄了？)就是勇于承担责任么。

问：那你说，还有谁？

王：不用说了吧。

问：不行！迷信蒋介石的人要查出来。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你们可以去查查报纸，有公开文章的！

问：那刘少奇贪污金皮带圈，金鞋拔呢？

王：金皮带圈、金鞋拔子是有这么回事。他做白区工作，随时有被逮捕危险，是应该身上带些东西的。

问：“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王：不知道！反正不是刘少奇，他只说进步资本家。

问：你是否说过王光英这个大资本家好，还要拉他入党？

王：王光英不是大资本家，最多是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他剥削是剥削，可是……，你们可以调查一下，他是否可以起进步资本家的作用。他不愿当资本家，说资本家名声太臭，要求入党，党给他任务，让他做资本家的工作。

问：你现在对刘少奇到底怎么看？

王：说他一辈子反革命，不反资本主义，我没有充分材料。

(同学要她戴上项链)

问：你说！江青同志叫你出国不要戴项链，你为什么非要戴上？

王：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带别针，没说带项链的事，但问题是一样的。

问：(逼)那你说红旗调查员的文章怎么样？

王：红旗调查员文章……(不语，同学吵，逼后，大声嘶叫)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问：好，记下来。

王：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清华，我们的问题肯定是右倾主义，是路线错误，我们是右倾不是形“左”实右。反正这“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我没有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

问：那你说是谁？

王：反正有人。

问：无耻！蒙骗人家还夸耀。现在谁都看透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本质了。

王：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真理就是真理，可能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问：你敢否定革命小将？

王：真正的爱护小将，应该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能歪曲事实来爱护革命小将……(被打断。众：你放毒！)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讲完，毛主席说：坏话、好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问：我们就是要斗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大扒手。

王：我不是，我是共产党员。

问：你不要给我们的党脸上抹黑了。干的丑事还少啦！桃园四清你干了些什么！

王：对四清材料你们了解了多少？你们都找什么人了解？你们下去五天，我待上一年了，比你们了解，你们要认真调查。

问：去你的。桃园经验臭透了。一会儿你听听。

王：桃园经验是好的，不是坏的。但有缺点有错误。

问：(大伙耻笑她)有功、有功。那么后十条看来也是好的，有缺点、有错误吧？

王：后十条是刘少奇改的，有些清规戒律，但精神是好的，是毛主席叫他修改的。

问：这么说后十条棒极了？

王：后十条有好的部分，但有形而上学，繁琐哲学，一些政策界限强调得过多，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运动。(群众气极，给她“打扮”后照相)

王：谢谢你们。你们不应该侮辱我。

问：刘少奇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你认为怎么样？

王：(避而不答)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6、7月是他干的，但以后就不能归他。

问：归谁？你说！

王：他路线错误有影响，不能全归他，他有责任。

问：那蒯大富反革命很久翻不过来，谁负责？

王：蒯大富反革命不是刘少奇定的，刘少奇没跟我说过蒯大富是反革命。

问：他在《修养》中大骂有人要全党尊重他……是谁？

王：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他不是骂主席，那指的是洛甫。

问：那1962年再版时为什么不修改，反而把斯大林都删了？

王：那不知道。他是坚决反修的。他改的地方有档案在，你们有条件就去查。毛主席说要出刘选，他不积极，后成立编辑委员会，要他修改出书，他看过一遍，有的是编辑委员会改的，他没注意，你们可以去查嘛。我知道，他是不反斯大林的，“九评”，“两论”，他都参加起草的。

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你怎么看？

王：批这电影很对、该批。

问：不对，要害揭开了“老革命”的画皮，暴露了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质。

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问：胡说！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我们就是要把刘少奇拉下马！

王：拉下马我同意，别人领导比他领导对党更有利。

问：王光美，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几个问题怎么看？(念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最后的几个问题)

王：(1)没讲过。我不知道。(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猖狂反对毛主席三个问题)

(2)我等待毛主席讲话，等毛主席讲最后一句话。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想，但想不出办法，没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象毛主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他是考虑避免修正主义复辟的。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1966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

(3)他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更没有什么猖狂。他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观问题。

(4)他没有大肆宣扬。他是想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当时白区损失极大，日本人又要进攻，因为一些人不知名，影响并不大，就让他们自首了。北京61个人，天津几十个人。至于自首书的措词，什么“坚决反共”，他不知道的。

(5)起草的文件，中央是看过的，当然他要检讨，但同一个文件他提出过积极练兵。当时这些是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

(6)他反对资本主义改造？没有！在天津讲话是错误的，但改造资本家他是积极赞成的。合作社问题他是同意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主要是邓子恢干的。

(7)八大报告是有缺点，但是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八大决议好象也有错误。……主席没看过？……这是很匆忙的，刘少奇决议好象看的也很匆忙。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

(8)这不是刘少奇说的。他只是对困难估计过分了。可能是会助长歪风滋长。

(9)刘选编委会叫他审查的，他对此不积极。

(10)他是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过分强调了扎根串连。有些话使人感到农村漆黑一团。

(11)对6、7月之前我同意毛主席大字报观点。6、7月后也要负责任。是不是都要他负责，那我就不了解情况了。

(王光美准备“坐牢”，将毛巾、牙刷……什么都带来了。)

问：王光美，你怕不怕？

王：我怕什么。我不怕。

第二次审问

时间：4月10日下午1点

地点：清华主楼803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文章怎么看？

王：戚本禹同志写得很好，旗帜鲜明。根据我知道的事实，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的结论我得不出。1950年我同刘少奇一起看这部电影时，他没有讲什么。主席要批判，他没批判，这是错了。反正我没有听他说过这片子是爱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文章出来后，我很气愤，也很关心。毛主席说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我又问了刘少奇一次，与他回忆了很久，他也说没说过。我们相信毛主席，伟大的毛主席会弄清楚的。

问：照你这么说刘少奇还是老革命？文化革命也只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王：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中犯错误不是偶然的，他自己也说不是偶然的，他的世界观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不违反毛泽东思想，他是要负主要责任。他没有毛主席的胆量和魄力来发动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我的错误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现在，我愿意交真心给你们。我对“假革命”、“反革命”的确没有认识到。

问：问你，你对今天斗争大会怎么看？

王：今天大会表现了群众的愤怒。我个人受一些委屈也没啥。毛主席教导我们也要经风雨见世面嘛。我希望你们给我听录音，我听到的太少了，我应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让刘少奇知道。

问：狡辩！我问你，桃园经验到底怎么样？

王：我认为桃园经验是成绩多缺点少。

问：喝！还成绩呢？你倒成了有功之臣了。

王：成绩不是王光美的，是毛主席的，是毛泽东思想的。

问：不许你污蔑毛主席。

王：我去桃园，许多人都不支持。刘少奇是主张我去的，那时就只有毛主席支持我去。

问：可是你呢，大整社员，大整同学，毛主席支持吗？

王：那，人的认识有个过程，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然正确思想从哪里来？

问：再问你，刘少奇在天津讲的反动话你怎么看？

王：天津讲话，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错误的。他是毛主席派去的，是针对一些人“左”倾情绪去纠正的，他说的话有些是很不好的。但“红色资本家”不是他讲的，我知道，我不说是谁。刘少奇只讲过进步资本家，资本家是有先进的，落后的。

问：谁说的“红色资本家”。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

问：不行！你是专政对象，说！

王：还是不说得好，我知道你们要揪。

问：算了吧！谁不知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者。

王：是的，是有人批评他老右倾，立三路线时批评他右倾，王明路线也批评他右倾……

(打断)

问：恶毒！你说现在是什么路线！不许赖！

王：我是说过去。

问：你对《论修养》怎么看？

王：我同意红旗评论员的话。

问：戚本禹同志文章呢？

王：(避而不答)

问：赶快交待你和刘少奇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行。

王：刘少奇没有罪行，叫我交待什么？

问：少耍赖！你对中央文革到底怎么看？

王：越是做工作多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要自我批评，中央文革是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的，我从讲话上看到过。大字报上边也有提意见的嘛！

问：三反分子的臭老婆，我们早定你……(被打断)

王：中国的妇女中国的女共产党员是独立的，不能因为丈夫错了，老婆就一定错，老婆错了，丈夫就一定错。

问：你们俩本来是臭味相投，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你是刘少奇拉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王：我入党不是拉进来的，我有手续的。

问：你介绍人是谁？

王：反正不是徐冰，外面是谣言。

问：谁？

王：一个姓孙，一个姓赖。

问：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

王：(不说)我的历史，我全部向组织汇报过了，你们可以通过组织调查。这些没必要说。

问：我们就要你说。谁看你档案。说！刘少奇对戚本禹同志文章怎么看？

王：文章发表后，他很仔细地看了两遍，我想他不会承认假革命、反革命。刘少奇说他从来没说过是爱国的。我们一起回忆过这件事，那回是谁推荐的，什么过程，我都忘了，反正是演到一半天就亮了，看不清，我们什么也没说。

问：你是不是说戚本禹同志、《红旗》在造谣？

王：戚本禹，我一直认为是好同志。是不是有人造谣，我不知道，反正刘少奇没说过。

第三次审问^①

^① 第三次“审问”，大量的内容是王光美的家庭情况(王家的家庭情况)、参加革命经过、入党经过

时间：4月10日5点40分—10点零5分

地点：主楼803

问：刘少奇是反党头子，知道吗？

王：毛主席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这么说。十七年来成绩是毛主席的，刘少奇是第一线，有错误是他的。

问：你说《红旗》文章你同意，那刘少奇是否修正主义一套？

王：《论修养》是唯心等还可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等我还想不通……

问：《修养》和赫鲁晓夫是否一样？

王：有某些方面一样，也有合乎马列主义的。

问：哈！这不是修正主义吗！打着红旗反红旗，你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1962年大量印发出版是谁定的？

王：可以查嘛，不是刘少奇亲自抓的。不知道。

问：戚本禹文章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王：从批《清宫秘史》和肃清刘少奇影响是好得很，但有些事实我有保留。是假革命反革命我未认识到。刘少奇从来没有讲过是爱国主义。

问：难道《红旗》文章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吗？

王：我不知道毛主席亲自看过。

问：你相信不相信中央文革？

王：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总的说来相信的，每个成员是否相信，那我有保留……

问：戚本禹文章的结论是中央文革的，你拥护中央文革吗？

王：那为什么不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呢？

问：刘少奇看了戚本禹文章什么态度？

王：刘少奇，反正不是反革命。

《三审王光美》这份资料相当难得，所以这里作了详细摘引。既可以让年轻的同志们见识一下“批斗”，也可以让尊敬的读者了解更多情况。王光美不屈服淫威，坚持原则，坚持真理，难能可贵。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指出党内走资派一方面抓住群众组织的一些缺点错误，另一方面又操纵扶植保字号组织。社论呼吁解放军在支左中应认识这个问题。社论又指出解放军支左中的缺点错误是认识问题，而走资派压群众是立场问题，号召军民要记住毛教导的“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

等，均已略去。

第八十卷 1967年4月11日至12日

(江青讲话：《为人民立新功》)

4月11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徐向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责令检讨。

傅崇碧在北京市厂(矿)军代表会议上讲话：真正的革命左派，斗争方向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单看成份、听话。如果离开两条路线斗争看左派、右派，就没有准绳。(《传信录 678》)

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派宣传车去北大宣传，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指使同学砸了宣传车。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是为“4.11”流血事件。中央文革接见双方，进行调处。

同日，邮电大楼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

4月12日

12日至18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她转述了毛泽东对《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一文的解释，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以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江青还当众宣布曹荻秋是“叛徒”、“自首变节分子”。

《为人民立新功》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的。

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再加上电报还要多哩！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

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的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末新鲜。这篇讲话强调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在历史上，不论是十年内战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詟，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讲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他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她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

左师触詟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很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这一次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

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对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時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時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的工作，不是份内的事，不管，要知道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

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音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人的子女的。如陈士渠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渠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渠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那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的材料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

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呀，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们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吧。

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同志要我来这里讲讲刘、邓路线问题。上一次的会我已经讲过一回，和康老一块，康老先开头，我继续讲，那次讲话有一个记录，虽然不那么很完全，但基本上可以。我想那个记录可以发给大家，我也不做修改了，即使有些错误，也是不要紧的。许多同志也听过了，没有听过的，看看记录也是可以的。今天，我讲的可能重复一些，但是不准备完全重复。

讲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我们党的发展情况，发展历史。

参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他们看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行的，中国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以经过民主革命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由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是最后的目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很多党员。另一种人是为了民主革命，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到党里面来的。他们可能着重点是在反帝这方面，而反封建还是软弱的。他们就要停在民主革命阶段，而民主革命可能还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他们是拥护的。这是刘少奇所代表的部分党员。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了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这又是一条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他有一套可以欺骗的东西，在党里面蒙混很久。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呢？现在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东西，过去我也知道不少，昨天和今天又看了他的一些讲话记录，有许多荒谬的东西，是令人吃惊的。我们所说的全国解放以后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很早就给我们指出，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梦想。因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回到老路上去，就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所以说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还是老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批评王明的，同时也是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五年初，搞《二十三条》，毛主席严厉批判他的时候，他在个别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批评他的。完全不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是这样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

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毛主席在后面还讲了一个土耳其的例子。他说：“一九二七年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怀抱，一天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就是说，土耳其事实上也变成了半殖民地。所以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的情况下，不是走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是走老路，走蒋介石的道路，走汪精卫的道路。

这一点，在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赤裸裸地说了。他说要当“红色买办”。红色就是红色，买办就是买办，那里有“红色买办”呢？他要粉刷一下。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打垮蒋介石，赶走帝国主义，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经过这个阶段转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又出现新的买办，刘少奇就是准备当这个新的买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他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时，说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三个前途。你们(资本家)是不是想出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搞社会主义，又不搞帝国主义。如果能想出第三条道路来就算你们有本事。其实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走老路。这个老路，不用资本家去想，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走的道路，就已经说明了。只要是无产阶级领导，只要是共产党领导(这是指真正的共产党，不是冒牌的共产党，不是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领导，那就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所谓第三条道路，本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讨论过多次了，他们也想找一条第三条道路，可是找来找去，还是蒋介石那条道路。但刘少奇还说是“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因为你本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嘛！其实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已经打进来了。美国就是有一套计划，它要和蒋介石合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民半殖民地。而刘少奇那个时候说，就是准备当“红色买办”，就是准备在美帝国主义占领、控制下当买办，哪里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他还说：“照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的方向一定要走到帝国主义，变成帝国主义以后，将来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他说“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是根本把毛主席在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完全忘得干干净净了。全世界的市场，只有中国是最广大的市场，七亿人口的市场。原料，中国也是很丰富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过去帝国主义说，中国不可能成为钢铁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煤油的国家，这是完全破产了的，而刘少奇说，如果要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就要到外国去搞原料、搞市场，向人家去抢，那还得打仗，发生世界大战”？他完全跟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历来的教导唱反调。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发展”。这是他在解放以后讲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当然比欧美的要晚一点，但是它衰老也快，衰老腐败。

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就很明确地给我们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挑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这是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篇，毛主席讲摘桃子问题时讲的一段话，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讲的，而刘少奇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作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时，认为中国现在有三种民主力量。出现了奇怪的理论，这可能是华盛顿来的理论。他说：“中国人民三个主要阶级要民主，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中间派，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要求中国民主。”他在这里没有提无产阶级，只提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比较广泛，有工人阶级，有农民，有手工业者，等等。他没有突出无产阶级。他说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

是什么人呢？大家知道，对于大资产阶级，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分析得很清楚，一种是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汪精卫；一种是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照刘少奇说，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也是要求中国民主的。而且还说：“三种人民”，蒋介石也算是人民。毛主席早就说得很清楚，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文中说，只要一提人民公敌，“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众，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这是毛主席讲的话，认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已经不成为争论的问题了。但六个月以后，刘少奇却把人民公敌变成了人民。

(周恩来插话：大家还记得，日本刚投降，毛主席就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这是很值得读一读的。因为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调兵遣将要去接收。那个时候，我们在延安连发了很多命令，当时还用朱德的名义发的。我们解放区的军队要开赴前线去接管，因为我们都在沿海嘛，都在敌占区嘛，就在周围，很容易接管。蒋介石看了就急得很。这个时候，根据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就来了电报，要我们不打内战。实际上，蒋介石准备打内战，同我们夺取敌占区的大城市嘛！所以主席确定了这么一个方针，连下命令，各个部队都向前线开。大家都记得嘛，从林彪同志起，大家都利用美国那个破飞机，从延安到太行山、到山东。正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三号还是二十四号，来那个电报，就那么一个内容，说中国不能打内战，要打内战中华民族是要毁灭的。这是第一点。这个不要紧，打内战，反正我们不先发动，总是蒋介石发动。算定他是要发动的嘛。第二点，就是要主席到重庆去谈判。难题就在第二点。第一点是阻止不了的，因为蒋介石要打嘛，我们准备好了就应战，就打了。第二点是个弯子，转就困难一些。主席的决心，是证明给世界人民看，中国共产党不首先发动内战，发动内战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估计当时形势，冒一点险，还是决定去了。我陪主席一上飞机，延安和各个解放区都打电报来，耽心啊！是冒很大的险的。当时主席的决心，如果在重庆被扣，我们就准备坐牢。告诉延安决不要因为主席在重庆，军队就不准备，晓得他要利用主席在重庆，要发动进攻。头一场就是太行山，就是邯郸。中间有这个曲折，因此有双十协定啦，还有老政协啦，停战啦，我和王若飞签的字。主席在双十辛亥革命纪念的第二天，十月十一日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去是由赫尔利保驾，坐的是赫尔利的专机，回来是坐张治中的专机，到现在我们对张治中还留有余地。的确，我当时把他抓住了。(江青同志：三上延安)三上延安府，送主席上延安这是一功。他送主席回延安，我就留在重庆作质。这是准备阶段，主席赞成有这个准备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大城市敌人不交给我们，等蒋介石军队开到了，敌人把枪交给他。我们一下子打不进去，看着大城市，什么济南、天津、北京、南京，进不去。小城市，什么淮安、淮阴进去了，临沂进去了，济南进不去，青岛进不去，烟台大概进去了吧！中等城市进了一点。这样，我们就积蓄力量，就扩大军队，不是什么复员哪，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哪，而是准备力量。练兵、扩大军队，土改三条。主席这三条建议，在重庆时就提出来了，想到这一点了。当时有这么个历史插曲，因为客观形势发展需要这么一个插曲，开始的时候，就估计到不是马上就能够达到胜利，而刘少奇完全不认识这个。)

(康生插话：斯大林那个电报，是错误的。我是经常这么想，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德、日、意、法西斯垮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功绩的。赫鲁晓夫诬蔑和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要看到，在战后一个时期，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有右的错误。他当时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他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各国人民，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他有一个政策，就是在各国千万不要引起武装冲突，不要把苏联再扯进去同美国冲突起来。他是这么样一个方针。因此，法共交了枪，法共有四十万武装，整个占领了马赛，

交了枪。希腊快打到雅典了，也交了枪。他要毛主席到重庆去干什么呢？实际上也是要交枪。就是要搞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那一套。所以中国的胜利，是毛主席违反了斯大林那个错误政策而取得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如果我们按照斯大林那一套，那就象法国一样，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不是作了副总理吗，陶里亚蒂不也是副总理吗？后来统统干掉了。这也就是王明那一套。王明是最羡慕那一套的。可惜蒋介石没有法国帝国主义那个气魄就是了。主席伟大，违反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伟大意义。中国革命胜利后，据刘少奇讲，斯大林承认了错误，到底是不是承认了，我现在也还怀疑这件事。中国胜利了，在一九五〇年、五一年，印度、印尼、缅甸、马来亚还是交了枪。马来亚有武装交了。印尼有武装交了。他有个理论，说这些国家同中国不同，中国靠近苏联，国家又大，交通又不发达，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靠近苏联。那些国家不靠近苏联，国家又小，交通又发达，那就不能实行中国经验。最近我翻了一下斯大林的文件，一九五〇年和五一年，他有两个文件是这样说的，印度、印尼、马来亚这些国家不能学习中国经验，因为他们那里地理环境，各方面条件不同。他还是那么一个想法。过去我认为只是欧洲交枪，最近我才知道亚洲也交枪。没有交枪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有一句话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是有极大世界意义的一个战略措施。）

日本投降的时候，毛主席在讲摘桃子的那篇讲话中说：“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象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可是，刘少奇在毛主席回来以后，就作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没有说和蒋介石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个方针，而是要靠议会斗争，提出要解除武装，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国民党军队。(王力：廉价出卖。说只要把军队交出去，美国的美金就来了。)这完全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刘少奇说：“我们参加政府，美国借的二十万美金就来了，复员善后，整年用一点，其余要开工厂，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商业、农业亦要参加去搞。”美金不是送给我们的，是送给蒋介石，给我们一点点，用来收买。

总之，毛主席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刘少奇在毛主席这个讲话以后六个月，他还认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要民主的，民主革命不是经过战争，而是经过宪法，成立议会，就可以彻底实现工业化，土地改革。蒋介石也搞土地改革，搞工业化，这不是天下奇闻吗？刘少奇那个时候说：“有些人要去作官了，中央政府的官”，“国民党各党派也会到解放区来活动，设通讯社，办报纸，设党部，讲统一，希望共产党给民主”。你看，他代表蒋介石来向我们要民主啊！他还说：“国民党也会来参加我们的政府，这不简单，与国民党办事不好办，但非办不可。”就是说，非这样作不行了。军队不能够在党领导下。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会脱离国民党”，可笑不可笑呢？说我们共产党员也要脱离军队。(王力：全民国家！)说：“相信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领导”。竟有这样荒谬的观点。这说明，他相信国民党军队可以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我们的军队也可以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是国民党要吞并我们的军队。他说，政协会议以后，参加政协会的人，很有风头”，军队“显示不出其重要了”。虽然他也说没有军队出不了风头，可是他又说什么七君子等人出风头，这些人有什么军队嘛？所以说，军队出不了风头了，是政协会议的人出风头了。他说，当时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是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使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我们了”。你看，这些不相信都是对的，但他却说这是“左倾”。他又说：“使那很多人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民主改革，不相信能和我们办民主建国，因而他不相信中国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他还看看觉得党的工作不必要转变。”这是由革命变成投降，丢掉武装搞议会。这是意大利和法国走的道路。

他还说：“觉得军队整编会整掉不去重视合法斗争，把自己限制在小的范围内”。就是搞议会斗争，把军队交出去，这叫做不是“小的范围内”了，这叫做不是“左的关门主义”了！我们军队没有党的领导，那还成什么人民解放军啊！他说：“党不直接给你们指示”，“只能简单的从报纸上，广播通讯社消息，了解党的方向，而不守纪律去做，更没有办法，那会失败的。”守纪律，什么纪律啊？国民党的纪律，不守国民党的纪律去搞，去听这个消息，这样从广播电台，广播通讯社，从报纸上，了解党的方向。他不了解，这么一搞，我们的报纸就根本出不成。可见他还比不上某些党外人士。他说：“左的关门主义在党内外一样，有些党外人士比我还左。”那倒是真的。他又说，这些党外人士“偏到一边去了。”就是指他们不相信蒋介石那一套，即上面说的那几个不相信。他还说：“我们要说服他们，好好去说服。”就是党外人士不愿意搞投降，他要去说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放战争中，他是根本没有什么作为的。他到西柏坡，按照他的一套搞土改，打倒一切(江青：搬石头。)另外一方面，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他在西柏坡有一个讲话，有记录。他在讲话里面，不但没有说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的党，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并且说我们要改组支部。说我们大家喜欢文化班就搞文化班。我们总支有三百多党员，如果都编入学习班，有的编入高级班，有的编入中级班，有的编入低级班。这就是支部组织的一个好方式。以后就不开小组会，开学习班的会，也就是开党的会。还说，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可以活泼一点，开一个钟头的会，演两个钟头的戏。(康生：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找了一个漂亮的歌女，开音乐舞蹈会，拿着个表，说你填表加入共产党吧，你加入共产党吧，进俱乐部给你个长年票，不要钱。)他还说，大家喜欢俱乐部，就把他变成俱乐部的会，没有戏班子就自己组织一下。我们很多同志喜欢唱，就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又演戏，大家可能要求一个月开两次三次。这样，就引起兴趣了。(王力：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天天晚上去干。)

我刚才讲的，大部分是解放以前的事。

解放以后，他在天津的讲话，是很有名的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就是他在王光美哥哥家里住的时候，同天津资本家的谈话，总之一句话，就是“剥削有功”。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主席在这里讲了在全国胜利，土地改革以后，国内还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矛盾。可是刘少奇在那个讲话中，全部抹煞了这个矛盾。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说，对资产阶级要限制。刘少奇说不需要限制资产阶级，而是要限制工人阶级。他的整篇讲话都是批评我们的错误。说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要限制它。对资产阶级歌颂备至，对工人阶级则贬低备至，说得不成样子。说没有资产阶级中国就不得了。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在全国胜利以后，没收的工业已经占优势了，占主要的大量的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反对限制资产阶级，反对限制资本主义。他也讲社会主义，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说以后要限制，也讲了一点限制，想办法限制一下，就可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的所谓限制是什么性质的限制？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限制，还是对资产阶级不利的限制？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限制和反限制，有斗争，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刘少奇这样讲，要限制一下，就是说要大量发展资本主义，他的限制，实质是限制社会主义，限制工人阶级。

刘少奇提出，“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要多少时间？他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很难具体讲，不过时间总会很长不会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等到了那个时候一定会具体地讲。”他给一个资本家宋棐卿(很有名的，参加政协会议后便跑到香港去

了，跑到巴西去了)讲，你现在几个工厂，将来还可以发展几个工厂，到社会主义了，还要给你管更多的工厂，还可以加你的薪，你干不干哪？宋说，为什么不干。刘少奇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把很多工厂交给资本家。他还对宋说：“你干就好，就是这个和平转变法。”这是转到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所谓“和平转变”，天津资本家要摸底，摸什么底，就是摸了这个底，摸到了资本主义的底。

刘少奇说他的政策“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心里的话了。他又说：“不只是工人要向资本家进行必要的斗争，就是资本家也要向工人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恰好是资产阶级所想的，要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毛主席经常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这也是马克思自己说过的。但是马克思发展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认为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进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从刘少奇的观点中，就可以了解到资产阶级所想的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斗争，就提倡资产阶级也要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大唱工人和资本家“平等”了，所以工人阶级可以向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也可以向工人阶级作斗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有个工人要求复工，资本家不同意，一个糊涂的工会的同志对资本家说：“你叫他复工就复工，叫他不复工就不复工。”这件事不知是真的假的。但是刘少奇觉得很好。这就是提倡资产阶级专政嘛。

关于工资问题，刘少奇是替资本家说话的，说工人吃个半饱，总比完全失业好些，总比完全没有吃的好些，提倡吃半饱。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底下做工，只能吃半饱。大家知道中国工人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却说吃半饱比没有吃好，他非常担心资产阶级的消灭。

总之，他全篇讲话，锋芒是对着工人阶级的，是对着社会主义的，他所讲的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是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宋斐卿这一个工厂不够，再发展几个工厂，将来搞社会主义，还交给他几个工厂，还加他的薪水。他问宋干不干？宋说干。但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以刘少奇的话为转移的。宋斐卿看到这个苗头，开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是刘拉进来的)，就溜掉了。

康老的意见很对，他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历来在党内有两种倾向。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这个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政权是资产阶级的，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论我国革命》中就讲到这个问题，讲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和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党，有一个很大的根本分歧；就是当时列宁主张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说工人没文化，不能搞社会主义。列宁驳斥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搞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再来搞文化呢！列宁说的是对的。孟什维克的意见是这样的，不是由一个革命阶段迅速地再转变到另一个阶段，而是停顿在一个阶段上、让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是这样主张，刘少奇也是这样主张。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条是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康生：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王明一直到刘少奇，还有陶里亚蒂都是这么一个问题。)(江青：一脉相同。)陈独秀、刘少奇加了一个，就是民主革命不能深入发展，要把中国重新回到老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点是不同的。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康生：这是真正的老修，这种理论出来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这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主席在摘桃子这篇文章中，批评有些同志把原子弹估计得了不起，看得神乎其神，指出这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

尘一样，经常扫除。灰尘是经常有的，刘少奇这个灰尘，是在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彻底暴露在群众面前，在我们党面前，现在是要扫除这个资产阶级的灰尘了。

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对资本家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反对农业合作化，主张单干，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主张单干是一贯的，没有变化的。如果是毛主席的意见在党内通过了，他也举手，那是一个形式。一九五一年，他就批评山西搞合作化，说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嘛，没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就不能搞社会主义。第一次互相合作的决议，就是对刘少奇的意见作斗争产生出来的。毛主席看到刘少奇对山西那个批语，发了很大的脾气，要搞出个文件。毛主席在根据地时，在民主革命阶段，就为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作准备。他提倡互助组，提倡变工队。在中央苏区，就提倡耕牛合作社。在陕北，大力提倡变工，变工是一个互助的形式。经过变工、互助，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过渡到合作社。这些，不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了，而且写上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可是，刘少奇好象根本没听过，没有见过，他的资产阶级本能，使他忘记，使他抵抗。刘少奇的这个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终归要暴露出来的。

这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写《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下决心把他公开给全党。过去主席讲过多少次，刘少奇是不准备搞社会主义的。我就听过主席讲过多少次。在搞《二十三条》的时候，毛主席发了很大的脾气。因为刘少奇要专毛主席的政。毛主席把宪法和党章端出来，说我有言论自由，党员可以在党内说话。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当时在四清运动中的错误。他那个错误是要把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否定毛主席的工作方法。他在吹嘘王光美的经验的时候，公开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这个记录落在我的手里。我和王力同志把一段改掉以后，他就不发了，当时我感觉到，他是为着这一点不发的。主要是改了这一段，他说这段改了不行，发下去变成严重的问题，不发了。(江青：我都听了。)(张春桥：各地都印了。)都印了。当时改，是想把他的胡说八道勾掉，结果他不接受。现在了解，桃园的经验是假的。(江青：那次他要反教条主义。要是不去像王光美那样蹲点，什么部长都不能当了。)所有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都不能当了。这里我要说公道话。康生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现，有一回说，我一定下去蹲点了。我说，为什么呢？康生同志说，唉！不蹲点，中央委员就当不成了嘛！(江青：发牢骚了！)(康生：是发牢骚。其实她那个广播，我根本没有听。)事实上，王光美并没有真正蹲点，说起来很可笑，什么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假的，学冯玉祥的办法罢了！冯玉祥请客吃窝窝头、小米稀饭，进去喝鸡汤。(江青：彭德怀也是这样！)刘少奇、王光美的这些是老的、腐朽的东西了，可是他在我们党内作为一个新发明。

总之，或者是刘少奇的路线胜利，或者是毛主席的路线胜利，就是说或者是资产阶级胜利，或者是无产阶级胜利。在我们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决定中国的命运。刘少奇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影响，错误地估计了他所代表的力量，他失败了，破产了，斗争还存在。但是我们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最大关键的时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弱软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刘少奇相反，他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为他的王光美、刘涛、刘萍萍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等这几个人，还有几个“联动”的小头头，这些力量大得不得了，而对我们毛主席藐视。他没有想到，他失败这么快。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很早，他没有来得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讲过要搞文化革命，但是没有像毛主席所提的这样内容的文化革命，他很早就死了，后来苏联没有搞。现在不管还有什么曲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胜利地前进，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掌舵，随时给我们指正方向，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这个革命正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历史。

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从什么问题表达出来呢？从对待群众的问题表达出来，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反对群众，镇压群众。毛主席这条路线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的同志们，从那里分别的？我想这个问题，只要到群众里面去就很清楚了。有些是不容易分别的，但是到群众里面去就能够分别了。

不要去搞阴谋，不要去搞自己的块块。有人在组织红卫兵成为御林军。李井泉在四川，搞了一个什么产业军（江青：近卫军）保卫他自己。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组织了什么赤卫军的野战兵团，保卫他自己。不要搞这些把戏。这些东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威力下，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都要彻底破产的。这些东西，一时看来力量很大、占优势，但没几天就垮台了。

斗争是反复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就是胜利，坚持同革命群众在一起，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的形势是清楚的，有一些人一下就夸大拥护他的人有多少，多大，但是真理不在他那边，而是在毛主席这边，是在拥护毛主席的同志这边，所以一击即溃。湖南的捍卫团垮台了。他这个造反派里边有两部分，一部分比较正派的，但是其中有个头头动摇了，在中间转来转去，摇摆来摇摆去，最后摇摆到哪里去？看我们的工作，看群众工作，终归我们可以争取大多数。能够争取大多数，现在我们从整个估计，是获得大多数，不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农业方面，工业方面，交通运输方面，现在都有很大的进步。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都好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要我们重新来研究。我们在各个方面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苏联已经倒退了，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在那里搞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现在苏维埃是世界的模范国家，但是，有可能新起来的国家把苏维埃抛到后边去。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但是我们要经常记住毛主席这句话：“戒骄戒躁”。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做的工作很少，无非是能够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我觉得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使我们中国建成为全世界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堕落下来了。

这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在军队的同志可能发生这个问题，不要因为反对我，或者对我有意见，就说他是反革命，反动，这个很危险。为什么主席提出，各省来谈判的，两方面的人都来，你说他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来，因为他不一定是反革命。如青海的问题，内蒙古的问题，就很清楚嘛，说他是“反革命”的是真正革命的，说他是革命的其实有个别的是真正的反革命，赵永夫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王逸伦也是暗藏下来的反革命。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分子，这是主席的思想，毛主席再三告诉我们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活动，不要以官的姿态，官的架子活动。我们现在有十七年的和平环境，的确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比较多，包括象我这样的人很容易同群众发生隔膜。发现问题，在工作中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必须在实践中，必须在群众中才能够做到。江青同志她就是深入接触实际，才发现了文艺界一塌糊涂，一大笔糊涂账。

文艺界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呢？象他们说话或者写文章，现在中国看的人还占少数，看戏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占多数，因为不识字的人也能看也能听。我们要通过文学艺术来教育群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业。象邓小平，对香港电影、美国电影有兴趣，这个事在一九六二年主席在北戴河就批评了的。（江青：一九六二年我到刘少奇那里去，我还说，中南海是人家的一块宣传基地。那时我还搞不清楚他，六四年我真正认识了他。）如果我们的文艺阵地让资产阶级占领，让帝国主义占领，让封建主义占领，让修正主义占领，那我们的头脑就要起变化。因为，它那一套习惯势力，比新的力量要大。这就是毛主席再三强调的。列宁也说过，旧的习惯势力非常强大。剥削阶级有几千年历史，经过几十年是不是可以完全把剥削阶级的文艺阵地攻破？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除此以外，教学制度的改革，

还有宣传、出版等一系列的工作，还在开头，还在摸索。

关于军队的问题，我就不说更多的话了。昨天我说过，我是你们的小学生，现在我还是讲这句真心话。在座的同志很多有丰富的经验，战斗的经验，但是小学生向先生说说话也可以的。就是说接近群众，懂得群众，又是很容易的，又是不容易的。所谓不容易就是旧的意识经常在我们脑子里起作用。譬如冲军区这个问题，群众没有想到人民的军队会向人民开枪，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那么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这是不可理解的嘛。所以，在内蒙古一开枪大家都回去了，不来了。主席告诉我们，群众到军区，要找军队谈判，证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是一种好现象，是一种好事。当然啦，这里面出现一些别扭的事情是可能的。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我们人民的军队不能随便向人民开枪，不能随便抓人。我说这个道理是普遍性的吧！昨天我批评一个同志说过，说是我有一件事妨碍他的计划，妨碍他抓人的计划，我就给他说，你要抓人嘛，如果是真正的坏人，回去还可以抓嘛，为什么一定要在大街上抓，这样丑化我们自己呢？回到单位去，让群众去识别，让群众扭送，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在那里抓呢？

再说一下阎红彦的问题。阎红彦是新交，我一九六〇年在医院开刀，他去看过我，我很感谢他。我无非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是听说群众冲了军区，要找阎红彦辩论，不管他那时在不在军区，出来一下就算了。我给他说，出来见一下群众，不要紧的。因为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我只问了他是不是阎红彦，后来的话是汪东兴同志代讲的，就这么两三句话。第二天早晨他就死掉了，留下一个遗书，说他的死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我的话完全是好意，不但是爱护军区，也是爱护阎红彦本人，是叫他出来一下，解一下围，见见群众，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不见！为什么我要再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这么一种人，怕群众怕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么两三句话，说是我逼死他的，我是叫你出来见群众嘛，有什么逼的问题呢？你可以不听嘛！问题是在群众运动高潮的面前过不了关，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抵抗，他从一个共产党员蜕化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在群众的威力下边，他没法子活下去了。他不能操纵军队，如果他能操纵军队，我看他是要开枪的。

我说个笑话，我经常接见群众，天天来的那些群众代表我一个都不认识的，比如象北航“红旗”，它的领袖名字，不久以前我才弄清楚，叫做韩爱晶。原先我不知道他是个英雄。但不管怎样，我们要相信一条，毛主席的指示，坏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是好人，相信这一条，我们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有坏人也可以暴露嘛。

我今天说的，过去也说过一次，这次做为补充吧。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萧华等第五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传信录 681》）

周恩来通过电话，召集安徽各群众组织代表及军管会主任钱钧等开会，要求停止召开“万炮齐轰严光，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不能把斗争矛头对准解放军，而应该是李葆华。（《传信录 682》）

在叶群、戚本禹的授意下，北航“红旗”再次发表“严正声明”，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

北京大学等十七个单位揪斗王光英。

杨成武召集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四人，由江青当面宣布成立以陈虹为组长，王育民为副组长的专案工作组，任务是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材料。陈等至上海，从警备区特别仓库中找到有关材料。其中有市公安局交保存的“通天”材料。经请示杨成武，于本月十七日携回北京。这件“通天”材料是 1954 年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江青历史是堕落的，当时的公安局进行了大量侦查，没有破案。这件材料就是这次侦查档案及在报章上收集的有关江青

解放前在上海时的剪报资料。

《百年潮》2003年第二期发表张薇君《江青与杨帆冤案》载：

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杨帆(原名石蕴华)，1939年曾奉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之命，写过一封有关蓝苹在上海的表现与被国民党拘捕的情况。由项英电报中央。电文中注明系当时上海地下党员殷扬所提供。1952年江青了解到殷扬即杨帆，开始进行报复。杨帆突然从在苏联医院疗养中调回，并在毫无说明的情况下，停止了他市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市政法委员等所有职务。公安部长罗瑞卿、副市长徐子荣找杨帆，说中央对他进行政治审查，主要交待：一、在江苏戏剧学校的历史；二、交代曾向延安发电，反映一位同志30年代在上海的情况的经过。杨帆在1955年被押至公安部，直至1965年8月，始判有期徒刑。1967年3月，江青又写条子给公安部长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时，杨帆正在秦城监狱监禁。

1967年4月12日深夜，江青和叶群等一起到京西宾馆，通过杨成武找来陈虹等四人当面宣布：“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现在我宣布，由陈虹任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搜集饶、潘、杨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并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后来，专案组没有搞出新材料。

由于4·11事件而对谢富治处理不满的“新北大公社”头目孙蓬一，召集万人大会，抨击谢富治为反革命两面派，并提出揪“摘桃派”。北京高等院校的两派斗争引起中央文革的严重关注。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五次接见各组织负责人，以解决分歧。北京大学内一些受聂派长期压制的师生也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与之对抗。

北航“红旗”再次发表声明：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

第八十一卷 1967年4月13日

4月13日

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同志和军委的同志要我在会议上讲一次话。我对于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都没有实践经验。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向解放军同志们学习。既然要我讲话，要我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那末，我就把一些不系统的想法提出来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第五条指出，必须“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支左最根本的就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就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斗争。林副主席讲过，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我觉得，军队支左正是我们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个好的机会。林副主席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军队支左就更要在运用毛主席著作上狠下功夫。因为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还是执行刘、邓的路线，这是划分左、中、右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我对于毛主席著作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是不够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系统的意见，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前次军级干部会议我讲过，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时，谈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当时毛主席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依靠群众，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必然依靠资产阶级，反对群众路线，反对阶级斗争，妄谈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讲，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着的。中国革命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存在，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的过渡阶段，必然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下面我想从几个问题上来谈一谈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一)

过去有一种说法，把刘少奇说成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譬如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如何正确，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对刘少奇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个决议不是毛主席写的，作为《毛泽东选集》的附录是不恰当的。征求过毛主席的意见，《毛泽东选集》将来再印行时，这个决议要抽掉。

刘少奇到底是不是一个“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模范”呢？我们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来看一看。毛主席一九三九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刘少奇是不是白区工作策略思想的一个模范呢？那么就看看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他的主张是什么？

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不是主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引导无产阶级放弃武装斗争，在城市工会工作中实行经济主义。一九二六年，他就说过：“工会为工人之经济组织”，“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其经济上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同的一个特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实际上是实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斗争。

再来看统一战线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是‘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问题上，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反对投降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企图。强调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恰恰又是背道而驰的。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行投降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他不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把统一战线看成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是要把人民的武装交给蒋介石去统一领导。早在一九三六年、三七年，他在北方局白区工作时，就用陶尚行的笔名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资产阶级的刊物上发表了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宣扬投降主义，主张把华北的人民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完全接受了王明的投降主义。因此，王明对陶尚行那篇文章大加赞赏，这不是偶然的。

再来看关于党的建设方面。毛主席说，“党的组织，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能够进行武装斗争的党，能够保持党的独立性并掌握统一战线的党。毛主席又说：“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因此，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要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组织。刘少奇的组织路线恰恰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背道而驰的，他是实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的、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志们看到的那份一九三六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几个人自首反共叛党的材料，就是刘少奇实行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的铁证。这正如中央在三月十六日关于这个问题的批语上指出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在自首投降出狱以后，由于刘少奇的包庇重用，“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的重要职位”。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才把这个叛徒集团揭露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叛徒集团，只是一个具体例子。在座的刘格平同志知道，薄一波出狱以后，刘少奇又派他到阎锡山那里去，贯彻刘少奇的叛徒路线，把太原第一监狱的一些人同样按照这个办法去自首叛变投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就是一个。过去杨尚昆那个办公厅的副主任龚子荣也是一个。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就明显地看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尖锐斗争，长期对立的。这是在基本问题上、原则问题上的对立。所以说，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只是在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而是很早就存在的，只不过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集中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罢了。

(二)

上面所说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设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人民政权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政权问题上，我们看一看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是如何表现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到一九三九年，民族危机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一直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一九三九年，正是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的逆流猖狂的时候，也正是蒋介石宣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号召全党全军全民积极投入革命战争，去争取胜利，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和倒行逆施，毛主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打退了国民党反党投降的逆流。同时，毛主席号召全国革命青年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消灭日寇，在思想上和在各方面准备打倒反动的卖国政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出席了延安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在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演。在这篇讲演中，毛主席告诉全国青年说：“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在这篇讲话中又说：“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毛主席告诉青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毛主席号召青年，必须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这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分界线。毛主席说，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是不算数的，要判断“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我觉得，毛主席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去支左，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支左，是真支左还是假支左，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是真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假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一个重要标准，就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要看对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的态度和关系怎么样。

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小册子。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毛主席说，这本书完全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天报上有很多文章，昨天陈伯达同志也讲过，我不详细说了。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谈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为了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四〇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本名著。我这里顺便说一句，毛主席并没有看过这本黑《修养》，只是在一些场合

中听到刘少奇一些谬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地、深刻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基本经验，揭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的规律，粉碎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且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这一本书，同刘少奇的黑《修养》针锋相对，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紧接着就提出“我们要建立新中国”。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领袖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个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明确地规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步骤，彻底地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路线，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把刘少奇的黑《修养》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两相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权问题就更加尖锐地提到面前来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毛主席指出中国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他说：“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是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呢？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这些话是有深远意义的，是针对党内的投降主义路线而讲的。我们过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总是有些糊涂，不是象林总所讲的那样，带着问题去学，对林总这句话体会不深。现在把刘少奇那些文件、讲话拿出来，再同毛主席著作中那一年，那一个问题上讲的一对比，事情就非常清楚。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基本原则问题上，的确是明显地对立着的。

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提醒大家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确定了。”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我们党正准备向蒋介石进行战争的过程中，象昨天总理所讲的，有一个插曲，就是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这个谈判的原因昨天总理已经讲了。毛主席率领代表团到重庆去谈判，方针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内战的阴谋，要揭破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同时也是为了我们争取备战的时间。现在我们看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文章中指出：“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毛主席又说，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以后，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他作了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文件，昨天伯达同志作了很好的批判，我不多重复。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大肆散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宣扬议会斗争，取消武装斗争，主张取消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人民的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他说：“军队也要整编，我们的军队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军、自卫队，我军的支部党委会、政治委员取消，在军队中是取消党的组织、整编，各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

统一于国防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要作到和国民党差不多。”

同志们，毛主席讲：“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刘少奇不仅是交一支枪、一粒子弹，而是把整个军队，整个党都出卖掉了。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去做，中国人民永远不会翻身，永远得不到解放。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破产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的大道阔步前进，终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在政权问题上，哪一条是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哪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

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国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在这个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斗争特别激烈，特别尖锐。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我们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报告。这一篇报告，最近毛主席还讲到，说看来有一些人对这个报告，对于二中全会决议，根本没有实行，也根本不想实行。今天必须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注意。所以，我就想谈一下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主席提出了要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这个报告，已经形成了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强调地指出，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将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提出这个基本问题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当时，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他教导我们全党警惕这些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来进攻我们的危险，要求我们同资产阶级作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在这个报告中，讲到人民解放军的问题，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今天来学习毛主席十八年前的这个指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现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又是生产队。毛主席在十八年以前，就是这样信任我们的解放军，相信我们的解放军，依靠我们的解放军。今天又给了我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这样极其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就要象林总所讲的，要勇敢地去实现这个任务，同时又要谦虚谨慎地来进行这个工作。因为，许多任务都是新的，没有经验。某一个时期，某些同志，某些地区，犯一点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在毛主席、林总的领导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军委的领导下，这些错误会立刻得到改正的。

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毛主席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这篇文章，人们是很熟悉的。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对内外的基本政策。毛主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我国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文章中又强调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人民手中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天津的那个亲戚王光英家里去，就是刘少奇称王光英为二哥，称王光英老婆为二嫂的那个家里去。在那里，他经常同一些大资本家混在一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资本家讲话。在此期间，他先后对天津市委、东亚毛纺厂职工、天津国营企业职员、工商业资本家、天津职工代表大会、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作了讲话，这些讲话，以及同年五月十九日，他从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主要论点是：

第一，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不是私人资本家工厂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第二，说什么工人阶级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工人阶级“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剥削他们一下，他们倒满舒服，如果不剥削他，他们就不舒服，觉得痛苦的很。”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要“多剥削”，“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这些，都是他那些文件上有的，不是我们造他的谣言。

刘少奇为了让资本家多剥削，宣扬应降低工人的工资。他说，“工资太高应该降低，使资本家能够维持赚些钱，使工厂可以发展，对工人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利”，如果“工资提的过高，……就要发生错误”。

第三，宣扬共产党员和工人要和资产阶级、资本家搞好关系，要向资本家投降。他说：“和资本家要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他还胡说：“关系搞好，又不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这一套投降的纲领的结论是什么呢？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就是刘少奇自己说的，“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也是中国的资本家青年时代的开始。他还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进步性”，应该让它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建立“功绩”。他猖狂地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这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公开反对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

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在一系列的报告中，不断重复上述论调，并且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说：“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同年十一月，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再一次鼓吹“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政协民主人士学习会上，又反复宣扬资本主义剥削“有进步作用，剥削得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苦得很”，“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等等。在那几年，他是大张旗鼓地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主席在二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

刘少奇不仅反对对城市、工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也反对农村合作化，反对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一九五一年七月，他

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咒骂说：“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文件已经印发给同志们了。

在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刘少奇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刘少奇在对东北农村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民，“不是富农、是中农”，应该“大大发展”，“在数年后应该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其中百分之十应是富农。”他胡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他反教条主义和赫鲁晓夫是一脉相承的。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土改报告中公然宣称，保护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护富农经济”。他所谓的发展资本主义、保护富农经济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恰恰是毛主席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刘少奇这种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完全违背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所以毛主席同这种反动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特别表现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那个讲话中。这个讲话，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彻底地批驳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讲话是针对刘少奇的，文件没有印发，我不妨念几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我们的各项工作，应当遵循总路线，为总路线服务，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错误。我们必须过渡，把社会主义看作‘遥遥无期’是不对的。过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图‘一步登天’也是不对的。”

“有的同志，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发展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有几种错误观点，是必须批驳的：

第一，有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第二，有同志指出，“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永远‘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大的错误，

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没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有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们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老是走不到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国营经济早已经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上面所说的是右倾性质的错误。”

现在把这个文件看一看，就会懂得当时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是针锋相对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着这种斗争，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在社会主义前进中的各个时期，都顽强地表现出来。

大家记得，一九五五年，当农村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邓子恢同志根据刘少奇反对合作化的错误思想，大砍农业合作社。全国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为此，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彻底批判了刘少奇、邓子恢的错误，推动了合作化高潮的发展，并且引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

一九五六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报告中，在有些问题上同苏共的“二十大”的修正主义黑潮相响应，在相当的程度上，支持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修正主义路线，报告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同刘少奇的反动主张相反，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月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今天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批驳和纠正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往后，同志们就更清楚了。一九六四年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今天正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在斗争中彻底破产。但是，他们并没有自动地退出舞台。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利用每一个时机进行反扑。

所有这些，都说明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象一条黑线一样，贯穿了各个时期，在每个时期都顽强地表现出来。

(四)

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生产水平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用生产力不发达和经济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而是一切老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共同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人们叫它作“生产力论”。按照这种“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还很分散落后，那么它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

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新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生产力如果还没有高度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那是没有用处的。这种“理论”存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种“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看不到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伟大促进作用。在他们看来，在生产水平还没有高度发展的地方，人民是没有资格，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点，我们查一查修正主义的著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举几个例子：

一八九九年，伯恩斯坦就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这样的思想。一九〇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的可能性。”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唯物史观》等书中，都一再重复这种滥调。特别是一九三〇年，考茨基在一本叫做《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书中，猖狂地攻击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诬蔑说，这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是犯了错误，使自己陷于绝境。他狂妄地说，按照我国的条件，根本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苏汉诺夫以及中国的陈独秀等等，都是继承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衣钵，虽然语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样的。

刘少奇的“理论”，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象昨天伯达同志所讲的，从中国来讲，他是同陈独秀一脉相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国际方面来讲，他是同老机会主义，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一脉相传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理论。

为了反对这种“理论”，列宁曾作过有力的斗争，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论战，彻底粉碎了这种反动的滥调。列宁强调指出，不是什么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是恰恰相反，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阵线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发展生产的伟大的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他反复阐明，俄国有布尔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有蕴藏着无比的革命创造力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取得政权以后，完全能够把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杂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我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上。这是很短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对于批判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帮助。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得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那些书本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列宁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从列宁的文章中，我们就更看到刚才引证的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是真正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方面，从夺取政权方面，从夺取了政权以后走什么道路方面，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最本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大家还记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讲过，延安的整风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

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与反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继承、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条是继承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五)

邓小平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他同样的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思想。

(一) 邓小平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一九五六年，他在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程的报告》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个人崇拜是一种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是恶毒攻击和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是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一年，他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样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了，明天也顾不住。”很明显，这是反对毛主席的，同时也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

(二) 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他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说：“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的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一九五八年四月，邓小平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说：“革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建设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我国正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在党内来说，是速度问题，并非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三) 攻击三面红旗，鼓吹单干，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一九五九年二月，邓小平在上海工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诬蔑大跃进是“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一九六一年十月在黑龙江省委汇报会上，邓小平攻击人民公社“超越”了阶段。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宣扬“三自一包”，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什么“前几年还可以看出优越性，这几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共青团三届十中全会上鼓吹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红卫兵已经画出漫画了，一个白猫，一个黑猫，拉着车子，他在上面坐着。

(四) 反对政治挂帅。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特别是去年二月间，他在薄一波召集的工交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政治挂帅的结果，一定要落脚到生产，落脚到科学实验。”他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讲的政治挂帅，他要经济挂帅，业务挂帅，政治挂帅和反对政治挂帅这不是一般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同军事、政治同经济、政治同业务的关系问题，不是一种工作安排或工作比重问题，这是一个彻底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邓是一脉相承的。

列宁反托洛茨基的时候，一九二二年写过《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其中有一句有名的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说，政治同经济比较

起来，政治是第一位。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知识。布哈林说，从政治出发也从经济出发。列宁驳斥说，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列宁还提出工会工作如果不是政治挂帅，我们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

毛主席在政治挂帅这个问题上，应当说是更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政治同军事的关系、政治同科学的关系、政治同业务的关系、政治同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明确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这个问题上，林副主席高度地发挥和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这个思想。

在我军中，到底是业务挂帅还是政治挂帅，这成为军队中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主要问题。因为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行业、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挂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去占领各种阵地，资本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正因为这样，要不要政治挂帅就成为能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对于每个同志来讲，就成为能不能永远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战士的问题。

所谓挂帅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挂帅的问题。我们讲的政治挂帅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帅，而他们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所以讲他们不政治挂帅，是指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从老修正主义一直到刘少奇、邓小平，都是这样。

一切修正主义者，在军事建设方面，都是反对人的因素第一，反对政治第一，都是宣传唯武器论的。考茨基曾经讲过，在现在枪炮技术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每天在宣传“唯核武器论”，说什么核武器的条件下，人的因素已失去作用了，说我们的民兵“等于一堆肉”，说原子武器可以毁灭人类、毁灭世界，而不是人类能够利用原子科学为人类服务。罗瑞卿、贺龙等人也就是这种修正主义、唯武器论的代表。他们强调军事技术，搞大比武，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解放军、我们党同罗瑞卿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修正主义在经济工作中，大肆宣扬利润原则，“利润刺激论”，“物质刺激论”。苏联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到农业，天天喊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样就使修正主义泛滥，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理论基础。刘少奇、邓小平也是物质刺激、利润刺激的贩卖者。刘少奇早在白区工作时，就实行一套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工业方面，希望经济部门的同志，检查一下刘少奇、邓小平所散布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我们在反对刘、邓路线中，必须强调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的支左工作，首先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支左、支工、支农，一切工作应当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去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从内蒙古的工作中看到，军队的个别同志有一种误解。革命群众最近提出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的刘、邓路线和坚持刘、邓路线的人在一月、二月的新反扑。但这个问题军队有些同志不了解，以为这是攻击军队，这完全是弄错了。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军队，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应当同革命群众以及革命组织一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我们支左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真支左假支左最重要的标准，是真夺权假夺权最重要的标准，是真拥护毛主席假拥护毛主席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很好地注意。希望同志们很好理解。为什么一月二十三日的支左五条中，最后着重讲一条，就是在全军中不是一般地而是深入地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

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离开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所谓支左，离开这个问题，就一定要犯大错误。这一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都是讲过的。我们在这一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有些地方犯了错误，但这不是主流。有些好同志还没有完全把毛主席这个思想掌握好，犯了错误，经过批评教育，是容易改正的。至于象赵永夫那种人，也会在运动中暴露出来。毛主席再三讲过，我们解放军不能因为在个别的问题、个别的时间、个别的地方，犯了一些错误，就灰溜溜的。我们应当执行林副主席上次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坚决地、勇敢地、有充分信心地去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伟大任务。毛主席、党中央，全党相信解放军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相信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已经有，而且将来更会有这种信心，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正个别地方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传信录683》）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中发(67)126号

一、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至于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担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三、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

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

六、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引导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样的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

到本单位去参加。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

七、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八、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坚持贯彻执行。

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傅崇碧等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戚说：中学生最近打得很厉害。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大方向是错误的。李钟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现在满街是李钟奇的大字报，我们不赞成。（《传信录 685》）

第八十二卷 1967年4月14日至15日

4月14日

康生指示聂元梓，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问题。并亲署证明，“望有关方面给看必要的材料”。“新北大”奉命成立“揪叛徒兵团”（即“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罗织成“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胡仁奎、李伦特务案”。并将组建情况报送康生、谢富治，受到公安部副部长李震的接见。先是“新北大”第二战斗队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狼狈为奸，胡、李从彭、薄处获得情报，向蒋介石汇报；彭真通过胡、李，与蒋介石勾结，进行投敌叛国活动。解放后，胡、李在彭等长期包庇下，窃据要位，潜伏下来，成为一大隐患。彭真因此于1968年7月9日被定为大特务，被捕入狱。

刘少奇就4月6日中南海“卫东”革命造反派的紧急通知，对戚本禹文章所提问题作了六点答复，说明1962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帮助修改的。前者即康生，后者即陈伯达。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地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的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不是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办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了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

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心平气和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后，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了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也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是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

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他气势汹汹地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铸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压是可以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以为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这是一批人，他们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的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

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的时候讲：“上海很有希望。”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谈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因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们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的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真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了，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它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上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个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校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作装卸工人。开始，有些人耽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就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一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主要的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们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就是几个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你说这几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也不见得，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是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是那些局长、党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旬，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竟属于哪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

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什么时候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求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象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他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

再讲一个对待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局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市委在开头就利用上海市委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利用毛主席领导批判《海瑞罢官》时造成的好影响，迷惑了群众，迷惑了干部。又强调“组织纪律性”啊，“内外有别”啊，害了很多干部、好多党团员。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解放这批干部，是干部问题，也是群众问题。究竟实行什么路线呢？能包办代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几个人关在小房子里搞“三结合”，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施令是没人听的。“三结合”，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革命的斗争过程。对干部来说，是干部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过程，斗争的过程，不能随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特别是有一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哪些人要打倒，哪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江青同志上次讲话中说到了陈丕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是难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谈到了，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对他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还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必要时，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的很大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唉呀！前一段上海文化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的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个饶漱石。（江青：江渭清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坚决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完全可以出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他可以很主动，但后来越陷越深，没办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的话都告诉他了。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这个人，我们过去也了解一点，但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以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

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的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发出来了，《紧急通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制不能改变，谁违反要以反革命论处，但他在十一日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十六日他还给“革会”签发一万块钱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手表、金子等转移到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犯罪的行为。他到处藏，最后藏到那里，我给他打了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怕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了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每个人的花样也不能相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总觉得他过去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对革命有利。但到现在毫无结果。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一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可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事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识？让他在小会上检查，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地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同刘少奇、邓小平，同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副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许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一是解决了陈丕显、曹荻秋向群众检讨的问题，给他们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限。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们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真正是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一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现在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一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比较好的一种方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子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而是发动了广大群众、发动了广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干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

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他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是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路各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以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哪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一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确实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分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大难的。我们自己也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边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派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为保证 4·15 召开的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常进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周恩来亲飞广州，在中山纪念堂作了长篇讲话，就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发展以及联合通知的内容，作了说明。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所以错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他们都要保持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传信录 688》）同日，周恩来又召集北京外贸学院造反派来穗人员及各总公司革命干部、群众代表，宣布对交易会军管。（《传信录 689》）

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接见北大、清华、地质等院校代表，听取 4·11 情况的汇报（北大与地院冲突及邮电“东方红”在邮电大楼武斗）。江青讲话：指责现在斗争的矛头不集中，并有人指向解放军（贴谢富治、李钟奇、郑维山的大字报），她要求各校进行整风，加强三性。（《传信录 690》）

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接见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戚本禹说：中学当前的任务是大批判。

戚本禹、谢富治、傅崇碧接见北京长途电信局人员，就电报大楼武斗问题对

两派群众组织作了讲话，戚批评北邮“红电”不欢迎军管，是错误的。（《传信录 692》）

傅崇碧在支左、军训的解放军干部会上讲话：我们一共训练了 338 所学校（其中 9 所大学），学生 31 万余，有成绩。问题是一、军训时间有超过四小时，太长；二、推行大联合过急，有的组织解散了；三、选举中红代会包办。计划拟于 20 日撤出。现在要作好收尾工作。（《传信录 693》）

谭震林召集三十多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开会，说：这是总理要我召见的，陈毅也召集这样的会。“我这次在二月逆流中确实是赤膊上阵”。“我的错误有两条：（1）不相信群众；（2）对老干部有感情，到处去保他们。”

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发表声明，提出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地院、清华、矿院贴出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

中央文革批准邮电学院“东方红”组织揪斗胡乔木，彭真、周扬、吴冷西陪斗。会上，胡乔木供认刘少奇说过：光绪是爱国的，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

财政部 18 个单位联合开会，炮轰李先念。

清华大学“8·8”派正式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派”（简称“团派”）与“4·14”派，相互对立。

山西太原造反派形成两派公开对立（4.14 事件）。“红总站”以杨承效为首，支持刘格平，要求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刘芝兰（均系与刘格平联名于 1 月 9 日写大字报揭发省级高干者）；另一派则为支持刘、陈、刘，其后台实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的“红联站”。从此两派武斗不休。

戚本禹宣布：遇罗克的《出身论》一文，是反动文章。

4月 15 日

陈伯达指示，要写一系列大文章批判刘少奇，初步准备 24 个内容。

《人民日报》以《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为题发表社论。

四川武斗形势严重，“产业军”扬言：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

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说：十月五日紧急指示中写了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刘志坚加的。冲击军区的事件大概有二十多起。同日，周恩来还接见了广州市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说：赵紫阳让权是一个阴谋。（《传信录 694、695》）

第八十三卷 1967年4月16日至20日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

4月16日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接见中学代表，先后讲话，要求停止学校与学校内部不断的武斗。青年人坐不下去，到处想串串，不愿做本单位艰苦的斗批改任务。希望大家回去整风。武汉与成都，情况还比较严重，需要冲。(《传信录 698》)

军内造反派连续两天抄查徐向前家。徐向前避居西山，得免揪斗。

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等接见大专院校代表。江青指责各校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地院开了六部车去打架。还把矛头对准解放军。

王力、关锋、杨成武、萧华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等造反派。关锋讲话说：听说大家要成立粉碎军内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筹备会，要开大会，揪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样搞不好。贴大标语：“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我不赞成。(《传信录 699》)

戚本禹在中国京剧院讲话，宣布成立以周荣国(北京军区军训部长)为首，有钱浩梁、杜近芳参加的临时三结合领导班子，抓紧排演“平原游击队”一剧。(《传信录 700》)

部分军事院校造反派一度接管了国防部三座门接待站。

4月17日

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发布致呼市各群众组织及内蒙驻军的信。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

给呼和浩特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指战员同志们的信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指战员同志们：

(一) 中共中央四月十三日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一切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同志，一切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团结起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内蒙问题的决定。

(二) 一切受蒙蔽的人，应当擦亮眼睛，不要再受坏人的挑动，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这一小撮人，要同个别煽动对抗中央决定的坏人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三) 中央已经正确地处理了内蒙问题，内蒙各方面到北京来反映情况的人，都应当迅速返回内蒙。各方面都不要继续派人到北京来，更不得拦阻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产。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

军委发布电令，军内人员立即停止串连。

林副主席签发文件 军委发电

关于重申到外地串连的通知

各军区、军兵种、院校(文革秘):

关于停止到外地串连问题，中共中央二月十九日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二月二十八日关于外出串连人员现令返回本单位通知，都有明确规定，最近发现某些院校、文艺团体，又有少数人员未经批准擅自来京和到外地去，这样对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利的，各单位应将上述规定时间所有人员重新进行教育，确实执行，已外出人员应动员他们立即返回，今后个别确有必要外出人员，一定按二月十八日军委通知规定执行，经上级批准，应立即向全体人员传达。

聂荣臻、肖华、杨成武、江青已阅，陈伯达、叶剑英、徐向前、粟裕、周总理已阅。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

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萧华、杨成武、叶群、姚文元等接见四川赴京代表，听取被打击的群众反映情况。(《传信录 701》)

姚文元给徐景贤传达中央文革对当前运动的意见：

1. 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一文是交上海写，要结合《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 25 周年来写。
2. 红代会的方向一定要坚持，把自下而上的工作做得充分些，条件成熟些。
3. 要注意“联动”的活动，对“联动”要打击一小撮，瓦解组织，争取群众。刘邓包庇了“联动”，“联动”的后台就是刘邓。
4. 红卫兵不要只注意上街，要回到学校去，市六女中的方向和经验是毛主席肯定的。全国大串连不要再突破了，要把住关口，斗批改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学生一定要按照学校大联合。要告诉同学们，把一个单位搞好了，就对革命有贡献了。
5. 要注意运动还会有反复。军委十条颁布后，无政府主义又有些抬头，要学习《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作一些批评。
6. 本来《红旗》杂志准备发表《反击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现改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
7. 关于陈毅，不要打乱主席的战略部署。全国要集中批刘邓，上海要集中批判陈、曹。刘少奇极不老实，不服罪，说什么现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篇文章能驳倒我。江青同志反驳说：一定要驳倒。
8. 文艺院校的斗批改也要提到日程上来了。现在，《江姐》在改，改成《山城血光》。原来描写地下斗争主题改为描写武装斗争的主题。在北京五月份上演。
9. 江青同志说：斗批改提到日程上来了。斗批改是积极的，批改比斗更难些。要搞批改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靠谁来批改？搞好批改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

关锋在空军司令部对介入的学生组织(北航)谈话，不要盲目支援。空军文工团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吴法宪同志政治上是可以相信的。(《传信录 702》)

外事口群众 700 余人去中南海揪陈毅，未果。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了批陈联络站，提出不要去揪陈毅，不要去外交部串连。陈毅说过许多不适当的话(戚本禹：是反动的话)，可以要求陈毅到群众中去。(《传信录 703》)

北大、清华造反派在四机部斗争四机部副部长王光英(王光美之兄)。

4月18日

北航“红旗”韩爱晶在红代会上传达了陈伯达的电话指示：北京最近发生打架的事情、揪人的事情很多，很不好。现在大大地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希望你们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前几天的讲话都是有效的，北京的大专学校不能乱来，不考虑无产阶级的纪律。我是很郑重地提出这个意见的，希望你们帮忙向本校和其他学校多做工作。前几天，我们说过北京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模范首都。什么叫关心国家大事呢？反对无政府主义，这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做工作。你们不要往外面再多派人，防止被别人利用。到外地去的联络员，除了中央批准的以外，都撤回来。大家都遵守中央的决定，回来。不然要犯很大的错误。我那天说过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这条标语应该上街。江青也指示：现在内战多，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斗、批、改放在一边。各校要整风，加强三性。从此，各院校开始了所谓的整风运动。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大批判中积极支持干部起来革命》。鼓励“革命干部”“杀”出来。

《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

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生产问题作了讲话。

谢富治召集红代会所属院校负责人开会，说现在武斗已发展到工人中了，城建公司几千人打架。必须大反无政府主义。在外地的学生，除去青海的5·1以前撤回外，其余的都立即撤回来。（《传信录705》）

关锋、杨成武、萧华接见聚集在国防科委已三天的“炮轰国防科委联络站”及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的造反派，并先后讲话。要求端正大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刘邓。聂荣臻、路扬是站在毛、林一边的。魏思文是三反分子无疑。（《传信录706》）

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东群众组织与驻军代表的座谈会上，转述了毛泽东的讲话：今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全国29个省大概分五种情况：（1）已经夺权的（5个）；（2）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北京、天津两个；（3）曾夺权，但搞错了或有严重错误，通过军管解决（如广东等）；（4）直接军管解决；（5）尚待解决。（《传信录707》）

4月19日

毛泽东接见谢富治，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问题，指示说：“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写宣言了。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輩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机会主义的乘方。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的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的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汇报会，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对武汉情况的汇报。会上，江青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最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周恩来最后提议：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

击武汉军区。中央文革当即决定，由戚本禹在二十一日负责接见。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高等军事学院进行军事管制。

关于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广化同志为副主任。

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高等军事学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二、高等军事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学、行政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命令》、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其他有关的指示、规定。

三、高等军事学院的群众组织，要认真进行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务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地制止武斗。如再发生武斗，应对凶手及其主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理。

四、高等军事学院的警卫、通信和运输分队统归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挥，有线广播设备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五、全体人员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坚守岗位，积极工作，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良好的革命秩序。对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和决定，必须坚持执行。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

4月20日

毛泽东指示：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有人反映：“现在号召斗、批、改，有人屁股坐不住”）。主席说：要学生坐得住，要到夏天。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谢富治、副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在庆祝大会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林彪、党中央、国务院讲话庆贺。江青也在会上讲话，说：“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人民日报》刊载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实况。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节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住地，在伟大祖国的心脏，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在世界革命人民仰望的革命灯塔——北京，今天传出了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喜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个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胜利地诞生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谢富治同志，副主任委员是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

元梓四位同志。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宣告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据点——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彻底垮台了，它宣告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倒台了。这是继毛主席和党中央一九六六年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之后，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一个新的伟大的飞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把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我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它证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课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创造了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增添了不朽的篇章。

今天，首都全城沸腾，数百万革命群众沉浸在火热的革命气氛和节日般的欢乐之中。有十万多参加的在工人体育场隆重举行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是全城欢腾的中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到会热烈祝贺，宣布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且作了重要讲话。首都无产阶级和全市革命群众，无限感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他们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一系列伟大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说，在这个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周恩来同志说，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在夺权后要充分重视政权的加强和巩固，真正地掌好权，用好权。

周恩来同志强调说，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必须紧紧地把握住。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遵守毛主席的教导，珍视你们的胜利果实，加强你们的责任感，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已经夺得的权力，让毛主席住的首都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永葆青春，永不变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成员叶群等同志，也参加了今天的大会。

大会在《东方红》雄壮乐曲声中开始。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富治同志，代表革命委员会在大会上首先讲话。

大会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热烈欢呼声中，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代表徐铠，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代表张桂福，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代表傅崇碧，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蒯大富，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

代表李冬民，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他们共同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专程前来北京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五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代表团成员中，有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陈琳瑚、李再含、李立、何光宇、潘复生、汪家道、张万春、王效禹、陈雷、王文俗等同志。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同志，代表出席大会的五个省市的代表团讲话。他说：

北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走在战斗的最前列，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斗争高潮中。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正在全国兴起。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大的鼓舞。我们深信，这个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一定能够领导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走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前列，对夺取北京市和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更出色的贡献，一定能够把我们伟大的首都，建设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永不变色，成为全国的模范，世界的榜样。

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我们是在一条战壕里向共同的敌人作战。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肩并肩地奋勇前进！

接着，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向大会赠送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〇年亲临黑龙江省视察时，为黑龙江省广大革命群众的亲笔题词的复制品。

今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常委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常委，有刘锡昌、徐铠、王景瑞、鲁文阁、苗永昆、邓万田、罗瑞华、张桂福、黄作珍、刘绍文、范普权、牟立善、谭厚兰、蒯大富、韩爱晶、李冬民、周景方、刘建勋、丁国珏、高扬文、牛连璧、涂武生。

大会最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国际歌》的雄壮乐曲声中胜利结束。

(新华社 1967 年 4 月 20 日讯，载 4 月 21 日《人民日报》)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信。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斗争、大批判中，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大胜利！

在这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歌唱，千万颗红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啊，毛主席！当我们回顾我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的时候，千言万语倾诉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忠诚，千歌万曲表达不出我们对您的热情歌颂，浩荡的大海容纳不下我们对您的无限崇敬和无限热爱。

是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您点燃了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

是您指挥中国工农红军跨过万水千山，实现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是您在永垂史册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奠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基础；

是您在革命圣地延安，指引着抗日战争前进的方向；

是您统帅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开进北京，为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春天；

是您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缔造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

在那漫长的战斗岁月里，在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征途中，您带领我们战胜了一个个的艰难险阻，闯过了一道道的惊涛骇浪，使灾难深重的祖国从黑暗走向光明，象巨人一样地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给世界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象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道路。

毛主席啊，毛主席！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率领我们开始了新的长征。

是您揭开了旧北京市委、市人委的黑幕，粉碎了隐藏在那里的一小撮野心家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

是您亲自决定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是您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拨正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是您英明地发现和热情地支持了威震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在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红卫兵小将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建了不朽的功勋；

是您在北京检阅了来自祖国五湖四海一千多万文化革命大军，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是您在北京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进军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是您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伟大战役的进军号。

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一幅幅惊心动魄的雄图，描绘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灿烂前景，谱写出您的光辉思想的颂歌，书写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雄壮的篇章，开创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旧北京市委、市人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包庇下，把北京市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变成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基础。十几年来，他们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目睹他们的滔天罪行，我们怎么能不愤怒？！怎么能不造反？！怎么能不夺权？！我们怀着誓死保卫您，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决心，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动了猛烈攻势。当我们刚刚打出第一发炮弹的时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在我们伟大的首都扼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捍卫您的光辉思想，为了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揭出这条反动路线的炮制者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冲破了重重阻力，扫清了层层障碍，斩钉截铁，下定决心：坚决把旧北京市委、市人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打倒！坚决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扔到历史垃圾堆！我们决心把对党内头号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结合起来，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不死，妄图翻案；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进行反攻倒算，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他们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要牢记您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高举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把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精心炮制的大毒草《修养》批倒，批垮，斗臭，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坚决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使命，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敬爱的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是您提出来的伟大方针，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一定要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革命统帅生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一个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誓夺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坚决执行和捍卫您提出来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我们要在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中，在彻底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我们要坚决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伪装“革命”，妄图钻进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我们一定要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召。这是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人民解放军是您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要坚决粉碎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阴谋。我们一定要好好向解放军学习，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活动，把人民的首都建设得象磐石一样的牢固，象钢铁一样的坚强。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您是我们最英明的舵手，我们永远跟着您闹革命，永远跟着您在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谁敢反对您，谁敢诋毁您的光辉思想，谁敢对抗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就造他的反，就把他打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一定要把“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当作座右铭来学，在灵魂深处开展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大夺头脑中“私”字的权。我们一定遵循您的教导，边战斗，边整风。我们要大反无政府主义，彻底克服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队伍。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希望和灯塔。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信心百倍，斗志昂扬，一定要把北京建设成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最红最红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城市，建设成世界上反帝反修的社会主义红色堡垒。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周恩来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市的工人、贫下中农、大中学革命师生、机关革命干部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挥员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三个月的积极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

会今天宣告正式成立，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住地，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

自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幕和阴谋，这就胜利地揭开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学聂元梓七同志写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

在北京，毛主席在亲自主持的党的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全会并发表了公报，从此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

北京的中学是震撼世界的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毛主席的热情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特别是在去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以后，红卫兵小将们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到处串连，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从去年八月到十一月，毛主席接见了一千二百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军民一体，老少一堂，使我们伟大的首都成为全国向往和全世界注视的中心。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的号召，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你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你们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优势，在组织上也取得优势。

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动员起来，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掌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无产阶级专政更不容易。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把北京市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披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外衣，暗地里却在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路线。他们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个教训，在夺权后要充分重视政权的加强和巩固，真正地掌好权，用好权。

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流毒，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阵地上得到贯彻执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促进

广大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在狠抓革命的同时，也要大促生产。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而且在经济建设和科学领域的领域里，也放出光彩。

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们要夺取今年的丰收，要争取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提高，要攀登科学新的高峰。在这方面，北京对于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一定要在思想革命化的前提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度的计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牢固而又发展的基础，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要战略方针。

毛主席在全国胜利的前夜教导我们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遵守毛主席的教导，珍视你们的胜利果实，加强你们的责任感，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已经夺得的权力，让毛主席住的首都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永葆青春，永不变色。

最后，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红卫兵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工、农、兵、学、革命干部同志们，战友们，红卫们小将们：

你们好！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热烈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的敬礼！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新的胜利，起着重大的影响。在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大学红卫兵代表会议、中学红卫兵代表会议以后，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联合起来，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谢富治同志的讲话很好。我只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拥军爱民的问题。

目前全国的形势，总的方面说来是很好的，是大好的。这个大好形势是毛主席领导着我们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结果，也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的结果。

但是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有反复的。这是正常的现象。绝对平衡的事情，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没有反复，那是很少的事情。经过反复的较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的较量、搏斗，才能锻炼我们。没有反复，怎么能锻炼我们。反复，不是坏事。

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同时按各地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代表，是北京市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十七年来，他们在各个方面，提出了并且顽固地坚持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本单位的斗批改，和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工作，是不矛盾的，是可以统一的。对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可以有力地带动各单位的斗、批、改。而各单位的斗、批、改，又可以更充分地揭露、更深入地批判党内的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各个战线上散布的毒素。这就要动脑筋，好好地想一想。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地做调查工作、研究工作。就需要冷静，能够坐到板凳上去商量商量，而不是天天吵嘴，更不是动起拳头打架。

这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每个单位，都需要建立革命的领导机构。当然，也有的单位，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基本上还好，就不必去夺权了。但是，差不多的单位都要搞革命的大联合，都要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本单位的临时权力机构。如果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你如何去斗批改？谁领导？对不对？

同志们想了这个问题没有？有的同学，只想到这里去串串，到那里去冲冲，那个劲头大。但是，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百年大计！这样想一想，就会增加同志们的责任感！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同志们一块，学习同志们好的经验，然后再来帮助同志们。

我们这一年来是共患难、同甘苦的战友。我希望在斗批改这个问题上，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不要转移了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踏踏实实地驳倒他们。对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揭发和批判。

自从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坚决支持，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五项工作，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大量的力量，干部、战士做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初步的成绩。

对军队，不管是谁，有意见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给他本人，也可以向上级甚至中央反映。但是，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革命群众要正确地对待军队，要拥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一月二十八号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

军队也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要爱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现在，四月六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

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如果用这个十条命令去破坏那个八条命令，那就错啦。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一个是怕同志们犯错误，另外怕坏人利用。因此，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地提出拥军爱民的号召。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我们要善于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混淆两类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各个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去正确地处理，不能把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组织和群众打成反革命，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更不要武斗。

同志们，我们希望，北京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把北京市建设成为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红卫兵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人们盼望已久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宣告成立。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始终是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在这全北京市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刻，让我们大家一起，衷心祝愿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今天，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出席了我们的大会。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建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参加了革命的“三结合”，从各个方面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让我们向他们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实现了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这些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远道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支持我们。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首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长期的英雄斗争的结果。

北京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所在地。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着全世界，照耀着全中国，照耀着伟大祖国的首都。但是，被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下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庇护和支持下，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地攻击、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和破坏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一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各个方面的工作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一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宣传工具大放修正主义的毒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在京剧、舞剧、交响乐的革命中，他们百般刁难和攻击江青同志。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一再抗拒毛主席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长期按兵不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又不准北京的报纸转载，也不准发行单行本，还攻击上海的革命同志。他们一贯实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安插亲信，重用坏人，包

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一贯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封锁，把北京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变成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基地。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骑在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大恶霸，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经常在干部中肉麻地吹嘘自己，为篡党、篡国制造舆论。事实上，旧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投降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抗日战争初期，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晋察冀边区执行的是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东北变本加厉地继续执行王明路线，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反对林彪同志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

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国际活动中，也背着中央散布了许多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美化资产阶级，美化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言论。他吹捧叛徒铁托和赫鲁晓夫，吹捧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干了许多投降主义的勾当。

现在查明，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在狱中自首变节，出卖同志。这个叛徒，后来又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互勾结，包庇重用一批叛徒，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挖出了我们党内的这个大叛徒集团，是一个丰功伟绩。

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一再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抗拒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的地下活动，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正是在他们进行这些反党阴谋活动的时候，他们的黑手被抓住了。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一举摧毁了“三家村”黑店，直捣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巢，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发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及时作出改组北京旧市委、组织新市委的决定，得到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大推动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接控制之下进行的，他们把北京变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地。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保护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斗争锋芒对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它推到夭折的边缘，并且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全国。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回到北京，挽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重新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当红卫兵和大串连这类的新事物，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就给以坚决的支持。首都红卫兵对全国各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在北京，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精神，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

恐怖，打退了它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斗争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过十分尖锐、十分复杂和曲折的斗争，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

上海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下而上地开展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酝酿、协商，分别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革命职工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和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了北京市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欢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全国的政权以后，资产阶级的反抗必然要增强十倍，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的政治能量还很大，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相当的优势。因此，无产阶级能否保持和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极端重要的新课题。这个问题，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通过“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了，在苏联和其它一些国家也复辟了。我国从一九四九年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同资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斗争。例如，一九五四年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一九五九年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改变所有制方面，有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斗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以及思想文化战线上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决战，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发动亿万群众起来革命，从下而上地对混到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一次大扫荡，大扫除。只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极其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极其伟大的魄力，才能够发动这样规模巨大的，惊天动地的群众运动。夺权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只有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把政权掌握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这种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斗争，就是保卫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不仅现在必需，以后也还会有。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同马克思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列宁建立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的学说同样重要，同样伟大。

现在，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掀起一个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大决战。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国修正主义的总头头。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骨干力量。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当前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这个大方向，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全面的批判，彻底清算和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流毒。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后台。我们要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把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夺回被他们篡夺去的一切阵地。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应该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这个共同目标下，并肩战斗，共同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林彪同志指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应该在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边战斗，边整风，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应该用开门整风的办法，主要是进行自我批评来解决。不应该因为有不同意见而打“内战”，搅乱了斗争的大方向，甚至被敌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大联合，大团结。我们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整风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不允许保守派借口大联合，来削弱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吞并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我们一定要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对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应该歧视他们，排斥他们。要在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耐心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一道闹革命。当然，对于反动组织，如“联动”之类，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同他们联合。对于这类组织和他们的头头，要实行专政，对他们的一般成员，则要分化瓦解、区别对待。

我们要结合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革命的“三结合”，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为基础，必须在革命群众斗争中逐步实现，那一些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对象，只能由革命群众来批准，不能自封。每一个革命的干部，都应该积极投入这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积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同他们划清界线，认真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考验。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支持一切愿意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样的革命的“三结合”，就可以防止坏人借口“三结合”，混水摸鱼，反攻倒算，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吴德、刘建勋等同志，已经开始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边。我们相信，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能经受考验，得到锻炼，继续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要通过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进一步发动群众，更好地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我们要通过这场革命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更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色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同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充分利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作为反面教员，从各个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战友们：在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完成一切任务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们的精神原子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首都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商店，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条街道，插遍首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要把人民的首都北京，建设成永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最红最红的革命城市。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央发布重申停止串连的通知。 中发(67)128号

最近，有少数学生和群众又开始到北京和其他地区进行串连，北京的一些学校又派人到外地串连。因此，中央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各地已经外出串连的，应当立即返回。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问题，应当尽量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解决，以免影响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运动和生产。

这一通知可以在城乡张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江青看到《文革快报》上登有中央文革驻武汉“记者”关于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 19 日会议指示的“情况反映”后，在上面批道：“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陈、钟在查明情况后，给中央文革写了书面报告，申述说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 19 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不准往下传达”的规定。记者所听到的，只是负责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话，并无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之意。

戚本禹在中央乐团讲话，指定成立有军代表领导，包括对立两派的领导班子，排演交响乐“沙家浜”。他说：你们的“改”就是演出“沙家浜”，一定要联合才能演出。（《传信录 713》）

第十二编 “为了孤立敌人”

第八十四卷 1967年4月21日至29日

4月21日

中央发布关于庆祝五一节的通知。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135号

[秘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通知

一、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战阶段到来。我们的一切宣传活动要围绕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应当宣传在大批判中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彻底肃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各个领域里的流毒，认真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大力地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二、今年的庆祝活动仍然照过去规定，采取分散纪念的办法，不搞全市性的大型集会游行，可在市内工厂、学校、机关分别或者联合举行小型的庆祝集会，各种游艺场所，可在节日开放并上演各种较好的文艺节目。

三、关于“五一”节外宾接待问题，另行通知。

四、节日里应当提高革命警惕性，国防前线要特别加强警戒，城市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严防地、富、反、右分子的破坏活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江青以武汉军区已传达19日中央文革会议的内容为由，派人没收了陈再道、钟汉华处的19日会议记录。且让人转告：不准再提19日的汇报；21日的接见亦取消。表示中央文革不再帮武汉军区做造反派的工作，对今后武汉军区的有关请示报告，也一概不予答复。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接见大、中学生代表。江青讲话，宣布将让“联动”公开，并接见他们。康生要求学生不要分4·3派、4·4派，要团结人。（《传信录714》）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萧华、江青等接见《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就新闻报导作了指示。（《传信录715》）

陈伯达与第一机床厂工人代表座谈。说：巴黎公社的选举就是要随时撤换。他要求代表第一机床厂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的李嘉才，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群众，出差要请假。可以当半年，不要当一辈子。（《传信录716》）

林立果（林彪之子）调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林当时还不是党员），与周宇驰、刘沛丰组成空军党委调查小组。

4月22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30名“联动”分子被释放。（《传信录718》）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了被释放的“联动”分子。毛泽东指示说：“要改造他们（指对“联动”那样的反动组织），要锻炼造反派。要瓦解这个反动组织，必须互相支援。”

周总理、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首长

接见被关押(扣留)的 140 多名“联动”分子的讲话

伯达：

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

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屈了你们。主席说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有个同学叫彭小蒙写了两次信给我，说刘万平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这个人，派了一个记者去了解一下。

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你们还半夜里出来喝酒，吃猫肉。你们关了多久了？(答：100 多天了，有的答两个月)，允许你们学习主席著作吗？(答：允许)虐待你们没有呀？(答：没有)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的不够！你们写过一副对联“为革命召之即来”，有点才气。你们回去以后，再恢复你们的组织。如北大附中的“红旗”，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伯达：

江青同志讲的很清楚了。毛主席下命令把你们放出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没做好。(江青同志插话：昨天和其他同学讲时未讲主席的命令，我们的意思是怕强加给你们)大家出去绝不能用主席的命令去压他们。你们犯的错误是很大的。在座的我和你们打过交道，也有西纠的。(江青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嘛。犯了错误会使今后谨慎些。避免犯错误了。你们“联动”是有思想基础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子好汉，老子反动儿子混蛋”。那时你们说有三万人，有的说有十万人要我辩论，我去了又没有辩论，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未答)你们当时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反动的思潮，是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有联系的，是从那里发出的？党内有部分干部长期在机关脱离群众，没有看到群众，有相当的人不了解群众。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特权阶层，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来很快就纠正了。不能包办代替嘛！毛主席从来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提倡包办代替，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他们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教训群众，结果使中国快亡了，这就是结果。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其中有你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这主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能记在你的，他的父母的帐上，要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看到阶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装起来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是个人的。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这点要充分警惕。刘少奇就是压制群众，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把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们提倡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也要高干子弟掌权。你们抄了刘邓的口号。江青说过这是封建的世袭制度。掌不掌权是看老百姓

姓是否授给你权，看你们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害了你们。我们见面少，对你们帮助少。听说你们搞了颓废的生活，养了毛驴，养了狗，八一学校搞得乱七八糟，学校破坏的厉害，破坏得多的是干部子弟学校。你们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劳动的，你们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窝窝头是哪里来的。你们接近群众太少，只在干部子弟中来来往往，要吃亏的。说了你们服气不服气(答：服气)不服气可以辩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给你们带来损害。现在有剥削阶级，同时有高薪阶层。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别是“八一”、“十一”等学校给你们很大害处，使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回过头来好，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并不是浪子，将来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回过头来很宝贵的，能不能成为宝贵的财富，要看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将来没犯错误的人不一定如你们，看你们的态度，但不是你们就对了。

对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样残暴的手段，你们是从旧的最坏的小说里学来的吧？我们过去没有用过什么揪砸，你们不是走一条正路。毛主席讲科学，讲实事求是。你们靠打砸抢怎样能搞好我们的事业，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在座的有些是上当的，有些同学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成了“联动”。

要好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这样是不是妥当，有没有污辱你们，(答：没有)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想潮。(江青同志插话，如果你们还要挂“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你们能够革命。)父母有问题不要紧，国家可以培养你们，他们不革命，你们可以革命嘛！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要给人家一个出路嘛！祖父母可能是大官僚，大军阀，父母可能就革命了嘛！要看实际行动，不能看父母的出身。不要把父母的功绩吃一辈子，他们做好事、做坏事是一回事，你们做好事、做坏事又是一回事。反动血统论是封建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江青同志插话：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主席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大家都在搞整风，你们可以回到学校去搞整风，灌输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批评，对你们来说，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你们过去犯的错误一笔勾销。(江青同志插话：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就可以回家去。)(众：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同志讲话：

我没有更多的话讲，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同意。毛主席的宽大政策，使我想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实在是幸福的。我经常这样想，年青要象你们这样，是真够幸福的，大家要珍惜爱惜这个幸福。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要有雄心壮志。今天毛主席的决定，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的伟大。(口号：毛主席万岁！)你们有没有革命的雄心壮志。(众答：有！)我也相信你们有，既然有，那么有没有勇气、敢不敢承认在过去短短的时间犯的错误。(答：敢)看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其中有一条就是勇于承认错误。过去我看医生，看他是否承认三个字，承认就是好医生。看了病不懂就说不懂；看懂了，没有把握搞好，就说不能，治错了敢不敢说不对。敢于说三个不字是好医生，不敢说三个不字，就不是好医生。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要敢于承认。第二、就是要敢改正错误，回去以后，有的人会说句把闲话，你们回去别人不会放鞭炮欢迎你们的。这个说闲话，那个说闲话，有的人不敢沾你们的边，怕说亲“联动”。有的时候还要打一打架。这些都阻碍你们改正错误，你们要做好准备，有勇敢精神。主席的政策是一看二帮。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有本领的人，不是不犯错误的，犯了就改正。犯了错误也是一个锻炼，只要你们改正，相信你们会革命的，可以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

周总理讲话：

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得很好。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江青同志插话：我们对西纠的评价是：西纠初期还是有功绩的，但后来就不象话了。)后来对你们管得就少了。过去责任尽得不够，今后我们帮助你们，不但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还有社会，今后加强我们的责任。我 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

家庭这关要过好。家庭有两种，一种是有的父母不赞成你们，骂你们甚至打你们，当然我们不赞成打罗！但生起气来打几下也是有的，你们要受得住，做错了自己承担责任；另一种是疼爱你们，溺爱你们，你们回去后，大哭一场不见得好，不要一回家温暖了，就旧病复发。将来准备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见一见，谈一谈。家庭这关要过好。

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还有一类家庭，父母犯了错误，被斗。那不要紧，你们是国家的财富，可以到公安部说一下，国家管你们，总会让你们学习的。

到学校那就更困难了，他们知道你们被捕过、拘留过，甚至有的同学把你们扭送到公安部。当然我们要做工作，你们也要做工作。不要因为过去他们扭送你们，回去后就报复；但也不要气馁。见了他们，既不自卑，也不要觉得了不起，好象我坐过监狱。要平心静气，叫别人感到诚恳，使同学们生不起气来。

不要请罪。请罪是封建主义的产物。错了改正就行了。要有自我批评，还要能听别人的批评。回去以后劝说有联动思想的孩子改过。这也是将功补过。你们受过拘留，自己改好了，还要说服他们改好。你们在学校里参加战斗组织，要成为表率，成为革命造反派。我和江青同志在二十日讲过“红卫兵”万岁！你们要把“红卫兵”光荣的旗帜再举起来！要真正举得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红卫兵”。把自己过去的过失补上。

(有的同学递条子，提到破四旧的问题)

周总理接着说：现在不必破四旧。好好读点书，谈一谈，做一点批评自我批评，把家庭、学校关系搞好。再过十天半个月后把你们的父母一起找来谈谈。过去谈得少，今后多谈一点把经验总结一下。

我们相信你们的绝大多数是会改好的。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跌了跤是有代价的，最后希望你们听我们全党、全国的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江青同志插话：

已发给红卫兵战士的文件，统统发给你们。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一个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

康生同志插话：

不要自封自己是老红卫兵，也不要自卑感。才十个月，有什么老啊！(康生同志见一个学生留有小胡子便说：把小胡子去掉。你们同意的话，我也把小胡子去掉。)

林彪对军委扩大会议电话指示：“关于正确对待群众”，在这次会议上，我本来想讲一讲群众路线的问题，加强大家对于群众的作用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解放以后，我军部队住在营房，干部住在机关，同群众的联系大大减少了。这次突然介入文化大革命，大量地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正确，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任务。这次发布的十条命令，就是为了保证搞好军队同群众的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问题的文章，使全军都能对群众树立正确的态度。我本来想讲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感冒了，不能够讲了，所以不要安排我讲话的时间了。大家讲话之后，请主席和同志们见见面，就可以结束这个会了。

这个电话记录，请萧华同志转告会议领导小组，并印发到会全体同志。

中共北京军区通知

全区师以上各级党委：

现将林副主席四月二十二日“口述对萧华同志的电话记录”转发给你们。

这是林副主席对大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也是对全军的最新指示。这一指示极为重要，极为适时，望你们接到立即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并紧密联系当前支左情况，深入讨论，进行检查，提出措施，坚决贯彻执行。要迅速将这一指示传达到全体干部和参加支左的全体同志，请各大单位把学习讨论贯彻的情况及时报告军区党委。

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干部，陈毅参加。周指示：要让群众揭发陈毅的错误。陈毅表示：欢迎大家揭发，这次我又犯了错误。

康生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说：党校揭露刘邓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并进行批判，比北京各学院要早，十月中旬就开始了。他要求党校建成一个完全是新的以毛泽东思想为领导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学校。（《传信录 719》）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造反军团负责人，指示：对胡耀邦已批，胡克实也应批一下。结合的干部，应作到“两划一站”（划清与刘邓及本单位走资派的关系，划清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系；站到革命路线与造反派一边来）。（《传信录 720》）

广西群众组织，以对韦国清支持与否，分成两大派。从 3 月 31 日起，矛盾日趋激烈。本日，“广西红总”、“南宁 8·31”、“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造反派组织，成立“南宁 4·22 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 4·22 革命行动指挥部”），总指挥为广西医学院学生曾春生。翌日，支持韦国清的四百多个组织共 4 万余人举行集会，冲突日增。

4月 23 日

毛泽东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作了批示，并致信林彪、周恩来。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

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军长胡伟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电革命派、交大文革总会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

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的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毛注)

黄经耀、胡伟等同志欢迎和感谢同学们对部队的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随后，黄经耀、胡伟等同志因势利导，转入讨论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李世英同学(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捕死亡，后被救活者。毛注)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即：

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

对先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

对保守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

要帮助工总司部队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

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

抓好活思想；

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毛注)；

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注)。

黄经耀、胡伟同志认为，李世英同学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四月二十一日召集西工大、西电、治院和交大四院的负责人，就如何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

毛泽东致军委扩大会的一个批语：

林、周阅后办。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抓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据有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的，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的。

周恩来、陈伯达等接见福建造反派及驻福建的北京三司等学生代表，听取福建造反派受打击的汇报，周恩来指示福建军区按 16 条逐县进行重新检查。(《传信录 722》)

外交部抗议印尼政府迫害华侨和进行反华活动。

汪东兴、戚本禹率中南海造反大队至刘少奇家，勒令于五一以前具体回答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所提出的问题。汪对刘说：“你的问题取决于你的认识，除此而外，谁也无可奈何。”

4月 24 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六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人民日报》发表以《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为题的社论。

中共中央发布印发林彪 3·20 讲话，供全国学习的批语。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批语

各级党委、各级军区党委、各革命委员会、各群众组织：

林彪同志三月二十日的讲话，很好。这个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不仅对于军队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战斗任务，而且对于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作为学习文件。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在军事管制下，各机关院校两派武斗暂趋平复。兹将高等军事学院在军事管制下恢复秩序的情况附录于此，以见一斑。

高等军事学院军事管制委员会召集该院“井冈山”和“红旗”代表会议纪要

出席人员：军管会主任陈奇涵、副主任曹广化、及军管会其他同志。“井冈山”代表孙继章、赵腾。“红联”代表张力平、吴恩庆。

会议开始前，由军管会方炎同志领读了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三页第二段、第二二一页第二段及第二一九页。

读完最高指示后，曹广化代表军管会对“井冈山”和“红联”两个组织的代表作了如下指示：

中央军委对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昨天晚上已经由军委副秘书长、副总长代表军委向你们宣读了。今天下午陈志带我们军管会的其他同志来到高等军事学院，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完成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井冈山”、“红联”两个战斗组织的代表来研究一下，我们怎样开展工作的问题。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我们一定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站在一起，坚决地把高等军事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一支光荣的军队。我们这支英雄的军队在世界上是没有第二个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三支”工作，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极大的关怀，极大的鼓舞，也是对我们有力的鞭策。我们解放军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柱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我们解放军必须坚决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执行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的一切命令、决定和指示，在各方面作出好的榜样。我们大家都讲执行最高指示，但是是否真的执行了，还要看行动上做得怎样。

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八条命令、七条决定、十条命令以及这个决定(指军管决定)……，都是毛主席批示的，都是最高指示(此时曹广化念了军管决定第一条……略)。

我们今晚开这第一次会议，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把我们的工作做一个初步的安排。

一、把所有被夺了权的单位的印章立即停止使用，明天(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以前全部交出。交出后，部、处如何接再行研究。

二、有线广播由军管会接管，全部广播设备器材统交军管会，不能损坏，不得转移。
(赵腾插话：有些广播器材已经被“红联”转移到昌平去了)今后广播如何建立由军管会负责计划。从明天早晨起广播的内容按军管会决定：反复广播军管决定、中央军委八条、十条命令，中央十六条决定及中央、军委其他有关决定指示；军管会的命令、通令、通告、决定、通知指示等；转播中央广播电台新闻、播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各个战斗组织的稿子暂时均不广播。可以写大字报。各战斗组织的稿子何时广播等候决定。

广播员由俱乐部的原广播员担任，如广播员在两方时，则应轮流值班。广播的内容不得擅自改变军管会决定的上述内容，要向军管会负责，如果将来有的广播员不执行军管的决定，我们再行考虑予以调换。

三、关于印刷厂的问题，对印刷处理的具体办法，我们明天再具体进行研究，现在应立即停止给各战斗组织印刷材料。但对军管会需要印发的材料必须予以充分的保证。

四、立即停止武斗。武斗是违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决定的，是违犯毛主席亲手批的八条、七条(决定)、十条命令的，是违犯毛主席亲自批的对高校军管的五条决定的。各个战斗组织无论如何要做到坚决不武斗，如果做不到只好执行纪律。要特别教育自己的子女、家属、保姆不能进行武斗，如果继续武斗，也要执行纪律。八条命令有明文规定，子女发生问题就要找干部(家长)负责。

关于不准武斗问题，中央军委都曾三令五申，但是，你们学院还这样地进行大规模武斗，这是十分错误的。今后无论如何不允许再进行武斗，一定要做好样子。

五、关于其他院校来支援的问题，各战斗队以后不要再请了，要说服他们，相信高院的革命群众自己会把革命闹好的，相信他们能够斗倒、斗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高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外来支援的同志，要劝说他们回去，以后不能再请他们来支援了。驻京附近的同志应立即回去，外地来的同志他们准备向我们作汇报，我们军管会也很喜欢听取他们的汇报。驻京院校的同志，他们回去后，我们也可以随时请他们来向我们汇报高院的情况。总之，你们再不要请他们来支援了。

六、各战斗组织对中央军委这个决定(指军管决定)要组织学习，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习时间暂定三天，如果时间不够，四、五天也可以。学习这个决定时，应结合十六条决定、八条、十条命令。周总理、江青等同志在北京市革委会大会上的讲话，一定要学好，真正的解决思想问题，然后再选学若干有关文件进行整风(具体部署另行研究。)

今天晚上，原则上把这些问题定下来，希望你们提出意见。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如果我们有错误希望同志们随时给我们批评指出，我们保证随时修正错误。

陈奇涵同志指示：

中央军委军管决定第一条就是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共同的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我们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譬如要搞大联合，要搞“三结合”等等。

各个战斗组织究竟怎样搞，希望你们下次会议提出意见。

曹广化同志：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进行研究。

4月25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杨成武、谢富治接见四川代表。造反派反映了受军区镇压情况。周等当场指令副司令员韩杰释放所抓人员。(《传信录723》)

江青、张春桥接见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人员。江青说：我的雄心

壮志是，只要我不死，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传信录 724》）

4月 26 日

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接见军管人员，聂荣臻对军管人员讲话：宣布军管一个多月了，我们集中二十多天学习，是有意识安排的。是让大家学习中央的指示、文件，以及各地典型经验。叶剑英说：现五省二市已经军管。他叮嘱大家下去要大兴调查研究，站稳立场，找出左派。周恩来指出：军管的任务是把领导班子建立起来，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它是一个过渡。主席原来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结果。现在二、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结果。（《传信录 728》）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

共青团中央揪斗书记处书记胡克实。

华北局揪斗书记李立三。

政法公社等组织召开彻底清算刘邓在政法界反革命罪行大会，揪斗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

中国政府就印尼宣布中国驻印尼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提出严重抗议。

4月 27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谢富治、张春桥、萧华、杨成武等接见山东代表团，王效禹作了汇报。周恩来指示：山东省革委会领导要加强，王效禹为主任委员，杨得志为副主任委员。要作好部队及人武部的思想工作。二师要用野战军把它吃掉，并从原地撤离，以改变性质。济南公安局的部队要撤出。放手让造反派把它冲散。康生说：公安纵队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间，不但是山东的问题，是带全国性的，是反罗瑞卿不彻底！杨得志在插话中说：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距离太大了。萧华说：有什么奇怪，你的屁股坐错了。（《传信录 730》）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萧华、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接见内蒙上访人员。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内蒙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代表军区萧应棠、刘昌、黄厚、王良太作了检查。（《传信录 731》）

萧华对艺术学院讲话：军队武斗的风在滋长。（《传信录 732》）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讲话：要重建组织，首先一步步的搞县、区、局一级的三结合。目前的无政府主义对阶级敌人有利，要大反特反。最近打算把大学关的人都放出来。（《传信录 733》）

关锋、戚本禹在来京的青海代表会议上作了解决青海问题的讲话。关锋说：青海军区是个反革命政变，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副司令员）夺了青海军区的权，扣押了司令员刘贤权。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逮捕了一万人。王昭（省委书记）是罗瑞卿死党。（《传信录 734》）

“斗薄筹备处”斗争了薄一波、陶鲁笳、李开信、宋绍文、梁膺庸等原国务院工交系统负责人。

北京十万人集会，声讨印尼政府反华行为。

4月 28 日

总政发布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指示。

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指示

内蒙军区党委、政治部：

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操纵的保守组织，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使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央四月十三日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纠正错误的一系列措施。中央决定下达后，立即得到内蒙地区广大革命群众、内蒙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

但是，据反映，仍有极少数人坚持错误立场，对抗中央决定，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另外，有些人因为受了欺骗蒙蔽，上街游行，上北京告状。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是违犯军纪的行为。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特作如下指示：

一、中央四月十三日“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是经过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批准的。一切拥护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志，必须自觉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人民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话的，我们一定要坚决地不折不扣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二、要立即在内蒙军区所有机关、所有部队、所有单位全体指战员中，深入传达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以及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做到人人皆知，家喻户晓。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下去进行宣讲，原原本本地把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传下去，耐心地进行宣传教育，特别要注意抓活思想，切实解决部队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部队中有一些人受了王逸伦等一小撮坏人的蒙蔽，受了前一时期错误宣传的影响，对内蒙问题的真相不了解，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军区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主要是军区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坚决支持呼市三司、八一八等革命组织，并把军区过去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向干部、战士解释清楚。相信广大群众只要真正掌握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的精神，就会明辨是非，迅速解决思想的。

三、内蒙事件主要由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等人负责。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他们是好人犯错误，受了蒙蔽，站错了立场。只要他们迅速把立场端正过来，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坚决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至于其它受王逸伦等一小撮坏人欺骗蒙蔽的干部、战士，他们是没有责任的。当然，这一事件对所有的同志都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每一个同志要从这一事件中接受教训，提高阶级斗争观念，把无产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一步。

四、内蒙地区由于一些历史原因，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又是反修斗争前线，内蒙军区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艰巨任务。中央决定调刘贤权同志任内蒙军区司令员，以加强内蒙军区的领导。刘贤权同志在青海地区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是一个好的领导干部。政治委员吴涛同志在这次内蒙地区文化大革命中，同乌兰夫的斗争是坚决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内蒙军区部队，要团结在以刘贤权、吴涛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共同努力、完成毛主席所赋予的一切任务。在目前刘贤权同志还未到职，中央决定滕海青同志代理司令员任务。军区的全体同志应该坚决拥护滕海青同志和吴涛同志领导。

五、我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人民军队，是有高度无产阶级觉悟和严密组织的军队。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当前内蒙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军区的全体指战员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一切军事调动必须绝对遵守军委规定，按照规定报请上级批准。参加地方集会和上街游行示威，要经军区批准，不准擅自行动。

六、当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我军担负着支左、支工、

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内蒙军区部队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内蒙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内蒙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王逸伦等人，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把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

此指示应传达到全体干部、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康生、李富春等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康生说：对二月兵变，只是群众怀疑，这事当时过去了。周说：据我知道没有这回事。（《传信录 735》）

4月 29 日

毛泽东发布的《一个指示》：

(三结合)要有群众参加。十几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四九、五〇、五一、五二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子，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不要看不起年青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五二年以后群众对我们冷淡了。过去党团员受到《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群众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以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通过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五二年以后我们党脱离了群众，群众不欢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改变我们脱离群众的问题。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搞薪金制、搞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按] 马基雅维里主张：“政治无道德”。历史上政治的核心就是一个“权”。

为了取得权，不可避免地会演成你死我活的拼死斗争。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在尚未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之前，是很普遍的。因此，历史学家并不单纯地以道德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治家。不过，这也仅限于政治斗争领域而已。在生活上，无论哪一个时代，道德标准是区分高尚与卑污的唯一尺度，这是毫无疑义的，尽管道德在历史的发展中标准的某些方面会有所变化，然人性的本质是不会变化的。毛泽东被奉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形象，一度在人民中是完美、正确、高尚和所有美丽词藻的化身，是民族的骄傲，国家的救星。然而，拨开严格保密制度与戈培尔式的宣传伎俩所制造的虚假外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货色呢？这个人的

政治主张与政治手段在这里我们可以撇开不说，单就生活作风、私人道德品质来看，读过李志绥所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映象，概括来说是八个大字：丑恶、虚伪、横暴、下流。在玩弄女性的问题上，尤其令人发指，真是一个荒淫无耻的衣冠禽兽。可以认为，李医生的揭发还只是一个开始，还不过只是毛丑恶卑陋行径的很小一个部分。将来，随着时局的发展，会有更多的揭发公之于世，到那时，毛的形象才可以如实地暴露于世人之前。

第八十五卷 1967年4月30日至5月2日

4月30日

晚，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到家中，开“团结会”。这些人都因此而得列入由周恩来拟定的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名单。

[按] 当时某中央领导人的名字见报与否，一般是显示毛对此人是否将予保护或打倒的官方表态。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发布了这一文件。（《传信录739》）

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 中发(67)142号

一、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许多宝贵意见，对于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我们一面在北京开会，一面就根据同志们所提的正确意见，及时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二、福建处在对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中，有很大贡献。在粉碎美蒋特务的工作方面，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前线的军民，必须更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一致对敌。

三、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福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实现自己的革命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

四、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中央认为，遇到这种场合，应该通过协商或联席会议的途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暂且放下，先解决那些能够很好地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强加于人，或者对不同意见革命组织和个人，进行围攻。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要只看对方的短处，只强调自己的长处。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尊”的错误倾向，实现各革命派的大联合。

七、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

事件，不予追究。

八、福建有个别干部（例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问题。应该把那里的农民群众同这些个别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农民群众没有过错，有一批人进城是被蒙蔽的。因那些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进城的个别干部，必须向农民群众承认这种鼓动是错误的。同时，各县人民武装部因为有的地方农民成批进城而擅自逮捕许多人，这是不能允许的，军队有关同志对此要表示态度，消除自己同群众的对立。

九、建议来京的福建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这里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回去，就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十、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责成军管机构按照中央的精神，处理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

刘少奇就中南海造反大队所提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几个问题作出交待。……二、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1月12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2月1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错误的。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1951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四、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但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解决。’这句话是错误的。……1962年我的论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修改的。我看《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的修改稿后，就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戚本禹在中直礼堂谈当前形势。主要问题二个：1、左派重新冲击军区；2、无政府主义。他说：刘邓已经把反毛主席的秘密报告做好了（指畅观楼查材料一事），政变后的安排也搞了，就是因为有解放军才不敢动。（《传信录740》）

财贸系统的革命造反者与红色造反者两组织之间连日武斗。傅崇碧接见革命造反者总部负责人，要求在五一一定不能再发生武斗。（《传信录741》）

周恩来接见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各派组织代表。分配五一出席庆祝大会观礼台票。他分析了当前形势：全国迄今只有六省市成立了革委会，十一省市实行了军管。下一步多数部门都要求军管。《红旗》第四期毛主席加了一段：不管是需要夺权的单位都要军管。（《传信录742》）

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余人批斗王光美兄弟王光琦、王光杰、王光英大会。

4月

毛泽东对林彪三个问题的报告的指示：

（一）依靠群众。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做的，靠少数领导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

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很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军队内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简单。军队和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啦！省得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队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行动很慢。

（三）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是害了自己。

毛泽东关于宜宾问题的批示^①：

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指责他们，更没有让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楚，让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重了。

康生派人找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逼取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安子文回答：“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讲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

叶群授意蒯大富收集徐向前、叶剑英的材料。并发表了《炮轰徐向前，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徐向前》。

由李作鹏操纵，秘密制定海军直属机关大院各大部批斗重点名单，其中海军领导三名，大部领导十三名，二级部领导十七名，其他师、团级干部三名，共三十六名。

张春桥任命游雪涛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进行特务、诬陷活动。先后制造了 26 起冤案，受害者 183 人，5 人致死。

《人民日报》编辑部：

《关于目前斗批问题的几点意见》(1967 年 4 月)

一、关于批判刘、邓、陶问题

《人民日报》要大搞，目前集中目标批判黑《修养》，批判该书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修养》离开阶级斗争，脱离政治，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在发表该书的当时甚至连抗日战争都不提，是一个亡党亡国的修养；

2. 《修养》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本书在 1962 年再版，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了思想理论基础；

3. 《修养》用孔孟之道作为标准，宣扬了唯心主义的修养论；

4. 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5. 在组织上提倡奴隶主义。《修养》是修正主义的建党纲领，在国内外的影响十分恶劣，在运动中起着阻碍与束缚革命群众的作用。

全面深入地批判刘、邓、陶黑线可以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1. 宣扬阶级投降，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搞垮无产阶级专政；

2. 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大搞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主义，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3. 推行修正主义的建党纲领和路线，鼓吹全民党，提倡奴隶主义；

4. 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5. 吹捧苏修，鼓吹“三和一少”；

6. 在哲学上宣扬唯心主义，宣扬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资产阶级哲学。

^① 时间另本作 3 月末。

批判刘、邓路线的同时，可以批判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这本书歪曲党的历史，起了很坏的作用。

二、关于批判反动权威的问题

在哲学上批判杨献珍、冯定、冯友兰、朱光潜；

在史学方面着重批判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黎澍；

经济学着重批判薄一波、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

教育界着重批判陆定一，北大还要批判陆平，清华还要批判蒋南翔；

文艺界着重批判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华君武、刘白羽、何其芳。

以上提到的，有的虽然过去已经批判过，但是还要继续批下去。

三、彻底批判《清宫秘史》

这本书宣扬卖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大肆污蔑革命群众运动，颠倒黑白，歪曲历史，起着极坏的作用，必须彻底清除它的流毒。

4月末5月初

毛泽东在五一和五一的前两天召开的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的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按]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共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由绝大多数工农大众推翻剥削阶级的伟大革命，所以他是当然的工农大众利益的代理人。唯有他最尊崇群众，最推崇群众路线。然而，听其言，观其行，事实胜于雄辩，真实的历史完全不是这样。让我们考察他历来的所作所为吧。中共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武装集团。从1927年走上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道路以后，其唯一目的就是武装夺

取政权，取而代之。为此它不择手段，利用“阶级斗争”蛊惑群众，欺骗群众，采用人海战术，以他人生命达到他的既定目的。在毛泽东下达的作战命令中，动辄“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等等。更有甚者，“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可耻的长春之战》；更早在西路军作战中，也采此种作法，以致许多女战士成了马步芳军队的俘虏后被强行婚配，命运非常悲惨。）在国共双方的夺权内战中，牺牲了三千万青壮年宝贵的生命。累累白骨，成就了将军们的辉煌战功；同时铸造了数百个红色特权贵族家庭。60年代，毛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日爆发，他宣称要以三亿同胞作赌本，发动核战争来打倒帝国主义，夺取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他还计划着：全世界27亿人，如果打原子战争，“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他为什么批判马寅初？“因为打仗需要人”，所以他拒绝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群众”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是他夺权战争的工具、是炮灰。而在中共夺权内战中作出了极大牺牲的农民，在共和国的地位却只是个二等国民，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近四千万农民，而中共对此至今没有一句负责任的交代，甚至在国内外已有多种揭露大饥荒真相的书籍问世的情况下，继续多方掩饰，谎言欺骗。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工商业以极低的成本，雇佣最能吃苦耐劳且不具备工资谈判能力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政府又和地产商勾结，以最低价掠夺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从而构成“改革红利”，成就了中国权力市场经济的10年高歌猛进。如今一党

专政下的“改革开放”，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众和政权基础工农联盟的农民群众，均已沦为弱势群体。唯有“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精英分子”——中共的各级官僚们，明抢暗贪，无耻掠夺，把“改革红利”偷进了自己的腰包，成了强大的权贵阶层。毛泽东、共产党的群众、群众路线的虚伪欺骗和功利目的，不是一目瞭然吗？

5月1日

毛泽东与高级干部的讲话：

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这时向朱德)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了，广场上是小将。今天的大会是个大联合。

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干部。今天除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各省第一书记都要回去，还是要做工作。江华、江渭清、谭启龙不是三反分子。陈丕显思想上、作风上蜕化，应很好改造。廖承志过关了没有？应让他过关。王震不是三反分子，是个粗人。建议谭震林同志去拜访他。余秋里讲假话，谷牧三六年被捕过，比较困难一些。

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震林？今天还是在这里开会嘛！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徐说：我身体不好，请萧华代替我工作。)还是你搞吧！

邓和刘有区别，邓在历史上闹独立王国，不理我。在中央书记处(按：似应作中央苏区)还临阵脱逃，以后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

刘少奇二五年被捕过，后来被人保出来了，住在北京。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六人小组，谣言很多，完全是造谣。

“联动”大部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成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主席在天安门上与王震握手说：王胡子，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有人要打倒你，能打倒吗？是打不倒的吧！你对打倒你的人要宽大嘛，宽大嘛！

毛泽东五一重要指示：

一、为避免脱离群众，以后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

二、国家机构要实行精简，使更适应新形势。

三、党团组织要半年以后可能恢复。

四、培养接班人问题，每个单位领导班子都要准备青年，只要二十岁以上就可以担任领导。

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作了长时间讲话：谈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

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败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

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林彪插话：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革命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所以我在中央特别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因为敌人是非常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这个通知中已明显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的工农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是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算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一月风暴就是工人搞起来的，随着全国工农全起来了。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去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

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得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的都热闹，看来，××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做走资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但是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对此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这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句话被一位副总理以自己的话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应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还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人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样达到酷爱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待干部必须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心，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要保，就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二，顽固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走资派我们必须做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坏人最多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他们组成一支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该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更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应比较长，中央文革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贵宾说：我们还是有困难的。中国是有希望的，世界是有希望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大批判，大斗争，尽快实现三结合。(有人谈到象《九评》那样批判《修养》)主席说，不要写长文章，两千字就够了，不要超过三千。

毛泽东接见张本^①的谈话：

五一节晚上十时三十五分，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同志向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单独引见了张本同志。接见时，总理也在座。

江青同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介绍说：这是国家科委张本同志，他们把韩光一伙打倒了。他们那里的运动搞得不错。

张本同志激动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说：应该祝科委同志们万寿无疆！应该祝人民万寿无疆！

毛主席又说：女同志也一样造反嘛！你们把反革命韩光打倒了，你们夺权夺得好。

接着，毛主席又亲切地问：你现在担任什么工作？

张本同志回答：在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工作。

毛主席说：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吧？

周总理说：也说是了吧！

毛主席向林副主席说：她原来是个局长，和群众一起造反。

周总理说：搞的不错。

毛泽东在中南海五一节晚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听到江青同志介绍京剧一团被挨打的事情以后，关心地问：现在还打不打了？同志们回答：现在我们都团结一致了。毛说：不打了，好。还问谭富英及其他一些老演员。在演唱时，问：现在还有没有反二簧？反西皮？演员们请示主席：在革命现代戏中，反二簧、反西皮可不可以？毛主席说：我看可以用。

林彪五一题词：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从此“四个伟大”的颂声成为晨昏礼忏，遍及神州。

5月初

《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秘书先后在接见造反派的一个头目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五月十六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人总部翻案。”

吴法宪先后给武汉军区空军的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他们独立思考，

^① 张本是国防科工委造反派头目。

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北京市“联动”成员串连起来，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对立派发生武斗，占领二十八中达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与之对立的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5月2日

陈伯达在人民公园与游园群众谈话。指示必须批判“联动”思潮。

第八十六卷 1967年5月3日至9日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的发表)

5月3日

周恩来接见十四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人员，指示：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李先念说：五一那天我向毛主席说了：粮食情况很好。主席很高兴，指示我们必须把粮食，棉花、布匹抓紧。我理解这是指(1)不要购过头粮；(2)销售上注意节约用粮。(《传信录 749》)

谢富治在第二机床厂讲话，指出：在集中力量批判刘邓的同时，把批判旧北京市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他强调革命大联合和反对无政府主义。(《传信录 750》)

5月4日

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各派组织代表。财贸六单位(财政、外贸、粮食、财经学院、外贸学院、《前进报》)两派对立，周提议召开大会，由李先念检查。他说：机关中“三结合”有两种设想：一种是由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和中级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一种是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不管哪一类，首先要进行大批判。(《传信录 751》)

陈伯达、戚本禹在北京师范大学就教育革命问题举行座谈。陈伯达建议师大编两本书：《世界教育发展史》、《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当同学反映陈毅、谭震林出现上天安门保皇派高兴时，戚本禹说：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你们的么！陈指责：师范学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师范大学要不要办，可以讨论。(《传信录 752》)

聂荣臻连日(4、5两日)接见科学院夺委会勤务组正副组长时讲话：文化革命委员会还要长期存在，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对各所，有的派军代表，有的派军管小组，主要管文化大革命。(《传信录 753、754》)

四川宜宾发生武斗。

上海青浦县发生三次大武斗，卷入者七百余人。

5月5日

林彪对空军工作做出指示：

五日上午，林副主席听秘书简要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以后，对空军工作作了如下指示：空军最近几仗打得好，这次会议也开得好，情况在好转。这是好现象，但是不能松懈。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战备。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把毛主席著作学得更好，把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和支援地方的工作做得更有效，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彻底的群众性大批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要把好人都团结起来，同时不要放松对个别坏人捣乱的警惕。

周恩来、江青等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指出：当前有一股反夺权的拆台风，保守派要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反夺权，打砸工代会等革命组织。这股打砸风影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正常生产和正常秩序。市革委会和工代会可以管

起来，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今后发生武斗事件，挑起武斗的要严加惩办，首恶分子要依法惩办，受蒙蔽的教育处理，打死人的要偿命，无故旷工的要停发工资。

周恩来写了致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的措辞严厉的“警告”信，“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错误，否则又要造成一次反复，甚至“走入绝路”。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

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周恩来

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

5月6日

成都产业军^①与造反派发生严重械斗，开枪打死五六十人。死者中有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学生李全华。北京发起支援四川革命造反派大游行，高呼“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晚，周恩来发出三点指示：(1)派出两万解放军至现场，以制止武斗；(2)双方撤离现场；(3)希望大家不要激动，相信中央能控制局势。四川自二月份以来，连续发生武斗，成都军区动用武装，镇压造反派。由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的产业军，坚决反对造反派所提的“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号。4月15日，他们扬言要“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从5月4日起，双方武斗日益加剧。

九龙工人发生工潮，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工潮迅速扩大，遍及其他地区。广州地方当局出面支持，抗议镇压。

王光美专案组(丙组)写报告说：“王光美和美国情报机关早有联系。”该专案组旋即正名成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说南开8·18、北航“红旗”组织联合调查团抓叛徒，应该向他们学习。从此，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揪叛徒组织。

5月7日

毛泽东给林彪有关军队整训的指示：

林彪同志：

各地军队都应该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至十四天为宜。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毛泽东
五月七日

^① 产业军全称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由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兵团、成都机电红旗等组成。它的对立面造反派组织由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医院9·15战斗团、四川大学8·26战斗团及一些大专学校红卫兵组成。

毛泽东对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批示：“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来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多可能有些问题。对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办法，告我为盼。”

“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 54 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 8·15 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诸同志共同商处。”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萧华、杨成武、叶群等接见四川代表，周说：成都部队由于相信军区，有错误，但能与产业军划清界线，是好的；而对川大 8·26 及工人造反兵团则是错误的。四川发生这样大的流血惨案，现在应该结束了。（《传信录 755》）

同日，中央召开了处理四川问题的大会，会上江青讲了话，陈伯达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周恩来最后作了指示。（《传信录 756》）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庭、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

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

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处理原则。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

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做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枝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代表，指出：当前，要在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中进行革命的“三结合”。现在提出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分化论”、“新保皇派论”是错误的。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失败，竭力反抗，当前主要是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制造分裂，挑起武斗。他号召大家学习毛选，克服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打倒“私”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抓大方向，反对武斗，反对分裂。谢指示：新北大聂元梓应参加红代会的核心组工作，这是中央的决定。并表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采取措施，10号以前制止武斗。（《传信录757》）

5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署名的重要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

《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

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国，流毒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修养》一书的要害是什么呢？

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指出：

“至于讲到我呢，那末无论是发现近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彼此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了这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早已作过对于各个阶级的经济解剖了。我所作出的新东西就在于证明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卫登麦尔》（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五二页）

列宁在五十年以前又强调指出：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九八—三九九页）

《修养》的作者，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割裂和歪曲。他在这本长达近五万字的书里，虽然也堆积了一些抽象的阶级斗争的词句，但是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那些阶级斗争的词句当然只是骗人的鬼话，当然是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

《修养》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出版，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多次重印。在几种版本里，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①，根本不谈解放战争，不谈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这样的《修养》，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触动不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国民党的一根毫毛。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9页）“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1页）很显然，抛开革命战争，抛开武装夺取政权，就根本谈不到党的发展、巩固和建设，谈不到党员的思想改造。可是，就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的年代里，夺取政权的年代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要人们忘记武装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去“修养”，岂不是要人们“修”成不干革命战争，不要夺取政权的庸人！这样“修”出来的庸人，绝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

《修养》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大加增删，重新出版，仍然

^① 《修养》一书，在一九六二年以前的各种版本里，都没有谈抗日战争。一九六二年的新版中，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一节里，加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段。

是原来的那套货色。在这个时期修订再版、重新出版的《修养》，不但根本不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而且仍然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伟大著作唱对台戏，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要人们忘记社会主义革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的“修养”，岂不是让人们“修”成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的布哈林式的人物，“修”成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修养》多次重印和再版，都不提武装夺取政权，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偶然的疏忽呢？不是。

《修养》一书讲了国家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讲国家问题的时候，是绝对不会不讲国家的阶级性质，绝对不会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是，《修养》一书偏偏抛开无产阶级专政，而象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那样，抽象地讲国家问题。

《修养》一书的作者说：无产阶级“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及国家机关，来和一切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从党内与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的分子出去”，“而保持党与国家机关的纯洁”。试问，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关呢？难道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吗？可以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吗？《修养》一书恰恰是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照《修养》一书作者看来，只要共产党人努力进行“自我修养”，就会从天上掉下一个什么“理想国”来。他梦寐以求的，不是别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养》，在上面引的这一段话中，特意增加了“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国家机关”。这种特意的增加，表明作者对我们国家性质的看法。可是，在这里，在全书，他根本不提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毛主席说：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对于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修养》一书的作者，把我们的国家，说成仅仅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向敌人实行专政的国家，这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主张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

《修养》一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一定要讲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作者却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事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党员到底要怎样去进行我们的事业？”作者回答说：“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及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作者又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人类最伟大的气魄与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作者在作了类似种种一连串的牧师式的祈祷和祝愿之后，做出结论说：“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作者的回答里，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所主张的怎样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原来就是这样！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

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一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十一页）

列宁说：“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一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四八页）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修养》一书里着重讲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胜利以后，“还须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改造时代，最后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人，在这里总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吧！没有，没有，还是一句也没有！可见，他所说的“长期的改造时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他所说的“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很显然，《修养》一书的作者，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修养》一书的作者，不仅自己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也把无产阶级专政删掉了。

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一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拦腰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砍掉了。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很明白，在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

另外一段，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一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一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

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一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一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的作者，又明目张胆地拦腰砍掉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连共产党的领导也给砍掉了。难道这又是偶然的疏忽吗！

《修养》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为什么仍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删掉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完全可以证明，这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他是绝对不能容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而讲什么“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这简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莫大侮辱。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养》，把“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还把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三段话全部删去了。这三段话是：

“人们和自然界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以及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时，也就建立彼此间在生产内部的某种相互关系，即某种生产关系”。

“生产底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更和发展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中的变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观念、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底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底改造”。

“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很明显，《修养》的作者，在一九六二年删掉斯大林，删掉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全部引文，完全是为了迎合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需要，反斯大林，也就是反列宁主义。

他为了删掉斯大林，恩格斯也被陪绑，恩格斯也被删掉了。

《修养》一书在多次重印和再版中，根本不讲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根本不提毛泽东思

想。这一点，也说明《修养》的作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真修正主义者。因为，在我们的时代，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离开了列宁主义，也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今年的选举》。《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把世界上的一切归结为“自我修养”。

“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一这就是《修养》一书的公式。这个公式，同老叛徒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公式一样，都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货色。

真的没有目的吗？当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老叛徒伯恩斯坦一样，有其阴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企图瓦解无产阶级队伍，使人们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在全国胜利以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以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个反动公式的目的。

晚，周恩来、杨成武、叶群等接见高等军事科学院造反派，周说：叶剑英是忠于毛主席的，大节是好的。在长征时揭发张国焘成立伪中央的问题，在反对彭、罗、陆、杨问题中是有贡献的。叶处理青海、四川问题上犯了错误，是轻信了下级的话。

5月9日

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蹈学校讲话：对两派武斗提出批评，提议组成联合班子，两派各自整风，推进联合。（《传信录761》）

北京市第二毛纺厂发生大规模武斗。类似情况，在各厂矿中多有发生。

第八十七卷 1967年5月10日至18日

5月10日

江青 1964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公开发表，《红旗》第六期以《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题，专门发表社论进行吹捧。

陈伯达、谢富治去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情况。陈伯达讲话，说：现在流行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实际上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

戚本禹在文艺评论座谈会上讲话：孙泱是蓝衣社特务，同严慰冰关系密切。（《传信录762》）

军事测量学院红总为揪总参文革主任王新亭，在学生支持下，于王家门外搭帐，坚持二十七昼夜。关锋、杨成武、萧华接见了他们。杨成武说王新亭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是个好同志、关锋要求大家掌握斗争大方向，要团结大多数。（《传信录763、764》）

首都科技界万余人，晚上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大会”。

5月11日

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干部写信反映两军区在支左中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五个错误，毛批示：“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同志身上却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成员驱车周览北京市全城大标语、大字报情况，随即又派人往各中学了解情况。

中共中央发布通知，要求全党大批刘少奇的《修养》一书。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153号

各革命委员会，各军区，各级党委，各革命组织：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刘少奇就对《修养》一书的批判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

外交部造反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代会批陈联络站等十个单位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揪斗陈毅。周恩来应要求在翌日凌晨接见了其代表二百余人。代表提出(1)陈毅马上滚到群众中来；(2)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外事活动。接着，周又接见了北外“红旗大队”、归国生“延安兵团”等单位，直至十二日凌晨六时。周恩来以需要安排为由，拒绝交出陈毅，并坚持不能打倒陈毅。

陈伯达在北京六中讲话，批评中学不应分为4·3派、4·4派，也不要组织批判4·3思潮。（《传信录765》）

王力、关锋对红代会的代表讲话：任何时候都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相信并依靠解放军。对解放军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要看得太重，有错改了就好。（《传信录 766》）

戚本禹在人大附中讲话：黑《修养》主张无政府主义，产生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阻碍实现大联合的一主要因素，克服无政府主义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传信录 767》）

四川“产业军”劫走亮相支持造反派的西南局书记曾希圣。

5月 11 日至 6月 16 日

八个所谓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在京会演。

5月 12 日

毛泽东签发中央关于甘肃问题的意见。

照办。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林副主席已阅。

即送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请主席批示。这个意见经五月十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洗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洗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妥否，请主席批示。

周恩来

五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洗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关于甘肃省军区支援甘肃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现对甘肃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甘肃省军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光荣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

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洗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四)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洗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

甘肃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兰州军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和批判以汪锋为代表的甘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在斗争中壮大左派力量，分化瓦解保守组织，争取教育广大群众，做好革命干部的“亮相”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取得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文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号召拥军爱民。

周恩来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我支持批判陈毅，但不同意打倒。（《传信录 768》）

戚本禹在玉渊潭中学讲话：两派老这么吵下去，也许没有希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一批精神贵族，主要两种人，一是不干活；一是特权阶层。无产阶级怎么办学校，全世界都没有解决。（《传信录 769》）

军队院校革命造反派开大会斗争罗瑞卿。

5月13日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军内一部分由吴法宪、李作鹏、叶群支持的三军文艺人员(后来称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①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长征组歌，对立的造反派联合以清华蒯大富为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冲击剧场，发生严重冲突，伤数十人(这一派后来便名为冲派)。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曾劝阻前者不要单独演出，因此被指为冲派的黑后台而被揪斗。周恩来、杨成武等连夜分别接见冲突双方的各组织代表。此即所谓“5·13 事件”。从此，总政瘫痪。

周总理、杨代总长在人大礼堂接见“5·13 事件”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凌晨三点三十四分

当总理和杨代总长进来时，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总理：你们这里边有观众，也有打架的。我们请不来，只好分分工，我和杨代总长在这儿，伯达、谢副总理和肖华、王力到那边(北京展览馆剧场)去了，那里的人多嘛。

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演出，不管那一派演出，我们应该欢迎嘛。不能只自己演，别人一演就给扣上个什么帽子。都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实际上却不一样。难道对毛主席就是这样的感情？

我和战友文工团打交道最多，他们最近一两年经常出国，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那知道回来以后就分化啦，“老燎原”里又出了个“新燎原”(群众代表：请总理坐下讲。)总理说：不要坐，站着后边能看到，站着讲好，坐下后边看不到。“五一”节前，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了他们合起来演“长征组歌”，演出那一天，不知是那一派的来了电话，叫我到“青艺”去看戏，我去了，忙坏了郑维山同志。那天我走了以后，你们就打起来了。马玉涛她说，“给总理演出我就演”。怎么能这样说，这不是给我演出，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嘛。你们演“长征组歌”，长征我们都参加了，可以看出你们真实的感情。你们唱歌、跳舞都在一起，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打。我们纪念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这个大方向是一致的嘛。

为什么打成这样子，我们都是解放军嘛！(地方院校有人插话：周总理，我们支持解放

^① 这些人基本上是保吴法宪与李作鹏的人，在运动初属保守派。而其对立面则属造反派。

军的造反派。)总理：“老燎原”和“新燎原”都是造反的，你们学校的同学不了解情况，你们支持这一派，打击那一派，所以我对你们学校的同学挺有怀疑。同志，北京的情况现在不是以前的情况了。我有充分证据，我知道他们那里的事情(指战友文工团)。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打，你们再在中间加油添醋，使问题更复杂了。陈伯达同志到那边去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斗争矛头要对准刘、邓。在大批判当中考验对方，考验自己。我们活到七十多岁的人，有“私”字还要去掉，你们这么多年看问题就那么准啊！来个电话，就去支持啦！

(总理讲到此时，各组织代表争吵着要发言)

杨代总长说：大家静一静，听总理讲话。(当时仍没静下来)

总理生气的说：是我请你们来的，还是你们到这里来示威的！你们在这里都是这样，可想在那里是什么样子。

(有人说：总理，空军党委调来了大批部队，在门口堵我们。另一人说：还有海军党委……。他们说周总理支持他们演出。)

总理：他们演出是肖主任批准的嘛。

(有人向总理请示发言)总理问：你是那个单位的？(答：我是军艺“星火燎原”的)

总理问：你是演出的吗？(答：不是。)

总理又问：是去干涉的吗？(答：对。)总理生气的说：那就不对！(热烈的掌声)(“星火燎原”这一同志又讲：我们找他们辩论。)

总理说：人家演出，你去辩论什么？！

有人说：这个会不对就得造反。

杨代总长：造反有理，我看这个反造得无理！

(军艺“星火燎原”讲：全军文革的指示怎么不一样，他通知这个戏不演。)

总理：凡是这样的大会全军文革、中央文革不知道，你们就去冲？谁给你们的权力？

杨代总长：国际友人看了后是什么样的影响，你们大部分是穿军装的解放军，林副主席听到你们打架，心里很难过。

总理：林副主席说，要有革命性、科学性嘛，可是你们呢？(下面吵吵嚷嚷)你们是那儿的？你们派别多，我搞不清，反正今天的演出，冲了就不对。既然已经演出了，七点钟听说要武斗，我们正在议论这个事情，你们就打开了，本来想叫他们不要演了，后来他们要坚持演出。林副主席知道了，非常着急，马上表示支持，肖华主任忙着这件事，可是你们从派别的利益出发，就这样干。

这篇著作从哲学到文艺，涉及范围广，是辉煌的著作，纪念不但在我国有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我们作为观众，演出有错误，会后批评。

(一观众说：总理，他们要冲会，演出者就一再说，这个大会是林副主席支持的。周总理打电话说：热烈祝贺这次演出成功。谢副总理也打电话说：今天的大会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谁冲谁犯错误，坚决反对武斗。戚本禹也打电话支持这次演出。但是他们还是冲。另一观众说：他们是保皇派演出，就要造反。)

总理：你造的是演出的反，你是观众就不对，你怎么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呢！(军艺“星火燎原”一同志说：今天给虞棘(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打电话。虞棘说，不同意他们演出。)

总理：啊！这就奇怪了。啊！有了个电话就是不同意他们演出，你们就打，谁给你们的权利？(有人说：我们没有打架。)

杨代总长：你们没有打架，怎么到现场的！

总理：人家演出，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这样的演出，有什么不好。你们在这样的场合去冲，你们就这样热爱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吗？你们这样做，我们都感到难过。你们不难过吗？你们不感到羞耻吗？你们造的是毛主席的反。你们也喊：毛主席万岁！你们行动却不符。林副主席都睡觉啦，起来打电话，叫你们

别打啦，你们不听，你们这样热爱毛主席吗？！

杨代总长：你们这样作法就没道理。

总理：这样的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演出，不管那派演出，我们都应该去看，看完以后，如果有意见，可以在演完后再辩论嘛。你们这样，就不是一种革命的感情，而是一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你们回去要好好学习“古田会议”的决议。

(战友文工团“新燎原”一同志说：“老燎原”单方面的不搞联合演出。)

总理：如果他们不联合演出，这是他们的不对。总之，今天这个演出，你们去冲，就是不对。林副主席支持他们的演出。所以你们不是根据全国人民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纪念这样辉煌的著作的演出，不管那一派都可以演。就是你们说是个保守分子，你也不能这样搞，不能把保守当成两条道路的斗争。你们演出，我们一样的支持你嘛。至于说，今天以前他们不与你们合作，这是他们的错，如果“老燎原”来，我还要给他们讲。不管怎么样，今天冲人家演出，在人家门口贴人家的大字报是不对的。人家演的是革命戏嘛。斗争也要讲政策、方法，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子能把人家斗垮呀！不一定。相反的，你们可能要被斗垮。

杨代总长：(念了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部分革命文艺工作者“隆重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五月十三日晚开幕大会演出的节目单和军艺“星火燎原”、总政军乐团“革命造反总队”等几个单位五月十三日晚在会场散发的要砸烂大会的传单)从这两份传单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个是宣传毛泽东思想，隆重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一个是宣战。

你们能说人家盗用军委和江青同志的名义招谣撞骗？怎么能这样说！我是军委文革的成员，总理和中央文革，我们都不知道。这次演出是肖华主任批准的，这怎么能说是招谣撞骗？！这就不符合实际情况。(有的同志喊：造谣可耻)不一定打架英勇就是左派。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以为打架最厉害便是左派，这样下去就要走到反面。是不是真正的左派，要看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

我完全拥护总理的指示，今天总理的话，说得语重心长。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古田会议”文件好好学一学，要整风，否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便很难。要革两个命：一个是革客观世界的命；一个是革主观世界的命。要夺两个权：一个是夺资产阶级的权；再一个是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

总理说了，现在是一九六七年的五月份，不是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份，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现在不要打、砸、抢，总理和江青同志在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的很清楚。

(一个中学红代会代表揭露事实真象，“星火燎原”、工程兵“傲霜雪”等起哄，总理很生气。)

总理：让大家把话讲完嘛！你们压制不同意见，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一观众说：总理，今天晚上的大会，这边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所谓的造反派他们打、砸、抢，他们把两个鼓打坏啦(是两个定音鼓)，据说值四千元。把玻璃砸烂了，许多演员被他们打伤了。我们把两个战斗组织的旗帜给他们，叫他们替我们讲一讲，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说，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

(总政军乐团：他们是保守组织，保刘、邓、刘志坚，他们的演出和主席没有感情。)

总理问：你怎么知道人家保刘邓？你没看节目，怎么知道他们和主席没有感情？

(军艺说：他们就是保字号的。)

总理：打起来，互相没有好话。

杨代总长：你们先搞的宣传品，说明你们有计划地冲会场，对不对？(接着会场喧哗)

总理：(生气)是我请你们来的，还是你们来示威的？

杨代总长：这里是中央首长接见，你们还这样，你们在展览馆还不打起来。

总理：军队保皇，保谁，保刘邓的皇？

杨代总长：解放军就不是保皇派。告诉你。

总理：现在我们请你们来，我就要讲话。军队分几派是存在的，说军队有保皇派，你怎么知道谁是保皇派？不应凭感情下结论。

(总政军乐团“革命造反总队”一同志说：他们今天晚上参加演出的，都是保皇派，他们保当权派……)

总理：你受了伤，我同情你(该同志的一只眼用纱布蒙着)。但是，你口口声声说当权派，解放军的当权派是林副主席，你是什么看法？

(下边很乱，总理生气了。)

总理：(战友“新燎原”：刚才 301 来电话，说我们有一个同志死了。)你看人家刚才来电话，(念)重伤三个，轻伤两个，没有死亡，你们不信，等会完了，我派人去调查。

总理：我不用你们讲，战友文工团的情况，我比你清楚。你们打战友文工团，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的做法是不对的，对一些倾向性问题上应该从古田会议学习着手，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保持造反精神，造反精神必须有科学性，是两条路线斗争，要分析，不能凭空办事。如果不是思想上真正过关，文化大革命就触动不了“私”字，一动就上街贴大标语，一动就出去串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四次关于停止串联和四月二十五日的通知，可是就是不听，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代会到外面串联的都有，那怎么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现在不是打、砸、抢，现在是大联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搞了个草案，就是不让打、砸、抢。

(下面很乱)

总理：象你们这样，非打架不可。

(测绘学院：现在这些保字号组织，又抬起头来了。)

总理：我再说一遍，我比你们清楚得多，你们讲他们保守，我们不这么看，中央文革不这么看，全军文革不这么看。

杨代总长：你们讲他们保守，他们讲你们保守呢？

总理：打起架的，不说好话，在座的都是红五星，红领章的，我们要无愧为解放军，大家要把红五月的文章好好学学，红五月要发表很多文章，希望好好学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次有机会遇到，我要问你们学习得怎么样？

你们现在根本无心读毛主席著作，这怎么能叫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怎么能批倒、批臭黑《修养》，同志们，老实告诉你们，我们跟主席几十年，还觉得总是跟不上，不要说四卷，连这本语录都没有学好，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学习啊！

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志，你受伤我同情，但你说话有缺点就要批判啊！

(军艺：海军在二楼设有电台，我们缴获了两个。这是对待谁，搞到一级战备的程度。)

总理：海军有没有带上电台，我不知道，你们不冲到二楼怎么知道人家二楼上有电台，这就证明你们冲了嘛，不要说了。

(二炮星火造反团××说：我们二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还很顽固，……当权派……)

总理：看你的发言，当权派，当权派，不加分析，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分清楚嘛！

(二炮医校红色造反队××说：我同意总理同志的讲话，但是对于今天的演出，我们认为不应单纯看成是演一场戏的问题，这是军内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希望中央首长重视这个问题。)

总理：不要认为你们就是造反的，人家就是保的，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如何对待派别问题，

在彻底大联合、大批判时，这样搞派别是不对的。

杨代总长：喂，同志们，我提个倡议，大家要爱护总理的身体，总理 24 小时没有休息了，象你们，没个完，一切不谈了。

总理：你们说，他们就是保当权派。同志们，什么当权派？对当权派要作阶级分析啊，你们知道吗？你们对战友文工团支持这一派反对那一派是不对的。你们刚才提到“老燎原”的许多错误，如果是事实的话，我当着他们的面也要批评他们。你们要执行八条。八条和十条并不矛盾，八条是拥军的，十条是爱民的。八条和十条要结合起来学，才能学好。首先来说，在派别斗争中，你们并没有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要太自信了。应该有自信心，但要有民主的自信心。在反对我们的敌人时，要有自信心。在派别斗争中，要有分析。派别斗争能否就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能动不动就便去支援，支援错了呢？年青人，应该自负，过于自负便是骄傲、狂妄。你们现在就是坐不下来，来了个电话就出去啦。语录读的很熟，并不等于就学好了毛主席著作，你们造反精神，我们支持你们，但是你们这样做法，就会出偏差。你们都是解放军，不要损害解放军的光荣称号。

红五月，你们要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好好的学，因为这个著作世界观、文艺观都讲了。你们应该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好好地学一学。现在你们这样，怎么能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如果说，十三号晚上的演出，他们对那一派进行了攻击，那是他们的不对。如果你们被打的多，这个我们要了解，但是你们冲会场是不对的。你们今天公开的宣战，这个情况我们事先也有了解，难怪乎他们是有准备的，你们不是冲到二楼闹了他们两个报话机吗？

今天碰到的事并不意外，我们常想这个问题，北京如此，外地也一样，这样搞会把我们的阵线搞乱了，对斗争不利。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的情况下，我们是应该正确对待派别斗争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大家在批判中，大联合中自己教育自己嘛。至于你们讲的好多细节，这里也说不清。反正是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手。今天你们有些受伤的，我表示同情。但你们作法是事有因果的，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干啦。为了昨天的事，你们准备了一天多啦，这又是一宿，也够辛苦了，该休息啦。毛主席说：“吃饱了肚子，养好了身体干革命。”当然了，更主要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精神上的粮食。

(会见到早晨五点一刻结束)

中央军委决定：向全军发放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语录章。

5月14日

中央发布关于中专的学制与分配办法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知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利于学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更好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劳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

一、实行半工半读的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以及厂矿企业附设的半工半读的学生，都要回到原生产单位或本校，按照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积极复课闹革命，同时参加生产劳动。

二、厂矿企业附设的半工半读学校，有不少是名义上半工半读，实际上学生全日参加劳动，有固定的生产岗位。对这部分学生，可以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在学生自愿的原则下，并经过群众评议，合乎学徒工条件的，可以转为学徒工，合乎正式工条件的，也可以转为正式工，不愿意转为学徒工或正式工的，可以继续半工半读，以学为主。对于他们的学习条件

如校舍等，要作适当安排。关于学制改革问题，原则上应在斗、批、改运动中，放到运动后期去解决。

三、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以及职业学校的一九六六年应届毕业生(一九六五年毕业生尚未分配工作的，包括在内)，根据自愿原则，现在即可按原有的分配办法分配工作。分配工作后，应到新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参加生产和工作。愿意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可以继续留校，原来享受的生活待遇，在分配工作之前，暂不变动。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对群众组织小报控制的通知。

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 中发(67)157号

中央各部门，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革命群众组织：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根据这类报刊宣传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应严格遵守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并参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

二、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和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编印流传。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非常战斗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军队。报刊上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对于他们的支援工作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也可以当面批评。有的报刊，在中央作出明确规定之后，还发表公开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这是完全错误的。

四、必须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的报刊泄密现象相当严重，在一些文章、报道中，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以及经济建设、外交斗争、机要事务等等重要机密。这种现象必须迅速制止。

五、宣传要突出政治。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揭深批透。不要搞《黄色新闻》以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

六、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对于国际上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

七、在宣传报道中，不要传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马路新闻”，尤其不要轻信和传播政治谣言。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文物图书的保护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 中发(67)158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它将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还将要保留历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文化的精华，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创造出为过去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灿烂的新文化。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保存下来的文物图书极为丰富。这些文物图书都是国家的财产，在文化大革命中，应当加强保护和管理工作，要防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为此，对保护文物图书，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一、全国各地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必须坚决保护，并且应当保持原状，目前不

要进行大拆大改。一定要在宣传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使它们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

二、各地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及雕刻壁画等都应当加以保护。

目前不宜开放的，可以暂时封闭，将来逐步使这些地方成为控诉历代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罪恶的场所，向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三、各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注意保护，严禁以搞副业生产或其他为名挖掘古墓。地下文物概归国有，出土文物应一律交当地文化部门保管。凡是出土的古代金银器皿各地人民银行不要收购，已收购的应当交由文化部门进行保管。

四、对有毒的书籍不要随便烧掉，要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

五、各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应当结合对查抄物资的清理，尽快组织力量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器、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清理，流失、分散的要收集起来，集中保存、要改善保管条件，勿使损坏。一时处理不完的，可先行封存，逐步进行处理。

六、各炼铜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

七、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文管会、文物工作队(组)、文化馆、文物商店、古籍书店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一律不要处理或销毁，应当妥善保管，并注意经常的保养工作。

在进行上述工作时，要进行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转发广州军区、湖南军区检查报告的批语。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

转发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时的批语 中发(67)151号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需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看，就什么都通了。

经毛泽东批准，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重要通告，要求禁止武斗、稳定生产秩序。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经中央批准。)

一、革命群众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争取革命和生产双丰收。

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

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运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

四、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

府状态”的指示。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

五、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

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

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并由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采取具体措施。

叶群带领关锋，由吴法宪、李作鹏、王宏坤等陪同到医院代表林彪慰问演出一派的伤员，进一步分裂了一些军事单位的群众组织。

周恩来、杨成武接见海军直属机关造反派(支持李作鹏的一派)，周恩来说：听说你们在三座门搞了一天半。我支持你们，现在不要去三座门了，不然，我就陪你们去。(《传信录 773》)

张春桥、姚文元奉命至南京，在革命派群众会上发表讲话。张、姚此行，由毛指定，自北京至济南、然后至南京、再去上海、杭州。张春桥讲话：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领导机构。他批评南京武斗已发展到三绝(绝食、绝水、绝医)，这完全偏离了大方向。张呼吁实现大联合，拥军爱民。姚文元与江苏省军管会主任杜平也作了发言。(《传信录 774》)

与外交部“造反联络站”及北外“六·一六”对立的北外“红旗”等冲击外交部，要求揪斗陈毅。同时也依例要求周恩来接见。

5月15日

晨一时，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后，接见了北外“红旗”、二外红卫兵代表。周严词批评了他们冲击外交部的错误，坚持批判陈毅的会议必须有安排。并表示：“我马上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去加强外交部，以后谁也不许去。”(《传信录 776》)

戚本禹在首钢接见两派代表。指责双方皆无权力扣人、抓人、抄家、不许再发生武斗。(《传信录 777》)

聂荣臻在京西宾馆接见部分科技人员时讲话：搞阶级斗争改造社会，要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同样，要战胜自然，没有理论，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基础学科我们发展不够，也作了好多工作；技术科学我们有许多成绩，电子计算机开始向苏联定货，一秒钟三十次，好难呀！我们自己搞，下定决心我们自己干，很快自己搞出来了，一万次，十万次，××万次也搞出来了。越封锁，越使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本月初，九龙发生工潮，在红卫兵的支持下，愈演愈烈，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嗣后，在六、七月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

四川宜宾自5·4以来，武斗不止。本月又发生大规模武斗，成都万余人赶往支援。重庆连日武斗激烈，双方动用高射炮等常规武器。大批工厂停工停产。

5月16日

按照毛泽东在5月15日夜的指示，《5·16通知》正式公开发表。毛将其中的“彭真同志”的“同志”二字删去，并说：写社论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

中央碰头会接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汇报了“5·13事件”。江青说：支持你们批判萧华，萧华一副绅士派头！并指示戚本禹接见演出人员，以示支持。晚，戚本禹偕同吴、李、邱在北京军区接见演出人员。

周恩来、江青、聂荣臻、徐向前、萧华、杨成武、粟裕、谢富治、叶群、郑维山、傅崇碧等接见内蒙军区来京代表团。周恩来在会上宣读了中央解决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传信录778》）

中央发布《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同意四川革委会筹备小组的意见，撤消任白戈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重庆在2月8日由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成立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其后又分化为拥护革联会的“8·15”派与反对的“反到底派”，尖锐对立，武斗一直在发展。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贴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武汉市保守派群众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与造反派不断发生武斗。

5月17日

毛泽东对五十四军支左工作报告的批示：

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得不错，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都要耐心地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天津红卫兵将查找到的《伍豪（周恩来化名）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抄送江青。江青于本日将抄件转送林彪、康生及周恩来本人。

中共中央发布通知要求全国深入学习5·16通知。

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67)161号

中央各部门、各革命委员会、各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中央决定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通知》，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个文件，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文件。希望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和讨论这个文件，并学习和讨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结合一年的斗争经验，领会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动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周恩来、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接见重庆两派代表，宣布了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意见。撤销任白戈的所有（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职务。重庆警备司令部在三支两军中没有顶住成都军区的方向路线错误，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肃反运动，支左犯了错误，现已认识并逐步改正。中央决定成立由兰亦农（驻军副政委）、白斌（副军长）、唐兴盛（军分区司令员）组成的革委会筹备小组。兰为组长，白为副组长。吸收适当人选，组成领导班子。对反革联会的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组织的都要平反。通过整风实现联合。（《传信录780》）

5月18日

《人民日报》与《红旗》联署，就5·16通知正式发表，刊登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这篇文章是对一年来文革的一个总结，是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其中，从“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一段，和文章最后一段，都是毛加写的。

《伟大的历史文件》

一年以前，在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个文件现在公开发表了。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去年二月，彭真抛出来的《汇报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出笼，是彭真修正主义集团由来已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大暴露，《通知》揭露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使这个集团破产了。这是一个突破口。从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阵线就乱了阵脚。

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这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混到党政领导机关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主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指出：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了毛主席这些科学论断是何等英明啊！

这些科学论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路明灯，是保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指路明灯。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

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现时代，又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毛主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那套修正主义货色拿出来示众，彻底批判，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对他们进行夺权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被广大群众揭露出来了。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现在揭露出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在全国胜利之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之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现在查明，彭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就是他支持的，也就是他的纲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他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他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现在，大家已经很清楚，毛主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所说的那种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种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头等重要的大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全中国的革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致欢呼这个伟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妄图在中国通过他们的代理人进行颠覆的阴谋，遭到最大的失败。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动亿万群众，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最可靠的保证。这是

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贡献。

在这个文件中，宣布撤销原来由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办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个伟大历史文件的公开发表，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现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是，严重的斗争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要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部门，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来。我们要把大批判运动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胜利完成各单位的斗批改任务。我们要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进一步繁荣起来。

党中央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通过学习这个文件，结合目前斗争的新形势，结合一年来的斗争经验，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周恩来接见军队院校代表，说：你们是那里有事就想到那里去打，找打架的地方。今天公开发表了《5·16通知》（去年是在党内）。通知中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讲的彭真。现在指的就是刘少奇了。（《传信录781》）

王光美专案组开始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的所谓“调查”。这个代号为504的专案组先后在全国拘捕、审讯64人，受牵连者不计其数。

第八十八卷 1967年5月19日至21日

(伍豪事件)

5月19日

周恩来就“伍豪启事”向毛泽东写信并附《大事纪》进行辩白。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在“存”字旁加划了两道杠，大有深意。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亲笔信

主席批：

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康生、江青同志已阅。

主席：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明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原件附件一]

大事记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

四月，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等经武汉入鄂豫皖苏区，顾留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

上海当夜得到消息，中央有关机关全部迁移。

五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人。^①

六月，向忠发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

九月，九·一八沈阳被日寇侵占。

十一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

^① 当时，顾顺章的家属掌握和了解我们党的许多机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中央机关地址。顾顺章叛变投敌后，经过我们侦察，取得了他们准备向敌人告密的可靠证据。他们还给顾顺章写信报告我党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址，对我党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为了保卫党的安全，我们采取了非常措施，将顾顺章的家属秘密处决。对于顾顺章幼女，由我工作人员谭钟玉同志送回家乡（上海宝山县）代为抚养。——原编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 37 号，33 号，在胶济路，武定路修德坊 6 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 91 号，从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报上登出的有：

时报(二十二至二十五，二十七至二十九七天)；

申报(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六天)；

新闻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七天)；

时事新报(二十四日至三十日七天)；

民国日报(二十四至二十七日四天)。

登得最详并附照片的为时报。(附一专讯)

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

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全文附)

报上登出的有：

时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至二日四天)；

申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三天)；

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至二日四天)；

时事新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至三日五天)；

民国日报(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至二日四天)。

十二月上旬周离沪，经汕头，从永定进入中央苏区。在闽西得知十二月十四日宁都暴动五军团起义成功。

二十日左右，周抵瑞金叶坪。

一九三二年一月，王世德发表叛变声明(全文附)

上海登一月十一日申报，其他报未见。

据报，南京中央日报登在一月二日。

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

二月，十八日起至二十一日，上海报上先后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附)。号称二百四十三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

上海报上登的有：

新闻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申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时事新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时报未登。

民国日报未找到。

二月二十二日，申报在广告栏内登出如下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种广告处启事，登在广告栏内很少先例，而又在伪造脱党启事登报的同天，当时一望而知是否认脱党启事的，故未能登出。这想是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公开否认办法。

[原件附件二]

周恩来夫妇：

查是案正凶周恩来，湖南人，化名极多，临机而变，共党有名伍豪者，即周也，周为法国留学生，历任黄埔学校教练，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妻名邓颖超，曾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妇运部负责人等职。又国民党方面查有共党中最为凶恶专事杀人之蔡飞，最近

因在上海犯绑案拘入巡捕房，业经派人向捕房查问核办。

录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时报》

[原件附件三]

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

敬启者，顺章于民国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于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与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自动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户读书，以求学识之长进。对于共党任何个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意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灭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恶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呈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严缉该犯等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伏祈公鉴。顾顺章谨启。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电局信箱八号。

录自民国二十年《申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共三天。

《时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日，共四天。

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十二月一、二日，共四天，字体小于上述两报。

民国日报同年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二两日，共四天。

时事新报同年十一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十二月一、二、三日，共五天。

[原件附件四]

王世德脱离共党紧要声明

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充任该党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党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自相残杀，乃于前月(按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龙章者，实即鄙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亦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分子，自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党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

王世德谨启

录自《申报》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十一日

[原件附件五]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录自《申报》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新闻报》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时报》没登此消息。

《时事新报》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补注：后经复查，一九三二年《时报》二月十六、十七两日的号外版亦登过此伪造启事。

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的真相

周恩来文集编辑组

一九三二年的二月中旬至下旬，国民党反动派用周恩来同志的一个笔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各报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借以污蔑周恩来同志、攻击我党。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利用上述伪造材料，对周恩来同志进行攻击和陷害。本文想就这件事情的真相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围绕这个问题所开展的激烈斗争，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因为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的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所以他的叛变对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当时形势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事变的重担。他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机关之前，采取了一系列妥善有效的措施，经过几个日夜不眠的紧张战斗，就迅速地把局面稳定下来。敌人妄图破坏我党中央机关、逮捕我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计划遭到破产。

事情过后，同志们怀着极其敬佩和感激的心情赞颂周恩来同志。敌人却因为阴谋的破产而十分恼火，将搜捕的最主要目标集中到周恩来同志身上。一九三一年九月，国民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志的决定。同年十一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同志的紧急启事。但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同志的踪迹，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敌人便又施出惯用的造谣诬陷伎俩，用“伍豪”的名义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报登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的假启事(全文见《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附件五)。敌人在这个伪造的启事中，所以用“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的名义，不单单是由于搜捕我地下党遭到失败，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恩来同志是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国内享有崇高威信。敌人妄图利用这种伎俩，造成我们党内的混乱，瓦解我们的党。正因为它是伪造的，所以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虽号称二百四十三人，却除了“伍豪”一个名字外，再没有另外一个姓名。如果真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敌人怎么会吝啬到连多一个名字都不肯写呢？！

当敌人在上海各报抛出这个伪造启事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已经离开了上海两个多月，早已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进入中央苏区，又怎么会在上海各报发表所谓“启事”呢？！

当时周恩来同志虽然已远离上海，但是，国民党伪造的启事登出以后，我们党立即予以揭穿，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这一斗争是由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进行的。在敌人抛出伪造启事的第二天，就用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所可能做到的公开否认的巧妙办法，写了一个实际上是辟谣的启事。这个启事登在二月二十二日的《申报》上，全文如下“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显然是一条很特别的启事。从内容上看，这样的广告处启事，极少先例。照一般情况，报刊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答复本人就可以了，绝不会在广告栏内再这样的刊登出来。再从时间上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二月十八日送给申报馆的，当时从二月十六日起，《时报》(号外)、《新闻报》先后登出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续登载了同一个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申报馆广告处又发表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上述声明。这样一种安排，使人一看就会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威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报刊以曲折的笔法登出辟谣启事的同时，我们党又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代党刊《斗争》第四期)上，以伍豪的名义，登

出了《伍豪启事》，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造谣诽谤。全文如下：

“伍豪启事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民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把中俄合办的中东路双手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三省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中，在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背后，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二月二十日”

配合登出《伍豪启事》一文，二月二十七日的《实报》上又以《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国民党伪造启事的文章，剖析了敌人抛出伪造启事的政治背景和惯用的造谣诬陷伎俩，深刻地揭露了敌人的虚弱本质和凶残狡诈的狰狞面目。现将全文摘要刊载如下：

“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

国民党反革命派，在与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运动斗争中，否认在政治上、军事上、理论上，都受到可怜的悲惨的失败之后，却企图以造谣中伤伪造文件来破坏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欺骗蒙蔽和愚弄劳苦群众！

.....

这类‘聊以自慰’‘并以惑众’的无耻的造谣之一，便是本月十六日后，时报、新闻报、申报那批反革命报纸上所刊登下列的广告：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见《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附件五，此处从略一引者）

这个文件是敌人在反对自己的政敌之中，所用的最无耻与卑鄙手段的模范之一！

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刑事犯的罪名追逐与通缉伍豪同志（即所谓爱棠村案）。现在却又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污蔑共产国际。难道天地间更有卑鄙与无耻甚于国民党反革命派的么？

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坚决的知道：唯一的真正能解放中国民族脱离帝国主义羁绊与压迫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所指的道路：民众武装进行坚决勇敢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而推翻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他们坚决相信：在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斗争中，只有苏联是唯一的盟友与兄弟的国家。

伍豪同志将与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都一致地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之下，以坚决英勇的打倒国民党的国内战争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来回答敌人的污蔑与造谣！

如果谣言能救国民党于死亡，则国民党这类混蛋可以不朽，可惜谣言只能证明反革命派之无力与破产，而不能挽救国民党之死亡！”

为了向广大群众公开地揭穿敌人对周恩来同志、对我党的造谣污蔑，我们党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约请律师代登启事，进行辟谣。在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中国律师是难以承办这件事的。我们党便通过一定的关系和渠道，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户营业的

法国律师巴和，由他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的《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的别名。现将全文抄录于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的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这个启事，在措词上非常巧妙，既合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又澄清事实真相，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这是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事情的全部情况，康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他当时就在上海，而且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对这一点，康生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曾不止一次的说过。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两个提到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还这样写过：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事”。“当时在上海同志都知道这样事。”

但是，时隔几年，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五月中旬，即《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前后，当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当年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条材料，向周恩来同志进行围攻，社会上掀起反对周恩来同志的逆流的时候，人们却看不到康生有片纸只字的表态。

为了回击林彪、“四人帮”的进攻，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即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用充分的材料讲清历史情况，说明当时自己早已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两个多月，正在中央苏区承担工作。同时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历史材料做为附件，一并送上(见《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有人提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可是，这个问题并未就此了结，党内外大多数同志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因此，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做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并且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但是，“四人帮”及其一伙却采取拖延的手法，拒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再次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同志病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当时，“四人帮”仍在横行。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问题仍有可能成为“四人帮”用以进行煽动，实行篡党夺权的借口，因此，周恩来同志在进入手术室之前，要来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所谓“伍豪启事”问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他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报告的日期，并写上了当时签字的时间和环境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见原件的影印件)。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这件事竟成为他老人家生前未了的遗愿。在周恩来文集编辑组工作的我们，有责任公布周恩来同志编定的文件，说明问题的真相，揭发林彪、“四人帮”攻击周恩来同志的罪行，并杜绝今后再有林彪、“四人帮”之类利用这个问题制造混乱。那种妄图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所谓“伍豪启事”来玷污周恩

来同志的阴谋，不过是一种历史丑行。周恩来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极端负责，对敌人斗争英勇坚定，他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原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

所谓“伍豪事件”，是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拿来诬陷和攻击周恩来同志的一桩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反革命阴谋事件。

“文化大革命”中，当江青反革命集团再三利用由国民党特务假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欺骗群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此系“国民党造谣污蔑”，周恩来同志作了多次严正的声明，陈云同志根据事实也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由于未在党内传达，知道真实情况的人很少。现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虽已数年，但流毒未彻底清除，党内外仍可能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受其欺骗。为了弄清真相，使全党同志从这一事件中受到教育，我们采取郑重的负责的态度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扼要整理如下。

一、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国民党反动派用周恩来同志的一个别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报纸上，刊登了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通过这则启事，达到诬蔑周恩来同志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目的。

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围剿”，都在红军的反“围剿”中遭到惨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抗日，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企图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他们积极准备第四次“围剿”，同时阴谋一举消灭当时设在上海的我党中央。他们搜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这时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中央情报保卫工作，他的工作对国民党反动派威胁很大。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伪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政治背景。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原为我党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举破坏我党中央的可能。幸而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党员钱壮飞同志等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周恩来同志得知后，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转移中央机关和改变负责人住处，改变党的工作方法，等等，使局势转危为安。六月二十二日，又发生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周恩来同志又采取了果断措施。这样，一再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叛徒将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敌人深知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同志，恨之入骨，乃于九月一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志等，继而又于十一月底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通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但这些均告无效。于是乃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刊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目的是想在我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

据曾因逮捕顾顺章而获得蒋介石嘉奖的国民党中央特务黄凯(一九三二年二月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一九五三年供称，这个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上海各报刊载。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送到申报馆广告门市部。广告处律师看了后认为，这个启事称二百四十三人脱党而具名只“伍豪”一人，有明显漏洞，“决定十六日暂不刊出”。但二月十六、十七日，《时报早晨号外》首先刊出了这一启事。十八日，《新闻报》也刊登了。十九日，国民党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为何不登这个启事，《申报》遂于

二十、二十一日刊登。《时事新报》也在这两天刊登。

二、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伪造启事

早在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报纸上刊登这个伪造启事之前两个多月，周恩来同志已经按照党的决定，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离开上海，中旬经福建永定进入苏区，十二月底到达瑞金。足见，伪造启事在上海各报刊出时，他已不在上海。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迅速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造谣诬蔑。

当时，《申报》在上海影响最大，党和申报馆有一定的关系。二月十八日，党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但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二月二十日，党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这一传单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二月二十日，《申报》也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正如陈云同志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十一期，刊登了党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接着，党还采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措施，以周恩来同志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巴和律师为《申报》常年法律顾问，经付以重金后，在三月四日的《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这一启事公开刊登后，便在党内外进一步澄清了问题。

一九三二年二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据国民党特务黄凯于一九五三年六月供称，伪造启事“丝豪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国民党反动派演出的伪造启事这一丑剧，最后不得不毫无结果而终。

三、江青等人企图利用伪造启事诬蔑陷害周恩来同志

由上可见，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反动派炮制出来用以造谣诬蔑我们党和周恩来同志的，这是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却一再妄图用这一伪造启事来诬陷、攻击周恩来同志。

一九六七年夏，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同志的别名后，于五月十二日将载有这一伪造启事的报纸的抄件送与江青。江青收到后，不作任何调查研究，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把伪造启事的抄件摆在他们三人面前，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这封信实际上是逼周恩来作出交待的通牒。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同志迅速地、断然地予以反驳。五月十九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恩来同志查阅了上海各旧报，亲自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同志。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同志看了周恩来同志送去的信和材料以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向毛泽东同志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又在一次谈话中说：象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毛泽东同志除了上述两次亲自澄清伪造启事外，还曾经嘱周恩来同志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

江青等人则企图利用伪造启事陷害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七年十月，江青在北京市钓鱼台接见吴法宪等人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同一时期，“四人帮”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列入“伍豪启事”一条。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将诬蔑周恩来同志的材料密封起来交给了吴法宪。

周恩来同志注意到江青等人居心叵测，因而曾就此事多次作了严正声明。除上述外，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他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拍照存档。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知她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并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谢富治家属记载，谢富治在死之前说：“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现已查明，康生的确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曾先后在涉及这个问题的两材料上批道：“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事”。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他口授了一个记录，出面证实：“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同志要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列入了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议程。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陈云同志，在六月十三日发言中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

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同一天，陈云同志还写了书面发言，说：“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专门报告了这个问题，再次说明这是敌人的造谣诬陷。

对于周恩来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伪造启事所做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曾提出将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但是会后却被搁置下来未办。而且王洪文于七月间还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档案馆“查到一份伍豪等人的启事”，于七月十七日报王洪文。王洪文批道：“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一九七二年冬，上海有人证明一九三二年二月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伍豪等启事”而设法刊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的情况，启事内容说：“报载事实不符，谣传不足凭信”。这一材料被张春桥、徐景贤扣压，不报中央。这些都说明江青一伙的陷害之心不死。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同志病重，在入手术室前他要来了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用已经颤抖的手亲笔在上面签了名，并注明了报告日期。这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关切。

周恩来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党性纯洁，立场坚定，不能容忍敌人的诬蔑对他的玷污，不能容忍这种诬蔑给我们带来不良影响。为了保护党的荣誉和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为澄清所谓“伍豪等启事”作了多次努力。经过他的努力、毛泽东同志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等的证明，事情已经完全清楚，江青等人企图利用伪造启事的阴谋早已破产。但是，由于一九六七年五月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始终没有一个党的正式文件澄清此事，至今还有许多同志不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曾经在一部分人当中传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尚未清除，因此，现在根据历史事实写出这份材料，向全党同志如实地介绍国民党反动派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及我党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经过，仍属必要。这不仅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遗愿，也符合全党同志的愿望。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中 央 党 史 研 究 室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

[按] 共产党惯于整人，大批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有些人也触入罪网，但念态度尚好或其他原因，大开恩宥，性虽定为反、坏、右，但不戴帽子，是为“不戴帽的反、坏、右分子”。这些“不戴帽者”虽暂不戴帽以观后效，但是帽子拿在当局手里，今后表现稍不顺眼，就立即扣下来，把你打入黑五类的队伍。堂皇其名曰“交群众监督，帽子在群众手里”。我想，这种人的心境大体上是同判死缓者相去无几的。“伍豪启事”也是一顶操在毛泽东和他的小帮派们手里的“叛徒”帽子，是专为周恩来预备的。当然，为周准备的也可能还有其他可以顺手拈来的“帽子”。君不见，1970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被揪，

毛泽东的佛手一翻，六顶帽子便扣在这个曾充毛的政治秘书多年，号称中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大右派陈伯达的头上。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似乎更惨。叛徒的帽子一直悬在他头上，直至身患绝症，要进手术室之前，仍然为此而忧心忡忡。

1975年9月20日，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自己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历史在这里沉思》第1册第79页）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通知，号召全军学习《5·16通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求各群众组织间求同存异，共同对敌。

5月20日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演出派)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批斗萧华大会。

《红旗》第七期刊载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大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北航、北邮、北林等院校革委会成立。

由50多个造反派组织主办的大型革命画展“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在北京美术馆开幕。

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原荣宝斋)举行“打倒刘少奇”漫画图片展览。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的漫画“打倒刘少奇”，每套百余幅，共印50万册，在市面上发行。极尽丑化刘少奇的能事。

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群众在公安局前静坐示威，抗议它的成员被捕，是为福州路事件。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组“毛主席语录歌曲”。之后，“语录歌”风靡一时。

5月21日

周恩来指示，国家体委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

第八十九卷 1967年5月22日至31日

(5·16反革命组织)

5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

为构陷刘少奇叛变罪名，专案组对中华合作总社的孟用潜实行隔离审查。5至10月间，又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及丁觉群、王世英等十一人，逼取证词^①。孟、杨、丁皆1929年刘少奇在沈阳被捕时的同事。

血腥的证词——诬陷刘少奇在东北充当“叛徒”的真相

一九六七年，在康生、江青直接指挥下，专案组抓住刘少奇一九二九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一事大做文章，他们将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七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主席写了二十封信申诉翻案，讲述真相，但均被扣压。)专案组立即向戚本禹、陈伯达、康生、江青报功。七月二十八日，戚本禹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出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机公布”。江青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同一天，中央五〇四专案组(即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某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

就在巫某等人抵沈阳的当天，一个七人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十五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一九二九年前后的二百四十五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一九二九年前后原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某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查处代理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二十七天里进行了三十八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那个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刘青第被逼按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刻如获至宝带回北京。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晨五时，一个被关押在公安厅招待所隔离的人突然用刮脸刀片割开了自己的脖颈，顿时鲜血淋漓。他叫关庆云，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当过代理科长。办案人员在他家中讯问十几次没有结果，就将他关押起来，经过多次审讯，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关庆云只好一死了之，经过抢救脱险之后，血迹未干，伤口未愈，审讯又开始了。根据彻查办主任的授意，办案人员先向关庆云介绍了一九二九年所谓案情，然后让他交代。关庆云欲死不能，欲说不知，不说不饶，死逼无奈只好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资派，我就证实，哪怕牺牲我自己。”于是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同志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

^① 其他被拘押的还有冯少白、曹亮、梁漱德、马国钧、丁君羊等。

先后还有贾文琦、董仁、熊守成被逼自杀(均未遂)。

杨明襄从一九五三年就患神经病，是当地有名的“杨魔症”，专案组也把他作为重点知情人带到招待所“办班”。杨大、小便不能自理，就请专人护理；记不得什么，专家人员就不厌其烦地给他讲“纱厂的故事”。有时吓唬他，有时也来软的，给他好吃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份杨明襄的“证实材料”终于形成上报了。

为了把证词搞得天衣无缝，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的再加工，然后再让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七十一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

(辽宁《共产党员》内部发行版 1986 年 11 期 宫耳、杨大勇文)

载《文摘周报》1986 年 12 月 12 日

外交部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对驻英代办的粗暴态度，宣布取消英驻华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

5月下旬

毛泽东作出决定：

- 一、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接管中央宣传部。
- 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研究决定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到中央宣传部来办公。
- 三、对在旧中宣部工作的干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决定集中学习，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个学习班要同志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同时这个学习班要集中力量斗黑帮、批判黑帮。

5月 23 日

《人民日报》重新刊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复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为题，发表社论，进行谀颂。下午，首都各界一万六千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纪念《讲话》发表 25 周年，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参加。大会由江青主持，陈伯达讲话，说：“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以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戚本禹在会上作报告，题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传信录 784、785》)

郭沫若在会上热情歌颂：

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你善于学习和应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无畏地在文艺战线冲锋，
让工人、农民、战士的英雄形象占据了中国的舞台。
我们一定会让英雄形象占据世界舞台，
中国的昨天就是众多亚非国家的今天。
中国的今天会是他们的明天，
我们要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
我们要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飘扬在亚非国家，
飘扬在五洲四海！

比共政治局委员司徒·伦斯、锡(斯里兰卡) 共中央书记桑穆加塔桑相继参

观访问北京地质学院，高度评价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晚，中央文革宣布成立文艺组与宣传组。

5月24日

红代会发表声明：炮打周恩来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戚本禹指示：图书馆除涉及边疆机密、黄色书籍、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的著作外，其它书籍都可外借。

[按]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除马、恩、列、斯和毛的所谓经典著作外，实已全部封禁，书店亦然。建国以来历经几次运动，治社会科学学者已普遍有摇手犯禁，腹诽横加之惧。至文化大革命而焚坑公行，故文化大革命实则大革文化命、或文化大革除也。

5月25日

毛泽东批准发布内蒙军区5·25命令。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军委对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命令的批示：

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的命令，很好。内蒙古军区的全体干部和战士应该坚决贯彻执行。

内蒙古军区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境的光荣任务，应该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的伟大号召，机关、部队应该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所有人员应该坚守工作岗位和战斗岗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应该最听毛主席的话，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执行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军区命令

内蒙古军区部份干部和战士来京以后，中央、军委首长两次接见，听取军区来京常委的汇报，对我们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并派负责同志到驻地分别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这是对内蒙古军区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信任。中央、军委首长的谆谆教导，使我们受到了极大地教育和鼓舞。

为了切实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为了认真实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为了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的伟大号召，特发布以下五条命令：

第一、坚决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军区各单位到呼市和其它各地串连的人员，必须于五月底以前一律返回原单位，不得在其它地方停留。过期不归的，以自由离部队处理。

第二、坚决贯彻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和中央、军委的其它有关命令、规定。

一、除步校、卫校、文工团、体工队和军乐队等开展“四大”的单位以外，军区领导

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

二、不许军队内部相互串连，也不许军队到地方去串连，对地方群众到军队串连的应予劝阻。

三、进行正面教育的单位，不应有战斗组织，现有的战斗组织一律取消，以确保领导机关严密地、完整地指挥体系，保证机关和部队的正常工作和秩序。

四、军队未经军区批准，不许随便游行和集会。

五、汽车和汽油的使用应由各级后勤部严格控制，加强管理，各种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工具、以及其它补充器材等应由领导机关严格控制使用。

第三、坚决支持和维护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单位和人员。对不满中央这一决定或言行不一、阳奉阴违的人，要进行教育和严格批评，对少数对抗中央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屡教不改、坚持错误的人，要给予纪律处分。

第四、全军区指战员一定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努力提高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提高政策水平，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绝对不准参加武斗，对于持不同观点的人，不应歧视，更不允许打击报复。

第五、坚决支持呼市三司和内蒙各地左派群众组织，努力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中受蒙蔽和认识不清的广大革命群众及其基层组织，全军区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身体力行，模范地执行中央决定。

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全军区指战员一起，坚决支持左派，教育团结受蒙蔽的广大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内蒙的乌兰夫、王逸伦、王铎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内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期望。

代理司令员 滕海清

政治委员 吴涛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召开“坚决与三反分子谭震林血战到底誓师大会”。首都大专院校及其他各部、口造反派近两万人参加，上海等五个地区来电支持。

广西“4·22”派进占《广西日报》办公楼。支韦（国清）派成立“5·25”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和“5·25 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联指”），与之进行械斗，直至 26 日晚，“联指”自动撤离，“4·22”派重新控制报社。宣布对《广西日报》夺权。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文件，即《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指示》。

5月26日

周恩来在科学院讲话，号召进行革命大批判。

本月 24、25·26 三天，《人民日报》相继发表毛泽东 1944 年《看了〈逼上梁山〉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51 年《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及 1963 年关于文艺界社会主义改造的批示和 1964 年关于文艺界各协会及其刊物的改造问题的批示。

5月27日

陈伯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叶群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及

外语学院、第二外语学院革命组织负责人，就一外“造反团”、“6·16”和二外“首都红卫兵”给周恩来贴大字报进行了批评。（《传信录 788》）

《红旗》第 9 期刊登姚文元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纲领》—在上海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蒙古反华暴行。

5月 28 日

中央同意内蒙对乌兰夫进行不直接点名的公开批判。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169 号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意你们关于在内蒙古日报上公开批判乌兰夫和王逸伦、王铎的意见。

一、对乌兰夫不直接点名、称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对王逸伦、王铎公开点名。

中 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批准对国防部所属几个部委实行军管的决定。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

一、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任命×××为军管会主任或军管小组长，×××、×××为副主任或副组长。

二、军管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各项方针政策，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斗、批、改，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影响，挖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

三、军管会应当坚定不移地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提高思想、政策水平。在同时存在着两个或更多左派群众组织的情况下，要帮助他们认清主要敌人、抓住主要矛盾，协商解决双方的争论，共同对敌，对于那些受蒙蔽而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应该耐心地教育他们同幕后操纵他们的坏人划清界限，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这样才能够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争取、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四、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对部（委）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部属单位无论是否实行军管的，均受部军管会的领导；分散在各地的单位，同时受所在地革命委员会或军区的领导，但有关生产运输调度业务，必须服从部军管会的集中指挥。

五、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统帅生产，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掀起生产的新高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

划。

六、实行军事管制后，对外活动如需要以行政首长名义签署或接洽的，仍按过去规定办理。行政首长已经撤职或停职的，应由上级指定适当人选以代理人名义出面。

七、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应当成为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模范；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加强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努力做好群众工作，充分发扬民主，进行四“大”；工作中走群众路线，遇事同群众商量，反对包办代替、强迫命令。

八、实行军事管制以后，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全体职工、干部应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促进思想革命化，坚守岗位，努力工作，向一切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各革命群众和全体职工、干部应当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自觉地服从军管会的领导，如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可以随时提出批评、建议或向上级反映，但在军管会或上级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仍应坚决执行。

本决定应向××部(委)及所属单位全体职工和干部传达，并可在内部张贴。

就北京部分院校干扰新华社工作，27日且向新华社发出照会一事，陈伯达电告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不许外部插手新华社。

新华社播发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及林彪就此件给中央常委的信。

5月29日

毛泽东了解到社会上炮打周恩来的风潮时，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与邓小平》一书(第55页)收录有毛泽东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无具体时期，亦真伪难辨，姑录于次，以供参考。

“文革小组的一些人对周恩来很有意见。主要是他总是联合与妥协的习惯使他们不满。最近，红卫兵开始在大字报中批评他。当然，没有人会否认诚实的周恩来的主要品质。但另一方面，他已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他的才能使得他事实上在党内是无法代替的……所以，我们应该尽力保护他。假如他与刘少奇、邓小平明显地断绝关系，我想，我们应该把他联合到我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来，并给他以某种程度的议政自由。”

中央发布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军委发电：

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已经看过，经中央文革、军委党委、军委文革小组讨论通过。

中央军委、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目前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的大批判的高潮中，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片大好形势，为了胜利地完成一批二斗三改的历史任务，根据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精神，结合军队院校的具体情况，特作如下指示：

1、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前必须更高地举起革命的批判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按各单位不同的情况，逐步的转入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本单位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深批透，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军队院校的党员、干部、教职员都不要外出串连，已经外出串连的，要迅速返回本单位，进行斗批改。

2、为了完成斗批改的艰巨任务，必须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并且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的，应该尽快地建立有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在本院的领导权力；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没有占优势的，应该通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壮大左派力量，积极创造条件，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有些院校党的领导、行政领导基本上还好，不需要夺权的，也应根据三结合的原则，充实和加强领导班子。

3、院校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钻进干部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多是可以改过来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帮助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对犯错误的干部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检讨亮相的机会，鼓励他们放下包袱，站出来工作，将功补过，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犯有错误的干部必须认真检讨错误、确实改正错误，以取得群众的信任。

4、中级指挥、技术、医务学校，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应逐步做到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上课要和文化大革命紧密结合，主要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并以一定工作时间学习一些专业课程。

5、在运动中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边战斗边整风，要引导革命群众组织自觉地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打倒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认真提倡文斗，反对武斗，不断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6、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应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对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旗帜鲜明，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应该帮助他们通过整风。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不能片面地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领导上和左派组织都要耐心地作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欢迎他们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上来。要注意抓典型单位，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帮助院校搞好斗、批、改。

这个指示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军队的文艺体育团体，除第二、四条外，也适用于军队的科研设计单位。

陈伯达等接见红代会核心组，指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1966年3月22日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今天公开发表。

北京部分红卫兵举行集会纪念红卫兵诞生一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以“联动”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召开“红卫兵万岁”大会，并与对立派发生尖锐冲突，这是“联动”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的最后一次高峰。

王海容、唐闻生写信给毛，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毛批示，“极左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作说服工作。”

5月30日

戚本禹谈毛主席制定5·16通知的历史背景：

(一)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长期勾结，在党内形成一股反毛主席的势力。国内外都有他们的基础。所以毛主席那时老提这个问题。他到外省后就提出蔡锷在云南反对袁世凯。还问：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毛主席再三提出，再三警告，后在十中全会上强调并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口号。

(二)据我知道，很多中央的同志都感到中央的第一个接班人是反对毛主席的，感到党有分裂的危险。很高的负责同志都哭过好几次，他们这完全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他们为中国命运担忧，为党的命运担忧。

(三)十几年来，刘、邓已经把持了许多要害部门。拿中央办公厅来说，主任杨尚昆，副主任曾山之类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是刘、邓的死党。还有田家英作了很多坏事，他公然叫嚣：“刘公怎么还不造反呵？”所说刘公，就是刘少奇。“反了吧！还不反？”他着急死了，就跳出来了。就是我过去呆过的小小秘书室，最近提出要当主任的陈炳函是个大叛徒。工业、农业、文教，很多口，很多要害部门，很多重要岗位都被他们占领。党的三大要害部门：一个宣传部、一个组织部、一个办公厅，都是他们掌握的。所以，62年刘少奇才敢于提出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不能下去蹲点就靠边站。”这都是有所指的。甚至提出毛主席的著作是教条主义的。当时这样嚣张，这样公开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我们很多同志是没有察觉的。

(四)他们有个人想抓军队，就是罗瑞卿，给我们识破了，打下去了。他们秘密报告都准备好了。彭真在畅观楼搞了个酸秀才么！就是把毛主席和中央的文件作为黑材料，作了一番准备嘛！那是很系统的。这就是他们的上台的秘密报告，他们那是准备好了的。有的黑帮交待：他们政变以后，陈伯达怎么安排？谁人怎么安排？都作了周密的计划。

(五)过去很多干部群众给毛主席写信告刘少奇，告邓小平。辽宁有个铁匠，他就是首先向中央揭发刘少奇提倡的富农可以入党这个问题的。后来他长期受报复打击。四川刘结挺、张西挺他们反对李井泉三自一包的单干风。李开始拉拢，李的老婆给刘洁挺老婆送礼，刘不要，以后李井泉就把他关起来。他们告到中央了，接待人员把材料交给童小鹏，童送给邓小平，邓批给西南局，于是回去后又抓起来，邓小平包庇李井泉。李井泉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不听毛主席的，他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卫恒(山西第一书记)就是听薄一波的。给薄一波、安子文写报告，就是不给中央写报告，他们的人事安排都要问薄一波，不问中央，不问毛主席。

(六)今天文化大革命是到了总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什么《海瑞罢官》，什么翦伯赞，都是舆论准备。什么吴晗问题，邓拓问题，都是前哨战。真正的大决战战役是解决这个问题。

全国妇联批斗“党内走资派、妇联副主任康克清”和“大叛徒、妇联副主任章蕴。”

广西“联指”为夺取《广西日报》大楼，与据守的“4·22”派武装冲突又演。连日来，社会上两派武斗盛行。

5月31日

中央发布关于专区及县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或革委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中发(67)172号

各军区，省军区，军，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省军管会：

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暂规定如下。

一、关于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批准。

成立正式革命委员会，地专级由军区审查，报中央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批准，报大军区备案。

二、关于已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的规定：

成立地专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成立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省革命委员会批准。

成立地专级正式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报中央批准；成立县级正式革命委员会，由省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报中央备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节录)

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璧，为保卫红卫兵的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亿万青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一代新人。吕祥璧同志就是这一代新人的突出代表之一。

林彪同志说：“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这种人是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的人”。因此，林彪同志号召：“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

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灭资兴无，破私立公，在头脑里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正是吕祥璧同志所以能够在入伍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地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最根本的原因。他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的崇高的思想和言行，为我们作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榜样。

在头脑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要树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权威，

就要树立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权威。这是决定着我们每个人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头等大事；是决定着我们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头等大事。正象吕祥璧同志所说：“有了毛主席，才有我吕祥璧；有了毛主席，才有新中国；有了毛主席，才能有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要象吕祥璧那样，在自己的头脑里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周恩来为保证铁路轮船交通，致函中央文革：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先念、剑英、萧华、成武、谷牧、秋里各同志会商此事，除已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中共中央决定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并且从六月一日起，先后五次发布命令、通告和布告，以解决交通运输混乱的严重局势，还派了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

5月31日—6月5日

亚非作家常设局在北京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讨论会”。6月9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讨论会的来自亚非和世界各国的作家和朋友。

5月底

以张建旗为首，策划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同时在北京农业大学亦出现同名的组织。

“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什么东西？！

钢院延安公社 329纵队

最近，在首都出现了一个什么“五一六兵团”。这一群见不得阳光的小丑，在一小撮陶铸式野心家的暗中指使、操纵下，上窜下跳，四方串联，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往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上街张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散布谣言，妄图掀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江青同志指出：“秘密组织‘五·一六’是不容许的！”

几个月以来，大量事实证明“五·一六兵团”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理论的反革命阴谋组织。他们的坏头头是一些对党、对社会主义有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罪恶活动的三个阶段

去年十二月份，从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刮起了一股炮打中央文革的黑风，当时，现在的“五一六兵团”的头目之一的张建旗也磨拳擦掌，蠢蠢欲动，并跟沈阳等地的社会渣滓串通，秘密收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黑材料。同时，在首都其他一些院校、国家机关以及湖南长沙等地，也都有一小撮坏蛋在暗地里干着同样的罪恶勾当，阴谋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时，慑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声势浩大的反击，他没有敢公开跳出来。这是五·一

六罪恶活动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今年二、三月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前后。适宜的气候，又使得这一班小丑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公开跳了出来。

三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张建旗在钢院“革造”一团连继召集“形势讨论会”，并作了长篇发言，肆无忌惮地诽谤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公开煽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月二十四日，师大苏××等三人也公开跳了出来。在这一期间，其他一些单位的丑角也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这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当即遭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迎头痛击。张建旗被当时的钢院九一九、东方红、钢铁公社等革命组织(延安公社的前身)揪出来斗争了。而其他的一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小丑李芳、陈立、李良弼等人却被“革造”包庇、窝藏了起来，并为他们提供进行阴谋活动的一切便利条件，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攻势面前，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不得不再次转入地下。

“五·一六兵团”罪恶活动的第三阶段是在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以后。当时，社会上的那么几个政治赌棍，从“揪摘桃派”论转化出来一个什么“再抓一小撮”论，“第二次文化革命”论，他们以资产阶级政客的眼光看待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当赌博、押宝，到处散布他的“再抓一小撮”论，闹得满城风雨。

在这阵阵的妖风迷雾中，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为他们的反革命本能所驱使，利令智昏，再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在躲在某几个阴暗角落里的一小撮 反党野心家的操纵指使下，经过一番串联、组织，正式成立了“首都五·一六兵团”。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加紧进行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在六、七月份达到了高峰，请看：

五月底，张建旗等人在北大某地召开黑会策划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什么“揭发批判”；与此同时，农大也出现了一个“五·一六兵团”，在二外，张××带头跳出来发表了什么“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商院，也跳出来一个炮打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决战纵队”。

六月二日，张建旗等人在外院密会，宣布成立“钢院五·一六兵团”。

六月三日张建旗发表“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煽动人们起来造反。同日又散发反动传单“二十三个为什么”，胡说毛主席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等等，十分恶毒。

六月三十日，经过一番串联后，一伙反革命分子在外语学院开了两天所谓“首都五·一六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兵团”。会上大搞所谓的“二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这个所谓的什么“代表大会决议”杀气腾腾地说，要展开“各种形式的各种针锋相对的积极斗争”，“我们决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启发造反派内部觉悟上，应该从国务院各口、各部内因入手，积极工作。”还成立什么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作战方案。”“决心”顽抗到底。

此后，这一小撮 反革命分子就集中力量在各部各口到处散发反动传单，涂写反动标语。

八月八日，抛出一个“十九个为什么”；公开为刘少奇翻案，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

八月九日，他们又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八九战役”，派出一大批喽罗走卒，在更深人静的时候，大量散发、张贴反动传单，涂写反动标语，什么“×××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等，嚣张之极，愚蠢之极！

配合着这个所谓的“八九战役”，在长沙等地也出现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浪潮。

接着，八月十二日到十五日，黑匪所谓的第一、二、四、五、六方面军负责人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了三天所谓的“火线会议”。

为了抵消中央首长八月十一日讲话对他们的压力，稳定军心，这个所谓的“火线会议”发表了一个“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吹嘘他们的所谓“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都极力关切。”并用诡辩手法歪曲中央首长八月十一日的讲话，说伯达同志引用毛主席的题词“多思”，是在“鼓励”他们，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中央首长痛斥五一六是秘密组织，阴谋组织，是“在指示我们不应该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该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该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说“阴谋这个词不是坏的，而是好的。”荒唐透顶，可笑之极！

这个所谓“火线会议”还作出四点决议：

一、要加强我们的斗争，坚定我们的政治方向，而不容许削弱我们的斗争和动摇我们的方向。

二、要坚持我们的斗争口号，而不是缓和和修正我们的斗争口号。

三、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要还我毛主席的四大，而不是丢弃毛主席的四大。

四、坚决毫不动摇地为建立红色根据地而奋斗，把我们的组织能公开的则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在五一六兵团的罪恶活动中，有《红旗》杂志社的四名“记者”，还有几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上窜下跳于“五一六兵团”与黑后台之间，有人给他们提供中央首长的电话号码，有人开小汽车给他们散发传单，他们有优越的活动条件，他们的魔爪伸到了各部、各口、各个部门、地区。

阴沟里跳出来的一群小丑

打着红旗反红旗是陶铸式人物的特点。

“五·一六兵团”的小头目张建旗，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他自称“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向跟他作斗争的人提什么抗议，装模作样地叫喊“誓死保卫毛主席”，背地里却恶毒地咒骂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在缴获的“五·一六兵团”的黑材料中，就发现有张建旗写的咒骂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标语。

张建旗进行反革命活动，完全是出自他的阶级本能，是跟他顽固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分不开的，也是跟他的家庭的影响分不开的。

张建旗在文化革命前，靠投机，捞到了一个预备党员的头衔，在文化革命中，他是反革命工作队最得力的帮凶，他父亲张世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范五的喽罗，原任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被揪出来后，工薪降为十二元。他的母亲孙西，也是一个坏干部，原任黑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也被群众揪出来斗争了。

这帮家伙进行反革命活动有着一整套反革命诡辩术，可以把白的说成是黑的。中央首长八月十一日痛斥了这个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他们经过一番“分析”后，竟解释成中央首长是“支持”他们的，“叫人们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他们用捏造、颠倒是非等种种最卑鄙无耻的阴谋手段，收集、整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黑材料，妄图分裂和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目的决不只是反对某一个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目的企图是打开一个缺口，从而搞垮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以使天下大乱，取而代之，复辟资本主义。

这帮家伙竟敢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翻案。明明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背着毛主席大肆散布和平幻想，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企图把人民军队双手奉送给国民党反动派，

他们却硬往总理身上栽赃，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总理提出来的。这一帮家伙把刘少奇解放以来在国际国内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洗刷得一干二净，而统统往总理身上推。狼子野心可见一斑！

这一帮家伙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咒骂林副主席亲自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是“老保”、“官办组织”、“御林军”，叫嚣炮打肖华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吴克华，崔田民，炮轰徐、叶、陈没有材料。”直接把矛头对准林副主席，对准伟大的长城人民解放军。

这一帮家伙到处散布“文化革命是二线向一线夺权”的反动谬论，妄图搅乱阶级阵线，分裂和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这一帮家伙歪曲马列主义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学说，叫嚣要打碎我们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煽动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夺权。

这一帮家伙，就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五一六兵团”的出现，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毫不足怪。当前，“五一六兵团”的这一小撮坏蛋已经完全陷入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些从“左”右两方面来搅乱斗争大方向，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陶铸式的人物，决计逃不过历史的判决！

地院《东方红报》74期、钢院延安公社《东方红》39期联合版。

陈伯达、康生、江青谈批判“5·16兵团”。

陈伯达说：

还有个“5·16”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是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出警告。

康生说：

要警惕“5·16”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要从极“左”的和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党中央，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上了当，帮了他的忙，对于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结合起来。

江青说：

“5·16”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5·16”用极左制造分裂。“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是反革命组织。

[按] 所谓“5·16反革命案”是文革中一个重大而又始终扑朔迷离的大案件，牵涉的群众难以计数，然最后又以全无实据了局。此中玄奥，仍有待掌握当时公安档案，专题研究。局外人暂时尚难妄加推测。

从本月下旬开始，北京高等院校普遍进行所谓“斗、批、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月一日以前，北航、地质、师大等院校，出现斗、批、改的新气象。

北航：斗批改办公室组织专案调查；分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统治我们学校的；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情况；抗大经验；半工半读；61—63年教育战线出现大反复的情况。25日开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大批判活动，先后把大毒草影片《林家铺子》、《两家人》、《武训传》、《青春之歌》等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纲》揪出来示众，下旬组织大批

大字报上街。

地院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5·16通知》后，“东方红揭竿而起”战斗队写出了一篇轰动全院的大字报《谁是我院最大的危险》，立刻，一场全院规模的十分激烈的大辩论高潮掀起来了。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有：十七年来地院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教育路线、科研路线等到底属于哪个司令部？究竟怎样才能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地院的影响？院系各级如何互相配合搞好院内斗、批、改？如何对待干部？辩论气氛十分活跃，斗批改开始进入了新阶段。

师大校园内一片新气象，出现了“四多一少”的局面。即关心大方向的人越来越多、批刘邓的人越来越多、搞斗批改的人越来越多，上街宣传的人越来越多。打内战的大字报越来越少了。常委会计划在六月份掀起教改的新高潮。主要内容有：批判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编写《中国教育制度发展史》；编写教育战线十七年来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记，毛主席关于教育的语录等等。

其他大专院校也重视或者已经投入本单位的斗批改。

5月

毛泽东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质。这个是大方向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毛泽东关于江西省军区的批示：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同志：

江西军区与群众对立情绪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

毛泽东

张春桥在上海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张说朱德、陈毅、贺龙“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你看：朱德是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

山东济南省委院内两派群众武斗，被王效禹拘捕关押者达388人。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在北京同时上演。

5、6月间

河北省在1967年5月3日，数所中学发生武斗。6月23日，河北农大发生严重流血事件，死7人，伤250人。

第九十卷 1967年6月1日至6日

6月1日

《红旗》、《人民日报》刊载纪念毛泽东决定发表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一周年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文中引用了毛《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铁路、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铁道、交通系统广大革命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在狠狠地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客、货运输任务，保证了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巨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胜利。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某些地区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极少数坏人的挑动下，出现了一些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的严重现象。这种现象很不利于铁路、交通部门的革命和生产，必须坚决克服。因此，特命令如下：

(一)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守生产岗位，努力做好工作，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切实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完成和超额完成运输计划，向一切消极怠工、影响运输秩序甚至中断交通运输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二)严禁破坏铁路、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无票强行乘坐车船，不准扒乘货车和拦截列车、汽车、轮船，不准妨碍铁路、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不准武斗，不准以卧轨等手段限制车辆通行。今后凡采用扒车、截车及其他不正当手段来京上访的人员，中央概不接见。

(三)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本命令自即日起生效，并可在城乡和车站、码头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

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接管中宣部，由其所属之文艺组与宣传组代行中宣部职能，中宣部撤销。

周恩来指示卫生系统造反派，要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

6月2日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指出：大学的斗批改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是历史上所没有解决过的。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讲，一种可能改革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张春桥鼓励大家作斗批改的闯将。

聂荣臻在工人体育馆对科技工作者讲话：许多科研单位已经逐步转入斗、批、改，改革的最高标准是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光辉的 5·7 指示。（《传信录 790》）

“钢院 5·16 兵团”正式成立。张建旗随即（6·3）抛出他在三月三十一日写的《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的大字报。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

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学部揪斗了潘梓年。

6月3日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专案组包括除王力以外所有中央文革成员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康生任组长，江青直接抓，戚本禹任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专案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是对毛泽东负责。

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指出：不能要求中央领导同志站在一派方面。另外一派，即使是十分反动的，我们也只能把他们的头子抓起来，广大群众还是要教育争取的。这是主席的方针，清一色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是违反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违反社会发展的，而且是反动的思想，这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过去犯过错误的也要教育他、团结他，这表现主席的伟大。

谢富治、傅崇碧受中央指示前往红代会传达两条命令：（1）红代会的人都不能利用北京红代会的名义跑到各地自作主张，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秩序；（2）红代会和各大专院校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委会决定，立即将我市各院校派往各省和北京各单位的同学调回来。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指出：《5·16 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两种思潮展开了新的斗争。有人认为，这意味着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又要从中央揪出新的黑帮、黑线来。陈伯达指出：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动摇的，这是全世界最坚强的司令部。而周总理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陈伯达、江青对北外“六·一六兵团”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康生接见红代会核心小组及大专院校代表讲话：彭真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反革命。从他的问题一发生，彭真专案组就怀疑他是叛徒。我们就组织人力调查研究，经过一年的工作，我们可以宣布，彭真是个叛徒，是自首变节分子。他曾经带着敌人逮捕过我们的人。彭真是一個在敌人面前下过跪的可耻的叛徒。

文革初刘少奇蹲点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掀起揪斗刘少奇的新浪潮，扎营中南海西门，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北京市各区工代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

6月4日

《人民日报》观察员发表《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一文。

《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触痛了苏修叛徒集团的中枢神经，震撼了他们的支离歪斜的“宝座”。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首的苏修集团，几乎没有一天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恶毒的诬蔑、攻击和咒骂。他们发出一连串的胡言乱语，说什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悲剧”。

这种现象，难道是奇怪的吗？不，一点也不奇怪。古往今来，凡是真正伟大的革命，都为革命人民看作是欢乐的节日，而被反动势力看作是大悲剧。

当一八七一年伟大的巴黎公社诞生时，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最盛大的节日”。而欧洲的君主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则惊呼为“可怕的灾难”。

当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巡洋舰一声炮响，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高奏凯歌的时候，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是感到多么振奋和鼓舞呵；而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的叛徒却咬牙切齿，胡说什么这是俄国革命的“最后一幕”，是布尔什维克的“专横”和“冒险行动”。

当一九四九年伟大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时，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又是何等欣喜若狂呵；但美帝国主义却丧魂落魄地叫喊：“中国的局面”是“不幸的”、“悲惨的”，是“最不愉快的时期”。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过去历次的革命都更深刻、规模更大的革命运动。这样的一场大革命，激起了苏修叛徒集团和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的咆哮、咒骂，岂不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吗？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曾经指出，究竟是什么人咒骂俄国劳动阶级第一次创立的苏维埃呢？是“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所有的喝血的匪帮，以及他们的讴歌者考茨基”。

今天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正是列宁所愤怒痛斥的叛徒考茨基的徒子徒孙。他们疯狂地咒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大悲剧”，恰恰是他们的反革命面目的大暴露。

在当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出现了一个大悲剧。这个大悲剧不是发生在中国，正是发生在苏联。这个大悲剧的制造者不是别人，正是以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为代表的大叛徒、大工贼集团。

今天，在列宁主义的故乡，伟大列宁的旗帜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糟蹋，所砍倒，修正主义在那里占了统治地位。

今天，在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了，社会主义江山改变了颜色。

今天，曾经在列宁的教导下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苏联人民，又重新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们在长时期的斗争中以无数鲜血浇灌而获得的革命果实被剥夺了。

今天，曾经被全世界人民看作是世界革命根据地，为亿万革命人民所向往的苏联，那里的统治集团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熄灭了它的光辉。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图画啊！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历史大倒退啊！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是被国际资产阶级从外部进行武装进攻打垮的。但是，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现在，日暮途穷的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从外部进行战争恫吓的同时，而主要利用赫鲁晓夫集团从内部进行颠覆，它们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在苏联实行了“和平演变”。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教训吗？

苏联发生的历史大倒退，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一个极端重大的新课题，这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才能保住这个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在尖锐复杂

的阶级斗争中，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大问题，是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的。

正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天才的领袖毛主席，正是毛主席所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通过亿万人民的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

苏联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最根本的一个教训，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赫鲁晓夫这个混进党内的蓄谋已久的大野心家及其一伙，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逝世之后，觉得时机已到，就发动宫廷政变，窃取了苏联的党权、军权和政权。从此，苏联的政权就改变了性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通过它的代理人实现了反革命复辟。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吸取了苏联的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这场大革命，极其深刻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同时也极其深刻地教育和影响着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在中国，在全世界，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通过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亲身感受和观察，经过比较和分析，正在进一步地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而革命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迸发出无穷无尽的改造世界的伟大物质力量。

经过这场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也就长期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经过这场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生死的斗争。如果我们丧失警惕，国家政权就会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所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权就会得而复失。

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同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主要矛盾。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主席说：“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如果无产阶级不在思想和文化革命中彻底战胜资产阶级，那么资产阶级就会首先从思想和文化这个阵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政权就仍然可以被资产阶级夺去，劳动人民斗争得来的一切仍然可以毁于一旦。

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最好形式。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把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揪出来，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批倒斗倒，从他们手里夺权，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

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总之，经过这场大革命，一切革命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的规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毛主席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一个极大的飞跃，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这样，根据毛主席发现的科学理论所发动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防止了苏联的悲剧在中国的重演，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的无产者和革命人民来说，是莫大的喜事，是伟大的希望，是极大的鼓舞，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曲最激动人心的响彻云霄的凯歌。但是，对于帝国主义和苏修叛徒集团来说，却千真万确地是大痛苦、大灾难、大悲哀。因为，他们的丧钟敲响了，他们的末日临近了，他们的“宝座”快要倒塌了！

在人类历史上，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总要经过曲折和反复。资产阶级革命，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更不可能设想不经过曲折和反复。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苏修领导这一伙大叛徒在苏联制造的历史大倒退，也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它是一件大坏事。但是毛主席总结了正面的和反面的历史经验，找到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样，这件大坏事也就变为一件大好事了。

我们正处在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有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一定会把整个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这些妖魔鬼怪统统赶出历史舞台。

武汉军区发表公告，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并检讨了在支左中的错误，号召实现大联合。造反派指责其为假检讨，而“百万雄师”却认为军区软弱。武汉的两派群众武斗有增无已，惨案累有发生。至六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死 108 人，伤 2774 人。

张建旗等发表《严正声明》，认为群众对他们存在误解。

6月5日

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批准有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等二百多个单位参加的“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

上海《解放日报》公开批判《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把它指为“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谢富治与原首都“三司”造反派头头座谈时指示：红代会核心组成员，除清华、北大、师大、地质、轻工等外，人员要扩大。组长仍由聂元梓担任，副组长由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担任。

中央党校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揭发党校校长林枫为彭真死党，在东北时曾与彭、吕正操“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

全国 58 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李立三(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被揪出批斗。

6月6日

中央再申通令，纠正最近发生的打砸抢风。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 中发(67)178 号

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特发出以下通令：

一、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

二、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

三、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四、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

五、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六、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都应该严加处理。

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物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

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团体，分别情节轻重，在一定的范围内通报批判。

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这个通令可以在城乡广泛张贴，并在群众中广泛宣读。

中央转发黑龙江《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179 号

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省、市、区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党委：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材料，很值得同志们注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语也很好。现在发给大家参考，并望按照当地具体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中 央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各地、市、县、特区革命委员会(接管委员会)并报中央文革、东北局:

现将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和有关部门把青少年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切实做好。

培养青少年一代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资产阶级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少年，极力同我们争夺下一代，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一代身上。在这方面，目前有些同志还认识不足，特别是有些同志溺爱、娇惯、放纵自己的子女，甚至怂恿自己的子女进行犯罪的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因此，必须教育干部、工人、农民，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特别是革命干部必须把教育子女当做一项经常的政治任务，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子女的头脑。对于怂恿自己子女干坏事的家长，要给予必要的处分，如果是革命干部这样做，还要加重处分。学校、机关、工矿企业、城市街道，都要有计划地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工作，组织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学毛主席的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曲，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儿童；组织他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生产劳动，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真正把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黑龙江省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

我们在四月间，到哈市马家沟、文昌小学和原省人委职工家属居民委员会等处，调查了中小学生校外活动情况，现将存在的问题报告如下：

从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以后，哈尔滨市中小学广大革命师生已陆续返校，边上课边闹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小学生普遍地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得到了锻炼，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但是，正象毛主席教导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坏人的勾引下，目前在青少年中出现了一些很不健康的现象，主要表现是：

一、进行掏兜等盗窃活动。有些学生在盗窃、流氓分子的影响和唆使下，经常到商店、车站、文化娱乐场所等人口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掏兜等盗窃活动。有的割断电线，剥去房瓦，拆去机器零件，破坏作用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偷盗行为，有些学生不以为耻，反以为能，说“偷了东西就蹲那么六、七天，有啥关系。”因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

二、损坏公物现象相当严重。有些学生不仅在学校不爱护公物，毁坏桌椅，在校外也任意毁坏公物。原省人委职工家属居民委员会附近，共有五十个路灯，被学生用弹弓打坏了四十五个，有时刚刚换上的灯泡又被打碎。有的住宅内的电闸保险丝几乎天天被孩子挑断，走廊内的电灯开关几乎全部砸碎，电线裸露，极易发生触电事故。有些办公室的玻璃，被学生用弹弓打破很多，房产处修配厂的玻璃，几乎每块上都有弹弓打的小眼。

三、有的沾染一些流氓习气。有的人歪戴帽子，说低级话，调戏、污辱女同学，向社会上的阿飞学习。有的成群结伙，搞“拜把兄弟”，讲“义气”，学习封建社会的东西。有的还在“誓言”中规定：所搞的活动不准向任何人讲，保证“把兄弟”不挨打，一人受难都上去。有些学生组织起来以后，成群结伙地在马路上欺侮弱小同学，拦截围攻批评过他们的教师和街道干部。有的夜间到他们有意见的人家，敲窗敲门，故做鬼态，借以吓人。

四、成群结伙，打架斗殴。有些学生成群结伙，选出头头，寻衅打架。有的学生备有匕首、棍棒、皮带等凶器，常常伏在公园的角落等处，借机引诱打架，有的被打伤，有的甚至被失手打死，引起很大纠纷。对于他们的这种活动，别人批评不得，有时对批评者施加报复。

如有的学生对谁家有意见，就召集一伙人，晚间聚集在这家的周围，有一人用手电筒照亮这家的窗户，其余的人用弹弓对准玻璃一齐发射，把人家玻璃打碎。有些学生过去比谁的家长官大，现在比谁的家长是什么派，欺侮参加保守派或未参加派别人员的子女。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反映到青少年头脑中，有些学生划不清无产阶级大民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滋长了一种极端民主化的情绪，一切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美其名曰“造反”，“反对奴隶主义”。因此不听教师、街道干部的教育，甚至有的教师和街道干部因为制止他们的不良行为而遭到报复。

第二、有些学生家长溺爱子女，放松了应有的教育。有的家长对孩子放纵不管，娇惯的不象话，根本听不得别人对他们子女的批评。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家备受宠爱，无人敢管。原省人委职工宿舍中，孩子闹事最多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往往是孩子中的头头，谁也管不了，在孩子中“称王称霸”。如高×的一个孩子，把办公厅交通员的摩托车偷着开跑了。事后，高×不但不教育孩子正确认识错误，反而鼓励孩子说“真勇敢”。又如王××的三个孩子，把邻家的一个孩子打得伤势很重，王××不但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反而无理的同被打伤的孩子家长吵骂。

第三、学校教师对学生教育抓得不紧，甚至有些教师明明看着学生有缺点、错误也不敢管教，不积极引导他们纠正，放任自流。同时，学生在校活动时间，特别是小学生的上课时间太短，有的学校只上一、二个小时课。课外作业一点没有，学生放学后又没有人组织自学，大多数时间都是玩耍。

根据上述问题和原因，我们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一致认为，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中小学生的阶级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他们正处于长知识、长身体的重要时期，青少年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去占领。青少年教育的好坏，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接班人的问题，正象毛主席教导的：“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在计，万年大计。”为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在中小学生中开展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儿童的宣传活动。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破四旧，立四新，大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用毛泽东思想把青少年武装起来。

二、干部、职工和所有家长，都必须把教育自己的子女当做一项经常的政治任务，切实做好，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自己的子女，对子女负责。对于怂恿自己子女干坏事的必须批评教育，严重的给予处分。

三、人民解放军在青少年中有很高的威望，建议解放军协助学校、街道加强对青少年的阶级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爱护公物、团结同学的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四、各小学应积极建立红小兵组织，把青少年组织起来，经常进行有益的集体活动。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应适当延长，一般的不应少于四课时。

五、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工矿企业、学校革命群众组织，应当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把青少年教育工作切实抓起来，并且协助学校、街道搞好学生校外教育工作，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

已发：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省、市、区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共印四〇〇四六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发出

凌晨，陈伯达、谢富治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成员，批评了“新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和清华的蒯大富。陈伯达说：凡是在社会上把持权力的，要夺无产阶级权的，只能造成自己垮台。

第九十一卷 1967年6月7日至24日

6月7日

扎营中南海西门的北京建工学院发出紧急呼吁，坚决要求揪斗刘少奇。

红代会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向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最紧急呼吁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伟大的历史文件 5·16 通知的公开发表，毛主席的五篇雄文及毛主席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的公开发表，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下达的战斗号召：把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推向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高潮——彻底清算刘贼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把刘贼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的日子到来了！

揪斗刘贼，讨还血债。把他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批倒批臭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神圣的职责，这就是我们当前斗争的大方向。一切革命同志，一切革命组织，都要紧紧把握这个大方向。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革命组织间搞宗派活动，争权夺利，把斗争矛头指向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那就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会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会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望。这只能使阶级敌人高兴，这只能使刘邓之流高兴。在这个问题上，绝对含糊不得！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代会建工学院新八一战士不仅深受五十多天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的疯狂摧残，而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又受到刘贼赤膊上阵的残酷镇压。八月二日到八月四日，刘贼带着大小喽罗刘澜涛、李雪峰、谷牧、汪锋、舒同、霍士廉、杨植霖、王恩茂、吴星峰之流到建工学院“蹲点”。在建院刘贼恶毒地攻击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变本加厉地施展其反革命的全部本领。首先以高压政策，妄图压跨革命造反组织八一战斗团，再一次扑灭革命火焰，这一阴谋破产以后，刘贼又施展了更阴险、更毒辣的手段，对革命造反的“八一”战斗团假支持真收买、在革命组织里寻找代言人，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色彩、保护自己过关，伺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新八一战士受刘贼迫害最深，对刘贼仇恨最大。我们是揪斗刘贼的当然先锋！

六月三日，我揪斗刘贼的战役已经打响了！在中南海西门，“新八一”战士安营下寨，用大字报、大标语、大演讲、大游行、与刘贼浴血奋战，到今天，我们已与刘贼尘战五天五夜了。我们誓把刘贼揪出中南海！交给全市、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审判！

我们向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发出最紧急呼吁：停止一切内战，联合起来，把全部精力放到彻底埋葬刘家王朝的最后决战中去。

热烈欢迎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和我们并肩战斗！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誓把刘贼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刘少奇从中南海滚出来！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红代会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于中南海

6月8日

《人民日报》登载上海市革委会6月2日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决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声讨美、以(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罪行和苏修的叛卖行为。

北京市革委会发布《关于停止使用广播车和高音喇叭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写报告说刘少奇的厨师郝苗“可能是国民党中统特务，赶快逮捕审查”。郝旋即被捕。

6月9日

林彪亲自出席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以示支持。三军革命造反派从此失势并遭到镇压。

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李作鹏为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免去其海军副司令员职务。免去苏振华海军政治委员职务。

林杰在与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轻工“红鹰”等单位同学谈话时说，目前北京存在三个问题：一、对刘邓罪恶批判不深；二、无政府主义严重；三、北京知识分子手太长，控制了工人运动。一个造反派组织夺权，没有搞大联合、三结合，中央不认为是犯方向性错误，这种情况在全国很普遍，改了就行。

6月10日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一万四千余人集会，斗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陈伯达等出席，表示支持。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节录）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奏凯歌，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关键时刻，中央直属文艺系统的数百个革命群众组织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了！

中央直属文艺团体、文艺院校、电影、图书、博物、文物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万四千多名文艺战士，今天满怀革命豪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齐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他们大联合后的第一次战斗的大检阅—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出席了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批判的盛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同志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文艺界的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你们今天的大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模范。你们应该继续成为大联合大批判的模范。”陈伯达同志祝革命文艺工作者大联合、大批判及各项工作取得胜利，并向全体文艺战士发出号召：“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成员金敬迈、李英儒、舒世俊、陆公达、刘巨成，也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标志着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发展到了一个

崭新的阶段。首都文艺战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战时刻联合起来，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一革命壮举，必将极大地促进整个文艺界以至于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批判，推动当前的大批判运动更深入的发展。

(原载 6月 11 日《人民日报》)

北京政法学院、光华木材厂于今日成立革委会。谢富治、傅崇碧、吴法宪等到会祝贺。

首都红代会改组，常委 15 名，由农大“东方红”、农机“东方红”、邮电“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医大红卫兵“红旗”、“新北大”、“政法公社”、财金“八·八”、地院“东方红”、工大“东方红”、电影学院“东方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联委会、北外“红旗”、清华“井冈山”分别选派。

外交部照会保加利亚使馆，强烈抗议保领导人破坏中保交换留学生协议。

6月 11 日

陈伯达为北航师生题字：“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群众的好学生。”又为北航“红旗”题字：“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集体的智慧，这样我们就将创造人类历史空前的奇迹”。他还为“红旗兵团”当场题写了“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并指示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这个工作要由你们把它具体化，提出方案，要靠毛泽东思想把它搞好。”（《传信录 793》）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造反派揪斗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前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聂真。

周恩来在 11 日、13 日连续接见农林口造反派，说谭震林的材料我看过了，还要核实，结论不能这么早。

6月 12 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通知 中发(67)183 号

今年六月十九日，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公开发表的十周年。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它第一次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它是当前我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南。

中央决定，应当结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结合组织宣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大张旗鼓的深入细致地开展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的宣传活动，引导群众和群众组织更深刻地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进行整风，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积极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

(一)于六月十九日重新发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二)中央报刊发表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的社论。并组织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

报导革命群众组织对这部伟大著作的学习活动。

(三)宣传要点

- 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伟大意义。
- 2、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3、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4、集中力量，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5、对确有证据的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
- 6、以民主的方法，“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反对左派群众之间打“内战”，反对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用压服的方法对待受蒙蔽的参加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的群众。
- 7、强调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强调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 8、推动各群众组织，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指南进行整风，总结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改造世界观、提高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和资产阶级作风。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

外交部向印度驻华使馆递送照会，就印度使馆人员在北京从事“间谍”活动，提出强烈抗议。

谢富治接见韩爱晶等，谈到 5·13 演出事件时，谢说，演出派是林总、江青支持的。他们在海军是支持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在北京军区是支持郑维山；在空军是支持吴法宪、余立金的。对聂元梓，这次虽受批评，还是爱护她。红代会核心组要扩大到 15 人，王大宾要当核心组副组长。把北大、矿院、轻工开除出核心组是不对的。中央文革中，现在宣传由王力负责，教育由关锋负责，文艺由戚本禹负责。至于文化革命何时结束，中央文革讨论了几次，尚无结果。（《传信录 794》）

《人民日报》报导：今年已出版《毛泽东选集》2900 多万部。同时还发行单行本和《语录》数亿册。

重庆市革委会与警备区发出联合通知，提出制止武斗的八条。

6月 13 日

周恩来在接见农林口造反派时，就干部亮相问题指示：“干部的亮相，一个是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单位的走资派彻底决裂；第二是彻底批判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是自我批评。最主要的是第三个，自己检查批判得深刻，这是最好的亮相。”农办不但是谭震林的，从历史上还有邓子恢、廖鲁言。不能以为廖是叛徒，就不斗了。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说打倒李先念，我不赞成。（《传信录 795》）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接见河南两派代表，听取双方汇报。

李富春接见鞍钢代表，谈鞍钢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一、清除刘邓薄(一波)在鞍钢的影响；二、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三、通过斗批改，把鞍钢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成为贯彻毛主席所提的鞍钢宪法的模范。（《传信录 796》）

全军文革改组，吴法宪任组长。

近日来，“誓把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站”代表和部分海军

造反派在三座门揪斗李曼村、谢镗忠。

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传达杨成武的几点指示，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6月14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戚本禹等第二次接见河南两派代表，听取情况汇报。

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头目刘令凯与钢院“5·16兵团”头目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5·16兵团”。

6月15日

中央发布关于内蒙军区问题的通报。

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

总部、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基地、各院校：

内蒙古军区少数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严重的是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八条决定后，黄厚、王良太等人阳奉阴违，煽动大批不明真象的群众和战士，顽固地抗拒中央的决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

今年二月以来，内蒙古军区的少数领导人，违背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采取了上抗中央下压群众的反动路线，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王铎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严重地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他们擅自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了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挫折。

中央为了解决内蒙问题，曾于二月至四月间，召集了内蒙古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到北京来汇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四月十三日，中央做出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即八条)，指出内蒙问题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中央、军委的负责同志对于军区少数领导人的错误，多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但是军区少数领导人，无视中央八条决定，不仅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不向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反而煽动和纵恿大批干部和战士上街游行示威，大量印发反动传单，造成部队思想上的严重混乱，他们甚至公然反对和围斗中央军委派到内蒙军区工作的代司令员滕海青同志，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继续扩大事态，五月初他们竟然指使和鼓动二千五百多名干部和战士，擅自离开战斗岗位和工作岗位，到北京闹事，制造声势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八条决定。

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对来京的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十分关切，几次接见他们，反复说明了情况，耐心地进行了说服教育，大多数干部战士弄清了事实真相，提高了觉悟，陆续回到了内蒙。

但是，就在中央对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教育的同时，内蒙军区少数领导人，继续操纵部分战士和群众，制造了更加严重的对抗中央的政治事件。五月十六日，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的大会上，他们无理取闹，不听总理讲话，多次高呼对抗中央决定的反动口号，还当场打伤了一位拥护中央决定的内蒙同志。五月二十四日的大会上，他们反抗中央的活动愈演愈烈，他们在会上拍桌子，跺脚，起哄，抢夺扩音器，大喊大叫冲上主席台将内蒙军区政委吴涛同志毒打致伤，还殴打了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和会场服务人员，甚至公然在会上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反动要求。至此内蒙军区少数领导人们所策划的

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罪恶活动，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

为了严肃军纪，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中央军委采取断然措施，做出了关于处理内蒙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反省，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其他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军委批准了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命令。中央军委做出的决定和措施，受到了内蒙古军区广大干部和战士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现在内蒙古军区机关、部队已恢复正常秩序，内蒙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好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全军指战员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决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家必须从内蒙军区的问题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必须坚守岗位，加强战备，为更好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赋予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任务，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现将内蒙古军区五月二十五日命令和中央军委五月二十六日的决定(第四条内蒙可不再下达)，印发到全军团以上党委，全军各级党委应将上述文件连同中央四月十三日的八条决定，立即在全军指战员和工作人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传达教育。

中共 中央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戚本禹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军区负责人。严厉指出：不管哪一派，动员农民进城和截国际列车都是政治错误。(《传信录 799》)

6月中

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中学文化大革命。当汇报到军训时间问题时，江青说：解放军现在感到撤出学校还有问题。他们说还没有完成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说：解放军就是好，责任心强，看来 25 天不行了，大概要到年底才可以。

6月 16 日

林彪致信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提议不用“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祝词。

林彪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

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查阅档案的规定》。

由江青支持的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在京

会演结束。本日晚，毛泽东、林彪等观看了“智取威虎山”。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见詹才芳、章伯森、梁春阳，提出五条：一、最近一段不要上街游行；二、不冲击别人；三、不搞武斗；四、不号召农民进城；五、学习好、生产好。章伯森、梁春阳是 15 日奉周恩来电召来京汇报湖南文化革命情况的。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指示：李先念不能打倒。李先念打过一辈子仗。过雪山时，主席看见就说这个人是好同志，有政治头脑，当然也有许多错误。周着重指出：不要把派别斗争联系到抓叛徒的问题上，这是很危险的。（《传信录 800》）

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红卫兵联队”中分裂出一个“大批判指挥部”，本日，举行了斗潘（梓年）揪吴（传启）大会。

[按] 学部两派，主要以潘梓年、吴传启问题展开。“揪潘吴联络站”认为吴传启是政治扒手，潘梓年是叛徒。

谢富治接见北大各派代表，讲解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如果有两个革命组织严重对立，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是敌人就要清除出去；是同志、朋友就要互相关心、爱护、帮助。谢指示：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搞革命大联合。要搞好学校的斗批改。要反对武斗。对聂元梓则强调帮助。（《传信录 801》）

[按] 北京大学的运动，原系由聂元梓所领导的校文革一手把持。4·11 事件之后，各种群众组织蠢起发展。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之后，又有“6·6 串连会”、“新北大公社联合兵团”，并演化成三大势力。由“东方红”、“井冈山”、“5·16 公社”联合为“东方红公社”、“井冈山红卫兵”，指责聂从去年八月后一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北京公社”、“红旗飘飘”、“革造”为主的一派，所持观点略同。两派均提出“炮轰聂元梓，打倒孙蓬一！”另一派以“联合兵团”、“6·6 串连会”为主，既主炮轰，又主帮助。此外，又成立“抗大兵团”、“铁锤战斗队”等小组织。6 月 14 日，反聂派曾举行静坐示威。

谢富治、吴德等在对部分大专院校人员的讲话中，建议学习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促进大联合。（《传信录 802》）

6月17日

张春桥在上海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字上很简洁，当前讲就是斗批改、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十二个字。这就是当前夺权斗争阶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要贯彻下去，我们就能把各方面工作带动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断

发展的，要不断地集中群众的智慧，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我们的工作中开花结果。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外交部就驻印度使馆遭袭击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

武汉发生大规模武斗。

《动态报》6月17日电讯：(武汉)保守组织“武红兵”、“百万雄师”2—3万人从中午一时围攻汉口江汉路造反派联络站，手执长矛、尖刀挑起武斗，武钢“9·13”造反派驻三民路附近一座大楼倒塌，死伤40多人。长江大桥公路桥被二千多“武红兵”封锁，武钢“9·13”大队人马前往支援，被解放军200多人拦住，只通过两辆汽车，被“武红兵”打伤惨重。一车38人全部死亡。“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被不明真像的农民包围，不能支援。事态继续发展，武汉造反派在危急中，望速告中央救援。

6月18日

毛泽东指示：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列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去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毛主席指示时，周总理也在场。他指示说：有个问题，把国内的硬搬来对外，不动脑筋，不管对象。人家需要什么不管，只管我们自己。研究一下对外，既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不同特点。)

毛泽东接见北京市工代会委员。

中央文革文艺组严厉批评中国杂技团擅自处理马戏团的动物。该团认为马戏是大毒草，杂技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将所养狗十九只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供实验，五头熊电死食肉，五只羊送动物园饲养，六匹马送交农场。其他骆驼、水牛、猴也做了处理。在收回时已仅存二只狗、六匹马、两头骆驼和一头小牛。

[按] 毛泽东把庭院植花养草和室内盆栽花卉指为资产阶级的享受，至文化革命进而及于马戏团的动物。他所仇视而图革除的是一切自然界的美好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活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残的，殃及禽兽，岂止国民而已哉！

6月19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工代会、红代会分别举行纪念大会。谢富治在红代会举行的纪念会上指出：前一段社会上两大派的对立，妨碍了北京市的大批判，给外省市的运动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两大派应该好好学习主席的这一个划时代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联合起来搞大批判。陈伯达、戚本禹也来到会场，肯定大会开得成功。

6月20日

驻京海陆空三军、二炮、总后革命派在北京军区召开斗争罗瑞卿大会，军内外 60 多个组织几万人参加。刘志坚、王尚荣、杨勇、廖汉生陪斗。

北京地院及在京地质系统革命派斗争陶鲁笳、邹家尤等。

6月 21 日—25 日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

毛泽东和卡翁达的谈话

主席：先独立国家援助后独立国家，是国际主义精神，不要感谢，不援助倒是错误的。

总理说：中国建设还需几十年、几百年，一直到帝国主义完全灭亡，也要几百年。这都落在我们下一代身上。如果不好好教育下一代照毛主席的路走，下一代出了修正主义还有什么共产主义？

主席：修正主义一代不如一代。

总理：柯西金象什么样子？象主席过去批评王明一样，梳装打扮，送上门去。柯西金替联合国硬是勾结约翰逊，吊个膀子，最下流，最无耻。

6月 21 日

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队院校、文体单位来京和外出串连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进行斗批改的通令(摘录)：

一、所有来京和已经外出串连的人员，都要在六月底以前全部返回本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在北京和外地逗留。

二、所有各种群众串连组织，如联络站、联络处、联络总部，筹备处、调查组织，以及其他名目的等等机构，在六月底以前要一律撤消。

三、各单位的接待机构，从六月底起，对拒不执行中央军委通令的串连人员，一律停止接待。各单位也不准收留外单位的串连的人员。今后外地来京上访的少量人员，必须经过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总部的批准，否则一律不予接待。对于违抗此通令的，由当地卫戍部队和驻军严肃处理。

此通令望立即向全体人员传达，切实贯彻实行。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凌晨，周恩来接见去××地区执行业务的“六·二六”医疗队全体成员，指出：医疗队下乡是卫生系统斗批改的序幕，如何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就要象这样打倒。

周恩来电召江西省委书记刘瑞森、郭光洲、黄光来京，汇报江西问题。

由姚文元率谭厚兰等七人组成的红卫兵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历时 18 天。

《红旗》转载《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一文时特加按语：

《文汇报》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的社论。这篇社论写得很好，问题提得及时、尖锐，道理讲得正确，也很有“杀劲”。本刊特转载其中的一篇，供读者学习。

现在，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包括基层的革命委员会，例如大专院校的革命委员会、工厂的革命委员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经验，使革命委员会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就当前情况来说，关键性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掌权还是为个人、为小团体争权、掌权。这是在人民内部反映出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只要是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掌权，就能从经验不多到经验较多，就能从事情办得不太好到办得很好，就能学会不熟悉的东西，就能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如果是为个人争权，为小团体掌权，那就会被鬼迷了心窍，毛主席的话、党中央的话听不进去，而一意孤行，忘记阶级敌人，而把炮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弟兄。这样下去，就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各级革命委员会对自己的成员中有私心杂念的同志，必须认真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他们切实地迅速地改正错误。

《文汇报》指出：“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个人争权。这个罪恶的念头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权’字与‘私’字攀上了亲家，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一小团体的‘权’，或者‘我’的‘权’，这就等于眼睛蒙上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窍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见时，就轻易地给对方扣上‘老保’、‘逆流’、‘复辟’等大帽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要再夺权，发展下去，甚至会去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会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呵！无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还是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要高度警惕，不要被“私”字这个鬼缠住。这一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对人们的新的严峻考验。

6月22日

中央就国防科工委所属单位进行军管作出补充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补充决定(试行草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完全适用于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的军事管制工作。上述单位是国家重点保密单位，为了确保国家机密，特作如下的补充决定。

一、不是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和厂矿的革命群众，一律不得前去串连。

二、国防工业部(院)及所属单位和厂矿的革命群众，可以在业余时间，只能在本地区、本部(院)范围内串连，但不得涉及国家机密。特定的机密要害部门和单位，外部门、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均不得前去串连。

三、国防工业部门及其所属全体人员，必须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保密工作，防止失密、泄密。

中央发布增加收入、节约开支的通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关于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通知 中发(67)193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财政经济战线形势大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节约而合理的使用财政资金，更好的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特作如下通知。

一、坚决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全体职工都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坚守生产岗位，完成生产定额。一切企业都要充分调动生产积极性，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节约流通费用，千方百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指标。

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指示，发扬勤劳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反对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和本位主义。这是有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必须充分认识，时刻抓紧。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要遵守国家制度的规定，精打细算，认真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准把不合规规定的开支挤入生产成本和商品流通费用，不准挪用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的资金和物资。挪用了的要退还。(社会集团购买力)要专款专用，严加控制，责成国务院采取具体措施。

三、毛主席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基本方针”。一切企业单位都要努力增加生产，并按照规定向国家交纳税款和利润，不许挪用和拖欠。已经挪用的，必须归还。已经拖欠的，必须补交。国家财政、税收部门，在努力帮助企业搞好生产、流通和增加收入的同时，要做好收入的组织工作。不论城市和农村，都要保证税款和利润有人收，及时收。要坚决同一切投机倒把、偷税漏税行为作斗争。

四、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的各项规定，要继续贯彻执行。一切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所有不符合规定的支出，特别是挪用流动资金作财政性开支的，要一律拒绝支付。一切财政经济人员，都要作反对经济主义、保护国家资财、坚持财政、信贷制度的战士。广大革命群众，都要关心生产，关心收入，并组织经济监督委员会或经济监督小组，监督消费，监督支出。

五、银行要通过贷款工作，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帮助生产单位做好资金的合理使用。企业和生产队要把贷款用于生产和流通，做到合理使用，按期归还。

六、各级财政、税收、银行和企业财务部门，都要以毛主席思想来统帅业务，统帅一切。要建立和健全革命化的工作班子。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要坚守岗位，搞好革命，搞好工作。

七、一切革命群众组织，要做“节约闹革命”的模范，不要挥霍浪费，挥霍浪费是资产阶级的官僚作风。群众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不要脱离生产，办公、会议、宣传、旅差等项费用要尽量节约。占用的生产运输车辆，包括宣传喇叭车，应当交回原单位，投入国家建设。

八、不论机关、团体和个人，凡有贪污盗窃和破坏国家和集体财产的，都必须按照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九、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军管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就以上各条专门进行讨论和研究，并应采取具体措施，认真检查督促，保证贯彻执行。

(这个通知应当在群众中宣读，这可在城乡张贴)

李立三被迫害致死。终年 68 岁。**李，湖南醴陵人。**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红卫兵联队”以“捣毁潘、吴王朝”为口号，对他们曾拥为革命干部的潘梓年、吴传启进行揭发批判。

6月 23 日

黄永胜批准了本年春广州市公安局军管负责人起草的《关于揪叛徒工作的请示》及附件《第一号调查方案》，秘密对叶剑英的“叛徒”问题进行调查。

《人民日报》介绍了《山东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要求革委会成员严格要求自己，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6月 24 日

中央对浙江等地来京谈判代表规定六条，责成遵守。

中共中央通知

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鞍钢、鞍山市来京会谈的代表团同志们并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部委：

为了保证各地代表团在京会谈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中央对各地问题的解决，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团中有争论意见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保证以下六条能在各地实现：

- 一、不上街游行。
- 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
- 三、不抓人，不扣人。
- 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
- 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
- 六、不夺枪，不开枪。

达成协议后，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

《解放军报》在发表《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一文时特加按语：

昨天本报发表了海军直属机关红联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今天又发表了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怎样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两种性质的当权派，两种性质的“革”，两种性质的“保”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研究。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尖锐对立，阵营分明。你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对待两种当权派的态度也是这样。你对待无产阶级当权派，是反对还是拥护，是革还是保；对资产阶级当权派，是拥护还是反对，是保还是革。这是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必须认真抉择的问题。

你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待无产阶级当权派，你就必然坚决拥护，坚决保，统统保。对他们的缺点、错误的批评，也必然是同志式的。对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就必然坚决革，有的要打倒，有的半打倒。

你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你就必然保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必然拼命地反对无产阶级当权派。

你是无政府主义者，你就必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分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打倒。这些人自以为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其实，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当权派，就削弱以至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如何对待两种当权派、两种革两种保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个立场问题。是屁股坐在那一边的问题。是坐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坐在资产阶级一边。

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

人民解放军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摘录)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 1967 年 5 月 11 日决定，由张国华等九同志组成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张国华同志任主任委员，任荣、陈明义二同志任副主

任委员，于6月24日正式成立。在西藏自治区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建立之前，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区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周恩来讲话：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有六个站出来了(上海、青岛、山东、山西、贵州、黑龙江)现在在北京正在谈的有：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甘肃六个省。还有两个需要解决，还没来北京，是湖北、宁夏。新疆还没有定局，吉林、辽宁还没有解决。主席说：现在不是三、四月了(毛曾说三、四月见眉目)，而是六、七月了。(《传信录810》)

周恩来接见农政、农办两派代表，提议对谭震林先从人民内部矛盾进行批判、组织一千人的会，便于控制。他表示，倾向于先把秦化龙的问题搞清楚。(《传信录809》)

康生、戚本禹接见河南×××，指示(1)要注意二·七公社内部分裂；(2)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和群众。

张春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指出从现在准备夺权到掌权，要有长远考虑。一个政权总要多数人掌握，即使是对待暂时的同盟者，也要照顾。现在上海每个月开一二次斗争陈、曹大会，这样使人不要忘记大方向。(《传信录812》)

[按] 杭州两派，“省联总”(造反派)与“红暴派”(保守组织)。后者保江华，支持军管会主任龙潜，认为二月夺权是曹祥仁(书记处书记)操纵的机会主义假夺权。

第九十二卷 1967年6月25日至7月9日

(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提出认罪书)

6月25日

《人民日报》在转载《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一文时特加编者按语：

划清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当前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但是，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所起的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

正如列宁所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

列宁指出的这种情况，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高度警惕。

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当他们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抑的时候，也会起来反抗，进行斗争。他们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他们可以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有利于革命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在政治倾向上，又往往表现出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弱点。他们热衷于极“左”的词句和口号，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极端的狂热性和自发的盲目性。而在遭受某些挫折和困难的情况下，又会悲观失望，表现出政治上的右倾和动摇。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改变，如果忽视了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斗争，是一座伟大的共产主义熔炉。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完全可以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向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克服的。每个革命同志，都要在大革命的海洋中学习游泳，努力增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社论，及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6月26日

中央警卫团被派至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两个分厂进行“三支两军”，毛泽东指出：

1. 下去以后要作好宣传工作，要作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2. 下去以后不要匆匆忙忙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发生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不愿联合的只是少数几个坏头头。

3. 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生活，组织个

医疗队，给他们看病。

经康生授意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出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周恩来接见上海市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代表说：北京学生左右运动。余秋里还未解放，就是学生搞的。李井泉是三反分子，是林彪同志指出的，邓小平平时不工作，打麻将，言论很少。工业七十条是唯一能打倒邓小平的材料，是他亲手搞的。全国六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十三个省建了革命筹备小组。浙江、甘肃、云南有较大反复。杭州问题中央开了六个会，还没有解决。中央最近对六个省有个文件，提出六个不准。这六个省要我回去讨论解决。（《传信录 814》）

康生、谢富治、王力等接见云南两派代表，康生说：中央历来认为，“炮兵团”、“八·二三”都是革命组织。希望通过学习，达到大联合。（《传信录 816》）

[按] 同属“炮兵团”观点的有“炮兵团”、“三七炮兵团”、“共产党宣言公社”、“红旗兵团”等。属“八·二三”观点的有“八·二三战斗团”。“一·一八战斗团”、“一·二六战斗团”、“红炮兵”等组织。它们是分别在 66 年 9 月、10 月成立的造反派组织。67 年 3 月军管后矛盾扩大，云南军区支持“炮兵团”；昆明军区支持“八·二三”。

李富春在全国生产供应会议上讲话：当前要狠抓农业、煤炭和交通运输。（《传信录 817》）

李钟奇、丁国钰接见北京中学造反派，李钟奇说：“中学军训中存在着缺点错误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右倾投降。”丁国钰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训是毛主席提出的，对解放军要坚决拥护，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清华大学接见师生代表时提出：文科要彻底改革，理工科要研究出一套教学制度。

由“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处”组织，有工代会、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等一万余人参加的大会，斗争罗瑞卿。刘志坚、苏振华、许光达、刘震、李聚奎、张宗逊、王尚荣、雷英夫、向忠、史进前、成钧等陪斗。

四川“红成”赴京告状团举行誓师大会，二十多万人参加。会后，相继来京。扬言“活捉刘洁挺，拉着上北京”。

6月 27 日

北京航空学院决定：从七月三日起，开始复课闹革命。

6月 28 日

中央发布《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中发(67)200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三)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

(四)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谢富治在市革委会上讲话：西安大学成立革委会时，大搞排场，铺张浪费，出席人数37.6万人，主席台五个彩门，请帖套印六次8千张。到北京、上海请人参加，用钱上万元。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犯了两个错误：请了几个剧团演了几次戏；请了五省代表，开了不好的先例。（《传信录819》）

戚本禹接见河南“十大总部”代表。当“公安公社”成员说自己大方向始终正确时，戚说：始终是错误的，干尽坏事。你们都是保守组织，喊打倒刘建勋就是大方向错误。纪登奎也打不倒。（《传信录821》）

[按] 河南造反派为“二七公社”。“十大总部”则被指为保守组织。属于前者的还有郑大“革联”、郑铁机务北段“八一”、河医“东方红”、开封师院“八二四”、新乡师院“八一八”等。属于后者的还有郑州“铁军”（中学）、省“革命职工造反总部”等。

外交部召见缅甸大使，抗议缅甸“反华暴行”。

6月29日

中央发布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

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 中发(67)204号

各军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军管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地四个红卫兵六月九日给江青同志的一封来信“摘要”发给你们。这封信尖锐地批评了那种铺张浪费，讲阔气、摆排场、扬名声、显地位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来信提出，

是节约闹革命，还是挥霍国家财产，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将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止是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问题，它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

这是来自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这件事，表明了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深入人心。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群众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这是我们防止修正主义的最可靠的保证。

中央认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充分地认识，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每个同志都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必须懂得当权以后，地位发生了变化，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滋长和发作，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灰尘也迎面扑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高度自觉，不断地用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武器，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抵制一切腐朽思想。

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要牢记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争权夺利，铺张浪费，腐化堕落，大少爷作风，就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我们要在自己头脑中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样，就不仅能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镇压下打胜仗。而且能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胜仗。

中央决定，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认真讨论这一封群众来信和中央的这个通知，切实检查和改正铺张浪费，并且做出必要的规定，坚决贯彻执行“要节约闹革命”的方针，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本色。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四个红卫兵给江青同志来信“摘要”

最近，×地有几个学校的革命造反派成立革命委员会，其规模之浩大，场面之豪华，实在使人惊讶，他们不是节约闹革命，而是大搞铺张浪费。

××学校联合开庆祝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参加大会者达三十七万六千人，几乎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参加人数的四倍。仅筹备这次大会，就花了国家财产近万元。据说灯炮一项就用四、五千元。

××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参加大会者达三十多万人。在排场、阔气方面比前者更甚。张灯结彩，花花绿绿，到了不堪入目的程度。也是仅筹办这次大会，就花了近万元，仅电线一项就四千元。

××大学召开纪念革命造反派一周年大会，也大搞浪费主义、风头主义、大少爷作风。

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也学了“老大哥”的样子，在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时，也大讲排场，大讲阔气，花费不少国家财产。

××大学也要成立校革命委员会，该校革命造反派的不少同志认为，应该隆重庆祝，但必须突出政治。他们说，热烈首先应该表现在政治上，表现在突出毛泽东思想上，表现在大造革命舆论上，而不应该表现在与外校比排场、比阔气上，不表现在大搞花花绿绿上。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这次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为节约闹革命的样板”。但校筹委会的某些人及其支持者，对这些意见都听不进去。这些同志专在大会的布置等形式问题上“狠下功夫”；一个大会的主席台，设计就长达三十四米。校里要搭彩门五个。为了人多势众，不惜违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从工厂里调回了六五级毕业班临时分配的学生。特别是搞的那个“请帖”实在是豪华之至，每个“请帖”价值五分钱之多，共印八千张，花费数百元。来信人谈到这里，痛心地说，去年“十月六日我们在北京开会时的请帖是手写的。可今天，我们却变了！”另外，筹委会某些人还准备派三人带上三

百多元去上海“请客人”，后因筹委会许多一般工作人员的坚决反对，抢了他们自己开的介绍信，才未去成。

来信人提出：筹委会的某些人为什么要讲排场，讲阔气呢？因为在他们看来，该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如果在排场、阔气方面赶不上××两校和××学院的话，就是“丢人”，会被人们看不起，就会没人来参加大会，也就不会开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

来信人认为，这种倾向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关系到“掌权以后的筹委会(以后即革命委员会)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来信说，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问题，它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若不给予纠正，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康生等接见江西来京两派代表，要求贯彻 6·24 通知，不许夺枪，要保持铁路畅通，动员农民返乡。

河南军区参谋杨松峰代表军区向“二七公社”表示支持左犯了方向错误，要坚决改正，支持“二七公社”。政委何运洪承认“错误在我”。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江西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一封信，要求立即停止夺枪，退出军事机关。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革命同志们：

据报，你们 29 日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6·6 通令和中央 6 月 24 日通知的。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们应该珍惜和保持你们的革命称号，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枝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住地，听后中央派人员处理。我们命令江西军区不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如果双方任何一方不这样做，不听中央的话，就要犯极其严重的错误。我们等待筹委会同志的答复。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上海“支联站”、“联司”在获悉王洪文决定 7·5 以前将踏平“联司”的情报，举行反击，双方发生武斗，伤 200 余人。

6月中下旬

云南、江西、浙江、东北等地不断发生武斗，一部分群众冲击军区，夺取枪支弹药。**云南大军区政委李成芳、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一派，武斗严重。**

河南省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等地大规模武斗，继“十大总部”焚烧郑州国棉六厂红色大楼之后，洛阳“公检法总部”、拖拉机厂“筹委会”和洛阳“筹派”于 6 月 19 日使用大型推土机和吊车将拖技校“8·16 兵团”的红色造反大楼砸坏。接着，他们又火焚了洛阳一高“井冈山兵团”的大楼。

6月30日—7月2日

“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进行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并作出决议，提出口号，准备重新打开反周恩来的局面。

6月下旬—7月初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公开散发毛泽东语录、像章及其他宣传品，遭到缅甸政府

和当地民众的反对，由此发生了反华骚乱，双方关系紧张。中国政府指责缅甸政府策划一系列反华暴行。自 6 月 30 日起，北京、上海、昆明数十万人连日举行示威，支持中国政府声明，抗议缅甸政府的暴行。7 月 1 日、5 日，外交部又两次照会缅甸大使馆，提出最强烈抗议。随后，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后，中缅关系始行恢复。

6月

中央对西藏、福建、浙江等省、铁道、交通、邮电、物资、石油、财政、林业、化工、煤炭、水电、建工建材等中央各部以及华北局相继实行军事管制。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下，全国各地在“二月逆流”中被“走资派”镇压下去的造反派再度崛起，反击“二月逆流”余波。成都军区发表公告，为川大“8·26”平反，指出“二月镇压”是方向错误。月底，河南军区向“二·七公社”承认军区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公安公社”中的群众纷纷杀回马枪。

邱会作指使总后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王希克等，编集有关徐向前材料，称徐是“一颗大定时炸弹，是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提出“打倒徐向前”。

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大联合问题，说，群众组织之间要联合，只要是愿意革命的都要搞大联合，不管新造反的、老造反的，都要搞联合。搞大联合，不要搞山头。总的趋势是要搞联合，使工厂稳定下来。新造反的、老造反的都要进行整风之后再联合。现在不适宜搞很多组织，不要象运动初期那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提出了要大联合，三结合，舵已经转过来了。你还要按过去的那样走下去，那就错了。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戚本禹说，如果谁把人打死、打伤，军代表要处理。必要时，要用军队把他抓起来，情节严重的枪毙。我讲的你们可以宣传，打死人要偿命，打伤人的要军代表抓，不管你多大理由。“砸”也不对，抢、抄家是不允许的，只有公安部门有权力。抄人家的东西要处理，现在只是没有时间，将来对这种人要开斗争会，抢了东西交不出来的，要扣工资，抢了东西归自己所有，是贪污盗窃行为，轻者赔，重者抓起来。黑帮的东西也不能抄，就是抄了也要归公。我们是有政府主义，要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只是没有时间，他们猖狂一时，也没有什么，将来一网打尽。三个月后处理。

7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委组成以谢富治为首的五人支左小组对八机部实行军管。

李富春接见冶金部造反派，指示要批判工业《70 条》，然后根据毛泽东的《鞍钢宪法》进行改，要先破后立。

军委决定召开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政治部的通知中指出：召开这样的大会，“不但将对我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把我军建设成为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的革命军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对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也将发生重大影响。”

周恩来接见财贸联委、财贸各派代表，对各派联合召开庆祝党 46 周年大会表示支持。并表示届时将参加。

外交部照会肯尼亚大使馆，抗议肯宣布我驻肯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

曾于 1929 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君羊被捕。

上海革委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声讨“联司”与“支联站”。

三十年代著名影星王莹的丈夫谢和赓(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被捕。王莹也相继被捕，1974年3月3日冤死狱中。

[按] 外传江青迫害王莹致死，是因三十年代在业余剧人协会排演夏衍的《赛金花》一剧中，争饰主角赛金花失败，怀恨报复所致。据魏贻昌编《江青外史》，争演《赛》剧是业余剧人协会与四十年代剧社间的矛盾。业余剧人协会中饰赛金花者为徐胜，蓝苹则饰一妓女。她们的演出因业余剧人协会最后放弃、改演由托尔斯泰原著改编的《欲魔》而作罢。江青迫害三十年代在沪的同行，不论恩怨，甚至于在困境中照顾过她生活的保姆亦所不免，最典型的贾雨村劣质，原不必有特殊矛盾也。

新华社报导：《毛主席语录》14种外文版已发行80多万册。

7月2日

毛泽东由康生等陪同，接见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休·麦克劳德等人。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停办出国师资班。

新华社以《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为题，欢呼《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

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

新华社短评

《毛主席语录》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受到了亿万革命人民最热烈的欢迎和颂扬。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毛泽东思想是人民革命的历史火车头。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为世界革命人民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对世界革命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

《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给世界革命人民带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促进世界革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世界人民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因为它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最锐利的武器。

《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给世界革命人民带来了进行革命斗争的指针。世界革命人民把《毛主席语录》称为“红色宝书”。读了这红书，心里明，眼中亮，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读了这宝书，方向明，信心足，学会怎样革命，怎样斗争。世界革命人民喜得这红书，就象久旱逢甘霖，雾航见灯塔。他们决心在斗争中、生活中、学习中和工作中活学活用，并且为本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帝、修、反的威风。《毛主席语录》象炽烈的火种，正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心中点燃起反抗的怒火。世界革命人民用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敢于打碎奴隶的枷锁，敢于砸烂万恶的旧世界，做新时代的主人；而一切牛鬼蛇神见了毛泽东思想，就象蝙蝠见了阳光，失魂落魄，胆战心惊。

《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插遍全球！

重庆市革筹会、警备区再次发布《联合通知》，要求停止武斗，呼吁大联合，然该地武斗益形加剧。

7月3日

戚本禹对文艺界讲话：现在文艺口应复课，所谓复课，“马上学习不行，主要搞斗、批、改”。在外的都回来。（《传信录 828》）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纪念毛的“七·三”指示发表三周年，表示坚决贯彻毛的教育方针，为建立和巩固新的教育制度而奋斗。

北航最早开始复课闹革命，表示将以“五·七”指示为奋斗之最高纲领，进行斗批改。

首都文艺界和大中学校红卫兵五万余人在午门广场集会，抗议缅甸奈温政府反华行为，会后游行示威，前往缅使馆抗议。

7月4日

陈伯达接见天津代表时指出：走资派只是极少数，一小撮。不是走资派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

戚本禹来到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的揪刘少奇前线指挥部，挑唆说：刘少奇到建院“八一团”是假支持，他是企图在十一中全会上蒙混过关。

中央办公厅责令刘少奇向“新八一战斗团”交出认罪书。

下午，“斗薄一波、批余秋里、谷牧联委会”召开“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工交系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罪行大会”，九十多单位参加。

林业部“东方红公社”发表声明：坚决打倒谭震林。

在中央的调解下，广西两派签订《十条协议》，规定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不准毒打、逼供对方人员，不准煽动农民进行武斗，维护交通秩序，不许抢枪、开枪等。然实际是一纸具文。

7月5日

毛泽东就大修他的塑像一事批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陈伯达接见教育部各派，要求实现联合，组成一个约 50 人的管理教育行政的班子，这些人通过选举产生，作不好可以罢免。（《传信录 830》）

《人民日报》报导：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北京其他高等院校也立即仿行。

《北航院革委会作战部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几点补充意见和解释》(摘录)

原则：在 7 月 3 日至 9 月 1 日这段时间里，我院复课闹革命的原则是：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兼学工、学农、学军，也学一些专业知识，为实现主席 5·7 指示探索途径，为在我院建立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奋斗。

学工、学农、学军可以在校内、校外。当前以校内为主，以后逐步扩大到校外为主。学工可以是与航空专业有联系的，也可以是无联系的如搬运工、清洁工、服务员等。

7月6日

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大学的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主席还说：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改不下去。

陈伯达在接见市革委会委员和大中学校代表时指出：中央文革号召大家不要分成两大派，希望做不三不四派，作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搞好革命大联合。

7月7日

中央发布《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特急）指示》。

毛泽东讲话：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

毛泽东接见×××会议全体人员。毛指示：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二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现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主席说：现在形势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对国大党，搞武装斗争。印尼共产党清算修正主义，已起来。缅甸游击队有很大发展，比泰国武装斗争还有基础，已经搞了几十年，过去党不团结(有红旗党、白旗党)，现统一起来了，反对奈温是一致的。武装活动的地区已占缅甸土地的百分之六十。缅甸比越南地理条件还好，回旋区大。泰国的地理条件也很好。缅甸起来、泰国起来，这样就把美国完全拖在东南亚。当然，我们还必须着眼在我们国土上早打大打。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这样我们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亚洲形势如此，非洲、拉丁美洲武装斗争也有很大发展。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祸首。全世界人民、美国人民都反对它。苏联修正主义也更加暴露无遗，特别是这次中东事件。苏联也是采取赫鲁晓夫那一套，本来他派往阿联军事专家两千多人，先是采用冒险主义，把军舰开了去说服阿联不要先出去，同时用热线告诉了约翰逊(赫鲁晓夫那时候还没有用热线)。后约翰逊很快告诉了以色列实行了突然出击，把阿联百分之六十的飞机都消灭在地面上。苏联一共援助阿联二十几个亿，打掉了二十亿，最后苏联投降停了战。这是出卖民族国家的又一次大暴露。对苏联，不仅是阿拉伯国家，亚洲、拉美都反对。苏联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自杀，就是一种不满。中东战争不久，苏联召集了几次东欧国家会议，罗马尼亚不签字，也未和以色列断交。后来毛雷尔跑到中国，和我们搞全面经济合作。单项协作也可以，全面协作我们不干。帝修更加孤立，越南战争坚持下去。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象是我们孤立，实际上它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华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转移人民对他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联共同策划的。这不表示我们的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大大提高。他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国家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地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兵工厂。但是，我们许多技术未解决。主席讲：要把×××××、××××狠狠地抓一下。总理批评“四机部落后”，四机部

要大大赶上去。

经林彪批准，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负责销毁四月中陈虹等自上海取回之“通天”材料。周恩来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代存的材料和吴、傅送来一包材料一并销毁。”毛阅后，曾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由于随即谢富治赴云南，继而杨成武随毛南巡，故销毁一事遂被搁置。

北京市革委会指示：三军演出问题，要支持原来演出的一派。

晨，山西太原太机“四野”查封了“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而成立了“地下政法公社”。同日，太原市核心小组办公室也被查封。

7月8日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江青等接见解放军军训会议代表。时，大中学校军训已告结束。

叶剑英谈国防科研时，引述毛泽东1964年讲话，“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叶的谈话中指责贺龙一生专搞秘密活动，到处树自己的山头，几十年做了不少坏事，就是培植自己的势力。他与刘邓接触结合的非常紧，是有阴谋、有野心的。（《传信录833》）

王力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讲话：李井泉人很阴险。去年十月中央政治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着李的鼻子说：四川出了问题你负责！林彪同志在去年十一月工交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李井泉是个大黑帮。（《传信录834》）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广州军区广东省军管会负责人孔石泉、温玉成、陈德等到中山大学与中大“红旗”，中大“8·31”造反派见面，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

7月9日

刘少奇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递交认罪书，然学院的另一派“八一战团”却抗议刘将检查交“新八一战斗团”，发出揪刘紧急动员令。其他院校也掀起揪刘高潮。

刘少奇交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的“认罪”书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们：

七月四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通知我说，党中央的意见，要我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写一个检查。现特检查如下：

（一）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那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同去。由于建筑材料工业部是归口由国家建委领导的，所以谷牧同志也到你们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戚本禹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你们的大会，上述各同志都来了。此外，还有刘澜涛及其他外地来北京的同志也有几位来了，他们是临时决定来参加的，我事先不知道。

参加你们八月二日大会，主要是听取你们中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我讲了几句话。

八月三日晚，我和李雪峰、谷牧、戚本禹同志等再次到你们学院，先找“八一团”的代表谈话，后找“革命团”的代表谈话。主要也是听取意见。最后，我分别向“八一团”和“革命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见。

八月四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最后我也说了一些话。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时候，我已感觉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李雪峰同志说，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八月五日李雪峰同志的讲话，以后吴星峰在建工学院的活动，我都不知道。八月五日以后，建工学院有几位同学给我来过信，并接到过几份简报，但是，我都没有答复。有的送给了李雪峰同志，有的处理了。

以上就是我参加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单经过。

(二)

在去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可是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过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一般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

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地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确实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地承担责任，没有正式地站出来向建工学院全体师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以便减轻当时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工作组的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来负担，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工作组在你们学院所犯的错误，你们清楚，你们可以讨论，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你们也可以讨论，谁的错误谁负责。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没有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参加你们八月二日全院的辩论大会，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此外，同学们还给我递条子，提出了第三种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包括一些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在内，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问题，应该经过正常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就可以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学生为主来搞。我认为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基础上的团结，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不能说这样的团结是“合二而一”的。当然在这里我应检讨，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有些不够完全、不够确切的地方。

经过去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日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又在八月四日听了工作组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我的脑子中已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八一战斗团”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坚决反对原来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领导的，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团”虽然也说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有缺点错误，但他们由于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党委、保工作组的。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不是指向院党委和工作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团”。因此，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不正确的。我的这种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向建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宣布我的这种看法，只有在八月四日找工作组的同志谈话时，略微地透露过这个意思，但也是很不全面的。

此外，我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发现建工学院的党团组织还是原班人马地进行活动，既没有经过改选，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党团组织的活动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

神和革命造反行动的。因此，我曾建议改选党团组织，如果一时选不出来，就推举临时召集人。党团员一般不开秘密会，开会时要找一倍非党团员参加。我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使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致受原来党团组织的操纵，阻碍运动的发展。至于我这个建议是否在以后付之实行？在以后的实行过程中，是否使建工学院的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我就知道了。如果在以后因为实行我这个建议，而使建工学院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的话，那就应该由我来担负主要责任。

我在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有人起来闹事，起来向我们党委和工作组造反，不要害怕，而要支持他们起来闹事，起来造反。即使有少数坏人参加，也不要怕。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害怕人家起来闹事，不让人家起来造我们的反，那就一定要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话讲得过多了，以至说过“不要怕坏人上台，坏人上台一个时候有好处。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着。”这些话是错误的。应加以批驳。

二、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强调了要团结多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没有说明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没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条件，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都是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三、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它自己。”在解释全人类包括一些什么人时，首先我指出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但也包括那些没有处死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已经处死者的家属子女等，都要改造他们。而要改造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在讲到改造这些剥削阶级的残余时，讲得过多了，过重了。这就引起人们有本末倒置之感，这也是错误的。

对于我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所犯错误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的其他言论和行动，凡不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也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并给予彻底的批判。

最后，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了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错误路线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错误的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工作组员，他们的责任甚小，主要责任在我，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签名)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据新华社报导，八个月内，在 117 个国家和地区，共发行《毛主席语录》80 多万册，14 种文本。

《红旗》第十一期发表洪平：《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及洪晓斌《坚决支持革命干部站出来》。

总参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斗争罗瑞卿，张爱萍、萧向荣、王尚荣、雷英夫、陈鹤桥、郝治平陪斗。11日，装甲兵机关造反派也开会斗争了罗瑞卿。

第十三编 武汉事件与“打倒军内一小撮”

第九十三卷 1967年7月10日至19日

(火线揪刘 武汉事件)

7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对河南省军区支左中所犯错误检查的批示。

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

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

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

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并武汉军区党委：

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有了错误，定要痛痛快快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绝不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更不能坚持错误，越走越远。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给河南省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对这一严重错误，在中央首长指出以前，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越陷越深；以致不能自拔。经过中央首长指出我们的错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才使我们逐步的醒悟过来，这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实际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坚决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我们在二月份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们组织双方代表赴京汇报，这对解决河南问题、纠正我们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对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采取了压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们的代表名额，不想赴京汇报，这实际上是对主席、中央的指示，与主席思想是对立的。

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压制了群众运动，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四月初，传达贯彻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这又给了我们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这些重要决定，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盲目自满，自恃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当时河南二七公社向我们的反抗，看作是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军区领导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群众大会讲话中，又重申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并且还把这个讲话登了报，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河南二七公社，致使我们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直至赴京汇报前夕，才作出宣布撤销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根本上搞错了。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不仅压制和打击了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支持了一些保守派。特别是三月份我们在急于夺权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原则，组织了几个总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赵文甫给军区写信，挑拨离间，用意极其恶毒，但我们政治上麻木不仁，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以及时揭露和反击。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立场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党委书记何运洪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并应作深刻检查。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不觉悟，不认识，不改正，根本原因是：

一、路线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始终体现着斗争的大方向认识不清，把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搞颠倒了，对他们非本质的和属于支流的缺点错误看得太重了，错误地把他们当作右派势力，进行压制和打击，自觉不自觉地站错了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保守思想严重。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习惯于按常规办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很不敏感，很不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反感，对他们缺乏深厚的阶级感情。对保守势力在思想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态度暧昧。支左工作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

三、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委领导成员很少深入实际，到群众里面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即使对我们所支持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提出的善意批评和宝贵建议，也听不进去。患得患失，不敢挺身而出冒风险，担担子，缺乏勇于负责的精神。怕群众，怕革命，怕丢面子，怕丢官，一句话就是怕革命。

四、党委领导不力。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闻不问，很不关心，参加省委文革小组有名无实，没有积极主动了解情况，因此介入后，心中无底，仓促上阵。在支左工作中，党委没有形成核心领导力量，工作忙乱，处处应付。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的方针和有效的措施。作风不民主，工作不深入，情况不明，决心不大，犹犹豫豫，朝令夕改；包办代替，听不进不同意见，未能充分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作用。

五、归根结蒂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得不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份力量多，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很好的触及灵魂，破私立公，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

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最高统帅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我们深感万分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河南五千万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地检查错误，坚决地改正错误。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坚定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决心以山东省军区为榜样，公开向群众作检查，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对二七公社坚决支持。努力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对部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路线觉悟，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努力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以上仅是我们的初步检查，还很不深刻，恳切盼望给予批评指示。

中共河南省军区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周恩来电告陈再道：“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武汉各派代表无须来京。

晚，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叶群、戚本禹等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出人员，以示支持。

戚本禹继周恩来、康生在7月4日接见河南造反派后，又于本日晚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分代表，肯定“二七公社”是造反派组织；“公安公社”有坏人操纵。

首都造反派250多个单位本日晚在地质学院大操场举行“坚决支持四川革命派大会”。时，成都“产业军”组织已形崩溃，然对中央所批准的革筹会不服，纷纷上京告状，人数多达万余。

7月上旬

戚本禹谈中央批陶的打算。

中央文革关于批陶的指示

最近广东省军管会派人去请示批陶的问题。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一、批陶问题全国怎样布置？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映再说。中央目前还没有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批判。

二、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决定。江青同志请示过毛主席，在报上批判是主席批准的，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行不行？

三、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哪里？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西行纪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本书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它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上海时代中学有个革命小将陆荣根，看过三家村的毒草，联系到陶铸的问题，首先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中宣部，受到迫害死去。报纸上可以先发这个革命小将的大字报，广州

加按语。

四、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来批判，他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先从广东开始。

五、给陶铸戴上什么帽子？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决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后定。

六、批陶的文章由那里审？

戚本禹同志说，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七、批判计划由谁定？

戚本禹同志说，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7月11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主持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蒯大富代表红代会致开幕词。陈伯达、傅崇碧、丁国钰到会。陈讲话，号召学生进行“教学改革”，说：“你们是创造这个新制度的开路先锋，是这一条新道路的探索者。”大会通过了《首都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倡议书》。

7月12日

周恩来、陈伯达、萧华、戚本禹、黄永胜等接见湖南代表，要求制止武斗，军区要好好改正错误，不再扣人。准备召集有关人物来京，商量解决湖南问题。

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授意对彭德怀进行揪斗。

张春桥在接见南京代表，谈及有人挑动农民进行武斗时，说：毛主席最近指示，现在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必须制止武斗。

7月13日

下午，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及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他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情况，指示：“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会上，毛泽东决定南巡，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随行。据王力透露，毛南巡是要亲自就地解决武汉地区大联合、三结合和建立革委会问题。（《王力反思录 上》第134页）实际上，恐另有阴谋，即使自己离开中南海，而让造反派放手揪刘。

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正式在中南海西门外扎营，坚决要求揪出刘少奇。其他院校、机关纷纷前往声援。

中央发布禁止挑动农民进行武斗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

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现在规定：

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枝弹药。

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

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所谓“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概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这个“通知”应该在生产队向农民群众宣传。

中央发布关于建造毛泽东塑像的指示。

林彪、周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现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执行。应当向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像，确实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但是，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传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毛主席七月五日指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

此外，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

康生在接见山西代表时谈彭真问题：彭真的问题搞了一年多才搞清楚。一开始我们就认为他可能是叛徒，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只是从履历表上怀疑。后来我们调查了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前，他自己供认了，说他被捕后，不仅自己叛变了，而且带着特务去抓革命同志，还向敌人下跪。这是革命的叛徒。这样证据确实了，我们才给他下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变投敌的大叛徒。我们知道彭真、安子文是有计划地抓了这个东西，烧了有关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吃了亏的。1949年安子文一进城就搞，派人到全国各地，……去调来档案销毁。太原陆军监狱的档案我们找不到，就是安子文1949年派人到太原销毁的。

陈伯达接见福建上访人员，指出韩先楚是个好同志，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傅崇碧在军代表会议上讲话：总理很忙，中央文革小组很忙，整天通宵干。

八万人进京告状，北京一天安排许多接见，解决各省问题。过去中央文革小组集中一块和一个省谈，现在不行了，只好分成几摊一块谈。伯达同志抓了江苏，还有高教，很忙。山西解决快了一些，现在大武斗，刘格平、张日清天天在京西宾馆解决问题。山东一开始作错了，中央一帮助，杨得志很快扭过来，形势就大好。（《传信录 836》）

据报导：北京市 130 多所中学，经过军训，实行联合，建立了革命“三结合”的临时领导机构。然实际上徒具形式，派性对立依然如故。

[按] 所谓“三结合”，毛最初提出是就干部年龄上，老、中、青三结合。后来的实际含义变成为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与造反派组织代表三者组织的政权机构，实际的权威是军代表，这批人对政府行政、机关专业则一窍不通，而又骄气十足。实际上他们本是部队以支左之名而处理的内定转业成员。他们一朝掌权，首先把家属迁来转为城市户口（军官家属多农村人口），然后是滥占权力，侵公肥私，而所谓不正之风大行矣。

7月上半月

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及李再含组成中央代表团去成都等地，处理西南三省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七月上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委派谢副总理等同志到西南和中南地区调查文化大革命情况，解决一些问题。七月一日，谢副总理在昆明接见“8·23”和“炮兵团”，做了重要讲话。七月五日，谢副总理在成都先后三次接见川大“8·26”，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表示支持川大“8·26”的革命行动。次日又接见“红成”等组织代表，要求他们按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六条规定办事，要撤回上京“告状”的数万人员。七月十四日，谢副总理在重庆接见两派代表，指出：现在揪赵永夫式的人物是错误的，54 军是毛主席的部队，要团结对敌。

7月 14 日

晨，周恩来飞武汉，为毛泽东东南巡作安排。随行者有李作鹏及海军、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周飞抵武汉后，始由武汉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通知陈再道、钟汉华，令他们前往空军驻地会见。

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应周恩来电召由四川抵武汉（同行的有北航“红旗”四人），以调解武汉两派严重的对立局面。临行前，与张国华、刘结挺、李再含在重庆接见两派代表。王力讲话：54 军是毛主席的部队，是第一支向中央检查支左的错误的，是中央信任的，现在提出揪赵永夫式的人物是错误的。要立即全面制止武斗，三方（并司、保革派、砸革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张国华、刘结挺同日发布了在重庆立即全面制止武斗的六条规定。

五月中以来，武汉两派武斗激烈。武汉军区支持保守的“百万雄师”，引起造反派冲击军区，倡言揪出“武汉的谭震林（武老谭），即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后，周恩来曾指示暂不露面。谢、王则上街看

大字报，有意公开身份。中央文革派早认定武汉有问题。林彪就曾多次对吴法宪说：武汉军区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江青 4·16 讲话，亦明确煽动造反派冲击成都、武汉军区。中共中央与中央文革亦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而军区不服，两派严重对立之局已成。

晚，毛泽东在杨成武等陪同下，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毛在火车上与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该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周恩来指示陈再道、钟汉华准备汇报，作出检讨。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造反派写信给汪东兴、周恩来，要求在 7 月 18 日开会当面批斗刘少奇。

林彪指使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陷害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学思(张学良之弟)。

晚，北京红代会等 50 多个组织三、四万人在地院大操场集会，支持“钢工总”、“钢二司”等武汉造反派反对陈再道及“百万雄师”的斗争。

“5·16”分子在农口各局及大街上发散宣传品“打谭攻周”。

7月上、中旬

“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以财贸口和农口为中心，开始了“第一战役”、“第二战役”，散发了大量攻击周恩来的传单。

全国八大军区中有五个军区发生群众冲击部队事件。

7月 15 日

康生讲话：毛主席说，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军内也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提高军队的思想水平。要从大局出发。第一，现在有人在部队煽动，就是要部队拥护张日清，反对刘格平。第二，山西省军区调农民带枪进城。第三，山西政法委员会无法无天，那样地对待群众，有些军分区，尤其是晋中军分区，那样反对陈永贵呵！不采取措施解决，要犯大错误。

戚本禹将中央办公厅吴良恩提出的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的报告，报请陈伯达、江青、康生决定。江、康画圈同意；陈在刘后，加上“邓、陶夫妇”。江复指使戚本禹在开会的同时，进行抄家，图获取有利于加罪刘少奇的有关日记、文件。

[按] 观此，益知毛泽东之南巡，乃把自己腾出身来，放纵群众围攻中南海，以达到彻底打倒刘、邓、陶的阴谋也。

北京市革委会召开彻底批判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动员大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给刘少奇发出勒令，迫使再次交出检查。

勒 令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

……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不好惹的。你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象你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二十五日零点前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红代会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

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揪陈(毅)大军”，进驻外交部。

谢富治、王力违反周恩来保密的指示，上街看大字报，被群众认出后，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谢、王亲往造反派处发表讲话。

中南地区公开在报上点名批判陶铸。

国务院致电淮南，令停止武斗。

淮南市军管会并转各革命组织：

各派应立即停止武斗，撤出对电厂包围，撤出对向阳包围，劝说农民回家。双方坚决贯彻六条协议，不能矛头对群众，不要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

请军管会负责查明有无抢窃银行金库行为，如有抢窃银行金库的行为，必须立即将为首者逮捕法办。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

7月15日、16日

毛泽东在梅岭一号两次召集随行的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和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各地问题的汇报，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作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毛在听了武汉地区情况后，又指示：文化大革命要在68年春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7月15日—18日

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与部队高级干部听取支左工作汇报，王力、谢富治参加。在毛、周逗留武汉期间，随行的李作鹏在王家墩机场设立了三军指挥部，吴法宪指令刘丰将武汉空军的领导人火速召来武汉。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也奉令来到武汉。

7月16日、18日、19日

戚本禹分别对参加会议的在京报社、电台等宣传部门负责人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以及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彭德怀、贺龙都是吃人的老虎。”“杀人不眨眼的野心家。”“彭德怀、罗瑞卿血债累累。”“不仅什么刘少奇、什么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统统都要批判。”“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不把他们批倒……你们领袖之类的……都会被抓起来，杀头。”

7月16日

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讲话：文化大革命就是大破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在批判中大破大立。要出好文章。戚本禹说：刘邓是吃人的野兽，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彭德怀是野心家。贺龙是土匪，他要当皇帝，叫真龙天子，他若得势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主义，贺龙一脑袋男盗女娼，他们是革命的同路人，跟毛主席是假，真正本性是要吃人。必须批倒批臭。首先各报纸要制定批判计划，作为头等任务；第二、红代会要组成专门批判小组；第三、加强材料工作，互通有无；第四、建议扩大批判联席小组，召集各校批判小组会商、互通情报，由十人组成：《解放军报》赵一雅，《人民日报》唐平铸，《红旗》林杰、金铁群、李广文，《文艺组》金敬迈、郑××、潘世民、杨勇志、阎长贵。（《传信录840》）

7月17日

军委看守小组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吴法宪任组长；小组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此即军委办事组的前身。该看守小组亦称军委四人小组或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办公，其任务是负责看管已经瘫痪的总政，负责驻京部队及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因全军文革亦已垮掉），然当时这一组织不对外公开，亦未正式下达文件，只在7月1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宣布成立。

纪希晨：《钓鱼台的风波》：“毛主席外出期间，林彪借口杨成武随同外出，管不了军队的事，背着毛主席指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看守小组，任命吴法宪为组长，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处理军内日常事务。随后，林彪又与江青合谋，提出成立军委办事组，在中央文革领导之下管理军队工作，代行中央军委常委的职权，夺了几位军委常委副主席的权，迫使几位老帅靠边站。”（《历史在这里沉思》第4册第281页）

北京市中等学校师生召开复课闹革命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誓师大会。《人民日报》报导：一个规模空前的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正在北京蓬勃开展。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6955部队支左经验后，广西422造反派气势大张，与保守派群众对立益形激化。晨，保守派群众围攻新华社广西分社。

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小型会议，布置揪刘事宜。

建工“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离开中南海，否则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北京电机厂来中南海西门，参加揪刘战斗。

7月18日

据王力回忆，毛与他谈话中曾说及：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还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还夸赞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周恩来在武汉为军队支左会议作总结，指示军区给“工总”平反，释放朱鸿霞，支持造反派。晚，周携陈再道、钟汉华往见毛泽东。谢富治、王力在座。当毛听说陈再道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还说：工作要作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工作作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作好。群众组织的工作作好了，思想工作作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毛又对陈、钟表示：我要他们作工作，作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并当场指示谢富治、王力，设一个接待站，接待群众组织来访，作思想工作。

周恩来在武汉、湖北军区干部会上的讲话（摘要）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的领导问题解决，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过去以王任重为首的当权，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重要意义。1·26夺权就夺权，2·8声明的出来，很多人支持。2·8声明尽管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

“百万雄师”是4·2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6·4公告出来就使得“百万雄师”得到合法的发展。在军区开过会，6·8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得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抓谭氏人物，对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方案的影响，还是坦白的。人武部、独立师(8201)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道听途说。这主要表现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我们有几个建议：

1. 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是严重的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解放有关案子。
2. 肯定“三新”、“二司”、“9·13”、“工人总部”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3. 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到我指名的影响。
4. “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来帮助。
5. “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
6. 军区要做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7. 军区要承担责任，要对部队做教育工作。长期的影响，不做好这个工作是不行的。
8. 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态度要澄清。军区有错误改了就行。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

晚，周恩来飞返北京。谢富治、王力随即前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在大会上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打击、受压制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康生接见河南代表时讲话：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事件后，毛主席就立即

指示要河南省军区找双方代表到北京来汇报，解决河南问题。主席再三指示，找双方，不是一方，甚至保守组织也要来，也要听他们的意见。我们把它作为解决各省、市区广大群众问题的重大方针。河南省军区何运洪、徐文礼一直拒绝，有意识地企图将“二七公社”压垮。错误的把矛头指向刘建勋、纪登奎，而不是执行陶铸、王任重指示的文敏生、赵文甫，犯了方向性错误。6月27日才送来检讨报告。中央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压了二十多天才发布。（《传信录843》）

李富春、李先念接见鞍山代表，呼吁无条件停止武斗。东北有三分之一的机动车辆压在鞍山，不停的武斗使车辆不能装卸。

戚本禹请示：为弄清王光美与美特关系问题，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意见，对杨承祚^①、袁绍英进行拘留审查，得到批准。杨在20日被拘审；22日袁被拘审。随后被拘的还有沈其震、曹亮、梁淑德、苏士文、马国钧、张重一等。

建工“八一战斗团”部分人于零时开始绝食斗争。誓词云：“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猖狂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国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晚北京100多个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齐集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戚本禹凌晨在人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但火力不强。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可以低头弯腰。”当天，中南海中央秘书局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夫妇，强迫低头弯腰。邓、陶夫妇亦相继挨斗，他们的家先后被抄。根据江青指示，这边斗，那边抄，要派人换上便衣，像是从外面来的人。刘少奇、王光美的笔记尽被抄走。会后刘少奇与王光美被分隔看管。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王光美，刘少奇正在操场上挨斗……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的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刘几脚，打了一个耳光。……我走到邓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铸的院子，邓和卓琳、陶铸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第472页）据李的记载，当毛泽东事后听到李的报告时说：“文革小组作事不听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

《人民日报》发表《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一文，指责建国十七年以来的“教育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破烂”，“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

工交、外事、财贸、卫生、统战、民委、学部、新闻出版单位造反派三万余，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

晚，“新北大”召开揪斗邓小平、彭真的誓师大会。

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与“联司”再次武斗，“东方红”队员解福喜受伤身死。晚，上海市革委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为解福喜身死事声讨“联司”。

7月19日

^① 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解放后任中国北京大学教授，袁绍英是他妻子。叶永烈《江青传》说杨、袁是15日被拘的。（第419页）

康生在京西宾馆传达毛泽东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很重要，要向六十九军的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近百个单位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苇草棚一字相连，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高呼。中南海西门外，轮番揪斗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部长，向刘少奇示威。群众不断冲击中南海各门，周恩来疲于应付。

清华“井冈山兵团”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蒯大富在会上讲话。北京及全国各地近100个组织前往“揪刘火线”扎营。旋即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总站”，广泛与全市及全国各单位联系，把揪刘运动推向新高潮。他们提出(1)勒令刘少奇交出第二、第三份认罪书；(2)背靠背进行大批判，争取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武汉造反派组织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王力的四点指示：即：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下午，谢富治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300多人的会议上，又讲了同样的意见，“百万雄师”组织的广大群众被王力在水电学院的讲话所激怒，声讨王力的大字报贴满武汉街头，要求揪斗王力。傍晚，省直属机关的干部，驻武汉的某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以及“百万雄师”的群众乘上百辆卡车和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涌入军区大院，质问军区，要求谢、王接见。王拒不见面。队伍又涌向谢、王下榻的东湖宾馆。

《动态报》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简介：

武汉革命组织：

1. “工人总部”（“钢工总”）。是武汉地区最早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之一，主要以武汉重型机械厂、汉阳钢轨厂、武汉锅炉厂、机械厂、柴油机厂等产业工人为主体。二月反革命复辟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而被取缔。

2. “钢二司”。是以武汉大中学校为主体的学生组织（湖大、华工等除外）。

3. “三新”：“新华农”（华中农学院中的群众组织）、“新华工”（华中工学院）、“新湖大”。

4. “钢9·13”。以武钢产业工人为主，是武汉最早、最坚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之一。

其他还有“红三司革联”，是从三司中造反出来的。“红卫兵革联”，是保守组织“三字兵”中造反出来的。“8·17”、“省直红司”、“长办联司”、“公安联司”等。

保守组织：

最大的是“百万雄师”，全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百万雄师联络站”，是今年五月由各保守组织以“红武兵”为主体扩大而成，包括：

1. “红武兵”。原保皇组织“职工联合会”垮台后，67年元月下旬，由市武装部出面，以民兵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原名叫“红色民兵”、“红战士”。

2. “野战军”。为四清工作队及运动初期的工作组拼凑而成，原名“红旗军”。

3. “红卫兵”。由王任重、张体学扶植的学生组织。元月份已自动解散，二月出来成了38201的“左派”得力打手。

4. “红色公安军”。是武汉公检法的老保。

5. “红船工”。

6. “红城公社”。是由公安部门操纵的居民组织。

7. “红色战兵”。机关干部。

其他尚有“造反大军”、“红星军”、“8·1红心军”、“工人造反司令部”（右翼）等。

人数总称百万。其头目为王克文（市委书记处书记）、辛甫（市委组织部长）、夏菊花（武汉杂技团团长）。

第九十四卷 1967年7月20日至22日

(武汉事件与“文攻武卫”)

7月20日

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数十辆卡车、消防车涌进军区大院。上午7时许，200多名“百万雄师”代表冲进东湖宾馆谢富治、王力的住处，独立师与二十九师战士亦随之涌至，将王力带至军区大院。接着，“百万雄师”数万人乘坐200余辆汽车，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王力！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也参加了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臂带“百万雄师”袖章，全副武装，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参加游行。游行持续至23日。湖北一些县市和外省群众组织，也纷纷来电支持。街头出现“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的大标语。

上午，林彪亲自写信给在武汉的毛泽东，由戚本禹、陈伯达进行了修饰，最后又签上江青的名，由邱会作持信飞至武汉，面呈毛泽东。信中说外间形势紧张，主席的安全已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同时，张春桥亦乘专机飞往武汉，并于下午四时转飞上海，安排毛向上海转移。

晚九时，周恩来从北京赶飞武汉，同行的三架飞机尽载中央警卫团全副武装的战士改在山坡机场降落。吴法宪布置空降部队控制山坡机场，以保护周的安全。周责令军区交还王力。此时王力已由军区从群众手中索回，军区政治部主任叶明将王力交付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带往二十九师师部。张为讨好王力，告诉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叛乱，已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要抓你。于是又将王力带到小洪山上，躲藏起来。在山上王力对张说：冲东湖宾馆是有组织的行为，海陆空三军的人都有，东湖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8199英雄部队虎穴龙潭救王力

(一)

我们编辑部的几位工作人员，于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前往访问英雄的8199部队。

这时正是上午八、九点钟，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武汉三镇，锣鼓喧天，彩旗飞舞，渡过了惊涛骇浪严峻考验的江城里，革命造反派正欢乐地庆祝胜利，一辆辆游行的卡车，满载着臂戴鲜红的臂章，手捧红彤彤语录的革命造反派战士骄傲地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鼓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可是，我们怎么忘得掉几天前那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胜利，使我们喜悦，也使我们回忆起我们走过的艰辛的，但是通往胜利的道路。

(二)

一间不大的寝室，壁正中挂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

茶在桌子上升腾着热气，热情的解放军战士往我们手里每人塞了一把扇子。

赵副师长，三十多岁的年龄，十分魁梧，神采奕奕，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握手时发现赵副师长穿的是一双草鞋。

张昭剑师政委身穿白衬衫，和洗得发黄的军裤，看去身体不好，脚不方便，谈起来才知他身经百战，为祖国，为人民，屡负重伤。

我们的心情很激动，我们望着和我们坐在一起的十几位首长及战士，望着他们鲜红的帽徽和领章。望着他们陌生而又熟悉亲切的脸庞，我们觉得我们的感情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感情是交融在一起的，我们的血液和他们的血液流在一起。我们有共同的誓愿：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张政委身上为保护王力同志脱险而增添的斑斑伤痕，最生动最有力地说明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立下了新功！

当我们谈起护救王力同志脱险，表达了我们钢二司小将的敬意之后，张政委谦逊地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我们的部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在关键时刻，我们不保卫毛主席司令部，保卫谁？”

(三)

在二·八声明之后，我们江城的革命造反派受到了陈再道之流的残酷镇压。我们没有一刻停止过战斗！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坚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陈再道之流为了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伙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欺骗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六月份起，在武汉三镇进行大规模武斗、屠杀！

“六·四公告”是一颗挑起武斗的黑色信号弹！

汉阳事件，六一七惨案，循礼门血案……

血洗汽配，血劫工造，火攻水运……都先后发生了！

一时乌云密布，黑浪翻滚！

三钢、三新、三联的革命闯将为保卫毛主席在浴血奋战！战友的鲜血染红了江城！

正在这关键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到武汉了。日里思，夜里盼，终于盼得亲人来。

北京吹来暖人风，大江涌起深情浪。整个江城沸腾了，一夜春风来，革命造反派个个喜笑颜开！

可是，陈再道之流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的反革命叛乱暗暗地预谋着。

“我们部队是十五号晚上传达的。”在座的邓邦碧连长告诉我们说：“我们大家一听中央首长来了，都高兴极了，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的，革命的人民谁不为亲人的到来兴高采烈呢？！

谢富治、王力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支持左派。

十九日下午三点，在武汉军区大院召开师以上干部重要会议，王力同志作了长篇讲话。

会议在八点钟休息一次，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到礼堂坪台上，笑容满面地接见了拥在军区的机关干部和家属以及负责保卫的八一九九部队战士，他们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向群众问好！一时掌声雷动，欢呼顿起，人们含着热泪，举起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

十点散会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又一次接见了群众。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就在这个会议上，王力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作了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如一声霹雳震江城，大长左派志气，大灭右派威风！

八二〇一的牛师长在会议中途，便无理起哄，强要发言，未被允许，下来后，凶相毕露，赤膊上阵，对部下煽动说：“拼了！”

于是，在会议中间，有三、四十名8201部队战士气势汹汹地冲到军区，要求接见，并质问王力同志五个问题。

于是，“百万雄师”受指使，连夜卡住长江沿线，汉水之滨，包围了飞机场，轮渡，火车站以及交通要道。

于是，军区外集拢了“百万雄师”的人，进行反革命示威，要挟中央首长。

一股腾腾杀气笼罩了全武汉，一场精心策划的反革命叛乱即将开始！陈大麻子的黑手伸了出来！

但是，“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拒绝接见 8201 无理取闹的人。满面笑容地告别了在场的群众，从容不迫地回东湖驻地去了！

“嘎！”一声响，“百万雄师”坏头头指挥一辆满载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大卡车飞驶而来，紧急刹车在军区门口。

又一辆，尘土滚滚，又是一辆……但是，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扑了空。邓连长告诉我们：十九号那一夜，八一九九部队守卫军区战士枕戈待旦，一夜未睡，严密注视事态的发展。

江城度过了紧张的一夜。

(四)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陈再道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也总是在垂死的时候，更加十倍的疯狂。

七月二十日，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纸老虎张牙舞爪地向革命派反派扑来了。

在陈再道的指挥下，清晨，六辆架着机枪，满载八二〇一部队战士的汽车冲进军区大院。汽车扬起的尘土未落，又接着开来四十几辆“百万雄师”，“省直联司”“三字兵”“康三司”的车辆，他们一律腰插匕首，手持长矛，头戴鸟龟帽，也冲进了军区大院。

一时军区大院搞得乌烟瘴气。

他们另一支部队就到东湖，围了中央首长驻地，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四条满面横肉的汉子，将王力同志非法绑架，推推攘攘，押至军区四号楼。

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件！龟蛇怒目相瞪，大江愤怒以呼。推打在王力同志身上，痛在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心上。陈大麻子罪该万死！

罪恶的乌黑的枪口，对准了王力同志的胸膛。可是，我们的王力同志谈笑自若，面不改色，十分坚定、沉着。是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最高尚，最纯粹。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敬爱的王力同志视死如归。他昂起头，挺起胸膛，象一道闪电，向着满天的乌云冲去！

到了军区，王力同志下车还亲切地向大家挥手说：“同志们好！”

四条横肉饱绽的恶棍匪徒赶上前来，把王力同志的手按下，一个混蛋狂妄地叫：“好！老子好就不把你揪来了！”

武汉的盛夏，赤日炎炎似火烧。一个六平方米的房间，住上四至五个人就使人热不能耐。可是，王力同志的房间里，床上，桌上，窗上……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匪徒，他们殴打，围攻，审问王力同志，使亲爱的王力同志血压升高，身负重伤。就连脚骨都被踩折。

(五)

难道能容忍敌人如此猖狂吗？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受折磨坐视不救吗？

不！决不！和王力同志在一起的张昭剑政委心如刀绞，如火焚！

关键时刻到了，是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的时候了！

张政委挺身而出，命令×团孙政委调来英雄的八一九九部队，火速赶到军区，保卫首长安全。

八一九九部队一到军区便神速地控制了四号楼一层及本楼的大门，楼梯。与百匪，三字兵，康三司及八二〇一形成对峙。

“飞将军自重霄入”，英雄的八一九九部队的战士象一道坚固的城墙围住了四号楼。但

是，形势依然紧急，百匪，八二〇一，三字兵，康三司开始冲上来，他们要把王力同志劫走。

王力同志还被围在三层，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陈大麻子狗胆包天竟在全市组织武装游行！

楼下院里的匪徒又发狂地吼叫着往上冲！

谣言越造越离奇，什么“好消息，中央同意斗王力！”什么“总理，伯达到武汉，王力靠边站！”他们急红了眼，向四号楼发动了更猛烈的冲击，满心狂妄，要抓王力。

这时传来了政委的指示：“头可断，血可流，一定要保护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王力同志，决不能让他们抓走！”关键时刻，听到了政委的声音，八一九九的战士们眼眶里涌出了热泪，手挽手挡得更紧了！

卑鄙的匪徒，用女妖在前面冲来，把我们战士逼成一个弧形，退至一层和二层之间了。无耻的匪徒，用头顶我们的战士，七、八个对一个，用手去拖、打我们的战士，担任指挥的8207—83 魏连长光荣负伤，昏迷过去。许多战士也负了伤，他们的血洒在军区的楼前，洒在江城的土地上，也洒在武汉及全国人民的心中！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尽管暴徒把长矛在地上敲得咚咚直响，但九班班长黄世袭义正辞严地说：“你这一套吓不倒我们，你了不起把我杀了，我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死得比泰山还重。而你呢？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死得比鸿毛还轻！”

(六)

我们听着 8199 指战员怀着崇敬的心情给我们讲王力同志战斗在暴徒中，他是那样的镇定自若，保持了革命造反派的凛然正气。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心不跳，脸带笑。我们的脑际里想起了泰山，想起了青松，又陡地一闪，那高大的形象就好象亲切地在眼前……

狭小的房间，匪徒们凶神恶煞般地围攻王力同志，他们扯脱王力同志的军装，撕掉了烈士用鲜血染红的领章，但是王力同志岿然不动。他无限热爱毛主席，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他对暴徒极端鄙视，他早已看穿了这一小撮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反动本质。

乌七八糟的暴徒乱吵胡嚷了一阵以后，其中一个所谓代表逼着王力同志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到武汉来在黑二司，新华工，干了些什么……

王力同志严正回答：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昨晚的表态不是我个人意见，是集体商量的，可以代表中央文革的。

真是投地可作金玉声！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刀山火海也敢闯！匕首，长矛，嚎叫，威胁算得了什么！

“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敌人恼羞成怒了！一个暴徒问：“王力，你说黑二司，黑工总，黑九一三是不是搞打砸抢！”

王力平静地回答：“不是打砸抢吧，就是有点也是支流……”，王力同志尚未说完，一拳正打在王力同志脸上，已经青紫斑斑肿大的脸又增加了一块红紫。这暴徒口里还骂：“支流，让你尝尝支流的滋味。”真是一群畜牲！

8201 一坏蛋穷凶极恶，竟拔出手枪指着王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军区某营栾庆祥营长，用胸膛抵住枪口，高声喝斥：“要开枪就先把我打死！”这是多么壮烈的画面，这是多么动人的事迹！蓝天作纸画英雄，大江滚滚奏赞歌。敌人永远也不懂，我们革命战士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的斗志高于山，情谊深似海！

(七)

太阳已经偏过当头，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多。王力同志一口水未喝，一口饭未吃，每时每刻都有生命危险，一分一秒都牵扯着战士的心。张政委、赵副师长、栾营长，看见王力同志挨打，每多一分钟，心就痛楚地紧缩一下。

下定决心要把王力同志营救出虎口！形势十分迫切，时间也十分短暂了。

8201 和 “百万雄师” 爬向窗子，沿着自来水管向上爬，一个，两个，又爬进来十几个人。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开始了！营救王力同志脱险的战斗开始了！

围攻王力的暴徒又饿又累，于是 8199 战士劝他们下去休息一下，逐渐把他们搞到楼下。英勇机智的 8199、8207 部队的战士迅速堵住了楼中间的楼梯，卡断了楼上的通道，也堵住下面百匪的视线，栾庆祥营长在上面掩护，8199、8207 的战士在楼下接应。

身负重伤的王力同志，在战士的搀扶下，顺利地从西边路口走出，坐上张政委预先安排在楼后的小汽车，小汽车马达轻轻地一声欢叫，就箭一般地冲出军区侧面二号门，当时时间是下午五点多钟！

只差一分钟！当王力同志从三层到二层，再从四号楼右侧送到楼下，穿过树林，正要上车，突然树林内一个脑袋一晃，是 8201 的一个人，他回头就去叫人，等到人叫来，车子已经出了军区。多么惊险的一分钟！为了首长的安全，8199 的邓连长早把上衣脱掉，故意匆忙地从侧门那里走来，果然引住了许多百匪，百匪吼着要抓邓连长，说王力是邓连长放走的，邓连长急中生智故意大发脾气：“放屁！你们是守门的，放跑了王力，老子是来抓的！”旁边的百匪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糊里糊涂，正不知怎么好，8199 的赵副师长喊：军区准备了饭，去吃饭吧！张政委也镇定地和百匪在泡蘑菇，百匪一走，张参谋把政委一拉，共同脱离了险境。

王力同志的车子一直开到 8199 师部驻地，王力同志住在六号楼。

这时陈大麻子慌了手脚，马上派出 8201 和 “百万雄师” 到 8199 师部设岗哨，严密封锁道路，扬言要进门搜查！

情况异常危急！王力同志有重落虎口的危险，怎么办？怎么办？！

张政委果断决定，派人赶走他们的岗哨，掩护王力同志上山。

(八)

我们登上了山坡。

这就是王力同志最后脱离险境和张政委及英雄的 8199 指战员度过难忘的一夜的地方！

我们沿着王力同志走过的道路向前走。山上没有路，荆棘遍野，野草丛生，怪石嶙峋。我们仿佛看见了敬爱的王力同志从容地从这里踏出一条道路来。

夜漆黑，为了不暴露目标，带路的张政委脱去了白外衣，赤着膊，在前面拔除野草，踏平荆棘，磨过尖石，不时爬着向前，给王力同志探路。战斗年代身负五次重伤，走路不方便的张政委，这一夜不知摔了多少次。

茫茫黑夜，没有一线灯光可以帮助探路。张政委已经撞得遍身鳞伤，他还是坚定地默默地在前面探路，他不是用身体，而是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胆忠心探索着一条艰难的，走向胜利的道路！

穿过树林，走到山的另一头，看见 8201 的岗哨，忙转回来。另一头又被铁丝网围住。

张政委和王力同志便在山凹里呆了一整夜。天亮时才下山到九一分队。

(九)

8201 和 “百万雄师” 见到没了王力，他们曾冲上这座山搜查，由于黑夜，石头、荆棘多，怕死的暴徒们，草草搜了一下便回去了。

百匪走后，张政委只身一人下山，来到九一分队，找到钱副连长，含着热泪，慷慨激昂，作说服工作，钱副连长当即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保卫中央首长。

……全连战士集结在一间小屋里，在张政委带领下向毛主席宣誓：“有我们在，就有王力同志在！”

天亮前，九一分队同志去迎接王力同志，战士们看见王力同志来了，非常高兴！但是一见王力同志被打的样子又都难过得哭了。怎不难过，中央首长来武汉连一个落脚的地方也

没有，还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怎不愤恨，恨千刀万剐的陈再道！恨“百万雄师”中一群混蛋！手中握着钢枪的战士，整整军装，把枪握得更紧了。

见到亲人王力同志，同志们想呼几句口号，表达满腔激情。但是，8201部队就在对面，只好吞下声音，泪水却沾湿了战士的衣裳，王力同志亲切地向大家问好！

王力同志被送到一间平房，在战士申烈焱的简单的床上休息。

第二天，师政委命令一部分战士“打篮球”以监视和掩护。另一部分战士把穿上军装的王力同志包在中间，乘上大卡车向飞机场驶去。

疲劳过度的张政委含着胜利的微笑昏了过去……

这个英雄的连队，是丘少云烈士生前所在营的一个连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过得硬的连队。护送王力同志的战士，都写了决心书，有的还写了遗书，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从8199师部回来，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看着碧蓝的天空，虽然天空中并没有飞机，但是，我们的耳边仿佛响着飞机响着欢乐的马达声，我们仿佛看到王力同志乘坐的飞机冲天而起，直向九霄，越过祖国阳光灿烂明丽的千山万水，向着祖国的心脏，向着毛主席飞去，飞去……

一路上依然是锣鼓喧天，彩旗飞舞，我们也和大家一块分享着胜利的欢乐。

灿烂光辉的毛泽东思想照耀着江城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革命者！

江城，经过考验的江城，在毛主席思想照耀下在更勇敢地向前飞奔！

(钢二司新华师总部，三司革联新华师红色造反团合编。)

(原载地质学院《东方红》小报，67年8月18日)

据湖北省委统计，湖北省在“七·二〇”事件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就打伤打残6.6万多人，打死600多人。

在“七·二〇”事件前后，毛泽东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北航韩爱晶等数十人审斗彭德怀，韩动手殴打，肆行暴力摧残。其众亦随之拳打脚踢，致使彭肋骨折断，伤及肺部，身体多处受伤。

北京卫戍区1967年7月20日对中央文革的报告：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被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7月21日

凌晨二时，毛泽东离武汉飞上海。

[按] 毛在国内巡行，例不坐飞机。这是破例的一次。当离开宾馆时，是由后门乘武汉军区的小车，大卡车在前面开道，亦从所不曾有，故“他老人家对于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王力语)，可见其狼狈。

刘丰至二十九师，将王力接至武汉空军司令部。

下午三时，戚本禹电话发出紧急动员令：从现在开始，工代会、农代会、大中院校红代会马上开始上街游行，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拟定类似

这样的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蛋！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等等。大会、小会、声讨会从今天开始进行。马上搞示威游行，经过天安门，时间由现在开始，搞二天到三天。(红代会通知：标语口号不得出现王力、谢富治的名字)根据这一布置，全市蜂起集会游行，并连夜波及全国各地。

《动态报》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总政、总后、海陆空三军、炮兵、二炮、工程兵等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二十一晚全部出动上街游行，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二十一日下午，北大、清华、北航、师大、地院、矿院、体院等高等院校均发出紧急动员令，并立即出动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冒雨进行。”“北航约六千人参加了游行，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武汉钢工总、钢二司等造反派。”“北师大全校开大会，向武汉三钢等造反派组织发出声援电，会后六千人参加了游行。”

大批武汉“百万雄师”成员乘车入京。车入永定门站，红代会及卫戍区包围检查，扣留 80 余人，然大部已进入市内。中央文革发出指示，要求各学校安排吃住，作分化瓦解工作，避免武斗。

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总站成立。全国各省市造反派对绝食揪刘斗争表示支持。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接见绝食揪刘战士。

总参、总政、国防科委、北京军区、二炮、防化工程兵、装甲兵、通讯兵和空军、海军驻京单位揪斗彭真、张爱萍、萧向荣、刘志坚、梁必业、李聚奎、杨勇、廖汉生、苏振华、刘震、成钧、陈鹤轩、张迺更、宋烈及许光达、谭友林、饶正锡等。

上海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发布通告，对与“工总司”长期对立的“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出通牒，要求把 7 月 18 日厂内两派武斗中，打死解福喜的凶手交出候审。

上海柴油机厂联司向上海市革委会递交备忘录

现在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日益加剧对我们联司进行迫害，现在他们更是抓住解福喜的死来达到其目的。为此，我们提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工总司的一些负责人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战部”挑起的，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 6.29、7.18 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

(二)对解福喜死的问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入院病历，确实证明解福喜的死因，根本不是什么被打死的，而主要是急病或中暑。

经我联司代表赴法医所观验，发现解福喜的尸体已遭破坏，已不足为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定对解的尸体进行剖解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

(三)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7.20)7.21 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

(四)近日《解放日报》发散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炮制者及幕后策划者采取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此致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北京市就中小学毕业招生和安置就业提出意见草案。

关于北京市中小学毕业招生和安置就业的意见 (草稿、供讨论用)

各中学军训指挥部军训团，中学红代会，中小学各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市、区教育局各革命群众组织：

发去“关于北京市中小学毕业招生和安置就业的意见 (草稿)”。请你们在集中力量搞好大批判的前提下，用适当时间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中学红代会和各区小学革命教师组织分别在七月底把意见汇集起来，提出一个修改意见，报市革命委员会。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毛主席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旧的教学方法和方针，把各类学校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今年中小学毕业、招生和安置就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和肃清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毕业、招生和安置就业问题上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二、毕业和招生的两种意见：

第一、分暑假、寒假两期毕业和招生。一九六六年的中小学毕业生在八、九月份毕业，同时招收一九六六年应入学的儿童和应升学的毕业生。一九六七年的应届毕业生到一九六八年一、二月份毕业，并相应进行招生。根据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这样安排，便于组织领导和安排就业，有利于学校的斗、批、改。问题是适龄儿童不能全部入学。

第二、小学暑假毕业两个年级，招收两年适龄的儿童入学，初中暑假招收两个年级，毕业一个年级，寒假再毕业一个年级。高中分暑假、寒假两期毕业、两期招生。这样安排，适龄儿童可以全部入学。问题是初中在校学生数量为增，领导管理、师资和教室都有一定困难，如能加强领导，增加师资，把教课全部改为二部制，也有可能解决。

我们倾向第二种方案。

三、半工半读和中等专业学校要认真搞好教学改革。继续招生，半工半读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定要办好，一定要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半工半读教育上散布的流毒。对于极少数确不需要办的学校，应进行调整，停止招生。对于一些极端不合理的制度，在招生前，应发动群众加以改革。

农村社队办的农业中学、耕读小学，应加强领导，坚持办好。

四、招生工作，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废除分数挂帅的升学考试制度，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要根据毛主席指示的“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原则，进行推荐、选拔，要坚决地全面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既要重视阶级成分，又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要注意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工农子女优先录取，郊区中学要适当提高贫下中农子女的升学率。

五、废除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学校、工读学校和幼儿师范学校。从今年招生开始取消男女分校分班的设置。实行就近入学，统一分配，适当调整的原则。对于少数需要寄宿的学生要予以适当安排。

六、中学学生毕业前，每人都要总结一年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收获。要认真学习“老

三篇”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开展自我批评，破“私”立“公”，坚定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最后写出思想总结，可在班上由群众提意见。同时，要认真填写“毕业生登记表”。

七、安置就业，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在农业、工交、财贸、文教等战线统筹安置，要保证重点部门和单位的需要。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毕业生应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结合，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首先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当社员，这是同贫下中农结合的主要形式，这是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途径。其次是插入国营农、林、牧渔场当工人。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积极做好毕业生的安置和就业工作。

八、就业安排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采取个人自报，班级评议，学校推荐，国家单位选拔，分配部门平衡相结合的方法。革命青年应当把党和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九、各区、县都要建立招生、毕业、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关。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由革命委员会负责组织，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由区、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和军训团负责组织，吸收区、县教育劳动等有关部门参加具体工作。

各中等学校要成立领导机关，建立革命委员会和实行军训的学校由革命委员会和军训团负责，没实行军训的和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学校在区、县领导小组协助下，以革命左派为核心，联合各群众革命组织，组成一个有革命干部、革命教师参加的领导班子。班级要相应建立领导小组，要动员团结广大教师积极参加毕业招生和安置就业工作。各小学要以革命干部、革命教师组成领导班子。

十、做好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要大力宣传破“私”立“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鼓励青年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成长。要提高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

上述毕业和招生工作要在八、九月份完成，十月上旬各类学校招收的新生都要开学上课。现在仍未回校的教职员和学生都要立即返校，为毕业、招生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做好准备，广大革命师生要立即动员起来，搞好毕业、招生和安置就业工作，搞好教育革命。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

陈伯达、康生等接见河南各方代表，对河南、武汉形势发表讲话。

陈伯达讲话摘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有障碍和阻力的，旧的习惯势力也会蒙蔽一部分群众，但群众总是会觉悟的。敌人貌似强大，实际上只是纸老虎，结果是自己搞垮自己，自己毁掉自己，统统挡不住毛泽东思想的洪流。他们自以为强大，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倒，结果把自己充分暴露了。大暴露，对革命派并不可怕，只有大暴露，群众才能看得出来。他们为什么要大暴露，因为他们受不了群众的压力，以为不得了，大暴露就要猖狂地向革命群众进攻，结果是碰得头破血流，自己给自己掘了坟墓。他们貌似强大，一下子暴露在群众面前，很快就垮了。与广大人民群众作对不垮是不可能的。

武汉“百万雄师”现在看起来很嚣张，不久就会垮。为什么会垮？因为对那些反动的家伙，开始群众还不了解，以后臭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对于受蒙蔽的群众我们要帮助，

要教育，要启发他们。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些人是受人控制的，“百万雄师”，号称百万，名气挺大，实际是个纸老虎。武汉“百万雄师”是纸老虎，纸老虎玩火把自己烧掉了，“玩火者必自焚”，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关于农民进城问题。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时，农村包围城市是对的，是为了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是反动的。现在革命的主流在城市，革命的工人、革命的青年、革命的学生，而农民还不知道情况。

有些工厂把国家财产、物资用来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叫做破坏国家财产。……

关于破坏国家财产制造杀人武器问题，我特别讲一下。不能用国家财产、物资制造小集团杀人武器。……工人同志要特别注意，不要被人利用。在工厂，工人被人利用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文化革命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文化革命，所以过去有些走错路的工人，应该赶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应当再被人利用。不然，将来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还有挑动农民进城的问题。谁挑动农民进城？你们有些保守派按照自己的目的，让农民犯错误。

在农村制造谣言，用农民包围城市，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过去没有解放以前，毛主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按照毛主席指示的道路，我们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现在情况变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这时候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是反动的。(康老：发明这个口号的是李井泉、产业军。)李井泉就是在城市混不住了，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背叛了毛主席。李井泉想要农民进城，保卫他的政权，他还不是失败了？各地的规律就是军分区、人民武装部动员。凡是动员农民进城大体都是军分区、人民武装部搞的，大家对这一点也不要怀疑。

人武部有好的，能够改正错误还应该欢迎，不想改正错误的要有适当措施。……动员农民进城就是犯罪，对无产阶级犯了罪，对人民犯了罪，对农民说来也是犯了罪。……如果你们对农民犯了罪，农民会找你们算账的。农民受蒙蔽是一时的。我们相信群众，信任群众。毛主席的路线就是相信群众的力量，希望他们转过来。群众可以犯错误，但是他们会改正，你们不要以为可以随便利用农民，那样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康生谈话摘要

我请你们估计一下，在河南省没有同情百万雄师的？百万雄师已经到河南了，产业军也到河南了，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铁军，十大总部，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仔细考虑你们组织里面，有没有同情百万雄师的？这一点要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百万雄师是反对二七公社的，是反对中央给二七公社平反的，这在武汉有标语。不但百万雄师，武汉军区也有人这样反对。因为河南军区何运洪与武汉军区有关系。何运洪为什么敢这样大胆呢？同志们，河造总的同志们，十大总部的同志们，你们应该很清醒的考虑，因为河南军区是受武汉军区直接领导的，一军也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我不说武汉军区整个不好，但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准备自己检查。他们里面有些组织，特别是独立师的一些干部，煽动百万雄师反对中央。因此，全国革命人民坚决反对他们，北京的革命群众，还有部队，反对他们不是偶然的。这是件好事，把他们的面貌一下暴露出来。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请河南革命组织，革命群众考虑一下，河南有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的危险？有没有按照这样的方法再来第二个武汉？每一个革命群众，每个组织，每一个真正要革命的人，都应该在他的头脑里考虑考虑。当然他们一意孤行，有他们的自由，他们可以走上反动道路。但是我希望革命群众要禁止这种现象，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假借革命运动走上反动道路。现在，王任重的百万雄师，李井泉的产业军，都向你们河南走，可见河南有点油水。不然为什么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有同情他们的，有支持他们的，和他们结合，和他们有点共同的东西，所以他们才

去。是同他们搞在一起，还是反对他们？这个问题摆在群众组织面前，这两条道路要自己选择，这不能和稀泥，这不能宗派主义、有小团体主义，这是国家大事，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希望革命的组织，千千万万不要上这个当。我觉得，群众总是好的，我们坚决相信群众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一个时候不明真相，会受蒙蔽。现在武汉街上贴满了标语，有些军区的宣传车也大肆宣传说：“武汉军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这完全是造谣。还造谣说：中央说，百万雄师是革命左派。军区的宣传车假造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林副主席的谣言，欺骗群众。他们总是想采取内蒙古反革命分子的手段，造成既成事实压中央，他们完全错了。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不会被这些坏分子压倒的，他们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让他们表演表演，谁愿表演就再表演一番。这样的阶级斗争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这看起来是坏事，实际上是好事。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更彻底的。同志们，今天从北京会上一大课，他代表全国的革命组织。这一点我为什么讲呢？因为河南武斗不是停止了，而是一天天的在发展，有军区的某些人在我面前玩两面派手腕，还在煽动群众。同志们从这个地方，可以懂得什么叫陶铸，什么叫王任重，那些坚持执行、坚决拥护陶、王的人，象文敏生、赵文甫等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你们拥护的是什么首长，他是什么结果。从这个问题，也可以叫何运洪、李善亭等人看一看，他们实行这种路线，如果不改变，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们能代表解放军吗？（众答：不能。）现在全军陆海空都在游行反对他们。同志们从今天可以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得到一个经验，我看对解决河南问题很有好处。当然也可能有人错误地估计形势，比如你们的公安公社吧！他们看看形势满好，又蹦了出来，我们准备他们蹦。刘大坤，还有一个钟什么东西，他们已经蹦了出来，谁跳出来都行！他们认为是一个大好时机嘛！我看大暴露一下，他们高兴一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现在河南的武斗不是停止，是发展了，是在酝酿一个武汉“百万雄师”这样的反动行为，有这样一个危险。因此，我希望你们看到街上革命群众游行的声势，得到一个教训。军区的某些人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支持对抗中央的指示的反革命的“百万雄师”不会有好结果。当然有些同志，譬如何运洪同志，检讨承认错误，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我上次讲了，是真革命假革命，有一条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真正的革命者，是全心全意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会两面三刀耍两面派手段。同志们，犯错误不要紧，哪个组织有错误也不要紧，犯错误坚决改正自觉检查就好了。现在有些群众组织，一面打人，一面叫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说这种话实在可耻。从这件事件是可以得到教训的。当然百万雄师内，积极参加的还有“三字兵”，这一点你们“铁军”要很好注意。“三字兵”就是“黑字兵”，还有公检法，你们十大总部要注意，要警惕，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彼此有同情的基础。我们同意同志们刚才讲的，我一接触河南问题就看出武汉了，不解决武汉的问题，河南的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河南军区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政策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大暴露，对解决河南问题有好处，同志们从这个问题得到积极的教训，也可以得另外的教训，无非是再表演一次，因为事情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今天我希望同志们，希望每个组织都平心静气地向团结方面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团结方面走。武汉军区的问题，希望你们作为一面镜子，引以为鉴，不要向这方面走，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现在看，事情的发展不完全是这样。当然河南也还是逐渐向好的方面走的。同志们要注意国家大事，脑子里有敌人，有阶级，有敌人。陶铸、王任重不是死老虎，陶铸、王任重还把手伸向河南，他们的黑爪牙是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敏生、赵文甫等。我们今天也可以讲，对于何运洪的问题也可以讲到底，是改正错误还是坚持错误。我们相信你改正错误，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底是不是确实如此。因为在军区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还受压制，代表何运洪路线还在兴风作浪。如果他们这样干，他们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我们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甚至犯了错误的干部，都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我们希望他们真正地改正错误，不是玩两面派。真正按着毛主席、按着中央的路线干，

河南的问题会完了吗？不会，还有一场严重斗争，这一场严重斗争对于你们革命群众组织是个严峻的考验。究竟站在那一边，摆在你们面前，由你们去选择，愿意站在那一方面，就站在那一方面，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了就好了。对中央同志，对文革小组，对毛主席采取那样的态度，是什么行动？是叛变行动，是愿意跟叛变的人在一起，还是愿意跟革命的人在一起，要选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跟着叛变的人阴谋诡计总会暴露出来，两面手法会暴露出来，两面三刀总会被揭发出来，希望代表了解这回事，也希望你们对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工作，你们不是说要革命吗？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反对毛主席的路线，还叫什么革命？你们每次都喊毛主席万岁，都一个人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但是你们实际行动并不象喊口号那样容易，不象读语录那样容易。我告诉你们，北京和全国革命派是真正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对你们，也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对于河南特别重要，因为河南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过去是受中南局陶铸、王任重领导的。过去军区是反对二七公社的，现在“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同样反对给二七平反，这里边同你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难道我们的同志愿意同他们的反动行为搞在一起吗？难道还同情他们、划不清界限吗？我相信大家不会这样的，现在形势大好，但是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艰苦的。

谢富治讲话摘要

我们是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周总理的指示，主要是毛主席要我、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到云南、成都、重庆，到武汉也是毛主席的意思。西南的问题虽然还没有全部解决，但是有毛主席的威信、有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威信，有王力等同志做了许多工作，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武汉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象成都和重庆，成都和重庆都是造反派内部的矛盾，有些也涉及到对保守派态度的问题，容易解决。武汉性质不同，是三钢、三新与“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矛盾。三钢是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新是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三钢”和“三新”的造反派都是热烈欢迎我们的。一去就把我们围住了，非常热情，他们说他们那里是“解放区”。

独立师的师长和政委最坏，带头和“百万雄师”抓我们。那一小撮走资派，王任重、陈再道和牛师长、蔡政委，他们坏得很，他们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他们特别仇恨中央文革。广大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对中央文革小组非常热爱的，威信很高，但反动派、保守势力、走资派，特别仇恨他。我们有一条经验，那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中央文革小组就是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的，是毛主席掌握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和保守势力，就是要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刀，而且是一个一个的搞，所以我们要热爱中央文革，要保卫中央文革，要听中央文革的话，我们北京革命造反派，要记住这一条。“百万雄师”，他们就是恨中央文革，他们的口号是，绞死王力，打倒谢富治，他们说王力有四点指示，什么四点指示，五点指示，周总理在军区讲话里有四条：“（一）‘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二）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三）要为工总翻案平反。（四）‘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三司是中间偏保守。”这完全是总理讲的。但独立师不敢说是总理讲的，而说是王力讲的，他们造了很多谣。把一切事情都加到王力身上，煽动群众，实际是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包围我们，把王力同志抓走，我去救，他们就骂着拿着刀子、长矛来抓我。我们到水电学院去，就是夜里两点多钟偷跑去的。一去就被群众围起来了。他们很热情，如果到百万雄师的群众中去就很危险。他们很坏，是王任重、陈再道、独立师和武汉的公检法还有他们的消防队。消防队坏透了，拿刀子来杀我们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和河南的保守势力串通起来。中央承认“二七”公社是造反派，他们就想反扑，给中央施加压力。当然他们当中坏人是少数，多数是受蒙蔽的。

保守势力是纸老虎，他们违反毛泽东思想就站不住。他们靠欺骗宣传，什么中央批准斗

王力啦，什么总理表示支持百万雄师啦，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武汉独立师他们的师长、政委都是坏家伙，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别的部队也是好的。你敢公开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中央文革，就要遭到七亿人民的反对，就要遭到几百万解放军的反对，只要一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一反对中央文革，就会垮台。管你什么百万雄师，就是千万雄师也不成。这一点也教育了我们，凡是坏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王力同志很好，我们要向他学习。

要把斗争矛头针对一小撮坏人，“百万雄师”的一小撮，独立师中的一小撮，军队中的一小撮。

“红成”在北京有一千八百人，与“百万雄师”不同，他们是造反派，中间犯错误了错误：(1)是矛头针对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他的办事组；(2)动员一万人上北京告状；(3)要以自己为主夺权，为小团体夺权。“红成”还是有进步的。

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叫我们怎么办就怎么办，要沿着毛主席航线走，不要离开毛主席的航线，不管是工代会还是红代会，应先把一个学校或一个工厂办好，然后再搞全市的工作，现在武汉的问题就不能离开大批判，这个大批判要搞到明年，通过大批判大搞联合，大学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批判修正主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不要离开这条航线，不管什么干扰我们都不能离开这个航线。在这个大事情下北京要稳定一下，要制止武斗，要完全纳入毛主席航线前进。工人是最主要的力量，工农是根本，各种流言蜚语谣传干扰，我们都不管，要跟着中央文革所引导的毛主席航线前进。

7月22日

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发表讲话，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时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摘录）

应该是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刚才有一位同学讲到，要做群众工作，制止武斗这是很好的，要大力宣传。因为搞武斗的人总是一小撮，如果广大的人民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穿了他们，他们就会象过街的耗子人人喊打。要向群众做深入的宣传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胜利。

另外，也不能太天真烂漫了，就是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己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一方面。我向同志们建议要做深入艰苦的群众工作，因为广大的群众识破他们还要做一些工作。但是，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当然，武汉的革命小将也在采取自卫。同志们，当“百万雄师”以及它的幕后操纵者一小撮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我们的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能允许吗？

河南的情况现在在解决，已经达成协议，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跟我们订了协议，他马上就撕毁了。这样的人我们要揭穿他，河南也不例外。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工人同样遭到这样的武斗、围攻。

我今天想看看你们就把这个道理讲一下，第一条，我们有理，真理在我们这边，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工人、革命农民这边，不在他们一小撮一边，他们必败！但是，如果他们挑起武斗，不肯放下武器，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凌晨三时，王力在李作鹏、刘丰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刘丰报告吴法宪，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乘机车、摩托。吴即将情况汇报林彪。

上午，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开会，要求稳定武汉局势，稳定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李作鹏则让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电报，指7·20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出面表态“打倒陈再道”。东海舰队发表《严正声明》，称“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当时，东海舰队已奉令向武汉靠近，以备不测。

张昭剑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

下午，谢富治、王力飞返北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关锋、姚文元、叶群等及群众数万人前往机场欢迎。当晚，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议将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决定调陈再道、钟汉华来京，并准备起草一个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

中央决定成立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林立果以“红尖兵”笔名，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鼓吹揪军内一小撮。

第九十五卷 7·20 武汉事件(续一)

[按] 武汉 7·20 事件，当时轰动全国，认为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13 年以后，陈再道写了《武汉 7·20 事件始末》(另有《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一书，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的严重对立贯彻始终。造反派因为事实上成为毛泽东、林彪、四人帮的打手，丧失其反官僚专制统治的本始意义；保守派所要维持的，本质上就是官僚党阀的独裁统治及其特权利益。故他们间的互斗，从总体上无是非之可言。本书旨在保存史料，原则上，只要是有关史料价值的，无论是哪一派，我们都予兼收，是非则留待研究者们去讨论。

谢富治、王力等同志战斗在武汉——记七·二〇事件
武汉钢二司

一、背景

武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的把持下，充满了白色恐怖。他们把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工总”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肆抓人，把五百多名革命派战士投入了监狱。他们对军委八条也不传达，就是在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还大肆挑起武斗。陈再道之流提出“以武斗制止武斗”，公开支持反动组织“百万雄师”，企图消灭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武汉地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六、七月份，武斗最为厉害。

周总理在七月十四日去武汉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对双方都做了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周总理在军区讲话里曾指出四点：(一)“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二)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三)要为“工总”翻案平反；(四)“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三司”是中间偏保守。造反派坚决拥护总理的指示，表现很好。谢富治、王力等同志从重庆到武汉后，周总理就委托谢富治、王力留下继续处理一些问题。

二、坚决支持革命派

谢富治、王力同志和随行的工作人员、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在重庆整整工作了一天，到武汉下飞机后没有休息。就立即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们分别接见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百万雄师”的代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谢富治、王力同志坚决支持革命派，他们向军区负责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的声明；“工总”必须翻案，因“工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

谢富治、王力同志还严正指出：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指示，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气焰。这一切当然不能不遭到陈大麻子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混蛋咬牙切齿的仇恨和疯狂的反对。

三、陈再道之流的叛乱

七月十九日下午，八二〇一部队中极个别的反革命分子，以传达谢富治、王力同志的讲话为名，大肆攻击中央代表，大肆造谣，把一切事情都加在王力同志身上，煽动部队战士

起来闹事，实际是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还组织人到“百万雄师”中去串连，密谋策划了当天夜间的反革命暴乱。七月二十日早晨零点，三卡车“百万雄师”暴徒开始冲击中央首长的住地—东湖宾馆，扬言要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去军区回答问题。同时军区门口和院内集结了成千上万手持大刀长矛的“百万雄师”队伍和全副武装的八二〇一部队，其中一部分已开始向东湖宾馆方向移动。这时，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把陈再道、钟汉华找来了。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却趾高气扬地对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施加压力说：“这回可要靠你们作工作啰，我们无能为力呀！”当时守卫在首长住地的也是八二〇一部队的人。他们在陈再道的操纵下，居然敞开大门放“百万雄师”和八二〇一部队的一小撮坏蛋长驱直入。清晨六点钟，全副武装的人突然出现在首长住的二号楼走廊上！他们杀气腾腾，东窜西跳，直奔首长住房而来！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毫不畏惧，把门一开挺身而出，厉声责问：你们要干什么？我就是谢富治！我就是王力！但是，他们立即被越来越多的手持大刀长矛的暴徒层层包围起来，并拥到外面草地上大肆围攻。

这时候，陈再道被暴徒误认为是王力同志，打了几下，就趁机装死狗，趴在地上鬼哭狼嚎起来。“百万雄师”中一些人看见错打了他们的陈司令，就连忙向陈再道这个老狗赔礼道歉，还给他鼓掌。陈再道是什么东西，难道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四、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当时，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耐心地向受蒙蔽的群众作了工作，情况刚刚开始缓和下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八二〇一部队中一小撮坏蛋和公、检、法当中的大队人马端着冲锋枪和上刺刀的步枪，子弹上膛，打开机头拥了过来。他们有些人敞着怀，歪戴着帽子，卷着袖子，一来就大叫：“王力在哪？揪王力！”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围攻、殴打开始了。当时在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一共只有七人，全遭毒打。他们一群围一个，用拳头、石块，没头没脑地乱打。甚至还拔出匕首向谢副总理的秘书刺过去，幸好旁边有人架住，才没有刺中。他们早已预谋好了，这时他们把谢副总理推到房内，把王力同志连推带打绑架上车带到军区去了。暴徒们狂叫：“王力被我们抓到了！”同时他们还把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战士尹聚平同志也抓走了。暴徒们走时，在门口警卫的八二〇一部队中一小撮坏蛋还向他们鼓掌。他们还冲进王力同志的房间把王力同志带的材料，全部抢光。王力同志被他们一拉上车就被暴徒把领章、帽徽撕掉了，军装被撕开了，把内衣全部给撕破了，拉到军区内游斗，殴打，全身多处受伤，一只眼睛被打肿，左脚被踩成骨折。对王力同志的围攻从早晨六点到下午三点，长达十来个钟头！真是疯狂到极顶。

当谢副总理听到王力同志被绑架到军区的消息后，立即带领剩下来的几个同志坐上车到军区去。军区的门口已被一队一队的汽车、消防车挤得水泄不通，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八二〇一部队和“百匪”。有一个消防队员混蛋，认出了谢富治总理，就扒着车子大叫：“拿刀过来，拿刀过来！”幸好车子开得较快，谢副总理才免遭毒手。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预谋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这次暴乱的直接指挥就是武汉军区和八二〇一部队中的一小撮坏蛋。他们坐镇军区大院，听汇报，下指示。行动前他们就调查好了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住处，连离二号楼只有几步远的一号楼，他们都没有去碰一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故意把谢副总理推到屋里纠缠不休，这边却绑架王力同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抢走了王力同志的文件，可是其它东西都没有动，这难道是一般的抢劫吗？

再听听这次反革命叛乱喊的是什么口号吧！什么“王力是中央文革的定时炸弹！”“王力是刘少奇的黑走狗！”“绞死王力！”“打倒谢富治！”“中央文革滚出武汉！”“陈再道的政权万岁！”等等。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不是很清楚的吗？

这一切都表明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武汉军区一小撮混蛋一手策划的、空前骇人听闻

的反革命暴乱，是武汉地区的匈牙利事件！

五、周总理乘飞机来了

当中央听到武汉反革命叛乱的消息后，周总理亲自带了两架专机去武汉（一架由周总理乘坐，另一架是空机，准备接谢富治、王力等同志）。周总理临行前，秘书通知军区，别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在周总理的飞机离武汉一百公里时，陈再道竟派了二十五辆汽车，载着“百万雄师”的人，亲自到了机场，当时空军发现情况不对，立即给总理拍电报，总理乘坐的专机改降在另一个机场，陈再道只等到了一架空飞机。原来，陈再道并不是去欢迎总理，而是想要扣留总理。陈再道的秘书揭发说：陈再道在得知周总理要来武汉市的消息时就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陈再道真是嚣张之极！罪该万死！

六、胜利返回毛主席身边

王力同志被他们抓去毒打、游斗以后，由于中央首长的严厉命令，军区中某些人才不得不把王力同志送到×××师，然后由×××师政委陪同在两个半连的保护下转移到山上。可是刚转移一分钟，“百万雄师”又包围了×××师！就差一点又把王力同志抓去了！在“百万雄师”一小撮的白色恐怖下，王力同志和其他两个同志，不得不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呆了半个晚上。后来才由×××师的一个政委找到两个排的解放军战士作了工作。人民解放军不愧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当战士们听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来的人遭到了危险，都痛哭流涕，写了保证书，表示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表示坚决保卫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这样王力同志才脱了险。后来在武汉空军的保护下离开了这两个排的驻地。刚刚走出门口，“百万雄师”的人又到了，他们喊：“王力跑了，王力跑了！”不一会，这两个排就被包围了。就这样，在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帮助下，在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下，经过几番危险和曲折，王力同志才转移到武昌南边的一个机场。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在空军部队的大力协助下，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和随行人员全部平安地回到了毛主席身边。让我们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七·二〇事件绝不是偶然的。列宁说过：“只要过渡时期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七·二〇事件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大事记

前 言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由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革命烈火正以燎原之势，燃遍全中国，群众运动的革命风暴，震撼全世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越来越好。

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是不甘心自己的死亡的，他们总要作垂死挣扎，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必然逻辑。武汉的谭震林—陈再道之流正是这样。他在我们革命造反派集中火力，向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巨浪猛烈地冲刷着中国大地上的污泥浊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遭到灭顶之灾之时，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残酷地镇压革命造反派，疯狂地破坏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为了大规模地镇压革命造反派，他首先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强行解散了工人总部，把四十八万工人战斗队员打成了“反革命”，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了把工人总部打下去，他们玩弄了极其卑鄙的手段，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要阴谋，放暗箭，颠倒黑白，横加罪名。把历史完全完全颠倒过去，臭名昭著的“〇·二一”眼看破产了，陈再道之流抛出了更恶毒的“六·四公告”，企图再次把刚刚兴起的工人总部

打下去，以维持其濒于灭亡的命运。

然而，陈再道之流想颠倒历史，左右乾坤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历史是最好的证人！墨写的谣言决掩盖不住血写的真理！

让我们打开历史的篇章，看看用战斗队员的血和汗记载的，是多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看看工人总部所走过的，是怎样光辉灿烂的斗争历程吧！历史将宣判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历史将无情地判决陈再道之流的死刑！

早在去年六月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长期盘踞的大本营湖北黑省委、武汉黑市委对群众运动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疯狂抵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当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全湖北时，以王任重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黑指示，向各工矿企业、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这些进驻工厂的“消防队”，疯狂地扶植保守势力“工人赤卫队”、“职工联合会”，残酷地镇压群众运动，竭力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大批敢想、敢说、敢冲、敢打、敢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工人打成“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顿时，大规模群众斗群众的黑云笼罩着江城每一个工矿企业单位，白色恐怖布满了武汉三镇。仅武汉锅炉厂被斗革命群众二百余人，被大字报点名批判的革命群众达六百多人。其它各工厂也是如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并没有使革命的工人屈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工人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了出来，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投入了战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纷纷成立自己的战斗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以后又冲破层层阻力，广泛串连，成立了全市性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红旗卷起农奴载，黑手高悬霸主鞭。”就是这支掌握真理的工人战斗队，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们的威风扫地以尽！

就是这支战斗队冲破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围剿，与革命学生一道起来造湖北省委的反，揪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秋后算帐派”总头目王任重，揪出了反革命两面派、镇压群众运动的急先锋张体学！

就是这支战斗队，英勇地顶住了“工人赤卫队”、“职工联合会”，“大专兵”的反革命围攻，旗帜鲜明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就是这支战斗队，在黑省委王任重、张体学疯狂地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唆使其御林军“职工联合会”等停工、停电、停交通、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乱发工资，滥用福利时，首先高举起“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喊出了“砸烂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响亮口号，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两副重担一肩挑！粉碎了这股经济主义妖风，及时地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请听听工人战斗队员的豪言壮语吧：“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造反派，抓革命，我们是先锋，促生产，我们是模范。”

“既做革命的闯将，又做生产的尖兵，誓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我们革命造反派天不怕，地不怕，天塌了，我们敢顶，地裂了，我们能填。”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诞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节节胜利也决定了战斗队必然壮大。她是在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中诞生的，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发展壮大的，是经过了阶级斗争考验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她本身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坚决捍卫十六条，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人战斗员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阶级感情，鲜明的阶级立场，钢铁般的斗争意志，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艰苦朴素的战斗作风，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为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史册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

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在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力地说明了我们伟大领袖的这一教导，证实了它是十分英明的，正确的。同时，我们也深信：工人总部这支武汉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必将担负起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在当前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关键时刻，在同武汉的谭震林之流的生死决战中，作出更加伟大的贡献，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

由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迅速燃遍全湖北。经过我们伟大领袖亲自批转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播以后，革命火种迅速传播到全国。我们伟大统帅又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亲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条。十六条的发表使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到了八月份，毛主席又号召进行革命串连，首都同学南下了，他们来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带来了首都文化大革命的好经验。到八月份，各个学校都出现了一批革命的“少数派”，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起来造工作组的反，造变相工作组校文革的反，造湖北省委的反，他们敢冲敢打，奋勇前进，为湖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他们又冲破重重阻力，和首都南下同学一起，自行串连，成立了自己的战斗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为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先锋队。

同样，在各个厂矿企业，也出现了许多革命的“少数派”工人，积极支持首都南下的同学，支持本地的“少数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勇敢地起来造反。有许多工人还参加了一些院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的则在自己厂里组织了战斗队。这就是工人总部的雏型，也就是战斗队的早期活动。

十月中旬

林副统帅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讲话：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杂志发表了十三期社论，敲响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逐步和广大群众见面并日益深入人心。革命的“少数派”逐渐增多，发展壮大。各厂的“少数派”纷纷成立自己的战斗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并有重型机床厂，第二机床附件厂，武汉锅炉厂等厂的“少数派”工人走向社会，在社会上进行广泛的串连。并形成了工人总部筹备小组。

十月下旬

工人总部筹备小组开始活动。战斗队队伍迅速壮大，战斗队员希望赶快成立全市性的组织。阶级斗争的现实也需要工人总部迅速成立起来。

十月二十八日：由工人总部筹备小组单独主持召开批判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经过了多次反复的斗争。这是工人总部的第一次兴起。这次会议得到了广大红色造反者(钢二司、新湖大、新华工)的支持，开得非常成功。

十一月四日

由工人总部筹备小组、二司、新华工、新湖大、北航红旗、西军电等革命组织在武昌体育场联合召开了第一次“炮轰湖北省委、火烧王任重、猛攻张体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便是战斗队员。参加大会的有六万余人。后因省委百般刁难、两面三刀，又不给新华工配车，不给适当的地点、位置，使得新华工同学没办法开会，后来大会被保字号“大抓兵”破坏了。

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隆隆炮声中正式宣告成立了！

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开成立大会，各革命组织都给以全力支持。送贺信、喜报，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革命造反派为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感到欢欣鼓舞。我钢二司代表在总部成立大会上发了言。对工总的成立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

工人总部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了，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历史转移点。从此，工人总部更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成了武汉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

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日

由于省委出尔反尔，百般刁难，赵修拒不答复工人战斗队的正当要求，拒不承认工人总部是革命组织，当晚有的战斗队员到武昌车站要求上北京见中央首长，希望向中央首长诉说自己受迫害的情形。可是省委不准他们去北京，这时，战斗队员在该站展开了斗争。经过战斗队员一天的英勇斗争，终于在晚上九点钟左右上车了。战斗队员冒着大雨，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上北京了，到毛主席的身边去了。

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七日

十六日下午六点钟，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外地红色造反者进驻《湖北日报》编辑部所在地—红旗大楼。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喉舌《湖北日报》的反。在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煽动下，保字号“工人赤卫队”、“大专院校红卫兵”、“女红军”包围了红旗大楼，残酷围攻武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红色造反者，造成惨重的流血事件，血染红旗大楼。当时许多工人战斗队员前往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给予进驻红旗大楼的红色造反者极大的鼓励。

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京战斗队员参加了在首都举行的“全国各地革命职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大会安排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四百余名代表担任大会保卫工作，因为在大会筹备过程中，工人总部的代表对待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抓革命、促生产的看法，都比较正确，组织比较好，出身比较好，我们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大会由于受到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的破坏而流产了。后来工人总部的代表曾到中南海要求见中央首长；这就是后来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造谣说是“冲击中南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事实完全不是那样(详情见北航红旗战士姜允珍大字报)。战斗队员恰恰是由于无限热爱毛主席，要求见中央首长的心很迫切才去中南海的。铁的事实给了那些造谣生事的混蛋以一记响亮的耳光。

同日，工人总部所属武锅分部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保守组织红铁军捣乱，会议失败，战斗队员士气空前高涨。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下午四点，周总理打电话通知工人总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就在那最幸福的时刻，战斗队员们打着鲜红鲜红的旗帜，戴着鲜红鲜红的袖章，在西郊机场接受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检阅。工人战斗队员是多么地激动啊！他们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宣誓：毛主席啊！我们无限忠于您！我们誓死保卫您的光辉思想！誓师捍卫您的革命路线，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一月二十七日

在京战斗队员第一批返汉。他们从首都学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决心投入到武汉地区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

十二月二日

由于各工厂革命造反派力量的日益壮大，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镇压造反派，武汉黑市委一小撮操纵成立了保字号组织《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用来对抗革命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武汉锅炉厂职工联合会成立“武锅分会”，与革命造反派战斗队相对抗。联合会成员大

批去北京。不上班，不生产，刮起了经济主义的妖风。战斗队员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肩挑两副重担，同时向保字号组织“联合会”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高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旗帜，战斗队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

十二月三日至四日

阿尔巴尼亚朋友访问武汉，革命造反派战友前往隆重欢迎，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晚会，工人总部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发了言。

同时，在京战斗队员分两批回汉。在家的战友们敲锣打鼓，前往迎接。

十二月十一日

保字号“职工联合会”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工人总部战斗员对这大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十二月十四日

工人总部、二司封了保字号“大专兵”所搞的“湖北日报复刊斗争委员会”。给了保字号沉重地一击。

十二月十九日

工人总部所属前卫兵团造了保字号“联合会”的反，把“联合会”设在市总工会的总部砸了。广大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市委、市总工会也不得不作了检查。

武汉重型机床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次煽动保守组织中的工人离厂，当时全厂百分之八十五的机床停工。加工一车间离厂人数达三分之二，革命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其他革命造反组织的工人挑起了更艰巨的生产重担，又一次为“抓革命，促生产”做出了模范的一例。

十二月二十五日

“职工联合会”制造林焕运事件，策划了“12·25”反革命大游行，对革命造反派工人总部施加压力，制造白色恐怖，妄图一举搞垮工人总部，但工人总部岿然不动。各厂的工人战斗队担负起更艰巨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

同时，武汉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组织正在武汉体育馆举行联欢，庆祝毛主席七十三寿辰，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十二月二十六日

这一天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七十三寿辰光辉日子。这天武汉三镇的革命造反派个个无比激动，人人满怀深情，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冒着风雨，举行了全市性的大游行，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以此表达了我们革命造反派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表达了我们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十二月二十七日

由工人总部、二司、新湖大、新华工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二十多万人，在汉口中苏友好宫雪地上召开“湖北省武汉地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在会上，大家一致表达了革命造反派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赤胆忠心。会后，并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二十万红色造反者同声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倒王任重！”“打倒张体学！”“打倒湖北黑省委！”二十几万人的声音汇成了一股洪流，二十几万人的队伍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同日，由工人总部、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十九个组织联合组成“斗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共同商议斗争王任重的问题。

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十一日

“斗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有关事宜，并决定于元月一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举行第一次斗争王任重大会。

十二月二十九日

武重的保守派十二时关门停工，一点左右，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工人战斗兵团的九十余人挑起了走掉的二百余人的工作担子，给了那些用反革命经济主义来煽动工人罢工的混蛋又一记响亮的耳光。工人战斗队真正做到了听毛主席的话，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十二月三十日

由工总执行小组长李洪荣起草了一个通知，并召集了所属以下一百多个分部和兵团会议，讨论了工人总部的组织路和政治路线。进行了思想整风，会议开得很成功。

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由工人总部、二司、新湖大、新华工等革命造反派主持，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斗争湖北省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大会。大会在“打倒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怒吼声中开始，王任重被揪出来示众。会上武汉第二机床厂，武汉地区血泪控述团，清华井冈山等单位发了言，以铁的事实揭露了王任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及其镇压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最后大会宣读了《给全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向全国人民宣布：黑炮手王任重已被革命造反派揪出来斗争了。

元月二日

工人总部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彻底揭露批判王任重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表达了工人战斗队誓把王任重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决心。会后并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大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元月三日

“联合会”于三日下午开始了一系列的反革命行动，疯狂地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在火车站围攻阻挡了6次国际列车和16次客车的正常运行，使货车以38次、82次、301次、国际列车受到极大的影响，严重地影响国际声誉，更严重地破坏了援越物资的运送，犯下了滔天罪行。

革命造反派对于这种现行反革命行为非常气愤，忍无可忍，在这种情况下，武重工人战斗兵团等十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封闭了该厂“职工联合会”。

四日：由工人总部，钢二司主持召开斗争王任重大会。大会地点分新华路体育场，人民公园，武昌体育场。人数达五、六十万。

五日：保字号“联合会”在幕后指挥者的策划下，借《中南区李一清给张体学的一封信》压制他们“革命”为借口，达到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给党中央毛主席施加压力的罪恶目的。三日下午围攻火车站，四日破坏斗争王任重大会，并跑到省委去聚众闹事，五日事态继续发展，从五日上午开始戒严，禁止行人车辆通行，实行白色恐怖，凡是见到战斗队员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围攻、绑架、非法审讯和严刑拷打，制造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再一次犯下滔天罪行。

武重齿轮车件战斗队和其他造反派工人自动集中讨论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订立了十条公约，保证八小时工作，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统一战线，其他六个车间也相继成立了指挥部。

六日：大量“联合会”人员畏罪逃跑，流往北京、广州、信阳去半月之久，严重破坏生产。“战斗队”全部挑起“联合会”丢下的生产任务，日以继夜地突击生产任务。

元月十日，工人总部自己的刊物《工人战报》创刊了。这是工人总部长期以来艰苦斗争才得来的，是广大工人战斗队员的喉舌。

同日，新武重战斗团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体职工制止随意上京“告状”的歪风，制止

闹工资、福利，闹经济的歪风，呼呈“联合会”会员回厂生产，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元月十二日：工人总部、二司等武汉市的革命造反派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团体的贺电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武汉的革命造反派决心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学习，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打倒经济主义，戳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耍的花招。

同日：毛泽东思想武重工人战斗兵团服务员，联络员，老工人紧急会议发出公告，号召革命造反派工人认真学习最近中央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站稳立场，以身作则，决不上阶级敌人的当，号召受蒙蔽的同志赶快觉醒起来。这样很快把一股“福利”风，“劳保”风压了下去。

元月十四日：在《告上海市人民书》的影响下，为了配合当时斗争形势，工人总部起草了“告武汉人民书”，并邀请了十三个旗帜鲜明的革命造反组织进行了讨论，后来迅速增加到四十多个组织，通过了《告武汉人民书》。文中把夺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元月十五日：湖北日报新生。

元月十七日：斗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在新华路体育场第三次斗争了王任重。

元月十九日：“职工联合会”又一次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深夜，埋伏在红色造反大楼附近的“职工联合会”会员切断了电话线，封锁了交通要路，从向阳门到武昌桥头都布置了岗哨，用暗号和黑话联系，分兵三路包围了红楼，五、六百人气势汹汹地冲进了红楼，突然袭击工总、二司、红教工、红教联、红工兵等革命造反组织，绑架守卫红楼的红工兵，手持木棒，刀子等杀人凶器，砸烂了各司令部的办公大楼，把里面的广播器材，油印机等物资洗劫一空，还抢了宣传车、卡车、自行车等等。并绑架了工人总部等组织的工作人员十一人，打伤多人。与此同时，在汉阳也有坏人挑动，砸了汉阳分部，家具加工厂，红卫纱厂等四个革命造反组织，打伤工人，这伙混蛋又一次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元月二十日：下午，武汉三镇，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震撼长江两岸，几十万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派伍举行了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十九日“联合会”暴徒砸工总，二司等革命造反组织总部的法西斯暴行，并抓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联合会”中顽固分子戴高帽游街。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战风，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反扑。

晚上由工总、二司、工造、红工兵、红教工(大专、中学的)、新湖大、新华工、北航红旗、西军电等十几个组织的代表开会的讨大联合问题，会议统一了认识，进行大联合的筹备工作。

元月二十一日：工人总部发表了《最最紧急通知》，制止戴高帽游街的现象。

下午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议，继续二十日会议。增加了首都南下造反大队，九·一三、三司、红卫军等组织。决定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委会”，并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还成立了五个专案小组。

元月二十二日：讨论“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筹委会成立宣言草稿。

元月二十三日：晚上在新湖大1—2号室召开部分单位会议，研究省市委夺权问题。

元月二十四日：继续开会，商讨有关省市委夺权问题。但会议后来实际上变成了炮轰工总、二司的会议，当时工总代表很谦虚、谨慎地接受了大家的批评。

元月二十五日：上午继续二十四日的会议。但会议气氛不友好，二司与工造发生磨擦，原因是由于工造在汉口所搞的一个小联合所引起的。

下午会议研究了几个具体问题。主要是：(1)确定夺权名称为“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2)确定总司令部的常委为七名；(3)决定夺权时间为元月二十六日

下午三时；(4)分工：新湖大起草《夺权公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新华工起草《第一号通令》；(5)由二司、三司摸省委内部造反派的底；(6)研究夺权方式。

晚上常委单独开会，二司与工造又发生磨擦。

元月二十六日：上午会议。二司与工造矛盾比较多，工总代表为了顾全大局，曾经让步：要二司代表退出常委。

下午在洪山礼堂门口外召开革命造反派夺权大会。

元月二十七日：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红工兵，就“一·二六”夺权问题发表《联合声明》，鲜明表明了对“一·二六”夺权的看法。这个《联合声明》完全是革命的，无可厚非的。

元月二十八日：工总等八个单位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对“二七造反军”的紧急通令。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为了粉碎阶级敌人利用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的资本主义复辟，工总、九·一三等十二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出“紧急通告”，并组织二司战士连续几天维持市场秩序，对投机商进行处理，有力地粉碎了当时在市场上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经济主义歪风。

下午在炮校有40多个单位参加的会上，工人总部、二司等七个单位组成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汇报了工作。

二月三日：黑省委更加疯狂地掀起经济主义黑风，大批不明真相的“职工联合会”会员离开生产岗位，一连几天不上班，一些工厂或车间停工，拦国际列车，交通断绝，实际上举行了严重的罢工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总部在武昌体育场举行“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各个工厂战斗队在几天内都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小组。

同日，工总、九·一三、二司、北航红旗等十三个革命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出“紧急通告”。“通告”号召革命造反派工人“听毛主席的话，既做革命的闯将，又做生产的模范！”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通告”对粉碎武汉地区的反革命经济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二月三日的《人民日报》上突出地报道了工人总部“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肯定了工人总部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月二日—四日：

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工总、二司、九·一三兵团革命造反派组织，组织了三千多劳动大军和百余辆汽车，于二十四日战斗在“二七”车站，武昌车站、武昌港运码头和汉阳、桥口等堆货场，抢运了大批的粮食、蔬菜、肉食、水果等春节物资和部分工业原料，有力地打击了省市委内一小撮混蛋破坏交通，破坏生产，破坏人民生活的阴谋。

二月五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等十一个组织写了倡议书，号召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二月七日：工总、二司、红教工等组织发出《关于冻结四旧缴获物资的紧急通知》，目的是为保护革命小将扫四旧的伟大功勋，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

二月八日：工总、二司、九·一三、北航红旗、哈军工、西军电等等十二个组织针对当时围攻工人总部等革命组织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局势的声明”，声明中所提出的反托派，是不符合《红旗》杂志三期社论精神的。

八日晚上，在水电学院斗争王任重，由二司主持，工总战斗队员参加。

二月九日：上午工总、二司等七个组织在武汉体育馆召开了揭发批判王任重、张体学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并把王张揪出来示众。

工总、二司、哈军工等十二个组织发出“关于迅速掀起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斗争高潮的

通告”，通告号召革命师生与革命工人贫下中农相结合，再次号召贯彻“抓革命，促生产”，“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

同日，工总等二十五个单位夺了旧省市委所把持的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并成立了毛主席著作湖北、武汉革命造反派出版印刷发行总司令部，并发表了夺权公告。

二月十三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等革命组织数万人在人民公园前集会，愤怒声讨苏修的滔天罪行。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二月十七日：由工人总部等主持在武昌体育场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下黑省委的要人李守宪。工总发出紧急命令：“……如果看到部队散发有对《长江日报》‘二·八’声明的不同观点的传单后，决不允许你们围攻、冲击军事机关、宣传车和军事人员。……”

二月十九日：工总、二司向所属战斗队员、红卫队再次在《长江日报》发表紧急通知：“如看到武汉部队就《长江日报》‘二·八’声明所发表的严正声明和其它有关材料后，决不准冲击、围攻军事机关、宣传车和军事人员，不许擅自到军事机关内贴标语、进行辩论。”

二月二十日：新武重工人战斗兵团发出通令，其中说：“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冲突。”

二月二十二日：工总、二司、九·一三、北航红旗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的生死决战》，这是“二·八”问题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篇文章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存在的阶级矛盾，比较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月二十六日：工总、九·一三、红教工、二司等组织举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和毛主席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几十万红色造反者从心里高呼：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我们想念毛主席！”“向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学习！”

二月二十八日：二司战士到工厂去与工人战斗队员交换关于“二·八”声明的新看法，逐渐认识到反托派是错误的。

更加艰苦复杂的战斗还在后头，工人战斗队员继续英勇地奋斗着。奋起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又一次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杀了出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陈再道之流镇压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钢二司)编

陈再道之流是残酷镇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在军队还未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前，陈再道之流就曾和王任重暗中勾结，干了许多镇压革命的罪恶勾当。

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之后，陈再道之流，这批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的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便盗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打着“支左”旗号，以公开“合法”的面貌出现，顽固地执行带枪的刘邓路线，用极其阴险极其毒辣的手段，残酷地血腥镇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发动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事件。

以下是我们简要记载的陈再道之流自今年一月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半年来镇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大事件。

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发表。武汉军区成立“支左”指挥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任办公室主任，信俊杰、李良等为副主任。

元月二十六日：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下，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权，这是革命的尝试，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实

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加之造反派内部的意见分歧，元月二十六日夺权没有成功。陈再道之流为了把“工人总部”、“二司”等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后来竟将元月二十六日夺权打成“假夺权”，“反革命夺权”。

陈再道之流在元月二十六日夺权中既不表态也未参加夺权。只有武汉部队某空军大队支持并参加了以“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为首的夺市委、市人委的权。

元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陈再道之流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歪曲八条，利用八条来镇压革命造反派。

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与市武装部的秘密策划下，保守组织“红武兵”正式成立。

元月底二月初：陈再道之流采取拉一帮打一帮的恶劣手法，操纵一些组织对“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大举围攻，提出“砸烂工人总部”，“架起一百二十门大炮猛轰九·一三”，“二司头头修了”等口号。

二月五日：“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革命造反组织召集形势讨论会，会上武字151部队张××说：目前造反派面临四大敌人：(1)黑省委。(2)武汉军区内一小撮。(3)保皇派。(4)机会主义(托派)。他还表示赞成与会者对形势的分析。会议决定发表关于形势的声明，进行反击。但《二八声明》发表后，张××表示反对，以后就一直下落不明。

二月八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等十二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简称《二八声明》)，轰动了武汉三镇。陈再道之流暂时按兵不动。

二月九日：在陈再道之流的纵恿下，武汉三司等组织无理砸毁武汉展览馆内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

二月十一日：陈再道之流操纵8201部队大量散发传单，污蔑二司“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并勒令二司驻武展负责人多次写检讨，以此打击二司。“三司”驻军区联络站放出空气说“武汉军区内即将对《二八声明》表态”，认为《二八声明》是“大毒草”。并抄出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初稿，以此大肆攻击二司等革命造反组织。

二月十三日：军区保卫部赶走驻军区大院的北航红旗战士。军区宣布复恢党委制，原班人马上台，停止军区文化大革命。

下午宣布王任重已由部队保护在军区总医院休养，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二司得知陈再道之流即将对《二八声明》表态的消息后，勤务组负责人杨道远同志对军区联络员表示：军区有权发表声明，但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军区负责。与此同时，二司司令部向二司全体战士发出了“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命令。

二月十七日：徐向前去武汉参与了武汉部队《二·一八声明》的炮制。徐向前当着陈再道的面对张广才(湖北军区副司令员)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

二月十八日：陈再道之流盗用武汉部队名义发表《严正声明》，它利用《二八声明》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用无限上纲的手法，把工人总部和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发表的《二八声明》污蔑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失败，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勾结，玩弄各种阴谋诡计，进行的新反扑”。还说《二八声明》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疯狂反扑”，要“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从《严正声明》发表后，武汉军区大小军事、军管单位全部设置第一道、第二道警戒线，谁要是不小心越过警界线，谁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就要被抓起来。孔庆德在沙市讲过：“牛鬼蛇神出笼了，就不能叫他们进去，他们冲击军区，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有一百用机枪扫。”

《二·一八严正声明》出笼后，武汉三镇立即刮起了二月黑风。

二月十九日：武汉××部队举行大规模武装游行示威，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包括直升

飞机)宣传大毒草《二·一八严正声明》。

徐向前离汉，陈再道之流立即开始了对军内外革命造反派的血腥镇压。

二月二十日：陈再道之流用武汉部队名义发表《公告》。

《公告》再一次把二司，工人总部等革命造反派污蔑为“把斗争锋芒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的反革命逆流。”并扬言对这些人要“逮捕法办”。

同天上午，武汉部队传达内部指示：“不许在公开场合下发表与武汉部队正式文件不同的意见，否则将受纪律的处分。”

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左右，由军区副政委叶明亲自率领二十个连，全副武装，突然包围了高级步校，并用飞机散发武汉军区文件，宣布解散高级步校革命造反组织“红旗”、“红色造反团”，公布了这些组织的所谓“罪行”，逮捕了十六人。

从二月二十一日起，陈再道之流便分期分批地对武汉几所军事院校和文艺团体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一片白色恐怖。

二月二十五日：“工人总部”、“二司”等革命造反派为了反抗陈再道之流的高压政策，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的决心，举行了几十万人的游行。口号是“我们想念毛主席！”，“坐牢算得了什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但是我们的革命行动却被陈再道之流打成了“反革命游行”，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并在我们的游行队伍中散发《粉碎反革命逆流》的传单。

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湖北军区“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在汉口召开，军区和地方干部三百多人出席了会议，省委中姜一、大叛徒张旺午也参加了。

三月一日，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韩东山在会上讲了话。陈再道说：“我们省委也解放了一批干部”。(按：他的所谓“解放”，就是叫大叛徒也当“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孔庆德则更露骨地说：“现在有人打倒陈再道，这是反革命的。”韩东山也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凶相说：“‘二·八’声明和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发表以后，阶级斗争明显化了，谁是真革命，谁是反革命也来了一个大暴露，一切牛鬼蛇神都暴露出来了。”

这次会议完全是陈再道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黑会。

三月二日：××部队接管电讯局，宣布工人总部电讯分部的所谓“罪状”，并逮捕了电讯分部工人战斗员十多人。

三月三日：陈再道之流盗用武汉部队名义发表《致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进一步污蔑革命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信中还胡说什么对我们几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把革命造反派视为仇敌，把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开信还打着要把头头和群众区别开来的幌子，企图把二司、工人总部广大战士从这些革命造反组织中分化瓦解出来。

三月四日：《湖北日报》(当时由造反派所掌握)发表《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社论。《湖北日报》三月四日社论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击中了陈再道之流和保皇小丑企图借批判《二·八声明》之名，对“二司”等革命造反组织进行反攻倒算的要害。因此三月四日的社论立即被陈再道之流打成“大毒草”。并扬言“要彻底肃清《二·八声明》在新华工和新湖大的流毒”，“如果《湖北日报》编辑部不公开检查，就实行专政措施。”

三月五日：“支左”指挥部对“大专院校红卫兵”(大专兵)发表五点看法。胡说什么大专院校红卫兵“在历史上有伟大功勋”“二司是群众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可以恢复活动和总部。”有的甚至为华中工学院有名的铁杆保皇“乌兰牧骑”吹捧，公然复活保守组织，为刘邓路线翻案。

直到三月十一日，在革命造反派的压力下，武汉“支左”曾经在表面上收回这五点意见。但仍然坚持“大专兵”可以恢复基层组织，继续支持保守派。

在“支左”的扶植下，保守组织纷纷死灰复燃，“大专兵”、“三字兵”全部恢复，“大专兵”和“职工联合会”变种如“红武兵”“一月革命”也纷纷成立，大大发展。

三月七日：陈再道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讲：“为了实现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二·八’声明的幕后指挥和策划者揪出来，”甚至说：“批判‘二·八声明’就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三月九日：陈再道之流盗用湖北军区名义接管井冈山大楼(原工人总部占用)，还搞什么“井冈山大楼展览”，动员大批群众前去参观，不惜一切手段，造谣中伤“工人总部”“二司”等革命组织。一“支左”人员甚至讲“井冈山大楼破坏得一蹋糊涂，工人总部连国民党都不如。”

陈再道之流盗用武汉军区名义发表《宣传提纲》，其中指出“批倒批臭‘二·八声明’之时，就是实现大联合之日。”这个提纲是陈再道之流把三月黑风刮向一个新阶段的具体行动纲领。

三月十日：新湖大“红八月”战士举行游行。欢呼《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发表。并高呼：“我们坚决和二司广大战士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结果被军区“支左”打成“反革命游行”，并要新湖大就此事作出检查。

在军区“支左”多次勒令下，我革命造反派被迫撤离《湖北日报》社—红旗大楼，报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雷行重新上台。

三月十二日：孔庆德在河南信阳空军学校宣布取缔所谓反革命组织“红色造反团”大会上，大肆攻击武汉造反派。他说：“汉口高级步校是反革命的大本营，他们勾结二司、工总抓军队，想把军队搞垮。”

三月十三日：三月十三日前后陈再道之流分别向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派出军训团。公然歪曲毛主席关于军训的指示，借军训之名，行支“保”压左之实，企图分而瓦解二司，新华工和新湖大，极力扶植保守组织。

同时还向新一中等中学派出工作组，整理造反派黑材料，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

三月十五日：“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干部大会”召开。这是一个典型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黑会。会上陈再道胡说什么“当前……右派组织正在土崩瓦解……”这实际上是把工人总部和二司等十几个革命组织打成了“右派组织”。钟汉华(武汉军区第二政委)也大叫：“张体学是否是三反分子未定。”韩东山更是赤膊上阵：“他们(指造反派)是土匪，不是什么左派。牛鬼蛇神出笼了，我们要赶快捉拿……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从此象张旺午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上台了，“香花派”(即发表《二八声明》的十二个革命组织的群众和同意《二八声明》观点的其他群众)统统靠边站。大逮捕开始了，三月黑风刮得更猛了。

三月十×日：陈再道对“红武兵”头头讲：“对工人总部，我们在写文章作报告时都要注意，不明显提反革命组织，但群众可以说。有了舆论之后，我们再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把二司打成比工人总部还要坏的组织。”

他又说：“在工人总部战斗队员中只提一小撮，实际上我们不要这样，而应该让他们统统靠边站。”

在“香花派靠边站”的反动口号下，几十万革命造反派战士被剥夺了基本政治权利，实际上处于被专政的地位。

三月十七日：大逮捕开始，仅在三月十七日晚就逮捕了几百名革命造反派同志(据公安联司田××揭发)。

武大军训团召开大会播送了三月十五日陈再道在“市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录音，军区特派要人在会上宣布：“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和‘香花派’(指二司)的大小头头滚出会场。”

陈再道在高级步校大放厥词说：“什么火烧、炮轰、打倒呀，我们这些人打倒了那还了

得呀？！”

三月十九日：北京揪出谭震林的消息传到武汉，武汉革命造反派开展了“揪出武汉谭震林”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革命斗争。陈再道心中有鬼，怕得要死，把我们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革命行动污蔑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反革命逆流”。

武大军训团宣布二司武大总部要“停止一切活动。”

三月二十日：孔庆德在荆州市狂叫什么“凡给干部戴高帽子的都是反革命行动。”“都是搞反革命复辟”。大肆攻击革命造反派，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三月二十一日：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舆论准备完成后，陈再道之流反革命复辟宣言书《三·二一通告》出笼了。《通告》悍然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全部基层组织。这是陈再道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特别是工总和二司，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黑色信号弹。《三·二一通告》出笼后，陈再道的一手策划下，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省有三百多个革命造反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六千多革命同志被无辜逮捕。就这样，武汉地区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被镇压了下去，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和湖北全省！

三月二十二日：三月二十一日《通告》一出笼，立即在武汉刮起了一股为刘邓路线翻案的黑风。三月二十二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铁杆老保邓子政写出反动大字报。胡说什么：“刘少奇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说“我从内心里拥护刘少奇。”公然为刘邓翻案。与此同时，好些高等院校如华工、华师、湖大的铁杆老保也写出类似的反动大字报。对此，我钢二司等革命组织的战士非常气愤，纷纷前往水利电力学院游行，声讨邓子政为刘邓翻案的罪行。但我们的革命行动却被陈再道之流污蔑为“转移批判《二八声明》大方向”的“反革命逆流”，甚至对参加游行的二司战士威胁说：“后果自负”。

陈再道之流盗用武汉部队的名义宣布接管公、检、法单位。三司按照陈再道之流的指示举行游行，“欢呼”这一“英明”决定，并开始大造“二司是反革命组织”的舆论。三司游行队伍高喊：“二司是反革命组织”，“砸烂黑二司”，“揪出《二八声明》的炮制者。”这些口号是经武大军训团批准的。

军区“支左”汪××对钢院“八一兵团”传达陈再道对二司的三点看法：(1)二司过去做了一些事情，但后来大方向错了，特别是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反革命逆流，事物是发展的，矛盾是转化的，希望他朝好的方面发展。(2)二司犯了严重错误，与工人总部相勾结，作了许多坏事，要把反革命分子揪出来。(3)二司头头对二司所犯错误要彻底交代，揭发批判，并作出公开的深刻检查，要把反动思想分子揭发出来，办坏事要公开讲，公布于众，表示自己的革命行动。

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在汉口高级步校讲：“二司的性质定了，二司是反革命性质。”

三月二×日：军区“支左”主任孔庆德在炮兵学校猖狂地叫喊：“这次运动就是要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出来登台表演，你们现在表演够了，让我们来表演了，你们如果不老老实实就杀你们的头肥田，这是无产阶级专政。”

三月二十四日：随着《三·二一通告》的出笼，陈再道更大规模地镇压学生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军区“支左”要人四出活动，到处放毒。并且从三月二十四日起向各工厂矿企业派出大量的“军代表”，打着“支工”、“支农”、“军管”的旗号，疯狂地镇压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武汉工人运动。

三月二十五日：渡口“支左”经验传至武汉，陈再道之流心中有鬼，既不组织学习，更不进行宣传。

武汉军区把登有批判刘少奇文章的四十五期《新北大》校刊全部销毁。对此，《新北大》校刊驻汉办事处向军区提出强烈抗议。

三月二十六日：武汉军区副司令韩东山在黄石市群众大会上恶毒攻击革命造反派说：“造反，造个卵子，连土匪都不如……”又说“管你工总几十万，我一个通令就叫你完蛋。”

结果，韩东山一声令下，黄石三十多个造反组织全部解散，三个最大的革命组织，如“革命职工红色造反联络总部”、“学生一司”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三万多人）。

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与新华工、新湖大、三司座谈时说：

(1)工人总部号称几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总，九个头头，七个是严重不纯分子，干了很多坏事。

(2)不依靠你们依靠谁呢？什么事不是和你们商量了吗？……我们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企图拉一批，打一批）。

(3)工总干了许多坏事，二司也干了，工总没有干的，二司也干了。

武汉军区李政委指示说：“批不批《二八声明》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

三月二十九日：王效禹同志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发表。当天空军“支左”张××在华师作形势报告说：“如果武汉有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那就是《二八声明》。”并污蔑“工总二司是最大的保皇派。”

四月一日：正当工人总部和二司等革命造反派战士在黑风恶浪中与陈再道之流进行艰苦搏斗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发出了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总攻击的动员令。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重要文章发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武汉革命造反派无不欢欣鼓舞，从此开展了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的强大反击。

在陈再道之流的精心策划下，《湖北日报》四月一日社论出笼，四月一日社论离开两条路线斗争，空谈三结合、大联合，实际是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新上台，要革命造反派与保守派合二而一，甚至让保守派吞掉，为资本主义复辟再次制造舆论。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武汉革命造反派最及时最有力的支持，广大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奔走相告，进行热情宣传。但陈再道之流对此怕的要死，恨得要命，指使“支左”人员对“三字兵”说：“这篇社论是对你们说的（指三字兵），二司已不是革命小将的问题。”

下午，大批解放军战士参加三司的游行，（欢呼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社论发表），而不跟二司、新湖大一起游行，充分暴露了陈再道之流支保压左的反动面目。

四月三日：由于“三司”头头紧跟陈再道，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三司”中的真正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造了其头头的反，成立了“三司革联”，但陈再道之流对其恨得要死，千方百计对其进行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拒不承认“三司革联”。

红司（新华工）提出“还我湖北日报”（即重新夺回造反派手中），军区“支左”说：“这是反动口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四月四日：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举行声讨刘邓大会，事先与“支左”达成协议：“三字兵”不能打旗号、带袖章参加大会，但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但军区“支左”的支“保”本性难移，撕毁协议，私自打电话给“三字兵”打旗号和戴着袖章来参加声讨大会，致使声讨会遭到破坏。

四月六日：军委十条命令下达，进一步解放了广大工人战斗队员和二司战士，给陈再道之流当头一棒。但军区“支左”一不宣传，二不执行，拒不释放被非法逮捕的革命造反派，顽固地推行刘邓路线。革命小将忍无可忍，提出了“打倒陈再道”的革命口号。

四月九日：陈再道之流将派往新华工、新武大、新湖大的军训团突然撤走。

四月十日：新一中革司战士勒令派往该校的“支左”小组撤离新一中，并勒令其交出整革命造反派的黑材料。

四月十一日：新一中革司战士向市“抓办”提出四项正义要求，遭到无理拒绝，被迫进行了静坐绝食斗争。钢二司等革命组织成立“专揪武汉谭震林战斗队”。晚上，新华工“要见孔庆德战斗队”到洪山礼堂要求孔庆德回答几个问题。钢二司、新湖大等革命造反派纷纷

前往支持，直到次日凌晨，孔才被迫接见，传达了陈再道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中心内容是：“三新二司是左派组织，我们依靠你们是不会动摇的。”这是陈再道之流为了暂时缓和他们同革命造反派的矛盾而耍的一次新花招。

四月十五日：孔庆德被迫去市人委虚伪宣布接受新一中小将四项要求，事后“支左”根本没有执行。

四月十六日：钢二司、三新、新一中革司等革命造反派在洪山礼堂召开批判孔庆德大会，孔中途退出，拒绝接受批判。

四月十八日：钢二司二届红代会召开，主题是“彻底为工总翻案”。

军区“支左”在会上发言，一方面拉拢钢二司，假惺惺地表示：“我们支持你们。”但另一方面又闭口不谈工人总部问题。

孟夫唐(湖北省副省长)写信给武汉军区并陈再道，指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错误。

四月十九日：北京传来消息，四月十六日江青同志指出武汉等地“还可以冲一冲”。陈再道伯得要死，竟不惜一切手段盗用中央名义从北京打来所谓“电话指示”，来电内容是：(1)江青同志说：“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江青同志向陈司令员赔礼道歉说：“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2)工总不能翻案。(3)江青同志说：中等学校红卫兵(三字兵)不能解散。(4)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四月二十一日：军区侯副政委找新华工赴京战士谈判，要尽两面三刀，假惺惺地承认“支左”有错误，但又坚持认为“支左”大方向没错。一方面被迫承认钢二司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但又坚持解散工人总部。并且不承认军区“支左”站在“三字兵”一边。

四月二十二日：钢二司、新华工就释放工人总部汉阳轧钢厂分部负责人夏邦银的问题与公安局军代表谈判。军代表无视军委十条命令，抛出夏邦银的所谓“十条罪状”，拒不释放。(直至五月中旬，迫于压力，才偷偷释放夏邦银，仍不公开平反。到六月份，军区×××还扬言“夏邦银以后还是要抓起来的。”)

四月二十三日：广大战斗队员冲破重重阻力，成立工人总部全市联络站，重新举起战旗。“支左”拒不承认。

四月中旬，钢二司、三新战士又重新杀向社会，遭到陈再道之流极力反对，被污蔑为“反革命逆流”。

四月二十四日：从四月下旬起，陈再道之流便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动“红武兵”和农民集训，专门参加武斗。

湖北军区“支农”负责人节××亲自到汉桥区找武装部负责人于××，策划组织农民进城武斗。

四月二十五日：陈再道之流，指使武汉部队两万人举行全副武装游行，行程四十里，历时五小时。游行队伍遇见“三字兵”等就高喊：“向革命小将学习。”看见钢二司、三新战士就高喊：“镇压反革命”、“彻底粉碎反动革命逆流”等口号，这是陈再道向中央文革和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的严重政治事件。

四月二十七日：钢二司战士在京与陈再道辩论，要求陈再道交出“二·八声明”的所谓“幕后策划者。”陈说：“我们正在调查嘛！大家都在调查嘛！现在材料还不充分。”

四月二十八日：军区单方撕毁协议将王任重先交给三司“斗争”，而不交给新湖大斗争，以此抬高三司。钢二司、新湖大被迫采取革命行动，从三司斗争会上将王任重揪到新湖大来斗争。事后，军区“支左”大肆造谣，说钢二司、新湖大“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一百七十多人”，极力制造解放军战士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在陈再道的指使下，武汉“特动”分子给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干部(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任爱生写恐吓信，对任爱生进行威胁和利诱。五天以后，陈再道之流指使军代表李×对任爱生说：“你若改变观点，可以到××参加‘抓办’”。利诱不成，又威胁说：“你不改变观点，后果就很严重。”当晚任爱生就被“三字

兵”抄家，并绑架和毒打，最后，任爱生被迫跳楼，身受重伤。

四月二十九日：武汉棉织厂“红武兵”无理围攻毒打在该厂门前贴大字报的钢二司、新华工战士十余人，轰动全市，揭开了反革命武斗的序幕。

汉口汉硚区一千多农民在陈再道之流控制的武装部的直接组织下，借声讨刘邓为名，全力冲击革命造反派设置的“夏邦银事件火线指挥部”。高呼“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由区武装部×参谋亲自指挥，红光公社党委书记×××带头。这是陈再道之流第一次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事件。

四月三十日：谭震林到机场参加迎接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的消息传来后，“支左”乘机大肆宣传，向坚持要揪武汉谭震林的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四月下旬，徐向前免去全军文革小组长的消息传到武汉，军区“支左”派出大量宣传车排队上街“辟谣”。仅武汉大学一个学校就开去宣传车十多辆，武昌解放路一次出动宣传车八辆。

五月四日：在陈再道之流的策划下，汉阳农民打着“汉阳贫下中农代表向新华工递交抗议书代表团”的标语，到新华工递交所谓《抗议书》。

五月十日：公安江汉分局一百多名警察殴打公安学校红司战士，军管会置之不理，红司战士被迫宣布绝食而发生“新分校绝食事件”。绝食从十三日起历时六天，参加人数近万人。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军区企图派副司令员杨秀山应付了事，未遂。钟汉华被迫硬着头皮亲自出马谈判，十九日达成七点协议。但第二天便矢口否认了这七条协议；更可恨的是陈再道之流竟利用新公校事件，污蔑革命造反派“殴打和绑架钟汉华”，挑动解放军战士、工人、农民对革命造派的不满。

五月十四日：陈再道在军区作“三支两军”工作总结报告，陈再道在报告中对自己的罪行避重就轻，甚至把扶植保守派的罪责强加在革命造反派头上。

五月十五日：由河南寄给湖北军区转交“首都赴汉专揪叛徒联合战斗兵团”有关大叛徒张旺午(湖北省副省长)的材料。陈再道之流竟私自拆开交给“三字兵”公布于世，以此抬高“三字兵”的身价。汉硚区九千农民在陈再道之流的挑动下，手持木棒进城游行，高喊“打倒大学生”，“刘少奇是新华工的后台”等口号。

五月十六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武汉革命造反派经过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进一步武装了思想，对党内和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了深入的揭发和批判。

由陈再道之流一手策划的反革命小联合“百万雄师联络站”成立。其中有“红武兵”、“革命造反大军”、“红城公社”、“三字兵”、“红旗联委”等组织，下层组织二百多个单位几十万人。其头头是辛甫(市委组织部长、现市“抓办”副主任)、王克文(市委书记处书记)、夏菊花(王任重的“红花”)。“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成了陈再道之流屠杀革命造反派的黑打手，它的成立是陈再道之流实行六月大屠杀的组织准备。

五月二十一日：陈再道之流以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名义发表大毒草《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这株大毒草污蔑革命造反派要揪武汉的谭震林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并且颠倒黑白，把武斗的罪名强加在革命造反派头上。公开咒骂亮相干部孟夫唐，说孟夫唐“赤膊上阵了”。对亮相干部进行无情打击。

在陈再道之流的策划下，省司、省人司(“支左”认为是左派组织)出面召开了农林水系统和工交系统的厅局长“亮相”会议。同时，驻省委军代表曾三次找史子荣等三个省委宣传部长谈话。五月二十四日，湖北军区政委周××说：“领导干部要他们表明态度”。于是到六月十一日为止就有三百四十六名省级干部“集体亮相”。

“总字 127 部队”发出了“周总理四点指示”的造谣传单。说什么“周总理指示说：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孟夫唐、张华操纵了反革命逆流……”。

五月二十三日：“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成立，她是从“三字兵”

中造反出来的，坚决主张为工人总部翻案。但军区“支左”拒不承认该组织，并对其进行经济封锁。

五月二十六日：中午，陈再道之流指使××部队战士近二百人，突然封锁湖北大学的几个校门，新湖大派代表交涉，军方置之不理。这是陈再道之流动员解放军战士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信号。

五月二十七日：凌晨二时，第二十中学学生钢二司战士张昌森被“特动”分子打死，革命群众当场抓住凶手，并将凶手交电讯局军代表处理。可是军代表竟将凶器交还凶手，并将凶手放走。

六月一日：武昌街道口发生车祸。这本来是一个交通事故，但陈再道之流却利用这个交通事故，不择手段，大肆造谣。胡说什么“这是工人总部、二司中的一小撮混蛋策划已久的迫害解放军的政治事件”。并且以公、检、法的名义宣判这个司机的“罪名”，把罪名强加在工人总部等革命造反组织的头上。

联系下面情况，更可说明问题：五月×日，陆军第×医院将武斗中被打死的群众尸体穿上解放军军装，组织农民参观，说：“这是被二司、工人总部打死的解放军”。武汉军区“支左”××曾胡说什么“武汉是和平解放的，所以牛鬼蛇神也特别多。”为“百万雄师”屠杀革命造反派提供“理论”根据。

六月四日：陈再道之流挑起大规模的反革命武斗的信号弹——“六·四”通告出笼。通告重申“解散工人总部是正确的”，“工人总部不能恢复”，通告把革命造反派痛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污蔑为“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把革命造反派揪陈再道的革命行动说成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在这颗黑色信号弹的后面，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就在这一天，“百万雄师”第一次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铁矛，出现在街头，砸毁了我革命造反派在市委大楼的联络站。

六月五日：“百万雄师”在市公安局面前，武昌司门口、青山国棉二厂、汉阳轧钢厂制造了围攻革命造反派的流血事件。

六月六日：中央“六·六”通令发表，陈再道之流不但不执行，相反却利用“六·六”通令，颠倒黑白，把发生武斗的罪责转嫁到革命造反派头上，操纵“百万雄师”，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

“六·六”汉阳大血案：汉阳五百多“红武兵”血洗并强占了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在汉阳的中心联络站。事件发生前，8201部队宣传车在我联络站附件叫喊：“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拳头对付流氓阿飞。”

六月七日：在汉阳龟山下，“百万雄师”打伤前往武昌参加劳动的解放军659部队战士六十四人。事后“百万雄师”去×军司令部认错，×军司令部××对“百万雄师”说：“自己人打错了就算了”。

在陈再道之流的策划下，以辛甫(市委组织部长)为首的第一批市级干部“集体亮相”。

中国人民解放军斗罗赴汉调查组在洪山宾馆(军管单位)前宣传中央“六·六”通令，高呼“六·四公告大毒草”。“支左”指挥部突然冲出几十人，大骂他们是“冒牌货”，挑动在场的“百万雄师”殴打调查组的解放军战士，并无理拘留调查组解放军战士十三人。

六月八日：在陈再道之流的幕后指挥下，早已垮台的“三字兵”成立“武汉地区司令部”，会后，武汉部队×部队几千名战士带着“三字兵”袖章和“三字兵”一起游行，公开支持保守组织。

毛泽东思想“八·一七”司令部被血洗。事件中，8201部队护桥炮艇×排长，公安局×科长亲自指挥。

下午，携带凶器游行的“红武兵”和“三字兵”，袭击下乡支援夏收回来的新湖大同学，而随同“三字兵”游行的解放军战士不但不制止，反而替“三字兵”运石头。原在湖北大学

搞军训的×营教导员和×连长，竟在旁唆使暴徒专打新湖大勤务员，结果新湖大柴玉本等三位同志被非法绑走。

六月九日：红峰中学“三字兵”，伙同“百万雄师”包围了革命造反派在汉阳的红色据点—红峰中学，当“百万雄师”强攻大楼时，“支左”开来九辆宣传车，车上的人眼看革命小将被围而袖手旁观。“百万雄师”“三字兵”给“支左”的宣传车送标语，车上的人则高喊：“向革命左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

武汉部队的所谓制止武斗的“六·九”通知出笼。

六月十一日：晚，军区“支左”办公室信部长找钢二司负责同志座谈有关制止武斗问题，信部长无视“百万雄师”血腥屠杀革命造反派的事实，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把武斗的罪责强加在革命造反派身上，要革命造反派放下武器。

六月十三日：“百万雄师”二千余人(其中有十五车是从东西湖调来的农民)，攻打武汉汽车配件厂，在武斗激烈进行时，只有二十米远的军管单位的驻军，不到一站车路的桥口驻军，却置若罔闻，不加理采。

流血事件开始时，军代表组长拒不报告上级。

最后，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被迫派人前来“制止”武斗，但又借口“百万雄师不让我们进去”，而呆在远处空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六月十日：原副省长夏世厚等人第六批干部“集体亮相”。六月十日前夕，陈再道之流一手策划的“保”代会(工代会、农代会)召开了。

晚，陈再道之流唆使三千多农民袭击钢二司华师总部。

六月十三日：陈再道之流盗用武汉部队名义，假惺惺地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书》，呼吁书避开武斗的性质、武斗的幕后指挥这个根本问题，空谈什么“制止武斗”，结果，武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激烈了。

晚，钢二司华农总部战士护送武汉重机床厂战友回去，路上，被预先埋伏好的“百万雄师”和农民包围，打死钢二司华农总部战士王体圣，重伤多人。事后，新华农医生打电话要武汉8201部队派车护送伤员，竟横遭拒绝。

同一天，湖北军区政治处政委黄××对××说“联合会，三字兵，百万雄师是好组织。”“劳改犯放出来怕什么，放出来打敌人，让他们立功赎罪。”

六月十四日：陈再道、钟汉华与红司(新华工)负责人聂年生谈判，钟汉华恶毒污蔑革命造反派“要夺军权”。

六月十五日：陈再道一手扶植起来的“省委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首届代表大会。武汉部队，湖北军区、百万雄师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还用武汉部队名义送了贺信。

六月十七日：“六·一七”汉口六渡桥大屠杀。这一天，“百万雄师”对我革命造反派驻汉口联络站“人民文化园”和“中南旅社”大举进攻。革命造反派接二连三打电话给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要求派部队来制止武斗，竟遭拒绝。但却派人亲临现场用话报机指挥“百万雄师”向我革命造反派进攻。在“九·一三”派出战士来抢救自己的战友时，陈再道之流则指派军车(戊4—19—14等)拦截路口，在放进一辆“九·一三”汽车进入“百万雄师”的包围圈之后，即将其他“九·一三”车辆全部堵在外面，致使一辆“九·一三”汽车孤军深入，一车“九·一三”战士大多数被活活戳死。

在这次反革命大屠杀中间，“百万雄师”的饮食全由军车运送。

六月十九日：下午，住在新华师避难的钢二司红旗二中战士，在图书馆三司住过的房间里，偶然发现钢二司证件。因此与三司发生纠纷。三司华师总部即打电话向“支左”告状求援，“支左”立刻派出十二辆汽车，满载解放军战士，将图书馆包围，捉拿红旗二中的所谓“杀人凶手”。三司的人员点一个他们抓一个，二司小将高喊“打倒陈再道”！解放军战士便高呼“捉拿牛鬼蛇神！”

六月二十三日一二四日：“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大血案。六月二十三日，四千名“百万雄师”攻打“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据无线电厂一“百万雄师”揭露：该厂两位军代表曾召集攻打“工造总司”的“百万雄师”头头开会，后有两名军管模样的人参加，商量如何攻打“工造总司”的问题。

当“百万雄师”疯狂屠杀革命造反派战士时，“工造总司”负责人多次给军区打电话，要求部队前来制止武斗，但得到的回答是：“吴焱金(工造负责人)，你小心些！”致使工造总司牺牲四十多人。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大血案：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百万雄师”集中了二万余人，分水陆两路，对新水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围攻、烧、杀和抢劫，打死造反派工人一人，重伤三十多人。

在这次大血案中，军区“支左”曾派三辆汽车装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并带有两挺机枪为“百万雄师”攻打新水运压阵，还有巡逻艇在长江巡逻。“百万雄师”血洗新水运时，军区曾打电话询问，被钢二司新水运的战士接了。

在“百万雄师”血洗新水运时，一“支左”人员公然在群众中高喊：“我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革命行动！”

攻下新水运的当天下午，东风纱厂军代表孙×对“百万雄师”发表广播讲话：“你们攻击水运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汉阳轧钢厂大血案：六月二十三日下午，汉轧的保守组织“二·一八造反军”带领八百多名“百万雄师”包围了汉阳轧钢厂，结果三十多名革命造反派战士全部牺牲，其中有钢二司新武大战士古立盛等两位同学。

在“百万雄师”血洗汉轧的前两天，该厂军代表突然不见，而在事件发生那天，有人亲眼看见这位军代表坐在“百万雄师”的汽车驾驶室里。

血洗汉轧的“百万雄师”总指挥是汉阳的武装部长。

六月二十六日：在陈再道之流的策划下，“百万雄师”包围新湖大。

中央六·二六电话通知下达。电话通知责成武汉军区严惩“百万雄师”的杀人凶手。它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给陈再道之流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当头一棒。

陈再道之流用武汉部队名义，给“百万雄师”发出一封信，一方面假惺惺地装作执行中央六·二六指示，实际上则阳奉阴违，对“百万雄师”中的杀人凶手不仅不按《六·六通令》处理，而且继续怂恿“百万雄师”屠杀革命造反派。就在中央“六·二六”指示下达的当天，“百万雄师”便包围了“长办联司”。

六月十七日：为了骗取群众信任，武汉军区战友报×社长等六名召集钢二司代表就接到“六·二六”指示以后如何制止武斗一事进行谈判，继续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

六月二十八日：陈再道之流盗用武汉部队名义发表“六·二八”通告。通告空喊双方放下武器，停止武斗，而只字不提“百万雄师”的杀人行凶，对“百万雄师”的杀人凶手仍不按“六·六”通令处理，实际上是公开对抗中央指示，为“百万雄师”开脱罪责，继续怂恿“百万雄师”屠杀革命造反派。

这一天，武汉“支左”军管了革命造反派的红色据点“人民文化园”等。到这一天为止，武汉“支左”已占领了武汉的交通要道、制高点，武汉军区周围的所有机关，几乎全被军管，形成了对军区的军事保护圈。

在这一天晚上，军区要员刘××在武昌区“百万雄师”头头的秘密会议上大放厥词，说什么“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派人指挥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中央把武汉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百万雄师’身上”。“他们三新、二司、黑工总、九·一三杀害我们革命群众的凶手，杀害我们解放军的凶手，要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我们坚决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

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六月三十日：“百万雄师”两次包围湖北大学，出动三十多辆“装甲车”（他们自己用汽车改装的），撞开了湖北大学的围墙，打伤两人。

七月一日：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三万余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六周年。参加大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革命派及首都、上海、哈尔滨、西安等地十几个单位的革命派代表。游行受到了武汉三镇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欢迎。

“红”三司也举行了三千人左右的集会游行，有武汉部队×部十九名解放军参加。游行队伍遭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冷遇。

七月二日：8201 部队×班长对 202 部队×战士说：“工总太坏了，太滑了，要抓他们的头头抓不着，‘百万雄师’二十九个人穿着军装和我们一起去抓也没抓到。”

七月三日：下午，在省委十三号楼省委机关召开的一个黑会上，钟汉华说：“河南问题与武汉问题无关，决不能用河南问题来检查武汉问题。‘百万雄师’大方向是正确的。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

七月五日：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前往湖北军区礼堂演出“收租院”，看见 8201 部队的战士，刺枪上刻有“打倒二癞子（指刚二司）”的字样。

七月十二一十三日：新一治革命造反派七人回厂领工资被“百万雄师”刺伤后抓走。武昌锅炉厂总部贴大字报被本厂“百万雄师”—“3·18”头头殴打吐血。“三钢”为此举行示威游行，以示抗议。

七月十四日：中央代表谢富治和王力同志到达武汉。

七月十五日：武汉革命造反派为粉碎刘少奇的新反扑举行盛大示威游行。谢富治和王力同志也乘车参加。“百万雄师”冲击我游行队伍，打死打伤我革命造反派战士四人。

王力同志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晚上到华中工学院与红司同志进行座谈。

七月十六日：武汉革命造反派三钢、三新、三联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举行了二万人横渡长江。谢富治同志亲自剪彩。

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谢富治、王力同志先后在武汉测绘学院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接见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的勤务员和战士，并作了指示。

七月十九日：谢富治和王力同志在军区×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周总理四点指示：

- (1) “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
- (2) 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 (3) 要为“工总”平反；
- (4) “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三司”是中间偏保守。

谢富治、王力同志还指出：“二·八”声明功过七三开，基本是好的。

晚上十点多钟，在陈再道、钟汉华的一手策划下，“百万雄师”和 8201 部队冲进军区，有计划有目的地对谢富治、王力同志进行围攻和殴打，并将王力同志绑架走。

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百万雄师”和 8201 部队殴打、斗争王力同志，他们出动四百多辆卡车举行全副武装的反革命游行，对王力同志进行游斗。并叫喊“打倒谢××”，“绞死王×”，“揪出江×后台”，“陈再道政权万岁”等反动口号。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经过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驻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和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勇斗争，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返回北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钢二司中南民族学院“江城铁骑”改编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原载武汉钢二司《风雷激》)

陈再道挑动农民进城镇压和屠杀革命造反派罪证如山

(编者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利用广大贫下中农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限热爱的深厚阶级感情，欺骗蒙蔽广大贫下中农，煽动农民进城镇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陈再道之流利用多记工分、多给奖励、多给贷款、多给化肥等经济收买的手段笼络人心，还借开“民兵代表会”“毛选学习训练班”之名，行大搞反革命武斗训练之实。你不听从他调动吗？你就是“立场错误”，就是“不热爱毛主席”，就是“不热爱解放军”，那就是“牛鬼蛇神”。下面公布的一些材料，系统地揭露了反革命分子陈再道之流挑动农民进城、大搞反革命武斗罪恶事实。

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和湖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王任重是一丘之貉，在革命的群众起来摧毁了王氏统治之后，兔死狐悲，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按捺不住心中的仇恨，步王任重之后尘刮起了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二月黑风。同样，好景不长，遭到革命造反派的迎头痛击，声名狼藉，狗急跳墙，一方面在市内大搞武斗，以武力镇压革命造反派，另一方面通过“抓办”“军代表”，人武部煽动农民进城武斗。从四月下旬到六月底的六十多天里，煽动农民进城千人以上的达二十四次之多，约十一万人次，常驻市内参加武斗的有一万四千多人。大搞反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以配合其大屠杀，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实行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

一、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是挑动农民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

早在四月二十三日，湖北军区支农负责人芦××奉陈贼黑指示，亲自到汉桥区找人武部政委于××研究农民进城的问题。随后到解放公社党委讲：“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工总’复活分子、三新、二司他们要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所谓揪武老谭，就是要揪陈司令员。陈司令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贫下中农对这个问题要挺身而出。”这次讲话内容由市人委农办秘书处王××通知各区和东西湖等地。各区在二十五日召开了各公社会议进行贯彻。

四月二十五日，汉桥区在省委党校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武装部政委于××说“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是因为‘二·八’声明没有批臭，流毒没有肃清。”并对干部说：“你们要把汉桥区的贫下中农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上街游行示威，打出贫下中农旗号，杀向社会。”第二天农民第一次上街游行，高呼事先统一的口号：“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

武汉部队陈再道之流精心策划的“六·四”公告的出笼是血腥屠杀革命造反派的黑色信号弹。六月五日市农委办公室主任李××在黄埔路兵站召开了市郊各公社贫协主任会议，大讲“三新”二司欺侮贫下中农，打贫下中农，现在武汉部队替我们撑腰，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了，我们要组织全民反击……。

中央“六·六”通知下达后，六月八日汉桥区红光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请示区人武部于××：“中央指示下来了，怎么办？”于回答：“不管他那一套，我们干我们的。”第二天发生了数千农民围攻汉阳纸厂的事件。六月二十五日晚十点多钟，武汉××支左办公室派人到陈家湾对农民讲：“你们农民辛苦生产粮食，但每月自己得稻谷二十多斤，而工人每月四十多斤大米，每月吃好几斤油，可是这些混蛋吃了你们生产的粮食，什么‘工总’、‘工造’、‘九·一三’反而大叫要打倒陈再道，打倒解放军。你们想一想，没有陈司令员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农民能翻身吗？(真他妈的混账至极！)你们现在应该起来保卫解放军！保卫毛主席！保卫陈司令员！这是一致的。”

8201 部队闵××到鲁家巷公社(在新华工附件)造谣说：“新华工是牛鬼蛇神。”“新华工把王任重、彭真的老婆弄到华中工学院来保护起来。”“新华工收集二·七公社，‘湘江风雷’、暴徒，在民众乐园做打手，抢粮、抢油，你们要收好粮油。”“新华工周围都埋了地雷”等等。

中央“六·二六”电话指示后，“百万雄师”中一片混乱，六月二十八日武汉军区刘×在武汉公共汽车场停车场召开的“百万雄师”代表大会上说：“中央点了我们的名，说明中

央知道武汉有个‘百万雄师’，我们干的好，干出了成绩，连中央都知道了我们的名字。”“‘六·二六’电话指示上，哪一条说我们‘百万雄师’大方向错了呢？没有，根本没有。我们掌握了斗争大方向，是保卫解放军。”“我们要坚持下去，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们不能解甲归田，半路散伙。我们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陈再道之流美其名曰：“农民进城是自觉的。”简直是胡说八道。陈再道挑动农民进城，铁证如山，罪恶难逃。

二、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是如何挑动农民进城的造谣惑众，欺骗宣传

陈再道之流凭着飞机、宣传车、发传单，写公文，蒙蔽广大指战员下乡对农民进行欺骗宣传。什么“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继而又说：“新华工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造反派打伤了 177 名解放军战士。”“把杨副司令员打得都不能小便了。”造反派要“打倒贫下中农”，挑拨贫下中农和革命造反派的血肉关系。甚至伪造中央首长指示，欺骗广大贫下中农。

利用“走资派”搞阶级报复

从三月份以后，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的“走资派”一律官复原职，拉进“三凑合”的“抓办”。有些“四清”时已下台的干部也被拉上台，搞控诉。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捧为“一枝红梅”的江堤公社曙光大队党支部书记叶×(1966年7月该大队团支委张××写了叶×一张大字报，结果被撤职开除团籍，并逮捕入狱，和张在一起劳动的六名青年也被监视劳动)组成“控诉团”在江山区、汉桥区控诉革命造反派。

四月中旬，江堤公社人武部召集被斗干部家属会，控诉革命造反派。公社党委书记周××感慨地说：“要记住这个苦啊！”

东西湖农场红星分场红卫大队支书朱××在全市民兵正副小队长、保守组织头头会上说：“‘工总’、‘九·一三’在‘民众乐园’挂了两小时国民党的旗帜，喊××万岁！跟台湾通电报……。”

政治上打击，经济上收买

对广大贫下中农在政治上打击，在经济上收买。对一时尚弄不清真象、受蒙蔽的贫下中农说：“你们是真正的贫下中农，拥护解放军”，每次上街游行给高额工分，车船费报销，生活补助三角、四角、六角不等，对革命造反派农民则骂是“叛徒”“没有阶级感情”。他们家庭有了困难不给补助，得了病不开“三联单”(现在不交现款，分配时扣除)，养猪不给补助糠票。江堤公社五小队共产党员陈××，因为“观点不同”不让参加党的会议，家庭困难不给补助钱。支部书记说：“你只要改变观点，我给你想办法。”

镇压造反派，拼凑保守派

武汉地区“红农司”等是郊区农民造反派组织，有十五万人。三月份被陈再道之流宣布他们“过时了”、“非法的”，勒令他们解散。对负责同志围攻、斗争、坐牢。经济上封锁，堂堂的湖北军区支农负责人芦××一次才批了 55 张半废报纸，一小瓶墨汁。

1967 年 6 月 22 日晚，“百万雄师”蒙蔽郊区农民千余人，包围“红农司”江堤兵团，毒打八人，兵团负责人杨相连全家四人遭毒打，家被抄。杨被带到“百匪”老巢“铁中”受刑。

陈再道之流一手镇压造反派，一手复活、拼凑保守组织。郊区农民主要是通过人武部和贫协组织进行。四月二十六日在军区支农负责人芦××参与下组成“市郊贫下中农联络站”，配合“百匪”行动。通过“游泳训练”、“毛著学习训练”欺骗农民搞武斗训练。六月十日市郊保守组织参加了“百万雄师”，各区、社成立“百万雄师”农村司令部，直属“百万雄师”调动。

三、陈再道挑动农民进城配合“百万雄师”屠杀造反派

六月份受蒙蔽的农民被正式推上“百万雄师”屠杀革命造反派的前线。武汉发生的“六·六”“六·九”“六·一三”“六·一七”“六·二四等血案”都有大批农民参加。

东西湖农场的农民是这样被推到战场上的：起初，欺骗他们说去慰问解放军。上车后，每人发安全帽一顶、木棒一根。后来就宣传“市内出现了反革命逆流”，并用经济收买，使受蒙蔽的农民为他卖命。

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屠杀革命造反派

陈再道是社会上牛鬼蛇神的总后台，为了残杀革命造反派，勾结地、富、反、坏等甚至放出劳改犯人杀害革命造反派。

六月十一日，洪山区委杨××，肖××造谣说：“三新、二司要暴乱”。动员300余农民每晚上封锁通往新华农的公路。六月十三日晚有地主分子宋××，富农分子陈××、陈××残杀新华农钢二司小将王体圣，打成重伤18人。在吴家山常去参加武斗的九人，其中贪污分子七人，地主分子一人，普通群众一人。

破坏机器设备、破坏工农业生产

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煽动农民进城武斗，屠杀革命造反派，使造反派工人有厂不能回。他们又抽人武斗，破坏机器设备，破坏工农业生产。汉阳造纸厂是全国制造毛著用纸四大厂之一，担负供应四分之一毛著用纸任务。六月九日“百匪”和数千名农民赶走革命造反派，破坏机器设备，造成严重的停产损失。六月十三日调二十余车农民配合百匪血洗“新汽配”，打死数人，打伤200余人，厂内精密机床厂严重地遭到破坏，一时难以恢复。

为了供应武斗凶器，许多农业机械厂停工造武器，仅××修配厂用去长钢管两吨，仅一次停工两天，造了500多把三角刮刀。

农村实行联防，农民无心生产

随着市内的血腥屠杀，修筑工事，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把黑手伸向农村，把农民也武装起来。最紧张时，每个公社每晚有300多人站岗放哨。田里插上三种旗，实行联防，暗中监视革命造反派，制造白色恐怖，使郊区农民惶恐不安，无心生产。

四、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挑动农民进城大事记：

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在调动农民进城集训参加凶杀的同时，还公然对抗中央“抓革命促生产”及“抓紧夏收”的伟大号召，多次挑动大批农民进城“游行”“示威”，挑起事端，挑拨贫下中农和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的血肉关系，以达到他们利用农民来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恶目的。

四月二十二日，各公社成立“毛著学习训练班”，学员由上级指定，大队贫协副主席及委员随同。

四月二十五日，区人武部召集各公社党委书记汇报“训练”情况，策划汉阳地区永丰、江堤、红光、四新等公社组织农民游行，名曰：批判刘邓。

四月二十六日，训练班的课题转为讨论武汉当前局势，宣读工总十大罪状，统一思想，并准备冲击汉阳公安局门前“夏邦银事件火线指挥部”。

四月二十八日，汉桥区“抓办”在省委党校礼堂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会上，武装部政委于××说：“有人说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错了，我认为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基本是正确的。同志们要看到反复，不要惊慌，反复是好事情，让牛鬼蛇神好暴露。”并用挑动性语言宣读工总十大罪状，说：“工总这么坏，都有人为它翻案，你们答应不答应？”接着就散发传单口号，其中有：“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拥护三·二一通告”。

四月二十九日，汉桥区永丰、江堤、红光，四新等四个公社上万农民到汉口游行示威。因考虑条件不成熟，未冲“火线指挥部”而去汉口，过汉水桥后，口号全部为：“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至民众乐园前，群众喊：“贫下中农不要受蒙蔽！”因而引起冲突，发生武斗。双方都有受伤，农民中有一女广播员受伤，武装部就此大做文章，王参谋亲自用小轿车把她送入医院，未经办入院手续，就强行收下，说什么病势很厉害，这是政治任务。经医生检查，只有轻度受伤。

五月二日下午，数十名自称区委干部者，未经医生允许，私自把女广播员陈×转走。

五月三日，“抓办”盗用四个公社贫下中农名义印发了五万造谣传单“贫下中农的呼吁”，发至全国各地，污蔑新华工、二司殴打贫下中农，耍流氓手段。

五月六日，又用“武汉市郊贫下中农向新华工递交抗议书代表团”的名义，来新华工递交抗议书。事后又在江堤公社召开妇联会议，把陈×的破衣服在会上展览，大肆宣扬“新华工污辱妇女”。当晚区委打电话给各公社造谣说：“新华工要打你们，砸你们，你们大队要抽一定人值班，并派两人到公社。”

五月十五日：汉桥区党委金××等人欺骗贫下中农，动员八千农民带木棒、凶器，由金领队，邵××、赵××等二十多个公社“走资派”在前，高喊：“打倒大学生！”“打倒刘少奇的总后台新华工！”挑起武斗，打伤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三十七人。

五月十六，以拥护“五·一六”通知为名，组织六千人上街游行，汉桥区委书记王××、区委副书记曾××都参加了游行。

五月二十二日，以拥护武汉部队“五·二一”通知为名组织一万五千农民分汉口、青山、武昌三处游行，高喊：“打倒孟夫唐！”。上午有两批 33 辆卡车，第二批第九辆是中型军用卡车，车号为：戊 4—07—07。

五月二十三日，十三辆满载贫下中农汽车去军区慰问所谓的解放军伤员(造谣)，沿途高喊：“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五月二十四日，汉桥区委通知江堤公社组织 1000 农民由党委邵××带队，武装部指挥，围攻汉阳三中，革命小将有二十六人被打成重伤。

五月二十六日，红山区武装部召集社干部贫下中农 500 人，开“控诉会”，并游行，到军区慰问并煽动东风、联合等四个公社 2000 余名农民上街游行。喊：“打倒孟夫唐之流”。打伤一治记者，抢走照相机、自行车。

五月三十日，红山区组织 15000 人，分青山、关山两处，抗议“新华工、九·一三打解放军。

六月三日，“百万雄师”围攻唐家墩模具厂革命造反派，汉桥区委从先锋公社调 200 农民，参加武斗，打死打伤二十七人。

六月四日武汉部队“六·四”公告发出当天下午全市郊区农民，分青山、汉口、武昌游行，有 20000 农民参加，沿路打伤不少革命群众。

六月六日“百万雄师”抢占武汉、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汉桥区 3000 农民配合行动，由农民占领广播大楼，并绑架电台负责人。

六月九日，“百万雄师”攻占居仁门中学，汉桥区委抽先锋、南泥湾公社 600 农民支援，在武圣路阻击，由南泥湾公社党委郭××负责。当天汉桥区数千农民围攻汉阳造纸厂。

六月十三日，“百万雄师”围攻汽车配件厂，破坏机器设备，赶走工人。当天汉桥区调 3000 农民，东西湖调 1500 农民，打死打伤职工 216 人。

六月中旬，仁山区委杨××，萧××借口“三新二司要暴乱”，每天晚上对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实行封锁。十三日晚伏击新华农同学，打死一人，打伤 18 人。地富分子都参加了。

六月十七日血案中，汉桥区、东西湖调来八万五千人。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百万雄师”和 3000 农民全副武装包围“红农司”江堤兵团。打伤了八人，兵团负责人杨相连全家四人被毒打，抄了家。杨相连被带到“百匪”据点受刑。

六月二十三日；红山区委书记姜云龙，区委办公室主任周烈等组成抽调小组。造谣说“三新、二司包围了区委大楼”。下午陆续调来青菱、东风等十二个公社一千三百多名农民到区委修工事，造武器。

六月二十四日，“百匪”围攻工造总司，汉桥区江堤公社、红光公社抽 3500 人参加。围攻汉阳轧钢厂有丁××带 4000 农民参加。

附件 (一) 武汉市和平人民公社调人通知

各生产大队，各革命组织：

近来由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王任重为首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极为猖狂，今晨五时，接市火联指挥部通知，现市委机关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围攻市级专政机关，企图抢劫国家机密文件，破坏国家财产。市火联指挥部依据“六·六”通令的第二精神，组织郊区农民去保卫国家财产的安全，决定我社派五百名贫下中农，于今天赶到汉口去参加保卫工作，现研究你队派四十名贫下中农社员参加。现将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派一批年青力壮(中年人，青年)的男同志，女同志不要。

二、去的同志自带粮票和衣服，防止风起受寒。

三、防止武斗(坚决不准武斗)，各人自带自卫工具。

四、去的同志的伙食费，工资，旅行费，全部由市委负责解决。

各大队带队的同志，请各小队负责安排时(适)当的战斗队员。

武汉市和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1967年6月9日

附件 (二) 打人凶手陈文焰口供

陈文焰，男，二十八岁，洪山人民公社红山大队十一小队社员，下中农出身，参加“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今天红旗二中为了堵窗子，动用了我大队的砖，发生了冲突，为了防止新华农前去支援，因此大队支部书记胡××，大队长陈××和郭××，动员社员说今晚全部到十二小队集合，铃声一响全部出动，并威胁社员说：“谁不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不听我的指挥，就是反革命”。在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的恐吓下，全大队男劳动力全部出动，女同志在家看小孩、放哨。出去之前小队有两个人放哨，并和附近药厂、灯泡厂主任联系了，一发生情况，就前来声援。今夜人数达二百多人，每人手持一棍，手腕系上手帕或白布条作标志。

今天出击有是准备的，马路两旁都有人，并准备了大量石头。

今天地主富农也全部出动了，仅我知道的十二小队两个富农，一个叫李德保，一个叫李德林，地主叫朱金传，其他队里我不清楚了。

洪山人民公社昨天召集了六十个单位，于上午八时在武昌区委党校开会，会议明天结束，参加外单位仅我所知有武测的，灯泡厂的，打罗厂的代表，公社所属生产队都派代表参加，11小队的代表是陈××，所抽人员分照发，每天补助伙食吃三角、补助两角。开会内容还没有传达。

今天敲钟的是12小队的王××，小队长。

今天捉拿你校学生英德的是二小队，后来我才知道了。

中央“六·六通令”上面根本没有传达，我们根本不知道。

附件 (三) 打人凶手陈忠显交待情况

造反组织头头叫陈××(小队)

三天以前就由上面交代各村派人加哨，以前两次是抢了牛肥料，今天还要夺人，重要道口派出了哨，今天由陈××带领，我们今天派出了八个劳动力，全部手持木棒，每人手上缠一白布条。

每晚7：30—12时半，每哨补助三个工分，全队91人，男劳力8人，女劳力10人。

陈××说我们如果不去冲不去打，白天不给我们工分，他叫我们去放哨，说二司中有许

多牛鬼蛇神，要打击我们。

三天之后，陈××把我们组织了一个“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大队长陈××为主要负责人。

我以前贪污过 200 多元，陈××叫我把生产抓好，白天老实生产，晚上去站岗放哨。

陈忠星(签字)

1967. 6. 14

第九十六卷 7·20 武汉事件(续二)

[附] 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在武汉地区爆发了。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这次事件诬蔑为“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把我和钟汉华等同志打成“策划‘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祸首”，武汉军民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当时，外电纷纷报道：“武汉发生了反叛乱”，“陈再道上将曾有效地控制了武汉”。时隔数年之后，我已经出来工作了，一些国外出版的刊物，仍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扣留了谢富治和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党中央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于武汉军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沉冤十一年之久的“七·二〇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被颠倒的历史终于重新颠倒过来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作为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感到有责任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民，有必要详细说一说“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间，我因病在北戴河疗养。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便给林彪写报告，说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回去参加运动。林彪很快同意了我的请求。路过北京时，我顺便去看望向前同志，说起了这件事情，徐帅对我说：“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当时我想得太简单，没有嚼出徐帅话中的味道。

回到武汉，短短几个月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到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二十八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二月初，我们的会议还在进行中，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却强行占领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二月八日，他们用《长江日报》的版面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以下简称《二·八声明》)。这篇声明唯我独尊，充满了极左思潮，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什么“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二月九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造成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二·八声明》出来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就连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进行批斗游街。二月十一日，他们竟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闹得乌烟瘴气。武汉军民对这种打砸抢的行为愤然不满，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和二月九日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罢工”，他们找到叶明同志(军区副政委)，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

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

声明》中的错误观点，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战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严正声明》，是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发表这个声明，军区党委是慎重的，不仅交给司、政、后机关干部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而且报告了军委文革小组。徐帅当时是小组组长，他同意军区的表态。我和钟汉华同志也看过《严正声明》，认为发表它是完全应该的。

二月底，会议结束，周总理把我和钟汉华同志找去，要我们回去后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总理当时满怀忧虑地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总理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八条命令以及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作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冲一冲武汉军区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汉的造反派提供的材料，于二月中旬起草，经王力修改并下令发表的。据这个监督组成员交代说，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因为这些地方压制造反派最厉害)，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四月六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两个东西一出来，军区很被动，十条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的造反派就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他们违反中央的有关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什么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为工总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在此之前，我和钟汉华同志于三月中下旬离开武汉，再次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看到《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社论和十条命令，又听说武汉出现反复，我们非常恼火。在一天的小组讨论会上，我发言放了一炮。我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也行。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发言记录整理后，秘书同志问我，要不要登简报？我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于是登了简报。“七·二〇事件”后，林彪的几员大将把我的这个发言说成是“公开扬言，妄图改组中央文革！”

四月十七日，秘书同志看到一份传单，印有江青四月十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的讲话。江青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觉得武汉的情况和成都不一样，问题没有成都那样严重，中央对武汉的情况不了解，应当汇报一下才好。请示总理，总理很快就同意了。

四月十九日，总理在钓鱼台主持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我们的汇报。江

青不知从哪里听说武汉有五万人绝食，问我们有没有这回事，我们说没有这回事。江青马上向我们作检讨，说她听了一面之词，讲得不对。并且解释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在汇报过程中，中央文革其他成员都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最后，总理叫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江青当即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二十一日就接见他们。但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参加接见会抬高造反派的“身价”，我们见江青这么郑重其事，当然高兴。

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江青送来当天的《文革快报》，内容是中央文革驻汉“记者”的“情况反映”，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十九日会议的有关指示，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江青在上面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晚上，我们查明情况，立即给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说明我们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十九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规定：不准再往下传达。记者听到的，不过是负责支左办公室工作的一位同志列席常委会后，回去给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的风，仅此而已，并没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的意思。当然，事情没有处理好，我们有责任，接受批评。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中央文革又派人前来没收了我们十九日的会议记录，同时让来人转告我们，不准再提十九日的汇报，二十一日的接见也已经取消，中央文革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从这以后，中央文革“说话算数”，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一概不答复。

大概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许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接到通知，让他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我和钟汉华同志接到的通知却是：“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百万雄师

“五一”前夕，我和钟汉华同志回到了武汉。这时，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争论的焦点所在。武汉和南下的所谓造反派，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钟汉华同志，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给武汉军区施加压力。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五月十六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干部不加分析，一律打倒。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一百二十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武汉军区驻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我们从内心讲，也同情他们，只不过所处的位置不同，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他们罢了。

与百万雄师相反，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人数越来越少了。我们从大局出发，仍然着重做他们的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他们，生怕把这批“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搞掉了，交不了差。

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和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实行大联合。《公告》发表后，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对《公告》也不太满意，认为我们太软弱了。

卑鄙的手段

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之所以闹得这么凶，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策划操纵的结果。这件事情的内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初步揭开。

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亲信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即不亲林彪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哪些人不亲林彪，吴法宪等人心中是有底的。五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先后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了四、五次电话，要武空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

四月份，中央文革派遣大批北京各院校的造反派到外地，以“调查”为名，进行反军乱军活动。北航红旗的几个造反派到武汉后，召集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开会，说什么“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这个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瞎说，事实上，中央文革和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就有着直接的联系。林杰、吴传启和戚本禹的秘书五月初先后接见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组织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五月十六日要发文件点军内的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总翻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把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给他们打招呼，说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林彪在臭名昭著的《八·九讲话》中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各种坏事暴露出来，把各种隐患诱发出来，问题就解决了。在这个讲话中，林彪既表白了他整武汉军区的一贯用心，也供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时所采取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之所以对武汉军区不放心，事出有因，由来已久。早在延安时期，钟汉华同志负责审干工作，发现叶群参加过三青团。当时，叶群痛哭流涕，林彪也大发脾气，但钟汉华等同志坚持原则，据实给叶群作了结论。一九六四年军委讨论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我发言说：“主席的指示，是一九六〇年战略方针(林彪主持制订的)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过去的方针，今天看是有缺陷的，当时看也有缺陷，没有主席指示的全面，成龙配套。”我的发言有批评林彪“南放北顶”作战指导思想的意思，因此引起了一场“风波”。黄永胜等人对我进行围攻，硬说我把主席的指示和原来的方针对立起来了，是否定过去的方针，反对林彪。同年，叶群到广州军区搞调查，说什么大比武是“拼凑尖子”，“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冲击了政治”等等，把大比武说得一无是处。许多同志认为要用“两分法”看待大比武。我也持这种观点，发言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主席看过大比武，没有说大比武不好。”叶群调查大比武，实际上是为林彪整罗瑞卿同志罗织罪名。我们讲公道话，当然得罪了林彪。一九六五年，林彪到武汉，我因在外检查工作，没有赶回来接他，而黄永胜却专程从广州赶到武汉来迎接林彪。相比之下，我对林彪实在有失恭敬。后来，我听其他同志讲，林彪在武汉大骂罗瑞卿同志，并且有所指地说：“你们武汉，有没有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湖北省军区给武汉军区写报告，说要象修韶山那样修林家大湾(林彪的

家乡)，而且要把路修成能并排通行四辆大卡车的柏油马路。这个报告，我们压了下来，没有批准。说实话，我当时还是好心，害怕了帮了林彪的倒忙。

这几件事情，我们没有违反党性，也不是什么非组织活动，但林彪却长期怀恨在心，费尽心机地要“把隐患诱发出来”。当然，林彪整武汉军区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倒我们，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从武汉开刀，为“揪军内一小撮”制造口实，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负责同志，扫清篡党夺权的道路。

我是不打倒他的

接到中央文革六月二十六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做好赴京汇报的准备。七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七月十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七月十四日清晨，总理为主席打前站，乘飞机到了武汉。随同总理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主席是晚上到武汉的，随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总理亲自为毛主席打前站，据说是想看看武汉的形势，究竟是不是象中央文革说的那样漆黑一团。另外，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进他们联合起来，稳定武汉的局势，为毛主席横渡长江创造条件。总理还设想，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武汉问题解决好，这对于解决其它省的问题，对于稳定全国的形势，会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主席两次召集总理和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主席还让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的工作。

七月十五日开始至十八日，总理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连续四天听取我们的汇报。这个会议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以及李作鹏、刘丰和作战部长们也断断续续参加了。十八日下午，总理做了总结讲话，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作。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且为军区承担责任，说我们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这个总结讲话的提纲，据说是总理亲自拟的，并且送主席审阅过。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总理苦口婆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总理为了消除我们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就告诉钟汉华同志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七月十八日晚上，总理要赶回北京，临走之前特地带我们去见毛主席。主席一见我们就问：“你们怎么样啊？”我心事沉重又有点气鼓鼓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席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我听主席这么说，心里踏实多了，赶快回答：“要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主席说：“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会，你一开会，就下了台。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并且嘱咐我们：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我对主席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王力认为我是在将他的军，满脸不高

兴，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文革的！”主席明白我的意思，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并且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主席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段话，也是当时讲的。

大约十点多钟，我们告辞出来，主席把我们送到走廊上，招呼几位服务员和我们握手，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又对我们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打不倒你！”我们和服务员同志握手时，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疯狂的破坏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七月十三日，总理决定到武汉，中央文革不通知武汉军区，却由吴法宪通知刘丰，说夜里有一架一级专机要到汉口机场降落，让刘丰等人作接机准备。专机具体什么时间到，坐的什么人，都没有告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空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

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和海、空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感到怀疑。他们在王家墩机场开设了“三军”指挥所，给林彪搞阴谋活动提供了条件。刘丰根据林彪、吴法宪的意思，竟背着总理，私带电台、保密机和总理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七月十六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那个人召集武空刘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七月十三日夜里，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在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造反派听文革的，让他去也好，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于是同意了。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而且指定要让刘丰带路。王力在车上问刘丰：“你们空军的观点，是不是和军区一样？”刘丰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空军那个人帮腔说：“有不同意见。”在湖北大学门口，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七月十五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在四天的汇报过程中，谢富治和王力一副凶相，态度极为蛮横。凡是不合他们口味的，我们讲一条他们驳一条。谢富治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我们当时不知道主席在武汉，也不知道主席和他们议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所以和他们顶得很厉害。记得在他们要我们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时，有人插话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韩东山同志当即反驳：“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谢富治听了这话，眼睛都瞪直了，他恶狠狠地说：“你反对林副主席！”七月十六日，即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报都是一个样。决定起草检讨，反正早晚要用。

谢富治和王力公开身份后，总理无可奈何，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七

月十五日和七月十六日夜里，谢、王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他们。七月十七日夜里，谢富治和王力一行跑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好后，谢把名单装进了口袋，就一句话也不说了（七月二十七日，名单上的十三个人一齐被逮捕，其中八人一直被关押到一九七二年才被批准“保外就医”）。这时，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百万雄师的同志不客气地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第二天，百万雄师总站向所属组织传达王力的指示。不传达还好，一传达群众都跳起来了，坚决不同意王力的讲话。

“七·二〇事件”发生的前几天，王力还多次和北航红旗造反派谈话，说什么中央要对武汉问题公开表态，百万雄师和四川产业军是同类型的保守组织，搞武斗厉害的头头要处理。陈再道问题严重，一九六七年还在保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支左又犯了路线错误，要公开作检查。武汉问题这么严重还算好的，其它省的问题更严重，主要是军队的问题等等。七月十六日和七月十九日，王力两次把主席在武汉的谈话记录拿给这些人看。这些人不仅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武汉造反派，而且卖力地兜售王力的黑货，进行煽风点火。武汉造反派则到处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表明谢富治、王力是支持他们的。

谢富治、王力的倒行逆施，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反感。七月十七日，百万雄师有针对性地贴出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七月十八日，标语口号又点出了王力的名字，要他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

七月十八夜里，主席和我们谈话之后，谢富治和王力带着刘丰等人，到机场送走总理，随后直接从机场溜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总理离开了武汉，谢富治和王力更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佩戴着造反派的袖章，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先后在大会上讲话。王力疯狂地喊道：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讲完话，谢富治又要刘丰等空军负责人挨个“亮相”。过去埋怨抓人抓得太少，要“多抓几个造反派”的刘丰，此时摇身一变，说自己是小学生，支左犯了错误，希望造反派帮助纠正，以后要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边等等。

谢富治、王力这天晚上的活动，成为爆发“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线。

第二天，七月十九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提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争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一场反击林彪路线的革命壮举即将发生了。

百万雄师过大江

七月十九日，我们按照预订的计划，上午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过我和钟汉华同志的检讨；下午三点多钟，又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王力开始说他不讲话，但谢富治讲完后，王力又说他要讲话。王力用教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象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王力从一九六五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讲起，一直讲到六七年军队支左。胡说什么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要大树特树工人总部。还胡说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夜里十点钟。而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开始行动了。晚饭后，省直机关的干部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他们，回答问题，并且解释清楚王力到水院的“四点指示”，究竟是什么意思，用心何在？

散会后，我和钟汉华同志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犯了错误，感谢宽大。正是这个时间，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端茶送水，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

事件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钟头，经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的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七月二十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离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两百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便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王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这天上午，主席叫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我因有伤，又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因此，留在东湖。钟汉华同志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同志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同时又不能讲出毛主席在武汉，放王力是毛主席的指示。磨到中午时分，钟汉华、叶明、孔庆德等同志设法将王力悄悄地弄出来，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楼。六号楼位于小洪山北侧，紧挨着军区指挥所，周围是部队的营区，比较安全。当晚，叶明、

韩东山同志准备再次把王力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却发现王力“失踪”了。

就在七月二十日这天，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进行游行示威。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也象江水一样滚滚而过。他们张贴标语，高喊口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武汉军民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正直的勇敢的武汉人民以为，这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定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的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林彪所希望的。

危言耸听

七月二十日上午，事件刚刚发生，林彪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当时周总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总理，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特别交代秘书要告诉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作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落款又不知怎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林彪、江青勾结一起，派邱会作和张春桥分别乘专机飞往武汉和上海，邱会作临走时，江青交代他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邱会作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于下午两点十分赶到了武汉。张春桥也于下午四点二十分赶到上海，安排“迎接”毛主席。

邱会作到武汉后，立即和主席身边的人“商量”，决定把主席转移到上海。五点多钟，邱会作见到毛主席，邱说：林彪、江青派我来送信，叫我把信亲自交给主席。外面形势不好……，林彪和江青担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转移，另给林彪、江青回个信，哪怕几个字也好。主席边看边笑，将信将疑，走不走，走，到哪儿，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没有下定决心，延至晚上八点多钟，主席同意去上海。二十一日凌晨两点钟，主席坐空军的汽车，在刘丰等人的“护送”下，绕道前往王家墩机场。到机场后，邱会作再次向主席讨回信，主席问他：为什么要转移？又说：想游泳，现在看游不成了。不写信，你回去同林彪、江青说说，就这么办！林彪、江青给主席的信写得什么内容，从来没有清查过。一九七四年，张春桥在京西宾馆的一次讲话中不打自招地供认说，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主席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我想，毛主席对林彪、江青是存有戒心的，如果没有戒心，不论书面还是口头同意林彪的“兵变”之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七月二十日，总理听说武汉发生百万军民反对王力的游行示威，即决定重返武汉。下午三点五十四分，总理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造谣欺骗总理，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一零一（即林彪）报告一下”。吴法宪把总理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总理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机场，一片刀光剑影。总理不以为然，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丢在山坡机场，仅带着两名卫士，乘汽车赶往武汉。总理到武汉比邱会作晚了八九个小时，主席已经决定去上海了。

总理一到武汉，就叫孔庆德和牛怀龙同志(独立师师长)把王力找回来。并让孔庆德同志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飞机(由于林彪插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七月二十一日，总理又叫我们去找王力，一心想把局势稳定下来。

王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七月二十日下午，叶明同志担心再次把王力抓走，不好交差。便叫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当时在军区大院)回去，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谁知张昭剑为了邀功请赏，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竟哄骗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隐瞒了他所在的二十九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是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抓王力的。

王力吓得屁滚尿流，跟着张昭剑，在小洪山上连滚带爬，一直躲到第二天。

王力在山上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尤其卑鄙的是，张昭剑竟然对我们封锁消息。七月二十一日上午，总理叫我们找王力，我们派人找到二十九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不告诉他们的具体情况。我们觉得二十九师这样做十分反常，便向总理作了汇报。

刘丰不知怎么得到王力在二十九师的消息，他中午窜到二十九师。一去就冲着张昭剑大骂武汉军区，说：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善于投机的张昭剑说：“我听空军的。”刘丰把王力转移到武空军司令部，王力要刘丰“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特别对人武部要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要创造一个革命的大军区！”

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李作鹏、刘丰的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清早，刘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他亲自把王力接出来，转移到山坡。武汉情况紧张，电话里不敢讲。与此同时，武空也向吴法宪报告，说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步枪等等。吴法宪接到这些电话后，都迅即报告了林彪。

这天上午，总理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同志和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总理让叶明、孔庆德同志住到二十九师，暂时主持军区的工作。并且让他们转告我和钟汉华同志，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他才好说话。总理还说，武空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总理在谈话中没有责备军区。

但是，总理的话，李作鹏和刘丰等人根本不执行。当天，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说“七·二〇”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甚至指使在武汉保卫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军舰发表《严正声明》，恶毒攻击和诬蔑武汉军民。《严正声明》杀气腾腾地说：“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吴法宪和刘丰串通一气，说空军要对“七·二〇事件”发表声明，打倒陈再道。总理发现制止，他们不仅不听，还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林彪。七月二十三日，刘丰从吴法宪那里听到消息，马上打电话给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〇’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张昭剑听了这话，立即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并且扬言要把军区领导同志“统统打倒！”尤其狠毒的是，张昭剑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叶明、孔庆德同志赶出二十九师，以致叶明同志几乎被打死！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本来，总理坐的飞机比谢富治和王力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但林彪、江青为了扩大声势，却让总理坐的飞机提前降落，逼总理参加他们搞的欢迎仪式。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谢富治汇报后，林彪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

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林彪的决定，把总理处理“七·二〇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会后，林彪又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关锋第二天对王力说：林彪之所以要采取这样非常的措施，不是为了欢迎你们回京，而是为了毛主席被迫离开武汉。阴险狡诈的林彪，明明是自己胁迫毛主席离开武汉，反过来却把罪名加在我们头上，用主席的名义来打击敢于反对他的武汉军民。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文革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开始了一场对武汉军民空前规模的舆论围剿。

进京

七月二十二日，我想请示一下总理，看总理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办。总理住处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说：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钟，我们收到了林彪以中央名义调我们进京“开会”的电报。五点二十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尽管如此，武汉军民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我们去机场时，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顺利地到达了机场。我们到了之后，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共是十五人。刘丰这天进进出出，发号施令，已经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他规定我们不准离开屋子，并且召集我们的秘书、保卫干事开会，要他们和我们划清界限，对我们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多钟，我们飞抵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总理交代宾馆的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为了保护我们，总理还下令给京西宾馆增派了警卫部队。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划了新的阴谋。我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我们刚住进京西宾馆，造反派就知道了，并且冲了进来，这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傅崇碧同志派人把我们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同志，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总理声色俱厉地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戚本禹接到总理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总理的指示不好办！”根本不做工作。而吴法宪则告诉总理，说他接到电话后，找了三军造反派的头头，做了工作，但三军造反派不仅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反而要求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交给三军造反派批斗。

其实，吴法宪做工作是假的，耍花招才是真的。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后，三军造反派就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三军造反派的行动是林彪派叶群到京西宾馆找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串连”布置的，叶群要求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还要求他们到处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为了给三军造反派鼓劲，叶群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的游行示威，甚

至亲自出马，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欢 迎 大 会

七月二十四日，我们到京的当天晚上，中央文革根据林彪的“第二步骤”，开会研究关于“七·二〇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会议还决定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林彪。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钟，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两个小时时间了，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江青、陈伯达、关锋、姚文元表示“拥护”林彪的意见。江青和陈伯达说：林彪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彪“一定参加”。关锋甚至建议，为了“壮大声势”，应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等人也参加大会，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指叶帅等)就可以不参加了。”林彪对关锋的意见非常赏识，夸奖他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果然，这天下午的大会，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没有参加。

下午四点多钟，林彪爬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作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帅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迎接林彪“文化大革命”“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据蒯大富交代，他们当时分析：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〇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做大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蒯大富等人的分析，完全切中了林彪分裂军队的反革命目的和篡党夺权的罪恶野心。

指 鹿 为 马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通知称我们为同志，并附有中央复电的全文和主席的批语。批语说：“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报如下，请酌定。”复电共五条，其中第二条，主席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内容是：“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主席称我为同志，使我深受感动，当时如果没有这两个字，林彪要整死我们是很容易的事情。

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际上是斗争我们。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我和钟汉华、

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坐”，但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〇”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谢富治讲完，吴法宪发言。这天早上四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〇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吴法宪受到指使，气势汹汹地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话完全是信口胡说，总理三次打断他的话，要他讲主要的，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并攻击徐帅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帅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完，徐帅写了张条字递给总理，忿然离开了会场。据说陈毅和谭震林同志没有发言，也是中途离开会场的。

会上，我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过来，抓掉我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我们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受到指使的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我们进行武斗。总理在休息室听了秘书周家鼎同志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但这时人已经溜掉了。总理后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中央常委的扩大会议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会议从中午开到吃晚饭，吃过晚饭又接着开，我低头弯腰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康生坐在那里不讲话，心想，康生年事高，又是文革顾问，和他讲讲，也许能让我们坐下来，于是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话没说完，康生脸一变，恶狠狠地训道：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说着又逐条解释那个有五条内容的电报，经他解释，我比反革命还要反革命，主席称我同志的意思也完全变了样。康生和江青还一唱一和，说党里有坏人，军队里也有坏人，张国焘、彭德怀、罗瑞卿就是坏人，是解放军的败类，是解放军的奇耻大辱等等。林彪的几员大将和江青的几名走卒在会上也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所有到会的人都必须发言，表明自己对“七·二〇事件”的态度。

按照毛主席的批语，是用不着开这样的会进行“讨论”的。林彪、江青开这个会，目的是要指鹿为马，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看党内军内有谁敢再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谁要是反对了，其下场就和陈再道等人一样，“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阴谋得逞

“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预谋已久的反革命方针，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一月风暴”前夕，林彪就在关锋、王力等人“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接着，他又让林立果写“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让吴法宪“把要揪的人名单和材料交给在北京串连的军队院校的学生，由学生们去揪。”他们妄图在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的同时，再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负责同志，把党政军大权统统夺到手。林彪、江青一伙从有意给武汉军区出难题到“诱发”“七·二〇

事件”，就是为了实现“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革命步骤。

七月二十二日，王力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同一天，林立果之流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署名“红尖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声讨“七·二〇事件”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社论、评论、文章、图片连篇累牍。从七月二十六日开始至八月二十八日为止，《人民日报》就发表和转载了二十二篇社论，其中有一天竟登了四篇之多，整版都是社论。中央文革还要求新影等制片厂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拷贝”把《北京支持你》搞出来。八月十六日，这部纪录片用专机送武汉首映。所有这些，在我党的新闻史上是从来未有过的。

七月二十七日，林彪、江青一伙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信中诬蔑我们和武汉人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我和钟汉华同志的职务。刘丰连升三级，当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八月八日，林彪、江青一伙用专机把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和新到职不久的刘丰等人接到北京。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等人两次接见他们，进行谈话。据他们整理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这些“中央首长”说：“武汉出现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

“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还到处发表关于“七·二〇事件”的讲话，提出“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和“改组人武部”等其它反动口号，各地小报则大肆宣传，疯狂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七月三十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一个有各地造反派一百多名头头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蒯大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和王力在天安门上作的黑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的动态。同一天，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也在武汉传达王力、关锋的黑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七·二〇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八月二日，中央文革接见武汉造反派一个坏头头，要他们向各地派人，介绍和推广他们与军内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据这个坏头头交代，武汉造反派先后派出了几万人，在全国各地冲击军队，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这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浪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同志被打成“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徐帅和徐海东同志的家多次被抄，许多军队负责同志被批斗监禁，惨遭迫害，甚至连一些公社和大队的人武干部、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不能幸免。湖北、河南因为“七·二〇事件”大揪“四个一小撮”（党内、军内、公检法内、百万雄师内），后果就更为严重了。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番号、代号，撤离武汉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多年担任警卫毛主席任务的部队，竟被刘丰、张昭剑等人武装押送到农场。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七·二〇事件”以后

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十八万四千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六百多人。如果算上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挑动造反派之间进行武斗的伤亡人数，那就更加骇人听闻了。

八月九日，林彪针对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局势，总结出“打”的“四种情况”（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说什么“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否则，“反动的东西就不能暴露”。林彪、江青一伙愚弄和残害干部群众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一九六七年，林彪、江青一伙先刮“一月风暴”，后“揪军内一小撮”，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阴谋得逞之后，他们又借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召开党的“九大”的机会，把一大批死党、亲信和打砸抢分子安插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在组织上形成反革命帮派体系，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空前浩劫。

丢车保帅

中央文革在开会研究“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对“揪军内一小撮”叫得最凶。康生说：“为什么不能提军内一小撮？”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康生告诉王力，说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在上海），毛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八月一日《红旗》杂志两篇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看过以后由陈伯达签发的。八月中旬，毛主席批示，说这两篇社论是“大毒草”。同时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且批示：“不用”，退给了林彪。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慌做一团。叶群把毛主席退回来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保险柜，然后叫林立果给江青写封信，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后来是别人加进去的。江青和康生则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主要怪陈伯达。八月下旬，毛主席要追究责任。江青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她把责任都推给王力等人。康生更是出尔反尔，赖得一干二净。他说请示毛主席时，毛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就这样，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串通一气，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成“变色龙”、“小爬虫”，关进了监狱。小野心家、阴谋家罪有应得，大野心家、阴谋家却蒙混过去了。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期间，江青在广州见到钟汉华同志时，恬不知耻地说“我对不起你，我也是上了林彪的当，他是副主席，他上了天安门，我也跟着上了天安门。林彪当时是想一箭双雕，通过‘七·二〇事件’，既打倒陈再道同志，又谋害毛主席。请你转告陈再道同志，向他道歉。”江青以为，用这几句话，就可以把她和林彪互相勾结的一段肮脏关系一笔勾销。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干好事的人，那怕把自己说得再清白，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结 束 语

一九六七年的“七·二〇事件”，是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革命行动，它遭受了残酷的镇压。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是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制度太不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太不健全。经过十年浩劫，我们的党和人民有了血的教训，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愚弄人民、残害人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有了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最后还必须说明一下，我在本文里点到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其中除极少数象朱鸿霞、胡厚民这样的坏人外，大多数群众在当时是受蒙蔽的。我希望并且相信，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北人民，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作者是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原载《中国老年》总第1—5期)

第九十七卷 1967年7月23日至27日

(王光美的检查)

7月23日

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〇事件”。

住在景山少年宫、来京上访的“四川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400余人连日与同住的河南“二七”、湖南“湘江风雷”、武汉“红二司”等造反派发生冲突。本日(23日)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前往制止，无效。武斗继续蔓延。地院“东方红”大批人马赶至。周恩来紧急指示：“北京的学生不要打‘红成’的，‘红成’的应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要打架，快点回成都。”

7月24日

凌晨三点多钟，陈再道、钟汉华一行奉召飞抵北京，住京西宾馆，立即受到三军造反派的冲击。在叶群的布置下，北京街头布满了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和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叶群与江青、关锋、戚本禹等在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下，乘坐几十辆小车绕京西宾馆巡行，以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北京揪刘联络总站下午在天安门召开“揪斗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三十余万人集会游行。揪刘队伍继续扩大，1500余单位参加了揪刘总站。中央文革派人对绝食人员进行慰问，并劝复食。

北京大学揪斗彭真。接连二天，工人、农民、政法干部亦分别开会，揪斗彭等。

谢富治接见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中学校红代会核心组讲话称：在武汉，周总理有四点指示：1、“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组织；2、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3、“工总”要翻案；4、“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武“三司”有点偏保、总理没有公开讲，我们讲了，都加在我们头上，有坏人(陈再道、钟汉华)来北京，在京西宾馆，北航去游行示威了，我们也可以去游行。(《传信录848》)

在接见山西代表时，康生、关锋说：张日清检讨仍不够，你们的苗头与武汉一模一样。公、检、法、人武部干了许多坏事，必须赶快刹车。(《传信录849》)

在林彪的指使下，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写信并将诬陷张学思的材料给江青、林彪、关锋。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是张作霖之子。在东北时曾反对林彪，李诬张学思在海军“推行苏联修正主义路线，忠实执行以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江青等复指张学思等193×年与东北军将领联名经延安新华社通电蒋介石一事，是“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事件”，进行迫害。

戚本禹打电话给新华社，责问为什么把新华社所编的绝密文件发给东北局、西北局及各部“另一个司令部的人”，而不发给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甚至江青。他责令王唯真抓一下这件事。(《传信录850》)

7月25日

下午五时，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前集会，欢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归来

的谢富治、王力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均出席。会前二小时，林彪突然打电话给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大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江青、陈伯达当即表示：林彪此举“十分英明”。会上，林彪说：“物极必反，这一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做文章。”会上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林彪还对萧力(李讷)说：“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林彪借陈再道问题，把矛头直接指向徐向前、徐海东等大批四方面军干部。在萧力的领导下，总政领导干部中分别扣上阎王、判官、小鬼帽子，被揪斗、关押、立案审查者达482人。袁子钦等十七人被迫害致死。

下午，北京高校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揪陈再道，谢富治表示支持。

蒯大富接受王力的示意，召集清华“井冈山”与北航“红旗”两总部联合会议，指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后台，提出打倒徐向前。

康生告诉王力：他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示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此后全国各报刊揪“军内一小撮”的呼声高涨。

晚，在新华社送审的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加上了“坚持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之全国不少地方发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放炮八发、子弹一千七百发，造反派死伤甚多。

7月26日

中央发布关于纪念八·一节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

今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第四十周年。中央决定，今年建军节，要结合当前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结合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结合目前开展的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张旗鼓地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伟大军事思想。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完整、最彻底、最系统、最伟大的军事理论，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最高峰。它是全世界革命人民争取被压迫民族解放和被压迫阶级解放，粉碎一切反动势力的强大武器。正确地宣传毛主席的伟大军事理论，在国外，必将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亚非拉地区，特别是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东南亚人民的武装斗争；在国内，也必将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推动当前的拥军爱民活动，更加密切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的关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宣传要点：

(一)宣传毛主席划时代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学说。宣传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光辉思想，宣传毛主席人民战争的理论，人民军队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宣传毛主席的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二)正确宣传“八一”南昌起义的意义，这次起义是在国民党完全叛变革命之后，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理论基础上，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要大力宣传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宣传人民解放军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在同国内外

阶级敌人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在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人民军队。

(三)宣传林彪副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彻底、最模范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创造性地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领导人民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创造四好连队，把部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等方面取得的光辉成就和丰富经验。

(四)宣传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积极支持左派和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在“三支”“两军”中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为人民立新功。

(五)彻底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罗瑞卿的反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揭露他们同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互勾结，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和策划下进行篡党、篡军的罪恶活动，把目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更深入的阶段。

(六)宣传人民解放军应百倍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侵犯我国的敌人，解放台湾，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七)宣传亚非拉地区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正进行着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几项主要措施：

(一)各报刊隆重发表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语录。重新发表林彪副主席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二)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三)《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报刊发表社论，刊登纪念文章。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对外宣传单位加强对国外的宣传。

(四)部队和地方的文化艺术单位，要适当开展一些纪念活动。

(五)宣传时间，从八月一日起延续到九月初。宣传规模，要比纪念“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大一些。

上午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对陈、钟进行批判，并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全文五条，毛审批时，在陈再道的名字下加了“同志”二字；并批示：“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报如下，请酌定。”吴法宪在会上打了陈再道两耳光，斥责说：“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愤而退场。陈毅、谭震林也相继退去。会后，徐向前、徐海东家被抄。

中共中央就武汉军区党委所拟公告复电指示。这封电报是由毛泽东代拟的。

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①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武汉军区发表公告。

^①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正式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平反。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此后，还发生了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政治事件。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二、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〇”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过去受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影响的群众和干部，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责任由我们来负。你们应当迅速地觉悟过来，向我们的错误作斗争，坚决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

三、立即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平反；向曾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人总部”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其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

四、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谁反对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打倒谁，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一定和他拼到底。我们是作好了一切准备的。任何反扑都必将为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彻底粉碎！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东海舰队向“百万雄师”发出命令，限十二小时内交出武器。

戚本禹接见北京建工学院新、老八一代表时讲话：批判刘少奇，不要限于建工学院和十七年，要从安源批起。批刘可能要一两月，或者一两年。刘少奇该出来的时候，毛主席不会不给，自有安排，水到渠成。（《传信录 854》）

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在北航操场共同主持了约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张闻天陪斗。会后，载上卡车在市内游街。

7月27日

在林彪亲自主持的会议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撤职。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任第一政委。武汉军区独立师番号被撤销，撤离武汉进行整训改编。

中央致信武汉军民。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武汉市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战员们！

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当然，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妄图垂死挣扎，还妄图镇压。因此，你们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万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们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

你们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严办。

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属于我们的伟大的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领袖一毛主席。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凌晨，周恩来、杨成武、戚本禹、吴法宪等第三次接见湖南代表，指出：(1)湖南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中央军委下令改组湖南省军区；(2)由47军派部队进驻长沙，负责主持湖南文化大革命；(3)“工联”等组织是左派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我们信得过。“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应恢复名誉，恢复组织。“红联”、“高司”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4)中央着手组织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周恩来接见江西代表时表示，要打倒江西的走资派方志纯。并指责江西省军区吴瑞山检查不像样。萍乡人武部7月13日包围萍乡煤校，惨无人道。江西不准备实行军管，准备成立三结合筹备小组。

王光美奉命交出检查。

中南海革命群众：

现按你们七月二十四日夜提出的五项问题交代如下：

问一、你的家庭是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什么有意隐瞒说成是民族资产阶级？你父亲是大官僚、大卖国贼，为什么说他“进步”，有“爱国心”？你和国民党反动军官王叔铭的关系？

我父亲王治昌，又名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当过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曾代理过部长。据他过去说他曾长期做教员，孙中山先生到北京时参加了当时的政府工作，开始当职员、签事(?)直至爬到司长、代理部长。后来在北伐战争以前一年左右，为一个叫邢逸三(又名邢瑞)的所代替，就闲在家里，有时也为人(当然系是剥削阶级)做短期的会计师或律师。他在当司

长或代理部长时，他当然是个反动官僚。在一九二一年他出席过华盛顿会议，做为中国代表团(不知当时怎么称法)的成员或随员，出席过巴拿马博览会，可能是主要代表。是否出席过巴黎和会和善后经济会议我不大清楚，可由那时报纸查出，但，我不记得他说去过巴黎或法国。如果他代表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他当然是大卖国贼；如果，他是一般成员或随员，则也是参与了卖国勾当。他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向上爬的时期，大概是我出生到我几岁的时候，听说他最高时每月薪一千元，家中雇工五、六人。解放时，我家所住的旧刑部街三十二号房子就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出生前买的，共四十六或五十间(包括厕所，门洞在内，具体房数可由房管局查出，房契是我母亲董洁如在一九五几年交公时交给房管局的)。后来，又在三十二号房子东边买了一所是二十八号还是二十九号我记不清了，这处有一个四合院和一个大院子，长期出租，日帝占领时卖出。我父王槐青的剥削财产主要是他在当司长时购置的，除房子外，还有些手饰、古董、字画和衣物。从这些方面看，王槐青的成份为官僚。但，这是四十多年前的情况。王槐青当过北洋政府的官僚和我家财产情况，我过去添(填？)表和写材料时都讲过，没有向党隐瞒。为什么我添(填？)家庭成份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呢？我们党并没有在城市划成份，我们参考我们在农村划阶级的办法衡量的。如以解放前三年算或更长一些时间算，一、肯定是剥削阶级，虽然当时有几个兄妹任医生、助产士、……自由职业者，补贴我的父母一些收入，但他们的主要收入是变卖房子、手饰后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利息的收入应属资本主义剥削。二、王槐青当官僚是解放前二十多年前的事。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时间内，他没有与官僚或帝国主义分子合伙搞过工矿企业，也没有开过商店，农村中没有土地，所以，我认为够不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沾不上地主的边。以上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即生产资料占有和剥削收入大体的数量和比例来分析的)。由思想上分析，王槐青青年时代及他当反动官僚时，当然有反动思想，在我记事以后，他在某些事上也不时暴露出有家长制统治，受到我母亲的抵制。但，因他留学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搞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套赞扬过，对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很钦佩，当官僚时又是管的工商司，资产阶级思想更多；虽他曾在四、五十年前加入过基督教(是否是在日本学习时入的我不大清楚，但，我听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曾在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夜校教过英文)，自我记事起没有看他或听说他去过教堂，没有在家中祈祷过，没有叫我们读过经书。但也没看他拜过财神、灶王爷之类封建迷信玩意。没有叫我们跪拜过，表面上对我们兄弟姐妹上学、学什么、参加什么党派、宗派、与什么人结婚均采所谓由我们自由决定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资产阶级的一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我父母中是较多，也给我们较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根据上面这些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分析，我认为我的家庭成份定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是较恰当的。如果，没有发现有我所不知道的王槐青与帝国主义分子或大官僚勾结合伙干了什么经济企业或他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大量剥削勾当和财产，我现在仍认为我的家庭成份定不成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不是京津首富或京津两大富豪之一等等，所以，我没有有意向党组织隐瞒成份和我所知道的家庭情况。我认为城市划成份，确系比远离城市的农村划成份复杂。革命群众如经调查有充分材料证明王槐青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些的时间有更多的剥削罪恶，或有什么构成国际资产阶级附庸的材料，并告诉我，我才能改变我对我家庭成份的看法。

虽然，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我的家庭成份是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反正是资产阶级，是靠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吃穿的，是可耻的，是有罪的。我自己幼年和青年上学时期也是吃的剥削来的饭、穿的剥削来的衣，是劳动人民供养我上的学校。在学校中我又受了多年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我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

问我为什么说我父亲“进步”、有“爱国心”？我对我父亲各个时期是有个分析的。他初参加孙中山的政府时还是有进步的一面，正如主席说过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初期是进步的，以后又会走向反动。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任(?)司长、代理部长一段是极端反动的，

这段历史是丑恶的。从他不当官僚到抗日战争前一段，他基本上过的是没落腐朽的士绅生活，虽然也参加一些家庭内的微弱劳动。在日本占领北京初期，有许多人来找他参加日伪维持会并给他以威胁、利诱，他都拒绝了，我认为这点证明他还是有爱国之心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当然，他是资产阶级，爱的也是资产阶级之国，但，反正没当汉奸要比当汉奸要好些。抗日战争时期，他尝到了做亡国奴的滋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更关心战局的发展，他盼望打败日帝，那是中苏美英联合反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他还是愿意反法西斯的民主阵营胜利的。从他那时期对战局的议论中，可看出他对美国和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后期他曾在北京交易所搞过买空卖空的粮食(?)交易。这种交易所为日寇操纵粮食的场所，王槐青这类行为是作了对日寇有利的事，实际上也是参与了卖国行为。但，同时，他也与我党地下党员开始有了接触(主要是我母亲比我父亲好些)。抗战胜利后，我父亲经过王光琦的关系，对李宗仁是很巴结的，恰象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所说在敌占区有相当多的人对国民党有幻想，蒋介石也在散布这种幻想。王槐青的巴结李宗仁即证明他对国民党有幻想。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接着又举行了旧政协会议，发布了停战协定，共产党的威信在原国民党统治区和原敌占区的人民中威信大增，我父亲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变化。由于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败，物价飞涨，美帝和国民党匪帮的接受大员的胡作非为，使北京许多人非常不满，逐渐丧失对国民党的信任，逐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加上我的家庭中参加革命方面工作的人力量增加，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据说我父亲给予我党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同志一些帮助(主要是我母亲的作用多)。这也是过去我说他有进步一面的原因。他也看了一些进步书(如，我在一九四六年曾给过我父母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和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书)。解放后，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口口声声赞扬；特别是对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的召开等(当然那时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和过渡时期，没有触动他的利益)。特别在吸收他参加北京文史馆为馆员后，中央负责同志请过他一次，又有些负责同志和他谈过话，对他有很大鼓舞和教育。文史馆每月给他若干元补贴，他的生活有固定收入这是几十年来没有的，而且是共产党给的，他是感谢的。对他这段时候，他是既有剥削人民的一面(据说拿过两年定息，每年二、三百元)，又有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的一面。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自一九四九年，我鼓励我母亲开办婴儿托儿所以来，我父亲在他病倒以前，也是赞成的。如果，我在那儿说过王槐青“进步”的话，是指他在民族资产阶级中还算比较进步的，支持我母亲响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号召开办托儿所，力图为人民做点好事。

就王槐青的整个一生讲，他当过反动官僚，长期过剥削生活，骂他为吸血鬼，砸了他的墓，我完全同意。我母亲也过了几十年剥削生活，寄生虫的生活，但，她在解放前后确给我地下党以一些有利的帮助，解放后积极拿出房子、家具等办托儿所，还是办的好事。记得毛主席在第一次新政协会上讲过，在我们困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拥护共产党，而做过一些好事的人，我们是不会忘掉他们，丢弃他们的(原话记不清了)。所以，党和革命群众对我母亲还会与我父亲有所区别的，她在托儿所工作一定有错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但是，我相信敬爱的毛主席和革命群众对她还是会一分为二的看待的。

关于我与王匪叔铭的关系，以前在清理中层运动中和整党运动中，我们专门写过详细的材料，见过几次，说过什么全部报告支部了。那时比现在记得还清楚，在我档案材料中一定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干爸爸。我与王叔铭既无不正当关系，更无政治关系。现把我见过他几次的情况向革命群众再交代一次。

一九四五年秋，王匪叔铭以什么国民党空军王副主任的名义，请了一些国民党飞行员的家属吃饭，名为“慰问”，实为拉拢人心。地点可能在王府井一带的一个饭馆里，主客共有三、四桌人。我家被“请”去的有我的父亲和我。我父亲与王同桌，我在另一桌上。饭后，告辞时是我父亲给我介绍的。王匪叔铭说：“听说你是学原子物理的，这很重要。”没说别的。

他为什么在我们那么多兄妹中单请我呢？因在他请吃饭以前，王光俊（我的五哥，当时在徐州匪空军当中队长）托两个人给我家送了一封信，我由学校回家正在门口碰上他们，他们中有一个叫做吴晓玲（？）也是个中队长。是把我他们带进家里见了我的父母的，他们主要讲了王光俊抗日战争以来的情况等。我是在门口叫门时问了他的姓名来历等，他们也问了我。王匪叔铭请客有我，可能是这两个人汇报或“推笃”（荐？）的。这个吴晓玲后来还找过我几次，我也写过材料，这儿不多说。在新年前后，王匪叔铭曾请我出席过他举行的几次晚会，一次在南池子（？）一带他们住地看烟（焰）火（可能是在这次晚会上，我听说蒋匪经国曾经过北京去沈阳一事，我报告了当时地下党领导我的崔月犁），一次在怀仁堂的舞会（王本人不跳舞，至少我没有与他跳过），这两次参加的均为国民党的飞行员什么的。以后又参加过一次晚宴和舞会，地点是在和平门内公部口一带（是否是大官僚资本家周作民的房子里我弄不清楚），那次主要是王匪请美帝的“顾问”军官的，有一些蒋匪空军和一些妇女参加，我坐在离王匪主人位子很远的一个地方，我旁边坐的美蒋低级军官，我不知他们那个单位的，还有一位妇女据说是燕大学生。明显这次宴会上请的女客，是为了饭后的舞会。这次，与王匪也没有说什么。以后不久，吴晓玲前后给我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说王匪叔铭要“请”我去给他当秘书，我拒绝了，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文学能力不行，当不了。第二次他又打电话很紧张地说，王匪交待让他办的，我拒绝他很难交差，并说秘书也不要我抄抄写写。甚至站在他的反动立场上说：只让你抄一些王匪给蒋匪的报告等，以此表示很“信任”我，话中意思是夸耀王匪同蒋有密切关系。我断然拒绝了，我说我的字写的不好，更不能干了。最后，吴晓玲就很生气地挂上了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找过我。大概在春节以后，王匪叔铭突然带了他的老婆，到我家来拜了一次年，我父母和我都在座，王匪只谈了些问候的话，他的老婆根本没有说话就走了。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王匪叔铭。当时，我拒绝去王匪处，是我怀疑王对我不怀好意，那时，他老婆没有来北京。以后，我把这件事向当时地下党领导的崔月犁讲过，在执行部向李克农同志讲过，如果我那时要是个政治强的共产党员，去干那个工作或可给党弄到不少情报。解放后，有一次我听刘少奇谈起胡宗南的秘书，夫妻俩均为我党党员，起了不少作用时，我也曾说过我若早是个共产党员也许可能地下党会派我去当王匪叔铭的秘书了这类的话。我与王匪叔铭，只有这些来往。

问二：在桃园“蹲点”中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罪行？你为什么打击革命群众、迫害革命干部、包庇反革命分子关景东？

我参加桃园四清的五个月工作中有错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号召和组织大学主席著作、强调工作队的作用、大工作队有包办代替、贯彻和宣扬了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和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不如其他工作队员的方面等。但，我去桃园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间揭发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我参加的河北委卢王庄四清工作队和桃园工作组是根据党中央、省委指示，以“双十条”为武器武装群众搞四清的。我们先后向群众和干部宣讲了“双十条”（草案），桃园四清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草案）的精神：即彻底革命的，在实践中和我的汇报总结中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讲的。在我们实践中深感后十条（草案）清规戒律太多，妨碍发动群众，也有些不好的干部借此抵制前十条的精神，所以，我一方面向刘少奇反映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复强调彻底革命精神，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我不知道我在桃园有什么罪行。我的上述错误和意见，对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修改和制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不好的影响，再加上其他因素，形成了一九六四年冬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判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受桃园经验和总结中的错误影响的，我负责。

我去桃园前，曾问刘我应注意什么？怎么工作？他答“除了要有无产阶级立场、观点、

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外，不要先有框框，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原话见我的汇报总结）他的这个说法我当时只觉得很抽象，没有感觉什么错误，报告中又自以为这个“指示”重要而宣扬过，因为我当时理解党中央的政策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所制定的“四十条”（草案）和人民公社六十条，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关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等等。我根本也不曾想到我们党中央的重要政策决定会有不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或有些甚至是伟大的毛主席所不同意的。现在看来，刘少奇为什么当时不指示我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学主席著作呢？这是刘少奇的严重错误。我虽只带了一套毛选下去，也只是自己读用，与个别工作组员讨论过，向少数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讲用过。而造成我在桃园工作的第一大错误，就是没有提倡和大学毛主席著作，而只广泛、反复宣讲上述各件中央指示“四十条”等，而且宣传过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声音，当时贫下中农就曾反映过，“毛主席真了解我们啊！”（原话见我的总结报告），而且春节后，我自动、积极地挂出了毛主席的像片。

在桃园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没有迫害革命干部，也没有包庇反革命。

桃园四清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底结束，工作组撤出的，以后省委又指派了一个巩固组，省委给他们的任务是摸索如何巩固四清的经验和学习解放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的办法。我曾与个别工作组员谈过，我们四清虽搞得基本还好，但有些人认为搞动买卖，费力小来钱易，因而资本主义搞得不够臭，值得注意。一九六四年夏秋间我接到巩固组寄来的几份简报，有一份讲搞了一次大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其内容不具体。我很想了解他们是如何搞的，经刘少奇同意又去了一次桃园，大概是九月份，那几天，我住在北戴河河北办事处，找了一些材料看，又分别接来一些工作组员、贫协代表、大队干部谈话。除了好的情况外，发现有的大队却借大反资本主义而反了社员群众。有的大队定出了资本主义形形色色多少样：如拔草喂羊、拆炕积肥等等，有的大队甚至要群众对照检查名为“对号入座”，……这些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凡“认真”执行的，就搞的群众人人自危。而他们罗列的这个所谓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中如投机倒把、挑轻工、抢高分……现象，经过四清已经解决了。我曾严肃地批评了巩固组的负责人（发生这段事情时，有些巩固组的负责人回天津了）建议他们要认真检讨并应向社员道歉。巩固组的负责人开始思想不通，直到一九六五年总结巩固组工作时才写了一份不太深刻的检讨。至于各组特别是反社员搞的特别“认真”地方是否向社员做了检讨道歉我就知道了。桃园对借口“大反资本主义”，而整了社员，据说还算搞的马虎，只要大家检讨了检讨，但在我去桃园与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代表和干部的座谈会上，我还代替巩固组做了道歉，并批评了这样做是错误的。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

关于迫害革命干部的问题，在桃园四清中只打击了三个人，一个是原支部书记吴臣是个坏分子，一个是原工委副书记张吉（是吴臣上面的根子，当时我们认为他们是蜕化变质分子，据说后来查出他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而停（定？）为反革命分子）。一个是原大队会计赵学汉（是个漏划的地主，吴臣下面的根子）。除他们外，在评审四类（地、富、反、坏）中，还斗了一些不老实改造的四类分子。对于其他干部，开始时是叫他们根据“四十条”检查自己的错误、交代问题，改正，还挽救他们，贯彻主席所教导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四清是个重新教育人的运动的精神。在他们检查交代时，有些干部态度不老实，曾发生叫干部站着、低头、变腰，甚至发生一起一夜不叫回家搞连续作战的事（对四队原队长李克明）。我们工作组当即制止了这样的做法。这段我们对犯错误的干部虽然也有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的错误，但后来他们检讨了，改正了，经济退赔了以后，干群关系大为改善，大多数干部是团结对象，另有两名干部因态度不好或问题严重，一个开除党籍，一个给以处分，但未带帽子，还是让他们当社员，仍是团结对象。

七月二十四日斗争我的大会上，那位来自抚宁县县大队的原会计的发言中提到我迫害了县水利科长喻仁的事，我在桃园确实批评过喻仁，内容见我桃园四清报告，是否有我了解情况不确而批评错了的情况，可能（因我后来也感到桃园水利投资数太多了，特别在四清后，

违背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方针)，但喻仁对群众态度等等是我亲自看到的，批评不会全是错的。但，是否因我在桃园报告中点名批评了他，而使他在一九六四年冬县直四清时挨了整，或整错了，我就不知道了。在县直四清中，清理一次水利投资完全必要。

一九六五年夏我在定兴搞县直四清时，就有一个水利科科员经过宣讲二十三条和工作组、革命群众对他们做政治思想教育，交出了贪污的七千元(约数)现款的事。当然，如果不对喻仁做政治思想工作，而给他关在小屋里叫他反省，甚至限制了他的自由，如二十四日发言者说的那样，至少方法是错误的。

关于关景东，我们入村时他是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家庭成分中农，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群众和干部反映他的四不清问题不少，但，这个人错了敢于承认。在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找他的几次谈话中，他比较主动检讨、交代了一些问题，并说了有些事做得不好，好象又不应算错误。我曾帮助他分析上纲，并鼓励坚决改正(其他大队的主要干部我也分别找他们谈过，他们没有关检讨的痛快，而且有的不想检讨)。在全公社召开的第一次三级干部会(有贫协代表参加)时，我们动员了大、小队干部在会上检讨放包袱，以起个带头作用。吴臣是不想讲的(当时还不知他是坏分子)，工作组分工由我着重帮助了关景东和女队长彭秀英，他们表示愿意检讨，我就要他们各写个检讨稿，稿子我看过。根据他们过去同我谈话的情况，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曾替他们修改过。(这是我的错误)会上，有几个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发言(他们是讲欢迎干部改正的话)，讲得很好，受到工作队领导的鼓励，对各大队开展四清有推动作用。桃园大队只有关景东在大会检讨了，袁秀英说她不好意思讲，就没讲。关也是受工作队长鼓励的一个。这可能给群众和干部以我保护他过了关的印象，那责任由我负。以后我们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共同调查，与关景东交代的基本相符，大约是双七百(即贪污多占七百元，七百斤粮一均为约数，六百几十斤我记不清了)。后来，吴臣散布关景东问题严重，我们又做了调查，大体仍是那么多，而且由于他退赔积极，努力抓生产等等，所以受到从宽处理，而且在最后选举时反而被选为大队长。

关景东这个人我过去认识，可是不记得了。在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到抚宁县东方红合作社参观过多穗高粱的高产试验田，长的确实好，受到不少同志称赞，当时基层干部估产数字很高，数字我也不记得了。当我们参观养兔场时，当地干部送给我的小孩一对安格拉兔子。小孩们把两个小兔带回北戴河住地，没过几天，一只小兔就因钻到水管里卡死了。我想养不了，再死一只太可惜了，于是我在海滨商店买了一些玩具并带了活着的一只兔子，同我的孩子们又去了一次东方红公社，说明把兔子退回的原因，并在去参观托儿所时把买的玩具送给了那里的小朋友。在这次参观中，我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基层干部和社员都照了几张象。在临走时有个社干部对我说希望帮他们社里买一台电影放映机，他说他们有钱就是买不到。我回家后，报告了刘少奇，他说我们不是有两部小放映机么，一部交放映组(捷克送的)，一部可以送给他们，算我们全家加入东方红合作社的投资，以后小孩可以去那里劳动。我不知向我提要求的人叫什么名字(反正不是关景东)，只记得有个接待过我们的妇女主任的名字 叫陈瑞芝(?)我写了封信给他讲了上述意思，连信及苏联制的一台十六毫米(?)的小电影机一并交由河北省委办事处转交。以后，虽曾再到北戴河，因东方红公社离我们住地较远，孩子们是在别的社参加劳动的，就没再去东方红合作社。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东方红合作社改为东方红公社，后来又建立了东风大公社。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冬，东风公社派了两个人到北京向刘少奇汇报，带了公社或县里的介绍信，刘少奇和我见了他们，他们两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主要是汇报公社化情况和增产情况，刘听了他们的汇报，我不记得他讲了什么。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关景东，他自称我们参观时他是东方红合作社副主任，公社化后担任什么我记不清楚了。这次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后来听说，河北省委知道当时各公社找负责同志要东西或托买东西的较多，曾以刘少奇的名义赠送给东风公社一只兰开夏种猪，并告他们不许再找我们了。这就是所谓我与关景东的“旧谊”。在我参加四清时，并

不知卢王庄公社胥王庄大队和桃园大队就是原东方红公社。在我参加工作组入村前集中学习时，公安厅同志反映说我去过卢王庄，最好不要到卢王庄去搞四清，工作队领导和我商量后，就选了个桃园大队，以为既不在卢王庄，又与部队较近，联系方便。那晓得到了桃园不久才知道桃园有好几个干部都是原东方红公社的，如赵树春(副支书，四清后开除党籍的)，关复顺(原东方红合作社的治保主任，四清中清出有严重错误)和关景东等。在工作组和我自己同他们谈话后，也发现他们见过我但均没认出我，所以我活动很随便。当有人说过关景东到过我家时，我还不信，后来，与关谈话时，他也谈起，我问了他当时的具体情况，才想了起来。在东方红合作社时，关景东确有夸大的地方，我们对多穗高粱也不懂行。以后，参观的负责同志愈来愈多，他们的估产也愈来愈高，甚至发展到县委来抢收时，他们大搞了弄虚作假。这些情况，是关景东和其他原东方红合作社干部在四清后期向我讲的。刘少奇和我并没有欣赏过他们的浮夸和作假，更不会因此而包庇关景东。

至于关景东是否是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在桃园时，他肯定的不是；是否他在担任大队后堕落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看不象，因不断有人到桃园去，桃园也常有人到省里开会，还有此地人到定兴县来过，我都问过桃园情况，大家反映关景东还不错。当然他不是最好干部，支书卢信政治上，生产上比他更好。至于他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什么错误言行，我就知道了，如果做了够得上反革命分子的事情，就该定为反革命分子。

问三：戚本禹同志评《清宫秘史》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哪些不符合事实？你为什么反对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戚本禹同志这篇文章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好得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的。对照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清宫秘史》剧本来看，更感到戚本禹同志的批判是抓住了该电影的三个要害问题：怎样对待帝国主义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事实、有分析，上纲很尖锐明确，文章也写得活泼，符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多次教导的写文章的要求：鲜明性、严肃性与生动性(原话我记不清了)。

戚本禹这篇文章不仅是评那部影片，而主要是揭发和批判刘少奇的。完全赞成对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国十七年来的错误和几十年来他的一切错误言行，一切违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狠批、批透。把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彻底批倒、批臭；以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领域里的绝对权威，使我们伟大的红色祖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并为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树立良好的榜样。

我对(?)刘少奇辜负了我们伟大领袖，党中央、全国人民的重托，未把工作做好，说过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甚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有些话，有些事，简直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刘少奇应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受他的错误路线伤害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请罪，向受他蒙蔽的革命干部请罪，向全国革命人民请罪。

但是，我还没有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假革命”“老反革命”“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吃人的野兽”，“蛇一样的恶人”……。我愿努力提高认识。我相信伟大的毛主席是最了解刘少奇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亲自领导的，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对什么事都能调查清楚，并给以正确的结论。

对戚本禹同志上述文章，在清华大学革命小将审问我时，以及在家中几个小孩向我们进行面对面斗争和质问时，我都讲过有些事实，可能有调查不周之处，不符合事实。但，未详细讲，现将我的这些看法向中南海的革命群众交代如下：

一、胡乔木说：“少奇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我就不大相信。我是同刘少奇一起看这部电影的。当时不知谁动员他看的，说是香港片在北京已上映完毕就要拿走了。当

晚恰在毛主席处开会，开完会已后半夜，有几位负责同志(可能也有胡乔木)一起看的，看到后半部天已大亮，看不清楚。在看电影时，和以后多年，刘少奇从没有向我夸奖过这部影片，更没有说过是“爱国主义的”。大概在今年二、三月间我从乔木处革命群众所写的大字报中，看到乔木借刘少奇的话使《清宫秘史》广泛上演，大为宣传，压制批判等情况。那时刘少奇生病或生病刚好，是我一个人看的大字报，我看了非常惊讶，回来就质问了刘少奇，他说他没有说过。戚本禹文章出来后，我又钉问他几次，他都说肯定没说过，即使他没说过，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严重错误的，虽只看清了半部，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留下片子认真看看。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批了“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刘少奇为什么不督促和重视对这个片子的批判，为什么不找中宣部或文化部等管事宣传的负责人调查一下主席所说的“被人称为……”这个人或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刘少奇当时是怎么看法，但仅只这种不重视毛主席的亲笔信件指示的态度就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二、关于刘少奇讲“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嘛！”我先是由大字报和造反报上看到过这个说法，就问过刘少奇，他说根本没讲过。这次戚本禹文章又引了这个话，我又问过刘少奇，他简单地答复我：肯定没讲过。我同他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二十年中，他没有讲过这个话，也没有讲过带这种意思的话。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一个略有爱国心的人(爱社会主义之国的人)也讲不出这类的话；反之，如果刘少奇是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更不会公开讲出这样的话，那不太露骨了么？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是很重要的，很有分量的，而且引用这句话还用了引号。不知是引自什么人的揭发材料，我百思不解。

三、关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据我了解，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在每个历史时期政策是不同的。在第一、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是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主要的打击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那时的土地革命可能对在我们红色政权巩固的地方，对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采取没收分配的办法。抗日战争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与我们一起抗日，采取了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自我党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后老解放区由减租减息改为搞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我参加的一年土改中，对富农是没收和征收其土地和多余财产的。全国解放后，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主要是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党中央曾决定改变我们对富农的政策，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保护富农，以安定中农，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记得一九五〇年党的三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曾有讨论和结论并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原话我不记得了，在中华人民土地改革法里也是这样定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法报告也讲了这个问题。(原话我也不记得了)后来实践证明，有的地方土改中，富农的土地、财产是分了，有的地方实行了保护政策，但，在以后的土改复查、合作化运动中，实际上对富农还是动了、分了。在一部分和平土改区，漏划的富农、或被保护了的富农问题，在四清运动中也进行了民主补课。所以，所谓“保护富农”只在一些新区暂时保护了一个短时期，根本就没有按“长期保护富农”去做。如果刘少奇在土改报告中，有于三中全会决议不符合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如当时，决定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和理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意了这种政策改变并做过报告。但我记得这个政策的改变不是刘少奇提出的。即使如此，如果刘少奇特别欣赏这项政策的改变，而到处大肆宣扬，也是错误的。

革命群众既要我交代我在那些问题上想不通，我如实地向革命群众交代了我的意见。我到现在还相信刘少奇不会说谎话，所以，我是过分地信任了刘少奇，也过分地相信我自己这些年看到和听到事，老使我扭不过弯来。我承认，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针锋相对的，决不能调和。所以，我同意对刘少奇展开大批判。

我对刘少奇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我经常接触的刘少奇，过去给我的印象似乎是“紧跟毛主席的”，“埋头工作，忘我劳动，一切为了革命”，而现在大量事实证明，他经常违背毛泽东思想。我曾想过刘少奇是否象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讲的那样：“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而如果刘少奇是这样的人就绝不能做负责工作，应将他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最近我又考虑，刘少奇过去比我们一般干部，接触毛主席机会要多得多，直接听到毛主席的指示要比一般干部多得多，而许多重大问题他也是请示报告了毛主席的，但，为什么他不能正确地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正确地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呢？而实践中不是这样，就是夹杂他的私货？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毛主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马列主义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思想体系，而刘少奇因为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决定了他不能正确地贯彻毛泽东思想，经常违反毛泽东思想、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他若是这种情况而又死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就应该把他打倒，并且彻底肃清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流毒。并经过对刘少奇的大揭发，大批判，在各个战线上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我现在就认识到这个程度，望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帮助。

问四：为什么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写了多少回忆录？都是什么内容？保存了刘少奇那些实物？

答：在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同刘少奇结婚后不久，有一次我曾向刘少奇提出要求，希望他在休息时给我讲他过去多年的革命斗争经历，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和学习他，一方面我也想将来把积累的材料写个传记什么的。当时，刘少奇即很严肃地向我讲：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应从我今后给党做的工作了解我。不要写我的什么，不许记录我的材料。你也写不了什么，你既不了解我们党的许多基本知识，又缺乏实际革命锻炼，还根本不了解我们党的历史，写不了，写不好，写了也没用。我当时完全从正面理解他这些话的，还以为他很“谦虚”，而检查了我自己怎么那么轻妄和而不自量。他的这些话，到现在对我还有影响，妨碍我认识他的本质，也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不能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大野心家的原因之一。

以后二十年来，他的确很少向我和孩子们讲他的历史。只有在随刘少奇到各地时，他的老战友们和他谈起过去在某地学习和工作时，我听到一些；有些旧谊亲友同他谈话时他说一些，偶尔大孩子们问到个别事情时也说一点，这些我听过一些。只有一次他和我谈过他的家庭、幼时学习，五四运动时期到北京，后又到保定育德中学半工半读、去上海俄文补习班后中国共青团(C、Y)派他去苏联学习等情况。那是在一九五几年我忘了，我靠回忆零乱地记在一个本子上了。这个本子是个黑色皮活页本，原来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前几个月开始清交文件时，我把它拿出放在我办公桌左角处，原准备拿出再看看，后来因看批判文章、几次写检查，也没顾得看，都记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请查我那个本子。

过去档案馆曾要我问刘少奇过去曾用过什么笔名，他说他也记不太清楚了，他说了几个，我转告给了档案馆，我自己也留了个底子，是否夹在上述本子中或在那个抽屉中，记不清了。

随他外出时，听地方各同志汇报和刘少奇插话时，我曾做过记录，都在我的笔记本上，因刘少奇不许我整理，我也没有整理过。

刘少奇到各地讲话记录，有的地方给过我，有的是机要室给我的，前些日子清文件时，我曾汇集了一些放在刘少奇办公室的圆桌上，准备供他清理思想之用。

去各地视察时，有的地方有公开报道，我前些日子曾从办公室旁小屋中清出一部分，准备清理思想时用，还未来及看，现在我床头一堆报纸下面。

我到乡下工作两年间，刘少奇给我的信，和去前，回来时给过我的指示，有的经回忆记在日记本上，有的记在零碎纸上，夹在两个本子中，是黑皮笔记本，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中。但，那本子中夹的不全是刘少奇的话。

在我下乡工作的两年中，刘少奇说孩子们由他管，他曾同几个大孩子谈过几次，有时他的大儿子刘允斌曾做过回忆记录。有的我在场时，我也简单记过一些，做为我改造思想之用。这些均在我办公桌右手的抽屉里或桌子上。

经我保存的还有刘少奇过去的一些报告，文件的手稿，都在我办公室的黄色柜子中。

过去刘少奇用过的东西，我保存的有他少年时读的一套古书(名叫乌凡纲鉴^①)，是我一九六一年到湖南宁乡花明楼时看见的，因刘少奇不叫在那展览，我说由我保管就要了来。这本书我没看过，原想看看，没读成，只翻了几处刘少奇加过圈点处，这本书现在我办公室黄色柜子中，另，我同刘少奇结婚时他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只有三件，一件是灰色布面羊皮大衣(一直在卫士同志处保存)，一只旧表，一只旧钢笔(大概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里)。

问五：为什么要两次销毁罪证？销毁了哪些东西？

我销毁了一些东西，不只两次我党(?)是犯罪行为，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行为。是没有彻底革命决心，对彻底揭露自己灵魂怕痛，不管动机如何，为了怕多出丑反而增加了错误，使事情复杂化，更出了大丑，甚至是犯罪行为。现将我几次销毁的内容和大体时间交待如下：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处理了一些清华工作组时的材料：有学生写的揭发、交待材料，如新水楼会和荒岛会议等材料，(均系复写的)，还有校、系工作组编的动态(印的)。是我分两批撕掉(毁？)由抽水马桶冲走的。

(其余清华大学工作组发的材料中，关于揭发和整理校党委的材料和我们工作组内部材料、大字报选编等，均在十月下旬(?)经总理办公室转工作组叶林同志了)。

在一九六六年底或一九六七年初，我撕掉了一些旧相片，把我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产假时贴过两本相片本，我又翻看了遍，撕掉了一些相片，分两回冲走的，以后我又翻看了一些零散的相片，又撕了一些，也冲走了。其中，有我小时和学生时代的照片，还有几张一九五二年我陪同刘少奇在苏联休养时的照片等。现在相片本和其他很多照片均放在床头小柜里。其中小孩子们的照片是他们自己清理的，我的清理，是在他们清理以后一段时候，零散的照片很多，我只看了一部分，都有些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另，在我办公桌抽屉里还可能有些，办公室旁小屋柜子里还有一些。

在一九六六(七？)年一月，即马桶堵塞那次，我是冲了一些小孩子们过去演“采茶扑蝶”、“织女穿梭”等节目用的一些假饰物，如项链、别针和假花等，还有刘允斌送我的一个淡蓝色项链(玻璃的)和我在一九五二年去苏联时带的一个假别针。原来这批东西，我在破四旧时曾说过什么时候我清交保育员和孩子们去处理，那时，因我经常在写检查没找出，在清华革命闯将“智擒王光美”以后感到还是扔掉好。

在四月十日清华大学斗争我以后，我把清华学生过去给我的来信清理了一次(也不全)，把七月底，八月初保工作组，和写给所谓“敬爱的王光美同志”的信，连信和信封全撕了，冲了两回。以后我又清了我去清华工作时带过的小灰箱子和黄背包，又发现有一些思想通讯(当时的保守派写给我的信和条子)我又撕掉冲走了。

最后一次，即七月十八日，我发现在我桌子上还有一封信，过去看过没撕，那大概是十月左右，重庆大学一个学生给我写的信，转抄了两份清华南下串连会在重庆给我贴的大字报。我当时看后在信封上用笔写了几个字，好象是“寄来两张大字报”或“抄来两张大字报”。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四月清理一部分信件时，就没有看它。十八日我拿出一看，其中也有写给所谓“敬爱的光美同志”的一封信，意思是说清华的这两张大字报在重庆山城引起轰动，他联想到重庆的情况，觉得不可能或有怀疑，要我回信给他。信内有他的系别和名字，我不

^① 疑为《了凡纲鉴》。

记得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他那时想不通也不奇怪，但，我当天听说要面对面开会斗争我和刘少奇的情况下，感到我的问题更严重了，还是少牵连一个人为好，我把这封信拿出和另一张别人给我抄的大字报(即七首两只)一齐撕了，冲掉了。原来想把信封扔在厕所的纸筐内，后来又看到有王光美同志亲启的字样，就叫我给撕得粉碎扔在厕所里，还未来及冲下去小贾同志就闯了进来。碎片我后来捞了出来，要交给南海卫东造反队，他们不要，我就把它凉干后包起放在衣袋里，十九日我发现这个小包没有了，据值班同志说已交给革命群众了。原写来的两张大字报在七月十八日这件事发生后，我交给南海卫东造反队李智敏同志了。我原想少牵联一个人，这个人我又不认识。但，因为事情恰恰发生在知道要斗争刘少奇和我的那天上午，不能不引起革命群众怀疑这个人与我有什么特殊关系。现在信封，大字报均在，终可查清是什么人写的。这个人当时对我犯了严重错误有怀疑，并不奇怪，最多不过是个保守派的学生群众，也许他现在已是造反派了。我和他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是不难查明的。我现在也没法解释为什么当时要撕掉这封完全不应扔去的信。办了极蠢极蠢的事。

撕毁和冲掉上述这些东西的思想动机和行动都是极端错误的。我没话讲只能向革命群众，向党，向伟大的毛主席低头认罪。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王光美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

河南发生“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查“百匪”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残百余人。

外交部抗议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破坏中捷文化合作协定。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因涉刘少奇案，由江青、康生批准逮捕。

第九十八卷 1967年7月28日至31日

(刘少奇的答辩 河南问题)

7月28日

陈伯达、谢富治接见武汉“三钢”、“三新”、“三联”造反派时讲话：对敌人要狠，对少数不可救药的坏蛋象王任重、陈再道要打倒。（《传信录856、857》）

陈伯达、谢富治对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代表谈话：对聂元梓、孙蓬一不要上纲太高，要帮助她们。清华“4·14”不要与蒯大富太过意不去，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传信录858》）

谢富治在政法口讲话，说：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毛主席给我讲了不止十次八次。在二三月黑风中，做了不少坏事。支持造反派的少，支持保守派的多。公安部要狠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传信录859》）

戚本禹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出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少奇）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立即得到江青批准。同日，中央504专案组（即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吴某等二人飞赴沈阳，成立彻查办公室。先后查阅了东北三省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与报刊资料，然一无所获。

首都及在京造反派数万人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捣毁刘邓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在人大召开赴广州问题串连会，组织“首都战广州兵团”，前往广州揪军内一小撮，矛头指向在广州打击造反派的黄永胜。

7月29日

刘少奇就戚本禹文中所提八个问题作出答辩。

刘少奇对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疯狂反扑

—刘少奇的又一“检查”—

按语：

我们燃烧着满腔仇恨怒火，公布刘贼的又一个所谓“检查”。

这个“检查”，比七月九日交出的那份“检查”更疯狂！更凶煞！更赤裸裸地暴露了他那副穷凶极恶、狗急跳墙的狰狞相！

这个“检查”，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代表他的狐群狗党，向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公开挑战，是一次最系统、最恶毒、最疯狂的反扑！

在这个“检查”中，刘少奇集中了几十年来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捏造事实，篡改历史，攻击诽谤，打起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的破旗，栽赃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他竭力推翻他是老反革命的定论，全盘否定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对他的严正宣判，妄想卷土重来，恢复他已失去的“天堂”。

革命的同志们，敌人拿起刀，我们也要拿起刀，这个刀就是革命的大批判！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刘少奇这个落水的疯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叫他遗臭万年！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誓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

《新八一》编辑部

南海革命造反大队的同志们：

你们一九六七年×月×日给我的紧急通令，限刘少奇于×月×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写信二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塞进去的私货，以下凡打上·者都是王光美亲笔写的)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浦)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知道狱中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还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了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二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四、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映着我国主要的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的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表示反对，但已来不及修改，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的指导方针，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场上退了一步。

五、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说。”“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此种意见出笼，事后是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六、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去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七、一九六四年夏，我在几个城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十月二

十三日，我在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路线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导我要读的其他著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这个问题，并认真的在革命群众的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签字）

67年月日

周恩来接见二机部九院代表，要求造反派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上要高姿态。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夺委会勤务组及院革委会全体成员、宣布同意在7月30日成立院革命委员会，陈伯达任名誉主任委员。粟裕、王建中等六人为军代表。郭沫若、竺可桢、吴有训参加革委会。

中央机关及大专院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会场上有“5·16分子”散发传单，当场有四人被捕。

彭真向新北大革委会交“认罪书”：

北大革委会：

我二十四日参加北大群众斗争大会后，即决心努力争取三天把检查认罪书写出来，至少写出个初稿，再作修改。但事与愿违，实际怎么也不可能做到。因为北大群众斗争我的大会，第二天、第三天，接连是工人、农民方面斗争我的大会。今天上午、下午政法方面群众斗争我的大会。我的脑筋、精神无论如何不能不跟着群众斗争我的大会跑。会后，我即竭力把思想集中到北大问题上，但总是不能很快集中，而是感到脑筋很迟钝，发木，工作效率极低，同时体力也来不及了。中间只有两天(27、28)没有参加群众大会，一天我奉命继续写前几天党中央办公厅要我写的材料，昨天才集中精力写关于北大问题的检讨，只写了一部分(初稿)。现遵命送上一阅。这一部分，我自己觉得需要重写(意思还要用)，需要把我北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通盘考虑安排后，才好一起写下去。如果明后日没有群众斗争大会的话，我努力争取写出，至少争取写出个初稿，但时间确实太紧了，很不够。因为我不愿意匆促地敷衍了事地写检讨给你们或中央。我请求延长二天到三天时间，不知可否？因时间紧迫，初稿和信都写得很了草，请原谅。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彭真

1967年7月29日

(此系一段初稿，还要改写，现遵命送上一阅)

工作组在北大进行工作时期，我的主要错误、罪过，是支持陆平等人的领导，即包庇陆平等，同时压制了北大的革命群众，压制阻挠了已经开始起来的群众革命运动。我在北大问题所犯的错误、罪过，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或在一些个别性的具体问题上的错误，而是一种

根本性质的错误，特殊性质的错误罪过。实际上，我当时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是实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政策，是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政策，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样我就在当时北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站错了边，走错了路，堕入了群众革命斗争对象的泥坑、反动窝子了。根本问题错了，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言论行动中，即不能不错。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我当时实际上是实行了这样的政策。这样，许立群、邓拓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的工作错了，万里直接领导的解决北大问题的国际饭店会议(民族饭店)也就错了，都作了错事，犯了错误、罪过。当然，他们各有他们的责任，但工作组和国际饭店的主要责任在我，主要罪过在我。因为他们是在上述错误、反动的指导思想、路线、政策下进行工作的，而这种指导思想、路线、政策，它集中表现在对当时北大领导陆平等人的态度即方针上。这虽然是集体的意见，但在确定时，实际是我起决定作用的，而且我又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所以错误罪过的主要责任在我。当然，我不是说，北大问题上的一切错误，都由我一个人包下来，不是，参预北大问题的其他犯错误的负责人，各有各的责任。但不管他们对错误的责任大小，也不管对解决北大问题的具体工作参加得多少，都不能减轻我的罪过。

王洪文作出砸“上柴联司”的五项决定：

1. 设立临时指挥部。
2. 这次行动的代号为 888。
3. 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
4. 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各组分口。
5. 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同时还制定了一个“G 号行动计划”，具体安排了埋伏、袭击、围攻和捉人等行动方案。

7月 30 日

毛泽东批准《关于甘肃问题座谈会纪要》。

退林彪同志：

此件已阅，很好，照办。

毛泽东

七月三十日

呈主席批示。

林 彪

七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示：

中央认为《关于甘肃问题座谈会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中央同意《纪要》中的六条意见。

关于甘肃问题座谈会纪要（摘要）

(一)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二·五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同志(甘肃省军区司令员)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五月，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兰州军区政委)等的汇报，提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四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照办。詹大南同

志竟然对“四条”进行抵制，并给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改变“四条”。

这次来京，经过中央谆谆教导，詹大南同志认识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詹大南同志应做公开检讨，挽回影响。

(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必须认真传达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

(三)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等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管，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洗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员，预计二十人左右。

(四)正确对待三大派群众组织。坚决支持红三司，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红联。积极地、艰苦地说服教育革联，端正大方向。

(五)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彻底批判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历史看，西北是彭真、刘澜涛多年经营的反革命政变据点，彭、高、习的恶劣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在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吕正操的黑手又伸向了甘肃，企图保汪锋，实际也是保自己。因此，甘肃的阶级斗争很复杂，任务很艰巨。

我们建议党中央批准在《甘肃日报》上点名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薄一波、吕正操、刘澜涛、汪锋。

(六)大家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以张达志、洗恒汉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三支”、“两军”必须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

周恩来、康生第八次接见河南代表，最后签定解决河南问题的协议书。军区支左犯了错误，主要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负责。调原十五军空降师政委王新志到河南，帮助刘建勋做军区工作。(王在武汉事件中保护谢、王有功)(《传信录 861、862》)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新的考验》，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周恩来、陈伯达、李富春、聂荣臻、粟裕、戚本禹等出席祝贺，周讲话：号召打倒张劲夫，搞好斗批改。他为陈伯达谢绝担任名誉院长而表示歉意。(《传信录 863》)

蒯大富召集有全国大部分省市和军事单位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全国形势讨论会”，会后派出二百多人分赴全国，对徐向前进行调查。企图把打倒徐向前的声浪推及全国。蒯还策划了绑架徐向前的计划，不成。抢抄了徐的家和办公室。

7月31日

关于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指出：朱德要出席，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师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历数罗瑞卿的种种罪行，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罗瑞卿。

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布紧急通告。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紧急通告

正当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猖狂反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彻底粉碎混进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罪恶阴谋，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赤胆忠心，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持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败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狂妄的进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七月二十七日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这是对我们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巨大支持和亲切关怀，是对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个沉重打击。这封信，是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是我们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行动指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些指示最热烈的拥护，一定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执行。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的指示，为了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伟大的新胜利，特发出紧急通告如下：

一、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二、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勇敢地挑起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作“节约闹革命”的模范。

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解放军，我军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共同担负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担，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谩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把仇恨和斗争矛头狠狠集中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五、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都是把“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严格区别开来的。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热情地欢迎“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迅速猛醒，起来造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工人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五、对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不再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卖力，改邪归正，我们同样给予出路。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将给予严厉的打击，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惩处。

晚，上海“工总司”对“上柴联司”进行了突然袭击。“工总司”以左臂扎

白布条为标志，出动了一百多人突然袭击“支联总部”，把正在开会的三十多个人全部抓走，关进了杨树浦公安局。

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说湖南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副司令员刘子云、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崔琳支持保守派“高司”干坏事，所搞“湘江风雷”材料不确。47军军长黎原表示：长沙武斗越来越凶，47军将出面制止。

7月末

毛泽东看到徐向前家被抄的简报，批示：对所有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及其家属，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批示：同意主席批示，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在总后大院召开五万人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杨勇等二十多名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并动手“触及皮肉”。

7月底8月初

揪刘队伍日更扩大，北京近2000个单位的造反派连日围困中南海，声言揪出刘少奇，要刘少奇“滚出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戚本禹前去表示支持。

很多省份发生群众抢夺解放军枪枝、弹药的事件，甚至抢劫战备仓库、拦截援越军用物资。湖南、广西、浙江、河北武斗益烈。

第九十九卷 1967年8月1日至5日

8月1日

《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文章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在“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鼓动下，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支弹药的事件愈益发展。军方亦擅自向支持它的群众组织提供武器弹药。两派斗争，许多地方演为内战。有的地方，地方与军队对立，进而发展为军队与军队间的对立。有的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武斗。这篇社论旋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还我长城。”这篇社论的起草者为林杰，在陈伯达主持下，向关锋、王力念读通过。“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最早见于年初《解放军报》的一份宣传要点，其清样上署名者为胡痴、王力、关锋、唐平铸。（同时可参见五十六卷1月10日条；亦见九十七卷7月25日康生告诉王力，汪东兴曾请示毛泽东，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节录）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以自豪的心情来纪念建军节，纪念我们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的战斗的胜利的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的举世无双的最强大的革命军队。

一九二七年八月，在国民党完全叛变革命之后，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九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亲自领导农民暴动，举起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中国人民开始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开始有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红旗卷起农奴戟”。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和我军的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开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发展。它不仅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出了争取真正解放的康庄大道。

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一样，一贯反对武装斗争，鼓吹议会道路，大搞投降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主张把人民军队交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去“领导”。抗战胜利以后，他公然主张把人民的军队拱手送给国民党反动派。

毛主席彻底批判了不要人民军队、不搞武装斗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创立了最完整、最科学、最伟大的军事学说。毛主席在

古田会议决议和其他一系列的军事著作中，制定了一条真正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的最高峰。这是世界革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的最强大的武器。

毛主席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总结。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真理日益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的民族所掌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革命人民，正在奋发起来，踢开机会主义的领袖，勇敢地拿起枪杆子，建立人民的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大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大造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同旧世界进行英勇顽强的大搏斗。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也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牢牢掌握军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有失去政权的危险；同样，建立了军队以后，仍然有失去军队的危险。如果失去了军队，军权被坏人所篡夺，那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争得的一切，就会全部丧失。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军权，实行反革命政变，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彭德怀、罗瑞卿是他在军队里的代理人。彭德怀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饶漱石一起，结成彭、高、饶反党联盟。一九五九年，他又是党的庐山会议揭露出来的反党集团的头子。罗瑞卿也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同彭德怀、彭真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顽固地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无耻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全国胜利以后，他们进一步勾结起来，拼命抓枪杆子，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使人民的军队变成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灵魂，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指南，是我军永不变质的根本保证。彭德怀、罗瑞卿之流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了篡夺军权，首先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彭德怀恶毒地攻击说“毛主席著作只能作参考，不能作为指导作战、训练部队的指针”。罗瑞卿胡说什么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他还大肆推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养》，吹捧这本书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要全军干部战士“好好学习”。

彭德怀、罗瑞卿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在军队里培植私人势力，树立个人威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里通外国，阴谋篡党、篡军。彭德怀搜罗一小撮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的旧军官等牛鬼蛇神，结成反党集团、反革命的“军事俱乐部”。罗瑞卿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结成反党阴谋集团。他们私自封官许愿，拉一批，打一批。他们做尽了坏事。他们力图在军队里搞反动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这一小撮人处心积虑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反对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

总之，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这些家伙，力图用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军队，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枪杆子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我们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在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军队的斗争中，在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德怀、罗瑞卿等篡军阴谋的斗争中，林彪同志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这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中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进一步促进全军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进行军管、军训等工作，为人民作出了新的伟大贡献。

有的地方，当地驻军的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只要认识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改正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自己也就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如果有人坚持不改，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错误的性质也要起变化。

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要善于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不断地改进支左工作。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依靠和爱护人民解放军，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对于当地驻军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在支左工作中，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要严格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重要保证。大家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凌晨，周恩来发表了有关贺龙的讲话(摘录)：

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你们要收集材料搞历史。我每天出入都看到你们揪贺龙的指挥部，贺龙他制造材料，说他一贯跟毛主席走，是一贯正确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你们要攻他的要害。

研究问题要研究点历史，南昌起义是贺龙参加的，总算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了第一枪，虽然不是党员，我们还是欢迎的。当时他是在二军，叶挺在十三军，南昌暴动大方向是对的，拉起武装打了国民党第一枪，但没有就地发动农民，没有建立根据地，在大方向对的前提下，犯了政治错误。一是城市观点，还想回广东，攻打大城市，先打广州，后打汕头；另外依靠外援，请苏联帮助，这两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犯了严重错误，不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两个胜仗马上要打败仗，最后失败了。贺龙的军队全垮了，因为他们是旧军队，主要力量受损失。到了海陆丰搞农民运动，留下了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在留下的部队当营长，陈毅也在，经朱德同志拖到井冈山得到了毛主席领导。尽管朱德以后犯了很多错误，毛主席说这一点是有功劳的，所以今晚参加了宴会。(七月三十一日晚于人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贺龙就不能参加，要区别对待。贺龙部队打散了，到了上海，有两条路线：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回家，当时没有消极回家的态度，他还想搞秋收起义，毛主席说要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湖北建立了两个游击区，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洪湖。洪湖赤卫队写贺龙，实际头子不是贺龙，为什么洪湖赤卫队得到农民拥护，因为头子不是贺龙。他没有采取回家的态度，也没有采取到苏联学习的路，他也学不了什么。贺龙在湘西桑植建立根据地，八月一日武装起义后，开了八七会议，搞秋收起义，毛主席参加八七会议以后，领导了秋收起义。派了二三个人到洪湖，派的是和林彪同志在一起学习的段德昌同志，段德昌同志把它搞起来了。贺龙二七年底回到湘西，也搞起来了。二八年底他们就会合了。这次我到武汉，

听群众说这二股部队完全不同，洪湖是农民武装，湘西有土匪，二股部队在政治发展上就有差别。30年发展到立三路线，第一次打长沙，由于偶然性，没有失败，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认为执行了立三路线取得了胜利。第二次进攻长沙，彭德怀主张攻打长沙，毛主席不同意，二军团贺龙赞成，段德昌不赞成，主张保持洪湖根据地，贺龙带部队攻打长沙失败后逃跑了，从长沙一退退到湖北的角上，实际上是执行了立三路线，先是冒险主义，后是逃跑主义，段德昌二次都不赞成，不赞成冒险也不赞成逃跑，坚持洪湖根据地。

三年连续三次反围剿胜利，活捉了张辉瓒，证明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取得了胜利，错误路线的失败。

三二年还是三三年，肃反第一个就把段德昌杀了，说他是“改组派”，实际上他是很好的同志，是洪湖地区的创始人。解放后讲起这事才平反了。贺龙说这问题他不负责任，把责任推给夏曦同志。肃反的负责人是贺龙、夏曦、关向应。贺龙是头子，我曾找他谈过话，说肃反是贺负责，贺一直认为由夏曦负责，这次他才承认错误。这次到武汉，部队一同志说，打死段德昌起决定作用的一票是贺龙，我说这句话很公道。

两个结论：贺不是一贯正确的，在湘西执行了立三路线，肃反扩大化。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贺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是一功。但他对过去的错误不承认，说他是一贯正确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主席不要面对面的斗，这是战略问题，要照顾这一点，这是毛主席的政策，……你们说服大家背靠背的批判，多作一些调查。

《红旗》第12期转载7月22日《解放军报》上由林立果化名(红尖兵)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论人民战争》语录，并重新发表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凌晨，首都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武汉市造反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五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渡江活动，历时五个小时，长江两岸、大江之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声，此起彼伏。四百人被溺死亡。

8月1日出版的《批陈战报》登载：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几百人，在外交部前日夜僵持，要求揪斗陈毅。批陈联络站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8月2日

首都红卫兵战士和革命群众一万余人，今日下午在人大会堂集会欢迎由姚文元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周恩来在欢迎中国红卫兵代表团会议上，向工农兵体院代表讲话，说：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负责。贺龙要背靠背斗，这是最高指示。（《传信录872》）

周恩来、戚本禹第四次接见湖南代表。指出2·4批示是错误的，在执行2·4批示时大捕、大肃流毒，更加错误。各军分区要认真检讨改正，对被煽动进城的农民要劝他们回乡。乱抢粮的现象必须立刻制止。（《传信录873》）

工代会、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及全国各地在京造反派，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声援新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坚决支持“红二司”等组织。

武汉造反派赴保定战斗队发表声明支持保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赴保战斗队严正声明

当前河北省保定市和全国一样，革命形势欣欣向荣，一片大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光辉指引下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冲决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击败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阶级敌人实行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惊慌万分，他们气的要死，恨的要命，他们时时刻刻都想扑灭革命烈火，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地镇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鉴于目前保定的形势，我们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赴保战斗队特发表如下严正声明：

一、我们认为驻保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八〇〇部队，是保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后盾，是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模范队伍，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彪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二、我们认为保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河北保定红代会，农业大学红色造反团等革命造反组织，是保定市的响当当的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组织，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我们认为保定目前武斗风是一种极不正常现象，这是河北保定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挑起的。我们坚决支持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派对那一小撮挑起武斗的混蛋，所采取的一切革命行动。

四、我们严重警告河北保定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你们胆敢挑起武斗，立即让你们粉身碎骨。我们对武斗中死伤的革命造反派及其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五、我们一向认为，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武斗有罪，自卫有理。我们坚决支持保定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还击一切来犯者，用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一切保守组织，团结受蒙蔽的广大群众。

六、我们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赴保定战斗队庄重申请加入保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坚决和他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特此声明。

8月3日

林彪在接见杨得志时作重要指示：

现在，一种是内蒙、青海的形势；一种是像你们那样，认错早改。要相信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要相信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毛主席对下面来的报告、电报，看得很仔细，对下面的情况了解的很清楚。红卫兵的报纸，主席都亲自看。

对主席的指示，最好是思想上能理解；如不能理解，就照办。如果什么都理解了再办就迟了。我们最好是不错。有的人错到底；你们未错到底，用你们的办法坚决改过来是对的。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只有毛主席才能发动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大革命过程中有些乱，临时乱一下不要紧，打仗还不是要伤亡人吗？只有在乱的当中，好人坏人才能暴露出来。

主席的政策是成功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对武汉、江西，都是主席下的决心。再三证明：主席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最聪明的是主席，我们这些人都是有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如此。

我们要坚决跟上靠下。跟上有点赶不上，只好照办。横直照主席的执行。你们随时要有报告，主席是有回答的。要坚决地跟两头，尤其是跟上头更重要。

局部要服从全局。你们早检讨早转过来是好的。迟转不如早转好。

(济南军区党委已于八月六日将这一重要指示印发给团以上党委，要求向全体干部传达，并发出贯彻执行的通知。)

周恩来在接见贸持会时讲话，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要适合外国的觉悟水平，使他们能够接受。又：主席要我保余秋里，现在余秋里同志被批成这个样子，我还要保他。余秋里是忠于毛主席的。（《传信录 877》）

首都中学红代会召开掀起大批判新高潮誓师大会，大会通过了给全市中等学校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一封信。

戏剧口所属的十二个单位分别在中南海北门安营扎寨，共同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

上海市革委会派宣传队到上柴宣传，被“联司”包围，双方又起冲突。

8月4日

毛泽东给江青信中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是支持右派的，提出要武装左派，决定发枪，搞第二武装。此信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又，当时广东夺枪问题严重，林彪主张起草一个严禁夺枪的通告，因毛不同意作罢。毛认为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毛泽东就《毛选》重版时对一些被打倒的人称“同志”应如何处理的请示批示：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有些注释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等五组织，批准在8月6日在外交部批斗陈毅。戚本禹在这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保过他，这是二月份的事；如果他当时不翻案，早就过关了。

李富春接见煤炭部造反派，指出生产下降厉害，必须狠抓革命、促生产。全国十大煤矿，两大组织：“东方红”与“井冈山”各去五个，了解情况。

谢富治在政法界批斗彭、罗大会上讲话，说：现在有人要搞第二次第三次大串连，清华又走了五千人。前一阶段到处抓武老谭，现在到处抓陈再道。我们应该抓住大批判这一大方向。（《传信录879》）

揪刘声浪益形高涨，数十万人集会天安门。

我兵团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纪念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

誓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

巨浪冲天哮，狂风卷地吼，一场揪斗刘少奇的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同仇敌忾讨刘贼 吼声震撼北京城

八月四日晚，首都工代会、农代会、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代会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一千多个单位共几十万人汇集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同仇敌忾声讨中国赫鲁晓夫。会场上，红旗舞长风，凯歌彻云天，处处洋溢着战斗的气氛。

大会发言以铁的事实揭穿刘少奇真反革命假革命的面目，痛斥刘贼无耻抵赖自己的罪行、嫁祸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卑劣伎俩，决心在八月五日把刘贼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

大会声明，刘贼已完全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他绝对逃脱不了彻底灭亡的命运。

挺戈跃马赴战场 风餐露宿志愈坚

连日来，我井冈山一批战士挺戈跃马、雄姿英发奔赴中南海揪刘第一线。战士们不顾疲劳，日夜奋战，盛夏当空的烈日，烤得人们汗流如雨，战士们席地而坐，秩序井然，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的教导如雨露滋润每个战士的心田。每日凌晨，经过一夜奋战的战士又高唱战歌，朗读毛主席语录，迎来了冉冉东升的朝阳，他们拿起笔写批判文章，画宣传画，召开小型批判会、斗争会，表演文艺节目，又开始了一天的战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井冈山人，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红小兵的战斗风格。

风雨无阻大示威 口诛笔伐批刘贼

七月三十一日，我兵团战士从广播中听到刘贼又一份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猖狂反扑的“检查”时，一个个义愤填膺，怒气冲霄。他们立即跑步出发，向刘贼大示威。

八月一日，我校近千人参加了天安门前几十万人大集会，声讨刘贼滔天罪行。首都革命派表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刘贼揪出中南海。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我井冈山战士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由天安门到平安里，一路上“打倒刘少奇！”“刘贼滚出中南海！”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几天连续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战士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无论是酷日当空还是暴雨倾盆，也无论是长途的奔跑还是夜间的激战，战士们依然精力充沛，毫无倦意。

千仇万恨凝笔尖 革命工人斗志昂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揪刘战斗中，我校工人以冲天的干劲站在斗争的行列。

中午，工人师傅连觉也没睡，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大量印发批判刘少奇的材料。师傅不会画，就找土建系的同志帮忙，有的师傅从来没有刻过蜡版，但为了斗倒刘贼，卷起袖子拿起铁笔，把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丑恶嘴脸刻出来，把心头无比仇恨写出来！整个车间变成了战场，洋溢着一片战斗的气氛，大家都为揪刘贡献自己的力量。

综合机械厂的工人们经过了一夜的战斗，就写出了一百多份批刘贼的大字报。铸工车间的金师傅冒着倾盆大雨来参加战斗，郑师傅脚长脚气，走路很困难，但他还积极要求去参加大会和示威游行。

中央首长到火线 殷切期望怀心间

毛主席、中央文革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揪刘火线的战士巨大鼓舞，谢副总理、戚本禹同志亲临火线，我井冈山战士和其他单位战士无不欢欣鼓舞。一张张神采焕发的脸孔，一双双闪动着激动泪花的眼睛，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请毛主席您老人家放心，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斗倒头臭，誓不罢休！

(原载清华《井冈山》70、71期合刊，67.8.5出版)

揪刘火线传凯歌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兵团自六月三日在中南海周围打响批揪斗刘少奇第一炮，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风起云涌，纷纷奔向中南海揪刘火线，誓与刘贼血战到底。为了纪念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表示誓把刘贼揪出中南海，我北航红旗战士与清华井冈山兵团、建工新八一战斗兵团等革命战友，从七月三十一日开始，在中南海西门与北门，并肩发起向刘贼连续声讨、批判的强大攻势，并于八月四日晚由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揪斗刘指挥部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两千五百多个单位、近六十万人的“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批审刘贼大会”。经过揪刘火线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在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由市革委会与四代会于八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胜利召开了声讨刘贼的百万人大会，并责令刘贼在中南海里受审，同时由中南海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刘、邓、陶分三个会场进行了斗争，刘贼丢魂丧魄，丑态百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目前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揪刘火线各路大军，已陆续撤回本单位，转入对刘贼更加深入的大批判。

(原载北航《红旗》第六十期《红旗雷达站》1967年8月12日出版)

解放军各总部及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造反派斗争了彭德怀、黄克诚、谭政、刘震、杨勇、苏振华、李志民等。

解放军各总部及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造反派面对面地斗争陈再道、钟汉

华、牛怀龙等。从下午四时至五日凌晨一时。

凌晨，王洪文率“工总司”24万群众，高举“文攻武卫”大旗，包围上柴厂，“联司”被彻底砸毁，打伤、关押650余人。随即对全市各单位的“支联”活动进行打击。这些行动得到张春桥的完全支持，说：“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他称赞王洪文是“我们的司令”、“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

上柴战地目击记

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进攻主门，联司在这座钢铁大门后堆了无数乱石、铁板等障碍物，钢铁战士智勇双全，灵机一动，将吊车撞开大门。顿时，冶金、电业、华东电力建设局、港务局、纺织、化工、交通运输等系统和红卫兵小将的各路大军冲入中央大道，革命医务工作者也深入火线，及时抢救伤员。但死心塌地为联司效劳的一小撮坏蛋，在铸工车间屋顶上，把砖块从高空抛下，织成一片火力网，阻挡队伍前进。各路人马立即分成四路，把铸工车间包围起来。各条战线的钢铁战士，从水落管(即下水管)、消防梯、门窗上攀登。刚要登上屋顶，联司中环蛋用特制的钢叉突然向我们战士刺来。在千钧一发之际，战士立即抓来灭火机猛喷屋顶。这突如其来的“新式武器”使一小撮坏蛋惊慌失措，似惊弓之鸟，步步退缩。这时吼声震天，各路大军经过短短一小时艰苦斗争，攻克了铸工车间。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强大攻势面前，一小撮坏蛋只得举手投降。

一号、二号、三号三幢大楼被造反派战士占领后，联司坏蛋都退到四号楼、五号楼固守。四号楼是联司总部，由联司所谓敢死队直属兵团据守，组织了密集的“火力网”，砖头、石头、石灰、铁器……象冰雹一样从高空抛下，还用皮弹弓射下螺丝帽，甚至掷下硝镪水、黄磷、燃烧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战士受了重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燃烧起来了，上柴厂战地一片烟雾腾腾。

消革会^①、义革会的负责人，眼看联司疯狂地垂死挣扎，眼看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屡次请战，要求出动消防车担负主攻任务，迅速歼灭联司老巢。指挥员观察了现场作战情况，为了力争在白天摧毁联司老巢，减少伤亡，减少工厂损失，根据消革会、义革会的请战，决定消革会、义革会出动主攻，用云梯搭桥，用水枪灭火和制止投掷燃烧瓶，黄磷、硝镪水和石块等凶器，掩护进攻。

三时许，消革会、义革会第二批战士在消革会常委詹××带领下乘车到达上柴战地，指挥员下令投入战斗，进攻四号楼。这是关键的一战。

“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拿下联司黑总部！”这是指挥部的战斗动员令。战士们一到现场，立即投入战斗。谁知凶恶的一小撮联司坏蛋，早就切断了厂内的水源。战士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终于在一千米外找到了河浜。由于距离太长，出水困难，消防战士又发挥集体智慧，采用四辆车子打接力的办法打水，洪水水枪的水压在一百磅以上，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消革会、义革会战士掌着。只见一道道银柱直喷四楼，喷得楼顶上一小撮坏头头都象落水狗。

为了占领制高点，云梯车开到了四号楼对面，腾空升起来了，超过了四号楼顶。联司暴徒用更密集的石块、铁片，燃烧汽油瓶拼命往云梯上砸。

这时，消革会战士徐××从水落管直爬上去，刚到三楼楼顶时，被联司暴徒用长矛刺中，从三楼掉了下来。第二个、第三个战士继续往上攀登。他们爬到楼顶时，用腿力夹住水落管，痛击联司暴徒的疯狂袭击，把这批暴徒打了回去，然后纷纷冲上楼顶。

“立即把云梯靠近四号楼搭桥，从云梯上冲进大楼！”指挥员又下命令。刹那间，又一批消革会、义革会战士从云梯上去，工人造反派战士也纷纷冲上去，争先登上三楼平台，占领了联司总部的制高点。

这时，四号楼二楼的联司暴徒还在顽抗，登上平台的战士往下打，下面的战士往上攻，

^① 即消防队革命委员会。

上下夹攻，直捣联司老巢。四号楼的联司很快地被歼灭后，就分兵二路，分别指向五号楼和扯着联司破旗的水塔。兵临城下，喊话四起：“放下武器，下来不打！”“联司成员赶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造反派战士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盘踞五号楼和水塔的联司坏蛋开始动摇了，他们丢下武器，倒下旗子，挂出自白旗来，一个个举起双手投降了！联司老巢彻底完蛋了！”

整个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到下午六时胜利结束。

(原载《工人造反报》)

在审判王洪文中徐潘清的证词：“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战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被从北京揪回沈阳，接受批斗。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第三书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强晓初、俞屏均被揪斗。在对待宋任穷问题上，两派对立。保守的“红团”与造反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从四月起，武斗不止，先后多达400余次，伤二千余人，死数人。

首都新闻界、电影界红卫兵15000人召开大会，声讨港英当局对我新闻、电影工作者的迫害。

8月5日

北京各界一百万人集会天安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许多单位纷纷发言，声讨刘少奇的“罪行”，并通过大会号召书，要求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刘少奇彻底批倒、批臭，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批斗刘少奇、王光美的会议同时在中南海召开。刘、王被揪斗，曹轶欧亲临指挥，刘遭到肆意污辱。邓小平、陶铸夫妇亦同时被揪斗。会后，刘少奇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秘书说：“你记，我要严正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中南海革命派揪斗刘、邓、陶

8月5日下午，中南海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内分三个战场再次斗争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他们的臭婆娘也被揪出来陪斗。大会上，让刘、邓、陶老实听取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大会的批判发言，有时把广播放小，中南海造反派质问他们一些问题。他们的态度十分恶劣，对关键性问题狡猾抵赖。他们的态度激起了广大革命派的无比愤怒。斗争火力很猛，迫使刘少奇低下了狗头，走一步向群众一鞠躬。臭妖婆王光美紧跟者，吓得不敢抬头。这次斗争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走资派的威风。这次大会拍了记录电影。

(原载北航《红旗》第61期《红旗雷达站》1967年8月15日出版)

《人民日报》为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发表社论。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年前的今天，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日子。

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里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以集中的火力，炮打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张大字报，揭露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在党内，有个隐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进军的号角。

《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豁然开朗了。原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存在着两个根本对抗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对抗和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深刻的斗争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曙光从地平线上一升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能出发，预感到这场革命敲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覆灭的丧钟，他们就拼死拼活地进行疯狂的挣扎。

长期隐蔽在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打着红旗作掩护，埋伏在毛主席的身边。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活动，上层下层都有，上层是主要的。最大的危险就出在上层。苏联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全国很快就变了颜色。前车之覆，不可不鉴。

隐蔽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由一小撮混进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互勾结拼凑而成的。他们是窃取实权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国家机器，一部分党权，一部分政权，一部分军权，在很大的程度上掌握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其他如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文的、有武的，有抓党权的，有抓笔杆子的，有抓枪杆子的。总之他们的手伸得很长，凡是搞反革命政变、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所需要的一套，都拼命去抓，抓住不放。对于这样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如果我们无产阶级丧失警惕，麻木不仁，任其存在，听其发展，那就会象毛主席所尖锐指出的，“不要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最伟大的天才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在我国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的关键时刻，尖锐地、深刻地洞察了党内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覆阴谋，准确而及时地捉住了他们的反革命黑手。

毛主席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动员亿万群众，揭露和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彻底摧毁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个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最伟大创造和最新发展。

经过天翻地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拉下了马。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七零八落了。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他们还在利用力所能及的影响，蒙蔽一部分群众，纠合保守势力，进行疯狂的反扑。最近在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就是一次大暴露。

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我们必须懂得，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已经被剥夺了，但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很深，影响很广。如果不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可能死灰复燃，还可能利用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影响继续地毒害人民群众，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现在，这些顽固的阶级敌人不是还在负隅顽抗，疯狂反扑吗？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就是给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彻底、最致命的摧毁。

我们必须懂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斗，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绝对领导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应当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真正做到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建立新的伟大功勋，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谢富治公开表示，反对首都红代会院校提出“第三次串连”的口号。八月份内，清华等院校许多学生外出串连，提出“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前夕”，准备“武装夺取政权”。

谢富治、戚本禹奉命动员包围中南海西门的揪刘大军撤离。从七月末建工学院造反派驻营中南海西门，要求揪斗刘少奇以来，前往声援的先后多达 2000 余单位。

第一百卷 1967年8月6日至8日

(谢富治讲话：砸烂公检法)

8月6日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说：外交部开会批陈毅，我得陪着去，这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你们拿开大会来压我，我很难过。你们最后给我一个电报，是最后通牒，我本想给陈伯达、江青看，算了，我吞下去算了。我是根据毛主席的方针办事，我自己有什么方针？你们不要去外交部干涉，开小会，否则，我就把十一日的大会取消。关于开大会的问题，你们要有一个安排报告，今晚回去，先把姬鹏飞、乔冠华放回来。开大会时，可以喊口号，但不能打旗子、刷大标语。（《传信录 883》）

李富春在中南海接见计委造反派的讲话中说：“斗争薄一波，要挖他的历史根子，要挖痛。第一、挖(他)是刘少奇包庇下来的叛徒(下边未听清)；第二、投奔阎锡山，把叛徒宋劭文、牛佩琮、戎子和等搞到山西去；第三、抗战时期搞牺盟会、决死队，牺盟会负责人是戎子和(下一个未听清)；第四、薄一波的一套手法是阎锡山那里来的，以后和刘少奇、刘澜涛、安子文等大叛徒勾结起来，到处伸手。你搞他的具体问题，他可以躲闪。你搞他的历史问题，他就没有办法。自首叛变 61 个人，是刘少奇批的，没有报告主席，没有报告中央，是同张闻天勾结起来搞的，主席不知道。（《传信录 884》）

中共中央决定：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的领导，集中搞好东北局机关的斗批改。

8月7日

刘少奇在挨斗后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申明自己已失去自由。刘在信中写道：“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非法的组织活动。”然如石沉大海，未见答复。

谢富治在公安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罗瑞卿大会上讲话：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并说明这是毛的指示。

在公安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这几天，我们公安部的同志们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要在我们公安系统、政法系统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这件事情作得很好，很对，我热烈赞成这种革命行动，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我也听到一些情况。我想这个批判应该继续下去，大会批判，大会斗争这很重要，可以调动每一个同志的积极性，可以揭发很多问题，可以介绍许多情况。

这两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公安系统的流毒很深，他们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搞修正主义，搞格伯乌的一套，要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这个工作仅仅依靠几次大会还不够，应该彻底批判，彻底斗争，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这件事希望我们公安部的全体同志，下定决心，来办这件伟大的事情。要转变政法战线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搞苏修那一套，要

下很大功夫，要先从我们公安部开始。我们有一个好条件，就是我们在北京，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这样就便于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教导，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但是，彭、罗在政法方面的流毒很深，这一点，我们大家在一年文化大革命中可以看出来，我们拿每一个公安民警人员来讲，大多数人都是好同志，这一点在整个公安机关也是如此。但是，作为领导，作为公安战线上，因为有彭、罗流毒，在建国十七年来，有的甚至时间更长一些，已成了习惯势力，所以毛主席的许多东西，尽管口头上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拥护林副主席，拥护毛主席的司令部，拥护中央文革，但是，行动上往往违背。公安机关在整个文化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局面没有改变。我们公安部也和下面脱离了关系，我们不知道下面什么人在领导。现在大多数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了军事管制，由军队系统管，但是军队他原来也不大懂得公安业务，还是由公安系统当参谋。结果，整个公安系统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少数，一直到今天为止，支持保守派的是多数，或者在革命派中的两大派中，他支持毛病比较多的，革命性弱一点的，压制革命性强的一派。这个专政机关很多地方的公安部门不是站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司令部一边，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一份力量，相反，往往站在对立面，而且死也不觉悟，到现在还不觉悟。归根结底，归到彭真、罗瑞卿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身上，中他们黑“修养”和“驯服工具”的毒很深，包括我们这些人。他们搞的“驯服工具”，不是为了我们毛主席，不是为了毛主席的司令部。林副主席讲：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是实际上却做了不是毛主席的司令部的“驯服工具”，甚至跟着他们一起镇压群众。

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很有意思，在去年，从文化革命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风暴以前，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当然里边还是有些造反派，但是作为领导来讲，绝大多数是这种情况，也有少数不是这种情况，这中间公安系统作的坏些，抓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这样一做，省、市机关的造反派，公安机关造反派造反了。今年一月份以后，所有公安机关都造了反，这个反造得对。当然，这不一定每个人都靠边站，有些是犯了错误的好同志。

大多数公安机关都实行了军管，我们相信伟大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军队。但是，军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我们一样，不大理解，有一些干部不理解，在认识上犯了错误，也有少数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还有什么牛师长，什么蔡政委，这都是坏人。坏人在军队里是极少数的，是个别的。但是，认识的错误比较多，我们这个公安机关又当了“驯服工具”。四川抓了三万五千人，川大一个大学就抓了五百多人，这不是公安机关出的点子？湖北大家知道，有三钢(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新。钢工总是一个有四十多万人的革命群众组织。独立师、公、检、法少数坏头头出点子，军区下命令，陈再道闭着眼睛不看材料，也不审查，一句话就抓了钢工总五百人，公安机关不仅不加抵制，而且出谋划策，所以公安机关在那里臭得很，成了被打倒的对象，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

我们没有接触武汉的公、检、法，他们都是曾经造了一次反甚至两次反的，可是思想没有转变过来，他们的本事就是抓人。最可笑的是，最近我们看到了新派到了武汉军区去的一个新班子反映了专政方面的一份材料，要在各个方面抓人，从“百万雄师”的什么头头起，通通都抓，污辱谢富治的要抓，污辱王力同志的要抓，一共八各个方面的人要抓。我没有注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材料，说不行，要我们研究。这个材料还是军队系统反映的，过了两天，看到了原始材料，是武汉公安机关的一个造反派，叫什么革联的提的，他造了一家伙反，地位变了，同样抓人。当然，抓人有阶级性，是右派当权，就抓革命造反派；左派、革命造反派当权，当然抓右派。但是文化革命里面的有些问题你闹不清楚，自己不了解，不加分析。当然，现在肯定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但是

我们不能靠抓人的办法，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专政，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所以，毛主席根据这个情况指出了政府、军队、革命左派抓人都不是好办法，都不要随便抓人，应该是群众专政，这是我们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武汉的“百万雄师”，军队、左派对他们一个人也不要抓，要让他们自己造反，把坏头头扭送上来。四川产业军自己起来造反，抓了十二个头头，这做得对。不要军队，更不要公安机关抓人。毛主席讲：“北京大体上是按照这样做的”。是群众扭送的多，公安机关抓的少。但是有一点没有做到，就是群众左派扭送的多，现在来看，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自己送的，象联动分子大多数是革命群众扭送的，保守势力送来的一个也没有，都是左派送来的，这比公安机关抓就先进了一大步。如果做到保守势力自己抓，这个工作还很艰巨。政府可以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加以协助，抓少数坏头头。这个我们不是没有做过，有些学校要我们抓人，我们派了人去，但主要还是靠他们，我们主要是协助。这样做有没有群众反对？北京造反派对我有意见，说我太软，不抓人。反正有意见，你这样做有意见，那样做也有意见，但不管怎样，总要合乎毛主席思想。从长久来讲，群众是会否定自己不正确的意见的。

那么多的公安机关为什么老是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这个根源，要归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特别是彭、罗。整个十七年来的公安工作，当然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但相当多的是没有按照毛主席思想办的，是按照修正主义办的，还有斯大林时代的某种错误做法，以及国民党的很多坏东西，这方面没有彻底革命，没有彻底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去办。毛主席思想在我们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没有建立起绝对权威。所以文化革命一年多了，始终跟不上毛主席思想，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就是今天革命明天夺权，从组织行政把它砸烂了，但整个的思想体系没有改变，什么厅长、局长呀换成勤务组，根本没有改造，他还是抓人，不懂得搞群众路线，不懂得支持左派、依靠左派、相信左派，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们说的是群众性的，特别是几派斗争，主要靠群众自己解决。至于什么强奸犯、杀人犯、个别隐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帝国主义特务、修正主义特务，当然专政机关有权力处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是要保证我们一定机密性，但也要经常通过群众。凡是能够通过群众的，应该通过群众，不要搞得那么神秘化，不能通过群众是极少数。第一、二次镇压反革命都是毛主席领导的，都是采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主席总结了，走群众路线，犯错误总要比少数人搞犯得少，犯了也容易纠正，苏联那一套，公安机关、保卫机关特殊化，特殊地位，凌驾于群众之上，不是群众监督公安机关，而是公安机关监督群众，这对我们公安机关的影响深得很。我们公安机关不是在广大群众监督下，而是搞特殊，去监督别人，这个东西老也转不过来，再加一个“驯服工具”的毒害。当然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应该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要用我们这个专政工具去镇压群众，我们就不干，就造他的反；如果谁要用专政工具去包庇坏人，我们也不干，就造他的反。利用专政工具去镇压群众，包庇坏人，在苏联是修正主义的特点。那个谢列平，当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连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当不了，可是这个安全委员会主席的权力比中央书记大多了，他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包庇坏人，专群众的政，凌驾于一切之上。我看，以后公安部的地位要把它降到一个普通勤务员，现在讲的勤务员实际上权力还是很大，要当真正的勤务员，什么人都可以领导、指挥，权力很小，象芝麻大那么一点。这个权力的大小问题，我和罗瑞卿曾经争论过，我说公安部的权力太大了，罗瑞卿说这是中央赋予我们的，在中央开会两个人争起来。“罗长予”这个人手太长，所有权都交给他，他还够。我没有能力，办不了那么多事情，权力不要那么大，老百姓可以管我们，只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什么人都可以管我们。公安部能不能彻底变，要权力很小，工作很多。

有些人迷信公安机关，我才不迷信，无非搞黑名单、抓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公安机关。现在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你推翻一层，搞一个勤务组，还是一样。当然我们公安部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林副主席身边，中央文革身边。

公安部革命派的同志们：通过这一年揭发大党阀彭真、大军阀罗瑞卿、大叛徒徐子荣、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我们受到了很大教育。冲公安部时，有的同志发脾气了，说我太软，发就发了，那些“联动”到公安部胡闹，这些事不要看的太严重了，公安部可以冲的，可以进进出出，这件事我受过批评，但有好处，公安部成了特殊，神圣不可侵犯是不行的。所以这几天批判大党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大军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批判得好！批判得对！但跟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以及作风上把他们彻底推翻，彻底打倒，再搞他半年到一年，不要疲倦，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彻底批判，要调动公安机关干部，犯了错误的干部要和革命派一起，彻底清算公安机关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彭、罗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彻底清算，这和我们大多数群众都有关系，过去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是很好的机会。彻底清算，这样才能使我们公安部永远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跟毛主席走，跟着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成为一个完全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革命的公安部，总是支持革命的，同保守势力作斗争，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公安部。这里说一下，各省的那些公安机关的保守势力找公安部，你们不要理他，要理他就要同他作斗争，千万不要使公安部成为包庇坏人的场所。我们招待所就住过“百万雄师”的人，被我们革命造反派撵走了。这次汉口有人要打倒谢富治，就是公安机关带头，打倒王力，也是公安机关带头。王力同志被绑架后，我到军区去，在军区门口看到一百多辆卡车，几十辆消防车，有几个穿消防服装的人凶恶得很，他们喊：陈再道是好人，谢富治是大坏蛋，拿刀子来，把他拖出来，杀了他！有几个大个子凶恶得很呀！大家都看到嘛！我没有得罪你，我们也不认识，你这样凶恶？！倒是下面青年人好，群众好，还是他们帮忙，保护我们把车开走了。最凶恶的人就是穿消防服的几个家伙。我一个人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他们不单是对王力同志和我，他们是针对毛主席，针对林副主席，针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对中央文革小组。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针对毛主席，这一点我们公安部的同志要清醒。现在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他不敢公开反对，而是写匿名信，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北京也有一股逆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革命派都是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地方，就是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这一点公安部的同志要清醒。要保卫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保卫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反对，就和他作斗争。公安部是专政机关，我们要支持革命派，从各方面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保守势力作斗争，特别是同反革命作斗争。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坚决捍卫和拥护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听林副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参谋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有丰功伟绩的，我们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跟他们走。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要把他打倒。

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都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他们把中央文革小组更不看在眼里。

今天讲两件事：一件是讲把公安部文化革命搞深搞透，接受下边公安机关的经验教训，不要随便抓人，特别是不能抓革命派，要保护革命派。如果我们要当“驯服工具”，只能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来讲，我们对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加以反对，不能当“驯服工具”，我们要彻底清算十七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公安部流传的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要坚决支持革命派。要同那些保守势力、反革命作斗争（这时有人要给谢副总理照相，谢副总理说：不要照相，不搞那一套），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

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事，我们除了把自己的革命搞到底以外，还要把中央交给的案子办得好，办得快。过去犯了错误，我们要建立新的功勋，配合文化大革命，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老底子。我们公安部参加了许多专案，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新的功勋，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走群众路线，坚决办快办好。

在北京市，我们了解的，要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给与方便条件。凡是保守的我们要限制，要斗争。但属于革命派内部两大派之间的争论，我们不参与。他们哪一派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们就支持。如果属于同保守势力和反革命作斗争，需要我们配合的话，我们就支持，别的事我们不管。

我没有准备，今天的讲话可能有错误。但总的精神，是有毛主席的指示作依据的。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这完全证明毛主席英明的预见性，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地方的公、检、法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当然，作为某些成员来讲，支持左派的哪个地方都有，但作为一个组织来讲，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是在大城市。县公安局支持保守派的有八成，不管造反没造反，夺权没夺权的都是这样。还有人武部，支持保守派的也是八成，是不是这样，你们可以调查。这是作为领导思想来讲的，为广大群众不是这样，问题是在领导。你不能说公安部百分之八十是支持保守派的，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公安部也有错，就是办错了事的，也是我们领导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下边公安机关没有联系。有，他们也不听你的，所以，我说今天讲话用什么小报，非正式的报纸，给下面送一些去。当然，这一送，打倒谢富治就更多了，你这个公安部长，专讲公安机关的坏话，其实不是坏话，是好话。要提醒他们，方向要搞对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提醒他们，方向要搞对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跟着毛主席走，跟着林副主席走，跟着中央文革小组走，要支持革命派，不能支持保守派。大多数同志是认识问题，少数是坏人。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行了。武汉公安机关的头头也不要捉，让他们自己捉，这不是靠捉人解决问题，要解决思想问题，个别实在坏得很的，由他们自己觉悟起来造反。

我想，公、检、法的这些问题首先要归罪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和我们广大干部也有点关系，但只要我们觉悟了，彻底清算他们就好办了。

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喊几句口号：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打倒陶铸！

打倒彭真！

打倒罗瑞卿！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核对)

谢富治讲话后，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报复公检法人员的事件。在公安部内，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将 225 名干部、工人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走资派”，47 人被捕入狱。公安部除谢富治本人和一名兼职副局长外，其他副局长都被逮捕、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整个公检法机构陷于瘫痪状态。

周恩来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指责湘潭军区把 900 多枝枪发给保守派。黔阳、常德、衡阳也有类似现象。保守派围攻造反派，造反派也要求有枪，这是可以理

解的，必然的。这种趋势从江西开始，影响到湖南，刚才听说又影响到广州。但抢总是不合法的，不应该。（《传信录 887》）

谢富治接见工代会、红代会，说：2000 余单位齐集中南海西门揪刘，给这些党内走资派一点压力是对的，但影响交通，影响中南海里面，所以必须撤。中央正准备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问题。准备重点解决河北省的张家口、唐山、石家庄、保定。新疆、宁夏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地方形势比较紧张，像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河北，中央准备解决，从海陆空军中抽出干部。大学生不要出去。有人提现在第二次大串连，是错误的。各代会要在反武斗方面作出贡献。（《传信录 888》）

姚登山在外交部成立了夺权指挥部。王力在外交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表示“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邓、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在姚登山等的把持下，公然以外交部名义向国外拍发电报，委派出国代办，中断外交活动，火烧印尼大使馆。在“王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国务院各部委亦发生冲砸政治部和夺权之风。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毛泽东。毛看后说：“大、大、大毒草！”

王力在外交部接见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姚登山等时的讲话：

王力同志八月七日晚接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同志，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对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整理的谈话记录转发于下：

八月七日下午七时，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找姚登山同志，说王力同志于晚上九点找姚登山和联络站代表一起谈一谈。

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的同志走进王力同志办公室，王力同志的左小腿部分打着石膏，在躺椅上和大家一一握手。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代表向王力同志表示了极其亲切的问候和敬意，并询问王力同志的伤情。王力同志说不要紧，快好了。

姚登山：武汉问题解决了吧？

王力：解决了。武汉问题证明一个道理。凡是烂透了的，可以很快、彻底、痛快地解决，凡是不痛不痒的要拖些时候。武汉这次事件后，军区立即改组，司令部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八二〇一部队调出去改编，“公检法”彻底改组，武装部彻底改组，对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对“百万雄师”本来想慢慢诱导，现在问题一清楚，下面起来造反，问题就解决得很快。

王力：今天晚上请你们来谈一谈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看到外交部一份材料，我们小组的同志议论了一下。晚上他们有事都出去了。我有点空，找你们来闲聊一下，什么都可以谈。

（王力同志看了代表名单，一个个认识一遍）

王力：好吧，先听你们的，我们学。

（联络站代表向王力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去年六月到十二月外交部运动三起三落，谈到联络站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十八日夺权，谈到四月份“总部”出现时……）

王力：“总部”是个什么组织？有多少人？在外交部有多大影响？

联络站代表：据他们说有二百三十人，他们在外交部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认为他们是保守组织。

（联络站代表继续谈运动情况，谈到“打倒陈毅”的口号。代表阐明我联络站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根据陈毅的三反言行，我们认为是敌我矛盾，应该把陈毅的三反言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至于将来对陈毅的处理，那是

中央决定的事，我们最后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们联络站也有同志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

王力同志插话：这个道理你们跟总理谈过没有？

联络站代表：谈过。

(又继续谈运动情况，当说到外交部运动阻力大时，分析了一下外交部的具体情况。)

王力同志：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同志：“攀险峰”是什么组织？有人看到它的政治主张，说它还不错，是不是中间的？

(联络站代表介绍了“攀险峰”的主要观点，联络站代表提到在七月十七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攀险峰”攻击联络站，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是方向路线错误，是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上了刘少奇的当)。

王力同志说：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联络站代表指出“攀险峰”和“总部”、驻外革联等组织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搞统一行动的。就是大字报、标语等都是联名写的。)

王力同志：那外交部基本上还是两大派啰！

(联络站代表谈到目前外交部运动情况：运动搞了这么长时间，外交部走资派没有真正打倒。领导干部没有敢于站出来亮相的，业务还是原来的班子抓。)

王力同志：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戚本禹那天对姚登山同志讲的话是对的。总理不是讲过“三结合”吗？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联络站同志谈到有些司长、部长只划圈，举了个例子：有个案子徐以新看后写上“怎么办？”让其他副部长传阅，最后传一圈回来，部长们都划了圈，案子上仍然是“怎么办”)

王力同志：这是官僚机构，不管事，何必还要个人在那儿？

(监督小组代表在谈到部党委对抗中央文革时)

王力同志问在场的中央文革宣传组负责人之一朱庭光同志：他们现在是不是威风小点？

朱答：他们不管了。

(联络站代表插话：中央文革批评后他们采取撒手不干，消极抵制。)

王力同志：(对部监督小组的同志讲)他们不干我们要找你们了，你们现在监督。监督不了嘛！？

(监督小组代表：中央许多精神下不到我们这里，如：主席七月一日对缅甸问题的指示我们不知道。关锋同志对新华社的讲话也是我们自己从新华社那里搞来的，也不知道部党委知道不知道，我们一月份夺权后有些不称职的司、处长、副局长让他们靠边站，那时候业务上我们搞的还可以。)

王力同志：那为什么又退了？原来冲了一下，后来又缩回来，现在停止不动，下阶段怎么办？没有很好考虑吧？

(联络站代表：在整风时，有人批评我们夺权夺过了头，说业务权是中央的。)

王力同志：这话不对。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如果你们夺了权另搞一套路线、方针那就不对。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执行和贯彻，谁执行和采用什么方针是另一个问题。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央组织部要恢复啰！？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

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好，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说到这里时王力同志坐了起来，用手挥了一下，很激动）。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没有这首要的一条，不管什么“长”，多少级，出去代表谁？代表毛主席，还是代表刘少奇、邓小平？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出国首先提出要什么“长”，多少级，不管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拥护刘少奇的，这不行，这是原则分歧，要是这样，革命就不要革了，以后出去要革命派来挑选，来审查。我们革命派，首先看你站在那一边？你不革命，什么长，多老的资格都不行，当然我们也要负责全面审查，保证不出乱子。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联络站代表告诉王力同志说，英勇护卫我国国旗的赵小寿同志回国后，分配工作时竟有两个单位都不要，部党委一次会议上还说赵小寿不能作为外交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典型来学习。王力同志说：这是专政！

（联络站的代表说：有些干部不称职，但是不能让他们靠边站，说是还没定性，不能撤职，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处理。）

王力同志：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有人不做工作还让他看文件干什么？造反派为什么不能看文件？只要工作需要就可以看。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这是笑话！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八月五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常识，而外交部竟有人还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王力同志念这封信的全文，最后署名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王力继续讲：我反对革命造反总部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为什么竟成了罪状呢？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这是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一致主张，他们不要想在这中间找什么裂痕，挑拨离间。我这样说并不是对你们偏听偏信，我们本来对“总部”不了解，现在它自我介绍了。我们经常是从这些告状的人中看出问题的。不对头，相当不对头。我们不赞成这封信，集中攻戚本禹。这种作法不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戚本禹看了，他说那些是他讲的，他负责任。我们从信中看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从中看出问题是严重的。这是一种思潮。

（联络站同志谈到整风，检查了我们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也谈到有些同志现在觉得就受压抑。）

王力同志：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不要磨掉锐气。

（联络站代表：我们联络站成立才半年多，整风就花了三个月，做了三次检查。）

王力同志：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老早就说要找你们，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有些省的事更紧迫。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排不上，各省的问题排在前面。每天还要抓报纸、广播，我分管这个。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当然不是叫你们过火，去搞打、砸、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要你们搞彻底革命，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三降一灭”。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要真实地监督，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提出看法，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凡是重大的原则性争论问题，应提到党中央，要坚持原则。

别的方面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总部”给我们来信，我们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同志念“总部”的信，而后他说，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王力继续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六月三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毅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联络站的同志说希望中央文革小组今后关心我们外交部的运动。

王力同志：对外交部必须有鲜明的态度，这样阵线才能分明，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这样干部才敢出来亮相。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战线。

联络站代表把整风中我们检查对待群众的问题给王力同志谈了一下。

王力同志：凡是有群众的地方用压是不行的，要做思想工作。希望你们坚决贯彻主席的革命路线。监督不能做点缀品，重大的方针政策上不能让步。当然，看不出问题是另一回事，夺权夺了半天没有多少权，挂了这个招牌。以后监督小组不只监督业务，整个负责发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监督，凡是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要监督。什么机密神秘化，对革命不利，不合理的要监督掉。等级森严，该批的就批，该改的就改掉。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调来搞党内工作的同志二十刚出头。他搞党总支书记工作，管好几个单位，学毛著积极分子，干得挺好嘛，他只有两个口袋，没有四个口袋。（大家没听懂，王力同志说两个口袋是普通战士，四个口袋是干部嘛，大家都笑了。）

部监督小组问以后业务上的事是否也可以和中央文革联系。

王力：有原则性争论就打电话给我们。

（又回到“总部”来信的问题上）从这封信我们看出这代表一种错误思潮，我们认为问题严重，找你们来谈谈。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持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联络站代表把联络站十七个战斗队写的“关于联络站某些负责人再次对抗总理的联合声明”递给王力同志看。

王力同志仔细阅后说：也是挑拨中央文革和总理的关系，跟“总部”一样。

联络站代表在离别时表示希望王力同志和中央文革推动一下外交部的运动。

王力同志说：主要还是靠你们。

联络站代表最后表示：我们下定决心要把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决不能让它半

夭折，我们准备着有大反复，革命造反派要准备重新被打下去，但即使这样也要坚持到底！

王力同志：那不会的，你们干吧。

最后，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代表同王力同志握手告别，并对中央文革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王力讲话后，曾向陈伯达、江青汇报，陈、江肯定他讲得好。

外交部造反派召开批判陈毅的小范围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挂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以其违反协议，坚持撤去，始参加会议，并宣布，这样小型批判会，在 11 日大会批判前再开一次。（《传信录 890》）

陈毅在群众中受批判

在党中央、中央文革、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八月七日下午，外交部及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批判陈毅三反罪行会。会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其他群众组织和领导干部，以大量铁一般的事例，揭发和批判了陈毅的三反罪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参加了批陈会，庆祝外交部系统大联合的行动，并热烈而诚恳地希望在十一日人大会堂举行的批陈大会上，外事口能够出现一个大联合、大批判的新气象。

（原载北航《红旗》第 60 期《红旗雷达站》1967 年 8 月 12 日出版）

军队机关造反派第二次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

三军革命派再次斗争陈再道

八月七日下午七时半至八日晨七时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海陆空三军直属机关和驻京部分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一千多人，对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及其帮凶钟汉华、牛怀志、蔡炳臣、巴方廷等人进行第二次斗争。经过十二小时的斗争，在事实面前，陈再道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反中央文革小组。钟汉华承认自己和陈再道是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祸首。牛怀志是绑架、殴打王力同志的现场指挥，巴方廷是杀人刽子手，他召集民兵把枪发给“百万雄师”，过去他是王明的警卫员，曾把周总理的警卫员打死。蔡炳臣承认自己是陈再道的帮凶和打手。

陈再道在去年提出看扩大中央文革小组，各大军区都要有人参加，认为现在中央的文革都是秀才。妄想改组中央文革，真是野心勃勃，罪该万死！

（原载北航《红旗》第 60 期《红旗雷达站》1967 年 8 月 12 日出版。）

姚文元在电话上通知上海：“春桥同志和我两人表示一个明确态度，支持成立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8月8日

王力致信姚登山。

姚登山同志：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礼！

王 力

周恩来将王力 8·7 讲话批给康生、王力，约三人一谈。康、王未到。康生扬言，王力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

“首都五·一六兵团”抛出《十九个为什么？》，为刘少奇鸣不平。

因苏联“斯维尔斯克”货船船员将毛泽东像章抛入海中，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并将船长及二副驱逐出境，将“斯维尔斯克”武装押送出境。

王光美向中南海造反派提出第二份检查：

中南海的革命群众：

在八月三日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上，革命群众要我就五个问题，做出检查交代。现已写出，送上请审阅。

由于我所犯的许多错误和严重错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为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愿再一次向革命群众、向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向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太阳毛主席请罪。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王光美

关于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的错误

1963 年 11 月底到 1964 年 4 月底参加桃园大队四清革命中的错误：

1. 没有在运动中号召和组织干部、社员和其他工作队员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而只是反复宣传党中央的“双十条”（草案）、党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即十二条）、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发展农业纲要四十条。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敢想过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搞的。我们在运动中主要还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精神，但没有随着运动的进展组织学习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促使群众和干部思想革命化，把四清搞得更好，使经过四清革命，在群众和干部中真正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

2. 过分强调工作队的作用。

我参加的河北省委试点工作队人数很多，因它既有试点摸经验的任务，又有培养干部的任务。大工作队必然会发生包办代替的错误。我在桃园四清总结中，又加以宣扬，影响各地在 1964 年冬搞大工作队的错误。

3. 过分强调根子要扎正，基础要打好，采用了第二个十条草案中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虽然我们是在向群众、干部大讲双十条（草案）时，同时物色根子的，仍有神秘化的作法。在一个被坏分子把持的党支部领导的大队中这样做有一定的必要。我在桃园总结中对扎根串连讲得很具体，对错误的扎根串连作法加以宣扬，造成了坏的影响。

4. 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特殊化，有的方面有不如其他组员的地方，造成不好影响。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中，批评了 1964 年的形“左”实右的倾向。我理解是指 1964 年冬至 1965 年 1 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的一段时间发生的问题。那段时期在全国四清运动中较普遍地存在着形

“左”而实右的倾向，主要应由刘少奇负责。其中受桃园经验错误影响的部分，我负责。我认为，桃园经验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也不是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

我去河北参加四清革命是刘少奇叫我下去锻炼的，并没有要我下去摸经验的意思。离京前，我问过刘少奇下去该怎么做，他简单地答复我几句，就是桃园总结中引的那几句，“除了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思想、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以外，不要先带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当时因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也没有向工作队负责人传达，直到总结时，才讲出。刘少奇没有指示我好好贯彻毛泽东思想是他的最大错误，但，我不认为他所说的不要带框框的意思是不要毛泽东思想，因为他要我贯彻党的政策，而四清中的主要政策文件，即双十条(草案)等，我们当时，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第一个十条(草案)明明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而我们在桃园时，也主要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放手发动群众，以彻底革命精神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理解刘少奇讲的不要带框框，是要我不要先想好下去会遇到什么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我在八月初，在清华大学工物系一个班参加批评工作的辩论会上，也曾讲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框框。

以后，我又搞四清的几个地方，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和第一个十条(草案)的。但，我没有完全否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时还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有关政策界限规定。在我参加的一些讨论四清工作部署的会上或我修正定稿的工作计划或文件中，大都讲是以二十三条为纲，以“双十条”的有关部分和其他文件和随着运动的进展大学主席其他有关著作来武装群众和干部。因为，我当时只知道第二个十条太长、有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等错误。不知道党中央已否定这个文件，而二十三条前的通知中有一句：“过去发出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我一直认为第二个十条中，还是有些不与二十三条抵触的部分，仍有用。这是我的错误。

在 23 条下达前，1964(年)冬季河北新城的四清，确有形“左”实右倾向。大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片面强调根子要选正，而使工作组员不敢接触中农，不敢接触干部，领导上反复强调沉下去，再沉下去，以致缺少革命声势。宣讲 23 条，都是给贫农、中农、干部分别宣讲的，而且要干部(除由少数干部同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组成生产班子抓生产外)集体学习二十三条，普遍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给干部很大压力，等错误做法。我因有外事任务，下去较晚。我曾向保定地委总团反映并研究了改进的办法。以后，我立即回北京向刘少奇汇报了新城情况(因那次下去以前，他曾要我两个月内不许提意见)，他同意了我们打开局面的一些办法，但，新城发生的问题，并没有太引起他的注意。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他还认为保定地委工作团的这一段错误原因来自华北局的某个领导同志的指示，而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二十三条，才扭转了那时在全国四清运动中的形“左”而实右的倾向，在看了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个光辉的历史文献以后，刘少奇才认识到 1964 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主要来自他的错误指导思想。

新城的四清在毛主席批评后，立即召开了几次万人大会贯彻二十三条的精神并将工作队一分为二，分出一半去涿县搞四清。以后的几次四清我认为基本上是遵照二十三条进行的，但，仍存在工作队大，有包办代替等错误。我个人在三同方面较之在桃园有些方面做得更差些(如：因我生了浮肿病，查不出原因，去社员家吃饭时，我自带了碗筷等)影响很不好。

关于 1966 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江苏省方巷大队在社教中如何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报导和短评，我对这两篇文章的看法，上次就做过检查。我认为是关于如何在四清革命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方法问题之争论，也是如何贯彻林彪副主席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指示的问题，却造成我反对在四清革命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错觉，我不想再辩解。

关于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期间，

忠实地推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清华大学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镇压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首先我一参加工作组，就站在工作组的立场上，想各种方法巩固工作组的领导地位，以一些不适合的框框条条限制群众运动，以我们主观设想的搞法去要求群众运动，自然遭到革命闯将们的抵制；接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方面，把一些非主流的事情当为主流；提出“排除干扰”的错误口号，把一些革命小闯将当做“假左派”，并提出与之辩论，必要时反击的完全错误的决定。这样，就发生了严重的学生斗学生的事件。从6月24日到7月12日一段时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特别对三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学生的大会，我亲自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对蒯大富同学六月二十七日的辩论会和七月八日批判会，对王铁成同学七月十二日的批判会）由于这三次全校性大会，在全校群众中造成极不正常的压力。我在七月初参加组织批判蒯大富同学的准备工作时，向工作组领导和当时的文革筹委会主任等都讲过要通过我们在运动中揪出的黑线人物和跳出来的“假左派”做为活靶子，通过对他们所反映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行进行批判，通过批判极少数以团结、教育、提高大多数（群众、干部和我们工作组自己）。这样就把当时怀疑工作组，要向工作组夺权的蒯大富同学当成了活靶子去批判。这些严重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我。由于我片面强调提高辩论和批判的水平，层层选拔大会发言人，并在大会前召开了练兵会，既造成各系各单位大抓“蒯”式人物，又对群众施行了国民党的“训政”办法，发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错误，是不相信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又没有虚心去当小学生向革命群众请教。由于这三次批判大会所造成的极不正常的压力，不仅伤害了被批判的蒯大富、王铁成、刘泉、陈继芳（后二者是在他们本系批判的）等人，并发生了不允许蒯大富同学半夜时到中央办公厅接待室而逼得他绝食抗议。在这段时期内还发生了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亡和学生朱德义卧轨自杀伤一腿的严重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压制了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我向革命群众请罪、向我们伟大的党请罪、向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错误确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评的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在这段时期，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之道而行之，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

清华工作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负重要责任，上述那些重大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我们工作组是属北京新市委直接领导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有一定责任，但第一位要负责的是刘少奇。因为：

（一）是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议上决定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而又没有对工作组派出后如何工作给以正确的指导，并同意了一些错误汇报和意见，做了不少错误指示。

（二）在大批工作组派出后，在去年六月九日至十三日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曾指示“不要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不要怕乱，乱了以后，再一分为二”。（这个指示我是离开清华大学以后，从揭发某些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时才知道的，原话可能不准确）刘少奇当时为什么不请示主席，已派出工作组应如何办？为什么回北京后，刘少奇不在他主持的常委汇报会上研究如何贯彻主席这个指示。在工作组受到革命小将较普遍的抵制以后，还不考虑是否工作组的工作有问题，反而同意了“排除干扰”的极端错误的意见。如果是对毛主席的上述指示的意义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按林彪副主席所指示的那样，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后，陈伯达同志一而再地提出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刘、邓又根本听不进去，未加考虑，即给回绝了，这又是怎么样的不尊重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不同意见啊！直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才亲自决定有问题、没问题的工作组一律撤销，并在党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扭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航道，亲自写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最光辉的革命文献“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亲自主持制定了伟大的革命纲领“十六条”决定。

(三)刘少奇叫我去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是六月十九日，那时他的意见是让我先去看一次大字报，再参加工作组，补办手续，如可以住，当晚可住女生宿舍。我当晚没住成，六月二十一日参加了工作组。虽然，他叫我去是为到第一线去锻炼，当时交代我：(1)下去同群众一齐搞好文化大革命，经受锻炼；(2)联系一个班或一个系；(3)反映些情况。但是，他为什么在主席讲过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以后，还同意我参加工作组，而又没有向我传达主席的指示。在七月二十日左右，陈伯达同志曾找我谈了一次话，除谈了些别的问题以外，着重谈了对外文委和广播学院发生的情况，说他们斗了第一批揭校党委的学生，并把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把他们的后台追到林杰同志等人身上，并说这不是个别现象。我当时，不仅不觉悟到清华大学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反而讲了清华大学的情况与那两个单位不一样。我讲了：我们工作组在不让蒯大富同学上中央接待室，和以保护为名限制了他的自由，是错误的；但，蒯不是反校党委的，对他进行批判还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也没有把他定为反革命分子，现在我们已进入批判校党委等等。我坚持了我的错误看法，辜负了伯达同志对我的帮助。而在我后来简单地向刘少奇报告了伯达同志找我谈话后，刘少奇也没有告诉我伯达同志曾提出过撤工作组的意见。

(四)在我参加清华工作组的四十多天里，我几乎是每夜回家住。我常常零碎地把我在清华大学接触到的情况和意见和个人的意见告诉刘少奇。刘少奇发表意见较少。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刘少奇确实批评过我们，并鉴于我们辩论中发生的问题，要我们拟出个辩论手册，以保护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但，他在我们搞“排除干扰”，批判蒯大富同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没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刘少奇是同意我们的基本做法的。直到知道中央文革有些同志对蒯大富同学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他还集中看了清华工作组编辑的一些大字报选、清华工作组长的几次讲话，和清华工作组写给周总理的关于蒯大富问题报告草稿，七月二十日左右还去清华大学看过一次大字报。直到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决定撤工作组时，刘少奇和我还认为清华工作组是属于错误不大那类的工作组，根本就没认识到是它经过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

我讲上面这四个方面，来说明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文化大革命犯严重错误中，刘少奇所负的责任，并不是想推卸我的责任。因为，我所经常反映的情况，多来自工作组领导、当时我们所依靠的积极分子和个人的意见，而我反映的错误情况和意见，恰恰同刘少奇在当时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听到的情况和意见比较一致，因而使他同意和批准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意见。在这方面，我是起了坏作用的。

关于我犯严重错误的根源，几次检查已讲过，根本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没话可再讲，只有今后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关于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篇文章的看法，我上次已写过材料。戚本禹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我读过他几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和报告。《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对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非常好，从三个根本方面：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批得深、批得透、击中要害。文字也写得非常生动。

关于刘少奇是否说过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问题，我过分地相信了我自己和刘少奇。觉得他不可能说过这个话或给过这样的评语。这是我的错误。

刘少奇看这部影片时，是已在北京上映完毕，据动员他看的人说第二天就要拿走。我怎么也想不起是什么人动员他看的了，而看前和看时也没有人向他反映过对这部影片有争论，更不知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对这部影片已提出严厉的批判。现在我仍想是

否有可能是赞扬和欣赏这部反动影片、反对江青同志正确批评的人，故意动员刘少奇看的。而刘少奇看了没讲话，他们也就用刘少奇来抵制江青同志。

即使刘少奇没讲过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

(一) 虽然看了前半部，为什么没有看出这是部反动影片，和不应让这样坏的香港影片在全国上映、毒害人民。他过去看电影和看其他文娱节目，很多次都是别人或我和孩子们在他因病休养时或工作较多时要他休息一下而动员他看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讲过选些轻松愉快的片子给他看，而不是让他审查片子。对一些很坏的影片他也提出过批评，但，大多数他都不发表态度。而鉴于他当时在党内工作的身份，他一看过，别人就可以说刘少奇看过或审查过，而造成不好影响。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两大错误：(1)对于电影、戏剧……是很重要的阶级斗争的武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无产阶级的宣传武器，就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武器，长期认识不够。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虽认识有所提高，却没有引出应有的教训。(2)我曾长期有过这种想法，对我们一般党员、群众和我的孩子们应多看受无产阶级教育的片子，而对我们的一些负责干部，他们似乎不会受不好的文艺节目的坏影响和腐蚀。他们看看各国、各种影片和文艺节目，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各国的、各阶级的动态。好象看“内部参考资料”一样。刘少奇可能也有这种错误想法。

(二) 在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明确提出“被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以后，为什么刘少奇不找当时主管文艺电影方面的负责人调查是谁称赞了这部反动影片，并阻扰了对它的批判。为什么不请示毛主席是谁称赞了这部影片，就应该如何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请主席指示。据揭发材料讲，毛主席以后还讲过这个问题，刘少奇一直未领导和组织对这部影片的批判，确实到了雷打不动的程度。对待毛主席的指示，采这样不认真的态度，不管他讲有什么理由，也是不能容忍的。

刘少奇在许多报告中和讲话中，虽然也多次讲过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宣传工作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革命战线；但，他对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不仅不抓紧，反而由于我上述他的种种错误态度造成了文艺界资本主义思想大泛滥，这里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也是没有得到根本、彻底改造的。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刘少奇曾在1946年初，做过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我没有听过，也没有听过传达。根据揭发，和八月三日斗争我的大会上，一位革命群众叫我念一些内容来看，刘少奇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是极端错误的，说什么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将要到来，鼓吹议会道路，散布对国民党匪帮的和平幻想，说要对我们的军队采取整军，并改变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形式等等。我现在认识到刘少奇的报告是极端错误的，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不仅是讲错话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精神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投降路线错误。而过去我曾认为这是一篇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对我党当时面临的形势和整个工作的安排的报告；而这样重要的报告，关系到我们全党工作形式的改变，刘少奇怎么可能不经过党中央讨论，而只讲他个人的意见呢？当时，旧政协才开完，停战协定刚发表，我党和国民党匪帮均分别发表了停战命令。我曾想是否在多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国内外均有许多人要求和平，我党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抓住和平、民主的旗帜。如果，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由于国际国内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党的努力，使蒋匪帮还不敢发动全面内战，或拖延内战爆发时间，或只限于局部的范围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如果，经过我们努力国民党匪帮仍胆敢发动全面内战(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而且它对反共内战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将更清楚地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了它们的反动面目。所以，当时，我党曾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分析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

认我党的地位，我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并准备如果这种可能出现，我党应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而且准备做一些让步，如让出一些解放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的军队，……。在我党采取了这些妥协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它。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赴重庆参加谈判是取得巨大的胜利的，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间，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威信大大上升。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中，在讲到国共谈判时，除了讲“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从来都强调蒋匪介石和国民党匪帮的本质就是要坚持独裁消灭共产党的。“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就是为了争取和平。”“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守，不能交出去。”“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那个时期，为了争取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在公开的讲话、协定、命令……中，我们党着重表示我们坚持和平、民主的愿望，是正确的，对革命事业是有利的。刘少奇做内部报告却只讲谈判，议会道路一种可能性，而不讲两种可能性；而把工作部署和工作方式完全按可能存在一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去安排，既散布了和平幻想，又给我们的实际工作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他做这个报告，并没有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批准，那么，在组织上也是极端错误的。怎么能对这样关系全局的形势分析和全部工作安排的报告，擅自去讲呢！也太胆大妄为了。

基于上述我曾存在的一些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即这样重要的报告，不可能不经过中央讨论等)，在革命群众追问我时，我的答复，必然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严重错误。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一) 在 1950 年或 1951 年初，山西省的王谦有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刘少奇看后，加了个极端错误的批语，发给了马列学院第一班的毕业生。批语中说“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合作社，以此做为新因素，去战胜农业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批语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据我回忆，他当时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他正组织和领导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强调打倒地主，有的地方搞的是清匪反霸斗争，使贫下中农翻身，保护农村资本主义——富农，以稳定中农，有利于农业发展，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孤立最主要的敌人：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那时满脑子广大新区的情况，而且赞成保护富农。使他完全忽视了在老解放区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极重要的示范作用。他的这个批语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二) 在组织合作社问题上，1949 年——1952 年(?)他比较注意强调先组织供销合作社。强调了在流通环节上的合作化的重要，而忽视组织生产合作社是错误的。强调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有了强大的工业相适应，有了强大的重工业，有了农业机器，才能组织集体农庄，搞农业社会化，因而对农业社会化曾认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因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一直是保守的。

(三) 在 1955 年上半年，广大农民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原定计划。在这种新鲜事物的大发展中免不了出些偏差，也是不难纠正的。而当时有些舆论反映认为合作社发展太快了，引起不少问题。在一次刘少奇主持的西楼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邓子恢集中了反映了这种意见，认为合作社的大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等等错误论调，刘少奇不仅对此

没有痛加驳斥，反而同意了对农业合作社“适当收缩，停止发展”的错误方针，因而就发生了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的严重情况。大大挫伤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刘少奇要负责的。

1957年7月31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是马列主义关于农业改造方面的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最正确的天才的伟大著作，狠狠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大大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具有极伟大的意义。过去，我学过主席这篇光辉著作，以为主要是批评邓子恢等的，并曾以主席指出，在支部检查了我们自己的糊涂认识。最近，我又重读了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结合大字报上的揭发和批判，才认识到主要是批判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某些同志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对五亿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应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并指示“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并批评了“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是看见了较少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的错误思想。批评了“超过干部的经验水平”的论调，指出干部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是要“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主席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不去看问题的本质、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失了方向”。在这篇光辉著作中，伟大的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第一次提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社，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对于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应当同社会主义工业化步骤相适应的问题，有了很大的发展。毛主席并尖锐地批判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当时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这里毛主席提出了路线的分歧。过去我一直以为是批评以邓子恢等直接提出下马的人，现在我认识到，那次西楼常委会，既是刘少奇主持的会上，未批驳邓等谬论，而决定“适当收缩、停止发展”，就使邓子恢等大加“发挥”而砍掉了二十万合作社，造成了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应由刘少奇负指导思想上的责任。我过去在革命群众向我进行的面对面斗争时，说过砍二十万合作社是邓子恢干的，而在1955年前，和主席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指示后，刘少奇对发展农业合作社还是积极的。这就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恶劣影响，是我的严重的错误。

“至于剥削有功”的话，不论在什么情况，什么地方，刘少奇讲了这个话或有这个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

过去，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曾讲过，刘少奇没有直接讲过这个话，而讲过近于这句话的许多错话。而且强调，他讲这类话的时间、条件和作用。1949年党中央搬进北京不久，大概是四月初，有同志反映，在天津有一种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党中央派刘少奇去解决。因当时，我们正大军南下，京津刚解放不久，经济上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经济上困难不小，所以，决定保存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刘少奇在天津工作了一个月时间，在批评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和有一种不敢接触民族资产阶级，并讲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资产(本)主义允许发展时，讲了许多错话，做了错事。有些话，孤立地摘录来看，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

当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根据我的了解作过上述说明和解释，似乎刘少奇天津之

行是根据党中央的委托，总的还是解决了当时的一些重要问题，只是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错误。(这份“检查”是根据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由中南海革命造反派的负责同志交我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原稿翻印。如有错误，以此件为准。)

(原载建工学院《八一战报》总第19期 8月22日出版)

宁夏发生大规模武斗，保守派在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支持下，在永宁围攻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乱枪齐发。造反派死百余人，伤三、四百人。

第一〇一卷 1967年8月9日至13日

8月9日

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和刘丰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上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

林彪同志重要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讲话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地区的问题由总理、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的问题已经请示过主席，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主席指示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好事。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这一次把一些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对革命路线的一方面暴露出来，革命的一方，也表现出来了。这里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激烈、最紧张的地方。

过去我们对个别军区有些不放心，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革命的力量总是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某些人不管怎么样反动，总是顶不过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毛主席指示，烂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坏人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他打下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在这样两个条件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各种坏事让他充分暴露出来。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没有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没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条件，是不行的。在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才有这个胆略和气魄。现在有毛主席健在，亲自领导，亲自掌舵，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各种坏事充分暴露出来好，各种隐患诱发出来好。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乱，经过破，经过革，转化为治，转化为立，转化为胜利，转化为建设。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看来很乱，乱是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有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象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有过这样情形，好人挨整，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很大的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只有第四种差些，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容易解决。

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同志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了甜头。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王、张、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很有利，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百年大计，千

年大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有效的措施。只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乱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

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有的干部犯错误，只要能挽救的，就尽量使他不要垮。但是自己应该下决心改正错误。如果自己不下决心改正错误，硬要往垮的路上走，就没有办法。

要不垮，办法用三条：

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中央是不怕麻烦的，是有这个精力和能力来解决问题的。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和中央许多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打电话看到的人少，又传得慢，打电报，大家都可以看到，还可以自己坐飞机来嘛，一两个小时就可到，不要自己想当然，自作聪明，自作主张。往往自己以为对了，实际上不对，自己以为差不多了，实际上差得满远。这是我反复要讲的，是三条当中最重要一条。

第二，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要听取两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调查研究是基本功。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三，现在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要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左派一边，站在革命群众一边。不要单纯从成份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来看问题。阶级成份是必须注意的，不注意会犯错误。但不能唯成份论，主要要看政治表现，看站在什么路线上。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对待保守组织的群众要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要进行分化争取工作，不要使他们和革命派长期对立，要争取广大受蒙蔽群众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派一边。对保守组织的个别坏头头，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发动保守组织的群众自己起来把他抓出来。要坚持支持左派，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左派本身有问题应强调联合，说服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搞本位主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主义不利于左派，而有利于右派。对右派组织的群众不能简单粗暴地压制。出了问题，出了事情，要报告请示中央，不要急，要慢慢地有步骤地解决，把情况弄清楚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工作作风。

现在老实讲，耽心我们同志担负这样重的任务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利。现在依靠军队，军队不犯错误就好，要不犯错误，就要依靠左派，依靠群众，最重要的是请示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就要高姿态，早认错比迟认错好，高姿态比低姿态好，改正的越快越好，这样群众就会满意，就会谅解。有错误不认错，遮遮盖盖，拖拖拉拉是不好的，坚持不改正错误是危险的，抗拒的办法是不行的。检讨了，改正了，就主动。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情况不了解，难免犯错误，错了不认错，就被抓住辫子，错了改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受到群众的欢迎。共产党人要有这种不掩盖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经过几十年，农村情况已经熟悉，这些问题都清楚了。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新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发生了新情况，出现了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全党许多同志过去没有仔细研究过，理论上、思想上准备不足。过去推倒三座大山，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

主革命一套。胜利后就变了，不知不觉地踏上了新的阶段，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这种革命，许多同志没有准备，没有认识，只有我们毛主席理论水平最高，在理论上、路线上、思想上、方针政策上高瞻远瞩，胸有成竹，早有准备，或者思想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有准备，其他一般的同志都没有思想准备。过去我们对农村土地革命熟悉，对资本主义不熟悉，在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侵略可以看的清楚，一个普通工人都能够懂得，但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我们过去又是在农村，许多同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理解很少。假如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一套旧思想、政策、理论来看今天的革命，就难免要犯错误，就不能理解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过去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的办法搬到今天，就不能不犯错误。犯错误有两种，一是肯改，一是不肯改。肯改，党和群众就欢迎，不肯改，就将毁了自己。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很不理解，进入了新的社会制度，作的新的事，脑子里还是老的一套概念。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但过去的领导班子，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除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之外，不少人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有的是资产阶级分子，所以犯很多错误，而这种错误，非纠正不行，绝不能因为犯错误的人多就不纠正。如果不纠正，就会不知不觉地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使我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家就会变颜色，有些人就会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政治大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经过这个政治思想上革命，就弄不清楚那些是社会主义，那些是资本主义，自以为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变了，变成了资本主义。只有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把毛主席思想搞通，才能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才能分清左右，分清正确和错误。否则，就会分不清敌我，分不清是非，把右的当成左的，把错的当成对的。今后要在毛主席领导下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把毛主席思想学习领会通了，就是懂了马列主义，才能不犯错误。

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靠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主席、中央。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要政治挂帅，要学毛主席著作，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发展，后退。

毛主席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用毛主席思想挂帅。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只要大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两条路线教育，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搞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不突出政治，就会迷失方向，甚至有的镇压人民，象内蒙一样。总政治部反谭政以后一段时期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办了一些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差了，跟不上形势。现在还要想办法，把总政机关改造好。

大学毛主席著作，主要依靠各大军区、军、师、团、营、连。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是个法宝。工作主要是靠各军区，主要是抓好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抓好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要讲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多介绍左派的好处。教育部队正确对待革命左派、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当前要抓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有抓好大批判，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把干部、战士的头脑搞清楚，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了，才能完成“三支”“两军”任务。如果部队本身的革命化不搞好，一出去就会出洋相，犯错误。“三支”“两军”，是在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的情况下，要军队去接管，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的军队干部参加三结合，有的军队干部要调到地方工作。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政权的重要性，对

领导班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头脑不清醒。过去十七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着一部分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的班子垮了，部分国家机器不灵，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过去旧的当权派领导班子垮了，实际上等于这一部分旧的国家机器不适用了。这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同，又有相同的地方。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一部分垮了，是好事，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就让它垮。垮了，军队去接管。

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军队接管不要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立即改正。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干部，要照毛主席指示分期调来集训，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取革命造反派的意见。要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也可以调来集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不通，通过教育转变过来的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就欢迎。应该按照主席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干部。就是暂时被打倒的人，教育过来也是好嘛。大多数干部是可以争取过来的，思想不通的也可以争取过来，使他们改头换面。经过教育之后，大部份还可以用。能不打倒就不打倒，有些暂时打倒的，还可以重新教育过来。领导班子是国家机器，必须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不适当的零件就要撤换，让他们受训，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刚才讲了，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参加的会少，知道的事情少，我说的话仅供同志们参考。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主席都有指示，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

一再告诉你们，三个条件，特别是第一条。怕你们犯错误，事情宁可慢些，凡事要多考虑，不要急，拖几天，天塌不下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其他同志日夜干，希望上上下下都要注意请示报告。

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

部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我们过去就是请贫下中农来报告嘛。内蒙请保守组织报告，所以把部队都引到邪路上去了。

林彪给北京卫戍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造反派负责人，说：武钢的联合必须以“9·13”为核心，不支持“9·13”就是不支持革命。（《传信录 893》）

谢富治接见外事系统代表，说外事系统也要批判修正主义，但千万不要武斗。（《传信录 894》）

陈伯达于晨四时巡视中南海两门间的揪刘队伍，表示慰问，同时指示应该撤回。

戚本禹到煤炭部讲话：国务院煤炭部改为煤炭科，到生产第一线去，抓革命，促生产。（《传信录 895》）

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接见“政法公社”成员，说谢副总理 8·7 讲话是有指导性的讲话。对公检法的基本估计，这个问题还要问问谢副总理。（《传信录 896》）

《红旗》杂志成员林杰讲话：军内走资派在支左中必然勾结地方走资派，对他们，就是要发动亿万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打倒。揪出军内“一小撮”，我们的军队就更强、更巩固。（《传信录 897》）

首都“5·16红卫兵团”与北外“6·16”红卫兵开展了所谓8·9战役，在市内出现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师大内大量发散传单，内容共四部分：1.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干了什么？；2.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3.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叛徒；4.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商业部也出现《质问周恩来三十一个问题》的大字报。

“五·一六”反革命案内幕

十年动乱期间，发生过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就是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

笔者是当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以下简称“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总理事件发生时的见证人。

“五·一六兵团”贴大字报攻击周总理

此事发生在1967年8月上旬。最早知道这个事件将要发生的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这位通讯员当时正在北京钢铁学院采访，他对北京钢铁学院各派别和他们的头头都比较熟悉，因此各派头头的观点和运动中的行动计划都不避讳他。

因此，“五·一六兵团”策划反对周总理，公开贴周总理的大字报的会议和准备过程被这位通讯员全部掌握。在“五·一六兵团”开始行动前四五个小时，这位通讯员就将情况及时准确地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

那晚9点左右，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给我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谈了有关情况。并强调，我们的通讯员就在现场，希望马上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正在钓鱼台16楼大会议室开会。我把袁光强报告的内容整理成电话记录，到会场直接找主管办事组的戚本禹，把电话记录送给他看。他看后只说一句：“请谢富治同志处理！”戚未作批示就把电话记录递给我。我考虑戚本禹的话空口无凭，找谢富治不好说，于是我在电话记录纸的批示栏写上：“戚本禹同志说，此事请谢富治同志处理。”然后放在正在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谢富治面前，我就退出会场。后来我听说，参加会议的小组成员和列席人员都在会场看了这个电话记录，当晚散会后，小组成员和往常一样，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然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后半夜我打电话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秘书邵崇勇同志是否掌握了“五·一六兵团”贴周总理大字报的情况？他告诉我已经掌握了，“五·一六兵团”贴出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它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

江青一伙组织调查嫁祸他人

“五·一六兵团”贴出反对周总理的大字报后几天里，江青一伙一直没有作出反应。大约8月中旬，由戚本禹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调查“五·一六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

在调查中，从“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主管《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关锋的妻子。还有“五·一六”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还有人反映，《红旗》记者站的记者同有反总理倾向的、国务院某部门的一个老干部有过接触。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即1967年8月底，王力和关锋的问题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端了出来，8月30日晚，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开完批判王力和关锋的会后，他们两个被隔离审查，每人带一套《毛选》和纸笔关到钓鱼台二楼去反省检查。

江青在事件还没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把反周总理的罪责全部推到王力、关锋身上。1967年9月5日，江青一个讲话透露中央文革内部揪出了坏人，而这一伙坏人的矛头是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五·一六”反革命活动就是明证。

江青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故意制造“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她所控制的中央专案组和“五·一六”专案组，把大批他们不满的人，和“五·一六”分子毫不沾边的人都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加以迫害。

(摘自《世纪》2003年第7期 王广宇文)

徐景贤传达姚文元讲话，支持在上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先搞十万人左右。然而主要靠文攻。文攻就是大批判。开大会可造声势，还要写文章。北京已组织了一百人的写作班子，写重点文章。上海也要搞一、二百人的班子。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刊登《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的文章。指责北平军人反省院“61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盗用党中央名义作出的决定。两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郑州警卫司令部在司令员陈贵昌、副司令员王辉、政委王新率领下进入郑州。8月13日，警卫司令部给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造反派发放枪支。

8月10日

中央发布关于派国防军维护交通的命令。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切实保障铁路运输的畅通，现决定派出部分国防军部队担负护路任务。部署如下：

一、任务区分。^①

二、铁路系统已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后，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或改组，以便更好地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

为了密切配合，共同完成维护铁路交通秩序的任务，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三、担任护路任务的部队，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广泛深入地宣传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和有关方针政策、命令、指示和规定，保证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四、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群众组织和革命职工，与铁路、交通运输系统以外的群众组织之间一律不许互相冲击。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群众组织，除中央特许者外，暂不参加本单位以外的群众联合组织，但可参加本地区的联合的政治活动，如革命的大批判。

外地、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在铁路、交通运输部门设置的联络机构，必须撤出。铁路、交通运输部门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之间，也不要互相设置联络机构。

命令的第四条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单独公布、张贴。

中央发布关于湖南问题的决定。

已阅，同意。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① 内容从略。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委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

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中央发布关于江西问题的决定。

此件看过，照办。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例如：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联络总站)，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

(二)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江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高举拥军的旗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协助他们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坚决揭露和制止保守组织中个别头头煽动攻击、殴打、绑架我支左部队指战员的错误行为。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应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查和改正了就好。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

(三)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程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由各方面协商产生，报中央批准。杨栋梁、温道宏、鲁鸣、罗元炘、陈昌奉等同志，以及黄先、刘瑞森、郭光洲等同志，可先参加筹备小组，并开始工作。筹备小组统一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条件。

(四)各革命组织及江西省广大革命群众，应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保证铁路等交通运输的畅通，保证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各革命组织及群众组织应当进行内部整风，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批判和克服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参加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的群众，要勇于揭露和改正错误，端正方向，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联合筹委会”方面的革命造反派，对于受蒙蔽的群众，要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摆事实，摆道理，进行耐心的、细致的、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热情帮助和欢迎他们提高觉悟，投入革命的行列，决不可采取打击报复、歧视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实现以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

(六)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中央对陕西省军区的指示：

陕西省军区：

对西北光学仪器厂 2·10 事件，根据国务院调查材料和陕西省军区反复调查的材料，中央认为是一个破坏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对逮捕的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应该予以教育释放。2·10 事件严重的破坏了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各群众组织应从中吸取教训。在 2·10 事件中犯了破坏国家财产的错误的，应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陕西军区在处理 2·10 事件中是有错误的，但不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现在平反是对的，不是“为打、砸、抢翻案”。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烽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相信他们。如对他们有意见，应实事求是地采取同志

式的态度帮助他们。

此件可向群众组织宣读。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叶群、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与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座谈北京及全国形势。康生指出：7·24 北大批判彭真的大会是错误的，把讲台让给了修正主义分子。（《传信录 900》）

周恩来、戚本禹、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接见煤炭部代表，对煤炭生产严重下降表示忧虑。宣布调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王俊任煤炭部军事代表，与副部长范文彩组成筹备小组，改变生产状况。（《传信录 901》）

谢富治在工代会纪念 8·8、8·13 大会上讲话：前几天，有的人居然武斗到中央文革来了，他们拿着手铐脚镣去中央文革宣传组抓人。（《传信录 902》）

下午 4 时，浙江温州“温联总”一部分人纵火焚烧市区，主要街道几乎全部烧毁，支左的 6299、6517 部队被围困，纵火者扬言烧平温州城，再用炮轰枪扫。

夜，新华社国内部和军事部编辑向王力送审稿件时，王力指示：新华社的国内分社大多是好的，是经受了考验的，其中有不少同志表现很好。请你们立即排个队，把那些坐过牢的，受过打击的，坚持斗争的，在关键时刻反映了重要情况的优秀记者，排个名单，到北京开个会，报道一下，长长志气，支持革命的记者、编辑。会议不要老保出席。我们中央文革要集体接见他们。这件事情请你们快办，越快越好。中央文革办事组要直接抓，新华社要快办。

8月 11 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在人大会堂对大学红代会、工代会及三军造反派讲话。陈说：有人认为，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夜。这是对形势的不正确的估计。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搞好拥军爱民。现在又出现第三次大串连的号召，想包办全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头的。（《传信录 905》）

江青、康生、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它把矛头对准总理，实质是对准中央。

反革命集团 5·16 是什么货色（摘要）

5·16 组织全称是“首都 5·16 红卫兵团”，是由北京钢铁学院“钢院 5·16 红卫兵团”发展而来。钢院 5·16 红卫兵团的发起人张建旗也就是总部的头目。其下分设八个方面军：农村口、财贸口、文教口、工交口、军口、中学口、外事口和全国通讯联络。早在三月份张建旗就提出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5 月，利用 5·16 通知发表，声言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把矛头指向周总理，6 月 2 日发表了致周的公开信，发散传单《23 个为什么？》六月份成立了首都 5·16 兵团，召开了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周总理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是“二月黑风的罪魁祸首”。在内部大搞“二亿三查”^①。8 月 11 日江青宣布它是反动组织，8 月 20 日逮捕了张建旗并组织部长、地下武工队长李芳、陈立等。

（原载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东方红简讯》第四期，1967 年 9 月 23 日，并参考钢院《东方红》第 35 期《5·16 罪恶活动大事记》。）

^① 忆受压迫受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

[附] 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毛主席批示：照办。

[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

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外事口在人大会堂召开了首次万人批判陈毅大会，周恩来、谢富治参加，陈毅被勒令在 15 天内交出认罪书。其罪状是执行了刘邓的“三降一灭”和文革中执行了反动路线。会间，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周恩来奋力劝阻，说搞臭了陈毅，谁来当外交部长？但全然无效，以至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在连日大小八次批判会上，陈毅因得周恩来保护，免遭冲击。

万人大会批判陈毅

八月十一日，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万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首次批斗陈毅大会。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谢副委员长也参加了大会。大会揭发批判了陈毅在外事工作中执行刘邓“三降一灭”外事路线及文化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通令陈毅在十五天之内交出认罪书。陈毅在铁的事实面前，向革命造反派低下了头。并当场向一位因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言论而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小将鞠躬两下。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表示愿向外事口革命派交出认罪书，以后再到群众中来受批判。

会议大长革命造反派的志气，会后总理做了指示，提出今后应多开些中小型会议，才能更好地批深批透。

(原载北航《红旗》第 61 期《红旗雷达站》1967 年 8 月 15 日出版)

总政机关造反派开会，揭发批判萧华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国防科委、总参、总政和三军驻京科研单位在工人体育馆召开联合大会，批判刘、邓、贺、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揪出了罗瑞卿，并有张爱萍、张廷发、张劲夫陪斗。粟裕、王树声、郑维山、罗舜初、刘华清等出席。

周恩来电话指示：在中央解决广西问题期间，“联指”围攻“4·22”据点的做法是错误的，要立即撤出。

8月 11 日—12 日

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大抓军内一小撮”及“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外交部两次照会缅甸大使馆，抗议缅军杀害中国边民。

8月 12 日

毛泽东开始发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从此不再使用。

周恩来第七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指出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两派夺枪都是错误的，尤其是“萍总”所为，严重的说是叛乱行为。萍乡“大联筹自卫兵”反击是正义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挑动农民进城，问题严重。(《传信录 906》)

周恩来、康生、关锋等接见宁夏军区负责人，指示调军区负责人来京，检查纠正正在三支两军中所犯路线错误。（《传信录 907》）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戚本禹接见“湘江风雷”代表，周指出：华国锋是中央了解的。提出“揪出八·八电话的黑后台”是错误的。你们看主席能调动多少人进行工作？“高司”总比当时的四方面军好吧！（《传信录 908》）

北京西单商场发生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最严重的一次武斗，造成巨大财产损失，谢富治亲往制止。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召开庆祝大会，**刘贤权任主任**。

8月12日—15日

“首都五·一六兵团”第一、二、四、五、六方面军负责人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了三天“火线会议”。作出了四点决议：

一、要加强我们的斗争，坚定我们的政治方向，而不容许削弱我们的斗争和动摇我们的方向。

二、要坚持我们的斗争口号，而不是缓和和修正我们的斗争口号。

三、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要还我毛主席的四大，而不是丢弃毛主席的四大。

四、坚决毫不动摇地为建立红色根据地而奋斗，把我们的组织能公开的则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8月13日

周恩来在南京对温州问题发表指示：中央军委已对温州问题定性，是反革命武装叛乱。温州保守组织“联总”在本月上旬与造反派“工总司”等发生严重冲突，保守派得到海军的支持。造反派被围攻，情况严重。街道被焚、工厂破坏。中央在派出 6517 部队前往支援后，又于 8 日增派 6299 部队前往。周并指示马上给温州运送粮食与医药用品。（《传信录 911》）

谢富治在市委常委会上讲话：劳改犯造反一律枪毙。把出来的劳改犯统统关起来。有人说：现在发展到武斗阶段，这是反动理论。两派武斗可能有黑手支持。（《传信录 912》）

中央文革文艺组通知，恢复练功、练唱。

各口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前几天，江青同志接见中国剧院《红灯记》演员时指示：演奏员必须坚持练功、练唱。为此规定：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所属的艺术团体院校的革命委员会(或临时权力机构、斗批联络组织)迅速组织本单位演员及演奏人员，即日恢复练功、练唱、练乐。在时间上要给予一定的保证，随时研究练习基本功的内容方法，并将这一活动坚持下去。特此通知。

中央派兰州军区所属 8116、8119、8047、8048(部分)及炮兵部队进驻银川，以图稳定宁夏局势。

湖南道县召开动员大会，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熊丙恩(原县委副书记)讲话：“告诉下边，一个生产队可以先杀一两个。”掀起大屠杀狂潮，祥林铺区的“百人杀人团”在不到一个月中，屠杀上千人。